

史覽其職

史党共聯

著基斯夫拉斯魯耶

行印社版出華中

1938



“布爾塞維主義”

Kustodev 作

目 錄

引 言

蘇聯共產黨（布）的歷史作用與意義

甚麼是列寧主義

爲什麼俄羅斯成了布爾塞維主義的家鄉

第一章 在最初馬克思主義組織產生以前十九世紀俄國革命運動概述

十二月黨

革命平民智識分子的運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民粹派

民意黨及黑分黨

四

五

六

七

九

三

六

一

一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之初步	四
南俄工人聯合會	四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	四
最初工人小組與最初工人聯合會的意義	四
民粹派運動的總結與結論	五
民粹派不懂得社會發展的道路	五
第二章 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爭取無產階級在俄國的政治領導	
權（從勞動解放社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五
勞動解放社	五
馬克思主義之傳播（最初的社會民主派小組）	五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列寧在彼得堡	六
列寧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	六
合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書報上之反映	六
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同盟	六

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一六

第三章 列寧的「火花報」(經濟主義的粉碎以及對於社會革命黨民粹派恐

怖主義的鬥爭) 一五

經濟主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機會主義流派 一四

蘇巴托夫派 一三

馬赫以斯基派 一二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火花報」 一一

列寧的「怎樣做」一書的意義 一〇

革命職業家是些什麼人 九

第一次革命前夜列寧對於國際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 八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的三個時期 七

第四章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六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成份及意義 五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綱領問題上的分歧	一六
第二次大會通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	一七
黨章「關於怎樣才能成爲黨員的問題」之爭論	一八
戰略和戰術問題，第二次大會對自由主義者之態度	一九
二次大會論社會革命黨	二〇
中央機關之選舉，組織上的分裂	二一
二次大會之總結	二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後（一九〇三—〇四）黨內生活之簡述	二三
第二次大會上及二次大會後的托洛茨基主義	二四
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國際意識	二五
第五章 布爾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二六
第一次革命前夜的情況，羣衆的革命運動	二七
日俄戰爭與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二八

- 孟塞維克的地方會議運動的計劃以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批評——一六四
-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一七五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集，多數派委員會的執行局——一七九
- 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人的兩個策略——一八四
-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一八六
-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一八八
-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策略問題——一九六
- 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及其機會主義的決議——二〇四
- 第六章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進程中布爾塞維克策略的證實——二一〇
- 刺武裝暴動之路——二二九
- 一九〇五年十月的總罷工——二三四
-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農民運動——二四六
-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二五九
-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蘇維埃的意義——二六〇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暴動	二四四
黨對於國會的略策：抵制國會，撤消抵制	二四四
第七章 十二月暴動及反動時期	二五二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第一次泰米福爾大會	二五二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的聯合大會及其決議	二五三
斯托克霍姆大會的策略的決議	二五三
第四次第五次大會間黨的鬥爭	二五六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倫敦大會及其成份	二五六
倫敦大會上的策略問題	二五七
揭破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大會和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	二五七
職工會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態度	二五八
第一次革命時期布爾塞維克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	二五九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二六三
第八章 第一次革命時期黨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	二六九

俄國工人階級組織的特殊條件	二六六
黨的組織是如何建立的	二六〇
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黨的黨員數量及其社會成份	二五五
黨組織中的選舉制	二五九
工人的出版物是如何印刷的	二五二
黨在農民中及學生中的工作	二六八
布爾塞維克在海陸軍中的工作	二五三
黨論游擊鬥爭	二五七
黨的工作經費是從那裏來的	二五〇
失業工人委員會	二五三
第九章 反動時期的黨	二五三
六月三日以後統治的社會經濟實質	二五八
政府的反革命及社會的反動	二六八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線與組織路線，這一時期黨的中心會議	二七一

孟塞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塞維克對於他們的鬥爭	三四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全俄黨的代表會議	三五
召回派和哀的美敦書派是取消派的內應	三六
一九〇九年六月「無產者報」編輯部的擴大會議	三六
「左」的取消派聯合為前進派	三六
反對托洛茨基中間主義立場的鬥爭，反對布爾塞維克中調和派的鬥爭	三六
一九〇一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	三六
布爾塞維克同孟塞維克黨派的同盟	三六
第十章 在新的革命高漲時期中的黨	三六七
新的革命高漲的開始	三六八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連那流域慘案	三六八
為羣衆的工人組織而鬥爭	三六八
黨的「星報」的作用	三六八
「思想」和「教育」雜誌	三六八

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和「我們之路」……………三六五

一九二二年布拉格黨代表會議及其在黨史中的意義……………三六六

一九一三年黨的會議，克拉可夫和波洛寧會議……………三六七

托洛茨基派取消派的八月聯盟……………三六八

國會黨團的工作……………三七二

保險運動……………三七四

在兩個革命中間國際舞台上的布爾塞維主義……………三七五

第十一章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對於戰爭的估計以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三八七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的原因……………三八七

第二國際的崩潰……………三九一

對於社會國家主義派的鬥爭……………三九五

中間派是掩蓋的國家主義者……………三九九

布爾塞維克對戰爭的態度……………四〇三

關於民族自決的口號與黨裏「左傾」分子的立場……………四〇四

布爾塞維克關於解除軍備口號的意見	四六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黨的工作	四二
對於國會內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審判	四二
爲第三國際而鬥爭，齊米瓦爾德和金泰爾的代表大會	四四
大戰中俄國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狀況	四九
大戰時俄國的工人運動	四三
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四六
第十三章 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布爾塞維克把它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	四三
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及黨的作用	四四
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及臨時政府，兩重政權及其社會根源	四三
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寧的提綱	四三
一九一七年四月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對於機會主義者的鬥爭	四八
四月代表會議論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	四六

第十四章 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之準備與資產階級政權之被推翻

四六九

羣衆革命動員的時期

四七〇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示威

四七一

混合政府，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克倫斯基的進攻，布

爾塞維克爲爭取軍隊中的影響而鬥爭

四七二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五日的事變，黨是羣衆的首領

四七三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斯達林同志在大會上

的作用

四七四

區域聯合派與托洛茨基

四七五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國事會議

四七六

可尼洛夫的暴動

四七七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組織暴動的時期

四七八

民治會議，國會預備會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四七九

武裝暴動的準備，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工賊行爲之揭發

四八〇

暴動的組織與執行

五二

附錄(一)

五三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五三

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研究黨史

五四

布爾塞維克黨的三十年

五五

論聯共黨史課本

五六

怎樣研究聯共黨史

五六

聯共黨史研究提綱

六二

附錄(二)

六五

蘇聯共產黨(布)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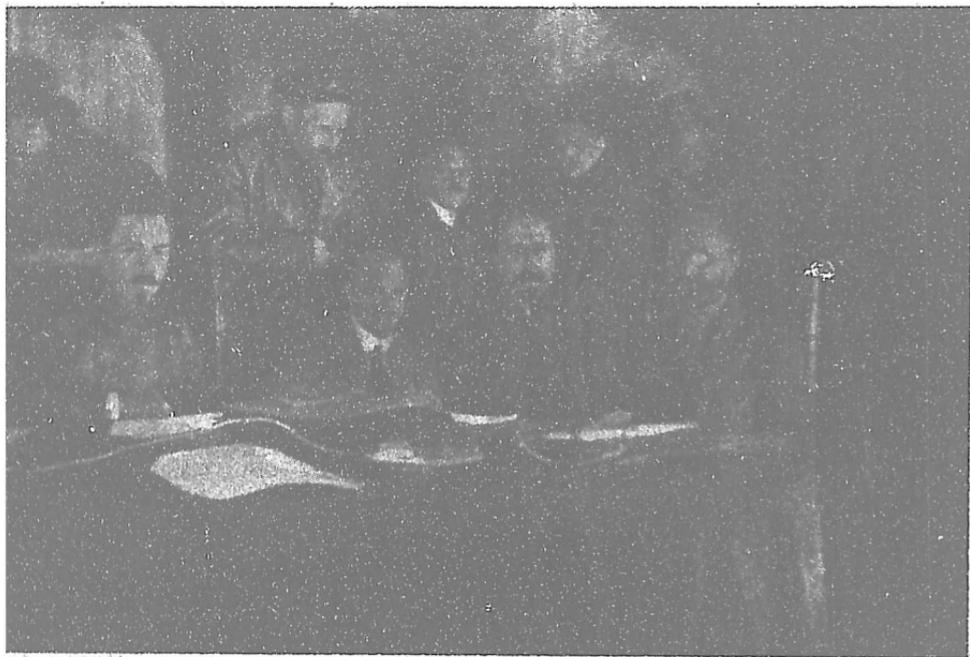
六五



列 寧 像



斯 達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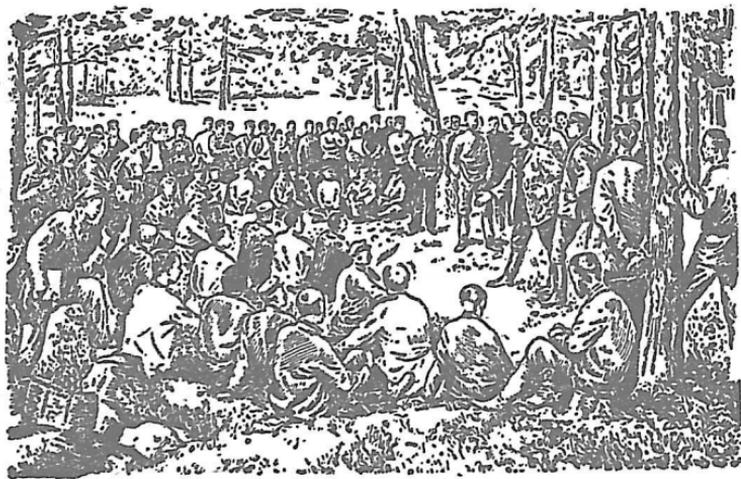


蘇聯的領袖

沙可納夫, 畢阿他可夫, 布哈林, 卡美內夫, 庫爾俠克 (自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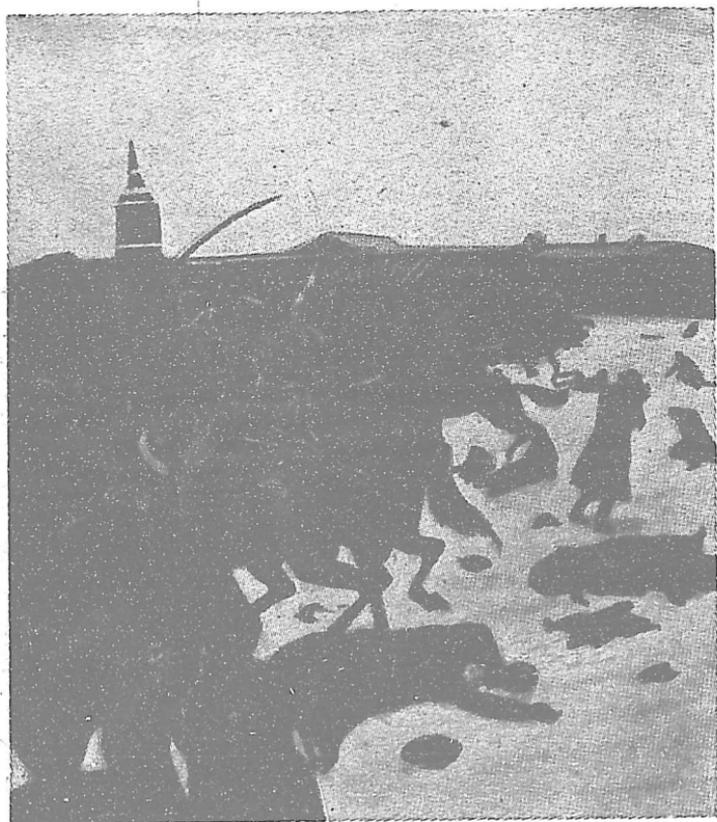


彼得堡「工人解放鬥爭同盟」的成員，
中坐者列寧，列寧左旁者即馬爾托夫



一八九〇年俄國瑪也夫卡工人
於五一節在樹林中的祕密集會

「血的日曜日」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冬宮前的射殺羣衆事件。



一九〇五年在彼得堡迫打罷工者



一九〇五年俄國農民暴動，搗毀地主的莊院



一九一七年列寧回彼得堡時受羣衆歡迎之盛況



一九一七年列寧向革命士兵工人指導十月暴動

引 言

蘇聯共產黨(布)的歷史作用與意義

世界上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俄國勝利了。布爾塞維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鞏固基礎上產生於一九〇三年，他在這個革命以前十五年間，以天才的領袖列寧為首，領導了工人階級鬥爭的一切形式與一切表現。以布爾塞維克黨為首的俄國工人階級成爲在反對沙皇制度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千百萬城鄉勞動者的領導者。

第一次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新的蘇維埃國家形式的國際意義是偉大與無可爭論的。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勝利的鬥爭，他的國際意義，現在連我們的敵人亦承認了的。因此，研究這個鬥爭的歷史，研究列寧黨的歷史具有最重大的意義——不論對於我國（蘇聯）的工人階級

及一切勞動羣衆，不論對於其他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勞動羣衆；他們在自己的特殊環境中正面遇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或者自己的『十月』。

這個鬥爭歷史，其革命事變之豐富，其在以布爾塞維克黨爲代表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羣衆的異常的英勇，其革命運動形式之複雜，都是足以令人驚嘆。爲着了解這個歷史首先應該研究布爾塞維克主義發展的道路，他的根源，他在俄國及國際舞台上的鬥爭。應該指明白爲什麼正是俄國產生與發展了布爾塞維克黨，爲什麼正是俄國先於別的國家取得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俄國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之產生，比歐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要遲得多。而布爾塞維克主義首先是澈底最革命的社會主義科學理論與有組織的羣衆的工人運動之結合。當俄國的工人階級以革命的領導者與決定的力量出現時，在俄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存留這樣的農奴制的殘餘，這些農奴制的殘餘，培育了不僅幾百萬工人，而且幾千萬農民，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及廣大的城市貧民階層對地主警察的國家之尖銳的階級仇恨。

必須首先消滅沙皇專制制度——這一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在農奴制度殘餘及資本主義的壓迫下的工人階級，從自己的有組織的鬥爭開始時起，依靠在幾千百萬農民及被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的同情之上，就站在一切民主份子的革命運動的先頭。

俄國的資產階級從不會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年資產階級的歷史稱之爲『糊塗年』）特別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例子，招起了俄國資產階級對於本國革命的恐懼，提醒了他去和沙皇制度找尋妥協，忍受羣衆被壓迫的最恥辱的現象；幫助對於幾十種所謂『異族』的民族的民族壓迫，祇是爲了避免革命。俄國的資產階級估計了在資本主義新階段上——帝國主義的時代——俄國的革命，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不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之內，他必然地應該做成到社會主義去的步驟。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引起了所有的資產階級的恐懼，因爲它轉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

俄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經過許多的根源與地主經濟聯結着，接收國家的大量的定貨，他準備着和地主妥協，只要能够避免人民羣衆的革命。這個革命不能不迴轉來反對資產階級。應該注意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比西歐遲得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已經基本地被分割完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大部份把沙皇制度看做能够在爭取和攫奪新的市場的事業上保護他們的利益的一種力量。

但是假如資產階級不能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那麼是否有另外的力量是能够領導革命運動呢？工人階級就是這樣的力量。歷史提出俄國工人階級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領袖。歷史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的任務是這樣地去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便這一革命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以便他立即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指明：無產階級革命附帶地，順便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反對世界憲兵（俄國的沙皇制度）的鬥爭，解放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幫助了它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

這樣，俄國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完成了最偉大的歷史任務。他早於別國的工人階級實現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恩格斯）所規定的綱領，就是非常有力與有歷史先見的共產主義者宣言上規定的綱領。在一八四八年當他們著作共產主義者宣言時，馬克思與恩格斯預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獲得民主主義。

無產階級使用自己的政治統治爲着逐步的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集中生產工具在國家手中（就是無產階級組成爲統治階級的國家手中），以及儘可能迅速地增加生產力之總和。』（共產主義者宣言）

共產主義者宣言中所規定的具體辦法的大部份在俄國早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實現了。

俄國共產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所以能够完成這樣巨大的任務，就因爲他們在列寧與斯達林領導之下，在自己身上完滿地體現了一切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特點，他們用共產主義者宣言的話來表達就是：『他們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之區別就在一方面，在不同的民族的無產者的鬥爭中提出與堅持與民族性無關的整個無產階級的總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發展的不

同的階段上，他們永遠是整個運動的利益的代表者。

因之，共產主義者在各國工人政黨面前是最堅決的，永遠推動運動的；在理論方面，比之落後的無產階級羣衆，他有了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過程與一般的結果的長處。」列寧在分析共產黨的特點時，寫道：「他是這個先進階級的最覺悟有毅力與先進的部分，是真正的先鋒隊。」

在無產階級面前放着偉大的任務——奪取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共產主義。綱領。因之我們是不能戰勝資產階級的，如果「沒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黨應該有充分的勇氣去領導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充份的經驗去明晰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應該有充份的機警去迴避達到目的的路上的一切的和各色各種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不要想推翻帝國主義與奪取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政黨就是列寧主義的政黨。」（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

俄國無產階級對於革命任務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列寧的了解是長期的組織與鼓動宣傳工作的結果；是布爾塞維克黨在幾十年中複雜的革命鬥爭的結果，布爾塞維克黨在自己身上體現了「我們時代的智識，忠誠與良知。」（列寧）

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了工人階級反對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達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及達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勝利。國際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最豐富

的經驗上學習怎樣與自己的資產階級鬥爭並戰勝牠。

列寧的最寶貴的遺產是布爾塞維克的黨。他依據在馬克斯列寧主義學說的堅固基礎上行動着，馬克斯列寧主義又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為列寧與斯達林所發揮。

甚麼是列寧主義

照列寧的說法，俄國之達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真是歷盡磨練。

『俄國以半世紀的歷史的磨練。空前的困苦與犧牲，驚人的革命勇氣，非常的毅力與熱忱的探索和研究，實際的考慮，失望，檢查，歐洲經驗的參照等等，方領悟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的理論。』
 (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寧與斯達林把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上，依據新的經驗與階級鬥爭的新的條件獨立地發展了牠。

斯達林反對着一切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與偽造，反對把列寧變成『農民哲學家』。他給列寧主義下了確切的定義：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戰術，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戰術。』(列寧主義諸問題)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創建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入高階段——帝國主義的時期，列寧『在發展了的帝國主義時期，在開展着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了，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開始無產階級民主的新時代，蘇維埃時代的時代（斯達林同上書）』根據新的經驗，根據無產階級的鬥爭發展與補充了科學社會主義。

在列寧死後，在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時期中，斯達林天才的繼續了列寧的這個工作。

當羣衆的工人運動在俄國剛剛萌芽的時期，列寧及其擁護者（一九〇三年起——布爾塞維克派）就開始了在工人階級中的革命工作。在西歐，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過着熱中於國會議員的時期，機會主義者在這些黨的中間影響極大。機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者，因此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列寧主義不僅進行了與俄國的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派別（民粹派，經濟主義，孟塞維克取消派，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他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一開始，就有國際的意義，這個鬥爭不僅在俄國的舞台上進行，而且在國際的舞台上進行。列寧主義充滿着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他在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肉搏中生長與鞏固起來，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鬥爭是戰勝資本主義的必需的先決條件。』（斯達林：列寧主義諸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關於實現

他的形式，關於他的任務。馬克思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共產主義者宣言、哲學之貧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列寧亦是一樣，他亦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八九四年；俄國社會民主派之任務，一八九七年）就十分明確的提出這個問題，列寧的功績就在於他從開始活動的時期起，就起來反對那些爲滿足資產階級而在這個問題上爲造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企圖證明馬克思從來沒有鄭重的提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考茨基甚至說道：馬克思僅僅偶然地說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小的字』。

但是馬克思不止一次的着重的指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正是他加添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的新東西。馬克思於一八五三年三月五日致威依特梅的信中解釋了關於階級鬥爭及現代社會之階級的分裂，在他以前的資產階級歷史家已經描述了的。

『我所做的新的東西，就在於（一）階級的存在祇與生產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聯結着；（二）階級鬥爭必然地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的本身祇不過是到一切階級的消滅，到沒有階級的社會的過渡。』

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發揮這個理論，其中之一就是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佔馬克思理論的最重要的地位，這個思想是列寧在反對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偽造者時所堅持的。在火花報編輯部製定綱領時，列寧提出原則的改正，堅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節加進黨綱

裏面去，而在爲布爾塞維克黨鬥爭時，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領導權問題佔最主要的地位，亦正因爲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是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到無產階級專政之過渡階梯。關於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之力量與能力而直接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是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不可分離的部分。叛徒考茨基「承認」階級鬥爭而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反對他的時候寫道：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學說中的最主要的。大家常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對的，從這個不對中，往往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偽造馬克思主義以便適應於資產階級。因爲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造的，一般地說來，對於資產階級是可以接受的。誰祇承認階級鬥爭，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限制爲階級鬥爭的學說，就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他，把他弄成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祇有擴展承認階級鬥爭直至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國家與革命）

十月革命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下體現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學說成爲共產國際綱領之最重要的部份。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成爲國家的新形式——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的國家，這是我們黨的最偉大的功績，是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國際勝利。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之最要與最有力的工具，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他在俄國實現的時候成爲「——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的先

錄隊與非無產階級無數的勞動者階層（小資產階級、小經營者、農民、智識分子等等）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資本的的聯盟，以完全推翻資本爲目的的聯盟，完全鎮壓資產階級的抵抗及其復辟企圖的聯盟，以完成創立與鞏固社會主義爲目的的聯盟。」（關於自由與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的演講的序言）

因此，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有重大的意義。「這是顯然的，誰準備取得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行動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總問題之一部份，因而成爲列寧主義的最活躍的問題之一。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內，農民問題作爲同盟者的問題，就是如下的問題：「由於農民生存的某些條件而來的，埋藏在農民之中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能用盡了呢？有否希望與根據，來利用這些可能性爲着無產階級的革命呢？來把農民被剝削的大多數農民從資產階級後備軍（在西方當資產階級革命時，以及直到現在農民都是這樣的）變爲無產階級後備軍，同盟者呢？」（列寧主義諸問題）

列寧主義教訓我們應該怎樣把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與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聯結起來，列寧主義永遠把勞動農民羣衆看做無產階級爭取政權鬥爭中的民主主義的後備軍。列寧認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亦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

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中最先進，最覺悟，政治上最發展的份子加入黨的隊伍中，作爲

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爲着社會主義的利益而指導一切羣衆組織的工作（工會、青年團、合作社、文化教育組織等等）。『黨是工人階級領袖的學校，是按照其經驗與威信能够集中地領導一切無產階級鬥爭的唯一組織，這樣便把一切工人階級的非黨的組織變爲黨和階級之間聯絡的附助機關和聯接的皮帶。』（列寧主義諸問題）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奪取政權之後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組織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把自己所有的政策，來幫助對於農村勞動階層的新教育，準備完成共產主義社會之建設，黨代表着『統一』的意志，與小組織之存在是不相容的。『鐵的紀律，布爾塞維克隊伍之一致，在鬥爭中確定目標前進——這就列寧、斯達林之特點。因此，關於黨的學說，一切黨的實際工作與工人運動內部的及黨內的敵人不斷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成部份。』

斯達林說：『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第一人，給了帝國主義以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他是資本主義的新的最後的階段；按照新的方法提出了在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完成建設的可能性的問題；並且肯定的解決了這個問題。』（論反對派）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完成，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勝利的鬥爭，鮮明地證實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列寧的理論，而同時我們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看做『不是一個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是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在其他的國家

勝利的幫助，工具和道路。」（同上）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可能勝利的學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一個單獨的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學說，在列寧死後，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特別改造時期，在向資本主義殘餘成份作社會主義大舉進攻的時期，在各方面社會主義改造，國家的工業化，農村的集體化的時期中，被斯達林所繼續發展。消滅富農階級，及爲着完成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要求理論上實際上研究許多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蘇聯的工人階級及政黨，在斯達林同志之理論的及其直接的具體的實際的領導下，闡明了這些問題，完成了這個時期的偉大任務。

爲什麼俄羅斯成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家鄉

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尖銳到極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在歐洲徘徊着惡魔——共產主義的惡魔，』現在共產主義已經不是惡魔了。共產主義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羣衆掌握了牠，深入了他們的認識之中，成了他們的政治綱領。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帝國主義使勞資矛盾極端緊張，牠把無產階級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的面前，帝國主義尖

銳化了各個資本主義集團及國家間的關係，引起了新的更加巨大的軍備與侵略戰爭之必然性，這裏戰爭與軍備的重荷全部落在工人與勞動農民階層身上，最後『帝國主義是對於廣大的殖民地及附屬國的幾萬萬人民之最公開的剝削，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這種壓迫之目的。』（列寧主義諸問題）

但這同時在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中，羣衆的民族的與階級的覺悟生長起來了，這些羣衆的革命運動亦生長起來了，殖民地羣衆看清楚了帝國主義是屠戮他們的劊子手。這些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大小不同的力量，存在於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內。除掉無產階級革命之外，這一切日益尖銳化的矛盾，找不到別的出路。這就是列寧主義（或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一樣的）產生發展鞏固起來的國際環境。

所有這一切的矛盾在以前的沙皇俄羅斯表示的特別厲害。沙皇專制以其官僚警察軍事機關之一切力量，用最大的殘酷性鎮壓勞動的鬥爭，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鬥爭，幾十種民族爭奪存在的鬥爭，沙俄是許多國家獨立存在之經常的威脅，土耳其、波斯、中國、沙俄幫助帝國主義瓜分這些國家。沙皇政權是『國際憲兵』。由於俄國之經濟之落後於西歐，因之外國資本之剝削羣衆在俄國廣泛的活躍着，『沙皇制度不僅是歐洲的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看門狗，並且同時是西歐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替巴黎、倫敦、柏林、不律塞爾所發行的債券向幾萬萬人民榨取利息。』（列寧主義諸問題）

沙皇俄羅斯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的組成部份，自二十世紀之初起，俄國就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但是在俄國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外，還保存着很大的半農奴制的奴役，對於工人農民及被壓迫民族的亞洲式的警察壓迫；因此，列寧聲言在俄國不僅有最新形式的資本主義，並且混雜着軍事的及封建的帝國主義。列寧寫道：

『在俄國，最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在沙皇制度對於波斯、滿洲及蒙古的政策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可是一般地說，軍事與封建的帝國主義在俄國佔着優勢。』（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

俄國帝國主義的這些特點，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煽起了俄國的民衆革命反對沙皇制度，反對俄國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這個革命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而與力求按照農民的辦法來解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土地問題）的幾千萬農民聯合着，與力求從沙皇俄羅斯之下解放起來的被壓迫民族聯合着。在這個環境中，列寧的黨站在偉大的革命的領袖地位，將這個革命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發端。假如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德國，那末在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這個中心逐漸地轉移到了俄國。

就由於這個原因，當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俄國時，俄國當時產生出來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列寧領導之下成為新的形式的政黨；他在最初就和第二國際的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者宣佈不

可調和的戰爭。他成了建立新的第三國際的基礎的政黨。俄國成爲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革命學說——列寧主義故鄉的策源地。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是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繁榮』時代的各國革命鬥爭經驗之綜合，同樣，列寧主義是新時代，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國革命鬥爭經驗之綜合，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奠基禮時的演說中，給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發展中的作用，作了如此的估計：

『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以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破產及其轉移到沒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去的必然性。

『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指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他們的作用，任務，責任：第一個站起來反對資本，在這個鬥爭之中把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上述演說辭）

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四七年）及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七二年）的組織者。他們一生進行了反對工人運動內及社會民主派中的各種機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在馬克思死後（一八八三年），恩格斯直到自己逝世時（一八九五年），繼續進行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份子的堅決的鬥爭。列寧與斯達林及其創造的布爾塞維克黨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

的工作。就由於這個原因，布爾塞維克主義成了世界的運動。『布爾塞維克主義可以作為大眾的戰術的模範。』（列寧）

列寧成爲全世界共產黨——第三國際的組織者。列寧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就在他們給了國際無產階級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確的革命理論和戰術，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戰術。

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了革命理論對於鬥爭勝利的意義。誰輕視理論，誰不願意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正確的理论，當他被羣衆掌握着的時候，就成爲最偉大的力量，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做什麼）『祇有以先進理論爲領導的政黨，才能够完成先進戰士的作。』（同上）斯達林在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上做了許多事情，他以一切力量強調着『……理論如果是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的聯結中形成起來的，那麼他就能變爲工人運動的最偉大的力量。因爲理論，祇有理論能够給運動以信心，以確定方向的力量，以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結的了解，因爲理論，祇有理論能够幫助實踐，不僅去了解各階級今天如何行動與向那裏行動，而且去了解最近將來他們將如何行動，向那裏行動。』（列寧主義諸問題）

對於理論的輕視常常是各種機會主義錯誤與傾向的根源。因此，黨員的責任之一就是『不倦怠

的工作來提高自己思想上的武器，來領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點，來領悟黨的重要的政治和組織的決定，並且把牠們向非黨羣衆解釋。」研究蘇聯共產黨的歷史是這種理論學習的一部份。一九三一年斯達林同志在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提出了黨史上的許多基本問題。揭發與批評了某些歷史著作中的原則的和歷史的錯誤，這就把研究黨史放到巨大的原則的高點上去了。斯達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及在許多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如國內戰爭史）的編輯中表明了對於黨史問題的鄭重的布爾塞維克態度的模範。

第一章 在最初馬克思主義組織產生以前

十九世紀俄國革命運動概述

現在的我們所曾親歷目見的這種共產主義運動，是表現於工人階級的運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可是在我們黨創立之前，在俄國的初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注意到工人階級把他當作革命的主要動力之前，俄國好幾代革命者，曾經進行了鬥爭，去反對沙皇專制反對農奴制及農奴制的殘餘，找尋着正確的理論，找尋着能在俄國完成革命的那種力量。列寧看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僅在整個十九世紀的世界經驗中得到證明，而且他更着重指出，「這個——也祇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特別由俄國革命思想中之迷惑與游移，錯誤與失望等等的經驗證明其正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半世紀中，處於極端蠻暴與反動的沙皇的壓迫之下，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熱烈地追求正確的革命理論，以驚人的憤勵與縝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見左派幼稚病）

因此，在研究黨史的時候，必須敘述至少簡單的敘述黨史之前史，敘述在俄國工人運動與布爾塞維克黨組成以前的那些革命運動。我們知道，布爾塞維克主義開始出現之後，他不僅要和馬克思主義者裏面的機會主義傾向進行鬥爭，而且還特別要和民粹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鬥爭。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寫道：『最近二十五年以來的整個俄國革命思想史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列寧：小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農民反對農奴制的革命運動，在幾世紀以前，已經發生。我們在此不詳述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羣衆的農民運動（布拉文、波洛特尼柯夫、拉尋、普加卓夫等所領導的）。不管對於暴動的壓迫是如何的殘酷，暴動還是從新爆發起來，因為農民的狀況，是到了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在農民從農奴制度壓迫解放出來之前夜，農民的騷動，每年達一百七十次。根據政府的統計，從一八三五到一八六五年，殺死了一百四十四個地主，此外謀害未成的，還有二十一個，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三的九年，因為謀害地主被充軍的，男的有二百九十八人，女的有一百十八人。

從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五四年的期間，發生了五百次以上的農民暴動。在一八四三年，奧倫堡省暴動了四十萬農民，在一八四四年，發生農奴暴動的，有十九個省，在一八四五年，有十五個省，在一八四六年，有十六個省，在一八四八年，有十四省發生了農民暴動，並且搗毀了四十五個地主莊園。

但是促進農奴制度崩潰的，還不僅是這些農奴制下的農民的騷動。

隨着商業資本的發展，在俄國也出現了工廠與工場。在一七六二年，俄國有九百八十四處工廠，在一七九六年，就有三千一百六十一處，到一八二五年，就是說，到十二月黨暴動的時候，俄國的工廠與工場，已達五千二百六十一處了，工人已達二一〇五六八人了。在這數目中，祇有一一四五一五人是自由僱傭的，其餘都是農奴，或半農奴，除此以外，地主及商人，還獲得權利，可以把自由的農民，編餘到工廠及工場裏去。這些被『編餘』的農民也變成了農奴了。爲着這些人，廠主向國家付稅，正好像地主爲農奴向國家付稅一樣，編餘到工廠的農民，每個月中至少有十天或更多的日子，須在工廠做工，正好像農奴爲地主勞役一樣，同時工資並沒有付到他們手裏，而是當作貢款被扣除了。這樣，農奴被迫在工場做工的日子，每年至少有一百二十天，或者更多些。這比較任何勞役，都還要奇重。農民是沒有出路的。當工廠的生產擴大起來的時候，工場及工廠的主人，開始取得一定的法律，使得他們能够把農民束縛於工廠與工場之中，而不使農民有經營自己農民經濟的可能。在紙面上，這些被『編餘』的農民，像是自由的，可是在實際上他們是同樣的農奴。他們寫了聲訴書，給工廠的總辦事處也得不到效果。工廠辦事處，強取他們的賄賂，侮辱他們，把他們的使者囚禁入獄，釘上鐵鍊，帶上頸鍊，流放充軍，受鞭棍的管打。

所以農民及工人中的革命運動的最初之芽，在農奴制的時候，已經萌發起來了，他們主要的是反對無權利的奴隸的不可忍受的狀況，這些『暴動』受到政府的殘酷的鎮壓，暴動的參加人，被殺，被刑，被詛咒，被剝肉，被罰作苦工或流放充軍。

十二月黨

可是不滿意於農奴制的，不僅是農民以及在俄國正在產生着的無產階級。早在十九世紀之初，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超出農奴經濟的範圍，農奴制成爲俄國的經濟生產力發展之障礙，農奴的不自由的勞動，對於供應市場的那種經濟，是太缺乏生產性了，個別的地主（比較開明的）已經感覺到向資本主義讓步的必要，感覺到國家組織的某些改變的必要。在此時以前不久，即在十八世紀末，發生了資產階級的法國大革命。法國的商業與工業資產階級，依靠着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甲可賓黨的領導之下，推翻了舊的貴族封建階級奪取了政權，而在巴黎的廣場上公開的斷去了法王路易十六的頭。在革命之後，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不得不對周圍的農奴制的國家進行防禦，而與他們進行了多次的戰爭。在這當兒，法國軍隊所向無敵，甚至像大家所知道的，佔領了莫斯科。可是歐洲的反動階級與俄皇專制政體相聯，依靠着農奴主——地主貴族，聚集了自己力量，來和法國軍隊鬥爭，將法國軍隊驅逐，並追出到巴黎。俄國一部分軍隊，在法國的短時期的停留，給了這部分軍隊以革命的影響；許多到過法國的俄國的軍官及士兵，回到了本國，他們對於專制政體及農奴制的觀點，發生了極大的動搖。

因為這次向法國進軍以及一般的法國革命的影響，而且主要的還是因為農奴制阻礙俄國生產力發展的關係，所以十九世紀初在俄國組織了以改變國家制度為宗旨的祕密團體。這些祕密團體如「救助會」（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善行會」（一八一八——一八二一年）「斯拉夫人聯合會」（這是一八二三年時北方與南方的祕密團體合併組成的）等等的首領，是貴族，而且差不多全是軍人。

彼得堡的祕密的「北方會」是由那些害怕民衆暴動的鬆健分子組成的。在南俄組織了祕密的「斯拉夫人聯合會」，他包括了更堅決的人們，在他們裏面，有不少的平民智識份子，他們在士兵中進行革命宣傳，來為共和國而鬥爭。如果說「北方會」在士兵中沒有進行的工作，那麼「南方會」却曾企圖在士兵中傳播共和國的思想。「南方會」的領導者之一，摩拉維也夫為兵士編了一本「教義問答」，在這裏面指出：士兵向俄皇宣誓，是反對上帝的，「俄皇強迫人民宣誓，是為着毀滅人民。」祕密的「南方會」的首領彼斯台爾起草了憲法草案（俄羅斯真理），根據這一草案，在武裝政變及消滅羅曼諾夫（沙皇姓）朝的皇室之後，就要建立起新的共和國的政府。土地歸於人民。為着不使地主驚恐起見，地主可以從政府得到抵償土地的金錢。過後列寧不止一次地記起并着重指出那時「貴族革命者」（列寧所謂「十二月黨」）中較左一派所提出的共和國的任務。

「南方會」人員，準備到一八二六年夏天當南俄舉行大的軍事演習的時候，爆發暴動。暴動的信

號，應當是俄皇亞歷山大第一之被殺。可是俄皇先期就死了，使發動的期間發生改變。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的參議院廣場上，幾個衛隊團（普列奧卜拉仁斯基的，謝米諾夫斯基的，及其他）發生了暴動，這些衛隊團，是由秘密的「北方會」會員的衛隊長官指揮的，這些部隊以及軍官，拒絕向尼古拉第一宣誓。總司令，密羅拉陀維奇親王，在其勸告暴動者的時候，就在廣場上被打死了；可是暴動者，沒有行動的組織性與堅決性，而政府却還有足夠的力量來鎮壓這次發動，秘密團體的會員被逮捕了，被禁於獄中與壘壘中了，而主要的領導者——彼斯台爾、卡崔夫斯基、立李也夫、摩拉維也夫和倍斯都日夫被槍決，有一百二十個以上的軍官，被充軍或是貶黜為兵而被流放。一千多的士兵，遭受肉體的刑罰，每人被打一萬二千棍，在這些士兵中，特別應當指出阿諾以青柯（他一人帶着衛隊團暴動，沒有官長的參加），馬拉費也夫、席寧、劉却洛夫及法捷也夫等，這些人都挨了一萬二千棍的打。至於鎮壓暴動中殺了好多人，那麼這點俄皇是極秘密地隱藏起來了。

這一暴動，在歷史上，就稱為有名的十二月黨的暴動。這是不受最感受農奴制痛苦的人們的擁護，不要農民的擁護而來舉行軍事政變的一個企圖。可是十二月黨的發動，終究是一種革命的企圖，列寧對於這一企圖是極贊揚的。

在總結失敗的教訓時，十二月黨的詩人，那樣寫道：

我們的手要拿着利刃猛伸出來。

可是却遇到了鎖鏈。

應當指出，在十二月黨暴動的時候，南俄開始了農民的革命運動；農民特卡狄克和薩摩達因柯，號召『殺奴主』。當十二月黨在彼得堡參議院廣場暴動的時候，建築伊薩克大教堂的工人用柴片來投擲暴動的鎮壓者。在十九世紀初『嚴峻的復仇者』沙皇制度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已經從下面起來了。

十二月黨遭受了失敗，因為他們不依靠在羣衆運動之上，他們的理想是軍事政變，可是當普希金在一八二七年對被充軍的十二月黨人寫下列的詩句時，他說的是對的呀：

我們悲苦的勞動不會白費的，

崇高的志向是輝耀着，

沈重的足鍊，將被毀除了，

黑暗要被打破了，

自由將欣然地迎接你們進入門來，

兄弟們將給你們以利刃！

對於這首詩，十二月黨詩人奧陀也夫斯基以其全部創造的預見的力量，作了一個回答：

我們悲苦的勞動，不會白費的，

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

我們開明的人民，

團聚在神聖旗幟之下，

我們把鎖鍊煅成利刃，

在旗幟上照耀着自由，

自由昏眩了沙皇，

但人民也快樂的呼吸了！

這首詩中『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一句，列寧以後當作口號引用於最初布爾塞維克機關報《花》之上。這一大旗，以後確實煽起工農武裝暴動的大火，把舊的凶殘、暴虐及階級壓迫的俄國社會燒成灰燼。

在紀念黑爾會的文章內，列寧關於十二月黨這樣的寫道：『俄國貴族內產生了比隆諾夫、阿拉克且也夫一類的人（地主大官僚，以殘酷和反動出名的），產生了無數『酗酒』的軍官，胡鬧者，紙牌賭客，市場獵艷者，獵手，牛皮大家，決鬥者——可是在他們中間——黑爾會說——也產生了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些人——英雄的隊伍。』在這文章之末，列寧指出參加反對沙皇制度鬥爭的三代：

『在紀念黑爾會的中間，我們清楚看到俄國革命中所行動着的三代，三個階級開始時候，

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和黑爾會。這些革命者的範圍是很狹仄的，他們離開民衆太遠了，但是他們的事業，不是無益的。十二月黨驚醒了黑爾會，黑爾會開展了革命的宣傳。這種宣傳，被平民智識份子的革命者（起自且尼雪夫斯基以迄「民意派」的英雄）所抓住，擴充，鞏固和煅煉了。戰士的範圍，比較寬廣了。他們對於人民的關係，比較接近了，黑爾會稱他們為「將來大風暴的青年突擊隊」，但是這還不是大風暴的本身。

大風暴，這是羣衆自己的運動，無產階級，唯一的澈底革命的階級，成爲這些羣衆的首領，而開始提高千百萬農民到公開的革命鬥爭上去。」（列寧紀念黑爾會文）

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運動

——啓蒙學者——

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最顯著的人物，無疑的是上世紀的那些著名的人材如伯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年）黑爾會（一八一二——一八七〇年）杜白羅劉泊夫（一八三六——一八六一）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他們中間每一個人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運動

中都留了了顯著的深刻的痕跡。列寧對於這些人物都懷着深刻的敬意，特別是對於且尼雪夫斯基，列寧多次地摘引且氏的著作，稱他為馬克思以前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上述數人中間每個人都是深刻地個人主義的。『憤激的』伯林斯基，是偉大的俄國作家及批評家，革命家及民主主義者，『以人作買賣的那種國家的惡濁情狀』引起了伯林斯基的革命的熱情，他把這種熱情傳播於他的同時代的人們。他是當時的真正的革命的甲可賓黨人。當他了解到祇有社會主義能夠消滅社會矛盾的時候，他就以全部的熱情的力量，寫信給鮑特金道：『我現在到了新的極端。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對於我，是思想的思想。存在的存在，問題的問題，信仰與智識的全部，一切從他而來，為他而作，並且在他之中。』

黑爾曾在國外建立了第一個自由的俄文的印刷所，在那裏出版了革命的雜誌警鐘，北極星。列寧在說到黑爾曾時認為他是『在革命準備中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被迫僑居國外的黑爾曾，將他的全部資財（他是從極富的地主家庭出來的）都用在革命事業上面，確實地黑爾曾雖然極漂亮地批評了沙皇制度，可是他多次地陷入自由主義的口氣，而引起了馬克思以及那時其他革命者對於他的不和的態度。

黑爾曾不止一次地向絞手的沙皇阿歷山大第二作了建議，這種建議引起了杜白羅，勃夫及且尼雪夫斯基的應有的鄙視，他們『非常正確的責備黑爾曾從民主主義退步到自由主義，可是中心地說來，不管黑爾曾如何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動搖，可是民主主義在他心中還是佔着上風。』

(列寧紀念黑爾會)

黑爾會沒有懂得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沒有懂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意義，而成爲農民的空想的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的始祖。

杜白羅劉泊夫（馬克思把他與且尼雪夫斯基稱爲『俄國的萊辛』——萊辛乃德國有名的批評家啓蒙學者是十九世紀最顯著人物之一，是青年的思想權威者，是好幾代的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領袖。詩人尼克拉索夫在其爲杜氏之死所震驚的時候，這樣的寫道：『如何的一座燈台熄滅了！如何的一顆心停止擺動了！』在杜氏生辰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真理報曾認爲他是『充滿魔感力的革命者的標本，他在自己的戰鬥的天性中，把對於敵人的嚴格的不調和性，對於革命的熾烈的忠實性，對於民衆革命活動的不動搖的信心，對於智識的不疲倦的渴望以及對於文學的熱烈的愛好，都併合起來了。』

這些革命平民智識份子的光輝人物的補充者與完成者，是且尼雪夫斯基。

且氏是最忠實於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者之一。他因爲起草告農民書被判處死刑，後來減爲充軍，對於且氏的審判是根據於警察所準備的文件來進行的，他在好多年內受折磨於彼得巴夫羅夫的囚營中，以後移到尼爾青的充軍地，再以後被流放於維劉以司克。他在革命者中間，有極大的威望。民意派認爲他從流放地回來，是一件特別重大的事情。有名的民粹派革命者梅世金甚至僞裝憲兵企圖將他

釋放。馬克思也幫助了且尼雪夫斯基的釋放，馬克思非常看重且氏，認為他是經濟學者與革命者。

馬克思在學俄文以後研究了且氏所著密爾政治經濟學的註釋一書之原文（密爾亦譯穆勒，英國經濟學者）在好些秘密的文字中（告農奴書署名「俄國人」寫給黑爾會的信）且氏直接地號召農民的革命。他寫道：『嘿！我們的狀況，是不堪設想的，不能忍受的，祇有斧頭能夠挽救我們，除斧頭以外別的都沒有什麼用。』

且尼雪夫斯基所作的歷史的哲學的批評的文章以及他對於密爾政治經濟學的註釋，表現出他的深刻的淵博的有智識的頭腦以及革命者民主主義者、哲學家及唯物論者的熱烈的衷心，他的小說做什麼在幾代革命者的革命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無疑的，伯林斯基、黑爾會、杜白羅、劉泊夫和且尼雪夫斯基，是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及啓蒙學者，他們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雖然在他一方面，他們根據那種認為農民是革命主要動力的錯誤估計，根據對於農村公社的作用的錯誤估計而提倡空想的俄羅斯社會主義，這種提倡，使黑爾會及且尼雪夫斯基帶上民粹派始祖的意義。

列寧在講到民粹派對於六十年代啓蒙運動的關係時說道：

『民粹派比較民主革命的啓蒙學者是進了一大步，他們向社會思想界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啓蒙學者一部分還沒有能夠提出（在當時），一部分是沒有提出過，並因為

他們眼光的狹窄，也不能提出來。這些問題的提出，是民粹派的巨大的歷史功績，所以很自然的很明白的民粹派爲這些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不管其實際如何）之後，就能在俄國社會思想的進步的潮流中，佔據前進的地位。

但是因爲民粹派根據着西歐早已拋棄的落後的理論，根據着對於資本主義的羅曼晉克的小資產階級的批評，根據着忽視俄國歷史上及現實上重大事實的那種觀點，而來提出上述問題的解決辦法，所以結果這些辦法是完全沒有用的。（見列寧著我們拒絕何種遺產一文）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民粹派

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之後，不得不舉行農奴的「解放」繼續不斷的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逼使沙皇政府實行這一改良。在這點上面，俄皇政府承認，寧可從上而下的來解放農奴，因爲不然農民將從下而上來真正的解放自己，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政府發表了關於「解放」農民的宣言。

列寧在一九〇一年工人政黨與農民一文中這樣地描寫農民的「解放」

『從農奴制「解放」了的農民，當他們從改良者的手下出來的時候，是如此的顛沛，痛苦與屈辱，並且是如此束縛於自己的分地之上，使他沒有別的道路，祇能「自願的」受農奴式的壓榨。農民耕作他們以前的主人的土地，向主人租種自己的割地，為着借糧供給飢餓的家庭，而在冬天就出賣夏天的勞力。牧師、教士所起草的宣言，號召農民來實現上帝所祝福的「自由勞動」這種「自由勞動」正是上述的勞作與奴役呵。』

『造成改良與實現改良的那些官僚的善意，保存了地主的壓榨，但是除地主的壓榨之外，還加上資本的壓榨——金錢的權力，不僅壓迫了而且分化了農民，廣大的農民羣衆不斷的破產而轉為無產者，小部分成爲一羣數量不多的頑強的富農和豐裕的農民，他們把農民經濟與農民土地蠶食到自己手中，他們形成往前發展的農村資產階級的骨幹，改良以後的四十年，正是這種農民的分化的劇烈的過程，正是這種遲緩的痛苦的毀滅的過程。農民達到了貧苦不堪的生活水平，他與畜牲住在一起，穿的襤褸，吃的粗糲；農民祇要有逃處，就從自己的分地上逃跑出來，甚至出錢，讓去自己的分地，付錢給願意接受分地的人們，因為分地上應付之款，比較他的收入還要來得多。農民週期的鬧着飢荒，在荒年時，幾千幾萬的死於飢餓及瘟疫，可是荒年是越來越頻繁了。』（列寧工人政黨與農民）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關於解放農奴的宣言，引起了農民極大的不滿，沙皇自己也相信農

民將以暴動來回答這一宣言。於是在發表宣言的那一天，下令給各軍隊進行戰鬥準備。關於如何去進行反對農民的行動，到處都給了指示。

農民的任何行動，都遭受流血的壓迫，特別慘酷的是卡桑省，彼士特耐鄉農民發動的鎮壓，這一發動，是在農民彼得洛夫領導之下的。

許多農民相信是地主欺騙他們，把真正的沙皇宣言沙皇金書隱藏起來而把偽造的宣言給他們看。這當然不是如此。發表給農民看的，不是假的而是真的宣言，這一宣言是地主貴族們，爲着整個貴族階層特別是大地主（沙皇羅曼諾夫朝也屬於此）階層的利益而寫成的呵！

這時在我們已經形成的平民智識份子的極大階層（破產貴族，官僚教士及商人的子弟）不能忍受農奴制度來阻礙俄國生產力的發展，來妨礙至少其他國家已經取得的那些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實行，平民智識份子忍受不住任何自由思想，任何自由言論都受到沙皇政府殘酷壓迫的那種情況，此外，還有對於非俄羅斯民族，對於「外族人」的不堪忍受的壓榨，這種壓榨不僅把沙皇俄羅斯變成鎮壓其他民族的世界的憲兵，而且把俄羅斯轉爲「各民族的牢獄」。六十年代的波蘭的暴動，最無情的慘酷地被鎮壓下去，波蘭的暴動者整千地被屠殺或流放。在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上，沙皇政府總是幫助地主，這些事情，綜合起來，使社會各階層中，特別是所謂平民智識分子（主要的是學生）中，積壓着許多的不滿。所以最初的革命小組及團體，就在學生中產生起來。這些平民智識分子，尋找對於

農民的關係，農民的不滿也傳達到了學生的中間。平民智識分子一部是與城市中正在興發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有關係的。同時，這些平民智識分子，大部分是很少了解農民的，他們把農民理想化了，他們也不能正確了解，用什麼方法可以變更國家制度。可是農民佔俄國人民的主要成份，所以那時的革命智識份子就把農民看作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在他們看來，俄國的農村公社，是社會主義公社的萌芽，而俄國的農民，每個人都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把俄國農村公社看作未來公社的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民粹派智識份子，從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大部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知道了社會主義，同時，不要忘記，俄國平民智識份子的革命運動是在西歐多次政治革命之後才開始的。這些政治革命，沒有給予無產階級以解放，無產階級那時已經在獨立行動了，在西歐革命及根據這些革命而產生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之下，俄國平民智識份子也開始講社會主義了。正因為那時俄國無產階級還是薄弱，無產階級的獨立行動也還是薄弱與稀少，同時還因為俄國平民智識分子不了解工人階級的作用，所以俄國智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負擔者，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農民，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所以民粹派的「社會主義」也是小私有者的『農民的』『庸俗的』（像列寧所常說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

在一九一四年民粹派論密哈洛夫斯基的一文內，列寧對於這種平民智識份子的運動，作了這樣

的估計：

『農民羣衆在俄國是唯一重要的羣衆的（除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負擔者。可是那時農民還睡在深夢中。從農民裏面出來的優秀分子，以及滿腹同情他們痛苦的人們，即所謂平民智識分子（主要的是青年學生，教師以及其他智識分子的代表）努力於啓發和警醒還在睡着的農民羣衆。』

雖然六十——七十年代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社會主義，不能引導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可是無論如何這種早期民粹派的戰鬥的民主主義，對於俄國幾代革命者的政治覺悟的發展，是有巨大的積極的意義的。列寧在他關於民粹派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列寧指出在這點上面孟雪維克的錯誤正是在於『鄙視民粹派的歷史上實現的並且進步的歷史內容。』列寧在一九〇九年這樣的寫道：『在反對民粹派，反對他們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理論時，孟雪維克以學究態度，忽視了民粹派的歷史上實現的並且進步的歷史內容，沒有把牠當作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地主的資本主義，美國式資本主義反對普魯士資本主義之小資產階級羣衆鬥爭的理論——由此就產生孟雪維克荒唐的，癡狂的，叛徒的思想——認為農民運動是反動的，認為立憲民主黨（俄國資產階級政黨——譯者）比較勞動派進步等等。』（列寧給司節班諾夫的信）

民粹派思想在俄國獲得如此的信仰與傳播是什麼道理呢？首先是因為那時俄國的落後，『俄羅

期的落後，自然地說明爲什麼在我們國家內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有如此廣大的基礎。」（列寧小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告訴我們，在歐洲「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爲根據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完全統治，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僅僅在經過長期的反對任何落後學說，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的鬥爭之後，才鞏固起來。」（同上文）民粹派思想在俄國獲得信仰與傳播的第二個原因（也是與俄國的落後有關的）還在於有組織的羣衆的工人運動，在俄國開始，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遲得多。

列寧說：「民粹派學說，在某種限度內，是一個完整的連貫的學說。他們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是全體無產階級的前衛戰士之作用，否認政治革命與資產階級政治自由的意義；他們提倡立刻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這種改革，是以農村公社及其小農經濟爲根據的。」（同上文）革命的民粹派的錯誤，無論是如何的重大，可是在他們中間許多實在是忠誠地自以爲是社會主義者，滿腹懷着實現自己「社會主義」的熱烈的意圖。可是這種社會主義在事實上僅僅是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罷了。六十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反映農民須要消滅農奴主貴族土地所有制的鬥爭，列寧尖銳地批評了他們這種不確實的理論，批評了六十七十年代的初期革命民粹派以及他們的後繼者——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但是列寧在某些方面把他們兩者作了尖銳的區別，關於「初期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如何」的問題，列寧回答道：信仰特別的社會制度，信仰俄羅斯生活的公社

制度——由此於是乎信仰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就是這信仰感動着他們，推動數千數百的人去和政府進行英勇的鬥爭。」（見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在這種農民社會主義裏面『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

可是如何鬥爭呢？依據於什麼人呢？對於這些問題，六十一——七十年的民粹派作了不同的回答。他們所以被稱為「民粹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於他們認革命的動力不是這個或那個革命階級，而是不分階級的人民。他們中間，一部分（拉武洛夫的信徒——「宣傳派」）認為應當教育人民，即教育農民，向農民宣傳，最好的社會組織是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另外一部份（巴枯寧的信徒——「暴動派」）認為不必教育人民，祇要叫人民暴動起來。第三部分（特加且夫的信徒）以為必須以革命少數派的陰謀組織的力量去奪取政權。在其他方面，他們是同意那些錯誤的有害俄國革命發展的理論的。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所組織的『土地與自由』的秘密團體內，宣傳派暴動派特加且夫派等三部分都加入了。整百的民粹派響應了『到民間去』的號召，進到農村裏去——有的裝着泥工木工，有的裝着醫士或教師，他們隨身帶着狡猾的機械奇怪人納烏英夫那以及其他的被禁的書籍。

政府也不是酣睡的。民粹派整百地被捕並被禁於獄中，以後舉行了裁判，在一八七七年所謂『五十人案』，一八七八年所謂『一百九十三人案』之中，許多被判充軍了。

在很長的時間內，許多「土地與自由黨」的民粹派，認為在政治鬥爭上，在爲着國家政權的某種政治改造而鬥爭的事業上，應用自己力量，是沒有意義的。在國家制度的問題上，他們中間有許多擁護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等）的觀點與理解，由他們看來在那時農民的俄國，依靠於農民羣衆的騷動與暴動，可以很容易的轉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改造，並消滅任何的國家政權。但是鬥爭的經驗告訴他們，第一，農民完全沒有準備好轉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第二，在平民智識分子民粹派的概念與農民羣衆的概念之間，存在着極深的鴻溝；第三，沙皇政府甚至不准許有和平的社會主義的宣傳。我們已經看到沙皇政府殘酷地鎮壓了任何『到民間去』的企圖，從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一八七九年十二月，殺了十七個人。一部分民粹派提出這樣的意見，以爲對於沙皇政府，應當用恐怖去和他鬥爭，就是說用刺殺沙皇政府官僚甚至刺殺沙皇本人的辦法去掃除沙皇政府，開始時，恐怖被認爲是自衛的手段，以後轉變成了對於壓迫與屠殺舉行報復的事情，最後當暴動派相信不可能完成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民粹派就把恐怖變成爲政治自由而鬥爭的唯一工具了。

民意黨及黑分黨

在一八七九年伏龍尼熱大會之後「土地與自由黨」分裂成兩個民粹派的組織——「民意黨」

及「黑分黨」這兩個組織的區別在於：「民意黨」關於基本問題保留民粹派的立場，可是同時却把恐佈的任務，政治鬥爭的任務，提到第一位。「黑分黨」的組織之所以具着這一名稱，正是因為他的會員，提倡在農民中間普遍分配土地（包括分配地主的以及其他的土地），同時「黑分黨」的大多數黨員認為把力量用在政治鬥爭上，而離開農村工作，是叛變革命事業。

「民意黨」的重要人物是熱略泊夫、彼洛夫斯卡亞、密哈以洛夫、卡白爾且赤等等。

聯共中央文化宣傳部在關於「民意黨」五十週年紀念的提綱上，詳細的說到「民意黨」的問題，在這一提綱上，一般的對於民粹派，特別是對於「民意黨」作了詳細的列寧主義的敘述。在這提綱上着重指出，革命民粹派的農民社會主義以及整個民粹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空想的，又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有害的恐佈主義的實際進行鬥爭。

民意黨不相信反對沙皇制度的羣衆鬥爭。據他們意見，「英雄」——個人的智識分子，應當代替羣衆。

「民意黨」和沙皇政府中間的鬥爭，是不平等的。在一方面，祇有不大的陰謀家的一羣。在他一方面，却有強大的國家機關，有數萬官吏以及警察憲兵侍衛等等，在這不平等的戰鬥中，「民意黨」的許多黨員，沒有效果地浪費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組織天才。例如哈爾都林這樣的人，他裝着木匠進入冬宮而且獲得了皇室侍衛的信任，他隱秘地引進炸彈到小室中，聚積了極大的數量，在有一天當沙皇

將與所延請的諸王侯伯宴飲的時候，就要將沙皇的食堂炸燬，可是結果在宴飲者未進食堂以前爆炸就已發生了。

由於「民意黨」的鬥爭，結果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由格林尼維茨基用炸彈把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炸死了。這一鬥爭耗竭了「民意黨」的力量，「民意黨」被摧毀了。這黨的執行委員會被處死刑，其餘留下來還活着的人員，也不能得到社會的贊助（那時社會是爲亞歷山大第三政府的摧殘驚恐了的）。「民意黨」的執行委員會（正確點說，他的殘餘）那時就寫信給亞歷山大第三，在這信裏提出，如果沙皇給予出版自由，召集地方代表會議，並且將革命民粹派領袖且尼雪夫斯基從充軍地釋放回來，那麼民意黨允諾停止恐怖行動。民意黨人想以恐怖來恐嚇并沙皇獲得小的讓步。恐怖沒有和任何羣衆工作或羣衆組織取得連繫。

後來，在留下來的活着的民意黨人裏面，又產生了恐怖的計劃。「民意黨」的一部分黨員，以列寧的長兄阿歷山大·烏良起夫爲首，於一八八七年，企圖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但是陰謀被發現了，陰謀的參加人被捕與處死了。

「民意黨」的主要缺點，是在於他們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他們沒有看到，那一個階級是革命的真正的動力。而且他們也沒有他們所能依據的羣衆組織。他們對於階級作用（特別是工人階級作用）的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資本主義的意義的無知，特別是他們的有害於革命的個人恐怖的策略，所有這

些，都是對於革命運動發展的巨大的阻礙，而且妨害了獨立的工人政黨的組成。

關於民意黨理論的害處，特別是關於他的恐怖行動的害處，列寧這樣的說道：

「我們認為幾百個刺殺沙皇事件，永不能够像數萬工人所參加的各種會議，各種鬥爭那樣，給予如此警醒的與教育的効力，在這些會議上，只討論自己的迫切利益，以及這些利益對於政治的連繫，在這些鬥爭中，真正推動無產階級中的新的「不關心」的階層，走上更自覺的生活與更廣大的革命鬥爭上去。」（列寧新事變與舊問題）

「黑分派」（蒲列哈諾夫、阿克薛爾洛特、柴蘇里奇、阿托且克曼）在基本上保持巴枯寧的立場。如果說「民意黨」是代表着數量稀少的陰謀者的組織，組織了許多暗殺的行動，並且建立了軍事組織，那麼「黑分派」却供獻了整批的有名的著作家，他們後來從民粹派轉到馬克思的革命學說，而建立了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勞働解放社」的團體。

應當指出，孟雪維克歷史家在敘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傳播時，認為「黑分派」是從「土地與自由社」轉到組織「勞働解放社」（關於這個團體以後再說）所經過的中間環節，而後從「勞働解放社」轉到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黑分派」的團體在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上，沒有留下任何重大的痕跡，這也就說的爲什麼列寧沒有給予這一團體以任何的注意，而馬克思却嘲笑這一團體是巴枯寧式的半無政府主義的團體，這一團體的「所謂原則」是從已故的巴枯

寧的輕浮的手裏採用下來的。」（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致索爾該書）

可是黑分派的功績，是在於他們批評了民粹派對於農民及農村公社的觀點，雖然他們的這種批評還是非常的不徹底，而且還遠沒有解脫民粹派的錯誤，在「黑分」的雜誌上，他們在好些文章內證明，農村公社是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瓦解着了。這樣，雖然黑分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沒有脫離民粹派的錯誤觀點，可是他們總算向這方面走了最初的（雖是極小的）一步。例如，他們還承認「資本主義準備到社會主義去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先行者」，又說「經濟問題的重心轉移到工業中心的方向」。由此，黑分派作出結論說：工人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應當比民意黨人想要的要大得多，黑分派提出「着手組織戰鬥的政黨」，可是黑分派還不能應有的將政治鬥爭的任務與社會主義運系起來，黑分派說明「政治革命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在一個時期能夠保證人民有經濟的及政治的自由。」和一切其他民粹派一樣，黑分派也錯誤地認為農民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

在黑分派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蒲列哈諾夫，後來成爲社會民主組織的創造者之一，更後來成爲孟雪維克主義之父。蒲列哈諾夫在青年時候，就參加了民粹黨的運動，他和工人有關係，並且在工人小組內進行了談話。在「黑分」印刷所被破獲後，他從政府的追索中逃了出來，出到國外；在國外他親近地認識了馬克思的學說，認識了工人的社會民主運動，而和柴蘇里奇、阿克薛爾洛特、依檢納托夫、德以奇一起，組織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組織——「勞動解放社」。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之初步

俄國工人階級是在農奴時代從農奴化的農民中產生出來的，那時是農奴無產階級，可是十八十九世紀聚集於工廠工場中的這些毫無權利的農奴工人，過着最黑暗痛苦的生活，他們不止一次地起來進行反對自己壓迫者的鬥爭，而十八十九世紀的比較重大的運動，也是沒有一個不有工人的積極參加的。大家都知道：烏拉爾的礦工廠工，極大的參加了普加且夫的暴動，供給他的軍器，而和他一起進行反對沙皇軍隊的戰鬥。

在農奴制度廢除之後，俄羅斯迅速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從一八六五到一八九〇的廿五年中，俄國的紡織工廠的生產，增加了五倍，煤的生產，增加了十倍，生鐵的生產增加了三倍，同樣的產業工人數目，在這廿五年中也從六十萬七千人增加到一百〇三萬二千人，這就是說，增加一半以上。在一切國家內資本主義積壘的歷史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之下，大資本擊破小的與中等的資本。發生了所謂資本的集中，就是說，資本聚集在少數幾個大資本家的手裏，他們以競爭方法，將小企業家，驅逐於市場之外，使他們隸屬於大資本家之下。俄國那時，也發生同樣的情形。在一八六六年包容一百以上工人的工廠，有六百一十一個，在一八九〇年，這樣的工廠已達九百五十一，工廠數增加了一半，可是工人數目

却增加了一倍（從二十三萬一千增至四十六萬四千）。

工人集中在較大的工廠裏，在一八六六年，包容一千以上工人的工廠所僱用的工人數目，佔全體產業工人的百分之廿七，而在一八九〇年，則已佔百分之四十六，這就是說，在這廿五年內，大工廠工人的增加，比一般的多一倍，半農奴制的壓迫，打擊了貧苦的農村，所以農民經濟發展的非常的緩慢，而且容納不下好多的勞動力，因之從農村中大批失業者被驅逐到城市中來。這些人逐漸地在城市的工廠周圍停止下來。他們成爲工廠廉價勞動力的經常後備軍。使資本家廠主能够無情的剝削工人羣衆，減少工資，強迫工人從廠方店舖以高價買取貨物，增加工作時間，並以苛重罰款掠奪工人。

開始的時候工人不靈活地，散漫地無組織地（自發地）反抗這種剝削，可是以後逐漸轉到有組織的罷工鬥爭。初期罷工，時常發生搗毀工廠破壞機器的事。可是誰要是知道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歷史的話，那麼就知道差不多在一切國家，工人階級都經過了這些錯誤，在德國、法國和英國，也會經過這樣的工人罷工與暴動。

工人從自己的經驗上相信必須與廠主進行罷工的鬥爭，一八七〇年夏，尼夫斯基紗廠發生了罷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資與減少罰款的要求。這一罷工，指示出俄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增長，在七十年代的頭五年，罷工在俄國各地爆發起來（在彼得堡、莫斯科、伊凡諾夫、高斯特洛姆及其他城市），到處工人都提出了經濟的要求。但是那時先進的工人，已經覺悟到了組織政治鬥爭的必要。同時在工人中

對於階級共同利益的覺悟，也增長起來。在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九年的罷工中，彼得堡紡織廠以及其他紡織廠的工人，相互的進行幫助。在一八七七年，先進的工人——織工阿萊克色也夫在法庭上（民粹派『五十人案』）發表一篇極好的演說，預言革命的勝利，他說，俄國的革命運動，要得到成功，除非『工人舉起他的滿含筋肉的粗手——兵士鎗刺所護衛的專制政體的重壓，那時將碎為細粉了。』

在這一審判中，還有一個工人阿加樸夫說過：『我的宣傳的目的在於喚起工人來進行社會革命，根據我的意見，沒有這種革命，工人永遠不能使自己狀況有基本的改善。』

在七十年代的這些先進工人中，應當指出很好的宣傳者馬爾克、馬林諾夫斯基（西苗尼柯夫廠的鐵工，被判充軍）、奧台薩、工人萊維茨基及克拉夫青柯等（被判充軍或監禁）、工人柴魯拜也夫（捷爾爾工廠工人的組織者「民意黨」一九三人案中參加者之一）、基夫、青年工人蘇白徐茨基（判處廿年苦工）及維爾斯基，他在被絞死時高呼：『共和國萬歲！』

南俄工人聯合會

在一八七四年，民粹派柴斯拉夫斯基，在奧得薩創立了工人的組織——「南俄工人聯合會。」

柴斯拉夫斯基是天才的組織者與宣傳家，他能够這樣有力地進行組織使得在極短的時期內，兩百個與奧得薩最重要企業有聯繫的工人，加入了一個組織，並且建立了互助會和圖書館，聯合會的會員，全是工人，南俄工人聯合會，在其致北方同志的信中，採取與那時其他民粹派不同的態度，指出自己最近的任務是『爭取政治的自由。』在信內說道『可是不要以為我們放棄了改造整個社會並將勞動工具轉入勞動羣衆手中之偉大終極目標。我們僅僅以為在爭取到政治自由之後，這種目標，可以最容易地達到。』

這一聯合會經過海員之助，與第一國際工作者，發生了關係。在把聯合會的章程與第一國際的章程比較來看的時候，我們可以明白見到許多類似的地方。在聯合會章程中，說明每個加入聯合會的，應當付會費，遵守紀律等等，柴斯拉夫斯基已經能够經過外洋船隻的火夫來獲得秘密的文件，這一聯合會，存在得不久，在一八七五年，差不多聯合會的全部活動份子都被捕交付法庭了，這是第一次對於工人組織的審判，政府看到這案件中除了柴斯拉夫斯基之外，其餘都是工人，因此非常吃驚，甚至在報紙上完全不提這一審判的事情，關於這一案件的判決，是非常嚴厲的。可是在「南俄工人聯合會」被摧殘之後，工人中間的革命活動，並沒有停止。南俄工人聯合會對於以後所產生的工人小組，是無疑地給了影響的。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

「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是於一八七八年由彼得堡的個別工人小組聯合組織起來的，這些工人小組是由「土地與自由社」的會員建立的。根據章程，這一聯合會的會員，祇能是工人。這一聯合會在產生後就已有二百以上的會員。領導這一聯合會的，是一個中心的小組，他有中央的財政處與中央的圖書館，在各區上，建立了各別的委員會，他們是歸中央小組領導的，北方聯合會的領導者，是司提理哈爾都林，他是維亞特加省農民出身的，他是工人革命運動最早的領袖之一。這一聯合會的另一個著名組織者，是五金工人奧泊諾爾斯基，他曾經到過倫敦、柏林和巴黎，對於西歐的運動，知道得很多。所以在北方聯合會的章程上也可以看出第一國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們自己，沒有民粹派智識份子的參加，獨立地寫成了聯合會的綱領，在這個綱領內，除了民粹派對於農村公社及國家作用的錯誤的觀點以外，工人們還正確的把爲着社會主義的鬥爭和爲着政治自由的鬥爭聯繫起來。這些最初的工人聯合會，無論是怎樣的薄弱，可是他比較民粹派的運動，總是高出整個的頭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自由的要求，首先是在工人綱領上出現的。

哈爾都林以及聯合會的許多其他會員，是贊成『和平的』宣傳工作，要想不懂在彼得堡而且在

各省鞏固工人的組織。可是「民意黨」以其恐怖主義的活動，耗竭了這一極好的組織家（哈爾都林）的力量，這樣就妨礙了組織工作的事業，自然「北方聯合會」的綱領，反映了民粹派所固有的錯誤。這一聯合會的綱領文件上，可以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我們在「北方聯合會」的文件上，可以看到指引基督的語句，在聯合會的綱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我們工人身上負擔着偉大的事業——解放自己及兄弟的事業，我們身上負擔着革新世界的責任，這一世界，沈淪於奢華，耗竭我們的力量，我們應當盡這責任……有人或許對我們說：『你們破壞世界，你們破壞家庭，你們摧毀財產，你們損害宗教。』』

『我們將回答道：不，不是我們，而是你們使世界墮落，不是我們，而是你們成爲邪惡的原因。相反的，我們是要革新新世界，復興家庭，確立財產於應有制度之上，而復活基督，關於博愛平等的偉大學說！』』

從「北方聯合會」的這些文句上，可以看到，甚至那些參加過民粹派組織中的最進步的工人，也傳染了非無產階級的思想。

在一八八一年後「俄國工人北方聯合會」與整個民粹派組織一起都受到了摧殘。

最初工人小組與最初工人聯合會的意義

當工人運動的曙光時期，在許多工人小組內所做的工作並不是徒然的，這一工作在工人羣衆中培養出某些工人運動的真正的能手，他們知道，保障工人事業，應當協力進行，知道各工廠的工人都有共同的利益，這些工人，如織工阿業克薛也夫，木工哈爾都林，織工奧泊諾爾斯基·莫以心諾克等，成了有名的最初工人罷工的領導者。

我們已經看到，七十年代工人的最初有組織的罷工，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上，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在一八八五年——一八八六年，又發生了許多的罷工，在這個中間，特別重要的是一八八五年佛拉基密·莫洛索夫廠的罷工，同年的伊凡諾伏——伏士尼斯克城五個工廠的罷工以及一八八六年波蘭及麥克思威爾廠的罷工。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一八八一——到一八八六的五年中，發生了包含八萬工人的罷工。這時已經很快發展的工廠工業，遇到了第一次嚴重的危機，第一次的停滯，商品的需求，比較工廠所產生的爲少。所以一方面，開始減少工人，他方面資本家廠主加緊減少工資，增加已經很長的工作時間，加多罰款。

廠內的工作時間，甚至長得十五點鐘以上。祇有百分之十的莫斯科省的工廠，工作時間在十二小時以下。全俄國工廠的平均工作時間，不下於十二小時半，在紡織工業，甚至達到十三——十四小時。罰制度達到這樣厲害的程度，以至單在莫洛索夫廠一廠，一年內就從工人身上扣下了兩萬金羅布的罰款。一切都要扣錢，甚至水管的水，到教堂做禮拜，洗澡，清洗廁所等等都被扣錢。這些事情引起了工人運

動，政府當然是幫助資本公司，他以軍事力量，鎮壓罷工，將罷工工人交付法庭，而且採取了大批驅逐工人移居他處的辦法。

莫洛索夫的罷工，帶着有組織的性質，在八千罷工工人中，為首的是前進的覺悟的工人莫以心諾克與伏爾柯夫，他們在革命小組中經過了秘密工作的鍛煉。罷工時提出了許多要求，如消滅罰款，減少工作時間，選舉工頭。罷工嚇怕了政府，為着鎮壓罷工，調遣了二營步兵一團騎兵。工人與沙皇軍隊發生了衝突，經過幾次的激戰以後，罷工工人的英勇抵抗，被摧殘下去了。

莫洛索夫的罷工，指出工人運動，已提到很高的階段，這一罷工逼得沙皇政府，頒佈了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禁止婦女做夜工的法令。

應當記得，這種工人的有組織的行動，是發生在俄國社會的前進分子被沙皇恐怖嚇怕了的時候。「民意黨」的領導被消滅了，並且在不平等的鬥爭中被摧毀了。「民意黨」獨立的陰謀家的組織，既沒有在農民中建立起羣衆的組織，又沒有在工人階級中建立起鞏固的關係。所以就得不到任何羣衆的贊助。散漫無組織，被地方長官巡查，警衛隊所壓榨，被牧師所欺騙的農民，還是順從地俯首自己的背脊，革命智識份子，失望於民粹派，不相信能夠喚起農民進行鬥爭，也還不了解工人階級的革命意義；他們極大地離開了革命運動，或是充分顯著地右傾了，而在民粹派中組織了列寧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祇有工人階級在這些年頭舉起了鬥爭的旗幟。那時比較最清醒的最忠於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就

着重注意到工人運動，而正確地看到工人正是領導革命達於勝利的階級。

民粹派運動的總結與結論

民粹派自以為是社會主義者，提倡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可是民粹派實際上阻礙了正確革命理論的成功。民粹派雖然翻譯了並且傳播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這是民粹派的功績）。可是他們在理論上實際上都是反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民粹派把農民理想化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在農民中建立任何的組織。十七年代的民粹派像列寧所說的，還是農民的戰鬥的民主主義的代表，八十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保留民粹派的一切基本錯誤，可是離開了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而以所謂「小小的事」與對於沙皇制度合作的宣傳來代替這戰鬥的民主主義。民粹派煨練出有利於革命的秘密革命工作的技能，但同時使他們的組織帶上狹仄的陰謀者的性質，這樣也就阻礙了羣衆的革命組織的建立，而給革命以損害。

民粹派在軍人中建立了革命的組織，可是他們深信智識份子領導作用的理論，所以他們僅僅在軍官中進行軍事工作，這樣就縮小了工作的範圍，使運動受到損害，民粹派促進了最初工人聯合會

的建立，可是他們看着工人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是一種附屬的力量，所以他們把工人中間的工作放在第三位，因而阻礙了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

但是對於革命運動特別有害的是民粹派的個人恐怖的理论與實際。這種理論與實際，使得階級鬥爭被『英雄』的個人義舉所代替，使得羣衆得到這樣不正確的思想，好像除去某一個人，就可以改變國家制度與社會關係似的，因之使工人組織者，不去用力組織與教育工人，而却將這力量耗費於實際恐怖上面，這樣民粹派（「民意黨人」）就滯延了工人政黨的組織，同時也就滯延了推翻沙皇制度，地主資本家政權的事業。

在八十年代「民意黨」被摧殘之後，民粹派轉成了可憐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他們更仇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他們全部的希望，在於沙皇政府能夠自動的實行那種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改良，能夠自動地組織起「人民的經濟」，如果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是尚未分化的農民利益的代表者，那麼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據列寧意見，正是富農利益的代表者。

民粹派不懂得社會發展的道路

他們以爲俄國因爲有舊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他們並沒

有把這一任務的實現，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作爲社會主義的過渡）連系起來，相反的他們以爲俄國可以避免『無產階級化的創傷』在他們和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上，民粹派向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以爲假使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瓦解公社，假使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在先進國家之一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可以幫助俄國革命，那麼這樣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可能的。自然，在那時的俄國以及獨立工人政黨尚未存在的情況之下，馬克思、恩格斯不能預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能在俄國首先得到勝利，但這也正可以說明，爲什麼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共產國際認爲在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國或諸國的國家幫助之下，許多落後的國家都可能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民粹派不懂資本主義的意義與作用。他們祇看到資本主義是惡事，而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團結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到鬥爭上去。

民粹派過分估計了智識分子的作用。他們以爲『批判的思維的個人』一出現於農村中，向農民解釋他們生活的痛苦，於是農民就起來革命了。

他們也不懂得國家的作用，在這問題上，許多民粹派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上的，他們不懂得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工人農民，首先應當推翻沙皇制度，並以此來保證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條件，並建立他們自己保護自己利益的工人國家。

馬克思主義者，爲着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不得和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以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民粹派進行堅決的鬥爭。沒有在思想上摧毀民粹派，沒有克服民粹派，那麼就休想建立工人政黨。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在其最初的階段上是和思想上摧毀民粹派的鬥爭相聯繫的。

第二章 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爭取

無產階級在俄國的政治領導權

——從勞動解放社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勞動解放社

我們已經指出，當蒲列哈諾夫、柴沙羅奇、阿克爾薛洛德僑居國外的時候，親切的認識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即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研究了西歐工人階級的有組織鬥爭的經驗，同時對於自己過去革命工作的本身經驗加以批判，民粹派依靠農民的企圖的失敗，在彼得堡工人中工作的初步的成功，驚醒了蒲列哈諾夫及其同志去要深刻的研究馬克思主義。

可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組成，有決定意義的還是成長着的工人階級，他以罷工使人知道自己，他們更加有組織地革命地行動起來了。

很快地蒲列哈諾夫、阿克爾薛洛德等得出結論來，必須創立特殊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而在
一八八三年組織了「勞動解放社」。這個半民粹派的名稱（「勞動解放」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解放）
是對於當時尚有權威的民粹主義的某種讓步。一八八四年發表了「勞動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參
加該社者有蒲列哈諾夫、柴蘇里赤、阿克爾薛洛德、德一奇、依格那托夫。

在這時候蒲列哈諾夫的第一步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亦出版了，與民粹
派和民意黨不同，蒲列哈諾夫在本書中說明了這樣的思想，就是爲了將來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必
須首先進行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不能和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分離的。同時
尖刻地反對民意黨以不依靠在有組織的羣衆身上的幾個陰謀家來「奪取政權」的計劃。

當時俄國革命者的多數是民粹派，因之對蒲列哈諾夫的新觀點及其創立的團體是仇視的，譏諷
地稱他們爲「勞動的解放者」。

蒲列哈諾夫在自己的大著我們的分歧一書中明定了在社會民主派與民粹派之間存在着分歧，
並且發揮了以下的觀點。

- (一) 從民粹派所宣揚的庸俗的農民的社會主義中是不能生長出無產階級革命來的。
- (二) 農村公社並不趨向於社會生活的與其經濟的共產主義的形式，而且趨向於資產
階級的形式，因爲他是根據在生產手段及工具的個人的佔有之上的，根據在私有財產制之

上的。

(三) 轉變到共產主義去的道路不是經過農村公社，至少農民公社，在這方面不能成爲倡導。

(四) 共產主義運動的倡導，是由無產階級來担负起來的。

(五)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蒲列哈諾夫的道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當時受到民粹派方面的猛烈的攻擊。

但是應該指出，在蒲列哈諾夫的著作中，特別在「勞動解放社」一八八四年的第一個綱領中，還有許多重大的缺陷。在第一個綱領中沒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要求。「勞動解放社」對於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給了過份重大的意義，并且還承認個人恐怖是政治鬥爭的手段。在「勞動解放」的綱領上，我們讀到：「承認反對專制政府的恐怖鬥爭之必要性；而與「民憲黨」的分歧祇在關於所謂革命政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及關於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直接活動的任務上。」（見蒲列哈諾夫全集卷二）

此外「勞動解放社」并贊成關於人民直接的人民立法的不正確立場，就是說人民不需要選舉自己的代表到任何國會中去，而由全體人民自己來直接創立法律，這些不正確的觀點有多少是民粹主義的反映，甚至是對民粹主義的自覺的讓步，當時民粹主義的思想還有很大的勢力。在「勞動解放

社」的綱領上提出了不正確的要求：「國家幫助生產者的聯合。」這是從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那裏取來的，拉薩爾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戰術是鬥爭過的。*

一八八七年「勞動解放社」發表了第二個綱領（草案），已經大大地改正了而且更加接近於社會民主黨的綱領。雖然就在第二個綱領中還仍就有某些不正確之處。

關於這個綱領草案，一九〇〇年時列寧寫道：「雖然這個綱領是在十五年之前發表的，然而一般地與整個地說來，我們認為他完全圓滿地解決了自己的任務，並且完全站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理論的水平線上。」（我黨綱領草案。）

從那些方面來觀察才使列寧認為「勞動解放社」的綱領是圓滿的呢？在綱領中確切地指明澈底的為社會主義鬥爭到底的階級——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所提出的目的——共產主義革命；先決條

* 拉薩爾——德國的社會主義著名的著作家演說家，馬克思同時代的人。（比馬克思死得早，他從不正確的「工資鐵則」出發，以為有所謂工資之最低限度而主張只為這個奮鬥。他對工人的經濟鬥爭及職工組織不加注意，而希望資產階級的國家幫助生產者的聯合，以為資產階級的國家能夠幫助工人經過這種生產聯合來組織生產，另一方面，拉薩爾過份重視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爭奪權及一般地國會的意義，而與著名的反動派俾斯麥談判。馬克思與恩格斯跟拉薩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戰術進行了鬥爭。現在工人階級的敵人利用拉薩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反對共產主義。）

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指出了俄國社會關係之特點——資本主義及地主經濟之雙重壓迫，指出了最迫切的任務及鬥爭手段。「勞動解放社」——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偉大功績就在這裏。可是列寧曾經對這個綱領加以批評，特別是在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上。

在「勞動解放社」的第二個綱領草案上寫道：「專制主義的最主要的支持就在農民的政治冷淡及智識的落後。」

一八九〇年蒲列哈諾夫寫道：「除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外，我們看不到別的社會力量，足以爲政府反對派或革命聯合底支持。」（全集卷三）

一九〇三年蒲列哈諾夫否認着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他寫道：「無產階級與「農夫」——這是目前的政治的對立物，無產階級之歷史作用的革命性底程度就是「農夫」之保守作用爲程度。」（蒲氏全集卷三）在一八九五年時在列寧和蒲列哈諾夫、阿克爾薛洛德之間已經存在着嚴格的分歧，這在以後就成爲布爾塞維克與孟雪維克之間的深刻的分歧。蒲列哈諾夫在當時與列寧談話中說，他不同意列寧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他說：「你是背向自由資產階級，而我們則面向他。」

蒲列哈諾夫認爲俄國祇有兩個革命力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樣，在當時在「勞動解放社」的綱領中已經透露了機會主義的思想。可是如果毀滅歷史的前途而認爲當時的「勞動解放社」

已經是完成的孟雪維克集團，那是不正確的。

「勞動解放社」——第二國際在俄國的最鮮明的代表者。* 第二國際在其活動之初期幫助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不過他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勞動解放社」同樣的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推動了社會民主派小組的組織，但是在他們的工作中已經存在了機會主義成份之萌芽。

特別不正確的是蒲列哈諾夫與「勞動解放社」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觀點。「勞動解放社」的活動家——首先是蒲列哈諾夫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可是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是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蒲列哈諾夫寫道：「社會民主派說祇有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觀點與列寧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列寧說：「沒有無產階級與貧農的聯合，民主是不鞏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斯達林同志說明第二國際及其領袖對於無產階級同盟者問題的這種立場時說：「這首先因為這些黨不想無產階級專政害怕革命與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誰害怕革命，誰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那他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不會有興趣——對於這些人同盟者的問題是不足關心的，沒有迫切意義的。」（列寧主義諸問題）

* 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第一次大會在巴黎開會。

在批評「勞動解放」新的綱領時，列寧提出了他自己的包括布爾塞維克主義根本的問題的提法。

不應該忘記，列寧從自己的革命工作開始時起就與「勞動解放社」之機會主義的傾向鬥爭，斯達林同志在十五次大會之結論中正確的指明：『如果沒有列寧反對五個人（即指「勞動解放社」之領導者——著者）的鬥爭，如果不排除這五個人，那麼我們的黨就不能團結成爲布爾塞維克的政黨。』

應該指出「勞動解放社」雖然有許多錯誤，但是對於俄國的初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治教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翻譯與出版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如共產主義者宣言——這是他們（指馬、恩二人）早期的創作之一，其中科學地通俗地解釋了當時先進工人對於社會的歷史發展的觀點——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然要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達到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他們出版了社會民主雜誌。

「勞動解放社」幫助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創造。

「勞動解放社」的工作，是在工人階級的羣衆的政治運動還沒有起來的時候進行的，列寧在確定他的歷史的地位時寫道，「勞動解放社」祇是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的根基，及向迎接工人運動做了第一步」（列寧工人運動中之思想鬥爭）當列寧開始自己的革命工作時特別到外國去了

一次（一八九五年）爲的是與「勞動解放社」取得聯繫。當時蒲列哈諾夫——特別是阿克爾薩洛德對於列寧已經有了他是發育着的黨的領袖的印象。

馬克思主義之傳播

——最初的社會民主派小組——

在國外「勞動解放社」成立的時候，在俄國共產主義的創始者，導師——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亦廣大地流行起來了。

當資本主義在俄國祇佔極微弱地位，而無產階級還沒有以獨立的鬥爭的階級力量而出現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是不會有迅速的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現的時候，正是資本主義在俄國已經有深厚的根基，侵入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部門，將市場服從資本主義的時候；正是巨大的工廠集合了除出賣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的時候。無產階級在工業城市中生長成了主要的階級。工人階級不能忍受在工廠與製造中所遭遇的可怖的非人剝削，不能忍受自己的完全沒有權利的狀況而起來鬥爭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下，工人的階級鬥爭更加擴大了，他表現得更加尖銳了，在這個工

人運動發展的基礎上，在俄國開始創立了許多社會民主派的小組與集團。這些小組的發展不僅與「勞動解放社」是並行的，而且有時是完全與他無關的。這是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及積極地增漲的最好的明證。

當然，理論在這上面亦有重大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給了先進工人以從新的觀點上去思索這個運動，正確地決定他的道路，製定他的政綱的可能性。

我們已經指出，「勞動解放社」對社會民主派的初期諸小組有很大的意義。這些小組在當時在俄國各地開始組織起來了——主要是在大的工業中心。在一八八三——八四年之冬，彼得堡的一個學生，叫做季特里·勃拉歌也夫的（保加利亞人）組織了第一個小組。他在我們的黨史上是以勃拉歌也夫小組著稱的。勃拉歌也夫在彼得堡認識了先進的工人與學生，在這些人中民黨與黑分黨當時都進行着宣傳。他在會議上宣傳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一八八四年勃拉歌也夫小組製定了綱領，這個綱領與「勞動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在許多方面都相類似。一八八八年的「勞動解放社」第二個綱領草案較之勃拉歌也夫小組的綱領，在馬克思主義方面更堅實些。在勃拉歌也夫小組的綱領上還保存着許多民粹派的觀點，但較之民粹派的小組則這些小組是前進一步，這小組組織了非法的印刷所，出版了工人報。在彼得堡的各處共有五十個勃拉歌也夫派的小組。一八八五年勃拉歌也夫被沙皇政府逮捕，因為他是外國人，因之驅逐出境。

差不多與勃拉歌也夫同時，杜起斯基在彼得堡組織了「提高俄國工人階級物質、智力及道德水準協助會」，即以後所謂為：「聖彼得堡熟練工人同志會」。

這會分為智識份子的和工人的二部份，杜起斯基對恐怖手段及民意派採取堅決否定的態度。他把智識份子與工人分割為兩部份的原因，就因為他不相信智識份子，把他們看做偶然的不可靠的同路人，由於高度的秘密技術，一八八八年的破壞祇破壞了他的智識份子的部份。工人部份保全着，這個保全着的工人部份在開展彼得堡工人中的宣傳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勃拉歌也夫小組之後，又組織一個小組，這在黨史上稱之為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小組的名稱取於其領導者之一的名字。這小組除了勃魯斯涅夫斯基之外，尚有很傑出的工人克里滿諾夫、施而爾、諾夫這兩個人都是杜起斯基小組中教育出來的，他們又組織了二十個工人小組。在這些初期的小組中參加了工人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工人如：波格唐諾夫、諾林斯基、施而爾諾夫、普魯升、阿芳那息夫、克里滿諾夫等，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參加了罷工，準備了出版報紙（當然是秘密的）。值得指出的勃魯斯涅夫斯基小組第一個在俄國紀念了五一勞動節（一八一九年），有許多工人參加，並有工人波格唐諾夫、普魯升、阿芳那息夫、克里滿諾夫等演說，真的，這些小組還不能算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他們中間還有保持民粹派觀點的人，可是他走上了更正確的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道路。這主要的是宣傳小組。這些小組的領導者在自己面前提出的任務是：在工人階級的強固

的組織創立以前，求得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領會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廣大的傳播出去。

列寧參加了八十年代下半期的這類小組之一——費多雪也夫小組。這小組是在一八八八年產生。列寧當時還是一個大學學生。

列寧很尊崇費多雪也夫，以後并與他通信，與「勞動解放社」的影響完全無關，費多雪也夫得出了必須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的結論。牢獄與放逐的環境摧毀了這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於一八八九年，在放逐中覺得自己被敵人追逐着而自殺了。在八十年代之末，在哈爾科夫，梅爾尼科夫及貝萊齊起組織了社會民主派的小組，以後，梅爾尼科夫被放逐於基輔，在那裏他又創立社會民主派的小組。同一時期，在八十年代在波蘭創立了「無產階級」小組。這派站在歧路上。一方面，他與民意黨有關並同情他的戰術及勃郎基式的陰謀組織。另一方面，這派的產生是根據在發展了的波蘭有組織工人鬥爭的基礎上，他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而在波蘭工人中做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李里涅夫、斯基及康恩——兩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這小組出身，這個小組的領導者瓦林斯基在法庭上的演說中如下地標明了這個小組的作用：

我們準備的不是變革，而是變革的條件——我們已經能够把工人運動變為獨立的，已經能够把他放進有紀律的範圍中形成着鬥爭手段與目的的一定綱領而引導無產階級到勝

利去。

這個小組準備了兩個波蘭組織的基本幹部，帶着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色彩的波蘭社會黨，及波蘭、陶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這組織在一八八四年被破獲。

無疑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宣傳時期，在教育先進工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教育了一批革命職業家，他們自九十年代起以列寧為首成了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組織的力量。

列寧認為從一八八四到一八九四年的十年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胚胎時期。

『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綱領的產生與鞏固的時期。贊成新的方向的人在俄國屈指可數。社會民主派在工人運動還沒有起來時就存在了，經歷了一個政黨的胚胎發展的過程。』（列寧做什麼）

當列寧出現於政治行動的舞台上時，這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胚胎時期就完結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列寧在彼得堡

我們已經知道，在八十年代之中期和末期，在各大工業中心已經組織了各色各樣的工人小組。可是還沒有有一個政黨能夠來聯結這些小組。但正是這個時期，特別是九十年代，俄國的工業暴風雨般的

生長者，正是這個時期，俄國經歷了真正的工業革命。新興的工業工廠之百分之四十是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的十年間產生出來。許多新的工業中心產生起來了。雖然在絕對數字方面俄國還遠遠的落後於歐洲，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講，俄國趕過了歐洲，趕過了美國，發展的『美國式』速度。大家知道這是算最快的速度的。

工業的總的生產率從一八八七年的二·三〇〇百萬盧布至一九〇〇年已經增長成爲三·二〇〇百萬盧布了；工人的數目亦很有力地生長着。如五金工人在一八九三年爲十九萬三千至一九〇〇年已經有三十四萬六千了；煤礦工人在一八九〇年爲四萬人至一八九八年已有七萬人了。外國資本的輸入幫助俄國工業的暴風雨般的發展。外國資本在俄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得到很大的利潤。聞所未聞的剝削，農奴制的秩序，幾乎完全沒有勞動法則，低微的工資——這些都幫助了資本家的非常的利潤。但是資本主義的猛烈發展引起了有力的工人運動，這個運動迫切的需要領導。一八八四年以罷工運動的活躍爲其特點。在脫威爾、雅魯斯拉夫、彼得堡的紡織工廠中間開始了罷工，接着南方各地亦發生了罷工，從社會民主派的小組宣傳需要轉入羣衆工作，在這個時期中在工人階級中已經有個別的工人領悟了有組織的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必要性，個別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工廠中的先進工人確立了聯繫，組織了小組來進行宣傳。從九十年代之下半年起，做了聯合各個小組的企圖，做了轉變革命工作的新的方法的企圖。

這個轉變到羣衆中鼓動工作，同時就是列寧在彼得堡活動之開始——一八九三年。

烏里亞諾夫（列寧）——他在成爲革命家時的名字，亦即是他的大多數著作的署名）生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新比爾斯克城。他的父親叫做伊里約·尼古拉衣維赤，是商人家庭出身，新比爾斯克省的國民學生的視察員。母親叫做馬麗·亞歷克山得路文娜，醫生之女。列寧中學畢業時，他的哥哥，亞歷山大被捕了。亞歷山大是「民意黨」黨員，參加了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第三爲目的陰謀。在決定實行暗殺沙皇的一天，列寧的哥哥及其他民意黨人被捕了，不久即被絞死。列寧與他的哥哥談話中已經能够認識革命運動。但是他得到結論說：民意黨的道路不是適用的，就是大哥亞歷山大，雖然承認恐怖手段，但亦不自認爲純粹式的民意黨員。正是亞歷山大給了列寧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叫他讀。

列寧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思索而看到了另外一種鬥爭的道路，羣衆革命鬥爭的道路，即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革命鬥爭的道路。一八八七年列寧考入卡桑大學，同時因參加罷課而被捕，開除學籍，放逐於古歌書起諾村。經歷了許多艱難，列寧才能重新回到卡桑，在那裏他認識了費多雪也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在這裏他更堅實地認識了馬克思的理論著作及「勞動解放社」出版的蒲列哈諾夫的書籍，以後列寧到了沙馬爾，很快就在他周圍組織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從他的親近的人們的回憶錄看來，在一八九一年，列寧已能用法文與德文自由看書，學着英文，懂得資本論，已經是完成的革命家了，雖然當時他還只二十二歲。這時候，他開始了第一部著作是研究農民的，叫做農民生活。

中之新的經濟運動。一八九三年列寧移居彼得堡，很快地他在自己周圍集合了馬克思主義營壘中的最鮮明代表者。在這裏，列寧遇見了克魯茲斯卡耶，她與他終生一同工作着。

列寧在當時就給大家以很有力的印像，不僅因為他具有對於工人階級事業勝利的信念，而且因為他的淵博的智識。到彼得堡之後，列寧參加了著名的民粹派伏尤楚夫（即微微）的報告。列寧反對伏尤楚夫的演說，給大家以極大的印像，而到會的警察局暗探向警察局報告，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給了民粹派伏尤楚夫重大的打擊。

克爾壽長諾夫斯基回憶道：

「一八九三年列寧出現於彼得堡時的第一次的報告已經給與我們以難忘的印像。我們隊伍中沒有人能够像他這樣熟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淵博的智識以回答大家關心的俄國經濟問題；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够有他這樣的依靠我們地方統計的豐富材料而得深刻的研究這個經濟；我們之中沒有人能够在行動諸力量的階級分析的深刻與廣泛方面與他競爭。」（見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列寧在彼得堡工人中進行了工作，組織了工人小組。

列寧按年齡說來是青年的同志，但由於他的智識與經驗，大家稱之為「老頭子」；在列寧周圍的人都叫做「老成派」，而那些不同意列寧的人就叫「青年派」。在一八九三——一九四年「老成派」

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小組，不久這些小組便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彼得堡的「爭取俄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列寧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

列寧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與恩格斯進行了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當時在俄國連工人階級組織的萌芽都沒有。「勞動解放」亦跟民粹主義做了鬥爭，雖然是不十分澈底的。

正是列寧給了民粹主義以真正的決定的打擊，馬克思主義者繼續着組織工人的小組并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同時他們把從民粹主義的影響下奪取當時的反政府的及有革命情緒的智識份子當作自己的任務。九十年代之自由主義的民粹派，自稱爲「土地與自由黨」及「民意黨」的事業的繼承者，可是正像列寧所指出的，他們完全放棄了這兩個組織的革命任務——與沙皇制度鬥爭。列寧把「民意黨」消滅後而出現的民粹派與革命的民粹主義分開來，而稱之爲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或「民粹派之末流」（即其殘餘）。他們拒絕了革命的道路而走上了和沙皇制度調和妥協及合作的道路。這個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的領袖爲著作家米哈依洛甫斯基、尤若酷夫、克里文哥等。他們在俄國之富

及其他雜誌寫着民粹主義精神的文章。這些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失掉了任何的革命性，宣傳改良主義的鬥爭方法，可是還保持着民粹派的一切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成見，保持對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方面之不了解，害怕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運動之發展。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宣傳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組合的救命的的作用，并號召國家與「社會」幫助「人民的生產」（即生產組合，公社等等）去和日益生長着的大工業鬥爭。這些沒有民衆的民粹派的希望不是放在人民身上而是放在沙皇政府身上。自由主義的民粹派抹殺了在所謂「人民的生產」之中有階級鬥爭，他不願意承認在「生產組合」等等之內有階級的壓迫，野蠻的剝削，他的程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和工廠製造所來得輕，在許多場合更來得厲害，無產階級的運動駭怕了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他們把階級鬥爭叫做「獸性的學校」，把工人叫做「無產階級的膿包。」

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之出現，是有許多原因的。民意黨的組織是被摧毀了。政府的恐怖，無疑地給了一部份民粹派以影響，企圖找尋更「和平的道路」。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的「幹小事」的宣傳是對於革命鬥爭的道路之勝利希望消失的結果。農民仍然是無望的。而沙皇政府摧毀了「民意黨」的組織。民粹派在工人中間沒有聯系，并且不能依靠在覺醒起來的羣衆運動之上。在農村中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動；基本農民羣衆之貧困化，生長了富農。

列寧在反對自稱爲「人民之友」的民粹派時，指出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民粹派與七十年代的

民粹派之區別，他說。

『農村破裂了，生產了一方面無產階級的羣衆，另一方面，少數「富農」壓迫着其他的居民——不僅如此，農村早已完全破裂了。與這個一起，舊的俄國的農民社會主義亦分裂了，讓位於一方面工人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蛻變成了庸俗的市儈的激進主義——從希望中激起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現代社會的根基的政治綱領（列寧附註：這正是我們一切舊的革命綱領之本質，從巴枯寧主義者，暴動派起，爲民粹派所繼承，而告終於民憲黨……）蛻變爲希望修補「改善人民生活狀況，而保存現社會根基」的綱領。』（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

列寧解釋這個情形的原因，就在自成一套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理論是依據在錯誤的想像之上的。『關於農民經濟的特殊的（農村公社的）結構，與實際情況一接觸之後，神話消散了，因之，從農民的社會主義中得出了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激進的民主主義的代表者來了。』（同上）在別的地方列寧對於從革命的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蛻變給以更加展開的圖畫：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早就指出了舊的，俄國的，典型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的蛻變，這個蛻變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就不斷地生長着，對於農民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對於農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萌芽與基礎，對於可以用直接的社會革命來避免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對

於人民已經準備好了社會革命，對於所有這些信仰是黯淡下去了。祇有用一切方法來鞏固農民經濟及一般的「小的人民的生產」，這個要求還保持着政治的意義。這個要求在其根柢上祇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民粹主義溶解為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派的流派形成起來了。他們不願看見或不能看見一切他們所設計的方案（所有這些信用貸款，合作社，土地改良，耕地擴張）都沒有超過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見同上書）

雖然，在這時候民粹派已經大大的冷落了，可是還有一部份小資產階級青年仍然追隨着民粹派。民粹派妨害工人階級集結起來進行獨立的鬥爭。

因之當時是要經過與民粹主義的鬥爭，經過民粹主義的克服，才能走向馬克思主義。就因這種原因，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主義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最近廿五年來俄國革命思想的整個歷史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的社會主義鬥爭的歷史。』（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在與民粹主義的鬥爭中，蒲列哈諾夫無疑地是有他的功績的。他的著作，我們的分歧（一八八四年）及史的一元論（一八九四年）幫助了許多人確定道路與克服民粹主義的殘餘。蒲列哈諾夫用這些著作斬斷了自己民粹主義的過去。但是蒲列哈諾夫沒有把自己熱心於民粹主義時期中的東西，完全從自己的意識中肅清出來。

大家知道的，跟民粹派爭論的主要問題是關於對農民的關係的問題。這裏極顯著的暴露了列寧

與蒲列哈諾夫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態度。蒲列哈諾夫籠統地認為一切農民都是反動的，而在批評民粹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實踐時，迴避了爭論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如何領導農民的問題，不給任何的回答，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的問題，雖不是俄國革命的主要問題，但是他的最重大的問題，以後我們可以見到，對於俄國革命最主要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列寧與蒲列哈諾夫之間有極大的分歧。

列寧不同地估計了民粹主義。他嚴格的分別了民粹主義的兩方面：他的空想的農民庸俗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以及一般的民主主義的鬥爭，這個鬥爭歸結到農民主張消滅一切農奴制遺跡的革命要求。列寧指出：當反對民粹派的反動理論時，同時應該利用他們反對農奴制壓迫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祇有這種民粹主義的估計（民粹主義反映了農民的二重性），才能幫助工農聯盟的建立。

這個對民粹派估計之不同，有着重大的原則的與實踐的意義。

列寧給了民粹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一八九四年，秘密出版的列寧的名著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是專門用來批評民粹派的。民粹派自稱人民之友，很厲害地攻擊馬克思主義者及馬克思的學說。可惜，這本書現在是不全的了，因為一部份為沙皇的憲兵所消毀。這本書說明列寧在一八九四年時已經完全正確地了解與預見了將來革命發展的道路。列寧在當時就看到工人階級是將來革命的領導者，預見了工人階級將站在『一切民主主義份子的為首地位。』

當時列寧提出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如下的任務。

(一) 在小組中集合工人階級的先進的代表們(組織任務)。

(二) 幫助他們領悟科學的社會主義(宣傳的任務)。

(三) 幫助他們了解俄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的作用，就是幫助工人階級的先進的代表了解祇有俄國工人階級能够成爲當前的革命的指導者，領袖。

(四) 當這個思想已經廣大地傳播了之後，在工人中創立堅固的黨的組織，這個組織應該以自覺的階級鬥爭來代替工人的零散的經濟鬥爭(創立工人的政黨)。

(五) 祇有在這些條件之下，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够站在一切其他鬥爭着的民主主義份子的領導地位。這裏已經給了在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而像斯達林同志所正確地指出的一樣：無產階級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

(六) 工人階級並不停滯在戰勝沙皇專制政體的勝利之上，對於工人階級道不過是一個階梯，以便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走向「以公開的政治鬥爭而達到共產主義革命的直接道路(與各國無產階級一起)」。共產主義革命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

這樣四十年以前列寧已經完全顯明的看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四十年前，列寧已經給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的思想。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列寧最嚴酷的批評了

民粹派，特別是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因為他以「人民之友」的作用而出現，所以他們對工人運動是特別有害的。列寧證明了他們對俄國的歷史發展的了解之不正確。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對於整個我們的黨的以後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他幫助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形成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這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的綱領，列寧提出這個綱領時（一八九四年）正是社會民主黨的胚胎時期已經終了，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作為獨立的政治派別而出現了，以列寧為首的彼得堡「鬥爭同盟」已經形成了的時候。

他指出：民粹派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抹殺階級鬥爭的意義和必然性，不說鬥爭而說協調的文化的活動。列寧譏諷民粹派說：「這些騎士們以為祇要他們對於勞動羣衆狀況的惡劣（不是由於他們「被動搖」而是由於他們受少數剝削者的無恥的搶劫）這個事實閉目無視，祇要他們像駝鳥一樣埋起頭來不看見這些剝削者，他們以為這樣剝削者就消滅了。」（見什麼是人民之友）

列寧強調了六十——七十年代民粹派反對沙皇制鬥爭這個事實的意義，但是他堅決地反對民意黨人的恐怖主義，認為這對革命是有害的。應該在這個意義上去了解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抗議上所寫的詞句說：俄國社會民主黨「繼續俄國一切以前的革命運動的事業與傳統；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為整個黨的最主要的迫切任務；而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早為

舊的民意黨的光榮的活動家所明白指明了的，但是社會民主黨選擇了不同的達到目的的手段和道路。」（蘇聯共產黨的決議卷一）

這樣，列寧所說的僅僅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傳統。

列寧無情的揭露了民粹派（民意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戰術之害處，因為這個恐怖戰術是不相信人民暴動之表誌與結果。列寧說：『恐怖是智識份子小集團之陰謀。恐怖與任何羣衆情緒都沒有聯系，恐怖不能培養任何羣衆鬥爭的領袖，恐怖是不相信暴動，沒有暴動的條件之結果及信號與同道者。』（列寧：俄國現狀）

孟雪維克把黑分派描寫成爲民粹派思想上過渡到馬克思主義的一環，這是不正確的。同樣不正確的是把布爾塞維克黨的產生歷史與民粹派聯結起來。未茨凱維奇就是這樣的。他想證明如果蒲列哈諾夫是從「黑分黨」出身，那麼列寧就是從民意黨出身的。他的斷語說：『布爾塞維克主義是民粹主義運動的諸成份的綜合與補充。』是不合馬克思主義的。

梯奧多洛維赤企圖粉飾與理想化民粹主義，給他們加上現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色彩，把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加之於民粹派身上，從民粹派著作中去找「國家的新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指示之類（而民粹派是絕沒有這類思想的），都是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斯底克洛夫想證明巴枯寧的某些著作比馬克思還高明及企圖把且尼雪夫斯基當作馬克思主義者，亦

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在樸克洛夫斯基的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史教程中，我們看到好多處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有害的比擬。譬如把脫加屈夫稱之爲「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却曾經因脫加屈夫之陰謀派及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而譏笑了他。樸克洛夫斯基把無政府主義者——尼却葉夫派認爲布爾塞維克而說：在七十年代「革命運動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部份已經很遠的分開了」，樸克洛夫斯基以爲民意黨人壽略可夫比布爾塞維克更早地預言了不僅一九〇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

在列寧的著作中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佔着很大的地位。列寧全集的第一二兩卷的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直接地或者間接的反對民粹主義的，祇要舉出以下的著作就够；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及農民生活中之新的經濟運動（一八九三年），經濟浪漫主義的分析（一八九七年），那些遺產是我們應該拒絕的（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等等。

必須在思想上摧毀民粹主義，不然，就不能創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這個任務爲列寧所光榮地完成了。

合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書報上之

反映

跟着工業的發達，跟着工廠製造所鐵路建設的發展，無產階級長大起來了，同時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馬克思主義亦更大的傳播開來了。

當俄國工人羣衆有組織地進行鬥爭時，民粹主義已經被摧毀了，「民意黨」在與沙皇政府鬥爭中覆滅了，個別的民意黨人還想把已經潰散的力量重新集合起來，可是即在民意黨人本身中間亦已經不一致了。工人運動指明了革命發展的方向。我們已經知道列寧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給了民粹主義以堅決的打擊。

在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中，除了革命的社會民主派之外，還有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亦參加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祇不過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同路人。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及俄國變成資產階級的俄國的環境中，這些同路人想利用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以達到把工人運動去適應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把資產階級描寫成似乎是在俄國負擔着特別的進步的作用。他們亦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們從馬克思的學說中常取了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學說，而拋棄了這個學說之革命的本質。對於馬克思關於暴力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必然性，資本主義崩潰及無產階級專政

建立的必然性的學說，他們企圖加以抹煞甚至駁斥。列寧稱他們為資產階級影響在無產階級中的傳播者。

政府在那時還依舊在和革命的民粹主義殘餘，民意黨的殘餘作鬥爭，因此，起初他對合法馬克思主義雜誌出版袖手旁觀。因為在這些雜誌中批評着民粹主義的基礎。自然，這絕不是說政府給了馬克思主義者以言論的自由；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些雜誌上佔大部份地位的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及列寧的論文不能不非法的出版，因為合法的版本剛在印刷機上下版的時候就被警察燒毀了。憲兵會燒了一本論文集，其中有一篇列寧的論文，在這文章中列寧揭破了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領袖之一——彼得·斯脫魯維的偽造，在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之下宣傳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時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即法律允許的）在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中間取得了很大數目的擁護者，列寧指出：合法馬克思主義是不可靠的人，他們很快會叛變我們，他們不過是暫時的同路人，實質上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擁護者。當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發展起來時，事實上亦就發生了這種情形：這類「馬克思主義者」如彼得·斯脫魯維、貝爾加也夫、杜甘巴倫諾夫斯等等走到敵人的營壘中去了，彼得·斯脫魯維從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地位墮落到佛浪該爾的擁護者，公開的白黨君主派。

亦有後來成為牧師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如巴爾加可夫。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會是革命家。這些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企圖為着自己的階級利益而

利用馬克思主義合法馬克思主義粉飾資本主義。他們指出資本主義的工廠製造所比小生產不同，他們帶來了『進步』與『文化』。自然，他們不能和不願意看見在一切這些資本主義『進步』之中的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合法馬克思主義曾經寫過，如果俄國還有失業，還有羣衆的窮困，那麼這祇不過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還不够，提倡『承認我們的文化落後，并跟資本主義者學習』。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族類。與德國的伯因斯坦及其他國家的改良主義者一樣，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採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并且曲解他），拒絕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而對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及無產階級革命地奪取政權的思想是仇視的。當列寧揭露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本質時，蒲列哈諾夫對他們是採取調和的態度。斯脫魯維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跟資本主義學習』，蒲列哈諾夫認為完全沒有什麼害處的，不過是兩方傾向者的誇大而已。

列寧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民粹派的鬥爭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如列寧所屢次指出的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民粹派）與俄國工人運動中以前的及以後的機會主義派別及西歐的修正主義有血統的聯系及相同的根源。

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如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八九四年），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斯脫魯維對他們的批判（一八九四年），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任務（一八九七年）及以後的著作中，列寧堅決地起來反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曲解與偽造，而把無產階級鬥

爭的最重要的諸問題提到了很大的理論的高點，并把最緊急的任務提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列寧這個工作教育了列寧派革命家。

列寧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不僅僅把俄國革命的問題正確的提出來了。——這些著作從最初就有巨大的國際意義。列寧在這些著作中提出了，並且在全世界面前以新的方法，戰鬥的方法解決了一切俄國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

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同盟

一八九四年末及一八九五年初，著名的工人組織，「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在彼得堡成立了。參加這個同盟的有列寧、克爾壽長諾夫斯基、克魯濱斯卡耶、斯大爾可夫、馬爾托夫、范涅葉夫、柴普羅順秋、馬爾欽歌、齊那依達、蘇非尼夫、茶洛夫娃、耶苦薄娃、西爾文、喀霍夫斯基、戈弗門、拉得欽歌弟兄、李金尼克、克拉辛、李潑升斯基、戈烈夫……等，這些同志在彼得堡各區各小組中工作，列寧曾在涅夫斯基哨所後工作，領導了四個小組。在那裏列寧認識了許多傑出的工人如巴浦世金、博特洛夫、施爾顯辭夫等。從一八九六年起，加李寧就成了「鬥爭同盟」的積極參加者，當時他在普的洛夫工廠做工。

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同盟」給了羣衆鼓動的工作以很大的意義。他不以小組中的宣傳

工作爲滿足，不以從工人小組中訓練很好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派爲滿足，「鬥爭同盟」提出領導工人羣衆鬥爭爲自己的任務。因爲祇有在鬥爭中才能教育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會學習認識自己的力量，明晰自己的任務與認識敵人的力量。

列寧屢次指出：社會民主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羣衆的工人運動之結合。應該把改善經濟條件的鬥爭與反對剝削者統治的制度底總的階級鬥爭聯結起來。「鬥爭同盟」自己的工作就從宣傳過渡到鼓動。當工廠中發生罷工時，「鬥爭同盟」就印發傳單，解釋和說明鬥爭的任務。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列寧和巴浦世金一同寫了一張告西門尼可夫工廠工人的傳單。一八九五年秋列寧寫了告杜爾東工廠工人的傳單。當拉菲姆香烟工廠罷工時，列寧寫了一張傳單叫做拉菲姆工廠女工們要求什麼，彼得堡「鬥爭同盟」領導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大的罷工，組織了這些罷工。如一八九六年三萬組織工人的著名的罷工是在彼得堡「鬥爭同盟」領導之下進行的。在這個罷工的影響之下，沙皇政府不能不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宣佈限制工作時間爲十一時半的法律。「鬥爭同盟」決定了出版工人事業報。這個報紙的領導地位應該由列寧來擔負。報紙已準備出版了，可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老成派」的中央集團的大部份：列寧、斯大爾可夫、克爾壽長諾夫斯基、柴普羅順秋、涅葉夫都被捕了。這次的逮捕對於彼得堡「鬥爭同盟」以後的命運有重大的意義。在列寧被捕之後，起初站在同盟的領導地位的是馬爾托夫——將來的孟雪維克的領袖（在當時是列寧的親近的意

見相同的人。)不久以後，幾乎所有的「老成派」都被抽了。這時站在同盟的領導地位的已經是「青年派」了——這些人是不同意「老成派」首先不同意列寧的，在如何進行羣衆工作，依照什麼方向，什麼道路來領導青年的工人階級的運動，這一問題上。

列寧即在牢獄之中亦不會停止替工人階級的組織工作。他從牢獄中用秘密的方法把文稿送到外面，如論罷工，給沙皇政府都是列寧在牢裏或禁閉室中寫下來的。

彼得堡「鬥爭同盟」在這個時候的意義，就在他是公認的實際的領導中心，擔負的作用就是他是「革命政黨之萌芽，這政黨是依靠在工人運動之上的，他領導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及反對專制政府的階級鬥爭。」(列寧)列寧以所有的熱情宣傳工人階級戰鬥的政黨的創立，這個政黨要能夠將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團結在自己周圍以進行堅決的戰鬥。列寧屢次說到「作戰」的黨。而這種新形式的黨，「作戰」的黨，決然地爲着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政黨，他的萌芽就是在列寧領導之下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列寧當時需要說明(如向以後的孟雪維克馬爾托夫)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不能和政治鬥爭分開的，說明馬克思的論點：一切階級鬥爭是政治鬥爭，說明必須在工人階級的意識中經常地把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維持這種地位的政治秩序聯結起來，說明因此必須把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任何衝突，利用來使落後的工人的意識能夠把這些剝削與污辱的日常事實和國內統治着的政治制度聯結起來。

「青年派」是不同意這些觀點的，他們以為政治鬥爭會把工人階級吸引着去離開他的主要的直接的經濟鬥爭的任務。因而在一八九六年底由於「老成派」之被捕，由於同盟的領導落於「青年派」手中，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脫離了革命的道路。然而同時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是增漲起來了。工人階級必須和沙皇的專制的俄國之一切國家制度鬥爭的意識是一天天地鞏固起來了。

彼得堡「鬥爭同盟」極大的推動了其他地方的各個個別的小組聯合為類似的同盟。

九十年代之末，南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帶有的有組織性質。那裏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就有被沙皇政府放逐去的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約瑟夫·柯金、伊凡路太、佛蘭起斯基在進行宣傳。一部份到過外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趙爾丹尼約、欠依之是在南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一八九三年組織了「米箕米·達西」集團（民主主義集團），其參加者的政治傾向是很複雜的。一八九五年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楚魯欠之加入了這個組織，一八九七年略多凱茨 維黑加入了，一八九八年 斯達林加入了。這個組織的少數集團——上述三人——定下了南高加索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存在的發端。當時著名的革命家之一——維克多庫爾那托夫斯基特別幫助這個集團的觀點的形成。

青年的斯達林同志在一八九七年已經是工人與學生小組的組織者與宣傳者了。斯達林同志是

鞋匠之子，因有革命思想而被中學校開除。斯達林同志在自己革命工作開始時起就成爲在創建布爾塞維克黨的事實上的列寧的忠實的助手，雖然他們直到在一五〇五年的布爾塞維克的坦米爾福爾斯（芬蘭）的代表會議上才見面。

更早一些在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已經由幾個小組的合流而組成了「莫斯科工人同盟」他的著名的活動家有，略獨夫、米茨凱維赤、維奴古洛夫兄弟及普魯古佛葉夫。一八九六年，爲紀念巴黎公社，莫斯科工人同盟組織了莫斯科工人致法國工人的祝賀詞。在二十八個工廠中收集了近六百個人簽名於這個祝詞之上，煤汽廠工人甚至決定關閉煤氣管使尼古拉沙皇加冕禮之日克里米官成爲黑暗世界。

一八九七年之這個同盟改名爲「莫斯科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九十年代之末，在西伯利亞組織了「西伯利亞社會民主同盟」他的組織者是巴倫斯基、顧必而門、色多夫、勃拉歌斯拉夫斯基等。以後，顧依畢魯夫兄弟及基洛夫等在「西伯利亞社會民主同盟」中獲得了革命的教育。

九十年代，在奧里霍夫、茶葉夫、依凡諾夫及華瓦尼新斯基部份地在費多雪也夫影響之下產生幾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以後聯合成爲社會民主黨「北方同盟」。

一八九三——一九四年馬克思主義者阿拉伯才夫及馬世茨斯基在洛斯托夫團結了一百五十人。

在葉加德琳斯拉夫、基也夫、尼古拉也夫、多爾薩馬爾、加澤恩等地在九十年代下半年期創立了社會民主派小組。

在一八八九年，在波蘭創立了「波蘭工人同盟」而在一八九一年被逮捕後，創立了波蘭社會主義黨，在這黨不久便形成了以露莎·盧森堡爲首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核心。

九十年代之末創立了立陶宛與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在俄國西方各省中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創立了猶太工人同盟，其中心在維爾斯。雖然猶太工人同盟在從宣傳轉變到鼓動工作上，如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的組織上，他對工人運動是有功績的，但是他從來不會是澈底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他傳染着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宣傳了這些思想。

列寧及其同志在彼得堡所倡導的思想，在當時會盤旋於許多革命家的頭腦之中，這就是創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這就是轉變到在工人階級中的進行鼓動工作（不僅經濟的，而且政治的）的思想。

當時傑出的組織家與宣傳家之一——梅爾尼可夫典型地表現了這個思想。他說：

『提高羣衆一寸，較之一個人獨上高樓要好得多。』

在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前，列寧及其擁護者不得和「青年派」（即經濟主義者）進行鬥爭，

社會民主派中之機會主義的流派進行鬥爭。

給在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一八九八年）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傳播的初期作總結時，列寧指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約十年（從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從「勞動解放社」之獨立到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組織，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綱產生與鞏固的時期。贊成新的方向的人屈指可數。社會民主派在工人運動中還沒有起來時就存在了，經歷了一個政黨的懷胎的發展的過程中。

『第二個時期共佔三四年，即從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從彼得堡「鬥爭同盟」至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著者注。）社會民主派作為社會運動，作為人民羣衆之高漲，作為政治的黨派而出現於世。這是童年與少年時期。智識份子對於民粹派的鬥爭的熱中，工人對於罷工的熱中，像傳染病一樣地迅速的流布。運動得到巨大的成功。大部份的領導者——十分年輕的人——由於他們年輕，對於實踐工作是沒有養成的，而驚人的迅速地從舞台上跌落了，可是其中大部份的人的工作的範圍是很廣大的。其中許多人當他們開始革命地思考問題時是「民意黨」式的——鬥爭迫得他們去學習，去閱讀各派的秘密出版物，努力地去研究合法民粹主義的諸問題。在這個鬥爭中教育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走向工人羣衆中去。

「一分鐘」亦不忘掉照耀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推翻專制政治的任務。一八九八年春黨的組織是社會民主黨派在這個階段上的最明顯而同時亦是最後的事業。」（列寧做什麼）

這就是列寧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前俄國社會民主派的發展史的分析。
社會民主黨發展之第三時期主要地在第一次大會後才開始的。

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我們已經看到九十年代之末，在各個工業中心中，單個的工人小組聯結起來而組成了社會民主派的組織，這些組織逐漸地從不大的小組宣傳轉變到羣衆鼓動。同時在運動生長影響之下，許多同時都成熟如下的思想，那必須把分散地行動着的組織團結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六年之初，「莫斯科工人同盟」已做了這個企圖，甚至已經製定了大會的綱領，可是大會沒有能够召集。一八九七年之初由基也夫「爭取工人階級解放同盟」之發起開始出版了全黨的工人報。一八九七年三月基也夫的組織企圖召集代表大會，但是沒有成功，祇到了三個代表（彼得堡、基也夫與波蘭社會民主派小組）他們就自爲預備會議。

祇於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在明斯克才開成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出席者有各個社會民主派組織的九個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也夫、葉卡德琳、斯拉夫的「鬥爭同盟」各一，猶太工人同盟，基也夫出版之工人報二個代表。雖然在九個人之中祇有一個工人，然而這次大會無疑地在創立工人政黨上有他的意義。工人報被認定為中央機關報，推選了三個人組成中央委員會（拉得欽、直里米爾、愛依台爾曼），製定了黨章，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在這宣言中指明黨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務是奪取政治自由，指明了社會民主黨是「民意黨」鬥爭之繼承者，但是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黨走的是有組織的工人羣衆的階級鬥爭的道路。宣言上說，黨以團結一切地方組織小組為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作為自己的任務。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大會決定工人政黨之自立上有巨大的意義。是的，在大會之後，大會上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及大會文件，與工人報印刷所全體被捕了。在各城市中逮捕了五百左右的社會民主派人，在基也夫一處即逮捕了一七六人。就是這些數目字，已經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運動發展之範圍，雖然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出席的組織很少，可是他匯集了單個的組織，單個的「鬥爭同盟」。從此時起，這些單個的組織便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而存在了。在第一次大會宣言中，政治鬥爭的任務佔了應有的地位。

第一次大會的主要缺點就在大會沒有製定黨綱，對重要的戰術問題沒有決議，而大會之組織決

議沒有保證黨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正因為如此，以後在機會主義者領導下的猶太工人同盟熱烈地堅持這個第一次大會的組織決定。

第一次大會的宣言，一般地說，是不確切的原則上很不堅定的文件。其中沒有提到這重要的要點，如政權移轉到無產階級之必然性——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提到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沒有一句話講到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然而這個宣言却有大的政治的，團結的意義，他表明運動的前進一步。把地方小組匯集成為政黨，這便鞏固了『俄國革命運動到自覺的階級鬥爭的新時代的轉變』（列寧全集卷二）第一次大會宣言說：『資產階級愈到歐洲東方，他在政治上愈薄弱，文化的政治的諸任務愈益落在無產階級的身上。』這對於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及他對資產階級關係有原則上的重要性。宣言上曾指明，奪取政治自由——『祇是實現無產階級歷史使命（創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之第一步。』

列寧指出了第一次大會沒有創立一個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在第一次大會後創立黨的鬥爭成爲工人運動的迫切任務。社會民主黨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到來了。

『我們已經看見，一八九七年已經準備了第三個時期，而在一八九八年他便出現了，替換了第二個時期。』（列寧做什麼）列寧將這個時期稱爲瓦解，崩潰與動搖的時期。『在少年時代，人常會聲音嘶啞，而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這個時期聲音亦嘶啞了，嘶啞虛偽之聲響起來了。』（列寧怎樣做）這個

虛偽之聲一方面是在合法馬克思主義之聲，斯脫魯維、普洛奇、樸維茨等，另一方面是形成中的經濟主義者機會主義派：馬丁諾夫、克利且夫斯基等。但是列寧同時指出：「……後退者祇是領導的人，運動本身仍然繼續生長，並且大踏步前進，無產階級的鬥爭奪取了工人的新階層，擴展到全個俄羅斯，並且間接地影響了學生及其他人民階層之民主精神的活躍。」（列寧怎樣做）這樣，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的形成本以下的階段：

（一）跟着資本主義的生長消滅了（雖然還不是最後的）革命的民粹主義的幻想；在階級鬥爭的新的事實的影響之下，新的階級生長的影響之下，在實際生活的影響之下，不僅是書本的影響，在國外及俄國內創建社會民主派的許多小組，這些小組的基本工作是宣傳，但是還沒有浸入羣衆。

（二）在資本主義暴風雨般的發展及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運動的影響之下新的轉換到來了。在這基礎上馬克思的學說大大地散佈起來了。經過小組工作之轉入羣衆鼓動，轉入領導鬥爭之最初的企圖，社會民主派的小組與羣衆聯結起來了。進行創立政黨的初步的企圖，這爲一八九八年之第一次大會所完成。但是如果不是形式地對待問題，而是以通過的決議的內容看來，則我黨第一次大會不是一八九八年之明斯克大會，而是第二次大會。第二次大會才放下了布爾塞維克黨存在的基礎。

這個時期給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初組織以很大的經驗，「鬥爭同盟」已經有了很豐富的組織經驗，準備了從小組轉入職業革命家的集中的政黨的組織。宣傳工作及九十年代罷工的經驗

訓練幾十個先進工人去領導羣衆運動，與民粹派的鬥爭，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及以後與經濟主義者的鬥爭，思想上鍛練了列寧的擁護者。這是一個準備時期，以便以後能夠提出消滅思想上的崩裂及組織上的手工業方式的問題。

第三章 列寧的「火花報」

——經濟主義的粉碎以及對於社會革命黨

民粹派及恐怖主義的鬥爭——

經濟主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機會主義流派

從個別小組內的宣傳走向鼓動以及羣衆中的革命工作，這一轉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他首先提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目的及任務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以列寧爲首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如何提出了工人階級政治任務的問題。可是不容忘記，在那時稱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僅有那些貫徹到底並準備好在工人階級中進行革命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就是那些從失望於民粹派運動的許多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代表，也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上面我們敘述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中間有好些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辭句之下，隱藏着最真實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面目，以後甚至變成白黨。

在這些智識份子眼前，於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間，發生了羣衆的工人罷工。政府及資本家爲這罷工運動所嚇怕了。一八九七年政府頒佈了減少工作時間的法令。這是工人階級用有組織的階級鬥爭，用羣衆的罷工所爭取到的勝利。直到一八九九年末，經濟的罷工運動，沒有減弱過。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九年，四十五萬二千工人罷了工，差不多所有罷工的結果都是工人勝利。於是在工人運動的某些參加者中間（首先在智識份子中，並且還有階級覺悟較差的工人中）發生了這樣的思想，以爲工人階級不應從事政治鬥爭，以爲政治鬥爭使工人離開自己主要的急切的任務，妨礙經濟鬥爭的成功。這種觀點受到了社會民主黨中某一部分的贊助，他們以後就在社會民主黨中組織了機會主義的流派，即所謂經濟主義。經濟主義者（或經濟派）的觀點是這樣的，政治鬥爭由自由資產階級去幹，而工人階級則從事經濟鬥爭。這正是投合自由資產階級之所好。自由資產階級贊助了經濟派，因爲經濟派正是在工人階級裏面幹着資產階級的事情，並且將資產階級影響輸送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在這上面，熱中於經濟鬥爭的人們把純粹經濟性質的罷工轉成無產階級行動的經常規則，轉成無產階級鬥爭的差不多的唯一的手段，而忘記了經濟罷工的一時的成功僅僅是工業的好景氣所引起的現象。可是這還不祇是在工業的一時好景氣的時候之下經濟鬥爭的一時勝利所引起的簡單的迷惘，俄國的經濟主義是國際機會主義的自覺的表現。這種機會主義在第二國際的歐洲各國政黨裏有了廣大的傳播。他包括整個的思想體系。這些思想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民主黨適應於資本家的利益，而不是

爲着和資本主義澈底鬥爭的目的。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經濟主義，就是在於放棄革命鬥爭，放棄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放棄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在「老成派」（列寧及其他）離散之後，經濟派不僅佔取了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的領導，而且到一八九八年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聯合會」中佔了多數。克里且夫斯基、馬丁諾夫、阿基莫夫等人的小集團所發行的「工人事業報」，實際上就是那種經濟派的國外機關報。「工人事業派」亂用了一陣馬克思主義的辭句，可是在實質上正是同樣的經濟派。他們發明了工人運動「階級論」，就是說工人運動在開始時應當祇是經濟運動，以後祇有工人自己了解到必須提出政治要求的時候才能成爲政治運動；經濟派否認了革命的政策，而祇承認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這一理論，實際就是放棄政治鬥爭。「工人事業派」在建立組織的問題上擁護手工業的方法，在這點上他們是和公開的經濟派相符的；他們屈服於運動的自發性之下，以機會主義態度降低政黨的^{作用}；他們在「自由批評」的掩蓋之下偷運了伯因斯坦的觀點。這些觀點是整個的思想體系，他爲了逢迎資產階級，爲了資產階級利益，將馬克思主義僞造了惡化了。

在彼得堡，經濟派發行工人思想報（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二年），這報有幾期是在彼得堡印刷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國外印刷的，「工人思想派」比較國外的工人事業報更公開地發表了自己的機會主義觀點。

經濟派告訴工人，說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並不包含在工人政黨的任務之內，這種事情應當由革命民主派智識份子，學生等等來幹。經濟派實施了資產階級的政策，或是像列寧所講的，『經濟主義是將資產階級影響傳達於無產階級之中。』

經濟派反對建立集中組織的政黨。我們那時所有的缺陷——手工業方式，散漫，動搖，祇有個別小組而相互沒有連系的狀態——所有這些，在經濟派看來是優點，是定例。黨自然應當反對這種手工業方式，黨和這種現象進行了鬥爭。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與經濟派進行了鬥爭，告訴了工人，爲了革命運動的勝利，必須使這一運動受着黨的領導，黨應當將工人改善自己物質生活的經濟鬥爭和革命工作的一切其他方面連系起來。

經濟派主張『純粹』的工人聯合會，就是這些組織僅僅進行經濟的鬥爭。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英美的資產階級用力贊助這樣的工會主義的運動。如果有人以爲這是放棄政策，那是錯誤的，其實這正是特種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樣，在這一問題上，經濟派也是推着工人階級走向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道路。

經濟派堅持自發的沒有政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而且證明工人羣衆不願意在自己裏面有領袖。黨也以自己的方法『證明』這點：他們逮捕了工人階級的領袖。資產階級總是以一切方法來摧殘堅決爲工人階級謀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領袖。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問題（關於領袖的問題）上，經濟派

所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事業而是資產階級的事業。

最後，經濟派輕視理論的重要性，否認以科學地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性。這樣他們也就是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

列寧的信徒，希爾塞維克，在工人階級裏面的工作總是根據於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指示，就是工人運動要能够勝利祇有把三條戰線上（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的鬥爭綜合起來。例如，恩格斯在說明德國工人運動的力量時，還指出這一運動是根據在對於無產階級運動各種問題的巨大的理論研究之上。根據恩格斯的意見，這種研究的缺乏正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弱點。布爾維塞克高高地舉起了爲革命理論而鬥爭的旗幟。在與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事業上，列寧有着偉大的國際的功勳。

列寧的著作如怎樣做，一直到現在還幫助國際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機會主義理論及實際進行鬥爭。

經濟派不願意承認：工人階級的策略應當建立在一定的計劃之上。在工人事業報上提倡說工人階級不能有鬥爭的計劃，說工人階級應當「隨波逐流的」來行動。列寧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堅持那種根據於深思熟慮的鬥爭計劃之上的策略。

在一八九八年，以庫斯柯瓦及普羅柯波維赤爲首的一些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發佈了敘述經濟派觀點的一封信。這封信叫做我們的信仰。經濟派在這封信上所敘述的主要思想是說：進行獨立的政治

鬥爭不是工人階級的事情而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事情，而工人階級則祇要贊助自由資產階級就好了。我們的信仰的作者勸告俄國工人遵循『抵抗力量小的路綫』走去，不要向沙皇制度及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而應當從西歐的改良主義者學習，應當如何去迎合統治階級。

在自己的文件上，經濟派直接的聲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而應當參加社會上一切其他非工人階級的急進的或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活動。這樣，工人階級所能起的作用僅僅是附屬的作用，反對派的作用，此外再沒有別的了。

在蒲列哈諾夫於德導報上所發表的幾封信中之一，經濟派在裏面按照上述觀點敘述了自己的計劃道：對於工人祇能說到經濟剝削的限制，在近代工人裏面能够把他們統一起來的要求是很少的。大量的工人羣衆對於政治很少興趣，而祇追求於職業的目的。如果智識份子要在無產階級裏面順利地工作，那麼祇應當根據無產階級的急需求來確立自己的綱領。向工人講什麼資本主義，專制政體，政治等等，是不生產的費時的浪費。這些思想可以在小組裏來發揮，但決不要包括在鼓勵工作的綱領之中。合作社，互助會等，就是理想。

當經濟派的基本文件我們的信仰在一八九九年落到列寧手上的時候（那時候列寧被流放在西伯利亞鄂尼悉省密奴心斯基縣的許奧斯柯鄉），列寧就召集被流放在附近的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犯開會。他們集合了十七個同志提出了抗議書，尖銳地主張政治鬥爭，而反對經濟主義。這一抗議書是

由列寧起草的，他對於我們的黨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列寧及其友徒向經濟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根據列寧的話，經濟主義「在原則上是惡化馬克思主義，屈服於近代的「批評」（這是機會主義的最新形態）；在政治上，是企求把政治鼓勵及政治鬥爭縮小或變成瑣事，不懂得如果不將一般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那麼社會民主就不能夠推翻專制政體；在策略上是完全不堅定——在組織問題上，不懂得運動的羣衆性不僅沒有減弱我們建立堅強集中的革命者組織之責任，而且更形加重了。這種組織應當能夠領導準備的工作，能夠領導任何突然的發動，以至最後能夠引導堅決的進攻。」（列寧和經濟主義擁護者的談話）

事情正是在於，許多的經濟派自覺地努力使工人階級的注意力離開這樣的問題——如推翻專制政治的問題。他們是害怕恐懼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在有一封信中這樣的寫道：

『向工人宣傳推翻專制——這就是說要使他們遭受歷史上僅有的最大的危險。當他們還不自覺自身的利益，還沒有具備從實際中所煅煉出來的堅定性和組織性，那麼號召他們推翻專制將引起——兇鬥與流血——』

我們往後可以看到，經濟派的觀點往後在新的環境中爲孟塞維克所發揮了。我們已經提到，俄國經濟派的觀點是當時統治於第二國際一切政黨中的機會主義的一種形態。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最顯著的代表是：伯因斯坦，但維特，黑爾茨，福爾馮爾；在法國則是密勒倫。伯因斯坦成立了整個

機會主義伯因斯坦派的學派（好像現在的考茨基派）在許多著作中，伯因斯坦派發揮了整個機會主義的政綱，在一切理論及實際的問題上修正了馬克思的學說，自然在這上面，伯因斯坦及其在各國的信徒，從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上除去了這樣重大的要點：如『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崩潰』、『無產階級專政』。因此當然就不必要有什麼獨立工人政黨的存在，不必要有什麼革命的鬥爭方法——如總同盟罷工，更不用說暴動了。伯因斯坦派證明，爲着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不需要社會革命，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爭取社會主義勝利；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恐慌歸於消滅，資本主義的國家經過改良與改正的方法，可以逐漸發展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俄國，贊成這種理論的，一方面有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及經濟派，他方面有民粹派。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土地問題的革命學說也受到了伯因斯坦派的批評，這種批評的著作被民粹派熱烈地翻印了。沙皇政府對於這種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與傳播採取頗爲友善的態度。列寧指出，政府書報檢查者及憲兵也並不反對這種時髦（指伯因斯坦主義）道可以從下列的事實看到，就是有名的（卑劣得有名的）伯因斯坦的書有了三種俄國版本，而蘇巴托夫（警察廳一個官員）却介紹伯因斯坦和柏羅柯拍維奇的著作等等。多次地，在審問被捕者的時候，憲兵頌揚伯因斯坦的書介紹被捕者去讀這種書。

經濟派主要的是在那些剛從農村出來的新工人中有了暫時的成功。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中最落後的階層，他們還沒有想到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同時還應當指出，經濟派和熟練工人中比較有保

證的上層份子，特別是大的官辦工廠中的上層工人，也有了關係。純粹經濟鬥爭的暫時的勝利也幫助了經濟派的影響，可是這種影響是不穩固的，不深入的。

到九十年代末，已經感覺到產業中的危機與停滯困難的時候來到了，於是資本家尖厲地向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不得不轉入防禦的罷工。到這時候，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經濟派的鬥爭是加緊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裏面為首的正是列寧，列寧把反對經濟派的鬥爭轉成反對國際的及俄國的機會主義，爭取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之鬥爭。像列寧在後來所指出的，正是在反對經濟派的鬥爭中開始建立起布爾塞維克黨。對於那些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企圖並企圖着使馬克思主義適應資產階級利益的人們，列寧與布爾塞維克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是過經煅煉了。

蘇巴托夫派

和經濟派的問題密切錯綜着的是所謂蘇巴托夫派問題，亦即所謂警察社會主義者。沙皇政府要誘致工人離開革命的道路，所以就利用經濟派所造成與推廣的那種情緒。經濟派提倡：工人不應從事政治，工人的事情僅僅在於顧慮自己生活的改善。而憲兵及警察的奸細則也在工人中推廣這種情

精，說在保護經濟利益上面政府甚至準備來幫助工人。經濟派說，工人不應按照革命智識份子的指示來做事。這也正是憲兵之所好，憲兵逮捕了革命智識份子，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向工人說道：政府並不反對『純粹』的工人組織。

工人羣衆的愈益強大的革命運動，推動政府走向「警察社會主義」的道路。政府企圖以警察的組織來對抗革命者的組織，以警察的鼓勵來對抗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鼓勵。這種警察的鼓勵當然不是直接由警察來做的，而是經過那些狡猾地選擇出來的幫手來做的。這些幫手好些是出於工人自己的隊伍。他們對工人說，這樣的道路能使工人階級得到利益。

在傳播警察社會主義的事情上起着特別大的作用的，是警察廳的一個官員——蘇巴托夫，因此俄國的警察社會主義一直被稱為蘇巴托夫主義。蘇巴托夫創造了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者的整個「學派」。憲兵大佐諾維茨基（在南俄）及瓦西里夫（在西邊）是他們著名的幫手。蘇巴托夫以爲警察應當統治工人運動，使他走上完全與革命相反的方向。這上面他所最喜用的方式是好細工作。某些少有經驗的男女工人或智識份子一落到憲兵的手裏，憲兵就開始『改造』他們，對他們說，我們給與你們以一切公開進行工作的可能，祇要你們放棄發送工人的道路。個別的沒有經驗的「革命者」進入了他們的牢籠，有時甚至以爲把參加革命組織者的名字報告警察是自己的責任。於是在西方邊陲，憲兵大佐瓦西里夫得到諾爾雪維赤、且米里斯基及其他猶太工人運動工作者的幫助，建立起「猶太

獨立工黨」在莫斯科組織了「機器生產互助工人聯合會」。在這「聯合會」的會議上，許多大學教授（奧席洛夫頓）作了演講，甚至牧師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如牧師加本在奧台薩因警察廳包探愛也維赤之助建立了「五金工人聯合會」。

但是不久以後，政府就看到，警察社會主義有時可以引到政府自己不能統制的那種工人運動。一九〇三年夏在奧台薩爆發了罷工。個別的罷工，轉成了總罷工。奧台薩的總罷工，傳播到了其他的城市。奧台薩蘇巴托夫派所建立的工人聯合會，迫得參加這一帶着政治性質的罷工。憲兵於是不能不流放夏也維赤，因為他在工人羣衆的影響之下，迫得不能不走警察廳偵探處所指示的以外的道路。甚至蘇巴托夫因為企圖玩弄罷工（例如在莫斯科「古眼」工廠）不得不被撤消職務，可是在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還作了一個想要使工人運動走上警察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的企圖。我們所指的，就是「聖彼得堡工廠工人會議」。這組織是在牧師加本領導之下為警察廳的偵探家所組織的。

馬赫以斯基派

經濟派的另一個產物是馬赫以斯基主義（這理論的創造者死於一九二六年，最後一個時期在蘇聯職工會工作）。馬赫以斯基被認是「左」的。他的觀點，充滿着無政府主義。他的例子上我們可以

看到列寧所說的無政府主義有時表現出馬克思主義隊伍中機會主義的裂片的話是如何的正確。馬赫以斯基在西伯利亞被流放的時候受到了經濟派所傳揚的情緒的影響，於是造成了自己的學說。馬赫以斯基指出，工人的主要敵人不是資本主義剝削，不是資產階級，而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馬克思以及其他智識份子爲着『自己私人利益』而幻想出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是不應爲之而奮鬥的。馬赫以斯基主張，社會主義是對於工人新的奴役。據他的意見，社會主義智識份子反對專制政體，爲政治自由而鬥爭，這祇是因爲他們自己要想統治。我們知道，經濟派也宣傳說工人階級應當從社會主義智識份子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說政治鬥爭是有害於工人的。在這問題上，馬赫以斯基與經濟派如出一轍。馬赫以斯基告訴工人說：工人的利益在於增加自己的收入，增加自己的工資到智識份子及有產階級收入的水平，說工人不僅能夠將自己的工資與智識份子代表的工資相平衡，而且能夠加以超過。自然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蘇聯，熟練工人多做了工作超過了平常限度，那麼所得工資有時不僅比較教師、農學家、土地測量者等爲多，而且比較醫生和大學教授爲多，可是如果告訴工人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收入可以和有產階級的收入相平衡，這正是欺騙工人。美國、福特及其他資本家在世界經濟危機之前正是用這種話來籠絡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是永不能和有產階級（資本家及地主）平衡的。

馬赫以斯基主義沒有廣大的傳播。在革命低落年代，在少數地方有了些微的成功，可是在工人羣

衆進行積極工作的地方，這派是不曾得到什麼成功的。

就是這一主張的倡導者，在最後幾年，也深信自己觀點的錯誤，而在未死以前幾年參加了蘇聯職工會領導機關的工作。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火花報」

我們已經知道，在工業興盛期間（一九〇〇年以前）當罷工時常得到勝利結果之時，經濟派有了某些成功，他們散播了這種信念說，工人階級光是以一種經濟鬥爭的方法就夠達到巨大的成功。

革命鬥爭的主張者——社會民主派——在這幾年也並沒有失去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他們繼續着革命工作，但是缺乏一個有組織的政黨，使得革命者的活動呈現散漫狀態。例如：在彼得堡，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彼得堡委員會（他就是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以外，還存在着其他小集團，如「工人思想」「工人旗幟」「二十人團」「社會主義者」及其他等等集團。

在一八九九年末開始了產業的危機，失業普遍於大的工人區域，危機立刻反映於罷工運動的狀況。罷工往下低落。在那時候，一部份工人階級裏面，成熟着比較革命的情緒，雖然經濟派多方的阻礙工人鬥爭性的行動，可是工人還是多次的採取了這種行動。

到這時候，一九〇〇年初，列寧及其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的會員，從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回來了。列寧還在被流放的時候，已經向許多同志寫信並預先商酌，要在回來之後努力於組織統一的全俄的黨的中心。實際生活已經前進到了這樣遼遠的地步，使得重新恢復一八九八年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已經成爲沒有意義的事情，可是那時經濟派及猶太工人同盟派却企圖爭取這個中央。因爲這樣的政治中心，黨的中央委員會，在俄國大概在最短期內就要被破獲，被逮捕，所以列寧以及其他同志，就想到要在國外建立政治的中心，首先就要建立全俄的政治報紙，來開始團結黨。一九〇〇年秋，列寧就出到國外去和「勞動解放社」的同志進行協商。列寧的這一思想，在他被流放的時候，已經詳盡地考慮過了。在從流放地回來的時候，列寧沿途召集了多次的會議，在烏發、拍斯柯夫、莫斯科及彼得堡，到處都與同志們約好了秘密通訊的暗號，秘密的會見，寄送文件的地址等等，並且和他們商量了將來工作的計劃。在彼得堡當列寧袋裏已經有着出國的護照的時候，偵探逮捕了列寧，在列寧的袋裏找到了一張帳單，如果憲兵起了懷疑將這個帳單拿藥水來洗，那麼他們或許就能發現密寫的致蒲列哈諾夫的信，在這信上敘述了全俄的報紙的計劃。但是憲兵對於這張紙並沒有引起注意，他們把列寧拘禁了幾天後就讓他出到國外去了。

正在那時沙皇政府的偵探蘇巴托夫提議殺死列寧，因爲據蘇巴托夫意見，列寧是革命者中間最強有力的並且對於沙皇制度最危險的人物。他說『在革命中現在沒有一個人比烏良諾夫（即列寧）

更爲重大。」說「應該立即把這一個頭從革命身體上割下來」

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國外已經出現了火花報的第十一期，在報的名稱下還有這樣銘辭「從火花中輝耀着大旗。」這句話是從十二月黨對普希金（他寫給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以慰勉之詞）的答詞中摘下來。真的，列寧所燃起的火花以後輝耀着偉大革命大旗，這一火陷把舊的貴族地主的沙皇帝國及資產階級政權燒成了灰燼，這一火陷還延燒到其他國家，現在蔓延到全世界，在火花報的編輯部中，除列寧外，還有蒲列哈諾夫、阿克薩爾洛特、柴蘇里奇、馬爾托夫及波特列索夫。

在一般的分散的與動搖的環境之中，火花報向手工業式組織狀況，向一切的機會主義的表現而且主要的向經濟派進行了鬥爭。火花報*的主要任務在於「促進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及政治組織。」那時社會民主派的組織是渙散的，他們沒有總的工作計劃；應當製定最近的計劃及最近的任務。列寧在從作開始的文章內，說明了這些任務。

應當爲建立黨而鬥爭。因爲那時黨還沒有，祇有各個小組，手工業式組織狀態及渙散狀況。應當建立統一的，由一個中心來領導的，有一個共同綱領來聯系的政黨。火花報就擔負起這樣的任務，列寧往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二次大會以後，列寧就退出火花報的編輯部；於是經營火花報的，感觸得孟塞維克了。所以在黨史上區分了老火花報（頭五十二期）及新的孟塞維克的火花報。老火花報被稱爲列寧的火花報，因爲列寧是他的主持者，列寧領導了這個報，他在裏面進行了主要的工作。

後稱火花爲『方向上充分是布爾塞維克的』報紙

那時首先應當將各種不同的集團和小組統一起來，清楚地確切的說明，根據於什麼之上來進行統一，或是像列寧所說的，在統一之前先要區分清楚。火花特別尖銳地和經濟派進行了鬥爭，列寧寫了和經濟派擁護者談話的文章，以後更寫了怎樣做一書，在這些著作中將經濟主義打擊得體無完膚了。

火花報的代理人——李維諾夫、斯太索瓦、斯托般尼、古西夫、包伍曼、倫格尼克、克拉西柯夫、徐姆涼、取卡、梁陀夫等在全俄國根據列寧的指示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在各地揭破了經濟派與手工業式組織的狀態進行了鬥爭，而建立了新的黨的火花派的組織。這樣在一九〇二年十月在彼得堡組織了火花派的委員會，來與經濟派所掌握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委員會」相頡頏。火花報的代理人組織了「北方聯合會」。在這聯合會裏面，加入了伊凡諾伏——伏士尼心斯克、奧來霍伏——助也夫、許夷、柯斯特、羅馬、雅洛斯拉夫爾等會地的組織。在外高加索，那時組成了高加索的聯合委員會，這委員是從底底的火花派（斯達林、茨哈卡亞、謝茨霍維里等同志）組織起來的。

一九〇一年九月，在外高加索開始出版替夫里斯委員會的機關報鬥爭。在這報上斯達林同志向「彌撒大西派」大多數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鬥爭。這個報紙在第一期就聲明：格魯徐亞的社會民主運動不是特殊的，具有自己的綱領的，僅僅是格魯徐亞的工人運動。他和整個的俄國的運動攜

手前進，所以他是服從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由此可以明白的看到，格魯德亞的社會民主派報紙應當祇是一種地方的機關報，他主要的應當說明地方的問題，而且僅僅表現地方的運動。

『很明白的，對於社會民主派的有組織的運動，主要的武器是革命思想的廣大鼓動與宣傳。』

斯達林同志擁護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在這報上這樣的寫道：

『無產階級正是應當摧毀專制政體的那種堅強的力量。社會民主黨應當向專制政體宣佈決死的鬥爭；社會民主黨還依靠在專制主義所壓迫的其他社會成份之上，依靠他們直接間接的幫助之上，來實行進攻；於是俄國專制君主制度的堅牆就要被澈底粉碎了。』

由於「火花」代理人及地方委員會的活動，那時黨已經有力量來實現複雜的舉動。例如在遭受破變以後，李維諾夫、包伍曼及其他中央的代理人被捕入獄，可是黨却組織了非常英勇的實行得極其巧妙的十個「火花派」的脫逃。

那時頓尼茨、西伯利亞等地的聯合會以及莫斯科、薩拉夫、奧台薩、都拉及其他各地的委員會也進行工作。在南俄進行工作的是一個省的組織「南方工人會」。但是上述這些委員會，加入了火花報方面，還不是說他們已經完全承認火花報的原則。例如，北方聯合會不是立刻就放棄了手工業式的組織方法，加入西伯利亞聯合會的湯姆斯基城委員會還沒有斷絕對於經濟派的關係。

「南方工人會」在農民問題及組織問題上不同意於火花報的觀點。可是火花報的代理人以堅持的工作與經濟派區別開來，並且爭取了地方的組織。

這時候，一方面農民運動活躍起來，他方面經濟派的錯誤使比較革命的青年離開了自己。在這兩方面的影響之下，加強了某些民粹派的團體，使社會革命黨開始形成。社會革命黨進行了有害於羣衆運動的恐怖主義的宣傳，傳播了他們對於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義之不正確的觀點，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革命的先進階級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農民。列寧在火花報寫了許多文章，如革命的冒險主義、社會革命黨所復活庸俗社會主義及民粹派等等，在這些文章內揭發了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這一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起來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爲修正主義作辯護。社會革命黨還把馬克思主義擊破了的舊民粹派關於農村公社的理論復活了，而認爲俄國農村公社具有社會主義實質，其實這種公社祇是把農民束縛於他們可憐的分地之上罷了。

在工人羣衆政治鬥爭的環境之中，社會革命黨既無羣衆的擁護，又脫離了羣衆的革命運動，於是就認爲反對沙皇制度代表的個人恐怖，是最高的鬥爭形式。恐怖主義者妨礙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的鬥爭，排除建立羣衆組織的可能。社會革命黨的個人恐怖要使羣衆趨於消極，要使反對沙皇制度的羣衆暴動的準備成爲不可能。列寧揭破了社會革命黨的冒險主義，他這樣的寫道：「他們恐怖的趨向是

以最密切的原因和下列事實相聯系的，就是他們一開始就立在那裏而且繼續立在工人運動之外。」（列寧革命的冒險主義）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自由主義者，地方會議派，創辦了解放雜誌。自由主義者企圖將學生運動以及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運動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使這種運動走上他們自己的路線，而帶上自己主義的性質。列寧在火花報上揭發了自由主義者，寫了致地方會議派書等文章以及地方會議派之摧殘者與自由主義派之征服者。在這些著作內，列寧以絕頂確切的態度決定了工人階級對於自由資產階級運動的關係。

除火花報外，那時在國外還出版了曙光雜誌（編輯部是和火花一樣的。）我們已經知道，在處於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派聯合會」中大多數是經濟派。在一九〇一年，召集了四個組織的大會——「社會民主主義者社」（「勞動解放社」會員是加入在內的），「火花」——「曙光派」的國外組織，「俄國社會民主派聯合會」及「鬥爭派」（梁尚諾夫與斯昂克洛夫，他們對經濟派採取調和的態度。）可是在這一大會上，國外的各組織發生了分裂。在第四次會議上「火花」——「曙光派」及「社會民主主義者社」脫離了大會，而在「火花」的思想上的領導之下合併為「俄國社會民主派國外聯盟」他就成了黨的集體的組織者。這樣在國外就組成了堅固的中心，而在俄國，則火花報幫助了個別的組織進行統一，並製成一致的鬥爭路線。

《火花報》的主要功績之一是在於他製定了統一的黨的綱領。

遠在黨的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對於這一綱領的每一個別條文，已在《火花報》編輯部的內部發生長久的與熱烈的爭論。列寧在那時已經在好些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後來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立場的基礎——如關於專政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關於土地問題以及對於自由主義者的關係問題。《火花報》研究了並且規定了黨的綱領的，策略的及組織的原則。

最後，《火花報》的功績還在於他準備了俄國黨的二次大會的召集。一九〇二年四月，在比洛斯托克召集了代表會議，在這會議上，選舉了召集二次大會的組織委員會。可是在這時候發生了破壞，逮捕，所以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在波斯柯夫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會議，在這會議上再選舉了新的召集了二次大會的組織委員會。參加這一委員會的，有《火花報》代表（拉青柯）彼得堡委員會的代表（克拉斯努哈）「南方工人會」代表（列文），除此以外，還參加了猶太社會民主組織的代表以及其他幾個同志（克爾長壽諾夫斯基、倫格尼克、斯托般尼、克拉西柯夫、里潑升斯基）組織委員會，不管其中有幾個委員的被捕，終於準備了到一九〇三年夏召集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

這樣，《火花報》完成了他創辦所預期的主要任務。《火花報》是黨的集體組織者，《火花報》進行了鬥爭反對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曲解與歪曲。《火花報》幫助着把手工業組織狀態，動搖以及渙散的時期，縮短起來並消滅下去。

列寧的「怎樣做」一書的意義

在怎樣做的一書中，列寧不僅闡明了那時革命鬥爭與黨的組織的一切最重要之問題，而且還闡明往後十年的這些重要問題。就是在現在，其他國家的工人，還可以從這書上得到很多的學習；爲着發展階級鬥爭與獲取勝利，需要幹些什麼並且如何去幹。

在這書上，列寧首先提出應當如何建立黨的問題。列寧說明，黨應當集中地建立起來，就是說，黨應當處在一個中心的領導之下。那時這是特別的重要，因爲那時在社會民主派的各小集團中間，存在了割裂渙散及手工業式的組織狀態。

我們往後的經驗證明，對於一個戰鬥的黨，這樣的集中組織是無條件地必須的；經濟派相反的曲解了選舉制與民主制。布爾塞維克，總是以爲民主制與選舉制不是自在的目的，而祇是一種手段，在順利的條件下，我們自上而下，完全經過選舉，現在蘇聯就照此實行。可是在秘密工作與警察摧殘（特別對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條件之下，那時，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指派地方委員會的人員，或是加以批准。

那時放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去建立一個有戰鬥力的新形式的政黨，這一政黨能夠實行戰鬥的行動，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團聚數千百萬的農民於無產階級的周圍。我們那時並不追求黨員

的巨大的數量。列寧無數次的着重指出，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先進的部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一先鋒隊的力量，是比較他的數量要多十倍以至百倍。』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無產階級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去奪取政權。』列寧說明了，無產階級一有了組織，就『得到統一的意志，這種數千數萬數十萬以至百萬的先鋒隊的統一意志，變成了階級意志。』所以建立一個有着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集中的黨，形成一個革命無產階級的組織者，這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發展的整個進程，是有巨大的意義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這種意志與行動的統一，是根據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論之上。列寧正建立了這樣新形式的一種政黨，他就是為這樣的組織而鬥爭。

怎樣做一書提出了革命職業家的問題。在黨的二次大會上，這一個問題引起了孟塞維克及托洛斯基的特別尖厲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一個大學教授及中學生，不管如何的不願參加組織，可是只要給黨以某種援助，他就可以成為黨員了。

怎樣做一書又反對了第二國際政黨裏面所存在的這種『自由批評』這種『自由批評』事實上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就是黨的每一組織與每一黨員，都可以提倡任何的觀點，列寧關於這點，這樣的說道：

『啊，是的，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的喊，而且可以隨你們自由的意，自由的去，甚至走到爛坑裏面；我們還發現，你們真正的位置，正在泥坑裏面。可是我們準備好就我們力之所及，幫

助你們從那邊遷移出來。但是可要請你們放鬆我們的手，不要牽住我們，不要污辱偉大的「自由的」一字，因為我們也能够隨心之所願，「自由的」走，我們不僅可以自由的與泥坑鬥爭，而且可以自由地和轉向泥坑去的人們作鬥爭。」

列寧把我們黨的道路與被迫沿着險阻懸崖走的同志們的運動相比較。他說我們應當留意那些人，他們高喊批評自由，可是在事實上是企圖把我們從懸崖推下深谷與泥坑。

在這時候已經提出黨應當是怎樣一個組織的問題。黨裏面不是僅僅包括同一思想的人們，或在牠裏面還可以有任何的小組織，流派及集團。列寧在怎樣做一書中，這樣的提出問題：開始應當堅決地和經濟派以及其他派別區分開來，應當用自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反抗一切其他的觀點，向他們進行鬥爭，指明我們和他們所不同意的地方在那裏，以後再對他們說：如果你們願意根據我們的綱領，根據我們的觀點，統一起來的話，那末就請便；如果不願意的話，那末對你們就應當進行鬥爭。怎樣做以及火花報給了手工業式組織狀態的主張以最殘酷的打擊，使得以前不正確地以為「建立地方工作是主要的，而中央以及一般政治任務是次要的」那些組織及同志，也注意到一般政治的任務上來。

在怎樣做一書中，列寧指出：不應當屈服在工人運動的自發性之下，因為這種自發性，可以引導到職工主義。他指示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政黨的任務，是使工人運動帶上自覺性，以革命的理论武裝羣

衆，斯達林同志在黨的爭論的概述的祕密小冊子中，發揮了上述思想。這一小冊子，已經顯出極好的宣傳家的能手，在這小冊子裏面，這樣的說道：

『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人運動的話，這正像是沒有實用的指南針，生了鏽，不得不被拋入海中。

『什麼是這樣的工人運動呢？這好像是一隻沒有指南針的船，他最後到達輪埠，需要更多的時間遭遇更多的阻礙。』

可是把他們聯系起來的時候，那末這將是按着正確路綫向着對岸直駛前進的船隻，他將不管一切風暴，而到達輪埠。

在這樣做一書中，列寧要求一切黨員爲自身培養出那些爲革命者高貴稱號所必須有的革命本質。列寧認爲收工人到委員會中有着特別的意義。我們儘可以說怎樣做一書，曾經是，而且其基本部份現在還是黨的每個有組織者的嚮導，這樣說是不會過份的，在這書上，列寧提出以革命職業家爲基本組織力量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這個問題。

革命職業家是些什麼人

革命職業家，就是以革命爲其一生主要的、基本的事業。那些革命行動者，好像這些火花派，他們領導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與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澈底的鬥爭。

列寧在那時期，這樣的寫道：『讓我們有革命的組織吧——那時我們就把俄羅斯顛覆過來。』
列寧對於巴布式金及斯維爾特洛夫的評價，可以作爲革命職業家的評價的例子，以革命爲生命中之一切的革命職業家的最好模範，是列寧及斯達林。

寫道：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在關於巴布式金之死（巴乃火花報的第一個工人通訊員）的文章裏，列寧

『巴布式金作了沙皇警兵的殘酷屠殺的犧牲者，他死了，可是他知道，他爲之犧牲生命的事業是不會死亡的，其他幾千幾萬幾百萬人的手，將會幹這一事業，其他的同志工人將爲這一事業而犧牲，他們將繼續鬥爭直到勝利——』

『這樣的人民的英雄是有的。這些就是像巴布式金那樣的人。這就是那樣的人，他們不是一年兩年，而是整十年地在革命中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這就是那樣的人，他們在危機來到時，在革命蔓延時，在千百萬羣衆進入運動時，領導着反對沙皇專制的羣衆武裝鬥爭。一切從沙皇專制政體手裏所爭得的勝利，是完全由羣衆鬥爭爭得的，這些羣衆是由巴布式金那樣的人所倡導的呵。』（列寧：巴布式金）

在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紀念斯維爾特洛夫的會議上，列寧在其演說中這樣說道：

『如果我們一看這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生命之路，那麼我們立刻可以看到，他的出色的組織天才，是在長期鬥爭進程中煅煉出來的，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他的偉大革命者的每一出色的特長，是由於他經過各個時代，經歷革命者活動的各種最困難的條件，而自己煅煉出來的。在他最初的一個活動的時期，他還是青年，他一有了政治的自覺，便立即完全的投入了革命。在二十世紀初的時代，我們看到斯維爾特洛夫是怎樣一個最顯著的革命職業家的典型——他這個人，完全與家庭脫離關係，和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享福及習慣脫離關係。他完全地忠心地投身於革命，而在長時期中甚至在數十年中，從牢獄到流放，從流放到牢獄，這樣的自己煅煉出那種能在長時期內訓練革命者的特質。』

『如果有些人以為（我們的敵人以及動搖者，常時這樣想）這是完全為秘密工作所吞沒，說革命職業家的這種特徵，使他脫離羣衆。那末斯維爾特洛夫的革命活動的例子，正是告訴我們這種意見，是如何深刻的錯誤；相反的，正是這種對於革命事業的澈底的忠誠（我們經過許多牢獄及遼遠西伯利亞流放生活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是輝耀着這種忠誠）造成這樣的領袖，這樣的我們無產階級之花。如果這種忠誠，和選擇人材，佈置組織工作的才能聯繫起來，那麼他就能夠煅煉出巨大的組織者，經過秘密的小組，經過革命的祕密工作，經過秘密

的政黨（沒有一個人像斯維爾特洛夫這樣完全地領受了並且表現了這一政黨，祇有經過這種實踐的學校，祇有這樣，他才能達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人的位置。到達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組織者的第一人的位置。）（列寧紀念斯維爾特洛夫）

斯達林同志對於斯維爾特洛夫也作了同樣高的評價。斯達林同志說：

『有些無產階級的領袖，他們並沒有在報紙上被喧傳訟揚，因為他們不愛在報上顯名，可是他們實在是革命運動的生命綫及真正領導者。斯維爾特洛夫，就是屬於這樣的領袖之列。』

『從頭到腳透澈全力骨幹的組織家，天生的，熟練的，經過革命教育的，敏銳的組織家，以全部沸騰着的行動來從事工作的組織家。』

這就是斯維爾特洛夫的形象。

『在我們現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之下做一個領袖——組織家，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選擇助手，建立辦公機關，經過這個機關來發號施令就是了。在我們條件之下做一個領袖——組織家，這就是說首先要知道工作幹部，善於了解他們的長處及短處，善於接近幹部；第二要善於分配幹部，使得：

（一）每一幹部感覺到適於其位；

（二）每一幹部能夠按照他的特質，供獻革命，以他所能供獻的最高限度；

(三) 使得這樣的幹部的分配，結果不是使工作發生障礙，而是使整個工作得到和協，統
一以及一般的發展；

(四) 這樣組織起來的工作的一般方向，正是表示着和實現着我們分配幹部時所要實現的政治思想。

『斯維爾特洛夫正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的這樣的領袖——組織家。』(斯達林論斯維爾特洛夫)

這就是列寧、斯達林所寫的在長期黨的鬥爭中煅煉出來的革命職業家的典型。這些就是領導我們偉大政黨的人們；這就是在自己光榮職務上盡瘁而死的德仁斯基、庫比雪夫、被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匪黨所狠毒謀害的基洛夫，以及我們黨的許多光榮的領導者。

第一次革命前夜列寧對於國際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

我們看到，列寧如何地從開始政治活動起，就開展他對於俄國的以及國際的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末，經濟派企圖統制工人運動，列寧就指出經濟主義不是偶然的或『民族的』潮流，在西歐的工人運動裏面，機會主義也抬了頭。我們看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領導政

黨) 莫以伯因斯坦爲首的整批有名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如何地批評了和修正了馬克思的學說及其革命政策的基本內容。在一八九九年伯因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書內，修正主義獲得了自己的形成。在起來反對伯因斯坦之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有了長時間的動搖。遲延了好久才來批評伯因斯坦的考茨基，給了標本的中間主義的批評，並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放棄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陣地（關於革命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等等）。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盧森堡等）在黨內清除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沒有表現必須的堅決性。可是列寧却相反的立即以全部的無情的火力，向着修正主義展開鬥爭。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祇有他揭破了修正主義的社會的政治的實質，他立刻就充分地估計到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代理人修正主義者的危險。

在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時，列寧着重指出這種鬥爭的意義，指出機會主義（經濟主義）與國外修正主義之間密切的內在的，思想的及政治的聯系。列寧這樣提出了問題：經濟派，不是別的，正是俄國的伯因斯坦派。

伯因斯坦派在實際上是代表着什麼？這點已由那時法國社會主義者密勒蘭表示出來了。密勒蘭在一八九九年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而以殘酷屠殺罷工工人聞名於時。第二國際裏，並沒有嚴峻的斥責卑污的叛徒。有一些首領（樊迪文等）聲明贊助密勒蘭，有些考茨基式的中間派，採取了動搖的調和的態度（由考茨基提出，並由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巴黎大會通過的有名的「橡皮決議」）列寧

澈底地繼續自己的路線，對於密勒蘭採取了不可調和的態度，在這幾年，列寧指出了機會主義的國際意義以及和機會主義的堅決鬥爭的必要。

列寧在一九〇二年寫道：『在現在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中形成了兩種派別（革命派及機會主義——作者註）這兩派中間的鬥爭，有時燃燒起來，爆發成光耀火焰，有時靜寂下來，而在引人的「講和的決議」掩蓋之下腐爛着。（怎樣做）社會主義內部各派的鬥爭，第一次地從民族的鬥爭轉變為國際的鬥爭了。

『……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總長派（即密勒蘭派），德國的伯因斯坦派，俄國的批評派——所有這些，都是一丘之貉，他們互相頌揚，互相學習，共同武裝起來反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機會主義對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稱呼）同時，列寧指出了世界革命運動的基本前途：

『或許，在這個第一次反對機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名的）之真正國際鬥爭中，國際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是足夠的強大，使得他能夠結束早在歐洲統治着的政治的反動。（見怎樣做）』

經過粉碎機會主義的鬥爭，到達戰勝階級敵人的鬥爭——這就是列寧在俄國以及在國際上的總路線。在怎樣做的這一書上，列寧發揮了他的立場，指出了，不僅必須與機會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而且必須與那些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派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堅決反對那些人們，他們『一開始，就指

斥我們說我們形成特別的團體採取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採取調和的道路。」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的三個時期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列寧如何把二次大會以前的黨史，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四年；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第三個時期，列寧稱爲渙散零落與動搖的時期，一直繼續到黨的二次大會，這是和經濟派鬥爭，和正在產生的社會革命黨鬥爭，和企圖統治工人運動的自由主義「解放派」鬥爭的時期。列寧及其擁護者，在這時候完成了巨大的解釋一切鬥爭原則問題的工作。這時期，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面向機會主義者進行了鬥爭。同時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的爭論中（下章再詳述），蒲列哈諾夫、阿克薛爾洛特、馬爾托夫以及其他孟塞維克領袖的未來孟塞維克觀點的體系，也已顯示了輪廓。正是列寧派以最大的努力，來消滅這一渙散零落與動搖的時期，而在列寧的立場之上團結了俄國大多數社會民主派的組織。

在怎樣做一書之末，列寧說明他自己深信。

「第四個時期，將是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的鞏固。從危機中，俄國社會民主黨將成爲堅持有力的組織，而最革命階級的真正先鋒隊將是起來「代替」機會主義者的後梯隊。」

『在號召實現這種「代替」的意義上，在把上面所說的總結起來的時候，那末，我們對

「怎樣做」的問題，可以作出簡短的回答，就是：取消第三個時期。』（見怎樣做）

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應當完成這一『取消第三個時期』的任務。二次大會極大部份地解決了這一任務。兩個基本路線中間的鬥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主義者兩方面中間的鬥爭，在二次大會上變成了正在形成着的兩個政黨（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中間的鬥爭了。

第四章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成份及意義*

一九〇三年七月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先在不列塞，後在倫敦開了會。出席大會的共有四十三個代

*出席第二次大會之派別如下：

- 一、「火花報多數派」(「頑強派」——列寧派)共二十人有二十四票投票權。
- 二、「火花報少數派」(「溫和派」——馬爾托夫派)共七人，有九票投票權。
- 三、「南方工人同盟的」擁護者四人。
- 四、「工人事業」擁護者三人。
- 五、「猶太工人同盟」五個代表。

表，代表二十六個組織。值得指明的：在四十三個代表之中，總共只有四個工人。這證明當時工人還沒有能够在自己的隊伍中選拔出足夠數量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領導者來；可是這完全不是說我們黨在那時候是智識份子成份的黨；這種說法是機會主義者對我們的污蔑。

在黨史上第二次大會會有極端重要的意義，二次大會通過了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是蒲列哈諾夫草擬的。列寧對這個綱領提加了許多修改，這樣，便使這綱領成爲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綱領了。

大會通過了黨章，創立了中央機關：中央委員會，中央機關報，黨的最高會議（黨的蘇維埃）。大會決定了對於好幾個戰術問題的我們的態度：對於自由資產階級，對於社會革命黨，對於民族問題。從第二次大會起，社會民主黨內開始了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的區分。在第二次大會上，完成地形成了布爾塞維克的黨。在第二次大會上第一次表露了以後在我們黨史上稱之爲托洛茨基主義的那種孟塞維克的流派。就因爲這些，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地研究第二次大會。

大會的反布爾塞維克的部份開始（如在表決黨章第一條時）是多數（二十三人有二十七票投票權），以後在「工人事業派」之兩個代表，馬丁諾夫及阿豈莫夫及猶太工人同盟五個代表退會場之後，變成了少數。因之，火花派多數派成爲大會之多數（二十個代表，二十四票投票權）。

六、「中間」集團——動搖的，擁護了火花，報少數派的，共四人，有六票投票權。（上述各派代表姓名均從略——譯者）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綱領問題上的分歧

這在第二次大會之前，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列寧與蒲列哈諾夫之間，在黨綱問題上發生了鬥爭。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起草黨綱。列寧自一八九五年起即獨立地準備黨綱。當一九〇二年蒲列哈諾夫把黨綱草案送給列寧時，列寧不同意這個草案，而提出了自己的草案。蒲列哈諾夫以分裂來威脅，如果通過列寧的草案時。但是在列寧的批評的影響之下他改造了自己的第一個草案。在長久的討論之後，接受了列寧提出的許多重大的改變與修改，這纔才使這綱領成爲列寧派可以接受的綱領。

火花報編輯部內部在黨綱問題上的爭論在那裏呢？首先就是列寧要求黨綱要成爲黨的戰鬥的綱領，而蒲列哈諾夫所寫的「……這是更近於給學生的研究綱領（特別在說明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主要部份上）而且是初級學生的綱領，他裏邊祇講到一般的資本主義，而還沒有講到俄國資本主義。」（列寧對蒲列哈諾夫第二個綱領草案之意見）列寧要求具體地提出俄國資本主義的問題，一定的明確的結論。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向俄國資本主義宣戰。我們需要黨綱從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出發，明確地規定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俄國的無產階級是處於農奴制剩餘及資本主義的

雙重壓迫之下。

列寧說：『我們寫的不是反對批評者的論文，而是戰鬥的政黨底綱領。』要使不僥幾百萬無產階級，而且幾百萬手工業者及被地主和資本主義弄得破產的農民從這個綱領中得到『……必然的結論：你們唯一的救星——參加無產階級的政黨。』（列寧對蒲列哈諾夫第二個綱領草案之意見）

列寧對於最重要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出的修改，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列寧堅持加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因為在蒲列哈諾夫的草案中沒有這一條。列寧在自己的意見中寫着：『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是和共產主義宣言的論點最密切和不可分離地聯結在一起的；這點就是：祇有一個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見同上文）

列寧提議在黨綱中更明確地指明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蒲列哈諾夫提出的草案中沒有把無產階級的不滿和革命性的原因和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農民）的不滿和原因嚴格地分別開來。列寧認為這種區別是必要的，為着強調小資產階級的有條件的革命性及顯露無產階級的作用是領袖、領導者；無產階級站在革命鬥爭的先頭及領導着農民。

列寧是土地綱領的作者，他認為在革命運動增長的條件下必須提出土地國有的綱領。但是在當前的階段上，列寧認為必須提出歸還割地給農民。

割地就是在農奴『解放』時，地主從農民土地上割去的土地。這是農民土地中最好的一部份，收

場、草原、森林、接近河邊之土地等等。沒有這些土地，農民就無從經營，他們被迫地向以前的地主去租借。割地是農村中農奴制的最重大的殘餘，地主依靠他照舊的來控制農民的咽喉。

當提歸還割地給農民的要求時，列寧把他叫做祇是擴大革命的道路，吸收廣大的農民羣衆參加革命的道路。蒲列哈諾夫原則上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國有土地，認為土地國有祇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才允許。

提出土地問題時，暴露了列寧和火花報編輯部其他人員間之深刻的分歧。

這些分歧，是不久以後兩個策略之開端——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兩個策略。

祇是由於列寧的修改及他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的鬥爭，黨綱才成為布爾塞維克可能接受的。採用了這個綱領之後，布爾塞維克爲着他而奮鬥，堅持他的革命要求。孟塞維克不止一次地把黨綱看做「一束爛紙」，常常脫離他，破壞他以迎合自己的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

第二次大會通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

雖然在大會上整個火花報編輯部擁護了統一的黨綱草案，然而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仍表現了分

歧——特別在大會之後。這些分歧指明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對於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許多重要問題底不同立場。

通過的黨綱之主要諸點就在於：這個黨綱明白與清楚地說我們把社會革命當做自己的任務以及『這個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爲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使他能够鎮壓一切剝削者的抵抗。』

在這政綱中佔很大的地位的就是所謂最低限度政綱。就是在無產階級澈底戰勝資產階級之前，我們提出的各項要求。在最低限度的政綱中有立憲會議，普遍，平等，直接選舉權，祕密投票，及民主共和國的要求。但是就在當時我們亦認爲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個思想蒲列哈諾夫在大會上展開了，他當時還讀助列寧的。在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中，他說：

『革命勝利——最高的規律。如果爲着革命的勝利要求限制某一個民主原則之實施，那末，假如不採取這種限制，則將成爲罪惡。我個人認爲即使對於選舉權的原則亦應該從我上述的民主的基本原則來觀察。可以設想到，有時我們，社會民主社會起來反對選舉權。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曾經取消過屬於貴族的人們的選舉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可以限制上層階級的政治權利，正如上層階級曾經限制過他的政治權利一樣。

下面他又說：

『如果在人民革命熱情勃發時選舉了一個很好的國會……那麼我們力求其成爲長期的國會；然而如果這選舉是失敗的，那末我們就需要力求不是經過兩年後解散他，假如可能的話，要經過兩星期解散他。』（第二次大會記錄）

蒲列哈諾夫的演說，在大會不僅有人鼓掌，亦有人噓他，這證明當時社會民主黨內已經有把資產階級民主黨做自己的最高目的而不再前進。這類人在孟塞維克中當時就不少。值得注意的，在二次大會後，在海外同盟二次大會上馬爾托夫起來反對列寧，聯合了那些被蒲列哈諾夫侵犯民主的尊貴所惱怒了的人們。但我們亦知道，蒲列哈諾夫在以後亦背叛了他在二次大會上所擁護的東西。我們知道，當一九一八年之初，布爾塞維克解散立憲會議時，蒲列哈諾夫怎樣地氣憤，可是事實上布爾塞維克祇不過把他從前曾經口頭上宣傳過的東西，實際上實現起來而已。

機會主義者阿登莫夫在第二次大會上起來反對我們的黨綱的要求——無產階級專政。大會堅決地否決了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發言。托洛茨基在第二次大會反對阿登莫夫，可是他對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給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定義，照托洛茨基說來，祇有黨融解於工人階級中而工人階級佔國內大多數時，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際上，這種機會主義的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把他推到不可知的遙遠的將來，就會引導到拒絕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

引起大會上的左派（經濟主義者「中間派」）的攻擊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黨的土地綱領上關

於割地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在黨綱上提出了歸還割地的要求，就是歸還在農民解放時被地主割去並用以奴役農民的土地。

在二次大會會有這樣的代表，認為這個要求是過份革命的要求。經濟主義者馬丁諾夫是反對採用歸還割地的綱領的，發表了駭人的機會主義思想，以為社會民主黨不應該『改革歷史上的不公平。』『中間派』之馬霍夫說：如果農民參加革命時，那麼『這已經不是革命而是反動。』同時黨在這時候除了提出歸還割地的要求之外，還提出了取消贖金與年貢，取消一切限制農民支配（在資產階級制度下）自己土地的法律。『沒收教堂與教會的財產，以及封地，公地及沙皇皇室所有的土地，並對獲得附助贖金的地主貴族土地抽收特別的捐稅……』這些手段應該用來組成特別的土地基金，為着缺少土地的農村公社之用。

我們以後可看到：過二三年後這個政綱已經不夠的了。革命的潮流已經這樣的高漲，農民參加革命已經這樣的巨大，因此，黨第三次大會提出了更加堅決的與革命的綱領。但是在第二次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已經給了農民土地問題以明確的提法。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決定了爭取對農民羣衆的影響的正確路線，爭取他們參加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爭取這個運動擁護無產階級。在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看到農民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這個革命還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但是他可以成爲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一步。

當時在民族問題上亦發生了爭論。在黨綱上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的要求。波蘭出席代表加尼茨基和瓦爾斯基起來反對這個要求，他們擁護盧森堡的民族問題的觀點。他們說民族自決權的要求——這是資產階級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反對各國無產階級統一的。列寧與斯達林經常教訓我們說，我們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必須反對沙皇制度的壓迫及其他民族的暴動政策；而反對黨綱上這個要求就是我們的黨拋棄國際主義的觀點。當二次大會黨綱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波蘭社會民主派要求大會起來反對波蘭的自決。因為委員會沒有同意這點，他們退出大會，而「波蘭立陶宛王國黨」（當時他們的名稱）就沒有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是列寧，是布爾塞維克，以後我們爲着堅持這個民族問題的觀點，進行了鬥爭，從保證革命的勝利及一切民族的勞動者的擁護。這樣，在當時，一九〇三年時，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已經起來公開的反對盧森堡的錯誤。

「從一九〇三年起，當我們黨通過了黨綱之後，我們每一步都遇到波蘭黨人的絕望的反對……波蘭社會民主派脫離了這個大會（二次大會——著者註）以爲承認民族自決權對他們是不能接受的。……這些人想把我們的立場降落到民族侵略主義的立場上去。」（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以後我們將看到，布爾塞維克怎樣反對猶太工人同盟在民族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

第二次大會的黨綱，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這綱領十分確定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問題，規定了對農民的正確態度，在民族問題上給了正確的路線，這是前進了一大步。

黨章「關於怎樣才能成爲黨員的問題」之爭論

另一個重要的進步是黨章的通過。爭論最大的問題是誰能算做黨員的問題。本來，組織問題是二次大會的主要的環節，而組織問題上的爭論成爲黨的分裂之引線。列寧提出如下的黨章第一條：

『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及親自參加黨的組織之一者，均可成爲黨員。』

按照這一條，則只有真正加入組織，一切服從組織，承認黨的紀律爲義務的，將自己全部交給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的人才能成爲黨員。在組織之內，每個黨員可以得受戰鬥教育，鍛鍊，自己工作之檢查。在地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對於黨員的了解保證了黨的更加良好的成份。數量上要少些，但是因之質量要好些堅固些。在對黨的這樣關係下，入黨的人，就要全部交給黨，一切和黨在一起，準備好將自己的行動，服從黨的要求。這樣，黨內就可以少一些胆怯者，動搖的人，他們想參加革命，而又害怕加入黨的組織。

另外一部份代表——未來的孟塞維克——堅持馬爾托夫的如下的條文：

『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並在黨的某一組織領導下經常讀助黨人，均得成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黨員。』

可見，孟塞維克主張不必加入組織就可以成爲黨員。他們說，難道某一個教授或中學生一定要加入組織才能成爲黨員麼？難道雖不在組織之內而經常讀助黨還不够成爲黨員麼？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熱烈的爭論，一直繼續到二次大會後。這證明我們和孟塞維克之間，對於黨，對於黨應該成爲什麼樣的黨，什麼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的了解是如何的不同。布爾塞維克堅持自己的條文，爭取組織中浸潤着無產階級的紀律，爭取黨的集中的組織，因爲不然黨將成爲一盤散沙，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及老爺無政府主義者（列寧稱托洛茨基的名稱）可以隨心所願的附着在內。因之列寧寫道：『馬爾托夫的條文，或者將成爲死的字母，空的詞句，或者將主要地及全部的幫助「充滿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不願意加入組織。在口頭上，馬爾托夫的條文是讀助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利益。而實際上，這條文是替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他們仇視無產階級的紀律及組織）利益的服務。』（見列寧：進，一步，退，兩步）

大會之多數（二——三票）在這個問題上是讀成孟塞維克的。有人認爲我們在大會之上多數是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的，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在大會上讀助列寧的多數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報時形成的，當不同意大會決議的經濟主義者及猶太工人同盟派退出之後。雖然，在大會上的工

人是很少，可是如果深深的想一想關於誰能成爲黨員的問題的爭論的實質，那末，就可以看到列寧與布爾塞維克在當時就關心到鞏固我黨的工人骨幹。列寧指出，我們的組織的基礎應該是工廠工人，而孟塞維克首先關心不要把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推出黨去，這些人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甚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中走向我們來的。因此，在黨的第三次大會上，沒有孟塞維克參加的布爾塞維克的大會上，我們取消了二次大會通過的黨章第一條而決議不是同意讚助黨的組織的人，而是真正參加組織之一的人才成爲黨員。

『黨是有組織的整體的思想，在列寧的著名的黨章的第一條中已經確立了起來。在那裏把黨看做組織之總和，而黨員則是黨的組織之一的一員。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三年時，就反對黨章的這一條文，提議代之以一種黨的自動計算「系統」，這個「系統」就是把黨員的「稱呼」加之於每個「大學教授」，「中學生」，每個「同情者」與「罷工工人」，這些人多少讚助我黨，可是不加入或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不必說：這個新奇的「系統」，如果他在我們黨內取得了地位，那麼，必然要引導到黨內充滿了大學教授與中學生而使黨退化到散亂的，未形成的，無組織的「存在」。沈沒於「同情者」的大海時，消滅了黨和階級的界限，拋棄了提高無組織的羣衆到先鋒隊的地位的黨的任務。』（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

在有許多不同民族的國家內，工人階級的政黨應該如何建立？是否可以按照民族建立，在第二次

大會上「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要求給猶太工人同盟以猶太無產階級唯一代表者之權力。我們如果通過了這個決定，那末他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不論在那裏，祇要有猶太人，他們應該創立單獨的組織與有單獨的代表。這樣，比如莫斯科，此地至少有三四十種不同的民族，那我們就要有三四十個民族組織及領導這些組織的三四十個民族委員會，而在總的莫斯科委員會中亦同樣應該有這些民族組織的代表，使這個委員會變為好像聯邦委員會那類東西。難道這可以通用於應該代表階級利益（不啻當地工人屬於什麼民族）的組織的麼？我們向猶太工人同盟派說：那些猶太人佔大多數的羣衆的地方，那些他們是佔多數羣衆的地方，必須根據對猶太工人及手工業者的生活的特點之研究與智識，製定特別的宣傳鼓動的方法，出版猶太語言的書報等等。我們不能，不應該根據聯邦的原則來在他們中間建立黨（如「猶太工人同盟」所要求的），就是不應這樣來建立黨：使每個民族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特有的組織，而這些組織再來協商。

因此，我們否決了「猶太工人同盟」的要求，「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以抗議的方式退出了會議，申明脫離黨。

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的退出，關於他們的民族侵略主義的立場，列寧寫道：

「『猶太工人同盟』的邏輯的，歷史的，民族的理由都經不起批評的。瓦解的時期加強了俄國社會民主派中間的動搖和各個單獨組織之分立，這對猶太工人同盟亦一樣且更厲害

些。他們不去提出口號來反對這種歷史地形成的（而爲瓦解所加強的）分立性，反而把他當作一種原則，並爲着這個去讚助民族自主的內部矛盾的詭辯，讚助猶太民族的大猶太主義思想。」

這樣，布爾塞維克在民族問題上，這個對革命前途有巨大意義的問題上，一開始就需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猶太工人同盟的立場；及如上面所講過的，反對波蘭社會民主派的「左的」機會主義的立場。

戰略和戰術問題，第二次大會對自由主義者之態度

二次大會製定了戰術的任務——黨在最近時期內的行動的路線。

大會解決了些什麼問題呢，對於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似乎大家都同意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表現的思想。在這宣言上說：『共產主義者到處讚助反對現存的社會和政治關係底一切革命運動。』

二次大會時，存在着自由主義者的組織，他團集在斯脫魯維所編解放雜誌的周圍。在這個組織之中有著作家、律師、地方會議的活動家，地主亦不少，自由主義的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亦參加了這個組

織。他們的目的何在？自由主義的憲法——就是比當前更能容許他們接近政權的法律，甚至即使多少把沙皇的權力『限制』一些也好。他們願意和沙皇勾結，妥協，及有產階級的政權分享。他們自己的力量，不够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達到這點，需要革命力量（首先是工人與農民）的幫助。

孟塞維克對自由主義者要求些什麼呢？他們在斯達洛維爾（彼得來索夫）提出的決議中同意在如下的條件贊助自由主義者。這些條件是：第一，自由主義者『明白與不含糊』的申明，他在自己反對專制政府的鬥爭中堅決地站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方面；第二，他們在自己綱領的要求中，不應提出違反工人階級及一般的民主派的利益的要求，或者阻礙他們覺悟的要求；第三，他們應把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選舉權作為自己鬥爭的口號。

斯達洛維爾（彼得來索夫）沒有給自由主義者以階級的估計，他着重於與資產階級妥協而沒有揭破他的膽小的出賣的政策。布爾塞維克在對自由主義者的問題上採取了什麼態度呢？他們讚成蒲列哈諾夫的提議，蒲氏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同意彼得來索夫和馬爾托夫的（在黨章問題上亦一樣）。「火花報頑強派」——列寧派在大會上讚成下面的決議。這決議中說：我們的黨『……必須到處在無產階級面前揭破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限制性，及不充分性，祇要這種限制性與不充分性暴露出來的時候。』（二次大會記錄）「火花報頑強派」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現在就應該揭破俄國自由主義的（圖集在斯脫魯維的解放雜誌周圍的）妥協的、反對革命的天性。

布爾塞維克告訴「火花報溫和派」——「明天的孟塞維克說：資產階級可以允諾一切，他可以最『堅決地』申明：他將擁護工人階級最公正的要求，但是當着有利於他的時候，他就會叛變，正像他在一切革命中叛賣了工人階級一樣。」

這樣，當「火花報溫和派」即孟塞維克，以允許讚助自由主義者（祇要對方亦允許一些在階級鬥爭中一錢不值的慶祝式的諾言的話）來束縛自己的時候，「火花報頑強派」或如以後所謂「鐵石般的」的列寧派選擇了對自由主義者的革命路線。不拒絕讚助自由主義者澈底的反對派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布爾塞維克告訴工人階級對自由資產階級要永遠地小心謹慎，對他應該採用警覺的不信任。但是大會把兩個決議（斯達洛維爾及蒲列哈諾夫的）都通過了。在布爾塞維克的第三次大會上取消了決議中斯達洛維爾的一部份，就是包括在上述三條件下擁護自由主義者的一部份。

二次大會論社會革命黨

二次大會通過了對社會革命黨的態度底決議。社會革命黨，隨着學生和農民中革命運動的活躍，而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他們復活了民粹派最壞的錯誤：對於歷史發展過程的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農民的意義底不正確的估計；以及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完全錯誤的學說；按照這個學說，在社會

中存在着和活動着，一方面是英雄，另一方面——羣衆。英雄或者『有批評思想的人』創造歷史，而羣衆——不過是聽候差遣的工具。因此他們同樣亦復活了對於『英雄』的個人鬭爭的過份的期望，這種鬭爭的方法是對政府走狗之恐怖的手段。我們黨與社會革命黨進行了鬥爭，因為看到『民意黨』的失敗的經驗有重複的危險。同時，社會革命黨準備着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擁護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已感覺到社會革命黨是自己的親近的弟兄。照着一個政治活動家的定義說來，那末，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分別就在：社會革命黨說：『給我們以憲法，否則我們就要開槍。』而自由主義者說：『給我們以憲法，否則他們（指社會革命黨）就要開槍。』社會革命黨的企圖與目的並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設施，祇不過他們願意採取比自由主義者更堅決一些的工具。

社會革命黨當時以關於勞動人民之模糊的說教，反抹殺這個勞動人民之中有階級及階級鬥爭的存在，獲得了在農民中一些影響。在工人中社會革命黨沒有多大影響，但是還多少有一點，有一些工人——特別是與農村有聯系的工人還相信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的宣傳，就是宣傳恐怖主義者個人英雄地反對專制政治，給了農民特別是學生青年之一部份以虛幻的希望，以為這些英雄能够保護人民及從沙皇的殘暴下拯救他們。

列寧派認為社會革命黨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阻礙着社會民主黨團結工人為獨立的政黨。因此，二次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社會革命黨的決議，把社會革命黨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一支派，而社會

民主黨對他的原則的態度，正和對待一般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一樣。跟不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不同，社會革命黨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一支派而同時反映着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民主主義的利益。然而，社會革命黨欺騙地以社會主義的旗幟出現，所以迫使大會認為：「他們的活動是有害的，不但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發展上，而且對於反對專制主義的總的民主鬥爭亦是一樣。」

因為在個別的（是的，少數的）組織（如烏拉爾）中曾經有把「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社會革命黨聯合底企圖。大會堅決地斥責「……一切把「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聯合底企圖，大會認為與社會革命黨祇有在反沙皇制度鬥爭中，在各別的情況下作部份的協定的可能，而且這種協定應受中央委員會之監督。」（二次大會記錄）

以後多年的事變證明，我們的估計之正確性。社會革命黨還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走到工人階級敵人的隊伍中去了；而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就和白黨（高查克、佛冷蓋爾、田尼金）肩並肩地一起反工農政府。自然，這不是說，在社會革命黨裏沒有忠實於勞動者利益的人們；亦不是說，當他們是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時，在任何階級都沒有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但是，整個地說來，社會革命黨在革命中起了障礙的作用，企圖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的範圍中，孟塞維克的作用亦是一樣。這對於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前就很清楚的了。

中央機關之選舉，組織上的分裂

在蘇聯目前，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是兩次大會之間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此外，大會選舉檢查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並提出蘇維埃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黨大會提出，而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批准。）黨中央委員會自己選舉（指定）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編輯部。

而在當時，黨的中央機關之構造是另一樣的。二次大會不僅選舉中央委員會，而且選舉中央機關報。火花報的編輯部。不應忘記，在二次大會之前，火花報同時是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報。火花報不僅是黨報，主要的中央黨報，——火花報編輯部在二次大會之前，還擔負了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爲着解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之間的可能發生的爭論，因而創立了黨的最高會議（黨蘇維埃）；由中央委員會二個代表中央機關報二個代表，及由大會直接選舉出來之一人組織之黨最高會議主席，大會選舉了蒲列哈諾夫。黨中央機關之所以有如此龐大之結構，主要的是因爲在沙皇統治的條件下，在俄國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很容易遭受破獲，而在這時候，中央機關報可以繼續實際上來領導黨。

當在二次大會上暴露了在許多問題上（黨綱對自由主義者的態度，黨章等問題上）的所有動搖之後，在由於猶太工人同盟和經濟主義者退出之後而組成的大會之多數的面前，提出了如何鞏固爲列寧及布爾塞維克所表顯的這一派的影響底問題。因此列寧關心着如何保證（至少在初期）領導在火花報——中央機關報手中。蒲列哈諾夫在二次會上，在許多問題上（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及黨章問題）是讚助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的，根據列寧的提議，火花報的編輯選舉三個人：列寧、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而中央委員會三人都是布爾塞維克：李格尼克、克爾壽長諾夫斯基、諾斯可夫。馬爾托夫提議：以前火花報編輯之六人（蒲列哈諾夫、列寧、亞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彼得來索夫、柴蘇里奇）均應重新當選。當大會之多數否決了這個提議而選舉了列寧提議的三人團之後，馬爾托夫聲明，他不加入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在這個問題上大會分裂了，形成「多數派」（布爾塞維克）和「少數派」（孟塞維克）；但實際上如果把分歧點綜合來看，那麼引起分裂的問題是創立怎樣的黨。列寧、布爾塞維克主張需要創立戰鬥的集中的政黨，以便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引導他們走向戰勝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而馬爾托夫、孟塞維克所主張創立的黨，是把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包括在自己隊伍內，而就不能成爲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現在出版了孟塞維克領袖們——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彼得來索夫等的很大的書信集。從這些信件中看到，孟塞維克來參加大會時，已經預見了黨分裂爲兩部分的必然性，因此他們便不惜使用

任何手段，但是這不妨害他們污蔑布爾塞維克爲分裂者。尤其托洛茨基，他污蔑列寧爲『小組黨事業的巨匠』及『我黨反動的一翼的領袖』。

以後中央委員會的成份變更了，在中央委員會中補充了（即不經過選舉而吸收進去了）列寧、克拉辛、加爾比令、齊姆略加、羅靜彼格、顧沙格夫、杜勃羅文斯基、加爾澄夫、羅皮莫夫。

二次大會之總結

二次大會在革命運動日益生長的环境下舉行的，當時工人階級日益成爲行將來到的革命中的活動的力量。二次大會開會時，革命的農民已經進入了政治鬥爭的舞台，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了革命的高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爭取對無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已經充分的顯露了，而孟塞維克在這時候想在兩者之間佔一個中間的妥協的立場。

二次大會定下了布爾塞維克黨，新形式的黨的存的開始。列寧寫道：『以前，我們的黨形式上不會是一個組織的整體，而祇是各個集團之總和，因此，除了思想的影響外，不能有別的關係。現在，我們成了有組織的黨』（進一步退兩步）。從這時起布爾塞維克黨即以自己的名義出現。在黨的以後的生活中，曾經有這樣的時機，就是黨曾企圖過和追隨孟塞維克的工人們建立統一戰線。而且爲着這個目的，

曾經有過和他們（孟塞維克）建立暫時的形式的統一。但是第二次大會起，馬克思革命派就領有了獨立政黨——布爾塞維克——的意義。布爾塞維克堅持着一定的自己的組織路線，布爾塞維克製定了自己的戰術，起初在二次大會上，後來三次大會又確切地規定了他。二次大會給了黨的政綱、章程，及對最重要問題的革命戰術之決議，爭取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這是到無產階級專政去的過渡階梯——布爾塞維克在生活中體現了起來。在一九〇三年，在二次大會上黨經過了第一次的整個思想寶庫之檢閱，產生了工人組織中基本派系之分化：布爾塞維克主義——一方面，孟塞維克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孟塞維克主義之一種變形）——另一方面，許多人在當時以為在大會前及大會上之爭論是非常重大的本質的爭論。在發展着的革命事變之前，許多人以為這些爭論是容易消逝的，因他們不是深刻的爭論。但是以後的革命史及黨史證明，在《火花》報編輯部內部開始的爭論，反映於以後的黨內爭論中；而在二次大會上達到了二個黨的形成。二次大會上之分裂有着巨大的國際意義；第二國際的領袖起來擁護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立場；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反對俄國的及國際的機會主義以擁護黨及黨的立場。

非常重要的，應該指出：以後當共產國際創立時，黨的結構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原則，全部地包括到所謂加入共產國際的廿一條件之中去了。在共產國際章程第三條上如下的規定了什麼是黨員：「凡承認某一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之綱領章程，參加黨的基本的下層組織及積極在其中工作，服從黨

及共產國際之一切決定及交納黨費者，均得成爲黨員。」如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章程上所提出的對黨員的要求相比較時，則可以堅信在這個問題上布爾塞維克繼續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與恩格斯之事業與傳統。

明白了二次大會上在本綱領及戰術問題周圍之鬥爭（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關於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就可以解釋以後黨內發生的許多問題。二次大會總結了列寧在怎樣做一書中所說的社會民主運動發展的最初的三個時期。

因此，誰想澈底地認識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就需要詳細的研究第二次大會。

我們已經看到：火花報在二次大會以前完成了最重大的歷史任務。他是黨的集體的組織者；他幫助消滅「瓦解和動搖」的時期，幫助了黨的創立；他製定綱領；他研究了工人政黨組織與戰術底最重要的問題；他明確地形成了黨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改良主義派之間的爭論。黨二次大會之任務是在「依據火花報所製定的原則底和組織的根基來創立真正的黨。」

火花報在與經濟主義者鬥爭中，在俄國內部團結了黨的委員會與集團之大多數。與火花報有聯系的各種組織的統一，鞏固了火花報之思想上的作用。

二次大會發生的分化與社會主義的分裂——這是在創立黨的事業上的決定的步驟。市儈式的機會主義，庸夫俗子式的運動的參加者，悲嘆着這個分裂。列寧對於這個分裂寫道：「布爾塞維克派與

孟塞維克派之區分，是社會民主派的革命的和機會的區分；山嶽派與基朗特派的區分，是直接的與必然的繼續；這不是昨天才暴露於僅僅俄國的工人政黨內，而且也許不是明天就會消逝的。『我們的大會是怎樣好啊……公開和自由的鬥爭。意見說出來了。派系分明了。手舉了。決議採取了。階段走過了。前進吧！』（列寧進一步退兩步）

新形式的黨，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工人階級爭鬥率領他們攻擊舊的制度為自己任務的政黨在二次大會上形成了。

市儈式的庸夫俗子式的運動的參加者攻擊列寧之『不忍耐性』。試看列寧與當時那樣偉大人物如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彼得來索夫破裂了。以後機會主義者同樣攻擊中央特別是斯達林同志，亦因為他們以同樣的列寧的『不忍耐性』對待機會主義。因為以列寧不調和性去對待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等，這些人以後墮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如果没有與機會主義者的這種尖銳的區分，分裂，破裂，那就沒有列寧的黨。斯達林同志在十五次黨大會的結論中提出了這個破裂的重要性。斯達林同志說：

『試以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時期來說。這是黨從和自由主義者妥協轉變到和自由資產階級作決死鬥爭的時期，從準備和沙皇制度鬥爭轉變到公開地和他鬥爭，以便完全撲滅沙皇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時期。當時，在黨的首領地位有六個人：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列寧、馬

爾托夫、亞克蘭雪洛特、彼得來索夫。轉變決定了這六個人之五的運命，他們從上滾下去，祇剩一個站穩着。……現在每個布爾塞維克都明白，如果列寧不與五個人作堅決的鬥爭，如果不排除五個人，那末我們的黨就不能夠團結成爲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黨。』（十五次大會記錄）

俄國社會民主黨二次大會後（一九〇三——〇四年）

黨內生活之簡述

這裏必須提到二次大會後的時期中社會民主黨生活的最重要的事實。這個時期在布爾塞維克歷史上有極重要的意義。黨及其中央的生活，在這時期在國外是在很困難的條件下，緊張的小組織鬥爭（與個人糾紛混和着的）中渡過的。那這些條件下，列寧所採取的堅持自己的思想，爭取黨的統一及爭取黨的羣衆之方法與戰術，極明顯表現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基點。

二次大會之後，孟塞維克立即開始反對大會決議的鬥爭，組織了小組織中心「孟塞維克委員會」（其成份爲：亞克蘭雪洛特、坦（Г. Д. Д.）·彼得來索夫和托洛茨基）在日內瓦召集了二次大會上十七個孟塞維克派擁護者的三天會議（一九〇三年九月）。這些步驟之意義祇有一個：排拒及取消列寧的影響，不惜破壞大會上創立的黨的工作。孟塞維克之蠻橫直至這樣的程度：當蒲列哈諾夫與坦

談判時，引用大會的決議，這時坦說祇有笨伯才服從他，聰明人不能不加以諷笑。第二次大會後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外同盟」改變了國外組織的狀況。這一同盟對於黨中央及二次大會的決議採取了反對派的孟塞維克的立場，他們非難列寧關於組織問題的立場，同時以孟塞維克估計通過了關於黨二次大會活動的決議。蒲列哈諾夫在「國外同盟」的會議以後，不惜一切的要求對於孟塞維克派進行妥協和讓步。以後，他向中央提出補充人員的要求，就是在火花報的編輯部裏引進舊的編輯員，在中央委員會補充四個孟塞維克，在最高委員會裏要求兩個位置。列寧不同意蒲列哈諾夫的提議，退出了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以備在黨的中央委員會裏鞏固自己陣地，來打擊機會主義者。在列寧退出火花報編輯部之後，蒲列哈諾夫，根據着他的形式上的權利，補充了四個孟塞維克到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來。雖然這些孟塞維克並沒有被黨的大會所選舉。蒲列哈諾夫，在第二次大會上雖然和布爾塞維克一起，但在以後，就回到孟塞維克方面去了。現在蒲列哈諾夫就從共同的孟塞維克的立場上來攻擊列寧和黨的二次大會的決議。這樣以後，列寧就最後的確定了召集三次大會的計劃。他在中央委員會內，進行了要求召集三次大會的鬥爭，並且企圖使黨的最高委員會主席蒲列哈諾夫贊成自己的要求，可是這一企圖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召集了黨的最高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列寧關於必須消滅小組戰鬥爭，關於不容許抵制中央機關，關於必須負責服從黨大會的決議，關於黨紀律等等的決議，都被蒲列哈諾夫、馬爾托夫、亞克爾雪洛特等孟塞維克所推翻了，他們通過了關於在中央委員會內

必須有孟塞維克代表的決議，列寧和李格尼克那時就聲明最高委員會的這種反黨政策的有害，提出必須召集三次大會；但是在這個時候，中央委員會的幾個委員對於機會主義者孟塞維克採取了調和的立場，而補充三個孟塞維克到中央委員會來。列寧就對中央委員會內的這調和派（諾斯可夫、克拉克、辛克爾壽長諾夫斯基）進行了鬥爭，揭破了他們在黨內為機會主義代理人的作用。

一九〇四年二月，斯達林同志從流放地點脫逃回來之後，就領導外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向孟塞維克和調和派進行了鬥爭。

列寧在他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有名的進退兩步的一書內寫道：一切孟塞維克的共同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否認組織問題的重要性。亞克爾雪洛特說過，他不懂得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態度是什麼東西，列寧回答他道：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態度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於他們不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戰鬥的組織；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否認布爾塞維克把黨看做戰鬥力量的這種觀點；第三個顯著的特點，是放棄老火花報及集中制的政策。亞克爾雪洛特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還沒有存在，所存在的祇是革命智識份子中在原則上贊成無產階級的人們罷了；資產階級革命是必須有的，這一革命應當由城市資產階級來幹，無產階級應幫助資產階級；只有這樣之後，才能展開真正的（就是廣大的，合法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前途；整個無產階級，應當被吸收到這種鬥爭之中。在這點上，孟塞維克不過是在新的條件下重複已被老火花報所揭破的經濟派的觀點罷了。

蒲列哈諾夫之轉向孟塞維克，自然不是偶然的。我們已經看到，當火花報編輯部內部關於黨綱發生爭論時，甚至在更早的時候，蒲列哈諾夫就已經發揮了並且擁護了許多完全與孟塞維克主義相合的觀點，蒲列哈諾夫反對土地國有，不懂得農民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他是在列寧的強大壓力之下才同意在黨綱上加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但是蒲列哈諾夫之所以轉到（更正確的說是回到）孟塞維克，下面這一種情形，也在事實上起了一些影響，就是：他和俄國革命鬥爭實際情況是脫離的。蒲列哈諾夫聲明，他認為第二次大會所發生的爭論，是不鄭重的，幼稚的；他認為組織問題沒有什麼重要，他很可同情布爾塞維克；他為着黨的合一『不惜一切的』完全轉到或者陷於孟塞維克的泥坑中去了。放棄為無產階級集中的政黨而鬥爭，在事實上就是放棄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而鬥爭，也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蒲列哈諾夫在實際上以他自己名字的權威和意義，幫助了孟塞維克，但是像孟塞維克巴爾烏斯所講的：『機會主義的不固定性，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還增進了機會主義表現的多面性。』不管各機會主義派別的本身意見是如何複雜，但是新火花報*即是說孟塞維克的活動，歸根到底是在於消滅黨的革命作用，減弱武裝暴動以及準備武裝暴動的重要性。孟塞維克除理論的破壞工作以外，還平行地進行實際的黨的破壞工作。孟塞維克從一九〇三年中段開始，就向一切省的

*從列寧退出火花報編輯部時，蒲列哈諾夫補充了四個孟塞維克到編輯部以後，就是在第五十三

期以後，火花報變成孟塞維克的了（常報、新火花報）。

委員會舉行進攻黨的最高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定要建立中央機關報特派員的組織。大批的孟塞維克於是就得到了出版物和金錢，他們利用了火花報的威信，不經過黨的中央而採取暗地裏拉攏的辦法，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工作來奪取各省的委員會。在莫斯科組織了隱掩的孟塞維克的中心，在彼得堡破壞了布爾塞維克所組織的示威遊行，在敖得薩及葉克特林諾斯拉夫就簡直奪取了委員會。

這樣，在二次大會之後，實際上就有了兩個黨：各有自己領導的中央，各有自己地方黨的委員會，各有自己中央機關報。

第二次大會上及二次大會後的托洛茨基主義

在九十年代末，托洛茨基在尼哥拉葉夫城參加了小組的組織，這小組後來和「南俄工人會」的組織合併了。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依爾庫茲省，從那裏他逃到國外，並參加了火花報。有一個時候，反火花派的人會稱他爲「列寧的棍棒」，但是後來很快的就發現托洛茨基的觀點與其信念，是從頭到底孟塞維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這一點在二次大會上已經發現了。如果把參加二次大會的黨員分成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的話，那末托洛茨基那時已經是孟塞維克了。二次大會後托洛茨基繼續站在孟塞維克立場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茨基也是孟塞維克；托洛茨基發揮了以前巴

爾烏斯和盧森堡所提出來的反革命的理論，即所謂『不斷革命論』（關於這點以後再詳細的說）於革命低落的幾年，在所謂取消派的時期（關於這點以後再說），以至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托洛茨基都是中間主義者。就是在托洛茨基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七）以後，托洛茨基的小資產階級的實質，還是不斷的表現出來，不過採取不同的花樣罷了：如在一九一八年，布萊斯特談判的時候；在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關於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期；在一九二三年關於黨的民主問題爭論的時候；在一九二四年關於『十月的教訓』的第二次爭論的時候；以及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以後托洛茨基轉到反革命立場上去，被黨所開除（一九二七年末），並被驅逐於蘇聯之外。托洛茨基主義現在是在世界反革命資產階級先鋒隊之中，是在世界法西斯主義前鋒隊之中。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是卑鄙惡毒的反革命派，白黨的恐怖主義者，法西斯蒂特務機關之走卒。托洛茨基在二次大會上表現如何呢。

一、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出來擁護孟塞維克關於黨章的第一條的條文，托洛茨基特別堅持的說，列寧，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條文，排擠單獨的智識份子，這些智識分子『站在黨綱的立場之上，而在黨的組織領導之下，單獨的為黨效勞。』托洛茨基以為列寧所提的條文，可以把智識份子從黨嚇退出去。相反的，列寧證明，應當在黨內保證無產階級更大的作用。

二、托洛茨基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綱所規定的那樣的黨，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托洛茨基認為這一專

政是凌駕無產階級的專政。像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那時已經提出一種意見，認為只有當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差不多互相同一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其實，黨和工人階級完全混合的狀況，只有在共產主義下面才能實現；可是，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卻是在過渡時期；在這一過渡時期，應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之下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情形為托洛茨基的公式所否認了的。托洛茨基說，只有在黨和工人階級混合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這樣，托洛茨基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不難看到，在這些觀點裏，已經具備着托洛茨基以後反革命理論的萌芽，這一理論否認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三，托洛茨基反對了集中組織的黨。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關於這樣黨的思想，托洛茨基等在那時稱為『可驚的貧乏的思想』。

托洛茨基反對黨的鐵的紀律，提倡「貴族的無政府主義。」

托洛茨基把這些孟塞維克的觀點發揮在我們的政治任務這小冊子中。這一小冊子，他是貢獻給他的『親愛的先生亞克蘭雪洛特』的。這是托洛茨基在第一次革命前夜所發表的真正孟塞維克的宣言，那時這一學生離開他的『親愛的先生』還不久。

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國際意義

自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派發生以來，列寧對於機會主義和調和派的鬥爭，就得到了更大的國際意義。

和機會主義者中間主義者實行分裂的路線，已在怎樣做一書內，在原則上規定了。這一路線，那時已產生了第一次的實際的結果，這一路線是和第二國際的傳統及策略堅決的衝突的。第二國際時代社會主義黨的典型是『容納機會主義於自己隊伍中的政黨』（見列寧怎樣做）而第二國際著名領袖的路線，是磨滅爭論，放任各種理論及派別『和平共居』的那種不變的路線。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組織的建立，就是說產生了一種全新式的政黨：一種真正革命的戰鬥的政黨，一種澈底的馬克思主義的，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一致的，消除了機會主義者及中間主義者的政黨。這一事實的巨大國際意義，很快就表現出來了：第二國際的領導，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問題上，一致站在孟塞維克方面；在國際舞台上，布爾塞維克就處在孤獨的地位，遇到了敵視，不信任及不了解；第二國際政黨的報紙及雜誌，發表了以孟塞維克的觀點來說明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情形的文章；考茨基所編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報新時代，拒絕登載布爾塞維克（列寧、路維夫等）的文章，考茨基直接出來

反對布爾塞維克。考茨基完全沒有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是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堅決分裂的開始，是兩個不同思想和兩種政策的衝突；考茨基以為這一分裂，僅僅是關於組織問題的次要的分歧；在考茨基看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的原因是在於個人的鬧意氣，只在於布爾塞維克首先是列寧的「宗派主義的」不調和性；考茨基贊成馬爾托夫關於黨章第一條的條文，並且提出抗議來反對二次大會不把亞克爾雪洛特、柴蘇里奇及斯達洛維爾吸收到火花報編輯部來的決定。

那時左派（巴爾烏斯、盧森堡等）也在考茨基之後出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盧森堡在新時代及孟塞維克火花報上發表了很長的文章，在這文章裏她替孟塞維克的組織原則作了更加發揮的根據，和托洛茨基及亞克爾雪洛特完全一致的，她也攻擊布爾塞維克，指責布爾塞維克是超集中主義，說布爾塞維克好像企圖不用無產階級方法，而用甲可賓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方法及布郎基信徒陰謀的革命者的方法來建立黨。

那時，工人羣衆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領袖培爾，也在調和的掩蓋之下，提出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意見；他提議組織第三者法庭來解決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爭論。列寧知道第二國際裏的這種法庭，將是幫助孟塞維克的，所以列寧及布爾塞維克嚴厲的拒絕了這種第三者的法庭，並且指出只有黨的代表大會才有權力解決這一爭論。列寧對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及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給了嚴厲的反駁。一九〇四年在荷蘭亞姆斯特坦城召集了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布爾塞維克黨得到

了獨立派遣代表（略獨夫及克拉克西可夫二同志）出席大會的允許，發表了並且傳播了列寧所編審過的報告。在這報告中以布爾塞維克的觀點估計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整個過去的革命工作以及二次大會上分裂的實質。這樣，早在一九〇四年，在第二國際的世界大會上，布爾塞維克不僅和俄國的機會主義而且和國際的機會主義對立起來了。

二次大會後，布爾塞維克爲着新形式政黨而進行的整個鬥爭，明白的指示出二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是在國際工人運動中與機會主義分裂的路線。

第五章 布爾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一九〇

七年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第一次革命前夜的情況，羣衆的革命運動

爲着了解俄國工人階級如何進到一九〇五年的武裝暴動，我們就不得不敘述這一第一次革命前夜的主要政治事變。

二十世紀初的工業危機，使得原來已是非常惡劣的工人階級困苦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了。罷工更多地帶上明顯的政治的色彩。多次地同情的罷工，包括了整個的區域。工人不能不起來反對資本的進攻，反對自己生活條件的惡化。必須實行政治鬥爭的這種自覺，更多地浸潤到工人階級的中間。

學生運動，也在工人階級中尋找依據。學生看到工人階級裏面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更時常地向工人階級發表宣言，號召他們參加學生的示威遊行。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的示威遊行中，我們

更多地看到工人的參加；而且在有些示威遊行中，工人佔着最大的部份。

政治的示威遊行——這種新的革命運動的形式，與工人羣衆罷工一起，成爲革命轉入更高階段的標幟。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了奧布霍夫工廠工人的武裝行動，即有名的『奧布霍夫的防衛』——彼得堡的工人，接受了戰鬥的洗禮。在外高加索（斯達林同志從一八九八年以來就在那裏進行工作），發展羣衆的社會民主運動。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發生了社會民主派所組織的替夫利斯鐵路上的罷工；在一九〇〇年八月，發生了鐵路工人和車站工人的罷工；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建立了替夫利斯的列寧火花派的委員會；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斯達林，凱慈霍維里及左魯基慈等同志。一九〇一年末，斯達林同志從替夫里斯轉到巴統；在那裏，斯達林同志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組織，領導了洛特寧爾特及曼特雪夫等工廠工人的罷工，並且組織了一九〇二年三月著名的工人的政治示威遊行。這一遊行結果形成了工人與軍隊警察的衝突。

斯達林同志在這一罷工之後被捕了。他在獄中一直坐在一九〇三年四月以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的新烏達村。

在西伯利亞，斯達林同志得到了列寧的信，從這信上斯達林同志知道了第二次大會上的分裂。斯達林同志完全贊成第二次大會的決定和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以後他就從流放地逃到外高加索，重新熱烈地進行布爾塞維克的工作。

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之下，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之下，在外高加索開展了各民衆工人農民的深入而廣大的革命運動。

這樣的遊行示威，同樣的發生於瓦沙維爾諾、沙拉托夫、索爾莫伏，而且帶着完全的羣衆的性質。

在尼熱·諾伏高洛特（即現高爾基城），沙皇政府的法庭，審判了索爾莫伏工人柴洛莫夫、比柯夫、薩梅林和密哈以洛夫，罪狀是他們參加一九〇二年五月一日——五日的遊行示威；這些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說，由尼熱的黨委員會及火花報印發，廣泛傳播於全國。列寧認爲這一事實，是具有巨大的意義的。他寫道：『四個尼熱·諾伏高洛特的工人這樣的說：我們感覺到自由的氣息，我們準備好爲着反對政治奴役與經濟奴役的鬥爭而被充軍。洛斯托夫地方的數千工人，正似與他互相響應地喊着；我們準備着犧牲——洛斯托夫的這些工人爲自己爭取了幾天政治集會的自由，並且擊退了軍隊對於毫無武裝的羣衆的多次進攻。』

『你們是能勝利的——這就是我們對於那些有目能見有耳能聞的人們所說的話。』（列寧：新事變與舊問題）

政府對於遊行示威者並不限於毒打，監禁和流放。在維爾諾省長卡瓦爾的命令之下，三十個遊行

者遭受笞刑。維爾諾工人列克爾特於是就槍擊卡瓦爾來回答這種壓迫。

一九〇二年秋（十一月四日到十一日），在頓河洛斯托夫城，發生了工人的總罷工。公開的羣衆

大會，吸收了幾萬人來參加。這一罷工，是由頓河流域的黨委員會領導的。

在新事變與舊問題一文中，列寧關於這個罷工這樣的寫道：

『在頓河洛斯托夫發生了初看起來是最普通的和『平凡』的一個罷工。這罷工引起了事變，他們顯著地證明社會革命黨復活民粹派，復活其一切理論與策略的錯誤的企圖，是如何的有害。這一罷工，包括數千工人，不管在這罷工中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參加得非常不夠，可是他從純粹的經濟性質的要求開始，很快的轉成了政治的事變。根據幾個參加人的目擊情形，集合的羣衆，達二萬到三萬人；他們進行了驚人地嚴肅與有組織的政治集會；在這會上，熱烈地宣讀了并評論了社會民主黨的宣言，發表了政治的演說，向勞動民衆中最偶然的最無訓練的分子解釋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的初步真理。教育着關於與士兵關係及對士兵態度的實際的與『原理』的功課。行政機關及警察，弄得驚慌失措（或許部份的是因爲軍隊的不可靠），而在幾天內沒有能力來阻止俄國從來所未見的露天羣衆政治集會的舉行。最後當使用軍事力量的時候，羣衆給了他以頑強的抵抗，一個同志的被殺，祇成了第二天抬屍的政治示威遊行的動因。』

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及七月，南俄重要工業中心的罷工，包括了二十萬以上的工人；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在巴庫的煤油廠，以後還在替夫利斯、巴統、基輔、葉克特林、諾斯拉夫、凱爾赤、也利沙、非特洛勒各地

都發生了罷工。工人行動的結果，常是遭受軍隊的流血的鎮壓，那時行動的工人更加時常的和軍隊發生了衝突。罷工和遊行示威發生的原因，首先自然一方面是由於更加擴大的工業危機下，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人特別受摧殘的狀況；同時他方面還是由於無產階級自覺的發展。

但是，危機打擊工人階級，而且以更大的程度打擊農民經濟。農民經濟困頓於地主嚴厲的摧殘之下。危機同樣影響社會其他階層的狀況。

在羣衆運動發展的狀況之下，一部份處在民粹派影響之下的智識分子，做了冒險主義的企圖（這種企圖的有害，已由民衆黨的恐怖的例子說明了），他們想用威嚇，想用恐怖來獲得現狀的改變。

在一九〇一年二月，學生加爾波維支槍擊教育部長波哥利波夫，拉哥烏斯基謀刺總監察官波比德諾斯再夫，但是都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〇二年二月，阿拉爾特在莫斯科槍擊特列破夫，一九〇二年四月巴爾馬雪夫刺死了內務總長西比亞金。同時農民運動亦擴大的傳布開來，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也走到了舞台上來了。列寧和我們整個的黨在這一時期，對於社會革命黨想用個人恐怖來代替工農羣衆鬥爭的企圖，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列寧揭破了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的冒險主義。

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指示出農民是怎樣尖銳的感覺着地主的壓迫。

在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經濟生活中，農產品的出口是有極大的意義的，那時糧食的出口達到了最高的數目（八百萬噸以上），所以地主差不多到處都提高了土地的地租，因此土地很少的以及毫無

土地的農民就陷於更大的摧殘之下。由於工業的危機，工廠做工的工人數目減少了，這樣，使土地很少及毫無土地的農民的狀況，更加惡化了，因為他們是靠到城市做工的工資來維持生活的。地主特別利用了自已的割地及插地（即插入農民土地中間的某些土地）來剝削農民，這些割地及插地從各方面侵凌農民的土地。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築起籬來，農民爲着通過到自己土地不得不付巨數的罰款；有的甚至把水溝也和農民的田地割絕開來，地主利用農民在土地上的困難情形，強制農民爲自己做工，使農民的田地陷於最不利的狀況之下。自然地主還利用了國家政權的機構，警察、法庭、哥薩克軍隊及教堂等，來無情的剝削農民。爲着保護地主利益，設立了地方長官，以及保安隊伍等等。

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階級政黨面前就發生了一個任務，即是消滅農村中半農奴的制度，以便掃除農村中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掃清階級鬥爭更強大地發展的道路。

農村中半農奴的制度以及農奴主、地主的政權是農民運動的基本原因，農民之大批失去土地，更加緊了這一運動；除此以外，還發生了飢荒。

列寧這樣寫道：『一千萬農家只有七千三百萬俄畝的土地，而二萬八千高貴的污濁的地主却有六千二百萬俄畝的土地。就是在這一種基本的情況之下，開展了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列寧：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

從一九〇〇年起開始的農民的革命運動，這一運動之後更廣大的發展起來。一九〇五年革命以

前的幾年，農民的鬥爭，分佈如下：

地區	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
黑地帶	四四	二八	三〇一	一二三	七五	五七一（次）
非黑地帶	四	三二	三九	一八	一六	九九（次）
歐俄全部	四八	六〇	三四〇	一四一	九一	六七〇（次）

上面的數目，當然也不是整個農民鬥爭完全的統計，因為在報紙和文件上所說的，僅是最重要的農民鬥爭。我們看到農民運動最發展的是在一九〇二年，以後就比較低落了。在一九〇五年農民運動以更大的力量爆發起來。應當指出農民運動是發生在工人運動之後（工人運動在軍隊與艦隊內的革命運動開始之後，也更加緊起來。）毫無疑義的，城市中的工業危機，不僅排除破產農民之進入城市，而且還把許多的失業工人兼農民，驅回到農村中去，這樣加緊了農村中的革命運動。但是像列寧所說的，那時農民所受資本主義的壓榨的痛苦，遠不及他們所受地主及農奴制殘餘壓榨的痛苦。所以在地主經濟最發展的黑土帶，農民運動特別厲害。一九〇二年在波爾他瓦和哈爾可夫省發生了農民的羣衆的革命行動，他們搗毀了地主的莊園。這件騷動對於整個農民裏面革命情緒的發展，有極大的意義，以致赫爾遜省的農民向摧殘他們的地主威嚇道：『嚇，當心，看你們地主在波爾他瓦省是怎樣的』農民運動表現在焚燒地主莊園，奪取地主土地（有的甚至在形式上把地主土地分配與農民），奪取草

地和牧場，不僅農村工人而且租種地主土地並為地主做工的農民也舉行了罷工。這些罷工在許多場台上轉變為奪取收穫的穀物，搗毀地主的倉庫和蓄藏，砍伐地主的森林，毆打並殺死地主及其管事人等等。特別普遍的是搗毀地主的莊園。在農民這樣的鬥爭條件之下，這種地主莊園的搗毀實際上等於武裝暴動，這種暴動受到了軍隊的殘酷的鎮壓。在格魯西亞、波羅的海邊諸省及波蘭，農民運動特別的強大，農民不僅反對地主，而且反對教會，因為他們幫助政府來『剷除暴徒』，他們常常就是內奸，他們在禮拜中知道了那些信徒是幹革命工作的，於是把這些信徒出賣給警察。在波羅的海邊諸省（現在的拉特維亞和愛斯多尼亞）反對教會的運動特別厲害。在那裏社會民主黨人組織了農民，舉行了所謂『赤色的三位體祭』，利用了教堂來作開會與示威之用，在那裏進行了真正的反對教會的運動。

在農村中貧農起來反對富農。但是整個的農民仇恨地主，所以在反對地主時，常是形成了農民的統一戰線。因之列寧指出，我們應當首先顧及整個農民利益與地主階級利益中間的對立，在我們農村工作中，列寧提出最重要的任務是反對農奴制殘餘的鬥爭。是要『從俄羅斯國家一切制度裏剷除等級的，不平等的以及侮辱幾千萬『老百姓』的精神』。但是布爾塞維克從不會忘記農村無產階級及貧農的特別階級利益。

列寧講到專政制俄國的這兩種戰爭：一種戰爭是發生於農奴制之下，這上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我們和整個農民聯合起來反對地主；還有一種戰爭是在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中間，僱傭勞

動反對資本的戰爭，他要求轉向社會主義，在這一戰爭中，無產階級和貧農攜手前進。

在經驗中，農民學會了懂得了在他們進行反對地主鬥爭時，沙皇政府站在地主一邊，來保護地主，因此農民對於政權的警察機關的仇恨，是增長起來了；可是還有一部份農民，還以為沙皇政府是在農民這邊的。在大多數的場合中，參加農民運動的正是貧農，但是這不是說中農和富裕農民沒有參加鬥爭。當然，很顯明的，富裕的農民在這一鬥爭中是非常不堅定的，他們想着『明天』，他們願感到在對付地主之後，貧農將要對付他們。工人階級及農民，是革命的動力，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鬥爭的結果，是依靠着這兩個階級的同盟以及其中無產階級的領導的。

在農村中有沒有我們黨的領導呢？在那時，我們黨在農村中的組織關係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的秘密的傳單和小冊子，也傳到農村中。列寧的論貧農一書在那時有極大的意義，在這書裏列寧說明了在當時革命中農民應該怎樣行動。在這一著作內，列寧引了這樣的思想，就是在農民為土地而鬥爭的中間，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是無產階級；列寧也引了這樣的思想，就是在當時的革命中，必須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他也已指出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農村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特別組織；他也已指出無產階級必須把中農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列寧那時也已提出了和富農及農村資產階級作鬥爭的問題。列寧說：無產階級和整個農民一起進行反對地主和沙皇的鬥爭，和貧農一起進行反對城市及農村資產階級的鬥爭。

在波羅的海邊諸省及外高加索，農民運動發展到更大的範圍，革命的農民運動差不多完全是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發展起來的。在農民的集會所提出的要求上面，我們完全可以看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最低限度政綱。沙皇政府以極端殘酷的手段鎮壓農民；政府派遣討伐的軍隊來幫助地主，特別派遣了英古斯人、卓爾客斯人、奧雪金人以及頓河流域庫班及特匹克等地的哥薩克人（上述四種都是非俄羅斯民族）的隊伍；沙皇政府以爲他們不惜俄文，和俄國農民生活隔離，并受地主某些禮物的收買，將能無情的和農民鬥爭。對於農民實行了槍殺，有時毒打至死。以特製的鞭子毒打一百之後，再用槍彈來結束生命。一九〇二年秋把九百六十個農民交付法庭審判，在這個數目裏面開釋了一百廿三個人，其餘都判了罪。從這時起，大批的人墮入政治犯的監獄，被判苦工和流放；在革命運動開始時，很多是平民智識分子，偶然還有一些貴族分子，以後學生就更多了，工人也時常出現了，更以後就開始大批逮捕工人。在農民運動發展的幾年，監獄擠滿了因反對地主而受逮捕的農民，那時軍隊還是忠於沙皇的。

俄羅斯帝國邊疆上的小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及智識分子，更有他們不滿沙皇政府的理由。猶太人民受到沙皇政府的種種對於猶太民族的特殊法律的壓迫，暴力的摧殘，以及種種殘酷的待遇。烏克蘭和波蘭的人民不能夠自由應用自己民族語言；在高加索，沙皇政權的民族壓迫政策，所謂俄羅斯化的政策，批發各民族自相殘殺。

但是沙皇政府在這些政策中，吸引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到自己一邊來，例如對於猶太勞苦羣衆及小資產階級的種種限制，對於猶太大資產階級是不起作用的。

波蘭、拉特維亞、高加索等地的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對於沙皇政府，是十分仇恨的，他們擁護民族主義運動。（波蘭的「人民民主派」，亞美尼亞的「德徐那克」等等）少數民族區域的勞苦羣衆，看到無產階級是幫助堅決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力量，所以他們擁護工人的政黨。在高加索，在西部邊疆，在波蘭，在芬蘭，無產階級都領導了被壓迫民族的廣大羣衆。

日俄戰爭與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在一九〇四年開始了日俄戰爭，結果，俄軍大敗，旅順被陷，俄國艦隊全部覆沒。這一戰爭的原因是怎樣的呢？這一戰爭已經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是由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和俄國——來進行的。俄國的地主資產階級企圖以奪取新的土地來擴大自己的財富及權力，枯羅泊特金將軍甚至起草了一個建立「黃俄羅斯省」的計劃。這一個省在地主與資產階級企圖成功的時候，是要在滿洲建

* 歷史家波克洛夫斯基認為任何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商業、工業資產階級的戰爭，這種

意見是不正確的。

立的。

在一八九八年，沙皇政府利用中國的困難狀況以及日本力量的不足，逼迫中國政府將遼東半島以及旅順港交給俄國。俄國在遼東的這種侵略，使俄國與日本處於敵對的地位。因為日本那時，也想鞏固自己在滿洲的勢力，也想預備把滿洲作為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根據地，以與西歐帝國主義相競爭。西歐帝國主義列強，首先是英國，是需要滅弱俄皇政府在東亞的力量。俄皇政府佔領遼東半島後，開始向朝鮮方面推進，並在鴨綠江兩岸建立森林租借區；日本預先料到，他在這一戰爭中的敵人，是沒有準備的，並且不能取得勝利的，所以日本就利用了這種情況，不經宣戰就使俄國軍隊及艦隊吃了幾次嚴重的敗仗。

沒有充分供給的俄國軍隊，抵不住日本人的攻擊。俄軍在退却時大批的被消滅；當俄軍缺乏子彈的時候，士兵却得到了整批列車的聖像（這好像是開頑笑似的）；同時還有特別的火車不許裝運傷兵而是裝運了總指揮（士得雪爾海軍大將及斯大克爾帕將軍）的財產。

社會民主黨對於這個戰爭採取什麼態度呢？那時孟塞維克的火花報提倡「一切代價爲着和平。」孟塞維克坦茵那時已經走到爲保衛祖國辯護的地位，托洛茨基也採取了差不多同樣的孟塞維克的觀點。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那時已經是戰敗主義者，他們很清楚看到，俄國自由及俄國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事業，是強有力的依靠於專制政體的軍事的失敗。日俄戰爭中俄皇政府的失敗，促進了

不滿沙皇制度的一切階層人民的革命運動的加緊；甚至在開始時，帶着愛國主義情緒的自由主義派，在遠東方面俄軍不利及覆沒的影響之下（這種俄軍的覆沒證明俄皇專制政府完全沒有能力來應付戰爭的困難），也開始給沙皇政府以某種反對。

孟塞維克的地方會議運動的計劃以及布爾塞維克對

它的批評

上述這些，不僅反映於平民智識分子（首先是學生）的情緒，而且還警醒了一部份資產階級，使他們思索改變現存制度的問題，尋找能够平息革命運動的方法，企圖求得某些讓步及改良（利用這些來彌縫專制制度警察制度的缺陷），並且企圖從沙皇政府那裏爭取某種憲法。這就說明爲什麼在工人的農民運動之外，那時還發展着地方會議派的自由主義運動。在一九〇二年組成的「解放派」，他們在斯特羅維主編之下，出版了解放雜誌，在一九〇四年開始合法的出版自由主義的批評專制制度的我們生活報；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召集了自由主義派的大會，在這大會上自由主義『左傾』的一派得到了勝利。那時自由派的活動是什麼呢？他們舉行了宴會，在宴會上發表了關於自由的響亮演說，高呼了響亮的詞句，如像『再不能如此生活下去』等等；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要求，這種自由，不會抵觸剝削者的經濟統治權，同時保證資產階級國家更自由發展的可能。自由主義派批評沙皇專制政體

的這種言論，在不諳於政治的常人看來，好像是革命的。由於俄皇政府在東方失敗的結果，資產階級的
不滿是增長了，這樣造成了反對專制政體鬥爭的整個民主陣綫的形狀。所以在這時，應當決定工人運
動在這一陣綫內的地位，指出社會民主黨應當號召工人進行怎樣實際的行動，指出應當怎樣組織無
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反對沙皇的共同鬥爭，在這時候很明顯的表示出兩種策略的分別；孟塞維克
主張參加自由主義派的會議，參加地方會議派的宴會和大會，在這些會上提出聲明，如果自由主義派
同意繼續向沙皇提呈包含民主要求的請求書，那麼工人階級將幫助自由主義派的運動。孟塞維克要
使工人階級追隨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之後，推動資產階級，但是不要推動得使資產階級駭怕；孟塞
維克聲明，參加資產階級的宴會運動是政治示威的最高形式，而反對整個現成制度的街上示威，是
『低級的形式』。孟塞維克對於事實這樣的設想：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革命中主要的
動力是資產階級，因此孟塞維克企圖使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締訂同盟。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怎樣的呢？特別明顯的決定了布爾塞維克對於自由主義派的路綫。布
爾塞維克黨努力使工人階級成爲一切鬥爭的革命力量的領袖；布爾塞維克黨號召工人階級不是去
和資產階級訂立同盟，而是去和農民成立聯盟；工人階級有自己獨立的任務，他代表着獨立的和最革
命的力量。工人階級現在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工人階級應當以自己羣衆的革命鬥爭，吸收其他階級
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一邊來。我們的黨不是號召工人參加宴會發表自由主義演說；我們的黨號召工

人出到街頭上舉行示威遊行，向警察的壓迫進行鬥爭。列寧指出，這種鬥爭的開展，可以使得無產階級一直轉到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按照自己的力量與能力，在可能時候，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

從上面關於蘇巴托夫的一章，讀者已經看到沙皇政府如何企圖在各個城市建立「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一九〇四年在彼得堡，沙皇政府又重新經過特務機關的代理人牧師加朋來建立這樣的組織。

牧師加朋的組織，是憲兵蘇巴托夫的「警察社會主義」的直接繼續。加朋派和蘇巴托夫派所不同的，是在於加朋派把他們和特務機關的關係謹慎地嚴密起來了，表面上裝出獨立的样子。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加朋已經寫信給警察廳總監洛布興，在這封信裏，他規定了自己在工人中活動的綱領。他的主要任務，是在於使工人脫離鬥爭，並在工廠工人中築起真正充滿俄羅斯精神的鳥巢，從這巢裏飛出健全的自我犧牲的良鳥來合理的保護自己的沙皇……」（見一九〇五年以前的加朋及特務部的關係）

同時加朋指出蘇巴托夫派失敗的原因。他以為這原因在於特務機關派遣猶太人夏也維赤到彼得薩工人中去主持工作（關於明斯克更不必說了）；而在莫斯科，「領導者」是警察，而且還不是特別有能力的警察，所以事情就帶着行政警察的，並且浮面的喧囂的性質；因之加朋就提出自己的進行組織的方法，他要使警察採取注意警察并嚴格監督的作用，而把主要地位讓給社會的獨立的活動。

差不多在彼得堡的各個區，都建立了加朋的組織。「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加朋及其親近，告訴工人說，政府準備容納工人的要求，幫助解決他們的合理的要求。在這時，工人狀況是非常惡化的，戰爭引起物價高漲，這首先最利害的打擊工人，工人受迫的狀況，在這時感覺到特別厲害，只要有個很小的動機，就足夠使得工人階級中間鬱積着的不滿，流成羣衆的無產階級的與農民的運動。事情的開始，是因為有一個工廠，開除了四個加朋派工人，加朋及加朋派企圖向普的洛夫廠管理處請求，向城防司令部請求，向內閣總長維德請求來解決這一事情，但是這種請求都沒有得到成功。被開除的工人，是加朋的「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的會員，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被恢復；一九〇五年一月三號，開始了普的洛夫工廠的罷工，同時，在其他工廠（例如在夏戎廠）也發生了罷工。從要求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開始，普的洛夫廠的罷工，很快的擴大起來，彼得堡的全體工廠一個一個的加入了這種罷工，加朋不得不領導這些羣衆。這些羣衆的運動，已經自發的，超出了政府特務機關所規定的範圍了。早在這一事情之前，在加朋的親信人員內，已經發生向沙皇遞請願書的思想。在這幾天，加朋提出下面的計劃：一月九號

讓整個工人階級集合起來，舉行和平的遊行，帶着宗教的旗幟及沙皇的像片，走到冬宮向沙皇請願。并遞請願書。在這請願書內這樣的寫道：

『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子以及無人救援的父母，向俄皇陛下，尋找真理和保護。我們是貧窮，我們受壓迫。我們肩上壓着過份的勞動，我們受毒罵，我們不認為是人，我們忍耐了。但是我們更遠更遠的被推向貧困壓迫與黑暗的深淵，專制的橫暴窒息着我們，我們的忍耐到了最後限度了，我們已經到達了可怕的時機，我們與其忍耐不堪忍受的痛苦，還不如死亡。』

在社會民主黨鼓動的影響之下，工人堅持要在請願書中包含下列的要求：釋放政治犯，政治自由，內閣總長應該對人民負責，一切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教堂與國家脫離，停止戰爭，八小時工作制等以及其他要求。這些要求是和工人政綱的要求完全適合的。

在一月六日、七日、八日幾天內，這一請願書在羣衆的工人會議上傳讀起來，社會民主黨人也在這些會上講了話。在這些會議上講話的布爾塞維克向工人指出，這一請願書上，除忠實臣民式的奴才式的聲明以外，還包含着黨的綱領上所寫的要求。布爾塞維克向工人解釋，當工人階級需要決定自己的要求時，他們可以在工人政黨的綱領上找到這些要求。布爾塞維克向工人說：向沙皇請求是不能獲得自由的，自由應當用力量來爭取。布爾塞維克警告工人們要被屠殺，但是布爾塞維克還不能停止向冬

宮的請願運動。以極大的自發力量推動着羣衆。很清楚的，這一運動超出了牧師加朋及其主人——沙皇特務機關——所規定的範圍，沙皇的軍隊將屠殺毫無武裝的工人及其妻子。

在一月九號，布爾塞維克和工人一起出到街道上，和工人一起參加對於軍隊最初的衝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起街道上的障礙物，在一切可能的時候給軍隊以抵抗。在這一天，被殘殺的工人有一千以上，受傷的更多，好多萬的工人在這一天懂得了，所謂「警察社會主義」決不能夠給他們以任何東西，而祇能够使他們脫離鬥爭；「警察社會主義」僅僅是政府對工人的愚蠢的欺騙，以及巨大的警察的挑釁罷了。

一月九號被稱爲血的星期日，這一天對於俄國整個工人階級以及幾千萬農民，真正是血的星期日。俄國的工農羣衆在這一天以及以後的幾天內，清楚的懂得沙皇和沙皇政府是保護誰個利益，站在誰個方面的。一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幾天，在彼得堡、弗拉基美爾、羅曼諾夫親王，指揮他屬下的軍隊實行鎮壓。吃驚的沙皇，甚至不敢到彼得堡來。軍隊、哥薩克和警察不僅屠殺和毆打毫無武裝的工人，而且絲毫不憐惜小兒幼女。在這幾天，勞苦羣衆還奮起進行革命的羣衆鬥爭，抗議的罷工像熱潮一般遍播於全國。沒有一個城市工人不能工，不提出政治的要求的。

從這時候起，布爾塞維克黨的影響特別增長了，布爾塞維克站在羣衆運動的領導地位。好幾萬工人，被沙皇政府驅逐到農村裏去，但是這些工人到農村裏便成了鼓動者，鼓動農民羣衆起來進行革命。

的鬥爭。穿着軍裝的工人農民即士兵羣衆，在一月九號以及以後幾天，爲了執行殘暴的驚恐的統治階級的命令，不得不槍殺農民；但在這些士兵羣衆中，也開始了動搖。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以及一月九號以後的事變，還提高了其他國家的革命情緒。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集，多數派

委員會的執行局

那時，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裏造成了這樣的情形，使得黨的新的代表大會的召集，成爲無論如何非常必須的事情。我們上面已經談過，孟塞維克不服從黨的二次大會的決議，並且事實上抵制了黨的中央機關。剛在二次大會之後，馬爾托夫即對二次大會決議怠工，拒絕參加《花報》編輯部。在一九〇三年，孟塞維克召集了「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國外同盟」的大會，在這大會上孟塞維克對於中央及二次大會決議採取公開對敵的立場。列寧聲明退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及黨的最高委員會。列寧在自己的聲明裏，指出他不同意蒲列哈諾夫關於『在現在爲着黨的統一，向馬爾托夫讓步，並且引進六個孟塞維克是有益的』這種意見。蒲列哈諾夫一個人留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裏，並且引進了三個孟塞維克到編輯部來。以後，孟塞維克因蒲列哈諾夫之助又，爭取了黨的最高委員會。由於某幾個中央委員採取調和的情緒，所以布爾塞維克中央違反了列寧指示，採取了動搖的立場，在中央也引進了孟塞

維克。

列寧揭破調和派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央內部的代理人。在那時，列寧在國外差不多完全是孤立的，雖然在國內大部黨的組織是站在列寧方面的。一九〇四年出現了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參加「地方會議」運動的計劃的時候，列寧就用了一切力量向工人解釋，說明孟塞維克要把工人政黨的作用降底到資產階級尾巴的作用，說明孟塞維克完全同意要資產階級來「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列寧做了一篇嚴厲的文章：地方會議運動及火花報的計劃。在這篇文章裏，批評了孟塞維克的整個政策，指出這上面托洛茨基的特別作用，指出托洛茨基的「左」傾空談及其孟塞維克實質。

以後，布爾塞維克就向着召集黨大會的召集（不經過中央）進行了堅決的步驟。一九〇四年八月，在國外召集了「二十二個布爾塞維克」會議，他們向國外黨的組織發表了宣言。『我們認為解除危機的實際出路，是在於立即召集黨的第三次大會。』

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之下，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合委員會和第二次大會後轉入孟塞維克手中的黨中央，斷絕了關係，並且要求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

斯達林同志在公開的爭論中，揭破了孟塞維克及妥協派，建立了布爾塞維克的委員會。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在替夫利斯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高加索委員會的會議（有十五個代表），這一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主張進行廣大的鼓動，為召集黨的第三次大會而鬥爭。這一會議選舉了為

召集第三次大會而鬥爭的委員會。

在南俄及北俄，列寧派也召集了同樣的會議，高加索、南俄及北俄的各種會議選舉了多數派委員會執行局，這一執行局是由最得力的同志組織起來的。

三個布爾塞維克的特區會議（南俄特區會議包含三個委員會，高加索包含四個委員會，北俄包含五個委員會，以及其他四個委員會中的一部份）委託執行局來召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多數派委員會執行局做了很大的工作，團結了布爾塞維克的委員會，同時正確地認識了分裂的歷史，以及列寧關於當前革命所提出的一切重要問題的意見。執行局依靠於三個特區會議的擁護，早在第三次大會召集之前，就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中心。執行局的代表們（李維諾夫、施姆略赤加古瑟夫、略托夫等）進行了極大的工作，他們來往於各地委員會之間，在實際工作上團結他們，並且對於日俄戰爭，對於「地方會議」運動，規定了一致的策略。

不久之後，高加索出版的斯達林同志的小冊子略述黨內爭論，在宣傳列寧觀點及揭破機會主義上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初，在國外組織布爾塞維克週刊前進報，參加前進報編輯部的有列寧、奧爾明斯基、伏洛夫斯基、盧那查爾斯基。

列寧進行了堅決鬥爭，並且在三次大會前夜，繼續進行鬥爭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某條調和情緒。

他們不知道和孟塞維克分裂的必要。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一日，列寧給古瑟夫與波格達諾夫的信裏這樣的寫道：『爲什麼要裝假及隱蔽，……如何的喜劇！……或是我們以真正鐵的組織團結那些願意作戰的人，並且用這一個小的但是堅固的政黨去打破新火花派的複雜成份的脆弱怪物；或是在我們自己行動上證明自己是被人輕蔑的形式主義者，而被迫趨於毀滅……我們主張分裂，我們號召前進派代表大會上去，我們需要組織前進派政黨，我們破裂，立即破裂對於破壞組織者的一切關係。可是有人却還對我們說要『忠順』並且傳說好像火花派和前進派的共同代表大會是可能的，如果我們不願向世界表示出乾癟無神的老處女（她是以自己毫無實效的道德的純潔自傲的）的最醜形狀的話，那末我們應當懂得，我們需要戰爭與戰爭的組織。』

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是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日在倫敦召集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二十四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十四個有發言權的代表。這是第一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在這大會上，那時掌握在孟塞維克手中的黨的最高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都沒有代表出席。九個孟塞維克委員會也派代表到這大會來，但是他們沒有實際參加這一大會。和這大會同時，孟塞維克也在日內瓦召集自己的會議，參加這一會議的有以下的孟塞維克的委員會和集團：彼得堡、利加、莫斯科、沙拉托夫、維爾諾、斯莫爾斯克、尼古拉也夫、敖得薩、基輔、哈爾可夫、羅斯托夫、高加索及西伯利亞。這樣，在一九〇五年初，當革命事變開始廣大發展，當工人階級必須確切的規定鬥爭路綫，規定自己對於各個策略問題的態度，規定自

已對於社會上贊成革命鬥爭與反對革命鬥爭的各階層的態度的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兩個黨。每個黨單獨討論問題。單獨在自己大會上規定鬥爭的路線。

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人的兩個策略

對於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爭論，應當給出正確的估計。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中，給了這一估計。他在這一書裏，從根本上提出了布爾塞維克的主要的中心口號，就是在當前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爭取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必須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黨的行動，黨的策略是由當前形勢的估計來決定的，並且要服從於革命的綱領的任務與戰略的任務的。布爾塞維克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認為俄國革命在第一階段上，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他的任務是摧毀沙皇制度，消滅農奴制的殘餘，取得政治的自由。但是列寧常着重的指出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是不能停頓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上的。無產階級還要向前進，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前進。從這點出發，列寧就指出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許多特點。

列寧指出我們和孟塞維克爭論的來源之一，是在於孟塞維克把這一革命規定為資產階級性質

就心滿意足，而沒有指出這一革命的農民革命的特殊性質。

『一九〇五年春及夏，當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就明白指出我們策略爭論的來源，特別提出農民革命的範疇，當着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之一，而規定他的勝利是要實現工農的革命的民主專政。』（見列寧：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

列寧認為農民羣衆的積極參加，『使一九〇五年革命和早昔時候的資產階級的大革命相近似，在那時候，農民是起着重大的革命作用的。』（見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估計）

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根據第一次革命的經驗，列寧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一書的結論上，這樣的寫道：

『俄國革命第一時期的經驗，澈底的證明，這一革命只有當着農民土地革命來進行的時候，才能勝利；而這一土地革命，如果不實行土地國有，也就不能完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在我們黨的土地綱領上，列寧這樣寫道：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是農民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綱領，它是在於反對農奴制的殘餘，反對我們農村結構中的一切中世紀的東西。』

列寧說明，當我們指出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農民性質的時候，我們絲毫不應忘記事情的其他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這一資產階級性農民革命中，領導者是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

之下的。在這一俄羅斯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書內，列寧指出了這一最重要的情形。

現在農民立即進行自己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沒有看到這一革命中的矛盾，而且也不許想到這樣的矛盾。工人的社會民主黨，看到這些矛盾，提出自己社會主義的目標，他不能把工人運動的命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看作一樣。這樣，列寧及布爾塞維克把這第一次革命看做不僅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而且他們還在這革命中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序言。列寧堅決的相信：『俄國民革命的勝利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的號炮，將是我們弟兄——各國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新勝利的號炮。』（見列寧：無產階級鬥爭與資產階級的奴役一文）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當列寧在瑞士蘇力為青年工人的會議作關於一九〇五年的報告的時候，列寧特別用力的指出無產階級及其鬥爭方法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作用。

列寧說：

『俄國革命的特點，正是在於這一革命根據他的社會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但是根據鬥爭手段却又是無產階級的。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他所直接企求實現的目的，他以自己力量所能直接達到的目的，是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大規模的大貴族的土地所有。——所有這些步驟是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法蘭西資產階級大革命所差不多完全實現了的東西。』

『俄國革命，同時還是無產階級的；這不僅在於無產階級是領導力量，是運動的先鋒隊這一意義上，而且還在於另一意義上，就是特殊的無產階級鬥爭的手段，即罷工，是推動羣衆的主要手段，是主要事變的蓬勃發展的最顯著的現象。』（列寧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

在這時候，俄國工人階級已經有了西歐資產階級革命與「巴黎公社」的經驗。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成爲主要的領導力量。無產階級依據於革命農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戰鬥聯盟，領導農民和自己一起鬥爭。

俄國革命發生於與過去西歐革命完全不同的國內與國際環境中。除過去革命經驗以外，俄國革命還有這個優點，就是他發生在西歐資本主義完全成熟可以轉變到社會主義，同時俄國資本主義也是比較高度發展的時候。

下列的情況是有巨大意義的：就是俄國革命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而且這一革命發生在帝國主義的國家裏。沙皇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的組成部份，帝國主義準備了這一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條件，在整個世界經濟的體系內，帝國主義準備了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在當前的災難及如何與之鬥爭一文內這樣的寫道：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是因為戰爭的苦況產生了無產階級的

暴動（但如果在經濟上社會主義還沒有成熟，那麼任何暴動不能創立社會主義）而且還是因為國家的獨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全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門，是這樣的歷史階梯上的一個階級；在這一層級與社會主義階級之間是沒有中間階級的。在俄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和農奴制度的最野蠻的『亞洲式』的殘餘的保存，同時並進。在俄國，只要有順利的條件的結合，就使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條件在俄國是有的：工人的羣衆革命運動，和農民反對地主的戰爭結合起來，和羣衆的軍事的暴動結合起來，和被壓迫民族的忿怒結合起來；同時在俄國還已經有了革命的最有經驗的戰鬥司令部，布爾塞維克黨。……沒有這一條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勝利及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〇六年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這樣說道：

『在十八世紀末，德國是封建的及封建的國家所包圍着的；可是在二十世紀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俄國，是被另外一些國家包圍着；在這些國家裏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已經充分武裝起來處於與資產階級作最後搏戰的前夜。』

列寧在一七八九年式革命呢？還是一八四八年式革命呢？一文中發表了同樣的思想。說道：

『我們的國際情況是比較有利的，因為歐洲無產階級使得歐洲皇帝對於俄國皇帝的幫

助成爲不可能。」

所以，布爾塞維克認爲這一俄國革命能够而且應當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言。那時在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認爲在這樣條件之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性農民革命將立即轉變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

學說

從上面已經知道，列寧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估計一九〇五年革命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列寧這樣稱法，在某種意義上指農民革命），認爲這一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是可能的。關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這一學說是直接繼承馬克思學說的。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時，已經認爲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能的；雖然在那時德國還沒有像一九〇五年俄國那樣的獨立的工人政黨，也沒有保證這種轉變的其他條件。布爾塞維克黨從來沒有在這兩種革命之間築起萬里長城來。

第二國際的英雄肯定說（并仍在肯定說），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革命二者中間有一鴻溝存在，至少有一中國萬里長城隔開，使這二者革命中間有一長時間的距離。在這時間的距離中，資產階

級奪取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則聚積力量并準備『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這時間的距離，他們往往以為至少也有幾十年。我們無須乎說明，這一『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下是沒有一點科學根據的，這『理論』祇是，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志願的一種藉口；我們也無須乎說明，在孕育着衝突和戰爭的帝國主義底下，在這『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當『榮繁的』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正在各國增長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勢力直至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也聯合在內以致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至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也追得聯合起來的時候，——在此時，我們自無須乎說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或多或少發展的國家，在這些條件之下，應該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前一革命應該轉變為後一革命。（見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在第一次革命前十年所著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列寧寫道：

『俄國工人提高到一切民主分子的領導者的地位，來摧毀專制政體，使得俄國無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一起）經過公開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自然如果沒有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這一大戰極大的加速了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革命），那麼或許不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就是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七年二月）及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之間，或許須要比較長的時期。但是在一切的條件之下，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是說必須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領導著作兩個策略中，各方面的發揮了關於革命轉變的學說。列寧那時已清楚的以不會引起任何懷疑的方式，寫道：

『在革命完全勝利的時候，我們將以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即完全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或許那時新的將來的馬丁諾夫們又要痛哭流涕了）。』

『民主革命的工專政，像世間一切存在的條件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方面為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是僱傭工人為反對僱主而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兩個策略）

在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的態度一文中，列寧發揮了這樣的思想：『……從民主革命，我們立即根據自己的力量，根據自覺的及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可能範圍，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贊成不斷革命的，我們不停頓於半途；——我們不陷於冒險主義，不販賣自己科學的良心，不追逐於廉價的名譽；我們所能够說而且正在說的，只有一點：我們以一切力量幫助農民來實現民主革命，使得我們無產階級政黨更便於盡可能迅速地轉向新的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只能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務完全完成的時候，才能够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呢？不是，這樣說。在列寧看來，革命勝利的主要標誌，是在於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手中。列寧估計到，革

命是發展在全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時期，也在俄國本國主義比較高的發展的時期。列寧指出：『現在革命的完全勝利，將是民主革命的結束，將是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堅決鬥爭的開始。』（兩個策略）所以列寧並不認爲上述兩個之間，不可避免的要有隔離和間斷。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自然首先是關於鬥爭力量的對比，關於革命政黨的組織性，關於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如何清楚了權擺在他們前面的革命任務等的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將會得到勝利；但是在沙皇俄羅斯，有兩種社會的鬥爭，整個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以及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勝利，專制政體的推翻，以及農奴制殘餘的消滅，並不能使革命停頓；相反的，革命的鬥爭將開展起來，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富農及一部份中農，轉到反革命方面去，而無產階級與僱農及貧農一起，在中農的中立之下，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列寧不止一次的說明革命轉變的問題是鬥爭的問題。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如果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條件之下，並且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的條件之下，能夠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那時第一種革命轉變爲第二種革命，第二種革命附帶的解決第一種革命的問題，第二種革命鞏固第一種革命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够決定第二種革命如何能够代第一種革命而興。』（見列寧：十月革命四週年紀念一文）

列寧學說的這一最重要的部份，已由俄國革命的三次經驗證實；這一學說，已經寫入到共產國際

綱領裏。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就已經以為俄國革命的勝利，將是世界革命的序言，關於革命轉變的這一學說，不但清楚說明了俄國革命的整個道路，而且清楚的說明了其他國家革命的整個道路。這一學說指示出，革命如何經過各個階段進到社會主義。藉口缺乏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是不對的，特別在帝國主義時代。可是孟塞維克常是藉口而且現在還是藉口於客觀條件的缺乏。

斯達林同志在列寧主義概論裏面說：『現在必須說，一大整體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已經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因此如果整個系統中革命已經成熟，則在這系統中雖然有幾個國家工業上不甚發展，也不會成為革命所不能克服的障礙物。』

但同時非常清楚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也正是說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為什麼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對於這一問題不能給出像他在一九一五年所給的回答呢？一九〇五年，在帝國主義的開始階段，還不能對於帝國主義做出列寧以後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詳盡的分析。在一九一五年，列寧發揮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及特躍性發展的規律；可是我們已經看到，早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以及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列寧及整個布爾塞維克黨，就已堅持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與必要，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了。

托洛茨基派以及其他的黨史偽造者，企圖證明說，我們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只提出資產階級

革命勝利的任務，而沒有爲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他們說只在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從新武裝』了才轉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托洛茨基主義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和策略的污蔑，已爲我們黨所揭破；只要一讀我們黨的歷史以及列寧和斯達林在這一時期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早在第一次革命的時期，布爾塞維克就已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列寧預見國際帝國主義要極力出來反對勝利的俄國革命。外國資本在沙皇俄國的各種租借企業上，投了許多資本，並且給了沙皇政府以數十萬萬的借款。只這一點，就已可說明，外國資本是如何直接需要在俄國保持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因爲如此，布爾塞維克主張立即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他清楚的看到，只有堅決的澈底的鬥爭，才能造成那種反對沙皇制度恢復與復辟的保證。關於在俄國革命勝利時如何保證不能復辟的這一問題，列寧在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非常清楚的提出了。

『反對復辟的有條件的相對的保證，僅僅是在於：革命要能够實現得更加澈底，革命要能够被革命階級所直接完成，要使中間者妥協者以及一切調和者參加得越少，並且要使革命能够真正實行到底。』

說列寧認爲只有在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俄國革命才能够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話對不對呢？不對的。列寧從來沒有這樣的提出問題，列寧僅僅提出俄國革命與西方革命密切相互聯系的

問題。自然，俄國的革命，特別是勝利的革命，給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在我們革命運動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時候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這樣幫助俄國革命的。俄國一九一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許多國家（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得到了有力的幫助。這還不是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因為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勝利；但是這已經是十分有力的幫助，能够麻痺和減弱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攻，而孟塞維克及托洛茨基派，却認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直接國家幫助，俄國的工人階級是不能保持政權並鞏固社會主義專政的。

現在我們用不着多來證明：托洛茨基派、孟塞維克以及投降主義者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可能的否認，是已經如何被俄國革命的整個進程所完全粉碎。因為俄國革命，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社會主義革命而勝利了。因為俄國革命堅持的擊退了舊世界一切力量聯合的進攻，因為俄國革命給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因為俄國革命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主義，是變相的孟塞維克主義，在一九〇五年，當革命很快往前高漲的時候，托洛茨基企

圖實行盧森堡及孟塞維克巴爾武斯*所創造的『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不只一次的謊言，說歷史證明了他的不斷革命論的正確。他不只一次的說而且現在還在說：他的『不斷革命論』和馬克思關於革命不間斷的理論沒有絲毫的區別。

實際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學說是怎麼樣的呢？在一八五〇年三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馬克思及恩格斯，寫了中央委員會對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宣言；在這宣言裏面，他們發揮了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那時正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遭受失敗，一八四九年暴動遭受鎮壓之後，馬克思預見了革命高漲的接近。馬克思那時預言，下一次革命運動，將以小資產階級爲首，德國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將爲政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關於這點馬克思回答道：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應該是這樣的：工人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來反對他所要推翻的集團。工人政黨在他要鞏固自己的時候，需要出來反對他們……民主的資產者，要把革命結束的越快越好，最多只限於實現這些要求而已；可是我們的利益以及我們的任務，是在於使革命不至間斷，直至多多少少的有產階級被剝奪統治。

巴爾武斯是俄國的孟塞維克僑居國外，很多的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他甚至與帝國主義者合作，並且公開幫助帝國主義者。

治權：直至無產階級收得國家的政權；直至不備一個國家，而且世界一切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密切聯合互不分離，使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停止競爭；並且直至最低限度主要的生產力將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對於我們，事情不在於變更私有財產，而在於消滅私有財產；不在於抹殺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有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的社會。』

馬克思指示了無產階級必須保持自己政黨的獨立性，自己的戰鬥的武裝組織，自己的羣衆組織，並且在國會內和國會外實行獨立的政策，同時，『工人不應當被民主派的好話所收買，例如他們說，這要破裂民主政黨，而給反動以勝利的可能等等的話。工人的戰鬥的口號，應當是不間斷的革命。』

在整個我們鬥爭的進程上，我們正是堅持這一革命的道路。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列寧早在一八九四年，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就已經指出了這樣的革命的道路，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列寧發揮了並且豐富了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指出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勝利的必要，以及從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寫道：『我們擁護不斷革命。』這正是說，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在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之下，取得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勝利；與鄉村貧農聯合，在中農中立之下，繼續開展革命鬥爭，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這個意義上面，就是在今天，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階級的革命鬥爭還是繼續下去，一直到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

更後一些，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寫道：

『過去的事，正如我們所預言：革命的進程，證明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合同，一切的農民反對帝制，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遺制（在這限度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隨後，合同貧農，合同半無產階級，合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着也反對農村富農，富人，投機商人在這限度內，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了。企圖建立人爲的中國萬里長城於二種革命中間，企圖除開無產階級準備程度及其聯合貧農程度之外，再用別的事物來隔離這二種革命，這種企圖乃是最大的曲解馬克思主義，乃是塗污馬克思主義，乃是以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以及和他一起的其他孟塞維克，在假冒馬克思不斷革命論的招牌之下，提倡的是什麼呢？托洛茨基聲明說：『……正是爲着保證自己的勝利，無產階級先鋒隊不得不在自己統治的最初階段，不僅對於封建的財產，而且對於資產階級的財產，完成最深刻的攻擊。在這點上，他不僅對於一切在革命鬥爭最初階段上幫助他的資產階級集團，而且對於幫助他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都是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的落後國家裏，工人政府狀況中的這些矛盾，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尋找自己的解決。』孟塞維克托洛茨基的理論，就是如此。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浪潮發展的影響之下，以及在他的同盟者孟塞維克太過公開的尾巴主義的影響之下，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向左』搖擺了。關於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常寫文章的孟塞維克

開端報，大家這樣的說道：『開端快走』，孟塞維克巴爾武斯及托洛茨基那時提出了『支離割裂地左的』（用列寧的話）口號：『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對於這一口號，列寧是無情地加以揭破了的。

不困難的可以明白看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與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理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的；是與布爾塞維克對於俄國革命性質與動力的了解，毫無相同之點的。托洛茨基提出『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的口號，但是那時還沒有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托洛茨基以為直接依靠於其他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否能夠幫助俄國革命；托洛茨基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其他的同盟者，托洛茨基認為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如果其他國的無產階級沒有勝利，那怎麼辦呢？以後當俄國無產階級根據着列寧的路線取得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的時候，托洛茨基還是堅持的說，在蘇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現在托洛茨基是處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先鋒隊裏面，是法西斯帝偵探機關的走卒，是恐怖主義匪徒的組織者；他現在進行瘋狂的鬥爭來反對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和一切孟塞維克一樣，托洛茨基在當時，就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便否認了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尤其是否認了勞動階級和農民相互關係的意義。當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提出了當前革命中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的時候，托洛茨基却否認了無產階級和勞動農工羣衆結成同盟的可能；而在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看來，這種同盟，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

利和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的基礎。托洛茨基從無產階級在國內沒有同盟的這個觀點出發，得到了以下的結論：『革命到來了，出動已是時候了，而我們却是單獨的。』

對於托洛茨基這種見解的無情的布爾塞維克的批判，我們可以從斯達林同志的論文中看到。斯達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一本小冊子裏寫着：『在過去，通常我們所注意到的，僅僅是『不斷革命論』對於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缺乏信心的這一方面，然而現在我們必須公道地用其他一方面來補充它，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才能同樣缺乏信心的一方面。』這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便否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為照托洛茨基說來，無產階級是單獨的。在國內既沒有同盟者，那它就不能領導誰了。由於否認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托洛茨基便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可能；同時，這樣他也便否認了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在俄國，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途徑，只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勝利。這就是托洛茨基的理論所以是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理論的原因。托洛茨基過去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者，等到工人階級獲得政權以後，他便出來向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鬥爭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策略問題

黨的第三次大會論武裝暴動和總罷工

黨的第三次大會的最大功績之一，便是它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武裝暴動的問題。第三次大會曾經指示全黨的各組織：『一、用宣傳和鼓動的方法，不僅向無產階級闡明當前武裝暴動的和政治意義，而且闡明武裝暴動的實際組織的方面；二、在這個宣傳和鼓動當中，說明羣衆的政治罷工的作用，這種政治罷工在暴動的開始和進程中，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三、對於武裝無產階級，對於武裝暴動計劃的製定以及對於暴動的直接領導，應採取最有力的辦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要時須把黨的工作者組織成特殊的集團。』

布爾塞維克就是這樣地提出了暴動的問題。在這上面，黨應該做什麼呢？黨應用宣傳鼓動的辦法向羣衆解釋暴動的不可避免及暴動的政治意義，並且在羣衆中傳播關於暴動可能進程的正確概念，向羣衆解釋其他各國武裝暴動的經驗，從這些經驗中擷取對於現在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宣傳……這僅是一個任務；還有一個並不次要的任務，就在於組織暴動的力量，擔負起武裝無產階級的任務。製定武裝暴動的計劃，領導這一暴動，並且爲着這一目的建立起特殊的武裝工人的團體，建立起最初的戰鬥的武裝支隊。

布爾塞維克認爲準備革命的嚴重任務的解決，是在於建立戰鬥的武裝支隊，（雖然這些支隊數

量不大……三個人，五個人的……）在於建立靈活的流動的戰鬥小隊。這些隊伍是帶着主動性的，能够在自己的周圍團結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量。我們的黨爲着準備發動，建立了整批的戰鬥的組織。

斯達林同志在外高加索，與其他高加索的布爾塞維克完成了巨大的武裝工人的工作；這一工作
要求三倍的勇敢，對於革命的忠實，組織性以及物質資材。在爲武裝工人羣衆而鬥爭的中間，高加索的
布爾塞維克，提出了這樣神話似的人物如卡摩同志，他是布爾塞維克的勇敢的軍事戰鬥行動的參
加者。

在武裝工人上面，李維諾夫同志做了很多的工作。在黨的配合之下，他和斯托摩尼柯夫，墨齊萬尼，
卡摩，卡夫太拉之等一起工作，爲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的武裝支隊進行購買軍火和運輸軍火的工作。列
寧如何看重李維諾夫的運輸軍火的組織工作，我們可以從列寧於一九〇四年末給徐姆梁赤卡的信
上看到，列寧說：『有李維諾夫在，軍火是會運來的。』李維諾夫那時當做笑話似地給列寧寫道：『孟塞
維克比布爾塞維克處在更便利的地位，因爲布爾塞維克必需爲工人獲取武器，而孟塞維克則僅僅
「熱烈的渴望自己武裝起來，」這當然比較容易得多了。』

基洛夫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是托姆斯克武裝支隊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在那裏他打擊了搗亂摧殘
的黑幫（俄國的極端反動的組織）。

伏洛希洛夫同志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已經是魯斯克的武裝支隊的組織者了。

庫比雪夫同志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前夜，完成了取得軍火的最危險的任務。

克拉辛同志也不止一次的完成了黨的同樣的任務。

布爾塞維克黨的軍事的戰鬥工作，是這一時期間黨的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份，這一工作給布爾塞維克以很多經驗，這些經驗在一九一七年時以及在國內戰爭時期加以利用了。

軍隊以及海軍內的軍事組織，是應當把革命的海陸軍人出動和工人的有組織的出動聯系起來。列寧在這時期，特別把這些出動與農村中的情緒與農村對於幫助海陸軍中運動的準備聯系起來，如果在一九〇五年時，這種組織武裝暴動的正確原則沒有造成勝利的話，那末這是因為那時沒有能够把革命的三大潮流（武裝工人的暴動，海陸軍中的暴動，以及農民的暴動）完全匯合起來。可是這一任務，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時，是完全實現了。

黨的三次大會的決議，對於羣衆中武裝暴動思想的正確的多方面的宣傳，是有巨大的意義的。

應當看到在這個時候，這樣提出問題，不僅遇到俄國孟塞維克的敵視，而且遇到西歐機會主義者的敵視。在西歐，好多年以來，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不斷的告訴工人說，工人階級市街暴動的時候，市街戰的時候已是過去了；說，在這個時期，城市已經改造過了，街道已經變成寬了直了，更便利於政府軍的射擊；說，或從那時起，武器是更加射得遠了，破壞性更大了；說，在近代的軍事技術下，工人階級要和政府軍隊作鬥爭是不可能的了；說，工人階級應當用國會選舉運動的方法來進行鬥爭，逐漸的增加選舉

的票數，增加國會議員的數目；再後——據他們說——在國會內就得到多數，而政府能够自然而然的轉到工人手中。第二國際理論家和領袖對於工人的欺騙，甚至達到這樣地步，使得他們在出版格羅斯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的時候，把恩格斯關於武裝暴動的可能的字句，完全刪去了。

對於無產階級爭取政權問題的這樣了解，正是對於工人的欺騙。——這一點，整個以後幾年的歷史都證明了。在這些年份，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的看到，在某些國家，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內已經有了多數，但這種多數却没有想到要去結束資產階級的政權。照例，這種多數（例如英國麥克唐納工黨政府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政府）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可是在他一方面，俄國暴動的經驗及其他國家暴動的經驗，指示出：在現在軍事技術之下，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如能依據於城市及農村的廣大民主羣衆，依據於政府軍隊搖搖部份的同情與幫助，而且主要的如能有這樣的條件，就是領導暴動的是組織得很好的與羣衆有聯系的共產黨的話，那末勝利的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是完全可能的。

那時，在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還不敢公開反對關於必須武裝暴動的問題的提出；那時政治的情況是極端的緊張，羣衆的憤怒，流成爲街道上和軍隊、警察、憲兵發生衝突的形式；在任何遊行示威中，在任何較大罷工中，都表現出農民羣衆反對地主，反對保衛團，反對地方長官的憤怒。這些人霸據鄉村中，侮辱農民。但是孟塞維克盡了他們一切的力量，做了一切必要的工作，用着好聽的願望，以及毫無意義

的妥洽的決議，要使他們脫離武裝暴動。孟塞維克宣傳說：武裝暴動是不應組織的，說這是自發的過程，說黨不能把武裝工人作為自己的任務，說黨僅僅應該把『熱烈的要求』去武裝工人。關於用『熱烈自己武裝起來的要求』去武裝工人的胡說，當然正是可以使孟塞維克不負絲毫的責任。在一九〇五年日內瓦的代表會議上，孟塞維克聲明沙皇政府由於武裝暴動的結果可能顛覆，這種暴動自發地發生起來的，但是有可能不經過暴動組織成新的資產階級的政權。

在暴動的問題上，甚至像這樣的工人運動的行動家如盧森堡，也贊助了孟塞維克的觀點，擁護把暴動看作自發過程的理論。托洛茨基在彼得堡審判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時期，也擁護孟塞維克關於暴動的觀點；說暴動不是準備起來的，而且自發的產生的。他因之把沒有準備反對沙皇政府的暴動的這一點，當作自己的功績。孟塞維克反對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組織，孟塞維克正是武裝暴動的反對者，事實上，孟塞維克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並駕齊驅的。

布爾塞維克在三次大會上關於總罷工問題的提出，對於工人階級的鬥爭，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那個時候，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以反對的態度，對付政治總罷工，著名的德國的孟塞維克阿耶爾，甚至說出這樣的話：『總罷工是總昏亂。』他說，『如果總罷工能夠逼迫資本家給出某種讓步的話，那末那時革命已經可能了，可是我們如能完成革命，我們又何須總罷工。』此外，他還指出總罷工所打擊得最厲害的是工人自己。根據這些他就以為總罷工是『總昏亂。』那時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只有極少數

除施蘭好斯特以及以後的盧森堡贊助總罷工的思想（雖然這不是常澈底的）可是他們不懂得把總罷工轉變為武裝暴動的必要。

黨的第三次大會提出，政治罷工以及總罷工是鬥爭手段之一，這種手段在暴動開始以及暴動本身過程能有重要的意義。

布爾塞維克對於羣衆政治罷工的這樣估計是不是得到證明了呢？

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們革命的經驗最顯著的證明了把羣衆政治罷工當作階級鬥爭的手段來運用的事情的正確，特別是如果這種罷工在一定的準備階段上以及在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之下能夠與武裝的工人暴動聯系起來的話。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關於第一次革命的進程和意義的不同的了解，產生他們不同的策略。布爾塞維克在黨的三次大會上聲明，在武裝推翻沙皇政府之後，工人農民的臨時革命政府將能出現；在順利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將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臨時革命政府中去。這種勝利的革命之階級內容是工農民主專政；這種勝利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形式，將是臨時政府。

在三次大會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案上，我們看到：

『根據着力量的對比及其他的因素(這些不能確切的預先決定的)可以容許我們黨的全權代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爲着和一切反革命的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爲着保持無產階級獨立的利益。』

臨時革命政府不是治安的組織,而是戰爭的組織;不僅要摧毀敵人,而且要鞏固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勝利,保證他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

孟塞維克日內瓦的會議上,出來反對工農的臨時革命政府,以及黨的代表對於這一政府的參加實在的,如果像孟塞維克所說的,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資產階級是主要的革命動力並且資產階級應當奪取政權的話,那末工人階級政黨如何能够參加這種臨時資產階級政府呢?孟塞維克對於這一問題回答道:『無論如何不能。』據孟塞維克的意見,臨時政府只能由自由資產階級組織成功;如果工人階級參加臨時政府,那末,他就應當自己負起責任來,工人階級應當實行許多不包括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的步驟,觸犯私有財產的關係;這樣的事,是工人階級不能做的,因爲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工人應當限於『左的反對派』的作用,而且不要過於逼迫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孟塞維克的學說是如此。實際上,孟塞維克在這『左的反對派』詞句之下,隱蔽着幫助資產階級的企求,不許無產階級爭取政權。

孟塞維克裝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姿態,而我們布爾塞維克說:『你們要與資產階級政府合作,

要把資產階級的行動當作你們自己的責任。」在這上面，他們抹煞了這點，就是我們所講的是關於革命的政府，這種政府當摧毀農奴制的殘餘，把民主革命貫徹到底。他們也抹煞了這一事實：就是，這樣的政府只能是勝利的武裝暴動結果所產生的工人農民政府。他們更抹煞了這一情形：就是，自由資產階級是不能澈底的和專制政體及地主鬥爭到底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間的妥協是不可避免的。有時候，在孟塞維克談話中，可以聽到以前阿可塞爾洛夫、蒲列哈諾夫、柴蘇里奇及其他孟塞維克所曾有的對於國家與政府的民粹派無政府主義不正確的觀點。參加政權道不是污了自己，實際上，這正是保護無產階級利益。因為孟塞維克使無產階級的作用成爲資產階級幫助者的作用，當然資產階級需要無產階級不和農民聯盟來取得政權，所以資產階級政黨稱贊了孟塞維克對於爭取政權問題的態度。

孟塞維克提出了什麼來與參加臨時政府的主張相對抗呢？他們提出了什麼來代替工農民主專政呢？他們提出了地方的革命自治。在這上面，孟塞維克表現出他們完全不懂得革命的初步常識，他們認爲可能有地方的革命自治；就是說，在地方上，可以有農民的自治，同時中央的政權機關却仍舊在沙皇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手裏。一切革命的經驗指示出這是以政權爲兒戲，以革命自治爲兒戲。實際上，這種革命自治，至多只能蛻化爲自由資產階級的地方會議。

孟塞維克在這問題上主張的荒謬，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的时候，特別明白的顯露出來。在那時候，工人階級取得了轉到自己方面來的軍隊的幫助，推翻了沙皇政權；孟塞維克開始時把政權交給

資產階級手中，交給克倫斯基、盧蔭古、爾伏夫、密潮柯夫等的政府的手中，以後他們也參加了這種資產階級的政府。在一九〇五年時，他們拒絕參加革命政權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而在一九一七年，他們却和資本家及地主一起參加了政府，參加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

這一事實，顯然的說明孟塞維克對於建立革命政權以及工人階級參加革命政府的意見，是如何的完全的無稽。

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

黨的三次大會，提出了沒收地主的、皇室的、采邑的及教堂的土地之革命的要求，大會責成黨的組織在羣衆中廣大地解釋我們黨是以幫助革命的農民運動爲自己任務的。在這上面，布爾塞維克保持這樣的意見：即是，現在不等到革命的完結，就應當立即在各地建立革命的農民委員會，他們應當以武力奪取地主的土地，實行各種民主的改革。但我們并不像某些人所講的，以爲農民在這門爭中是完全清一色的，是具有完全一樣的利益的。不是的，就在那時，我們早就認爲：第一、『……社會民主工黨既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應當在一切場合下，在一切情況下堅決的企求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並且向他們解釋他們利益和農民資產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同時，我們認爲農村無產階級的這種獨立組織，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和城市無產階級匯合起來。

這樣，我們黨的三次大會，在農民（土地）問題上，給了十分明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綫。在那時已經提出沒收一切作爲剝削與壓榨農民手段的土地。這種要求：在那時，已經指出農村中的革命策略，指出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組織及獨立階級路綫。

對於其他政黨的態度

第三次大會通過了決議要『……用一切努力來聯絡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以配合各地方的工作，並且這樣地來準備統一全部社會民主黨組織，使之成爲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可能。』

應當決定對於社會革命黨的態度。我們在黨的二次大會上已經決定了這種態度，指示出社會革命黨標榜社會主義的旗子，來使工人階級脫離他正確的階級路綫，所以社會革命黨能給革命以損害。可是，社會革命黨那時雖是小資產階級的，但還是革命的組織；他在極大部份知識分子，城市小市民以及部份農民裏面是有影響的。所以我們認爲：『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組織，爲着和專制政體鬥爭的目的成立臨時的戰鬥的協定，在某些場合下，可能是有利的。』可是這上面，應提出下面的條件，『就是，怎樣的協定，無論如何不應當限制社會民主黨完全的獨立性，並且不能破壞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策略及社會民主黨原則的完全性與純潔性。』

黨的三次大會，通過了關於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決議。在這決議內說，我們的黨，贊助資產階級反對

沙皇制度的反對派的革命運動，可是應同時注意到俄國資產階級的作用。因此黨在這上面提出：『向工人解釋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別的反對革命與反對無產階級的性質。』並且『進行有力的鬥爭』——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想把工人運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且代表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個別集團的一切企圖。』

黨的第三次大會上的組織問題

那時候，以及以後，有些人時常責備布爾塞維克說：布爾塞維克是地下黨的歌頌者。就是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保留地下黨，不願利用合法的、公開的行動。這當然是完全不對的，布爾塞維克早在以前就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個機會，一個最小的可能去利用政府機關的每一最小的弱點來組織工人階級。

在一九〇五年，總的情況到了這樣地步，使政府不得不容許『與政府敵對的階級的政治行動之某種自由』。孟塞維克對於這一政治局勢的了解是怎樣的呢？一部份孟塞維克政治上做出結論說，必需一般的取消地下黨，並使整個工人運動適合於現有的公開鬥爭的可能。這就是說，完全放棄推翻專制政體的任務，在政治上跟隨着於資產階級的憲法的志願之後，而把自己僅僅限制於經濟鬥爭，這在實際上，就是孟塞維克在新的環境下所採取的經濟派的路線。

布爾塞維克不是這樣的處理問題。布爾塞維克並不信任沙皇政府的允諾，知道他的允諾是非常

不可靠的；所以布爾塞維克認爲必需保留自己不公開的地下黨的組織，在革命受到摧殘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纔能保留自己基本的力量以及黨的基本的機構。同時黨的三次大會決定：『一、利用每一個公開行動的機會，以便除一般民主要求之外，提出獨立的階級的要求，以便在這種行動的本身進程中，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的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二、利用一切合法的半合法的工人團體，工會，以及其他組織，來保證社會民主黨在他們中間有支配的影響，並且根據可能程度，把他們轉變爲俄國將來公開的社會民主黨的據點。』這就是說，在那個時候，布爾塞維克已經認爲在保留與鞏固地下黨的條件之下，必須而且可能組織工會，俱樂部等等。

列寧在這次大會上，特別熱烈的提出這一思想：就是，必須更多的吸收工人來領導革命運動。黨的三次大會，通過了第二次大會所提出的但是未經通過的黨章第一條的條文，即：『凡是接受黨的綱領，在物質上資助黨並且以親自工作來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得認爲是黨員。』

三次大會在關於宣傳鼓動的特別決議上，着重指出：『應當儘可能的吸收更多覺悟的工人來做運動的領導者，來做鼓動者，宣傳者，特別是來做地方黨的領導機關以及整個黨的領導機關的委員，這一點是有極端重要意義的。』

爲着從工人階級中訓練這樣的領導者，大會指出了許多辦法來把宣傳鼓動提到極大的高度。這些辦法，例如：出版通俗的小冊子，建立巡迴的鼓動者及宣傳者的小隊，出版適當的書籍，並且製定小組

討論的提綱等。

在這上面，那時已經注意到必須出版以農民為目的通俗的文件。

黨的領導機關本身機構也改變了。以後黨的大會，只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從會員中指派中央機關報的負責編輯。黨的最高會議是取消了，中央委員會就擁有再擴大的權力，而成爲黨的真正的領導中心。黨的領導，得到了更大的整齊性和集中性。大會已通過了關於從黨分離出去的部份（孟塞維克）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那時已經指責孟塞維克是經濟派事業的繼承者；他們反對我們黨對於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採取獨立的策略；反對我們黨可能而且需要在民衆暴動中擔負起組織的作用；反對我們黨在任何條件之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這一切都表示出他們是要縮小黨的工作範圍，降低黨的工作程度的企求。

大會又指出必須與孟塞維克進行堅決的鬥爭。在這個決議之外，大會更指出：『以前在某種程度內贊成上述觀點的人，要參加黨的組織必需有下面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承認黨的各次代表大會及黨章，並且全部的服從黨的紀律。』

這樣，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是第一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在這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布爾塞維克革命的策略問題的明確的決議，確定了鬥爭的主要的基本路線，並且使黨的組織有極大的明確性與整齊性。這一大會確定了黨在一九〇五年武裝暴動中的行動路線。這一大會在一九〇五年革

命的地位，正好像斯達林同志領導下的通過極重要決議的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所佔的地位一樣。

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及其機會主義的決議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布爾塞維克在倫敦召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孟塞維克單獨的在日內瓦召集他們的代表會議。這一代表會議決定些什麼呢？當布爾塞維克提出了非常清楚的實際的任務——組織工人羣衆來進行勝利的武裝暴動的時候，孟塞維克却提出了『開放革命』的口號，拒絕組織暴動。當布爾塞維克提出了暴動，人民奪取政權，並且建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府的時候，孟塞維克却以為在這一資產階級革命中，臨時政府應當調劑這一解放國家中的敵對階級的鬥爭，不僅不推動革命往前發展，而且反進行鬥爭來反對那些威脅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那些因素。

這一孟塞維克的路綫，往後就轉為資產階級的直接的附庸，在一切無產階級起來舉起社會主義革命的暴動的旗幟的國家，孟塞維克總是出來作為資產階級的忠實走狗。孟塞維克堅持的說，現在形勢下的任務，要求『社會主義政黨在整個革命的時期，對於一切革命過程中前後交替的政府，保持極端革命反對派的地位；這樣的地位能够最好的準備社會民主黨去利用政權，如果政權落到社會民主

黨手中的時候。』換句話說，孟塞維克主張不要把政權拿到自己手中，他們用一切方法反對奪取政權；同時又莫名其妙的這一政權『將會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知道政權不是從空而降，工人階級只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只能經過武裝鬥爭取得政權。如果資產階級同意把社會民主黨放到政權上去的話，那麼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相信孟塞維克將實現資產階級的意志，將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

同時孟塞維克提出部份奪取政權以及在地方上組織革命公社的思想（關於共和國，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甚至忘記提到了）。列寧特別尖銳的嘲笑了這個思想，列寧寫道：『在某都市裏或某區域裏，部份奪取政權的有利性與參加全國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分別？像彼得堡這樣曾經發生過一月九日事變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都市」中之一嗎？像高加索這樣大過許多國家面積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區域中之一嗎？分散無產階級的注意力與目標，——指導它去作「部份的」鬥爭，而不指導它去作共同的，一致的，全部的和完滿的鬥爭——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幹的事情，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何年何日起開始為他們負責代庖的呢？』（兩個策略）

孟塞維克在暴動問題上，不能逃出生意民主黨人斯脫魯維「解放派」立場的俘虜之外。孟塞維克反對『組織革命』的口號而提倡『開放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別的，僅僅是有機的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先鋒隊的作用，否認黨的領導作用，把黨溶解於階級中，屈服自發的狀態之下罷了。

斯達林同志說：「屈服於自發狀態的理論，決然反對自發運動帶上了自覺的有計劃的性質，這理論反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提高羣衆的自覺，反對政黨領導運動；這理論主張運動中的自覺分子不要妨害運動自己的進行；這理論主張政黨只可追隨自發的運動并附在這運動的尾巴。自發理論是降低自覺分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的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的邏輯的基礎。」（見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孟塞維克否認組織革命的任務，并且反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把暴動看作藝術的學說。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在無產階級政黨能夠領導革命的時候，革命將會得到太過「急進」的勝利。孟塞維克、馬丁、諾夫在兩個戰爭一書內說道：「請讀者設想一下子，如果列寧的空想實現的時候，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假定那種的參加黨員只限於革命職業家的政黨，能夠『準備委派，并實行全民武裝暴動』，這豈不顯明的可以看到，全民的意志，將在革命後立即委派這一政黨為臨時的政府嗎？豈不明顯的可以看到，人民將付托這一政黨而不是別的政黨以最近的革命的命運嗎，豈不明顯的可以看到，這一政黨如果願救贖以前人民所給他的信任的話，那麼就不能不而且必須要把政府拿到自己手裏，并且保持政權，直到他用革命的辦法鞏固革命的勝利嗎？」

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適應，對於太過急進的勝利的革命的害怕（而革命的完全勝利，沒有無產階級的先鋒作用，是不能成功的。同時，這種先鋒作用，更需要無產階級處在戰鬥的堅定的布爾塞維克

黨領導之下，同時又引起孟塞維克譴蔑布爾塞維克爲「勃蘭基主義」、「陰謀主義」、「甲可賓主義」等等的尾巴主義的悲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的馬克思主義與暴動的一文中，列寧這樣寫道：

「他們因爲馬克思主義者把暴動當做藝術看待，所以譴蔑他們是勃蘭基主義者——天下有比這個更可恥的抹殺真理的事情麼？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否認，正是馬克思自己把暴動看作藝術并且非常精確而肯定的解釋過了，他說我們必須把暴動看作像藝術一樣，我們必須獲得首一次的勝利，以後利用敵人的秩序紊亂，從一個勝利轉入別一個勝利，一刻不停的向敵進攻等等。」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秘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底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不澈底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動搖的那個時候，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根據這三個條件，馬克思主義對於暴動問題的立場和勃蘭基主義是不同的。」

當第三次（布爾塞維克）代表大會提出了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去沒收一切地主階級土地的明確提議的時候，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却限制於提出在農民中進行工作的問題。孟塞克不把農民看作

是革命的動力，而看做人民中的許多階層之一。在這階層中，有時候『不妨』進行工作。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反對爲着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委員會之組織，而告訴農民，要他們和平的等待將來立憲會議關於土地問題的決定。

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的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表示出孟塞維克是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機會主義的政黨。他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已經向工人階級傳達資產階級的影響，已經企圖把工人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他們反對革命的前進先鋒隊的革命策略，而企圖把無產階級束縛在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的策略之下，毫無疑義的，孟塞維克依據着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以及城市小市民的信仰，在第一次革命中起了障礙革命的作用，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能力，模糊無產階級的明確路線，并使無產階級的個別隊伍脫離革命的道路；孟塞維克以表面上承認與布爾塞維克一致的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爲掩蓋，而實際上，則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

第六章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進程中布

爾塞維克策略的證實

到武裝暴動之路

一月九號驚醒了全俄千百萬的工人羣衆：莫斯科、波蘭、沿波羅的海區、頓巴斯、高加索、烏拉爾、薩拉托夫區，這些人都是無產階級，農民及民族革命運動最重要的中心。

在這些區域內發生的事件，當時不弱於彼得堡一月的流血慘案。在波蘭、高加索及其他的區域內，不僅工人起來了，農民也起來了。

我們曾經指出，在有些區域內，因為不可忍受的民族壓迫，羣衆的騷動更加利害。沙皇政府企圖阻止這一羣衆運動的發展，但毫無結果。一月九號後，憲兵假借工人的名義向沙皇組織了可笑的請願，沙皇在宮內接待了請願團，講了幾句備極氣憤的話：『我饒恕你們。』這些話只是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憤

怒。爲着表示他們關心工人，爲着要撲滅燃燒起來的革命火焰，政府曾指定了工人問題特別委員會，並以希德洛夫斯基爲主席（即「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

對於這個委員會，我們黨在工人階級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說明離開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工人問題是不能單獨解決的；沙皇政府所組織的任何委員會，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布爾塞維克黨利用從工廠和企業中選舉代表到這個委員會中去的事實來宣傳組織工人階級，並進行反對專制政體的廣泛宣傳。彼得堡布爾塞維克黨的委員會，在選舉大會上，領導着選舉，參加人提出了許多政治要求，以至要求立即召集立憲會議。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自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因爲要實現這些要求，便要推翻專制政體。革命掃除了希德洛夫斯基委員會，政府只好將它正式宣佈解散。因爲工人拒絕選派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

工人運動繼續高漲。二月十八號，沙皇政府想要安定社會中的自由階層，給了農民一點恩賜，組織了所謂「布爾根會議」（布爾根是當時的內務大臣）。這個會議製定了國會的條例，在我們的革命歷史中，八月六號頒佈了大家所知道的布爾根國會條例。根據沙皇的指示，布爾根國會沒有頒佈各種法令之權，牠只是討論性質的組織。實際上工人階級是無法選派代表到這個國會中去的。布爾塞維克黨主張進行積極抵制的政策，利用一切的會議，不是選派代表參加國會，而是用來宣傳和組織羣衆，進行武裝暴動和推翻沙皇制度。自由資產階級是害怕武裝暴動贊助國會選舉的，而克維塞爾則跟在自

由資產階級的後面並且幫助他們，工人是完全被剝奪了選舉權，農民的票數被地主、商人和牧師佔去了。

這個時候，俄國海陸軍在遠東方面的嚴重失敗，傳遍了全俄國，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國的陸軍在奉天會戰中又受到了嚴重的失敗。爲要挽救危局，沙皇政府集中了其餘的海軍派赴遠東；這部海軍，在旅順的海戰中，差不多完全覆沒，一部份的軍艦，爲日軍奪去。這更加深了人民中各階層對於沙皇政府的不滿。

列寧對於旅順的海戰這樣寫道：『俄國的二十艘軍艦和一萬二千人至一萬五千人的海員，在兩天的會戰中，有十三艘軍艦被擊沉和消滅了，四艘被俘，只有一艘軍艦「阿馬斯號」被救出，開到海參威；海員大部份死亡了，海軍司令官洛特芬斯基及其助手列波格托夫都被俘。日本的海軍退出戰鬥後，毫無損傷，只失去了三艘水雷艇。俄國的海軍完全被消滅。』

這時工人的羣衆罷工運動是非常的激烈。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基的罷工，延長到七十二天之久。這時伏士尼辛斯基羣衆的意見，主張建立非黨的羣衆選舉組織——代表大會或代表蘇維埃。

這個時候，在其他工人運動的中心，特別是在烏拉爾，開始產生了工人羣衆的組織，以後這種組織遍及於全國。羣衆的政治罷工，在有些地方變成了同軍隊警察公開的衝突；洛芝的罷工，變成了武裝衝突，街市戰鬥延長到幾天之久；敖得薩的總罷工，是同黑海艦隊第一次革命暴動的時期相配合的。在一

一九〇五年以前，有些地方在軍隊中已經進行過革命的工作，雖然是不夠的。一九〇五年的羣衆運動，提出了在軍隊中，在海軍中進行軍事工作的問題。由於黨進行了這種工作，所以各處都產生了軍事的組織，建立了士兵和海員的印刷機關，印刷了許多告士兵和海員的傳單，在軍隊和海軍的許多部隊中，都成立了革命的小組。遠東的失敗，對於俄國陸軍和海軍的情緒，是起了革命的作用。這一失敗，一方面嚴重的打擊了士兵和海員們的愛國情緒，另一方面證明沙皇政府無力進行作戰。同時，農民運動在全國廣泛的發展，也影響到士兵和海員的情緒，增強了軍隊中的革命情緒和不滿。

一九〇五年夏，「波基姆金」軍艦上的暴動，就是這種不滿第一次羣衆的表示。暴動的海員，嚴厲對付了他們所最不滿意的長官，帶着其他幾艘軍用汽艇，開到了敖得薩。這時敖得薩正進行着總罷工。列寧認爲這次暴動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他特別派遣了尤順同志帶着一定的指示去參加領導這一運動，使他們同地方的警衛隊和農民運動聯系起來。在出發以前，列寧再三對尤順指出：「必須特別注意到農民方面積極的幫助，讓他們奪取地主、教會和其他的土地，號召並幫助他們這樣做。」——在敖得薩現在是這樣的情形，一切革命的力量都須要動員到鬥爭中去。」

當尤順到了敖得薩後，波基姆金軍艦已經開走了，尤順沒有達到與之聯絡的目的。

雖說參加這次暴動的海員和個別的社會民主黨員是英勇果敢，但是因爲沒有正確的領導，暴動終是失敗了。當黑海艦隊和其他的軍艦沒有參加到革命的軍艦方面來時，他是應該開到羅馬尼亞的

海岸，海員應在康斯坦美登陸的。以後落到沙皇政府手中的海員，都受到了裁判，一部是處決了，一部是判決徒刑。這一暴動的事實，是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對於工人農民，特別對於士兵和海員羣衆，更加明瞭更加切實的感覺到了，在暴動的時候，陸軍和海軍，應同工人階級聯合在一起。建立革命的軍隊，是急待進行的問題。

自然，政府同反動的階級並不是沒有抵抗的。他們依着自己的力量，組織和準備抵抗。這個時候，產生了極端反動的組織：「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社」、「阿爾漢格爾團」和「法權黨」。
黑色百人團，進行了各種破壞活動，反對工人和智識分子。這是法西斯蒂組織的前身。

沙皇政府企圖挑起民族愛國主義，民族間的仇視，動員一切黑暗勢力在城市和鄉村中進行反猶太人的活動，在高加索則慫恿韃靼人反對阿美尼亞人，造成這兩個民族間的仇視。

工人爲着自衛不得不開始組織自己的赤衛軍。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這些赤衛軍在準備和進行武裝暴動中是有很大意義的。

一九〇五年春夏的罷工，對於農民運動的影響，恰和對於陸軍和海軍中的影響一樣。農民運動在遣散回鄉的那些參加罷工分子的影響之下是加強了。就是長期在非無產階級勢力影響下的工人，如在莫斯科、佐巴托夫長期企圖誘惑工人階級不參加革命，可是，現在，工人運動使蘊藏着的廣大羣衆的革命力量爆發起來變成了羣衆的革命罷工運動了。在這個時候，各地都開始建立職工會的組織。這個

工作，在開始的時候，在各種智識分子的職業中——工程師、醫生、律師及鐵路郵電的職員中，較有成績。這時的職工會，除保障經濟的要求外，並提出了一些政治的要求。

在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的威脅之下，政府給了學生以一些讓步，允許所謂高等教育機關的自治。學生積極的參加了革命運動，一九〇五年秋，在一切有大學的城市裏，利用着比較自由的環境，打開了高等教育機關的門，召集了人民的大會，工人和城市的的小資產階級開始聽到了很有趣的政治講演。

無產階級反沙皇制度鬥爭的開展，在沙皇政府壓迫下的民族中，引起了民族的革命運動。

布爾塞維克提出的革命口號是：『民族自決權。』在被壓迫的民族中，如工人階級佔着很大的數量，那些地方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就比較的開展。波蘭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開始於一九〇五年，同年的六月間，鬥爭已經進到同警察巷戰的地步了（如在洛茨）。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八月，在波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舉行過同盟罷工，反對對於猶太人的摧殘。在高加索、巴庫、替夫利斯和格羅斯耐的工人，領導了反對沙皇政府的革命運動。一九〇五年正月，特別是六月的政治罷工，包括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反沙皇政府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直接的領導下進行着。

一九〇五年十月的總罷工

九月十九號莫斯科的印刷工人開始了罷工，很快的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印刷工廠也參加了這一罷工。印刷廠的罷工運動，受到了其他工廠和企業的投助；在九月底的時候，莫斯科到庫爾斯基，莫斯科到烏拉爾的鐵道上，發生了罷工運動，在九月間成立的全俄鐵道工會，領導了這一罷工運動。

十月七號在莫斯科鐵道中心，開始了罷工，很快的就蔓延到一切主要的鐵道中心了。郵政、電報、工廠、企業、小職員、學生以及律師、工程師、醫生的聯合會，都參加了這次罷工運動。十月的罷工，遍及全俄，至於最偏僻的區域和最落後的階層都參加了這一罷工運動。工人階級實際上是革命開展的領導者，自由資產階級是落在尾巴後面了。十月的總罷工表示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力量和權威，使得沙皇政府不得不發表所謂十月十七號的宣言。

在十月十七號的宣言中，沙皇政府允許了人民自由的最低基礎：個人不可侵犯，良心，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允許召集立法會議；八月六號，布爾根國會規定，失去選舉權的人民階層允許參加立法會議的選舉。委任維特伯爵為會議的主席，他是當時一般人稱為『狼齒狐尾』的人。他同資本家商量好了，允許國家的借款給他們財政上的幫助。在這個時候，產生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十月黨；在其黨綱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同沙皇政府的妥協。政府對於工人羣衆，進行欺騙的政策，他想表示他是廣大人民羣衆利益的保護者。農民除了諾言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十月二十一號應實行政治的大赦，結果只是部份政治犯的赦免。同時政府却組織了許多黑色百人團的摧殘行動，結果死了數千人，傷了上萬人之多。政府

組織了對於革命者的毒打，對於猶太人的摧殘，阿美尼亞和韃靼人間的仇視，對於學生的蹂躪。

黑色百人團焚燒了幾百人開會的房子。那時有這樣一段歌曲：

沙皇害怕了，將宣言發表；

死者得自由，生者坐監牢。

工人們仍在積極進行組織赤衛軍，他們知道十月十七號羣衆的政治罷工中所得到的初步勝利，須要繼續的努力和繼續的鬥爭，才能最後的推翻沙皇制度。列寧認爲十月十七號的宣言是階級力量某種平衡的結果；當時無產階級和農民，雖說是取得了這個宣言，但是他們還無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也不能用舊的方式來統治了，不得不允諾一些自由。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農民運動

在一九〇五年的正月事件以後，農民運動有了新的發展。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血的星期日以後，大批的罷工工人，遣散到農村去，他們在不滿的、騷動的、和叛亂的農民中，是起了發動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的二月初，在奧爾洛夫和杜拉省，開始了農民的騷動，很快的就推廣到赤爾尼果夫省；由這一省推廣到那一省，由這一區推廣到那一區。運動的形式和鬥爭的方法，差不多同一九〇三一

！一九〇四年時的一樣：搗毀地主的私產，奪取糧食和穀倉，燒房子，砍樹林。春天的時候，開始了『自動的』強迫耕種地主以至教堂寺院的土地，在地主的地方畜養牲口，佔據了地主的草場。這種農民運動在沿波羅的海的地區，在高加索和波爾，在特維爾和薩拉托夫等省特別厲害，並且具有更好的組織性。多數黨的組織，在這中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俄國評論寫道：『社會民主黨人享有很大的同情。他們在各處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會議，進行演講。』烏克蘭社會民主黨組織「斯比爾克」用烏克蘭文出版真、理、報，分出了很多的篇幅登載農民問題的文字。特維爾、波爾托瓦、赤爾尼果夫、耶克台林、諾斯拉夫等省的地方委員會，印發了很多的傳單和宣言；黨的中央委員會，印發了告農民書，我們給農民的話及其他的東西。在農村中組織了會議、遊行、組織了農民小組、區的和省的委員會。一九〇五年的夏天，社會民主黨人在許多的地方組織了農村工人和貧農的罷工。

一九〇五年十月罷工後，『罷工』這個名詞在農民中是很普遍的。

農民運動的另一種普遍的方式，是對地主的抵制。這種抵制是這樣的：農民提出減租，交還土地和草場給農民，改善僱農生活等等要求，在地主未滿足農民的這些要求以前，農民不同地主發生任何的關係。農民常常的停止僱農的工作和役務，在地主未滿足要求以前，則吃地主的飯。

很多的地方，農民搗毀了地主的房舍和產業。一九〇五年秋冬的時候，在十九個省內，據正式的統計，搗毀地主產業的損失，達二千九百萬金盧布之巨。由此可見這一運動的力量了。

地主田莊被破壞的，在薩拉托夫省有二七二處；在坦波夫省有一三〇處；在奧爾洛夫省有八四處；在本薩省有三〇處；在庫爾斯克省有九二七處；在烏拉爾省有二〇〇處；在沿波羅的海區有二六〇處。如果我們留心的話，我們可以看到，農民運動的浪潮是接着城市的工人運動而起的。特別是同着軍隊中和海軍中的暴動互相呼應的。從一九〇六年秋天起，農民運動便大大的低落了；到一九〇七年底的時候，農民運動更加消沉。他們比工人階級的組織性較差，他們抵抗反動進攻的力量比較弱。

一九〇六年所組織的農民聯合會，主要的是在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之下，一部份則在立憲民主黨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部份主要的是富裕的農民。在一九〇五年底農民聯合會多少還起了些作用；在他的中央機關被摧殘以後，就可以看到他是沒有廣大的農民羣衆作爲基礎的。他們內部發生了許多矛盾和分歧，他們企圖聯合農民的各階層，可是富裕的富農的成份則企圖將農民聯合會變爲自己的組織，因此農民聯合會對於事件的發展已經不起什麼作用了。

農民聯合會選派了相當多的代表參加第一次國會，他們是用「勞動社」的名義出現的。這個組織，主要是代表富裕農民的，而不是代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參加革命運動的農民羣衆。

但是我們的黨對於「勞動社」是和對待地主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少數派所希望的立憲民主黨——不同的。我們的黨認爲同「勞動社」可以訂立這種或那種的戰鬥協定，以增強中農貧農在這一組織中的影響，以保證無產階級在這一農民組織的工作上的領導。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號的工人羣衆運動，對於社會的各階級都有了深刻的影響。即或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也了解到國家制度如沒有大的變更，如沒有給工人農民一些讓步是無法熄滅爆發着的革命運動的。代表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地方會議的代表與城市中的政治行動家及部份的資本家，甚至地主，在革命事變的威逼之下（而不是在自由主義宴會上的少數派講演的影響下），向沙皇呈遞了許多政治經濟改革的意見和方案。他們階級的利益，他們阻止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的企圖，決定了一九〇五年二月地方會議的莫斯科大會的決議——用收買方法分割土地給農民。（當時的有名口號是『分割土地給農民，否則他們要宰割我們了。』立憲民主黨政綱有名的一條是『依公正的價格收買。』自然所謂『公正』只是有利於地主。）這同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的會議比較，自由資產階級是進了一步，提出了選舉權的要求。工人階級的進攻，使得他們『左傾。』

俄國的海軍在旅順被日軍擊敗後，一九〇五年六月六號，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團，共有十四個代表，入宮覲見沙皇。自由資產階級，憲法的贊助者說：『皇上快點罷在人民嘗試的緊急關頭，我們在上帝和俄羅斯的前面是負了責任的。』這一無恥的代表團，認爲沙皇和自己應對祖國的命運，對上帝負責，所

以入宮覲見，以求同沙皇政府進行某種勾結；這種勾結也是立憲民主黨政綱中的一條。不要共和國，不要土地歸於農民，甚至也可用兩院制，以便那些『先生們』能夠在上議院中指揮一切。列寧對此寫道：『無產階級在鬥爭着，資產階級則在竊取政權。』

在十月的時候，自由的和保守的資產階級成立了這種勾結，組織了『十月十七日黨』。自由的和保守的資產階級，非常害怕革命的勝利，他們準備同萬惡的沙皇政府妥協，以保證資產階級的程序。在十二月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的資產階級瘋狂的頌揚俄國工人第一次暴動的鎮壓者——杜巴索夫大將。

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態度，完全證實了布爾塞維克黨對於俄國自由主義的估計。自由資產階級中比較民主的一部份，『聯合的聯合』，參加着智識勞動者、工程師、醫生等。這一部份在一九〇五年參加了革命運動，其中的右派則同反動政府成立了直接的妥協。自由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運動的恐嚇，完全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本質。

以後事變的發展，更多的證明布爾塞維克黨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策略的正確。

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蘇維埃的意義

一九〇五年夏，在各大工業中心，就產生了蘇維埃。在十月事變最開展的時候，在十月的上半月，產生了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參加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有智識分子聯合會的代表——工程師、醫生、律師等；也有不少的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代表。在事件的發展中，牠起着革命的作用，首先因為他是國家首都和最大工業革命中心的工人代表蘇維埃。

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領導了彼得堡的政治總罷工；以革命的手段實現出版的自由，開始出版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宣佈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十一月二號，在如下的口號之下進行了政治的罷工：『打倒軍事法庭。』『打倒死刑。』『取消波蘭和全俄的軍事戒嚴。』

因為黑色百人團和政府方面企圖與準備摧殘這一運動，所以彼得堡的蘇維埃號召羣衆起來組織自衛的武裝赤衛軍。這種行動，阻止了彼得堡黑色百人團所準備的摧殘。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號召羣衆抗租，不繳付收贖土地的價錢，提出了以現金支付工資和薪俸的要求，號召羣衆收回儲蓄銀行的存款，協同組織職工會，並組織失業工人委員會。蘇維埃以後的繼續存在，祇有一個作用，就是要變成暴動的機關。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未敢利用彼得堡軍區軍隊的革命情緒，他們對於軍隊的工作注意很不够。在開始的時候，托洛茨基所提出（當時他是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命令軍隊退出彼得堡』的口號是不正確的。可是在其他的城市裏面，如在莫斯科，產生了工人士兵的代表蘇維埃，他們起了更大的革命作用。在後貝加爾區，甚至產生了工人士兵和哥薩克的代表蘇維埃。

斯達林同志對於工人代表蘇維埃說了如下的話：『……一九〇五年出列寧格羅和莫斯科工人所開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運動，將要引導到粉碎資本主義和現實社會主義在世界六分之一領土上的勝利。』

在沙皇政府機關的所在地，彼得堡，組織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對於其他革命中心的蘇維埃的組織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是，沙皇政府也不能長久忍耐在自己的政府機關的旁邊存在着另外一個機關，這一個機關，將要逐漸成爲革命政權的機關。因此沙皇政府採取了一切的辦法來摧殘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莫斯科，十二月暴動前夜，當其他各地工人農民和軍隊中的革命運動大大發展的時候，沙皇政府就實行了這一摧殘。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內，軍隊和海軍中革命運動的重要事實和其他的革命事件，略舉如下：

十月十九號

在西非史托波爾的羣衆大會上，從人民中選舉了代表蘇維埃。在彼得堡，巴庫，塔什干，烏法，基也夫，本莎和耶朗德林堡，屠殺示威羣衆；在克西尼夫，羅姆那黑，諾夫哥洛特，薩拉托夫，布多爾斯克，尼古拉也夫，啓良賓斯克，可斯特洛姆等城都受到了摧殘。

十月二十號

在莫斯科舉行保曼出殯的遊行，在西非史托波爾安葬死難烈士葬儀上，海軍大尉史米特作了演講。在托姆斯克的黑色百人團在省長和教堂的

幫助下，焚毀了鐵路工人的會場。

十月二十一號 宣佈赦免政治犯，同時對於人民進行了新的屠殺和摧殘。

十月二十三號 在依凡諾夫，黑色百人團打死了無產階級的領袖阿芬納西也夫。克羅斯
坦士兵和海員的示威大會。

十月二十五號 有梯夫里斯的總罷工；托姆波夫斯克和薩拉托夫省的農民武裝暴動。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七號 有克羅斯坦士兵和海員的暴動。

十月三十一號 以革命的手段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在工廠內準備武器；沙多威士
兵和海員的騷擾。

十一月一號 彼得堡的蘇維埃在第十次會議上議決宣佈彼得堡的總罷工。

十一月三號 有海參威海員後備隊的變亂。

十一月四號 有黑海艦隊的動盪。

十一月八號 在西弗史托波爾有奧霍司夫軍艦上的變亂。

十一月十號 有海參威士兵的變亂。

十一月十三號 有黑海艦隊內的暴動；巴統士兵的示威大會。

十一月十五號 黑海艦隊暴動被鎮壓。

十一月十六號 在西弗史托波爾放棄了海軍營舍。

十一月十七號 發生中亞細亞鐵路的總罷工，表示反對塔什干城對於革命士兵的屠殺；

發生哈爾可夫工人和士兵的武裝遊行；發生基也夫工人和士兵的遊行；

在蘇霍姆、瓦沙、阿史特洛倫克和弗爾可非斯克等地士兵發生騷擾。

十一月十八號 在基也夫、里格、巴蘭洛維奇、弗龍尼熱等處軍隊中發生騷擾。

十一月二十號 在薩馬拉、可史特洛姆、哈爾可夫、亞歷山大洛夫斯克和弗拉杰卡夫奇，

產生了工人代表蘇維埃。

十一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郵電聯合會大會領袖被捕。梯夫里斯發生軍事騷擾。

十一月二十二號 在赤塔成立哥薩克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普斯可夫士兵中發生騷擾。

十一月二十三號 鐵路工人大會，向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如果不取消砲壘官枯士加克、工程

師蘇可洛夫和其他革命運動參加者的死刑，全鐵路綫在晚八時一律停

車。政府取消死刑的判決。

十一月二十四號 有波羅的海區的海罷工；赤塔工人和哥薩克士兵的遊行。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號 在列費爾、尼阿拉也夫、洛斯托夫，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普布

魯斯基監獄的暴動。

十一月二十六號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洛薩爾被捕，莫斯科哥薩克的示威要求派遣回鄉。在依爾庫茨克選舉軍事罷工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九號

有彼得堡的布列阿不拉辛斯基步兵團和勳盪，依爾庫茨克士兵選舉長官。

十一月三十號

杜枯姆和暴動。

十二月一號

莫斯科尼斯基步兵團中的勳盪。

十二月二號

莫斯科第二洛司托夫步兵團的勳盪。

十二月三號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委員被捕。

在這個時候，農民聯合會更加積極活動，他們號召農民參加工人階級的鬥爭，到處都爆發着工人、農民、士兵和海員的暴動與騷擾。在這個情況下，政府發佈了命令，解散各地蘇維埃的組織，逮捕革命組織的指導者，主要的是全俄農民聯合會的委員會，特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政府對於罷工和社團的組織，頒佈了許多懲治的法規，摧殘了許多的組織，發下了凶橫的命令，無情的蹂躪暴動的羣衆。被摧殘的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還企圖號召工人的政治總罷工。但是這是已經過去的階段了，運動進到了暴動。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對於蘇維埃已經有了正確的估計，反對以蘇維埃為

兒戲；孟塞維克派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時，在許多地方便是這樣做的。以後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在俄國、德國以及其他的國家，孟塞維克派企圖將蘇維埃變成無權的國會或是國會的附屬品。

一九〇五年時，布爾塞維克黨已經看到蘇維埃是暴動的機關，他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的雛形。孟塞維克派則認為蘇維埃是地方自治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時，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對於蘇維埃不同的態度，隨着蘇維埃內布爾塞維克派孟塞維克派數量的不同而不同地影響到蘇維埃的活動。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蘇維埃，便是組織暴動的機關，是工人士兵海員暴動的野戰司令部；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便準備了武裝暴動。一九〇五年夏天，在烏拉爾許多的地方都組織了工農代表蘇維埃。黨經過蘇維埃領導了烏拉爾工農的羣衆運動；布爾塞維克黨在西伯利亞、遠東領導了蘇維埃（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赤塔、海參威、哈爾濱）；在南俄也有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的蘇維埃。當時蘇維埃已經起了黨同羣衆聯系的輪帶的作用。當時孟塞維克派想把蘇維埃變爲無權力的『自治機關』，可是，當時的政權却是在沙皇政府的手裏；布爾塞維克黨企圖將蘇維埃變成無產階級與革命農民奪取政權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暴動

沙皇政府同一部份自由資產階級訂立了妥協（所謂「十月十七號聯盟」）以後，沙皇政府便轉到堅決的反攻。這個反攻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暴動的根源，革命運動的根源遍及全國，暴動是更加頑強了，他們取得了更多的羣衆，得到了工農羣衆更大的同情。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被解散，農民聯合會總委員會委員被捕，在許多農民暴動的省份，都宣佈了軍事戒嚴，凶橫的命令：『捕盡所有的人，』不要愛惜子彈，』逮捕一切革命運動的領導，解散一切蘇維埃和罷工委員會。這樣，在無產階級的面前，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或是不戰而退，放棄從困難犧牲中所取得的一切，走到地下去；或是繼續戰鬥。莫斯科的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是與廣大的工人羣衆有着密切的聯系的，他們積極的準備了武裝暴動。莫斯科蘇維埃估計工人階級大衆的意志，他們在十二月五號和六號許多的大會上，都通過了宣佈政治總罷工的決議，並使其變爲武裝暴動。

莫斯科的無產階級在暴動的開始時，有了自己戰鬥的組織，約有一千人的赤衛隊，其中大半是布爾塞維克黨員。在莫斯科許多的企業中，都有赤衛隊的組織，在拍萊斯尼布的斯基區，在史米特工廠，布魯赫洛夫克，綏金印刷廠，庫世納列夫廠，在拉爾廠，列諾米工廠，在莫斯科至卡薩的鐵路上以及在其他企業中，都有赤衛隊的組織，在工人階級壓迫之下，孟塞維克派做出採納戰鬥口號的樣子來參加組織赤衛隊，其實他們以後後悔了，躲開了十二月暴動。拉林（當時的孟塞維克派）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會議上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時候，『可惜孟塞維克派沒有照着自己的意見作。』此地必須指出，

關於暴動的問題，在莫斯科並不是在狹小的範圍內決定的，而是在工廠的羣衆大會上，工人自己表決通過的。大多數都贊成暴動。宣佈政治總罷工以後，參加的羣衆，日漸增加，不僅是工人，職員也有。可是罷工終究沒有做到全部的總罷工。彼得堡對於牠的幫助是不充分的，一開始，暴動勝利的機會，便爲之減少。尼古拉鐵路（莫斯科至彼得格勒），仍在政府的手裏；交通沒有停止，使政府能將軍隊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來鎮壓暴動。莫斯科的衛戍部隊是動搖過。在暴動以前，洛斯托夫的雷彈團及其他軍隊，都有過革命的發動。在暴動開始的時候，特別估計了這些部隊的援助。

現在所公佈的沙皇政府機關的紀事，證明政府在暴動開始的時候，是如何驚慌失措。政府恐怕莫斯科失守，政府覺得彼得堡也不可靠，害怕將軍隊派出彼得堡。十二月十號開始了街市戰，莫斯科築成了兩道圓圈的障礙物。沙皇政府不惜用砲火射擊首都，政府指揮下的軍隊，比暴動者多好幾倍。直接參加暴動的有幾千工人，其他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都表同情並贊助暴動。直至十二月十九號止，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暴動的指揮機關，在戰鬥開始以前，一部被捕，一部被隔絕。武裝的發動，變成了個別地區的暴動。他們互相間沒有聯繫，沒有統一的指揮中心，沒有製定嚴格的戰鬥計劃。暴動的地區，主要的是進行着防禦，這便是暴動弱點的來源及其失敗的部份原因。列寧在當時這樣指出過。特別凶橫的謝米諾夫的步兵團，他用他的主力進攻暴動主要堡壘——紅帕英斯尼。最好的赤衛軍都集中在這裏，謝米諾夫指揮。不管暴動的工人是表示了如何的英勇，莫斯科的暴動終於是被鎮壓下去了。莫斯科的暴動，並

不是孤立的，在其他區域的許多城市裏，也發生了革命的暴動。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沃爾斯、諾伏露西斯克、西弗史托波爾、克薩斯塔特等地都有武裝的發動。在沿波羅的海區（拉特維亞）在格魯西亞和耶加基林鐵道區的鬥爭，特別激烈。有些地方是武裝自衛的性質；另一些地方，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目的是在推翻沙皇政權。

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對於這次暴動有怎樣的估計呢？

孟塞維克派中的蒲列哈諾夫，在武裝暴動以後，埋怨黨說：『不應該拿武器的呵！』孟塞維克派對於這次暴動所發表的彙集的材料，證明說，在莫斯科所發生的並不是人民的暴動，因為參加鬥爭的僅僅是赤衛軍；整個工人階級並沒有參加暴動，因為工人階級僅僅是要為『自己的』口號而鬥爭。這樣的事實——即約有六千的工人只有破舊的槍，好幾天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同着全副武裝的敵人鬥爭，這事實，孟塞維克派認為不能是武裝暴動。他們多方的鄙視嘲笑暴動，證明暴動的方法是無希望的空想的鬥爭方式。

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暴動是另外一種意見。他們認為莫斯科武裝暴動的經驗，證明了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勝利是可能的。無疑的，莫斯科暴動，各方面說來，準備都是不夠的。寧在回答蒲列哈諾夫的『不應該拿武器呵』的非難時，這樣寫道：『相反的，應該是更堅決更積極的拿起武器來。應該向羣衆說明，僅僅靠着和平的罷工是不可能的，必須進行堅決無情的武裝鬥爭。』

列寧在許多的文章中，指出了這次暴動的重大意義，並說明暴動組織上的錯誤和缺點。他一再的指示我們，應該詳細的研究這次暴動的經驗。列寧斥責蒲列哈諾夫機會主義的可憐的才幹。他這樣寫道：『我們「革命的克魯包特金派」所遵守的法規是：給多少拿多少；要打你就應該跑；已經被打了，這算不了什麼，用不着拿武器。』

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列寧估計莫斯科暴動意義的時候，激烈的反對過孟塞維克派對於一九〇五年偉大革命運動的估計。列寧指出了十二月暴動的結果，無產階級所得到的教訓和進行武裝暴動中所犯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缺乏暴動的組織性。例如莫斯科所發下做障礙物的訓令，很遲以後才傳到各區去；那時在中央區已經做好障礙物了。

『我們是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我們是不高明的指揮官，自己的隊伍配置不當，使大部份的隊伍不能積極的參加作戰。工人羣衆四出找尋，但未找到積極行動的訓示。』

十二月暴動的另一錯誤，便是我們爭取軍隊的工作不夠。

『在真正的民衆運動中，軍隊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在革命鬥爭尖銳化的情況下，必須認真的爲爭取軍隊而鬥爭……必須大胆的直接公開承認，在這一方面，我們是落後於政府。我們未能利用我們現有的力量，進行勇敢積極的大胆直前的鬥爭，爭取在沙皇政府指揮下的

動搖的軍隊。」

第三個錯誤，便是我們沒有轉為堅決的進攻。

「十二月暴動，很明顯的證明機會主義者深刻的忘記了馬克思的意思，即暴動是藝術。這個藝術的主要規則，是堅決果敢，勇往直前的進攻。我們對於這種真理的了解是不够的，我們一定要進攻，這原則我們學得不够，對羣衆也沒有教好。」

列寧指出莫斯科暴動，提出了新的巷戰的戰術，這是游擊戰爭的戰術。

「莫斯科提出了這個戰術，但沒有大的發展。沒有推廣到廣大的羣衆中去。赤衛隊的數目還少，工人羣衆沒有得到勇敢進攻的口號，沒有採用這一口號。游擊隊的性質是太單純了，他們的武器和作戰方法都很差，他們只會領導着成羣的幹，差不多不知道散開。」

根據這些教訓，列寧作出如下的結論：「將來要廣泛的開展我們的工作，勇敢的提出自己的任務，了解俄國革命偉大時期的教訓。」列寧號召準備新的暴動。

列寧說：「我們要記着，偉大的羣衆鬥爭，正日益逼近，即武裝暴動將要到來。他們將可能是同時到來的。羣衆應該知道，他們將要參加武裝流血的絕望的鬥爭。不怕犧牲的精神，應傳遍到羣衆中去，這樣才能保證勝利。應最堅決的進攻敵人，羣衆的口號應該是進攻而不是防禦，無情的消滅敵人，這是他們的任務。鬥爭的組織要機動靈活，軍隊的動搖分子將被吸引到積極的鬥爭方面來，在這一偉大的鬥爭

中，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執行自己的使命。」

黨對於國會的策略：抵制國會，撤消抵制

我們已經知道布爾塞維克黨曾號召抵制布爾根的國會。而當時孟塞維克派認為，可以利用選舉，參加國會，執行資產階級的政策，使工人階級放棄革命鬥爭的方法，在工人階級中進行欺騙。以為參加布爾根的國會選舉，多少總能給工人階級一部利益。

在進行選舉以前，革命便剷除了布爾根國會。一部份的孟塞維克派在工人階級革命的壓制之下，逼得向左轉了。

十二月暴動，使政府不得不實行部份的讓步。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號發佈的指令，『儘可能的使人民中的各階級，過去沒有選舉權的，吸收參加國會。』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號，發佈了國會新的條令。革命運動的發展，使得沙皇政府改變了他的選舉法，造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好像國會可以使行立法權似的。十二月的暴動，引起了許多法律上的變動，證明沙皇政府企圖鞏固這個時候新的力量的比重，製造出這樣的憲法，能夠幫助沙皇制度，維持他自己的基本陣地。一九〇六年三月四號出現了集會自由的法令，這一法令也是在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中取得的。但是並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要求，因為

根據公佈的這一臨時法令，一切團體和組織存在的決定權是在地方警察的手裏。這些團體組織，祇在不爲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時候才能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一切法令，證明革命情緒低落和革命浪潮下降；但這並不是證明工人階級完全被征服下去。其實，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準備繼續的鬥爭，那麼，反動的到來，將要更早更嚴重。雖說十二月暴動被鎮壓下去，在沿波羅的海區、波蘭、高加索、西伯利亞、俄羅斯中部都有殘酷的鎮壓；雖說公開的報紙被封閉，許多罷工委員會委員被捕，蘇維埃的解散和被捕，但是一九〇六年初的革命運動，自然證明工人階級革命毅力的激昂與奮勇。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決定對於國會態度的問題。當時布爾塞維克黨是宣佈抵制國會的；而孟塞維克派是主張參加國會第一級第二級的選舉。那時選舉不是直接的而是三四級的，工人用不着打算從非工人區中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來。工人們組織成爲專門的工人選舉區，每個工廠企業中，在一百工人以上者，可以選舉出一個代表；在大的工廠企業中，每一千人選舉一個代表；由代表中選出候選人來。在每省的選舉大會上，工人中只能有一兩個候選人，而其他階級和階層的參加人却有百人之多，這就是新的維持的國會。依照這個法律，下面的人無選舉權：

苦丁伊仁

一、二、三〇、〇〇〇人

建設工人

二、六八、〇〇〇人

社會的商業的機關之工人	一六五、〇〇〇人
運輸鐵路電車水手工	二七六、〇〇〇人
四十九人以下的工廠企業工人	二〇三、〇〇〇人
合計	二、一四二、〇〇〇人

這樣看來，男工中六三%無選舉權，至於女工，那就更不用說了。

孟塞維克派提議一半抵制國會，而不是到處抵制。他們說，應該利用整個選舉運動及工人選舉區，讓工人選舉代表，讓代表選舉候選人，然後候選人應該宣言抵制這樣的國會，要求變更選舉法。布爾塞維克黨認為在當時，羣衆的革命運動，還是走向更堅決的鬥爭方式，當時能夠組織工人階級的新的更有力的暴動，這時如果把工人的注意引到維持國會選舉上去，那是有害的。

自由資產階級想削弱羣衆的革命運動，反對武裝暴動，企圖使羣衆相信改良的道路可以使得現制度進行一些改革。孟塞維克派是贊助這種立憲幻想的。

布爾塞維克派堅決反對對於國會立憲的幻想，反對認為國會能够改變俄國現存政治制度或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這種幻想。布爾塞維克派抵制第一次的國會，同時揭破了這種立憲的幻想。

抵制的政策是布爾塞維克派建議的，大多數的組織，都同意這種辦法。但是有些地方準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被選到國會，特別在高加索，因為那裏的社會民主黨依靠了小資產階級。

第一次國會，按他的成份和政策說來，是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性質。但是我們不應該這樣想，以為布爾塞維克黨是消極抵制第一次國會的，布爾塞維克派所主張的是積極的抵制。在通過抵制國會的會議上同時決定利用選舉運動的時機，進行最廣泛的宣傳，組織各種的羣衆大會，儘可能的參加選舉大會，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召集立憲會議來反對無用的國會；在這些會議上，號召抵制國會，並通過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決議，同時在國會選舉的那天，組織無產階級公開的行動，舉行各地的政治罷工，遊行和示威。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時關於抵制國會的經驗，這樣寫道：『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抵制的辦法，在一九〇五年是正確的，成功的，而在一九〇六年是錯誤的。先來分析前一情況，我們看當國會外羣衆革命行動（特別是罷工）非常迅速發展的時候，當無產階級和農民中沒有任何一個階層給反動政權以支持的時候，當革命的無產階級影響着廣大的和落後的羣衆，來進行罷工的鬥爭和土地運動的時候，阻止反動政權召集反動國會的目的是達到了。』

因此，列寧認為抵制布爾根的國會選舉是正確的，是有利的；而在十二月暴動失敗後抵制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國會的選舉是一個錯誤，雖說是『容易改正的錯誤。』

第一次國會，當其討論到統治階級地主利益的時候，當農民勇敢起來講話的時候，即當一九〇六年七月，便宣佈解散了。

現在又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對於國會新的選舉，繼續抵制的政策是否適當？不完全抵制第一次國會的經驗和廣大人民羣衆對於憲法的幻想，希望經過國會能夠得到政治上自由的情緒以及羣衆革命運動的相當低落，使得我們的黨，不能不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重新討論抵制的問題。結果決議參加第二次國會的選舉。情況已經變動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參加第二次的國會了。

布爾塞維克派參加當時國會的選舉，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意見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是像機會主義者那樣誘惑羣衆，說經過國會代表的選舉，工人階級能夠取得部份的政權。布爾塞維克所看到的，是利用國會的講台，能夠同羣衆聯系起來在羣衆中進行革命的宣傳，從國會的講台上宣傳布爾塞維克黨的主張，擁護自己的政綱和策略。布爾塞維克黨反對孟塞維克派立憲的幻想；同時反對國會另外的一種傾向，以爲工人階級一般的不應該參加任何資產階級國家內所組織的代表機關，而應該完全抵制國會的選舉。他們對工人階級指出，在這種抵制的言詞後面，隱藏着自動取消政治鬥爭，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方面去的觀點。

在第二次國會的選舉中，布爾塞維克認爲祇有和那些承認武裝暴動，承認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政黨才可以成立妥協，這種妥協，僅限於提出共同的代表名單，對於社會民主黨政治宣傳的獨立性，不能加以任何的限制。

對於工人階級，布爾塞維克認爲必須無條件的獨立行動，不允許同任何的政黨妥協。

孟塞維克派提出另一種策略。他們認為抵制第一次的國會完全是錯誤的，同時也主張參加第二次國會的選舉。可是，他們號召參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國會，不是爲着利用國會的政治講台，而是爲着參加國會的工作，爲着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會中，進行有機的工作。因此孟塞維克派一方面告訴工人說，布爾塞維克黨『農民化了』，差不多要變成人民黨；在另一方面，他們關於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本質，給與工人以完全錯誤的了解，把自由資產階級形容成爲無產階級在同反革命鬥爭中的同盟者。

布爾塞維克黨，却認爲革命的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孟塞維克派却推開了這個力量和這個主要的同盟者，而想把工人階級變爲立憲民主黨的附屬品。列寧曾不止一次的指出：布爾塞維克黨同孟塞維克黨的基本區別，就在他們對於那些參加國會和在國會內鬥爭的各種力量，採取不同的態度。對於第一次國會的解散和第二次國會的選舉，列寧在他所寫的告選民書的草稿上說：『抵制國會是在企圖剝奪蹂躪者的召集人民代表會的事業，是警告人民不要相信空頭支票並號召爲真正的政權而鬥爭，抵制未成功是因爲自由資產階級背叛了自由的事業。』

抵制國會的時候，當時還有新的武裝暴動的希望，參加國會選舉時，力量的對比已經變動，革命高潮很快的到來是沒有希望了。這是布爾塞維克黨對國會的策略。我們的黨認爲在這種和那種的情況下對於國會的策略，應該服從於黨的一般策略，服從於國會外的鬥爭。

我們主張工人選舉區應提出單獨的名單來，不同任何人聯合，只有在高級選舉的時候，才允許同

代表革命農民的政黨妥協。

當羣衆準備暴動，許多的地方都進行着巷戰，這時利用選舉，把羣衆從直接的革命鬥爭中引開，兒戲式的參加國會選舉，並且還帶上許多附帶條件，這就是孟塞維克派對於布爾根國會和第一次國會的策略。

孟塞維克派在其給第四次黨大會的決議草案中寫道：『國會是政治活動的中心，是革命運動的出發點。』

布爾塞維克派在放棄抵制國會以後，從沒有站在這樣的立場上說話。因為雖是資產階級的最好的國會，也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罷了。這時孟塞維克派的策略，是同立憲民主黨聯盟，同自由資產階級聯盟，同保守的資產階級聯盟。兩種策略，是有天淵之別的。

我們的策略，歸結爲如下數點：

一、我們已經看到，當革命運動猛烈發展的時候，那時集中注意力於國會的選舉，會使羣衆離開直接主要的任務——準備武裝暴動。而國會選舉的條件，又完全不利於組織羣衆，在這些條件下，布爾塞維克主張抵制國會的。那時參加國會選舉將使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加深欺騙的幻想，以爲國會能够解決某些比較激進的問題。

布爾塞維克黨雖是抵制國會，但不是原則上反對參加一切國會。在必要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

黨自己會組織工人階級參加國會的選舉，用自己的策略或國會內的黨團，同一切其他的黨派其他的國會黨團相對抗。我們以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去了解我們在這個雜亂的國會（如俄國工會）中的作用。我們參加國會為的是進行革命宣傳。超越國會中大多數資產階級政黨的頭上進行宣傳。我們為的是利用國會的講台進行我們的宣傳和組織羣衆。

二、我們參加國會的合法的工作，同時在軍隊中，工人階級中，農民中進行秘密的革命宣傳，參加國會只是幫助我們這些工作而已。

三、關於在羣衆革命鬥爭時期奪取一部份私有財產的問題，我們認為要保證政治鬥爭的勝利，農民沒收和奪取地主的土地，奪取敵人的武器和財富，原則上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四、當革命低落的時候，我們能夠善於適應新的條件來改變我們的策略。我們在任何的條件下不放棄我們基本的任務和我們革命的政綱；在任何困難的條件下，也不放棄我們的秘密工作。

布爾塞維克黨的戰略和策略，就在於他善於在革命高漲時，高度的發揮起自己的力量，在消沉時，善於機動，善於保持戰鬥力，保持和鍛鍊黨內的基本幹部，領導羣衆的革命鬥爭。

第一次俄國的革命和以後的事變，都充分證明了布爾塞維克黨戰略策略的正確性。

第七章 十二月暴動及反動時期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第一次泰米福爾大會

我們知道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的分歧，是很深刻的。形式上是當時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兩個派別，其實，自從第二次黨大會以後，就是兩個獨立的政黨了。列寧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在九十年代的時候，當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進行鬥爭及以後同經濟派進行鬥爭的時候，布爾塞維克主義便種下了根基。

自從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塞維克主義便是政治思潮中獨立的派別和政黨了，牠是從堅固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上長成的，牠是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當我們在倫敦舉行第三次黨大會時，孟塞維克在日內瓦單獨的召集了

會議，實質上就是孟塞維克的大會。列寧說那時的情形是『兩個大會，兩個政黨。』

但是應該指出，參加鬥爭的廣大工人羣衆，還不是完全的時常的瞭解分歧的本質，他們有時候以爲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爭論是小事，因爲兩者的任務都是一致的。他們以爲這種形成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獨立存在的分歧，是因着小事而發生的不必要的爭論，使得在需要行動的時候，工人階級受到分裂，受到削弱。對於黨綱的問題，他們也沒有弄清楚，以爲布爾塞維克黨和孟塞維克黨的黨綱都是共同的，因爲都是叫做社會民主黨。因此參加革命鬥爭的廣大工人羣衆，都要求統一。

列寧會寫道：『大家都知道，絕大多數的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是很不滿意黨的分歧而要求黨內統一的。』（列寧論黨的改組）

這種統一，或如我們現在所說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事變的發展所要求我們做的。

在第四次（聯合的）大會以前列寧寫道：『軍事戒嚴，屠殺和處決，罪犯滿獄，無產階級的飢餓與貧困，許多秘密組織的破壞，造成了組織上的混亂，公開活動不能存在，以及與恢復黨的統一的困難問題相聯的策略的爭論——這一切情形不得不使黨的力量相當的分散。脫離這種狀態的形式的辦法，就是召集黨的聯合大會……』

在第四次大會以後，聯合大會的布爾塞維克代表致全黨書會說：『因爲當前人民鬥爭的嚴重的和決定的事變，所以建立全俄及各民族中先進無產階級行動的統一，是更加重要了。』

我們同孟塞維克一起開了會，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放棄了布爾塞維克黨的政綱和策略。我們共同開會，正是爲的在全黨的前面，明白指出我們觀點的不同，揭穿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在第四次聯合大會以後，列寧寫道：『大會重大的理論工作，是在更明確更具體的分別了社會民主黨的左右翼……聯合大會作了許多工作，寫了很多文件材料，明確的指出了什麼是我們的一致，什麼是我們的分歧，分歧到了怎樣的程度。』（列寧關於聯合大會的報告）

革命事變的發展，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日益相信布爾塞維克黨的策略，而孟塞維克只是在小資產階級中得到了一些成績。因此一九〇五年下半年，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者所決定的明確的路線是：爲着同孟塞維克影響之下的工人建立統一戰線，爲着要爭取他們，所以贊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認爲『統一』只是說服工人的方法，使工人相信，只有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是唯一正確的革命鬥爭的道路。可是列寧常常說，雖然我們在形式上是聯合的，但是我們應當分別清楚，應當明確規定自己獨立的路線。

革命開始向上發展，列寧利用了最初的可能回到了俄國，並且在彼得堡領導了一切的工作（當時他秘密的住在芬蘭）。蒲列哈諾夫仍在外國，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日寫給蒲列哈諾夫的信上說：『——你的豐富的知識豐富的政治經驗，是俄國無產階級十分需要的——這能够創造出新的基礎，將舊的拋掉來進行活的事業。你從日內瓦回到彼得堡來工作，在精神和在黨的方面，都是很好的

轉變，由分裂轉為統一，我很希望我們不要放過了這個時機，從二次大會以後從沒有過這樣的好機會，或者在最近也不會很快的有這種好機會。」

但是直到二月革命的勝利，蒲列哈諾夫還是留在外國未回，甚至於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和二月革命的前夜，他還是公開的起了社會愛國主義的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時，爲着建立革命中的統一戰線，爲着要爭取那些不了解孟塞維克領袖和機會主義實質的工人們到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來，需要進行聯合的大會。布爾塞維克在十二月暴動開始以前的這個時候，用盡了他一切的力量（有許多中心組織的代表被阻）在芬蘭的泰米福爾召集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代表會議，並定下了統一的方針。代表會議決定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孟塞維克的組織委員會以及其他中央文化機關，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併起來。應立即召集黨的聯合大會，組織這些統一的中央機關。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決定黨應該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實行普選的原則，而在理論上和實際工作的領導上，給與所選的中央機關以進行工作的全權，同時進行定期的改選，普遍的監督和工作詳細的報告。

這次會議，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依列寧的意思，這次會議，實質上是在各派聯合大會之前的第四次布爾塞維克黨的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斯達林同志起了極大的作用，他是高加索布爾塞維克黨的出席代表，當時他已經是高加索布爾塞維克的領袖，並且是黨內有名的「堅

頓」的布爾塞維克。

斯達林同志回憶他在泰米福爾的大會上第一次同列寧的見面，這樣寫道：

『列寧在這次大會上有兩篇極動人的演說，一個是關於目前的形勢，一個是關於土地問題。可惜原文都未保存。這是極動人的講演，引起了大會全體的歡呼。偉大說服的力量，簡單明瞭的論證，簡短明白的詞句，沒有閒話，沒有誇大的詞藻，也沒有空洞的語句，這便是列寧演說與其他國會演說家大不相同的地方。』

『列寧的演說，引起我注意的倒還不是這方面，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征服的論理的力量。這種論理，雖說是比較枯燥，但是確實是抓住了聽衆，逐漸的浸入到他們內心中，不遺痕跡的說服了他們。我曾記得有些代表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論理，是一種什麼極有力量的觸鬚，他的觸角從各方面來包圍着你，使你無法脫離他的包圍，不是降服，就要完全失敗。』』

『我想到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是他演說技術上最有力的一方面。』

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泰米福爾的代表大會上，對於第一次國會的選舉，起草並且通過了『積極抵制』的策略，通過了必須重新審定土地綱領的決議案。大會向『一切黨的組織提議，在選舉的基礎上，迅速堅決的改造地方的組織。』

可是，我們不應以爲當時的環境容許我們完全實行民主集中制。在當時有有限的自由和警察監

視的環境，妨礙着我們。在許多大的城市裏面，教育機關的住地爲革命組織所利用，有的地方，因爲自由主義者們的幫助，還可以利用地方會議及其他的機關開會。當時召集小組會議或代表會議都很容易，可是並不是在任意的地方都有這樣的條件。列寧總是主張在任意的環境之下，都是應該保持和鞏固黨的秘密組織的。

警察和憲兵從未放鬆破壞我們的組織。當我們組織中的領導同志被捕後，中央委員會或是地方黨部，就應迅速派人補充，或是由當地提拔。在委員會中，應有軍事和戰鬥組織的代表。因爲這樣，所以要進行民主的選舉，不僅很危險，而且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間，我們有選舉出來的工廠的區的和城市的委員會，他們是在大會上或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有些地方，召集了較大地區的會議，便選出了地方黨部。

在第一次泰米福爾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列寧對於土地問題所提出的決議。在該決議中說：『會議認爲我們黨的土地綱領，應該變更如下：取消割地的那一條。並改變如下：幫助農民用一切革命的辦法，直至沒收一切國家、教堂、廟宇、封地與大私有者的土地，而把農村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作爲自己經常的主要的任務。』

泰米福爾代表會議，是正在各地武裝暴動開始高漲的環境下閉幕的。不論布爾塞維克或孟塞維克對於武裝暴動的態度如何不同，可是暴動使下級的幹部，特別是工人更加接近，使要求統一的力量

更形增強了。孟塞維克代表的大會決議，是以後組織聯合委員會的預兆，在這種聯合組織的形式中，孟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組織並沒有完全混合，而是各自保持着派別的組織，在上面成立聯合委員會，雙方各派代表參加。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的聯合大會及其決議

一九〇六年，在瑞典的斯托克霍姆第四次黨大會。會議是在瑞典社會民主黨民衆大廈舉行的。瑞典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們，了致歡迎詞，參加會議的大多數是孟塞維克，但是這並不是說黨和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是站在孟塞維克的觀點上的，是同情他們的。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因為當時的環境，不是到處都可以進行民主的選舉。有些最革命，最傾向於布爾塞維克黨，參加武裝暴動最積極的組織恰巧都受到了摧殘。不是一切組織都派遣了自己的全部的代表。在黨內『自由的時期』混入許多非無產階級的分，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寫給亞克薩爾洛特的信上說，許多的解放派（自由資產階級）加入了孟塞維克的組織。在高加索，除了工業的地區（如巴庫）以外，許多社會民主黨員是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因此孟塞維克佔了很大的勢力。例如，梯里其孟塞維克派去參加大會的代表數目有最大的彼得堡組織的代表那樣多。在斯托克霍姆大會上，孟塞維克爲何佔了多數，原因就在於此。大會

的成份如此，所以對於許多問題的決議都是孟塞維克的性質。拉特維亞和波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比較接近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知道了這一點，便利利用他們的多數，將俄國社會民主黨同這些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合併的問題放在大會的最後來討論。孟塞維克藉口說，俄國社會民主黨首先要決定自己的問題，以後再談同人家合併的問題；彷彿在大會上所決定的一切問題，同波蘭與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沒有關係似的。孟塞維克這樣做，爲的是要使波蘭和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不致於投布爾塞維克的票。參加這次大會的布爾塞維克有列寧、斯達林、克拉辛、李可夫、台史尼茨基、伏洛夫斯基、阿爾基姆、盧那查爾斯基、魯米宰夫、魯得尼夫、替歐多洛維奇、弗拉基米洛夫、照明、略楊夫、古西夫、克魯普斯克雅、弗拉基米爾斯基、福隆斯、伏洛希洛夫、瓦倫左瓦、古比克、謝多依、波瑞納洛夫、各洛得辛瓦、史達梭瓦、納可梁可夫、布不諾夫、杜那也夫、雅洛斯拉夫斯基等。大會代表參加會議的時候，都是十分謹慎的，在交通上和大會組織上，史達梭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代表都是利用假的名字出發，例如，伏洛希洛夫就是利用安替明可夫的假名字（反孟塞維克之意）。在這次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進行了形式上的聯合，選舉了聯合的中央委員會，其中孟塞維克佔多數，布爾塞維克只有李可夫、克拉辛、台史尼斯基三個人。在這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黨同其他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行了合併，拉特維亞、波蘭和立陶宛的組織以及猶太工人同盟（猶太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都聯合起來了。拉特維亞和波蘭的組織，得到了所謂區域的自治，在有這些組織的地方，社會民主黨人都參加了他們的組織。猶太勞動

同盟的活動是不受地區限制的。

在「傾斜稚病」一書中，列寧寫道：『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我們同盟塞維克形式上雖是一個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其實我們同盟塞維克，同這些傳達資產階級影響於無產階級的人們及機會主義者，是從沒有停止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的。』

在第四次聯合大會上所討論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革命形勢估計和無產階級任務的問題，對國會態度的問題，武裝暴動和組織問題。一些策略上的問題，例如武裝暴動，游擊戰爭，對奪取財產問題的態度以及對於國會的態度問題，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都發生了分歧。布爾塞維克提到黨面前的任務，是由極明顯的事實出發，就是認為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是往前繼續的；而孟塞維克則日益變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以社會主義的詞句爲掩護而反對革命鬥爭的路線。

在這次聯合大會上，孟塞維克雖然佔了多數，但是他們爲了不拒絕工人羣衆，對於吸收黨員的問題，不得不採取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提議。黨章的第一條，如布爾塞維克在第二次大會上所提出和在第三次大會上所載入黨章內的那種形式通過了。當時布爾塞維克主張給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波蘭、拉特維亞、猶太勞動同盟）以表決權，孟塞維克則反對這點，他們恐怕布爾塞維克佔優勢。因爲在許多革命策略的問題上，拉特維亞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當時是幫助布爾塞維克的（雖說是不很徹底）。通過的決議案上說，黨的組織應該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黨的機關應該是選舉出

來的；同時每一個下級組織，都應該服從上級；一切黨員和一切組織都應服從自己的中央。布爾塞維克認為必須建立集中的黨的中央機關報委員會不在大會上選出，而由中央委員會指定，受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並執行中央的路線。

在聯合大會上（第四次大會）提出審定土地綱領的問題，布爾塞維克認為土地問題是反對沙皇制度，爭取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勝利的整個鬥爭問題中的一部。布爾塞維克提出土地國有的綱領。土地國有，首先是革命農民委員會沒收（無代價的剝奪）一切地主土地交給工農新的革命政權。土地國有的口號，易於動員全體的農民參加革命的鬥爭，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所實行的土地國有，便於無產階級同鄉村的貧農一起，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還在黨的第二次大會以前，在火花報編輯部內討論黨綱的時候，列寧即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實現土地國有的可能。當時蒲列哈諾夫證明說，在俄國的革命條件下實行土地國有，不是前進而是後退。孟塞維克提出了土地市有的綱領，同布爾塞維克土地國有的綱領相對立。土地市有的內容是：農民所耕種的分地歸農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交給所謂民主自治機關（市政機關），農民要土地的時候可租用。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不是發動農民起來參加革命的鬥爭，因農民是要為着完全消滅地主土地私有，奪取地主一切的土地而鬥爭的。孟塞維克土地問題的綱領，實

質上是要革命半途終止。在土地問題的綱領上，便可看出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兩種不同的路線。列寧激烈的反對過土地市有，而同意幫助分割派。後者所提出的綱領，是農民分配地主的土地。列寧認為分割的綱領，雖是錯的，但並不是有害的辦法。他們的錯誤，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在奪取地主的土地以後，階級鬥爭還有廣泛發展的前途；但他沒有害處，因為分割土地的綱領，能夠給主要的敵人——農奴主的土地佔有——以打擊，這與孟塞維克的土地市有是不同的。在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和不澈底的分割土地的綱領之中，如果要選擇一種的話，那就寧願選擇分割的綱領，因為他能夠發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通過了孟塞維克土地市有的綱領，不過加上一些修改罷了。

斯托克霍姆大會的策略的決議

雖然孟塞維克佔了多數，可是在他們中間，思想是非常動搖不定的；同時工人羣衆的情緒，是如此的革命，使得孟塞維克關於時局估計的問題，不敢在大會上提出自己的決議來。在大會之前，孟塞維克關於時局估計決議的草案，在黨的刊物上公佈過，可是在大會上，在布爾塞維克批評的壓力之下，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草案，並且未提出來討論。

布爾塞維克當時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革命是走向新的高漲，我們的任務，是要領導革命到底。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不同點，就是布爾塞維克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同着革命的農民能够執行這個任務。孟塞維克不相信農民的力量，他們主張同資產階級聯合，所以以前跟着他們的羣衆，也就離開他們了。在大會上孟塞維克阿克爾雪洛特關於國會問題的報告，激烈的批評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斯達林在第四次大會上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指出孟塞維克實際上是將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結果在勝利的時候，便是資產階級專政）。斯達林說，如果照孟塞維克的意見，我們不需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需要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那末，無論是組織武裝暴動或是奪取政權，我們都不須直接的積極的參加，這便是孟塞維克的『方案』。但是，如果無產階級的利益需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話，如果無產階級不是跟着人家的尾巴走，而是站在革命的前頭的話，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該放棄對於組織武裝暴動和奪取內政的積極的參加。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意見。無產階級的領導嗎？還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在黨內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這就是我們的分歧。

列寧在大會上明白的指出，孟塞維克不是指導革命而是跟着革命的尾巴走。事實上他們不是同着農民走而是同着自由的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在一起。立憲的幻想浸透了他們，他們自己已被欺騙而且欺騙着人民大眾。他們認為不經過武裝的鬥爭，用國會內和平的鬥爭就可以走向全民的政權。實

質上，孟塞維克譏嘲了革命鬥爭的方式——武裝暴動。孟塞維克尼柯爾斯基批評布爾塞維克說，布爾塞維克認為『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是主要形式』，而孟塞維克則認為，運動主要的形式是立憲的，國會的，議會的形式。孟塞維克尼柯爾斯基說，『廣大羣衆的革命運動甚至沒有。』列寧答覆孟塞維克說：『請取下你的立憲派的眼鏡吧，那時你便可以看到俄國的農民運動，軍隊的騷擾，失業工人的運動，你便可以看到一切鬥爭的形式，就是溫和的資本家們，他們也不否認這些形式的存在。』

在大會上斯達林譏嘲孟塞維克放棄武裝暴動的主張，他說：『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唯一正確的戰鬥的策略，是覺醒工人的策略；而孟塞維克的策略，則是隱蔽工人的策略。』

第四次第五次大會間黨的鬭爭

在大會完結之後，列寧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代表，給了他們以指示，告訴他們以後要如何的爲着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勝利而鬥爭。布爾塞維克沒有任何的灰心，布爾塞維克以列寧爲首組織了中央，繼續領導布爾塞維克的鬥爭。

斯達林在他以後的回憶中說：『我開始看到了失敗中的列寧，他並不像一般的領袖們在失敗之後是那樣的灰心喪氣。相反的，失敗使得列寧更加鼓舞自己的力量，鼓勵自己的同志進行新的鬥爭，爭

取將來的勝利。我說到列寧的失敗，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我們來看一看列寧的敵人斯·托克·霍姆大
會上的勝利者——蒲列哈諾夫、亞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吧！他們很少像真正的勝利者，因為列寧在他
對於孟塞維克主義無情的批評中，真是使他們無地容身。我記得我們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常常是集在
一起，大家望着列寧，問他的意見。在有些代表的演說中，表示着失望，列寧對於這些演說很諷刺的說：
『同志們，不要喪氣，我們一定會勝利的，因為我們是正確的。』拋棄智識分子的喪氣現象，相信自己的
力量，相信勝利，這就是那時列寧對我們所說的。所以說布爾塞維克的失敗是暫時性的，布爾塞維克在
最近將來是會勝利的。』

在第四次大會以後，布爾塞維克同孟塞維克的鬥爭更加厲害了。布爾塞維克向各地作報告，在說
明聯合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時，對於革命的基本問題仍然堅持着布爾塞維克的觀點。有些地方，關於大
會報告，有兩個報告人，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一個孟塞維克的。在第四次大會上所爭論的問題，又在地方
大會上重新爭論起來。

在大會以後，孟塞維克中央所採取的右的方針——幫助立憲民主派國會，幫助立憲民主派關於
負責國會內閣的要求，使得必須同孟塞維克中央的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一路線實質上是使工人
階級服從於那種和沙皇妥協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在保持沙皇政權的條件下，要求負責的國會內閣，這
僅僅是此種勾結的掩護罷了。

一九〇六年七月，沙皇以國會內爭論土地問題為口實解散了第一次的國會。布爾塞維克主張號召工人、農民和軍隊積極準備全民的暴動。『可以看到最近將來的農民運動，他們是準備着並等待着直接的號召。』孟塞維克的中央是跟着立憲民主黨走的，他們參加了立憲民主黨在菲波爾格所行的會議，提出了恢復全權國會的口號。因為國會是立憲民主黨把持的，所以孟塞維克的這種行動，又一次的證明他們對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是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布爾塞維克沒有服從這樣的決議，在一些下級黨的組織——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幫助之下，反對了孟塞維克中央的這種決議。在布爾塞維克組織的逼迫之下，中央幾次的變更了自己的決議。孟塞維克在主張立即宣布總罷工、反對解散國會（這種行動預計一定是失敗的）與主張部份的行動（這們分散革命力量）之間動搖着。布爾塞維克指出，這樣的示威是無效果的，應該號召鄭重地準備總暴動。

國會解散以後，事變的發展證明了布爾塞維克的正確。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底的時候，發生了史維亞堡暴動和以後克隆斯坦暴動。孟塞維克的中央，不能利用時機將這些局部的行動變為總暴動，而只是號召同情的示威。列寧曾寫道：『在國會解散以後，我們中央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破產，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

布爾塞維克堅決的為着召集黨的緊急會議而鬥爭。因為許多事實證明孟塞維克的政策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受到極大的失敗，使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完全喪失他們的獨立性，使工人階級的政策瓦解。

在孟塞維克的隊伍中，加緊對於無產階級的一切策略的基礎，作了機會主義的修正。由此便產生了取消主義的『廣大工人黨』的草案。

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所召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完全暴露了孟塞維克向自由資產階級投降的態度。在這次代表會議上，討論了召集黨的緊急會議的問題（布爾塞維克的提議），非黨工人大會的問題（孟塞維克提議），以及在第二次國會選舉時黨的策略的問題。孟塞維克在猶太工人勞動同盟的幫助之下，通過了可以同立憲民主黨聯合（妥協）的決議。正好像在二十七年以後，同進攻的法西主義鬥爭的時候，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宣傳『小害』的政策替希特勒開路一樣，俄國的孟塞維克們也主張贊助立憲民主黨，以為不然黑色百人團就要起來了。布爾塞維克在代表會議上雖說是少數，但是執行了他們自己在工人階級中的獨立的政策，布爾塞維克終於達到了部份的修正，就是說地方的組織，有決定妥協與否之權，孟塞維克的中央不能強迫地方的組織一定要同立憲民主黨聯合。在代表會議上，孟塞維克推翻了召集緊急大會的提議，但是在許多地方組織壓迫之下，——波蘭社會民主黨也是這樣主張——決定在一九〇七年初召集這樣的大會。

在大會以前，許多地方的組織事實上已分裂了。彼得堡的組織也發生了分裂，孟塞維克違背市委的決議，同立憲民主黨進行談判。對於這個問題所印發的彼得堡的選舉，三十一個孟塞維克的虛偽的這本小冊子中，列寧對孟塞維克給了無情的致命的批評。列寧這樣寫道：『孟塞維克同立憲民主黨

作買賣不顧工人爲的。是在立憲民主黨的幫助之下，把自己的人選到國會中去。這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到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從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到立憲民主黨的經過的簡單內容。」

爲了這意見，孟塞維克的中央，曾將列寧交黨的法庭審判。兩次的會議都沒有任何的決定，相反的列寧在會議上給了他們以反駁的斥責。在第二次會議上，列寧在他的發言中，揭破了孟塞維克出賣的政策。關於分裂黨的行動，列寧在他的答覆中說：『分裂是斷絕各種組織關係，將意見的鬥爭從組織內部移到了組織之外，從糾正說服同志的立場移到了破壞他們組織，煽惑工人羣衆以及一般民衆來反對分裂出去的組織的立場。在一個黨內，黨員間所不允許的辦法，在黨的分裂以後的各部份之間，是允許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此列寧認爲自己的行動不僅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有人對我說：你造成了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我答覆說：我是有意的打算在彼得堡於選舉前夜跟着分裂出去的孟塞維克走的那一部份無產階級隊伍中形成混亂。在黨被分裂的時候，我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最有趣的是：在孟塞維克同立憲民主黨勾搭以求得位置的歷史中，有些地方，立憲民主黨同他們勾搭。孟塞維克將工人政黨的政策腐化，把它降低到極小的無原則的政治手腕，到完全失去自己的獨立性。這個時期，在廣大工人羣衆的面前，更明顯的暴露了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倫敦大會及其成份

在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一年以後，在倫敦召集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解散第二國會的前夜召集的。雖說第二國會的大多數議員主張同專制妥協，反對革命，而只希望對於現存的制度進行一些改良，改組和補充，但沙皇政府仍舊認為這樣的國會是危險的，所以，他要尋找一切的口實來解散國會。第五次大會本擬定在丹麥都城開會，但是當代表都到了的時候，丹麥政府禁止開會；以後想到瑞典的馬爾姆城去開會，但是到那裏去開會又被禁止了。所以，這次遊牧式的大會便全體搬到了倫敦。在倫敦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移動之後，最後才開成會。會議是在英國和平社會主義者（費賓社）所租借的『教會』的地址舉行的。一共到會的代表有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布爾塞維克有一〇五人，孟塞維克有九十七人，四個人是『無派別的』，孟塞維克的托洛茨基也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在大會上企圖組織堅固的『中央』，但無結果。黨中間派作了堅決的鬥爭。其餘的代表是從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來的，其中有波蘭的拉特維亞的，烏克蘭的，阿美尼亞的，和猶太勞動同盟的代表。高爾基參加了這次大會，僅有發言權。他在物質上和政治上都給了布爾塞維克很多的幫助。在倫敦大會上高爾基和他的妻子安得列也瓦對於布爾塞維克代表的生活非常注意的幫助。孟塞維克對於高爾基的『小組織性』自然是很氣憤的。

在這樣成份之下，一切的問題本可以作出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可是，倫敦大會雖然一般的說表現了布爾塞維克的勝利，布爾塞維克策略的勝利，和工人運動中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勝利，但因為各

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特別是因爲猶太勞動同盟採取動搖的、機會主義的、有時是孟塞維克的、有時是中立派的態度，所以對於許多問題，布爾塞維克不能實現自己的路線，不能在組織上鞏固起來。在大會頭一部份工作中，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還受到以托洛茨基爲首的「非小組織」的代表幫助。在這次大會上，托洛茨基擁護孟塞維克路線，反對激底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

對於孟塞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布爾塞維克給了嚴格的批評，並且指出孟塞維克違背了黨的路線，甚至於違背了聯合大會的決定，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承認這種情形。但是大會模糊了這個問題，而沒有通過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我們指出中央委員會違背了聯合委員會的決定。如像：一、提出了負責（立憲民主黨的）內閣的要求；二、把爲國會而鬥爭的要求當作爲政權機關而鬥爭的要求提了出來；三、爲着同立憲民主黨妥協，企圖沒收土地的要求，準備用收買土地的要求來代替它；四、在第二國會選舉運動的時候，中央委員會不願第四次大會的決定，企圖同立憲民主黨、君主主義的自由資產階級進行妥協；五、在第二次國會內君主立憲的自由資產階級實行妥協的路線；六、不去集中注意於國會以外的鬥爭，不去把國會內部工農代表和其他代表間的衝突貫徹到底，而却在事實上採取妥協的政策；七、破壞了黨內的統一，如像在彼得堡和其他的地方。在倫敦大會的這些問題上，特別表現了妥協派和中間派的惡果，各民族組織的代表，有些便是這樣的分子。布爾塞維克主張對於這些事實，黨應該給以制裁，而猶太勞動同盟和拉特維亞的代表團提議對於中央的報告不作任何

的決議，繼續討論以下的問題。孟塞維克自然是贊成這個提議的。結果以一百四十三票對九十一票（當時到會的布爾塞維克、波蘭社會民主黨四十八票懷疑）通過了這個提議。在討論其他一些重要日程時，例如，各國會黨團的報告，新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及討論孟塞維克參加資產階級刊物的問題，都是這樣的情形。

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盧森堡、蒂斯柯及其他波蘭和拉特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是處於動搖的地位。這並不是說，各民族黨的組織對於許多的問題都是不徹底的妥協的態度；相反的，在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上，例如對於「工人大會」的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對非無產階級政黨態度的問題，許多民族組織的代表，特別是波蘭的代表，是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可是因為一部份代表採取中間主義的態度，倫敦大會沒有得出明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如果當時在各民族組織中完全建立了布爾塞維克組織的話，那麼這樣的路線是可以達到的。當時在各民族組織的內部也有派別的鬥爭，他們也有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特別是在波蘭和拉特維亞的同志中是如此。而猶太勞動同盟則大多數是接近孟塞維克的。在革命低落和反動的時期，猶太勞動同盟的組織內，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猶太智識分子，孟塞維克的觀點佔了決定的優勢，這便決定了十月革命以前以及蘇維埃政權勝利以後猶太勞動同盟的態度。在革命低落時期，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內的派別鬥爭，甚至引起分裂，分出了孟塞維克的集團。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主要的是代表着波蘭工業中心有組織的無產階級，雖說有

過許多的動搖和中間派的長時間的影響，可是布爾塞維克的影響終於佔了優勢。波蘭的社會民主黨有許多次是擁護布爾塞維克政策的。參加大會的烏克蘭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史匹爾加」是孟塞維克的組織。

倫敦大會上的策略問題

在倫敦大會上，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政黨關係的問題的報告，佔着主要的地位，在大會有過激烈的鬥爭。不顧一切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終於通過了自己的決議。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對於當時鬥爭中的每個政黨的階級實質，給了一個明確的說明，從代表農奴地主、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社」，「貴族聯合會」等）起都包含在內。決議上對於「十月十七日聯盟」、「工商黨」、「和平創設黨」的估計，認為他們是一部份地主以及資產階級特別落後的階層的階級組織。布爾塞維克主張向這些政黨作堅決無情的鬥爭。對於自由帝制派資產階級政黨——其中最主要的是立憲民主黨，它代表着比較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同時還有一部份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跟着他們走——我們黨主張揭破他們的行動，反對他們在民主小資產階級中的影響。對於民粹派和勞動派（民粹社會主義、勞動團和社會革命黨），因為當時他們多多少少還代表着廣大農民羣衆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

觀點，他們在服從資產階級領導與堅決的反對地主土地佔有和封建國家二者之間動搖着，我們黨主張揭破他們非社會主義的實質和他們模糊無產階級和小私有者中間的階級對立的企圖，同時以各方面的努力，使他們脫離資產階級領導的影響。

關於對國會態度問題的決議，是大會大多數人通過的（波蘭和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和猶太勞動同盟的一部份是同布爾塞維克一致表決的。）它指出，國會鬥爭的一般性質應該服從於無產階級在國會外的鬥爭，特別重要的是利用羣衆的經濟鬥爭並且積極的參加經濟鬥爭。同時又指出國會鬥爭的方法是不能實現政治自由的，所以還是需要『人民大眾反對沙皇政府武裝力量公開的鬥爭，這是能够保證革命完全勝利——把政權轉入民衆手中——的唯一出路。』

我們應該說，在許多的基本問題上，各民族的組織是幫助了布爾塞維克，可是他們怕在組織上鞏固布爾塞維克的影響，在選舉中央委員會的時候，他們幫助了孟塞維克，組織這樣的中央委員會，使其
 中布爾塞維克的多數，祇多一票。在孟塞維克不同意倫敦大會所通過的決議的情形之下，這點在開始時就不僅表示地方組織內要發生鬥爭，而且在中央委員會內也要有激烈的小組織的鬥爭。大會代表將近有十五萬有組織黨員的這種情況使上述情形更帶着危險性。在倫敦大會閉會後，布爾塞維克知道，鬥爭是必然要繼續的，同孟塞維克調和是不可能，不會有的。應該在工人的面前完全揭破孟塞維克的觀點，爲着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在工人運動中的勝利而鬥爭。

揭破孟塞維克關於工人大會和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

還在討論布爾根國會問題的時候，孟塞維克、亞克爾、雪洛特便提出了召集「工人大會」的計劃。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對於這個計劃都有熱烈的討論，對於這個問題出版了小冊子和文集。列寧對於這個問題也寫了幾篇文章。當時孟塞維克的亞克爾、雪洛特和拉林以及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主席諾薩爾，特別堅持了這種思想。

這個計劃一般的內容，是召集一種大會，包括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一切職工會、工人合作社、俱樂部等，在這個大會上應該組織一個什麼「全俄工黨」或叫「全俄工人協會」或叫「非黨的黨」或者是叫「廣大工人政黨」。爲什麼有建立這樣一個組織的必要呢？有些贊助「工人大會」的人們說：現在工人參加各種的政黨並且互相的爭論着，這樣便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如果我們組織這樣一個黨，大家不分政治觀點來參加，那末各政黨間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鬥爭了。列寧回答他們說：『在現在的條件下，這種企圖得不到和平和良好的工作，也不會有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合作（拉林客氣地以爲社會民主黨可以在廣大政黨內部起宣傳隊的作用）而事實上祇會有鬥爭的擴大，領軌與分裂，思想與組織上的混亂。』

其實，如果在一個黨內，布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還是互相爭論，那麼再把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白俄的社會革命派以及猶太勞動同盟都吸收進來的時候，還能有和平可言嗎？自然在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複雜的黨內，鬥爭將要更加厲害。

主張『工人大會』的人們說：『社會民主黨內的智識分子太多，如果是『工人大會』，就不會有這樣多的智識分子。』

列寧回答他們道：『爲什麼你們的智識分子不開始退讓，讓無產階級分子去作決議呢？』『在你們少數的作家及行動家所擬定「自我組織」裏，有什麼保證能使以後不重復這種現象呢？』列寧往下繼續的說，這上面其實沒有什麼自我組織而只有智識分子的播弄，來遮掩實際組織思想的缺乏。工人從不會臆想『自我組織』。『如果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社會革命黨和其他的分子混淆到社會民主黨內面來，那末能有什麼「廣大的工黨」呢？』

孟塞維克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俄國社會民主黨應當同政治上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的力量聯合起來』，而工人大會的目的，是在建立俄國工人政治聯合的基礎。列寧問：『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什麼？難道這不是俄國工人的政治聯合嗎？難道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成份，不是無產階級政治上覺悟的分子嗎？這上面，只是證明孟塞維克的貧乏。』列寧指出他們提出召集工人大會的意思，是想使社會民主黨的先鋒隊服從無產階級的非黨的政治組織。

斯道林同志和列寧一樣反對召集「工人大會」和組織「廣大工人政黨」的思想。斯道林同志揭破了孟塞維克這種思想的虛偽與惡果。

斯道林同志說道：「工人大會的思想，其具體的形式，根本上是虛偽的。因為這種思想不是基於真的事實，而是基於不正確的了解，以為我們還沒有黨。其實我們已經有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大家都知道他的存在，並且他使階級敵人深深的感覺到。關於這一點，孟塞維克也知道得很清楚。正是因為我們有了這樣的黨，所以工人大會的思想根本是錯誤的。」

爲什麼提起了組織「廣大工人政黨」的呢？列寧說明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智識分子庸人對於革命表示疲憊。列寧說：「這裏面沒有什麼廣大的思想，只是表示智識分子對於堅決爲馬克斯主義而鬥爭感覺疲憊罷了。」

第二個原因，列寧認爲是孟塞維克機會主義的本質，想把革命的工人運動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實際上，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同情於建立一個「廣大獨立的組織」如像跟着資產階級走的英國「自由工黨」一樣；而不願有那種具着明確革命的政治階級路線之工人政治組織。

第三個原因，列寧認爲孟塞維克不了解在工人羣衆運動高漲時期所建立的那些組織，如工人代表蘇維埃、職工會等等的意義。孟塞維克在當時已經有了他們以後在革命低落時候，在取消派時期所更加發揮了的那種思想。諾薩爾說：「黨不應該將召集大會的工作拿到自己手裏。召集大會的主動權，

應該歸於職工會和召集大會的籌備會。」這樣，孟塞維克簡直向我們黨提出了自殺的政策。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薩爾解釋工人大會和其他大的組織計劃的失敗，是由於他和托洛斯基的被捕所致。當時布爾塞維克很厲害的譏諷這種可憐的意見。如果某種思想的本身是合於實際生活的話，那末，即或十個薩爾和托洛茨基被捕，它也是會反映到實際生活來的。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是死的，所以他就不能有任何的反映。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上，在黨所通過的決議中說：『非黨工人大會的思想，被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所利用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對於工人羣衆的影響，這種思想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的發展是有害的。』大會認為雖然可以在黨內刊物上討論這一問題，可是同時認為無論個別的黨員或是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都不許在廣大的工人羣衆中進行準備工人大會的鼓勵與組織工作。

職工會及布爾塞維克對它的態度

在一月事件以後，工人階級對於組織職工會的要求開始增強了。無產階級的羣衆運動是少不了這種組織的，在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時候，莫斯科已經有了二十六個大大小小的職工會組織。在莫斯科罷工運動的時期，各個城市裏面職工會的組織是大大的增加了。職工會的組織者，多半是布爾塞維克

的黨員，他們一開始就把職工會同黨的關係建立起來了。如果我們研究那時職工會的章程，那末我們可以看到非常複雜的內容，常常在職工會的經濟綱領之外，提出了一些政治的任務來。蘇巴托組織的經驗告訴了工人，放棄政治，結果會使他們投到「警察社會主義」的懷抱裏去。沒有一個工人組織是可以放棄政治的。有的地方，因為建立公開組織比較困難，所以成立了秘密的職工會。誠然，在我們的隊伍中也有反對組織職工會的。他們以為這是小的事情，真正的革命者，不應該幹這種組織職工會的事情，因為這樣便放鬆了政治上的任務。一九〇六年斯托克霍姆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上說，職工會是非黨的組織，黨員都應該加入職工會，積極參加職工會工作來提高會員的團結和階級的覺悟。『在鬥爭中和宣傳中，應將職工會和黨有機地聯系起來。』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提出了一種意見，認為職工會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校。當時布爾塞維克黨已經起來反對孟塞維克關於職工會中立化的計劃。在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決議中說：『黨用一切力量來教育加入職工會的工人，使其廣大地了解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任務，並以自己的行動，爭取職工會中的真正的領導權。』

在斯托克霍姆大會上，布爾塞維克是堅決反對按照民族組織職工會的意見。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關於職工會問題所通過的決議中說：『我們大家應該使職工會承認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上的領導，並且和黨建立組織上的聯系。我們的這種意見，推翻了「獨立的職工會」和「職工會中立化」，即以爲職工會同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和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沒有任何關係的思想。獨立的「中立

的「職工會的組織（如英國的職工會），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因此資產階級極力幫助這種政策，因為這種政策不依靠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却依靠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一九〇七年，斯達林在巴庫工人報上所寫的，總結黨五次大會的論文中寫道：

「大會的結果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黨內機會主義的派別，對於孟塞維克主義的勝利。倫敦大會總結了革命社會民主黨的這些勝利，鞏固了這些勝利。大會通過了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所以今後的黨，就是要執行無產階級的嚴格的階級政策。無產階級的紅旗，再不會在自由主義前面降低起來。那種不轉向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動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是黨的倫敦大會第二個重要的結果。」

「全俄的先進工人，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之下，實際的聯合成為統一的全俄的政黨，這是倫敦大會的意義及其一般的性質。」

在第五次倫敦大會上，布爾塞維克代表的黨團會議，選舉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來領導全俄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工作。

第一次革命時期布爾塞維克黨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鬥爭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大大的增強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在國際舞台上的陣綫。

『俄國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焦點，在俄國所醞釀着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的國家都還要深刻，只有俄國能够以革命的手段解決這些矛盾。』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移到俄國來了。關於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及其在國際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寫道：

『歷史權在我們前面的迫切的任務，比任何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迫切任務還帶着更大的革命意義。這一任務的實現，不僅破壞歐洲反動的有力的支柱，而且破壞亞洲反動的最有力的支柱，使得俄國的無產階級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明顯地證實了列寧的先見。誠然，革命沒有將沙皇制度完全摧毀；但是沙皇制度在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民的打擊之下，是如此的震動；工人階級所發揮的力量，是表現得這樣的巨大；是表現成這樣的形式，使得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世界舞台上，起了偉大的革命的作用。在他的影響之下，東方數萬萬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驚醒起來參加革命的鬥爭（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在他的

影響之下，西歐工人運動的浪潮大為高漲。強有力的遊行示威，從來未有的罷工運動的高漲，廣大黨員羣衆要求黨的領導轉變到更堅決的鬥爭的方式——這些，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反應。這次革命，表示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已代一八四七——一九〇四年的舊的和平時代而與現在的時代，是東方猛烈革命震動並轉而影響歐洲的時期，是全世界工人運動猛烈高漲的時期。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影響之下，西歐社會民主黨中革命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分化的過程是加緊了，他們中間基本派別的形成是加速了。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作例罷。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右派，主要的，是害怕俄國革命運動的革命影響。右派在黨內，特別在職工會內，擴大反對『革命幻想』的宣傳，堅決的表示反對總罷工的思想。在機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一九〇六年在柯龍召集的職工大會，竟公開禁止職工會員進行總罷工的宣傳。

俄國孟基維克所堅持的理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要經過整個的時代，第一種革命和第二種革命之間，隔着一個萬里長城，這完全是站在國際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的。第二國際的政黨，認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將來的一種可能，而且還認為不是必然的。他們以為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革命的震蕩與爆發而用社會改革的辦法來實現。

實際上這是同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這不是基於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道路，而是基於同資產階級合作的道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態度顯明表現了它的機會主義中間主

義的本質。牠不了解革命運動的新時期的來到，不了解新的戰鬥政黨的作用，沒有估計到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不了解俄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從上至下，從下而上的組織革命，組織武裝暴動與總罷工作為暴動的初階，爭取農民，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等等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工人運動的最重要而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此外，他們保持着舊的『無論如何要有合法地位』的主張。他們極力警告羣衆，不要羣衆將俄國的經驗看做是西歐的模範。在工人羣衆的壓力之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所能做的事，最多祇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把總罷工當作資本進攻時的防禦手段以及爲民主政治制度而鬥爭的進攻手段罷了。可是到了緊急的時機，到了應該由宣傳變爲行動的時候，黨的領導拒絕宣佈總罷工，向職工會的機會主義首領投降。一九〇六年曼亥姆的黨大會上，形成了機會主義的勝利。所以，中間派因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而表現的『左傾』只是口頭上的短時期的現象而已。

一九〇五年革命影響的重要表現之一，及俄國和國際舞台上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機會主義直接鬥爭的結果。以及布爾塞維克整個政策影響的結果，是第二國際內左派的形成，特別是德國以盧森堡爲首的左派，在革命的時候，開始從孟塞維克的機氣中解放出來，開始（雖說是不徹底不堅決的）中間派進行鬥爭。在俄國革命的時期（一九〇五——一九〇七），盧森堡及其同志，在宣傳俄國革命的經驗上作了很多的工作，特別是宣傳了總罷工，宣傳了爲實現總罷工而鬥爭，號召西歐工人爲轉入

堅決鬥爭方式而努力，但同時左派又表現了不徹底性，他們離開布爾塞維克主義還是很遠的。孟塞維克的組織原則仍然俘虜着左派；他們屈服於運動的自發性之下；他們不了解在革命運動中特別是在罷工運動中黨的組織的作用；他們沒有充分的估計這一作用；當他們宣傳總罷工的時候，他們沒有和布爾塞維克一樣，把罷工和發動聯系起來。最後，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動力和性質的估計，左派（盧森堡、第史柯、巴爾夫斯）『……發表了空想的半孟塞維克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方案。（馬克思的革命方案的閹割）在這方案中，浸透了孟塞維克對於工農聯合政策的否認；他們把這種「不斷革命論」的方案和布爾塞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方案對立起來。』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布爾塞維克如何估計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教訓呢？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領導者，在鬥爭中他表示了自己英勇剛毅的精神。但是爲要戰勝沙皇制度，需要更好的組織和準備。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寧在給赤色布萊斯尼亞區（莫斯科一區）工人的信中說：『莫斯科工人的不可磨滅的英勇，是全俄國一切勞動羣衆的鬥爭模範。但是那時的羣衆還不很開展，還很渙散，沒有幫助那些拿起武器來反對沙皇和地主專制政體的布萊斯尼亞和莫斯科的英傑。』

列寧在給瑞典工人報告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說，農民組織性的不夠，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很可惜，農民的行動是太渙散了，太無組織了，太缺乏進攻了，這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列寧說，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工人和士兵的組織性同樣不夠，『穿上軍服的工人和農民是暴動的靈魂，運動成爲全民的了。在俄國的歷史上，第一次把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吸收到運動中來了。道中間缺乏什麼呢？一方面，缺乏羣衆的持久性和堅決性，他們還犯了過於相信他人的毛病；另一方面，革命社會民主黨工人的軍事組織，也是不夠，他們還未能靈敏地取得領導權，使自己成爲革命軍隊的首領來和政府的權力進攻。』失敗的原因，是因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能够像一九一七年一樣把工人、農民和海陸軍人的三個運動的潮流統一起來，同時進行堅決的進攻。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沙皇政府得以各個擊破革命運動。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另一原因，是當時的國際環境使沙皇政府能够同資產階級妥協。俄國的帝制是國際反動勢力的支柱；國際資產階級很明白的懂得，工農革命的勝利，是比較沙皇制度的存在要危險得多。國際資產階級只想把沙皇制度稍微歐化一下，他們不反對幫助沙皇政府進行一些變革和改良，因爲這種改良，對於俄國資本主義往前的發展是有利的。因爲『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

下，改良主義政策的改良必然成爲鞏固這一政權的工具，成爲分化革命的工具。『想要保存俄國沙皇制度的西歐的資本家，幫助了沙皇的部長維特侯爵締結了債款，使得沙皇政府能够收買一部份資產階級和跳出了日俄戰爭和革命所造成的嚴重的財政危機。』

自由資產階級背叛了人民。在革命開始的時候，他們給了人民許多允諾。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以後，我們看到資產階級的一部份組織了反動的「十月十七日黨」——十月黨。這一政黨的組織，是一部份工業自由資產階級同地主勾結妥協的結果。因爲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同西歐的一樣，害怕工農的勝利比害怕沙皇制度的存在要更加厲害得多，依據西歐革命的經驗，資產階級知道能够同沙皇政府進行更有利的買賣。

以期這村爲首的高加索社會民主黨聯合委員會，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七日發表的宣言中說：爲着爭取勝利，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政黨，把各地分散的工作聯系起來，擔負起組織武裝暴動的責任，並且決定實現進攻的政策；實際的生活，已經準備了新的革命的浪潮，城市中的危機和農村中的飢荒使新的革命的爆發，成爲不可避免的。可是缺陷却在於這樣的政黨，只是剛剛形成起來。在內部鬥爭中減弱了的幼年的黨，剛剛恢復過來，準備內部完全的統一。』

關於統一，自然是要建立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兩條路線的混合。』列寧同斯達林是一貫反對這種混合的。

兩個政黨，爲着爭取工人階級而鬥爭，形式上是統一的，實際上是分途揚鑿。一個黨是布爾塞維克，他提出工人階級是先進的戰士，是革命的領導者，證明在革命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必須同農民聯合；另一個黨，是各色各樣分子，從托洛茨基起直至坦，以及當時站在右派觀點上的馬丁洛夫爲止的那些人的政黨；這個黨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否認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不承認無產階級能够成爲革命的領導者。孟塞維克的路綫，是要使無產階級適應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從於自由資產階級。

無論如何，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工農革命鬥爭的經驗，準備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總演習。一九一七年，列寧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一文中說道：『如果沒有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中間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毅力和偉大的階級鬥爭，那麼第二次革命一開始，幾天以後，就迅速完成初步階段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已經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以來的陳見，驚醒了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使他們進入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出（並且給全世界指出）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的本質，他們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他們行動的方法以及他們最近和將來的目的。』

第一次的革命雖說是失敗了，但是第一次的革命證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同農民聯盟，才能徹底實現，這一革命應該是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過渡。

爲要保證革命的勝利，工人階級必須覺悟到自己是領導的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一九〇五年的

革命和以前的革命運動，準備工人階級擔負起這樣的使命。我們黨的功績，就是他把這種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變成了先進工人和那時少數革命農民幹部們的心得。布爾塞維克教育他們，並且鬥爭的經驗也證明，只有無產階級能够爭取農民羣衆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從勝利和失敗中，無產階級學到如何寶重自己的力量，寶重那些組織在工人政黨中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他知道誰是同盟者，誰是敵人，誰個動搖，誰個在工人階級鬥爭緊急的時候要向那一個方面動搖。我們的黨幫助工人階級分析清楚這些問題，這是黨對於工人階級的功績。

從第一次革命的經驗中，農民也已經看見了工人階級是他們唯一可靠的同盟者和領袖。革命的農民，看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主張的改革，完全是適合農民利益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黨和階級，能像工人階級政黨布爾塞維克黨那樣，如此堅決澈底的解決農民和地主階級中間的基本矛盾。在第一次革命中，因為我們的黨同農民的組織關係不够，所以我們對於農民的影響也很不够。可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農民已經學會如何去尊重布爾塞維克黨了。

在第一次革命中，我們黨在軍隊和軍事組織中的工作經驗——領導海員和士兵的運動，在軍隊中進行革命的宣傳等——幫助了以後我們建立強有力的軍事組織，如果沒有這種組織，那末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布爾塞維克在反對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所堅持的組織原則，幫助我們建立了堅固的

組織，這種組織經開了極困難的地下工作時期，保持了自己基本的力量，並在革命運動一開始發展的時候，使我們的黨成爲工人階級的領袖。在第一次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對於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上的劃分，對於機會主義者和中間派的堅決鬥爭和分裂，幫助了我們在以後的時期中保持了明確的行動路線，幫助我們向工人階級提出這樣的口號，給與這樣的指示，使得工人階級能够深切的明白的了解。同時這些口號又是最革命的口號和號召，能够團結千百萬的工農羣衆來參加革命的鬥爭。

工人農民第一次組織了羣衆鬥爭與暴動的機關——蘇維埃。工人在經驗中檢查了鬥爭的方式，從和平的示威起直到羣衆罷工和武裝暴動止。

在第一次的革命中，工人階級是被打坍了，但是沒有被征服。在革命低落時期到臨之際，工人階級還保持那種不能被剝奪的獲得，以保證他以後的勝利。這種不能被剝奪的收穫就是馬克思、列寧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種學說，在那時，在第一次革命時，是已經創立起來了（不是像托洛茨基派所說創立於後來）布爾塞維克主義——列寧主義的學說，是被第一次革命的經驗證實了。

工人階級，有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他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是思想上是堅固團結的。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間，沙皇政府的最殘酷的恐怖並不能摧毀這個有生氣的組織，這一組織，使得俄國的工人階級能够在歷史上完成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

工人階級的革命學說——列寧主義以及在革命的戰鬥中鍛鍊出來的布爾塞維克黨——這就是無產階級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得到的東西。無產階級帶着這些收穫，經過了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革命低落的黑暗時代；這些收穫使得他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年新的革命高漲的時候能夠積極的參加；這些收穫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最正確的決定自己對於世界大戰的路綫和態度；這些收穫保證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對於沙皇制度的勝利；並且在一九一七年時，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的周圍，在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的周圍動員了工人階級。

從俄國工人階級的例子，從沙俄時代布爾塞維克黨的經驗上，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可以相信這兩個必需的條件：正確明白的革命理論以及從戰鬥中鍛鍊出來的强有力的布爾塞維克黨，是保證任何一國工人階級勝利的條件。

第八章 第一次革命時期黨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

俄國工人階級組織的特殊條件

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我們的黨，從一開始產生的時期起便是一個新形式的政黨，這是一個革命職業家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組織。這些革命職業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堅固基礎上團結起來，爲共產主義進行澈底的革命的鬥爭。這是一個戰鬥的政黨。列寧當時稱之爲軍事的組織：這是一個爲鐵的紀律所團結起來的政黨，這一政黨雖然在數量上比較小，但它是和工人及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相聯系的，它是在階級戰鬥中發展並鞏固起來的，它是在反對右的及『左』的機會主義，反對中間主義，反對調和主義等等鬥爭中發展並鞏固起來的。

我們的黨主要的是在地下的非法的工作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在這點上面，它是和大多數其他國

家的社會黨甚至共產黨不同。當我們的黨開始建立的時候，壓迫是如此的厲害，那時許多人爲着極小的組織工人小組的企圖遭受長期的流放，償付多年監禁甚至苦工的代價。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自由詞句，不得不經過秘密環境發表出來，我們手寫的宣言經過打字機或經過手抄以後，在玻璃板上翻印或是經過秘密的印刷機印出來。只有在一九〇五年，我們才得到比較寬大的合法的可能，召集公開的會議，出版公開的報紙及書籍。

如果在西歐各種傾向的職工會（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羣衆組織）大部份於建立政黨之前就出工人階級建立起來；那麼在地下的俄國，當職工會組織的時候，是已經有了無產階級政治組織政黨的建立，這一政黨不得不把職工會組織的事業拿到自己的手中。

如果在西歐的許多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充分完成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建立之前就已經早已完成的話，那麼在俄國，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工人階級，領導了農民的革命鬥爭，並且和農民一起解決那些在西歐由農民與資產階級共同解決的問題。

俄國革命歷史的這三個主要的特點，我們應當看到：以便瞭解：黨的組織在第一次革命中是如何組織起來，並且處在如何的狀況之中。

黨的組織是如何建立的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受的殘酷壓迫的條件之下，當然說不到建立公開存在的工人政黨。他們不得不在地下的環境中，在經常的政治摧殘的環境中建立我們的黨，不得不採取這樣的組織方式，使得我們不管警察對我們組織的偵察、逮捕、流放、摧殘，我們還能夠鞏固我們的組織，並且保證對工人的必要的聯系。

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只有很少的選舉的委員會。黨是集中地組織起來的，中央委員會可以派遣，指定同志到任何組織去做領導工作，委員會可以引進（就是說不經過下層選舉引進到自己委員會中）任何同志去領導黨的組織。領導的中心，應當隱蔽起來；組織的領導者的名字，只有組織中不多的黨員可以知道。委員會的整個人員，只有其中委員及上級領導機關（省委或中央委員會）知道。委員會常是根據職務的需要組織起來。就是說，選擇同志使每一個同志負擔一定的任務，完成委員會中某一特定的工作。這樣，委員會中除書記以外，有負責的宣傳者，負責的組織者，技術組織者，軍事組織者。委員會中委員的數目是不多的，從五人至九人，再多就很少見。在委員會的組織中，有時加入了最大區域的組織者。委員會的書記，集中管理組織的一切報告，他保存委員會中的委員，各區組織者的接頭機關（在這機關中，某些同志可以來得到消息，進行談話，並得到黨的工作上某些同志的狀況），文件儲藏處，文件發行的交通站，武裝庫，印刷處，炸彈儲藏處等等的地址。書記還保存和中央機關和國外通訊的密碼；在大的城市，還按區組織了宣傳鼓動小組，他們是由負責宣傳者領導的。委員會的負責宣

傳者，進行並領導宣傳鼓動的整個佈置，召集宣傳者開會，指示他們怎樣並依何種方向去進行工作，與他們一起共同指定宣傳小組上課的提綱以及如何在飛行集會，羣衆會議上進行演講的指示。這些小的羣衆會議，或是在工廠周圍召集，或是在鄉下，在空地，在森林，在田野，或是在偏僻的石洞，或者在房屋內召集。小組人數是不多的，當然大多數是相互不知道名字的；通常，只知道假名，每個黨員入黨時都規定假名。有時這些假名保持了一生，代替了同志的真名字。例如列寧是黨內名字，而真名字是烏梁諾夫；例如斯達林同志，直到現在還被許多人叫他的假名字：「科巴。」有時同志有幾個名字。爲着更好的隱蔽自己的真名字使混入的偵探不能知道，並且使偵探沒有可能來進一步的查問。例如在黨的第四次第五次大會上，斯達林是以「伊凡諾維赤」的名字出席的。

工廠的及區的組織者，進行了組織的工作。在工廠中，組織了宣傳小組，或是組織了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有時是非常小的，由三個五個加入秘密組織的工人所組成的支部。區的組織者，應當知道一切工廠委員會，他應當經常召集工廠委員會的會議，給他們以一般的指示，從他們那裏得到最重要事實（這些事實能作爲工人階級中鼓動的材料）的材料，並且把這些材料告訴黨的委員會。宣傳者及鼓動者與工廠工人相聯系，同樣應收集關於工廠工作的材料，定期召集各區組織者的會議，來規定某種有組織的運動的計劃。但在警察的壓迫下，總的會議應該開得比較稀少，以避免破壞及逮捕。

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黨的黨員數量及社會成份

在我們所進行工作的這種秘密條件之下，當然說不到正確的黨員的名單。黨證和黨員登記書那時是沒有的，每一個工廠的組織者只在腦筋中記得自己組織中的黨員；他很少把這些黨員名單轉告區的組織者和書記。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組織，那時數量很少。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彼得堡的組織和彼得堡的孟塞維克集團，總算起來大約有三千人；在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夏間，布爾塞維克組織總計有二千五百人；巴庫及其他好些黨的組織，也是強大的人數很多。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組織，那時在數量上是差不多的，在一九〇五年各約有三萬多黨員，猶太工人同盟及波蘭工人組織，還不算在內。

應當指出，布爾塞維克組織，在工業中心佔着主要地位；而孟塞維克，則在手工業者，智識分子，學生及城市小市民中間享有更大的影響。

就是孟塞維克馬爾托夫，在其俄國社會民主黨史上面，也指出：「在高加索，孟塞維克在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中佔主要地位。而在孟塞維克對工人階級有影響的地方，則他們所團結的工人，是更多傾向於行會的職業的鬥爭，而更少傾向於堅定的階級政治的鬥爭。」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社會民主黨黨員

的數量是大大增加了。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所代表的黨員已有十五萬，其中一半是工人。

黨組織中的選舉制

孟塞維克特別着重指出（尤其在口頭上）他們在組織問題上的民主主義。當一九〇四年，選舉的制度實際上是對於民主主義與選舉制的危險的兒戲，是只能給與憲兵及警察以更容易的侵入黨的秘密組織的可能。在那時候，孟塞維克，包括托洛茨基派，都已要求實行選舉制度。應當指出，在孟塞維克組織中，這種選舉制度是僅僅在口頭上存在的。

事實上，孟塞維克實行了委派制，從上而下來建立自己的組織，孟塞維克的組織，主要的是智識分子的組織，而列寧教育我們的黨，必須懂得去培養工人幹部，使他們能夠領導政治鬥爭，在第三次大會上就通過了這樣的決定。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廿二日所寫的話，到現在還保持他的意義。他說：『有人說，能够做委員會委員的工人是沒有。我聽了這話，就坐立不安起來。問題是被拖延着；顯然的，黨內是有些毛病。工人應當被吸收來加入委員會。』

當環境使我們有比較公開集會可能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就實行更寬廣的選舉制度，同時自然保存中央委員會有派遣某些委員到某些組織去工作的權利，保留各委員會有不經過選舉來引進新委

員的權利。一九〇五年秋，省的及城市的委員會已經可以有比較自由的選舉，因此召集了代表會議。但這不是說，各省委員會的整個人員是選舉的。和以前一樣，總的領導中心（黨中央）指定各省的負責工作人員組織者及宣傳者，就是說這一區域的主要領導者。在一九〇六年，特別在斯托克爾大會後，我們的組織極大的改造了，選舉制度進行得更徹底了。早在一九〇五年冬，布爾塞維克的泰米福爾的會議上，已經認為必須實行選舉制度，同時給予選舉出來的領導機關以在思想上，實際上領導的權利。領導的變動，行動上最廣大的配備及嚴格的管理之權，亦給予了他們。

在布爾塞維克看來，組織上的民主主義，從來不是目的而只是更好的組織羣衆的手段，吸引羣衆來積極參加的手段。民主主義的形式，範圍及其寬度，是隨着整個工人階級先進部份的鬥爭條件以及政治情況的改變而改變的。在以後，黨的十次大會關於黨的建設的問題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黨，根本否認能夠找到一種絕對正確的，對革命過程一切階段都適用的黨的組織形式，相反的，組織形式及鬥爭方法，是完全要按照當前具體歷史環境的特點以及這一環境中所直接產生的任務來決定的。

孟塞維克的特點，是在於他們反對集中的戰鬥的黨。他們在口頭上常是誇耀自己的民主主義，好像不管具體的歷史環境如何，民主主義本身就是醫治一切組織上毛病的萬應良藥似的。

工人的出版物是如何印刷的

在秘密工作時期，我們不得不在國外印刷報紙及書籍。因為那裏的條件比俄國自由些。火花報，前進報以及部分的無產者報都是在國外印刷。有一個時候，我們按照國外送來的樣子，在俄國基世尼夫印刷火花報，在彼得堡印刷無產者報。同樣的，曙光雜誌以及其他供給大眾讀的小冊子書籍，也是在國外印的。爲着轉運及寄送的便利，不得不用極薄的香烟紙來印刷。在國外，專門組織了發行文件的站，來處理轉運的事情。在這一工作上，需要非常的靈敏，勇敢及對於革命事業的忠實。許多同志，在這一工作上得到了極大的技術上的精密性。在這一方面，彼得尼滋基和李維諾夫同志特別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時，會用了兩層底的箱子來裝運文件，上面一層放着衣服，來矇蔽海關的檢查員及憲兵注意的；但是大部分的文件，是經過黨所組織的輸運站運輸來的。可是國外的出版物還不能滿足革命鬥爭的需要，報紙所印的數量不夠。例如火花報有時一百多個人讀一份，他們秘密的傳授，傳到最後的讀者時，報紙已是模糊不清，破孔百出。秘密的小冊子，也是這樣讀的。

黨的委員會發表了傳單，宣言。這些東西，在俄國用各種方法來印刷，數量很多。在高加索建立的秘密的印刷廠，特別是凱滋那維里所建立的巴庫印刷所，給了黨以很大的幫助。例如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中就發行了如下的數目：克夫委員會發行二十六種傳單，共七萬份；敖得薩發行了廿八種，共八萬份；薛瓦斯篤波爾發行了廿三種，共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份；西福羅披爾廿三種，共一萬七千份；湯姆斯克廿三種，共一萬一千份。在一九〇五年五月，莫斯科委員會發行了四十種，八萬四千份；敖得薩委員會

廿三種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份北方委員會發行了八種三萬九千五百份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宣言在各地翻印了好幾十萬份的發了出去。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像第一次革命時期的俄國那樣有如此發展的非法的工人出版物。每一委員會活躍的響應着事變，在革命的重要時期，甚至每日發表傳單。這些傳單成爲羣衆政治鼓動的工具，雖然它們還不能完全代替報紙。

那時出版報紙的數量也不少，火花報每週出版，有時還每週兩次；份數由一萬到一萬五千個別的期數，在俄國翻印了。報紙不僅用俄文出版，例如，猶太工人同盟就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呼聲，拉特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出版鬥爭，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出版紅旗。這些報紙也是按期出版的。除此以外，在很少數的地方，我們利用了公開的報紙。一九〇五年時，我們開始在彼得堡出版新生報；在莫斯科出版鬥爭及火把；以後又出版浪潮、迴響等。只要有可能的時候，我們就建立自己公開合法的書店，他們出版大批與工人有關的小冊子。這樣的書店，如鐵錘、海燕、金鐘、新生等等，在第一次革命時期發行了好幾百萬的社會民主黨的小冊子。我們的小冊子還在其他書店出版，如羅斯托夫的帕拉莫洛夫書店，莫斯科的麥克瓦書店。

布爾塞維克的出版物，在高加索，尤其在巴庫特別的多。由於斯達林同志的主動，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建立了並出版了以下的俄文報紙：巴庫工人、汽笛及巴庫無產者。參加汽笛報的，除了實際上的領導者斯達林同志外，還有加巴利茲、肖米亞、奧爾卓尼基茲、斯板塔梁、斯得板尼、康瑪拉夫等。像與

爾卓尼基茲同志所回憶的，汽笛報，事實上是全黨的機關報。那時，這些報紙轟動了全俄國。巴庫工人報、汽笛報及巴庫啓蒙報一樣對於巴庫工人的布爾塞維克教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與孟塞維克的特殊的變形蘇巴托夫派，信得立克夫派進行了鬥爭。在巴庫委員會的秘密印刷廠裏，斯多羅亞同志是曾經工作過的。在一九〇八年，巴庫工人在斯達林同志編輯之下公開出版，但那時反動已經來到了。此外，在一九〇九年出版了浪潮雜誌；由於斯達林同志的主動，巴庫布爾塞維克用秋爾克文出版了號召報，份數達到二千；在那時，這已經是頗大的份數了。但巴庫的巡撫，爲着它的『有害傾向』把它封閉了。布爾塞維克所建立的秋爾克人組織『古買特』，出版了改進黨。在一九〇七年，出版了同志報、火花報、新的話、工人呼聲等等。這些報紙的編輯中，參加了肖米亞及克奴念茲同志。

黨在農民中及學生中的工作

黨不僅在工人中工作，而且在農民中工作。那時（並且以後）在農民羣衆中建立黨的組織是比較困難得多。在農民中必須使他們正確了解當前的革命，向廣大農民的廣大階層解釋無產階級的作，解釋無產階級是革命農民的前進的同盟者及唯一的同盟者，吸收農民的基本羣衆到革命方面來。同時我們自然不忘記聯合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的任務。所以在那些有好多農業僱用工人

的地方，我們不僅建立城市工人的組織，而且建立農村僱農的組織。在某些大莊園的地方，存在了特殊的農村黨的小組。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甚至召集了黨的農民工作人員的會議來討論進行農民工作的特殊方法，出版了特殊的供給農民用的傳單和書籍。在我們宣傳中有特別大的作用的，是列寧的科學的通俗小冊子論貧民。

我們的黨，在學生中也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無疑的，學生羣衆在革命的年代是經閱了極大的革命高潮。學生中有頗大的民族主義的一部份，他們在社會地位上是接近農民及城市小市民的，他們在這時候誠意的參加了一般的運動。學生的極大多數自以爲是社會主義者，並自稱屬於某黨，某派。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甚至一九〇七年，高等學校的學生在革命宣傳鼓動的事業上起了巨大的作用，盡了極大的功勞幫助我們來實現集會的自由。他們供給最高學術機關的課堂來作爲羣衆大會會場之用。在這些大會中，有好多工人參加。這幾年在學生中分出了不大的但是堅強的與工人階級鬥爭相聯的一部。在大的大學的城市裏，存在了特別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在包括全體學生羣衆的學生會裏，布爾塞維克努力提出了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彼得堡學生會的領導機關中，有一個時候大多數是布爾塞維克代表，這使我們有可能來廣大的利用教育機關去做黨的工作，如從男女學生中我們組織了小組去分發宣傳品，舉行募捐等等。甚至某些地方，如在莫斯科，在武裝暴動時期，甚至有學生的戰鬥的糾察隊來和工人階級一起進行戰鬥。

那時我們還沒有特殊的青年組織，那時只有青年學生的小組。在這些小組裏，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宣傳。在總的革命高漲時期，某些革命學生參加了革命運動。* 如果我們拿大多數秘密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年齡來看，那末他們開始革命活動的年齡，是青年團的年齡。列寧、斯達林、伏洛希洛夫、莫洛托夫、奧爾卓尼基茲、基洛夫、庫比雪夫、福龍斯、得爾任斯基等等同志，都是在青年團的年齡就開始了他們的秘密工作的。

黨在那些年代，沒有建立特殊的反對宗教的組織，並且沒有把反對宗教的宣傳問題提到第一位。這一問題在那時我們的工作中還不能站在顯著的地位。但這不是說宗教是私事。應當提出，正在鬥爭特別尖銳的時期，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前夜，列寧却認為必要來寫一篇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文章。這一文章的基本內容以及列寧在其他文章中（如關於工人政黨對宗教的關係、階級與黨對於宗教及教會的關係，以後更有論戰鬥的唯物論的意義等文）所說的內容，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在反宗教工作上的指導。在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中，列寧這樣的規定了工人政黨對宗教的關係：

『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不是私事。我們的黨，是爲着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的，自覺的，先進的戰士的聯合。這樣的聯合對於不覺悟，黑暗和無知現象，如宗教的信仰，是不

* 應當指出，猶太勞動同盟把手工業的學徒及學生組織於青年猶太勞動同盟之中，並且在羣衆的
城市工人運動的時期，發生過個別的學徒的罷工等等。

能够置之不管的。爲着用純粹思想的，而且祇有思想的武器，用我們的報紙，用我們的言說去和宗教的昏暗做鬥爭，我們就要求將教堂完全和國家分離開來。同時我們建立自覺的聯合，也是爲着反對任何對工人的宗教的愚弄。對於我們思想的鬥爭不是私人的，而是全黨的全無產階級的事情。」（見列寧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

所以我們的黨，對於教派中的工作給以很大的注意。在沙皇政府之下，好些教派如虛東迪斯派、浸禮會及其他等等，不能够公開宣傳自己的信仰，甚至不許集會。所以某些教派，爲着避免沙皇的壓迫不得不喬遷英國。他們把相信教派的兒童奪取過來，用統治宗教的精神去教育他們。一切流放的地點擠滿着教派中的人，在西伯利亞，教派中的人爲着避免沙皇政府的摧殘，遷移到最遠的邊疆上去。這就是爲什麼在黨的二次大會上，根據那時研究教派問題的本質，勃魯也維齊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決議，在決議中說：『俄國的教派運動，在他的許多表現上，是反對現狀的許多民主傾向之一。』大會決定加緊對於教派的工作，以便吸引他們到革命鬥爭中來。教派中人，希望着建立更自由的民主的制度，並使宗教與國家分離開來。在第一次革命中教派所要實現的宣傳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祇在十月革命中間方才得到實現，並且規定於將宗教與國家分離的命令上面。

如果現在蘇維埃國家還存在着教派的運動，而且有同樣的外表形式與教義，那麼這運動與以前是已經不同了，它已經不是以前和沙皇政府鬥爭時候的進步的力量了。現在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

家，教派固執着宗教來反對教派青年中日益發展的趨向於共產主義的意志，反對他們參加社會生活的意志，反對工農青年日益增長的不信宗教的狀況。他們在浸禮會長老會等儀式之下，常常成爲富農的直接掩護者。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所發生的好些反革命的組織特別明顯的指出，在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宗教是爲着什麼目的，並且爲着那些階級服務的。

布爾塞維克在海陸軍中的工作

軍隊中的工作是如何建立的呢？俄國革命最尖銳的提出了並且解決了關於對軍隊態度及吸收軍隊參加革命的問題。可是黨用以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是一個困難的道路，是付了在革命中所不可避免的犧牲代價的。在軍隊中利用了徵調以前我們在工農中所有的關係。當被徵調者集合於城市的時候，我們就利用了他們的集會。在那裏，我們發行了特別的致新兵，致青年兵士的傳單，向他們說明軍隊在警察，資產階級，地主的國家中的作用。向他們解釋他們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責任，並且號召他們拿着武器和工人階級，農民一起來進行反對沙皇政府，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鬥爭。在軍官中間，我們進行的工作較少。官長在社會階級上說來，是離開工人階級與農民較遠的，他們主要是從貴族出身的，在後一個時期，還有些是從商人及官吏出來的。可是在軍官中間，也有同情我們運動的分子，有個別

的軍官實際的參加我們軍事組織的工作，在他們中間有些是我們黨的黨員。

我們黨在軍隊中的革命工作，是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兵士是被嚴厲監視着。他們在兵營中有嚴格的警衛，不但和政治上『可疑』的人們隔絕關係，而且一般的和羣衆隔絕了關係。他們的書信受警察的檢查，在兵營中不准拿進任何能使兵士知道人民痛苦狀況的印刷品和書寫品。最殘酷的紀律（對兵士的毒打一直保存到一九〇三年）紀律營、禁閉、破毀意志和自覺的出操，在兵士中特別的擁護沙皇的和宗教的反動宣傳——所有這些都是爲着使兵士成爲『沙皇和祖國的忠實的僕從』。但是，不管這些辦法如何嚴厲，革命運動還是侵入到軍隊中。在一月九號前，我們的黨已經在某些地方的軍隊中進行了革命工作；在一月九號後，這一工作到處加緊起來，開始建立特別的軍事組織。致海陸軍士兵的傳單宣言，更多的發表出來。特別在大城市的警衛部隊及堡壘中，在克羅斯坦特、薛瓦斯、波爾斯維阿堡、巴頓、海參威、華沙、里加里巴、瓦特維斯加堡及許多其他城市，都進行了軍隊的工作。

可是我們黨的組織，還沒有能够充分駕御這一運動，使得我們可以有的計劃的加以推動。雖然那時在許多部隊內已建立起我們黨的軍事組織（團的、營的、連的委員會及小組等），可是這一運動在極大限度內還是自發的。關於一九〇五年冬黑海艦隊上士兵的暴動，我們已講過了。一九〇五年十月廿六日、廿七日，暴發了克羅斯坦特的暴動，政府在那時所舉行的瘋狂的摧殘行動，吸收了一部份覺悟較差的兵士來參加，這樣來破壞整個運動。暴動被壓迫下去了；參加暴動的好的一部份海軍兵士受到了

法庭的審判。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薛瓦斯坡爾也爆發了暴動；在那裏，海軍士兵的運動是和工人運動相聯的，但是暴動的組織非常不好，這使政府就能利用所有的武裝及技術，並調動忠實於他的軍隊來鎮壓暴動。好幾百海陸軍士兵在這一暴動中犧牲了。二千以上的暴動者被俘虜了。這時候，在許多城市——基夫、畢幾高爾斯克、哈爾可夫、雅克太令諾、達爾、洛姆城、洛斯托夫、雅魯斯拉夫斯基、蘇霍姆、伏倫尼城、梯夫里斯、巴拉諾維齊、維帶白斯克、阿萊爾、斯達烏羅坡爾、明斯克、諾伏拉細斯克、伊爾庫茨克、庫爾斯克、報不魯查斯克、塔什干及其他城市都發生了軍事暴動。這證明了工農的一般的革命情緒。應當指出，在無產階級羣衆發生有組織的影響的部隊，在包括許多以前熟練工人的技師隊、工兵隊、海軍兵士、砲兵隊等等，運動是最強大最有組織的。

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的黨開始發行軍事的報紙。在莫斯科，十二月暴動之後開始發行士兵生活報；在彼得堡，發行兵營報；在其他城市，也有軍事報紙的發行。一九〇六年春，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召集了軍事組織的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在第一次會議上就被逮捕了）；一九〇六年夏，在斯維亞堡及萊佛爾爆發了暴動，這些暴動被沙皇鎮壓下去了。一九〇六年秋，當時孟塞維克居統治地位的中央委員會，在地方組織的壓力之下也召集了一個充分可憐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會議，那時布爾塞維克努力要把軍事的戰鬥的組織工作統一起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在芬蘭的特梅費爾斯城召集了第一個布爾塞維克的軍事及戰鬥組織的聯席會議。在海陸軍中我們的黨起了重大的作用。關於這一聯席會

議，列寧寫了專門的文章，很稱許這一會議的決議。

在一九〇七年，我們的黨努力要把整個國會黨團的工作和工人階級中，農民中及軍隊中的羣衆運動聯系起來。政府看到，如果我們真正能够把我們數量不少的國會黨團轉變爲能够利用國會講台來組織革命民衆的話，那麼這種聯系是何等的危險！這就是爲什麼政府警察廳的稽查，特務處憲兵隊的偵探竭力要想混入我們所建立的軍事組織。一九〇七年在彼得堡，他們混入了我們的軍事組織。那時具有革命情緒的彼得堡的警衛隊及海陸軍，提出了請願書以及對於國會中工人議員的要求。沙皇特務機關的偵探侵入一切會議，把我們的計劃報告憲兵隊。沙皇政府在一九〇七年五月底，解散了第二次國會並逮捕了我們工人議員之後，舉行了有名的國會的審判，並且連帶了士兵。那時還舉行了好些對於我們黨的軍事戰鬥組織的審判。*

布爾塞維克的軍事工作，自從布爾塞維克黨決定了武裝暴動問題的時候起，黨就提出了建立武裝糾察隊，研究街道武裝鬥爭經驗，在工人羣衆中傳播最必須的基本軍事常識，選擇最有戰鬥性的，最有經驗的，能够保守秘密的，能够進行地下秘密工作的幹部等等任務。在黨的第三次大會上，就已經決定『採取最有力的辦法來武裝無產階級，製定武裝暴動及直接領導暴動的計劃。必要時建立黨的幹部的特殊小組。』

* 本書作者一九〇八年，因爲彼得堡黨的軍事組織的案件，被判罰處苦工。

對於軍隊、憲兵及警察所常時發生的衝突，同樣的產生一種必要去建立能夠進行武裝抵抗的戰鬥隊伍。當一九〇五年孟塞維克號召在彼得堡舉行武裝的五一示威遊行的時候，我們黨就警惕的反對這點，指出在那時情況的條件之下，這樣的武裝示威，不可避免的要成爲無結果的發動與自動。因爲我們那時對於暴動還沒有準備好。在一九〇五年夏，我們的黨進行了這種準備工作，在最大的工業城市組織了武裝糾察隊。在莫斯科，在葉克特零諾斯拉夫，在烏拉爾組織了數量頗大的糾察隊。他們在武裝暴動中，應當起工人羣衆的先鋒隊，前衛戰鬥隊伍及組織者的作用。

我們的黨，提出了準備軍事教導員的任務。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之下，建立了技術的組織。他們設立製造爆炸品及軍火的作場，教育工人以戰時的軍事智識。在這樣的作場之一，克立伏夫、米哈以洛夫等同志是曾經作過工作的。這一工作的領導，極大部份是歸於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克拉辛，他在這幾年，極活躍的參加了整個我們的軍事工作。一九〇六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軍事技術委員會；在南俄有一個時候在基夫也建立了這樣的委員會。我們所運輸的軍火，數量頗多。在運輸工作的組織上，李維諾夫、斯得莫尼可夫、比得尼茲基都是參加了的。高爾基也幫助了這一工作，在他不朽的著作母親中所稱爲保魯的柴洛莫夫曾告訴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武裝暴動以前不久，高爾基要他到芬蘭的別墅中去。高爾基那時說，在奧地利已經買了一萬枝步槍，連帶子彈，並且已經僱了奧地利的輪船，這一輪船，將把裝在鋅化鐵的封固了的箱子裏面那些武器，擲到芬蘭海岸的約定的地方。我就被指定爲三人之一，

假裝芬蘭的漁夫去撈起這些箱子』

在一九〇七年倫敦大會上，我們已經看到革命浪潮的低落，羣衆革命運動的低落。所以我們提出了決議，在這上面說：『在黨的委員會下面所存在的戰鬥糾察隊，以前是參加了游擊鬥爭；但在現在的條件下，將不可避免的要轉變爲關門的陰謀的小組，脫離廣大羣衆，發生墮落，並在黨內發生破壞的影響。』但是這不是說，我們黨完全不要在戰鬥精神下去教育工人。我們僅僅說，在新的條件之下，『對於準備無產階級戰鬥先鋒隊來實現武裝暴動的任務上，最適當的戰鬥組織的形式，是黨的民警的制度。』就是說，在現在黨的支部的範圍內教育一切黨員以軍事智識。』可是這一任務，我們只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後方才加以實現。

黨論游擊鬥爭

在大工業中心所發生的先進工人反對沙皇政府力量的武裝鬥爭，吸引了更廣大的工人來參加，並且在某些地方還吸引了農民來參加，他們起來反對政府的走卒憲兵、警察及衛兵，有時甚至還反對沙皇政權更大的代表。這一鬥爭有時採取了經濟恐怖的性質來反對最痛恨的地主和資本家。他方面，在第一次革命時期，我們還看到奪取政府機關的庫藏來供給革命鬥爭的物質需要的許多事實。黨不

得不決定自己對於這種事實及這種鬥爭方法的態度。在十二月暴動後，這些問題更迫切的放在黨的面前。在一九〇六年——〇七年，列寧在以布爾塞維克的筆名所做的俄國的現在狀況和工人政黨的策略一文中，說明我們不能從議事日程上除去暴動的問題；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表示失望，以為我們不能最後的把三種分散的暴動潮流（工人的、農民的、兵士的）匯合成一個勝利的暴動。列寧特別詳細的說明了戰鬥糾察隊的游擊行動的問題。他說：『如果我們還是僅僅在口頭上談論暴動並鄭重的承認無產階級的暴動的話，那麼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阻礙而應當贊助戰鬥糾察隊的游擊行動。』

我們應當特別提出，在一九〇六年——〇七年，列寧已經提出了國內戰爭的問題。

自然，游擊戰爭在某些地方損害了其他形式的工作。但是像列寧在游擊戰爭一文中所指出的，『任何新的鬥爭方式，帶着新的危險與新的犧牲。它不可免的要『損害』對於這種新的鬥爭方式無準備的組織。在任何戰爭中，任何軍事行動都要使戰鬥的軍隊受到某些損害。但從此不能得到結論，說不應作戰；從這上面，應當得出結論，說應當學習作戰，祇此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黨在第一次革命時期的各個階段，不是一律地來看游擊行動的問題。

例如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上，當革命浪潮顯然表示低落時，布爾塞維克就提出承認：『一、在俄國革命的現在時期，還沒有勝利的民衆暴動的充分條件；二、在現在政治經濟危機的條件之下，廣大民衆增長着的不滿向着抵抗最小的方向走，他不可免的要流成個別的游擊行動的鬥爭來反對』

經濟，政治壓迫的直接負責者。」我們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下，游擊行動將帶着無政府的性質，所以向大會提議承認游擊行動是不需要的，並且與之進行鬥爭。

對於奪取資財的問題，孟塞維克與布塞爾維克是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如果奪取資財是在黨的中央機關嚴格監察之下，那麼，在革命的羣衆武裝鬥爭的時期，爲着革命的目的，布塞爾維克是允許部份的奪取國家資財的。可是孟塞維克却裝腔作勢，說他們反對奪取資財；可是這絲毫沒有妨礙孟塞維克的領導機關利用戰鬥隊伍所奪取來的金錢來供給自己組織的需要。我們以前已經指出了，奪取資財以及使用所奪取的資財，如果沒有黨的嚴格檢查的話，那麼他將會發生何種的危險。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危險，使奪取資財蛻化成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甚至成爲土匪主義（而且真的有些蛻化了）。那時有些奪取資財者脫離黨的組織，將所得的金錢作爲個人之用，而促使勞苦羣衆中的搖動分子脫離革命組織（那些以奪取錢財爲原則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很多的實行了這種事情。）

確實的，有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爲在原則上不許部份的奪取資財。但是就是以孟塞維克佔大多數的黨的第四次斯托克霍姆大會，也不得不承認『奪取敵人（專制政府）所有的資財來供給暴動的需要是可允許的，同時，應當嚴重注意，使居民的利益受到可能的最少的損害。』（有時，在隊伍攻擊與射擊之際，偶然死傷路人。）

列寧說：在這一問題上，布塞爾維克是非常的小心，這話毫無疑義是正確的。對於那些認爲必須奪

取錢財的布塞爾維克，嚴格的說明了，要使這種奪取，『只在黨的監察及供給暴動需要的條件之下才能允許進行。』

至於游擊行動中的恐怖，那麼布塞爾維克提出只把他用來反對暴力鎮壓者及積極反動派。可是還需要遵守下列條件：一、要估計到廣大羣衆的情緒；二、注意當地工人運動的條件；三、顧慮使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被無益的浪費。

黨的工作經費是從那裏來的

進行秘密工作，——印刷傳單小冊子，派遣革命者從一個城市到別個城市，購置武器，以及黨的組織的其他化費——是須要經費的。這些經費從什麼地方來呢？黨費是很少的，例如從一九〇五年二月巴庫黨委員的報告上就可以看到，他們用的經費只有百分之三是黨費。是的，在某些工人佔據了極大部份的黨的組織裏，黨員的黨費收入比較的多。例如在八月，黨費在各地方的經費所佔的百分數如下：里加組織佔百分之三十三；伊凡諾伏·伏斯尼信斯克組織（也是工人的）佔百分之五十三；猶太工人同盟的洛茲組織佔百分之五十。但是大部份組織的經費，並不是從徵收黨費來的。例如莫斯科委員會，在一九〇五年的上半年每月平均有四千羅布以上的收入；巴庫委員會，在一九〇四年冬每月收入在

一千羅布以上，這些經費，是從同情者進行特別募捐來的。募捐大部份進行於工人中，在智識份子及學生中，有時在同情的自由派中也進行了募捐。那時特別選出了並且組織了財政科，那些和自由派以及同情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有聯系的同志都加入了這一科。在晚會、宴會及羣衆大會上也進行了募捐。有一個時候，極大數目的募捐，經過高爾基轉交於黨。在一九〇七年，同情布塞爾維克的木器廠主希米特（他因爲在一九〇五因組織武裝糾察隊曾經被捕）在將死以前，做了遺囑，把他全部財產交付給黨。在他死後，這些財產（大約二十八萬羅布）就由他的姊妹轉交給黨。在這幾年，黨的一部份的經費，是用奪取沙皇政府財庫的辦法來得到的（烏發城的奪取，杜雪特城的奪取等等）差不多一切黨員的工作都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甚至那些用全部時間來做黨的工作的黨員，也只從黨得到極少數的費用；有時三個、五個、十個，最多二十五、三十羅布一月的生活費。大部份秘密工作的革命者，是只有最低限度的費用的。許多秘密工作的革命者，不得不應用別人的名字來居住；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每夜變更宿地，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也不遺名遺姓，因爲這些秘密工作者的護照，大部份是假造的及靠不住的，假造常是很容易被發見的。爲着供給這些護照，在黨的委員會下，在領導中心設立了特別的護照處。用錢收買了空白的護照，假造了印章，寫了假想的名字，或是將現有的護照攝影下來。這些護照有時是屬於已經死去的人的。

失業工人委員會

應當指出，布塞爾維克在那時建立了失業工人的羣衆組織；這一組織，在彼得堡是由失業工人委員會來領導的。這一組織，對於無產階級階級自覺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孟塞維克恐怕在這一組織中發展無政府主義的情緒，所以他們對這一組織採取渺對的態度。失業工人委員會領導者，是布爾塞維克馬立雪夫。

失業工人委員會，努力於組織公共工作，建立食堂，在物質上幫助失業者，組織他們的鬥爭，使之成爲無產階級總鬥爭的一種形式。可是布爾塞維克從來沒有使羣衆發生幻想，以爲這樣的組織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根本消滅失業。布爾塞維克僅僅努力將失業工人的鬥爭和整個其他工人羣衆的鬥爭聯合起來。失業工人委員會，是黨用來與工人羣衆發生聯系的合法可能之一。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失業工人的委員會，在其存在期內，是完成了這些任務的。

第九章 反動時期的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

革命的政黨必須學習，他們學習了怎樣進攻。但現在還需要懂得怎樣正確的退

却的科學，以作進攻之補充。他們須懂得——革命的階級已經在自己痛苦的經驗中

懂得了——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就不能期望勝利。

列寧左派幼稚病

六月三日以後統治的社會經濟實質

第二次國會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三號被沙皇政府命令解散，這一天，在俄國歷史上成爲政變的一天。因爲沙皇政府沒有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就發表了新的國會選舉的命令。這樣，沙皇政府就完全拋棄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號所發表的宣言，根據這一宣言，沙皇政府在發表新的法令時是應

得到國會同意的。可是，事情並不限於國會的解散；這一「國會」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被送交法庭審判；工人階級的代表，或是被罰處苦工，或是被判流放。新的選舉法，是在於加強國會內（以及國內）土地所有者地主及工商資產階級的影響，減少國會內工農代表的數量。有些居住被壓迫民族的邊區，在第二次國會中是派遣了革命的代表；這些邊區，或是完全被剝奪了選舉權，或是被限制了選舉權。根據新的選舉法，工人被派遣到第三國會的代表比第二次國會要少四倍；根據沙皇的法令，工人只能按照工人區，在六個省裏（彼得堡、莫斯科、哈爾可夫、也訶太林諾斯拉夫、帕拉金米耳、考司拖勞夫）每省選舉一個代表。選舉的制度是這樣的：大工廠的工人，在該工廠做了六個月以上，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繳納居住稅的，選舉了代表；這些代表選舉選舉者，選舉者再按照以上省份選舉一個議員到國會去。除工人區以外，社會民主黨只能利用人民中小資產階級階層的選舉票，被選到國會去。（在高加索某些地方，個別孟塞維克就這樣被選到國會上去）沙皇政府，一方面迎合貴族地主的要求，他方面迎合工商資產階級的要求，在勞動立法及土地改良上的好些步驟，把沙皇制度和自由的，帝制的資產階級溶合起來了。

沙皇的帝制，用列寧的話來說，是「在轉為資產階級帝制政體的路上又進了一步。」這就是說，沙皇政府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資產階級成立了妥協，同時繼續代表着農奴主的利益。在新的條件之下，他就在農村中保護着兩個階級的利益：一方面是逐漸加強的鄉村資產階級；他方面是大的土地所有

者及地主；沙皇政府就在他們中間縱橫排圍着，同時又負擔了鎮壓工農新的革命行動的任務。沙皇政府在農村中，在黑色百人團的地主與富農中間的縱橫排圍的情形，列寧稱之爲『農村的拿破崙主義』。這就是說，沙皇政府『失去了自己舊的宗法社會的和封建的簡單的團結的基礎』而在開始資產階級化之後，喪失了以前的穩定性。

自由資產階級也迎合了政府，資產階級的行動明顯的表示出他的唯一要求在於防止革命，在於阻礙革命運動往前發展。經過第三國會所通過的好些法令，資產階級鞏固了自己對於國家機關的影響，對於地主專制國家的影響。由於國會中地主的幫助，資產階級把勞動立法轉爲反對工人的法令，例如他把關於商業雇員休息的法令轉爲反對商業雇員休息的法令。資產階級一般的承認商業雇員一天應作十二點鐘的工，有些甚至達到十五點鐘。資產階級提出了戰爭性的口號：『偉大的俄羅斯！』正是從這時候起；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在沙皇政府政策上，對於近東的民族加緊搖幌着武器，正是從這時候起。俄國民族自由主義者的政策，開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正是立憲民主黨準備了輿論，提出必須在軍事上注意達達尼爾海峽與近東的主張。

工業的低落也促進了反動的情緒。工業的低落已經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開始了；在一九〇六、〇七年部份高漲之後，工業繼續低落。直到一九〇九年末一九一〇年初，工業的低落使得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空前惡化，資本在各個戰綫上進攻，職工會組織被搗毀，罷工運動低落下來。按件工資低落了，罰款

加重了，發生了許多關廠以及大批失業。同時，在農村經濟，特別在農民經濟方面却發生某些高漲；促成這種高漲的，是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的豐收以及下述情形：就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農民運動使得地主加緊把土地出賣，使得地主土地部份的轉入富裕農民手中，使得佃價減低；在這時候，糧食的收穫量是增加了。如果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每一個海可脫土地能收穫七·三真特奈耳糧食的話，那麼，一九一一——一五年每一海可脫已增至八個真特奈爾了。

政府清楚的知道，光是依靠貴族與工商資產階級是不夠的。他企圖使富裕農民成爲自己的鞏固基礎，企圖造成堅強的富農。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的法令，說明農民有權脫離公社，成立獨立經濟，分割土地，把土地鞏固爲自己私人財產的這種權利。這一法令，是應當爲着完成上述的任務的。沙皇政府在長時期內保存公社，作爲一種貢獻的賦稅的警察組織；現在却幫助農民中的富裕者脫離公社。當然，比較富裕的，富農的上層農村分子，就利用了這一法令。他們努力保存自己的大的分地，不僅購買地主土地，而且購買貧農的分地來增加自己地產。政府促進了這一過程，可是這種辦法是更加加緊了農民的分化。從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號發表的時候起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一號，在全體農家中，差不多五分之一或是差不多兩百萬的農家，把全體農民土地中的百分之十六固定爲自己的財產。應當指出，在富農加緊脫離公社組織獨立田莊的幾年（一九〇七到一九〇九）農民運動開始往下低落；但是不久，在一九一一年，由於公社社員和獨立田莊主人的衝突，使得農民運動又有了某些增長。這個農民運

動，現在所表現的，除反對地主的鬥爭以外，還發生焚燒獨立農莊的富農的房子，割除他們的糧食草料的事情。

沙皇政府土地政策新的改變的實質，就在於地主及資產階級已經覺到了破壞公社，破壞舊的分地所有權的必要。這種破壞成爲不可避免的了。列寧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寫道：『資本主義已經一往不回的破壞了俄羅斯舊的農村結構的一切基礎，但是，這一結構的破壞，可以按照地主方法或是按照農民方法來進行：可以爲着地主資本主義肅清道路；或是爲着農民資本主義肅清道路。地主式的對於舊制度的破壞，就是強迫的破壞公社，加緊的使得貧窮的農家破產及毀滅，使少數富農得到利益；農民式的破壞，是在於沒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見列寧新的土地政策）很顯然的，我們的黨，從這兩種『破壞舊制度的可能道路中，選擇了『農民式』破壞的道路，即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農民暴動的道路。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三日，沙皇接見了第三國會的三百零七個議員，沙皇聲明他不準許暴力的奪取地主土地。關於這點，列寧如下寫道：『農奴主的沙皇，向非黨的農村大聲的說，他不準許強迫的奪取地主土地。但是，工人階級爲着回答沙皇起見，向千百萬非黨的農民大聲說道：無產階級號召農民來進行羣衆的鬥爭，來推翻沙皇政府並沒收地主土地。』（見列寧新的土地政策）

在斯托理賓的改良下，農民是否喪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呢？沒有。相反的，在國會裏面以及國會之外，沙皇政體的土地政策以及他的一般政策之趨向拿破崙主義的轉變，只有使得這兩方面中間，即一方

面黑色百人團的專制政體及「野蠻地主」的統治，他方面全國經濟的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的衝突，更加尖銳起來，擴大起來。警察富農對於農村羣衆的進攻，增長了農村中的鬥爭，使得這一鬥爭在政治上更加覺悟。可以說，使得反對專制政體的鬥爭和每個農村的日常切身問題接近起來。（見列寧對於當前時機的估計）

政府的反革命及社會的反動

在解散第二國會並摧殘社會民主黨黨團之後，政府就更加殘酷的來摧殘工人階級的政治與經濟的組織了。因為解散國會沒有引起嚴重的羣衆的抗議，使得政府可以放手做事，因此，政府就更容易來鎮壓工人階級的組織了。政府不僅把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判處苦工和流放，而且使大批革命者擠滿了苦工的監獄，壘寨及流放地點。黑暗的恐怖，瘋狂地散佈着，絞手斯托理賓把絞架佈滿了全國。

工人階級及農民運動的失敗，使得第一次革命的同路人中間發生破裂和分化。在智識分子中間，這種破裂和分化特別的深刻。在革命最高漲的時期，從資產階級陣營中來加入革命政黨的那些人，到了償付代價，鎮壓革命的時候一來，便脫離了革命政黨。他們寧願實行適應斯托理賓統治的策略，而不願冒繼續鬥爭的危險。他們中間，一部份轉入革命的公開敵人的營壘，一部份坐在遺留下來的公開的

匿體裏面，並且經過出版物企圖以蛻化到斯托利賓制度去的精神，經過取消革命鬥爭形式與方法的道路來影響無產階級。

從來沒有像這幾年那樣多的內奸與叛變。沙皇的偵探和憲兵，利用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從革命政黨的黨員中吸收某些叛徒，這些叛徒甚至侵入了中央領導機關。例如在我們黨的中央，混入了內奸馬利諾夫斯基，在真理報的編輯部混入了切爾諾馬索夫；在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坐着內奸阿塞夫；他把社會革命黨軍事組織的一切計劃都報告了政府（很可注意的，就是當阿塞夫被揭發的時候，切爾諾夫以及其他社會革命黨的『戰鬥人員』，却使他能够安穩的逃去。）

在第一次革命中，出版光輝的革命著作之文學，也開始深刻的墜落下去。在文壇上出現了整整的作家，他們開始歌頌色情文學與性的淫亂。

所有這些醜惡的與墜落的現象，是在大批失業，大批驅逐工人，關廠，破壞工會以及其他工人組織等等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的。在一九〇七年封閉了一百五十九個職工會；在一九〇八年封閉了十個；一九〇九年封閉了九十六個；一九一〇年封閉了八十八個；職工會不能不轉入秘密狀況。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拒絕了六百零四個職工會的登記；在革命高漲時期，職工會的會員有好幾十萬，到這時候就減低到只有三萬五千了；在一九一〇年，救得薩、伊凡諾夫、窩司尼奧斯克及其他城市，職工會完全被摧毀了；在耶克太林諾斯拉夫以前有五十一個職工會的，到一九一〇年只剩了九個了；在莫斯科，一

九〇九年三月一日有三十二個職工會，四萬二千會員，到同年夏天，就只有二十個職工會七千會員了。資本的進攻，向着各方面進行着。按件工資在一九〇八年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時間到處延長到十小時到十四小時。工作時間的延長和工資的減少並行前進；罰款的制度又重興起來；工人活動的任何表現被殘酷鎮壓，不但職工會被封閉，而且職工會領導機關人員到處被逮捕，被流放。只在一九〇七年一年，就封閉了一百個以上的職工會的報紙；在產業中，大批驅逐工人，首先就將先進的工人驅逐於廠門之外。

所有這些事實，影響於無產階級的同路人的墮落；就是在我們黨的內部，這些事實也引起部份黨員的墮落。第一次革命的失敗，工人農民運動之受摧殘，工農運動之被破壞，一大部份智識分子的脫離，資產階級帝制政體的暫時穩定，所有這些，影響了我們黨內個別集團的動搖。因為我們的黨，在那時還不是包括純粹的成份的。脫離我們黨的智識分子是很多的，莫斯科委員會在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六號的通知中，指出了『智識分子可恥的從黨逃開』。在一九一一年末，列寧寫道：『經過四年破壞與分裂之後，建立起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心。』再後一些時候，在一九一二年一月黨的拍拉格會議的決議案上說到反動時期引起『大部份黨的組織的被毀與破壞，在多年內沒有黨的實際中心，——中央委員會』。在對於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同盟的報告中，列寧寫道：

『在最近幾年，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是動搖的破裂的幾年。在三年之中，黨沒有能够召

集代表會議在最近兩年以來，中央不能開展任何的行動。」

可是雖然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黨却還是保持了自己原則上的明確的黨的路綫，這個就證明了布爾塞維克的力量。在一九二〇年當列寧回憶這一時期的時候，他寫道：

「在這次被打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塞維克黨最退得旗幟不紊，其「軍隊」之喪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深痼與不可救藥而言），頹喪最輕，大規模的，正確而果毅的恢復工作之能力最大。」

布爾塞維克爲什麼能夠達到這點呢？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如此，在其能夠無情的揭破並逐出一般口頭革命家。這裏人不願了解退却的必要與怎樣退却。他們不了解在最反動的議會中，最反動的職工會中，協作社以及保險會等等組織之學習公開工作的必要。」（以上俱見列寧：左傾幼稚病）

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點，同樣也是因爲能夠澈底揭破那時的右的機會主義者——取消派孟塞維克，以及「左」的機會主義者召回派，抵制派的前進派等。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綫與組織路綫，這一時期黨的

中心的會議

我們已經提到了第二國會被解散以後所立即召集的我們黨的第三次代表會議（一九〇七年

七月)在這一會議上,討論了關於參加國會選舉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那時領導的是一九〇七年倫敦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所選舉出來的中央,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布爾塞維克,有列寧、都布魯文斯基、高爾登堡、麥西考夫斯基、盧世可夫、奇奧道勞維支、諾金、馬拉提及其他;孟塞維克有馬丁諾夫、秀兒丹尼亞、尼幾佛兒、伊索夫、馬爾托夫及其他;波蘭社會民主黨有端爾斯基、瓦耳斯基,他們的候補人有馬哈列夫、斯基、馬列斯基、鐵虛哥;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有丹尼雪夫斯基,候補人有布雪維茲、秀兒茲;以後中央委員會中又提進了三個人,兩個是猶太工人同盟的羅森及麥傑姆;一個是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克拉克本斯克龍堡。

這一中央是非常不堅定的,他沒有堅定的政治路線。猶太工人同盟代表常和孟塞維克一起,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是動搖的騎牆派。因為如此,在倫敦大會上已經形成自己組織的布爾塞維克,就不能繼續保留自己組織的中心,以便在中央內部堅持布爾塞維克的路綫。

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之後,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召集了第四次全俄黨的代表會議。參加這一會議的有十個布爾塞維克,四個孟塞維克,五個猶太工人代表,五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三個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在會議上,可以明白看到,布爾塞維克的秘密組織是保存得最多,這種情形加強了整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在社會民主黨中的影響。這一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國會中社會民主黨黨團策略的布爾塞維克的決議,這決議案說明:無論以何種形式都不能幫助立憲民主黨;因為,立憲民主黨人事實

上和反動的十月黨人一齊投票，他們不僅把自己形容成爲反對派，而且把自己形容成爲民主派的代表。在決議案說明：國會黨團的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向廣大民衆說明第三國會對於人民利益的完全違背，揭破政府的自由派的提議的階級實質，把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的要求不加任何削減與他們的要求對立起來，同時應當特別注意那些關係廣大民衆經濟利益的問題。這次議指出：在某些場合，可以和比較立憲民主黨人爲左的集團成立妥協，但同時不許在社會民主黨綱領及策略上有任何的退讓，也不需要同他們成立某種聯盟。黨之所以不能不通過這一決定，是爲着防止國會黨團蛻化的可能，防止國會黨團蛻化成爲完全脫離黨的領導機關而獨立行動的集團之可能。在西歐國會的實際經驗中，常時發生這種情形，就是國會中的社會黨員完全脫離自己的黨及自己選舉人而獨立行動，並且事實上常是迎合資產階級的國會政黨；他們不同工人階級作報告，也不向他們負責。在我們決議中，指出國會黨團必須服從中央委員會。決議並且提出了如何以革命方法利用國會講台的任務。社會民主黨的議員，進到國會裏去不是爲着『創造的工作』，而是爲着利用國會的講台來進行革命的鼓動，並且把勞動民衆團結到工人政黨黨綱的不折不扣的要求上來。

關於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例如蒲列哈諾夫）參加資產階級報章的問題，代表會議在特別的『關於參加資產階級報章』的決議案中指出：『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自由派及自由民主派報章，在現在是帶着這樣的性質，就是他能夠給工人政黨以嚴重的損害；如果，這種參加往前繼續下去，那麼能够引

起社會民主黨的重重的思想上與組織上的墮落。」

在這一代表會議上同樣通過了『關於小組織中心及鞏固中央與地方組織聯系』的決議。事實上，在各地地方那時不僅保留了特殊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中心（委員會），而且在許多孟塞維克佔統治地位的地方，孟塞維克非但不給布爾塞維克以任何工作，而且不讓牠們接近黨的秘密組織。在孟塞維克佔據統治地位的組織裏，布爾塞維克從沒有減弱過揭破他們錯誤的工作。此外又通過了決定，要立即開始出版黨的中央機關報。

一九〇七年末，全俄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定，更要求布爾塞維克向黨內及黨外的一切機會主義的派別與傾向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時候已經發生了各種機會主義的派別，從右來的取消派以及從『左』來的取消派。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對於這些孟塞維克取消派及『左』的取消派的各集團的鬥爭，是我們黨在這幾年（不僅在反動時期而且在新的革命高漲的幾年）的工作內容。這種鬥爭不僅進行於國外的領導中心，而且進行於俄國的黨的地方組織。

孟塞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塞維克對於他們的鬥爭

社會民主黨內的分歧，在第一次革命失敗後是更加厲害了。一部份孟塞維克，認為無產階級的失

敗是證實他們觀點的正確，就是無產階級不能成爲當前革命的領導者，同時，他們認爲這一革命已經完結了。孟塞維克中間，大部份開始宣傳必須取消秘密工作與秘密組織，孟塞維克取消派提出要適應於沙皇的斯托理賓的統治，只在沙皇法律所容許的合法範圍內進行活動，爲着這點，須減削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口號，不要提出我們基本的革命要求，而提出部份改良及修改現有立法的打了折扣的要求，因此，他們得到了『斯托理賓的工黨』的別號。在倫敦第五次代表大會以前，他們已經提議要建立『廣大的』、『公開的』工人政黨，實際上這一種『廣大的』政黨，完全不是革命行動的政黨，而祇是機會主義者的政黨罷了。

那時在俄國公開發行的雜誌我們曙光、復活和生活事業等上面，孟塞維克取消派開始公開的宣傳，說我們當前不是向着革命危機而是向着憲法危機。說，迎接了這一危機，工人階級有完全的可能去從昇到政權地位的資產階級手裏獲取部份的讓步，以便能夠擴大自己鬥爭的範圍并增加組織的可能。孟塞維克取消派聲明斯托理賓的改良是已經實現了，聲明俄國已有『文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應當適應於它。這些孟塞維克取消派，如拉林、耶小夫、賴維斯基、波特列索夫等，確定的說，那時社會民主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消，因爲秘密組織是沒有了；如果要把他恢復起來的話，那麼『真正的人士是不會走向地下的。』孟塞維克馬爾托夫聲明『秘密政黨現在沒有政治的任務』，而認爲特別地從事於取消這些外表，是一種沒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馬爾托夫和但茵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統一的編輯部，並且有時裝腔做樣，好像他們是在批評取消派。可是在事實上，他們自己正是取消派，並且對黨的工作怠工。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孟塞維克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合法的『斯托理賓的工黨』。這種黨，是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他們正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工作。

列寧在許多文章上，斯達林在高加索來信上，都揭破了取消派，指出取消派是放棄社會民主黨綱領，放棄革命策略并取消秘密政黨的。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全俄黨的代表會議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在巴黎經過很大的困難召集了第五次全俄黨的代表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列寧、達拉都太、波力達耶夫，以及從中央工業區、彼得堡、烏拉爾來的五個布爾塞維克代表；孟塞維克從高加索及南俄派遣了三個代表亞克爾、索洛特、但茵、拉賓、雪維力；此外，在會議上還有三個猶太、勞動同盟代表伊恩諾夫、猶琴、凡英西頓；五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鐵世加、馬爾哈力夫斯、賴得爾、頓布洛無斯基及加涅斯基；一個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出席的在一半以上。這一代表會議在極大的限度內是布爾塞維克的，在其決議案的重要性上說來，他代替了黨的代表

大會，在那時的條件之下黨的代表大會是不可能召集的。孟塞維克沒有能够把國外中央執行局（這實際上是孟塞維克的中央）的代表派遣到會議上來；除高加索代表亞克爾雪洛特、但茵、拉賈雪維力及一個烏拉爾孟塞維克代表之外，其餘從俄國派來的代表都是布爾塞維克。所以這一代表會議的決議，帶着布爾塞維克的性質。在列寧所起草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書裏面，給出了內容豐富的并為以後整個歷史進程所證明的形勢的估計。這一估計的要點，是說『舊的農奴制的專制政體是在崩潰着，它在轉為資產階級帝制政體的道路又前進了一步』。『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土地政策，』……『使得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一切矛盾千百倍的尖銳化起來，并使農村加速分化為極少數的反動派以及革命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羣衆』。『十一月九日的法令，只是加速使農民羣衆分化為不可調和的兩相鬥爭的及自覺的政治力量。』在這一決議案中特別指出，引起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基本原素繼續發生作用，因此『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情況之下，新的革命危機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更指出國際形勢『也使得國際間的衝突更多發生，這樣也就使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尖銳化，并使總的革命形勢日益革命化。從這上面，就得出了一定的決定。黨的任務，還是以前的任務，應當向廣大羣衆解釋目前已經發生的變更的意義，研究第一次革命的經驗，鞏固黨的革命組織，和以前一樣向一切脫離革命路綫的傾向作鬥爭，特別是應當和『脫離革命馬克斯主義及削減社會民主黨口號的現象作鬥爭；這些現象，現在在有些受到墮落影響的黨內分子內，特

別強大的表現出來。」應當促進工人的經濟鬥爭。在當前議事日程上，首先提出了對於無產階級覺悟羣衆的教育組織與團結的工作，同時更指出，在這上面不應忘記農民與軍隊中間的工作。這上面主要的注意力，應當放在『農民與軍隊中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的教育上面。』在關於國會中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決議案中，對於工會黨團活動給了尖銳的但同時是同志的教育的批評。

關於組織問題，代表會議認為『黨應當特別注意於利用并鞏固現有的組織，同時建立新的非法的，半合法的，以及在可能範圍內合法的組織。這些組織可以被黨用來作為黨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宣傳及實際組織工作的據點……全部這些工作，要能成爲可能與有效，只有在下述條件之下：就是在每一個生產企業，成立純粹黨的雖然人數不多的工人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與羣衆密切相聯，而整個合法組織的工作應當處在祕密黨的組織的領導之下。』特別會議指出了恢復黨的工作上的基本環節，這樣的環節，就是非常靈活的產業支部。地方黨的組織建設的重心，應當轉移到支部上去，我們黨就這樣的最殘酷的反動時期鞏固了自己在布爾塞維克黨堡壘（工廠）中的影響。

召回派和哀的美敦書派是取消派的內應

在革命低落時期，在退守時期，我們的黨不僅要與右的孟塞維克取消派的危險進行鬥爭，甚至在

布爾塞維克中某一部份人，也沒有看到第一次革命被鎮壓以後沙皇帝制政體的『變化』沒有看到政治情況中的這些變更。按照這些『布爾塞維克』的意見，好像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革命之後，什麼東西都沒有變更似的。他們對於政治形勢的不正確的估計，使他們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以及對於工人階級有害的政治路線。早在一九〇七年六月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三次會議上面，從中央工業區及莫斯科來的一部份布爾塞維克，就已經提出要抵制第三國會。在通過決議案時，爲着使得孟塞維克不能得到勝利，主張抵制的人們，就擁護了列寧的決議。列寧那時是反對抵制的，在代表會議前所出版的『論抵制第三國會』的小冊子上，除列寧的『反對抵制』的文章之外，還登載了卡米尼夫的擁護抵制的文章。卡米尼夫站在有害的抵制的立場之上，不去估計當時來到的反動時期的新形勢。地方黨的組織，遵照列寧的指示積極地參加了選舉，這一選舉是在殘酷地破壞一切工人組織的環境之下舉行的。第三國會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大部份是孟塞維克，在他們最初行動上，就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錯誤。

在一九〇八年，主張抵制的人們，又重新進行他們反對參加國會的鬥爭。他們認爲：黨參加選舉是犯了錯誤，他們要求召回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因此他們就被稱爲召回派。召回派的主要理由如下：國會內合法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存在，會在工人中造成欺騙的希望，以爲第三國會可能解決某些對於工人階級有切身利益的問題。召回派認爲國會中的合法活動，是黨對於準備武裝暴動的直接任務的脫離，因此他們反對國會中的合法活動。根據同樣的理由，他們反對參加合法的社會俱樂部、合作社

等等。這樣，召回派就反對利用合法的可能。這種可能不管反動的嚴重，不管採取如何減削的形式對於工人還是有些成績的。召回派努力想使黨從工人階級脫離開來，把黨轉為關門的集團；召回派不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鬥爭的必要；不懂爲着這一目的利用一切公開可能的必要。因此，召回派雖用『左』的詞句，可是正像取消派一樣，實際上否認了無產階級領導權。

召回派不懂得在已經來到的反動的條件之下應當改變策略，鞏固黨的祕密組織，同時利用一切合法的及半合法的可能來與羣衆聯系。列寧說，召回派所提出的是『把一九〇五年、〇六年革命詞句保留起來（保留於罐頭中）的策略，而不是把革命方法用不同的環境，用到已經改變了的時期。這種時期，要求不同的組織方法與組織形式。召回派的策略，是死的策略』（見列寧：致高爾基的兩封信）。

一部份召回派要求立即召回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一部份則主張向他們提出哀的美敦書：『或是議員要如此道般的作，或是把他們召回來。』一九〇九年在國外召集的無產者編輯部的擴大會議，認爲哀的美敦書派是這樣的一種趨向：『這一趨向，在原則上拒絕利用第三國會的講台，或是用某些事實的理由企圖爲自己不執行這種責任的行動作辯護；他們要想召回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於是利用向國會黨團立即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方法來代替長時間的對於國會黨團的教育與糾正的工作。』

一九〇九年六月「無產者報」編輯部的擴大會議

一九〇九年六月在巴黎召集了無產者報編輯部的擴大會議。這是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代表會議，參加的還有地方的代表（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的代表）出席這一會議的有列寧、都魯溫斯基、西孜夫斯基、波格達諾夫、馬拉特、達拉都太等。斯達林同志那時是在流放着。

這一會議，指出了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書派對於那些與無產階級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分子的關係。這些趨向是如何脫離了布爾塞維克主義，有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如在彼得堡，召回派及一部份社會革命黨聯合起來反對布爾塞維克，拒絕幫助黨在國會內的代表，並且在有些場合，召回派和工團主義者一起行動。這就是爲什麼在一九〇九年布爾塞維克機關報無產者的擴大的編輯部這樣的說道：

『布爾塞維克主義，是社會民主黨中的確定的政派，它與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書派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布爾塞維克派應該與這些脫離革命馬克斯主義道路的傾向進行最堅決的鬥爭。』

實際上，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書派是『左』的取消派——是取消派的內應，因爲他們提倡取消那種能使我們黨接近羣衆（雖然有些困難）的工作方式。

這些是作內應的取消派。因為他們脫離羣衆中的工作，所以他們就幫助了右的取消派的成功，幫助取消派在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政策的成功。在一九〇九年，『左』的取消派同樣被逐出布爾塞維克黨之外。在其他國家的工人政黨中，在某種環境之下也發生這樣『左』的機會主義的情緒與觀點，這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病。我們的黨在第一次革命時期，以及在兩個革命之間的時期，都和這種幼稚病進行了鬥爭。以後，在一九二〇年，列寧在共產國際中，當這種情緒在德國及其他國家共產黨的一部份裏面發現的時候，列寧又與這種情緒與觀點進行了鬥爭。

那時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中間的動搖，表示出在他們觀點的哲學基礎上，是發生了動搖。某些同志（盧那卡爾斯基、波格達諾夫等）努力把敵視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觀點（資產階級哲學馬赫與阿文那力奧斯的學說——所謂經驗批判論、經驗一元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學說——辯證法唯物論聯系起來。資產階級哲學家的學說，使這些人很遠的離開了布爾塞維克的路綫。除這些哲學的迷亂之外，還發現了求神論及造神論的傾向（盧那卡爾斯基及其他）。盧那卡爾斯基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宗教與社會主義一書內說：『馬克思……澈底的幫助神的自覺，使之轉爲人類的宗教。』盧那卡爾斯基說明新的宗教是比較任何宗教所固有的更有根據的一種希望。我們的黨就出來反對這種反動的說教，列寧對於這種神的名回派給了下述的估價：『求神論和造神論的區別，并不比較黃鬼和藍鬼的區別爲多。提出求神論并不是爲着反對任何的鬼神，反對任何思想的迷亂，（任何的拜神，不管

他是最純潔的，最理想的，最天真爛漫的都是迷亂）而是爲着不要黃鬼要藍鬼。這比較不說一句話還要壞一百倍……

『任何從事造神或是允許這種造神的人只是最壞的作踐自己，他不去作事而來自思自愛。這種人，只是思考着自『我』的，最無味的，愚蠢的，奴化的特點和小特點，這些特點是被造神論所神化了。』

列寧認爲必須給這種哲學上的迷亂以打擊，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揭破了波格達諾夫、盧那却爾斯基等哲學動搖的反動性。列寧花費了許多勞力與時間，把那些已發現了的思想的動搖作一個哲學的分析。那時有某些人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年列寧這樣多的研究了哲學。列寧的著作，給了澈底辯證法唯物論（馬克斯、列寧主義哲學基礎）的一切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列寧的哲學著作，對於革命世界觀的基礎的發展，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這一著作是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論發展上的新的更高階段的著作。

關於造神派與求神派的問題，在一九〇九年六月無產者擴大編輯部的會議上是經過了討論。這一會議認爲：『對於一切形式的宗教觀念與宗教情緒（無論他們從那里來的）的鬥爭是必要的，是領導機關的當前任務之一。』

在無產者編輯部的擴大會議上，卡米尼夫、徐諾維夫、李可夫、湯姆斯基對於『左』的機會主義

者採取了調和的立場，並且沒有參加會議的重要決議案的表決；實際上，卡米尼夫及徐諾維夫是擁護「左」的機會主義者的。卡米尼夫購着列寧寫信給被黨開除的波格達諾夫，說他從一九〇五年以來是波格達諾夫的唯心哲學的信徒。

「左」的取消派聯合為前進派

在一九〇九年底，在黨通過反對「左」的取消派，反對召回派、哀的美敦書派、造神派、求神派等的決議之後，他們聯合成為獨立的組織，成為「前進派」。這一派有自己策略的綱領，並且運用高爾基的錢來建立黨校，開始在意大利的卡普利的島上，以後在撥龍尼亞地方。前進派說，他們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革命者，而列寧及其信徒，據他們說是「右傾」了，並且不再是布爾塞維克革命者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有幾個前進派人，是永遠離開了我們的黨，並且第二次及第三次革命使他們轉入無產階級革命的營壘（如伏爾斯基、阿來克辛斯基等）前進派是由盧那却爾斯基、阿來克辛斯基、伏爾斯基、略多夫、博可洛夫斯基、丹司尼斯基等組織起來的。在俄國會選送了前進的工人到前進派所組織的卡普利黨校中去，在開始時候他們認為這一黨校將是全黨的黨校，所以在選送工人時，許多黨的組織是參加了（在這一黨校的組織中，工人布爾塞維克對託諾夫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早在一九〇九年六月無產者報編輯部擴大會議上面，就在特別的關於卡普利黨校的決議案中指出，這一黨校的發起者『所要達到的目的，不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目的，不是黨內的布爾塞維克思想取向的目的，而是他們自己小集團的思想政治的目的』更指出黨校的發起者組織者『完全是召回派、良的美敦書派與造神派的代表』所以『布爾塞維克派不能對這學校負任何的責任。』

當來到卡普利學校的工人看到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常時不是馬克斯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而是召回派及求神派的政策與哲學的時候，於是他們中間的一部份人就轉到巴黎來；因為那時列寧住在巴黎，布爾塞維克中心也在巴黎。在這以前，他們聘請列寧到卡普利黨校中去講課，但列寧拒絕了，理由是因為這一學校是被召回派利用來進行小組織的鬥爭。

列寧於是在巴黎郊外，在龍秀莫地方組織了另外一個黨校。在那裏，除列寧講授俄國土地改革以外，還有都布魯溫斯基、馬爾克佛蘭及米洛夫幾人講課，這一黨校，在革命幹部的理論訓練上是做了許多工作，這些幹部後來就回到俄國做黨的工作。

卡干諾維奇同志在一九三一年紀念紅色教授學院十週年的演說中指出了這兩個學校建立的尖銳原則的分別。他說：

『我們幹部的理論訓練，常是充滿着切身的政治的內容，試舉列寧在龍秀莫建立的老布爾塞維克黨校的例子，並舉這一黨校的經驗和召回派波格達諾夫所組織的卡普利島上所

建立的學校相比較。這兩個學校，有兩種課程，有兩種不同的對於準備幹部的的方法；如果在波格達諾夫所組織的卡普利學校中，佔特別顯著地位的，是社會世界觀史、藝術史、俄國文學史、及俄國教堂與國家的話，那麼，在列寧所組織的黨校裏，主要課程是土地問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際及勞動立法；如果在那裏是藝術史的話，那麼在這裏就是社會主義理論與實際；如果那裏是俄國文學史的話，那麼這裏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如果那裏是俄國教堂與國家的話，那麼這裏是勞動立法。

『在把這兩種課程比較的時候，我們清楚的看到布爾塞維克和列寧是善於而且已經在理論與實際的不可分離的聯系中提出了革命的基本問題的。』

可以指出，在巴黎黨校中與爾卓尼基茲、世佛爾滋、多加多夫、邱古靈、不來司拉夫、滿諾也夫、別盧司道斯基、西文（是在巴庫被殺的二十八委員之一）筆夏琴、樸裏喜耶各、可薩略夫、費龍諾夫等同志，是受過訓練的。

反對托洛茨基中間主義立場的鬥爭，反對布爾塞維克中調和派的鬥爭

當列寧進行不調和的兩條戰綫的鬥爭，反對孟塞維克取消派，反對『左』的取消派——召回派，

爲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定路線而奮鬥的時候，有些人却想以非小組織的名義，以聯合及調和一切派別及小組織的名義來阻礙黨的路綫的決定。在這些企圖把黨轉變爲垃圾箱的人們中，包含了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站第一位的就是孟塞維克托洛茨基。正在這幾年，列寧稱他爲無賴的托洛茨基，從一九〇八年起，是國外真理報的編輯。這報，是在爾伏夫地方由烏克蘭社會民主聯合會「斯比爾加」出版的。「斯比爾加」組織中的成份，大部份是孟塞維克，而且以後不久，就確定的成爲充分孟塞維克的組織了。托洛茨基組織了以他的真理報爲首的文化團體，托洛茨基那時是中間主義者，努力想無原則地根據取消派的綱領來調和并統一布爾塞維克與取消派。實際上，托洛茨基的調和主義，是取消派的一種隱蔽的，危險的一種形式。

列寧對於托洛茨基在反動時期的立場，做了如下的估計：『托洛茨基，表現自己是梁尚諾夫式的那種最下流的投機主義者及小組織分子。或是建立編輯部中的平等，服從中央，並且除托洛茨基以外不要任何人移到巴黎來。（托洛茨基這個混蛋，要用我們的錢來安置真理報的整個親熱的集團）或是和這種過路分子決裂，並且在中央機關報將他揭破。他膽說黨，可是他自已表現得比其他一切小組織分子還要壞。』以後，在一九一二年托洛茨基就聯合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集團與傾向組織所謂八月聯盟來反對布爾塞維克黨。托洛茨基派那時是在俄國傳播中間主義的主要集團。像斯達林同志所說的，『中間主義是政治的範疇，他的觀念是隨遇而安的觀念，是在一個政黨中把無產階級利益服從

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觀念。這種觀念是與列寧主義相仇視並且對立的。」（見列寧主義概論）

托洛茨基是代表中間主義的最純粹的形式，這種中間主義並不限於托洛茨基信徒之中，在這幾年裏，布爾塞維克中間也有不少傾向於中間主義立場的調和派，他們中間有卡米尼夫、徐諾維夫、布魯溫斯基、諾琴、李可夫及某些那時在俄國國內及國外黨的工作者。巴黎的布爾塞維克調和派夫拉基米洛夫、馬爾克等，也是這一趨向的代表。他們自稱為布爾塞維克護黨派。他們在一九一一年的根據地，在國外是擁護黨報，在俄國是統一報。他們和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所謂分離運動進行鬥爭，他們認為列寧的分離政策是在於有了取消派及召回派的特殊派別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為這個派別及小組組織辯護。列寧稱布爾塞維克中的調和派為托洛茨基的應聲蟲。調和派的全部哲學，是在於說『小組組織是罪惡，』『非小組組織是好事。』

從一九〇九年，列寧及斯達林不得不加緊向布爾塞維克中的調和派進行鬥爭。在外高加索，馬哈拉則等，是採取明顯的調和派的立場的。一九一〇年一月，在贊成統一的人們的壓力之下違反了列寧的意見，召集了中央全體會議。

一九一〇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

由於一部份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的脫離，中央的成份是大大的改變了。早在一九〇八年八月，孟塞維克就已經提議解散中央，代之以收集消息的委員會。因為他們說，無論如何黨是要崩潰的，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領導了。一部份布爾塞維克還企圖想使思想上組織上各相脫離的派別調和起來。而調和派諾琴、都布魯溫斯基、烏拉基米洛夫、李可夫、索可爾尼可夫、釐索夫斯基、馬爾克、高爾鄧堡等，也幹着這種沒有希望的事情。

在一九一〇年一月，在中央的全體會議中，不管列寧的反對，調和的情緒還是如此的強大，使得會議竟決定了停閉布爾塞維克的無產者報，而且甚至給托洛茨基真理報以金錢的補助。卡米尼夫加入了托洛茨基報的編輯部，同時還決定了停閉孟塞維克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之聲。爲着調和起見，在所通過的決議案中磨去了一切尖銳稜角。會議決定了出版統一的中央機關報，這報的編輯部，經過選舉包括兩個布爾塞維克，兩個孟塞維克和一個波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佛爾斯基。爲着討論爭論的問題，決定出版論爭之真；此外還決定了中央的領導組織移到俄國；爲着領導國外的的工作，組織了國外的中央局，這裏面參加了一個布爾塞維克代表，一個猶太工人同盟代表，一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代表，一個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代表。可是，從這些調和的決議中，（列寧警告了並堅決進行了反對這種調和派決議的鬥爭）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中央的孟塞維克候補委員米哈以爾、猶里及羅曼聲明他們不加入中央，因他們一般的不願意參加秘密的組織。諾琴及高爾鄧堡回到俄國來找他們參加，以便執行中央

全體會議的決定。可是結果無效。在尋找孟塞維克的中間，他們被捕了。這時候十六個著名的孟塞維克，在繼續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之聲報上發表了聲明，說他們對於開始在俄國出版的取消派雜誌我們旭光是負責任的。『左』的取消派召回派，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之後，開始鞏固自己小組的中心。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的真理報上繼續污蔑布爾塞維克，並多方的擁護取消派。

很明顯的，列寧最堅決的向這種給黨以重大危害的調和情緒與辦法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他在這時期的文章與書信證明，在這一期間，特別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上，他在布爾塞維克中反對調和派的尖銳的鬥爭。關於中央全體會議，列寧認為這會議是『好的與壞的兩方面的出發點，是社會民主黨以後發展中往前進步及以後動搖的出發點』。列寧指出了中央全體會議所犯的『巨大的調和主義的錯誤』，因為調和派相信了取消派、前進派、召回派及托洛茨基的謬言，而以自己的投票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這樣有害的決定，如：停閉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無產者。只在列寧的堅定的布爾塞維克的堅持之下，一九一〇年一月的中央全體會議才通過了切實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決定。

結果正像列寧所預先看到並警告過的那樣，僅僅布爾塞維克服從了中央全體會議的決議，停閉了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孟塞維克却繼續發行着自己的社會民主黨人之聲。在統一的孟塞維克的機關中，工作是放肆地進行着的；可是布爾塞維克的總部，却受到束縛，正在加緊恢復黨的組織，並打擊

反黨派別與小組織的時候被逼開空下來。這種嚴重的狀況，是由一部份布爾塞維克的調和主義所造成的，他們因之成了機會主義的助手。

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防礙了列寧的兩條戰綫的鬥爭；而在列寧背後與波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佛爾斯基協商，給列寧以壓力，逼他放棄反對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綫的鬥爭。

每一個共產黨員，從反動時期反黨工作的例子上可以看到調和主義正是脫離黨的總路綫的危險的機會主義。調和派是孟塞維克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在黨內的代理人。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護黨派的同盟

托洛茨基和幫助它的卡米尼夫、徐諾維夫、李可夫等提出將一切派別與小組織做一個無原則的混合；可是列寧與之相反，實行了堅決的路綫來把社會民主黨中的一切革命分子，一切能够與取消派鬥爭的分子集結起來。在這個基礎之上，布爾塞維克就和孟塞維克護黨派（這些孟塞維克還是認為必須保存黨的祕密組織）訂立了戰鬥同盟。領導這些孟塞維克護黨派的是蒲列哈諾夫。蒲列哈諾夫在他那時登載於我們報章上的一篇文章中（因為這篇文章，孟塞維克稱他為祕密工作的歌頌者）寫道：

『我們地下的田鼠萬歲！讓我們地下組織發展並鞏固起來吧！』

這一戰鬥的妥協，是不是說布爾塞維克對於反對取消派的孟塞維克護黨派做了任何讓步呢？自然沒有。行動的統一，是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列寧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解釋這一種同盟是反對一切取消派的統一戰綫的形式：

『在一九一〇年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護黨派在黨的一切領導機關裏（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進行了工作。這是兩個「強大政派的聯合」的第一步，是在反取消派及召回派的一個旗幟之下思想準備與集合力量的的一個步驟。』

列寧在給季可夫的信中，尖銳的批評了某一些中央委員的調和主義。並且在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信中，確定的指出在國外應當聯合什麼人使得可以『立刻的靠得住的』爭取『國外的多數（布爾塞維克，蒲列哈諾夫派，擁護黨的工人，在各省，在美國的許多派別。』爲着證明聯合蒲列哈諾夫派來和取消派鬥爭的必要，列寧如下解釋道：

『關於如何成爲革命領導者的問題，我們是和他們區分開來的；但是在革命低落的時候，在反對那些把領導權問題當做空洞幻想的人們的時候，我們是同志。』更早些，列寧說明：『在現在困難的時候，當黨在理論上爲馬克思主義而鬥爭，在工人運動實際上爲黨而鬥爭的任務放在當前議事日程上的時候，一切布爾塞維克的無條件的責任，應當用全部努力來

和這些社會民主黨人相接近。」

在一九一〇年五月，在另外一個地方列寧這樣寫道：

「只有把這些擁護黨的孟塞維克分子和布爾塞維克以及非小組織的反對取消派的護黨派團結起來，中央的國外局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才能幫助俄國的工作。國外的布爾塞維克正是號召一切同志來這樣做的。」

經驗證明，我們的黨為着聯合進行反對取消派與召回派的鬥爭來實行這種接近，是完全正確的。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斯達林同志在回答無原則的徐諾維夫、托洛茨基同盟的時候，指示出：「列寧曾經贊成這樣的黨內同盟，這種同盟第一是原則性的；第二他的目的是為着鞏固黨反對取消派，反對孟塞維克，反對動搖分子。在我們黨史上，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同盟的經驗，是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列寧派和蒲列哈諾夫派的反對取消派同盟。在那個時候，取消派組成了反對黨的八月同盟，參加的有模特來索夫及其他取消派，阿來克辛斯基及其他召回派，這一同盟為首的是托洛茨基。這樣的一個同盟，是反黨的無原則的冒險主義的八月同盟；而另外的一個同盟，則是列寧派和蒲列哈諾夫派，即和革命的孟塞維克（那時蒲列哈諾夫是革命的孟塞維克）的同盟。這樣的同盟，列寧是承認了的，我們全體也是承認的。」

我們黨的這一路線，促醒了孟塞維克的好些集團起來向取消派抗議。例如彼得堡非保爾區孟塞

維克的抗議，莫斯科及其他地方孟塞維克的抗議。這一對於蒲列哈諾夫派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幫助布爾塞維克去爭取那些還在孟塞維克影響之下的工人。斯達林同志在那一時期致列寧的信裏寫道：

『據我的意見，同盟（列寧和蒲列哈諾夫）的路線是唯一合適的，因為：一、它，只有它適應於俄國工作的真正的利益。在俄國，現在要求將一切真正擁護黨的分子團結起來；二、它，只有它加速這種過程，使得合法的組織能夠從取消派的障氣下解放出來，並在工人孟塞維克與取消派之間掘下一條深溝，消滅並擊斃取消派。爭取合法組織中的影響是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復興黨的道路上的必要條件，而同盟正是從這些組織中清除取消派垃圾的唯一手段。』

在同盟的計劃中，可看到列寧的手跡。他是聰明的人，他知道蝦子是在那裏過冬的。但這不是說任何的同盟是好的。托洛茨基的同盟——他也許說是『綜合』——是腐敗的無原則性，是各種原則的混淆品，是無原則的人對於『好的』原則無可奈何的『憂愁』。在俄國，布爾塞維克爭取黨的組織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在列寧周圍保持了堅定的布爾塞維克的骨幹，他們不受任何動搖與猶豫的影響，他們在這反動時期的困難的幾年，領導了工人階級的前進部份。

由於堅持並實行列寧的黨的路綫，布爾塞維克能夠參加到四次合法大會（民衆大學的，合作社的，婦女的，以及工廠醫生的大會）的工人集團中去。這一特殊的統一戰綫的策略，使得布爾塞維克列寧派能夠爭取好些工人的孟塞維克組織（彼得堡的非保爾區，也洛太林諾斯拉夫）建立在原則基

礎之上的對於蒲列哈諾夫派的同盟，使得我們能够建立兩個戰鬥的機關報：秘密的工人報和公開的星報。這兩個報，在工人運動開始高漲的時候是起了極大作用的。工人報是供給新的工人黨員看的通俗機關報，和托洛茨基的無原則的中間主義報紙（所謂維也納的真理報）不同。工人報把通俗的敘述方法和無產階級路綫的理論的緊定性結合起來了。至於星報，那麼它成了純粹布爾塞維克機關報，成爲一面旗幟，在其周圍團結了工人階級最好的力量。

在總結反動時期，總結黨史上的這個最困難時期的時候，應當着重指出：一、布爾塞維克是領導了工人階級，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在反動時期，他們也沒有和工人階級脫離關係，沒有放棄革命口號。爲着準備新的革命，保存了並堅持了秘密組織，並且在反對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鬥爭和反對調和主義的鬥爭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立場；二、布爾塞維克在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的經驗中得到了鍛鍊，利用了一切最小的可能來與羣衆發生聯系。布爾塞維克在反對取消派、召回派、造神派以及一切脫離無產階級的派別的鬥爭中堅強起來了；三、這一時期以及往後時期的布爾塞維克的重要功績，是在於他們能够在組織上和一切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和小組分別開來，能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階級鬥爭的了解中保守團結並教育黨的幹部。

第十章 在新的革命高漲時期中的黨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

黑色百人團反動的完全統治時期已經結束了，開始了新的革命高漲的時期；退守的無產階級，雖然有了從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九年的長期的間斷，但是現在又集中了自己的力量，開始轉為反攻。有些產業部門中的活躍，使得無產階級的鬥爭也活躍起來了。……無產階級開始起來了，民主的青年們也跟着起來了。俄國的人民，已經甦醒起來參加新的鬥爭了，他們迎接着新的革命。

列寧

新的革命高漲的開始

第一次革命前夜開始的工業危機，在一九一〇年初結束了。隨着工業復興的開始，經濟和政治罷工運動浪潮也開始了。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羣衆罷工運動的高漲，表示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並且

表示了第一次革命前夜的標誌；一九一〇年罷工運動的高漲，也表示新的革命高漲的開始。列寧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寫道：『我們現在看到，在反革命三年殘暴的摧殘之後，被各種恐怖方法所壓迫的，摧殘的，打擊的，驚駭的人民大眾又開始抬起頭來，大家都驚覺了，重新開始參加鬥爭。三年中的屠殺逮捕和野蠻的摧殘，不知消滅了多少沙皇制度的『敵人』，又不知有多少是關在監獄裏及被充軍，更不知有多少是被嚇怕了。可是現在千百萬的羣衆，已經不是革命以前的他們了，在俄國的歷史上，千百萬的羣衆從沒有經過這樣深切的顯明的教訓和這樣公開的階級鬥爭。』

一九一〇年秋，是政治鬥爭中的轉變時機。在幾年困苦的反動時期以後，在幾年的沉靜以後，於一九一〇年秋因為托爾斯泰的逝世發生了學生的第一次政治示威。會生們不願立憲民主黨所提出的一些『鎮靜』的號召舉行了示威。列寧說：『這些示威是革命的青年們對於立憲民主黨的一種唾棄。』

在布斯科夫、托波爾斯克、沃洛格卡、色林多易、克多瑪拉等地的監獄和苦工場中，對於政治犯的拷打是起了推動革命的作用。最粗暴的虐待，拷打和摧殘，引起了政治犯中普遍的反抗；對於政治犯實行虐待和不可忍受的摧殘，引起了工人階級中普遍的義憤。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連那流域慘案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在遼遠的連那流域的森林地區，在波達依爾附近發生了事件，這一事件震動了全國。在連那金鐵工業區，工人要求改善自己不可忍受的生活條件，軍隊向着手無寸鐵的工人羣衆用排槍射擊，結果打死打傷了有幾百人。連那的慘案，使工人階級想起了第一次革命後黑暗恐怖的情形，那時不知道有多少上了斷頭台和被槍決，那時的討伐隊簡直將整村整鄉的羣衆燒殺一空。從一九〇七年六月以後的幾年中，是最嚴厲的黑暗的反動時期。當很遠的森林地區，離開京城有七千俄里，距鐵路也有兩千俄里的地方，發生了對於赤手空拳的工人羣衆實行屠殺，結果死傷五百餘人的事件時，便引起了全國極深刻的憤怒。連那工人的鬥爭所提出的是最初步的經濟上的要求，是整個工人階級反對卑污兇橫的沙皇制度鬥爭的反映。這次慘案引起了如何深刻的印象，可以由羣衆罷工運動的涵湧來證明。不僅首都的工人以罷工和示威來回答，里格、薩拉托夫、基也夫、敖得薩、耶加太林、諾斯拉夫、哈爾可夫、黑爾松、尼古拉也夫、蘇爾莫夫及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也都起來反對這次的屠殺。工人在自己的決議案中寫道：『我們是如何的驚駭和震動，以致一下子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形容。無論我們表示如何的抗議，這僅僅是我們氣憤中極微弱的反映，我們每一個人是這樣的感覺到。』

差不多每一個地方的工人都拿出他一天的工資來幫被難者的家屬。一切工廠作坊和企業中的工人，都進行了罷工和廣大的羣衆示威以表示反對。從這個廣大的工人羣衆罷工運動中，黨得到了一些什麼教訓呢？在這些事變中布爾塞維克已經得到了一種證明，指出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是爲着局部

的要求，而是準備着普遍地進行堅決的鬥爭。

孟塞維克是被這些事變駭倒了。他們叫工人不要中了『罷工的熱狂』，而應該爲着聯盟的權利進行有計劃的階級鬥爭。

從這個偉大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中，孟塞維克做出了可笑的機會主義的，自由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的結論來，認爲工人只能爲着局部的要求和聯盟的權利而鬥爭；而布爾塞維克則提出了三個基本的口號，即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全部土地。這三個基本口號，不僅能夠團結廣大的工人羣衆，而且還能夠聯合士兵和農民。孟塞維克的口號是爲着局部的聯盟權利而鬥爭，對於沙皇制度用一些更革和改良來代替革命；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是在於動員羣衆對沙皇制度進行革命的進攻，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

孟塞維克主張請願運動，即在工人的要求之下搜集簽名，要求廢除對於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的限制。經驗告訴我們，孟塞維克沒有達到吸收廣大羣衆來參加鬥爭的目的。可是在布爾塞維克所提出來的革命口號周圍（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全部土地，民主共和國）却團結了千百萬的羣衆。

一九一一年是轉變的年頭，從這個時候起，罷工，示威和抗議的次數是在不斷的增加，參加的羣衆也逐漸增多。到世界大戰前夜的時候，進到了最高度革命鬥爭的形式——在彼得堡街上建立了障礙物。

爲羣衆的工人組織而鬥爭

在高漲的時期中，爲要爭取這一廣大運動的領導權，必須利用一切公開和秘密的可能。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說過，不管條件是如何的困難，如何受限制，我們利用了一切公開形式的工作（在職工會中，俱樂部中，各種的會議中，和保險運動中）來對新的幹部進行革命的教育。

除了職工會以外，民衆館、俱樂部、夜間大學和其他的文化教育機關，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這樣的機關，有時甚至是黨的工作支點。婦女積極的參加了俱樂部的工作，甚至於還有專門的婦女俱樂部的如「婦女互助社」。爲着領導婦女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出版了女工雜誌，一共出了七期。

在這個時期，爭取職工會的鬥爭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知道，這時候一部份的同志表現了召回派的情緒，以爲在合法組織中工作是沒有好處的；因爲這種組織，是警察和奸細的巢穴，使我們易於被捕。我們的黨，對於這種召回派的情緒進行了鬥爭。實在的，職工會是警察、保安科、奸細活動的場所，這是證實了的事情。在革命以後，我們在警察的文庫中找到了不少參加職工會的好細的名單，他們爲的是把一切忠實於工人階級的行動家報告警察。可是布爾塞維克在職工會中的活動，其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教育組織的影響，在這幾年中是很大的。不管警察是如何的活動，終不能征服這種力量。因爲公開

工作和秘密工作有了良好的配合，所以我們在都市中爭取了最大數和重要職工會的組織。例如五金工會、木業工會、建築工會、縫紉工會、店員工會等。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中間，我們繼續進行了這些基本羣衆的工作。職工會的組織有自己的出版機關，例如布爾塞維克所很好地領導了的店員公報的這一機關報。

黨的「星報」的作用

這時黨的重要任務，是組織合法的刊物。這種刊物，要能夠爲正在興發的革命運動服務，並對革命運動起指導作用。不建立這樣的工人刊物，布爾塞維克是不能把握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的。

一九一〇年八月當柯木哈根開國際社會民主黨大會時，黨開了許多的會議，除了中央委員參加會議以外，國會的工人代表波列達也夫也積極的參加了。這些會議決定出版共同的機關報，參加的不僅是布爾塞維克，也有孟塞維克護黨派。十二月十六日，星報第一號出刊了，這是聯合的機關報。這個報紙，一共出刊了六十八期，在一九一一年夏，編輯部的成份也是共同的組織。（朋赤普魯也非奇、約爾丹斯基、博克洛夫斯基，當時是孟塞維克護黨派）從一九一一年秋，星報才是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在星報被封閉後，尼夫斯基星報出刊了二十四期。在這個報紙中，有一個時期有孟塞維克護黨派參加，從一

九一年底，星報才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參加人有普列達也夫、格拉得列夫、巴都林，而思想上的領導者則是列寧。這時列寧是住在靠近俄國邊界的克拉可夫。在這個報紙上，登載了多篇斯達林同志的領導文章；在這報紙上經常參加工作最多的是莫洛托夫、耶列米也夫、拉斯可爾尼可夫、米海伊洛夫、格爾曼洛夫、耶里薩洛瓦朋奇、普魯也維奇、維里奇金娜、法比爾克維奇等人。

孟塞維克也承認星報的偉大的意義。他們指出，工人高興讀星報很關心它，愛護它，把它當作是工人自己的報紙；而對於孟塞維克的報紙尼夫斯基呼聲，却是很冷淡的。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馬爾托夫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妙的，尼夫斯基呼聲漸漸有關門的樣子，但是，旁邊的星報雖說下面無產階級分子有些不關心，無興趣，然而星報不管他的經濟來源怎樣，*終於支持住了。而我們的報呢？總是在那裏堆集着，除了在幾個小組織的範圍之外沒有得到任何物質上和精神上積極的擁護。拿募款給國會黨團幫助連列的被難者和災民來說吧，我們的報紙和星報根本是不同的。星報的讀者，不僅愛戴它，把它當作自己的讀物，而且在工廠作坊中幫助募捐；我們的讀者只讀着那些他在工人中個人活動所寫來的東西，對於報紙的本身是不想的。最好也不過是說一說必

* 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派遺謠，說我黨報紙，是用「來源不正的錢」出版的。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報

是用幸脫金、梅林等人所保管的黨費來出版的。孟塞維克和托洛茨基派用這種謠言來破壞，正好像

現在資產階級報紙用「莫斯科金錢」的謠言來破壞破壞一樣。

須有真正無產階級的報紙和工人的印刷廠而已。」我們應該說，誰也沒有像馬爾托夫這樣清楚知道孟塞維克的情形。既然他都這樣描寫工人對於星報和孟塞維克報紙的態度，那麼這種態度實際上當然對於孟塞維克是非常不利的。

「思想」和「教育」雜誌

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差不多同星報同一時候，在國外黨中央的領導之下，開始出版了布爾塞維克的思想雜誌，列寧對於這個雜誌是很滿意的。在這個雜誌上，列寧和其他的同志都寫了許多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同取消派和其他派別分歧的實質和意義。可是，思想雜誌的出刊很快的就終止了，不得不再來建立另外一個教育雜誌。這個雜誌開始出版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四年七月止。教育雜誌的編輯，是沙維里也夫、耶里薩洛瓦和米海伊洛夫三個同志；管理文學藝術部門的是高爾基。這個雜誌的思想上的領導者，也是在外國。列寧和從充軍中跑出來的斯達林，都積極的參加了這個雜誌的工作。他們以許多的指示幫助了教育雜誌和開始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斯達林寫了許多關於民族問題的指導文章，這在當時是有重大意義的。斯達林的這些文章，充實了馬克斯列寧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的了解，打擊了孟塞維克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口號，因為他們是想以資產階級

的『文明民族自治』的日號來代替我們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綱領。

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和「我們之路」

教育雜誌不能按期出刊，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因為沒有一種工人的日報，所以工人所看的是資產階級的報紙。在一九一一年秋的時候，就有了出版工人日報的意思；同時在工人中間，也有了捐款建造工人俱樂部的打算。布爾塞維克在各種組織中和各種會議上提出來，我們不一定要建造大廈，而要組織工人日報，特別是在連那慘案的時候，更感覺到這種必要了。當時需要將有重大意義的政治事變迅速的傳播公佈出來，但是苦於沒有報紙。在這個時候，建立工人日報的宣傳有了很大的成績。在工人中間，差不多募集了四千盧布來出版報紙。四月十號的時候，在教育雜誌上登載出版真理日報的廣告，四月十二號就開始徵求真理報的定戶，四月廿二號真理報第一號出現了，這是真正工人的紀念日。以後規定四月廿二號（即公歷五月五號）為工人刊物的紀念日。真理報所經過的是艱難的過程，真理報繼續出版四十天之後被封閉了。代替它出版的是工人真理，一共出了十七期；工人真理被封後，北方真理出版了。北方真理出了三十一期以後，勞動真理代之出版；它出了二十期以後，為真理鬥爭出版了五十一期；無產階級真理出版了十六期；真理之路出版了九十一期。以後有工人報（以後變為工人

雜誌)勞動真理,這報紙出版了三十五期;在大戰宣佈的前幾天,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八號也被停刊了。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廿五至九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建立了我們之路的報紙,這個報紙的負責人是馬克西莫夫斯基,阿波林斯基和以後被可爾恰克所槍決的雅可夫列夫同志,洛波瓦也積極的參加過這個報紙的工作(她在一九二四年逝世)。

這些報紙,在組織羣衆和教育羣衆上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在重要的政治時機,這些報紙是起了工人羣衆的組織者的作用,動員了羣衆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口號之下參加鬥爭,將各地單獨的行動統一爲一致的行動。有時在某個城市中,工人的行動之所以能有堅固的基礎和有力的援助,完全是因爲真理報的影響。真理報訓練了大批的工人通訊員的幹部,他們同真理報有着密切的聯系。例如在一年之內有一一四個通訊,平均每一期有四十一個通訊。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撥款和沒收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二百七十期的中間,一百十六期受到了阻礙,撥款到七千八百盧布之多。編輯入獄時期總的計算起來有四百七十二個月之多。曾有過卅六次反對這個報紙的起訴的事件。因爲這些審判都不能封閉我們的報紙,所以警察們便只好進行公開的挑撥破壞,好細且爾諾馬左夫混入了我們報紙的編輯部,故意登載一些文章來引起對於真理報的壓迫。但是任何的壓迫,都不能削弱真理報對於工人羣衆的影響。工人爲真理報募集了『鐵的基金』保證必要的撥款和沒收時的開支來回答敵人的壓迫。因爲報紙到了發行者,報販手上常被沒收,所以只好組織自己的系統來分派報紙。工人羣衆同報紙是

有直接的密切的聯系的。工人在他們無數的書信中表明了他們對於工人自己報紙的愛戴。在一篇歡迎詞中，我們看到了對於真理報有如下的歌頌：

『讓你的聲音高呼，像警鐘般的怒鳴，像春日的報曉者，同聲高歌，他將要號召被人鄙視的弟兄起來求生，并以堅決的自信發揚那不自由的奴隸們的吼聲。』

在真理報上，同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有系統的鬥爭。列寧在真理報上所寫的文章，是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的。他經常按期的寫文章，給與一些指示而且非常注意真理報的工作。斯達林在真理報上也做了巨大的工作，從真理報開辦的時候起他便是真理報實際上的指導者。不管沙皇的新聞檢查是如何嚴格，斯達林在他的文章中非常明確的向工人解釋鬥爭中的一些迫切的政治問題。

克夫特拉茲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八號的真理報上所寫的關於斯達林同志的回憶中說：斯達林在同黨兵偵探恐怖鬥爭中表現了特出的智能。一九一一年冬，斯達林同志從流放中逃回，忽然到了克夫特拉茲的家裏。當斯達林一到了彼得堡的時候，偵探便跟上了他的綫索。有一次在街上跟了他後面追，斯達林在馬車跑得很快時候從車上跳到雪地上，不僅趕車的沒有看見，在後面追的也沒有發覺。這樣斯達林同志才脫離了敵人的監視。斯達林在彼得堡的秘密組織內工作，直至一九一二年四月為止。以後他又被捕了，被流放到那里姆斯基邊區四年。孟塞維克以尼夫斯基呼聲及以後的火把報同布爾塞維克的報紙相對抗，但是這兩種報紙都不能得到像布爾塞維克工人刊物那樣大的影響。孟

塞維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點。

一九二二年布拉格第六次黨代表會議及其在黨史中

的意義

這時爲要保證工人革命運動的勝利，必須有堅強的正確的政治領導。當時孟塞維克亂叫工人『罷工的熱狂』，並且使工人的視線和力量，爲着聯盟的權利走向不正確鬥爭的道路。而布爾塞維克爲着政黨而鬥爭，爲着澈底的革命政策而鬥爭。這鬥爭團結了那些始終忠實於我們黨的分於黨周圍，並且從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智識分子中造成了革命的幹部。這時爲黨而鬥爭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鬥爭。我們已經看到，孟塞維克對於一九二〇年中央全會的決議完全置之度外。中央的國外分局，在政治領導上又是那樣的不堅定，因爲參加到分局中的政治代表是不堅定的。萊多維亞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是傾向於孟塞維克的，他們所派出的新的代表，使中央的國外分局成爲孟塞維克的了。中央全會的決議未見實行。孟塞維克所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雖說中央全會禁止過，但仍然是繼續出版。在中央的俄國局裏，我們知道孟塞維克是拒絕參加的。

一九二〇年一月的中央全會上所定出的『和平』事實上被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前進派」及托洛茨基所破壞。只有布爾塞維克始終是爲着黨和黨的組織而鬥爭。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認為爲着黨的利益，爲着黨的恢復和建立，應當獨立發動作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五號布爾塞維克公開的宣佈說，對於一切小組組織的形式上的條約完全無效。

爲着召集黨的代表會議，建立了國外的組織委員會。但是因爲這個委員會沒有很好的工作，便重新建立了全俄的組織委員會，它負起了準備代表會議的責任。奧爾卓尼基茲、世佛爾茲（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是礦工工會的主席）和布列斯拉夫三個同志，很努力的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他們巡視過許多地方的組織，並且担負了召集第六次全俄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一九一二年一月於布拉格）這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在同孟塞維克組織分裂的基礎上，在完全驅逐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基礎上，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重新建立了我們的黨。

有二十個以上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出席了這次代表會議。這一代表會議有代表大會的意義的。列寧領導了這次代表會議的一切工作，從倫敦大會時起，在代表的人數上說來，這是到得最齊的一次代表會議。奧爾卓尼基茲、史派特良、多加托夫、格洛斯基諸同志都參加了這次的代表大會。大會上代表着彼得堡、莫斯科中央工業區、薩拉托夫、替夫里斯、巴庫、尼可拉也夫、克薩基夫、耶卡台林洛斯拉夫、德芬斯克、維爾諾等地的組織。列寧是代表中央機關編輯部出席的，比特尼茨基和其他的同志是代表運輸機關出席的，有些代表因爲被捕而沒有到會。這時黨的組織情形怎樣呢？從大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

決議案中便可看出。其中寫道：「因為反革命情緒的潮流和沙皇政府無情的鎮壓，使得許多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處於被毀的狀態下，在長久的時期中，沒有黨的實際領導的中心，——中央委員會。這種情況造成了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極端困難的情形。……在現在時候，因為工人運動的發展，各地先進的工人都非常要求恢復黨的秘密組織，建立公開的和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的經常工作。……正是因為這些緣故，許多社會民主工黨地方的組織，極力主張召集全黨的代表會議，並重新建立我們的黨。……工人運動以及對於沙皇政府進行革命鬥爭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就是無條件的必須採取最迅速的最有力的辦法恢復有權力的同地方組織有密切聯系的實際的黨的中央機關。……」

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有卅七個城市作了工作報告。代表會議認為當時不僅有了黨的組織的恢復，而並有了黨的組織繼續的發展。布拉格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對於我們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政策都作了原則上的確定。

在第六次布拉格代表會議上，解決了重要的組織問題：誰能批准黨的各種決議，誰能在今後指揮黨。那時須要建立這樣的中央機關，使能批准黨的一切決議，指導黨全部的生活。但是那時還沒有這樣的中央機關。在倫敦大會上所選舉出來的舊中央，是已經解體了；在最近將來要召集大會，是根本沒有希望。布拉格代表大會選舉了中央，以便能夠首先指導全黨的生活。

在中央委員中的布爾塞維克有列寧、奧爾卓尼基茲、史登特良等同志。斯達林同志雖缺席，亦被選爲中央委員；史維爾特洛夫亦被補爲中央委員。

指導俄國黨的工作的中央分局，有斯達林、奧爾卓尼基茲、史登特良，中央候補委員有史達索瓦、布不諾夫、加里寧和史米爾諾夫。

布爾塞維克黨中央的鞏固，把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完全驅逐出黨，這是布拉格代表會議重要的總結之一。取消派組織（我們曙光和生活事業）之被驅出黨外，在肅清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意義上，是有極大重要性的。代表會議同樣的檢查了布爾塞維克自己的隊伍，這樣，不僅使黨肅清了右的取消主義者，而且還肅清了『左』的取消主義者。代表會議尖銳的提出了『同着誰前進』的問題。代表會議取消了對於托洛茨基的維也納真理報的條約，代表會議決定以工人報爲中央的機關報，並且建立黨在國外正式的中央機關——國外組織的委員會。

代表會議不僅是提出了關於理論問題的決議，而且提出了黨的實際工作問題的決議。不用說，在建立了中央並且有了工人每日的報紙以後，那能保證更正確的政治領導。

代表會議所提出的立憲會議，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全部土地分給農民及八小時工作制等要求，是有其特別重大的意義的。在這個時候，孟塞維克確定地想『投到斯托理賓的制度』方面去，投到斯托理賓的政體下去，他們取消了民主共和國的要求而提出了『全權國會』的口號。關於沒收地主土

地的革命要求，孟塞維克用修改第三次國會土地法的改良主義的要求來代替了。許多孟塞維克主張不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有些孟塞維克主張取消無產階級的政黨而代以「工人利益保障社」（這是取消派洛世可夫所提議的）孟塞維克主張發起對於這種會社的章程的簽名，以便求得政府合法的承認。取消派在他們的行動中，是「無論如何要求得合法」他們是不知滾到多深的泥坑中去了。

這時是第四國會的選舉積極準備的時候，布拉格代表會議對於參加這次選舉的政黨和政治力量有個確切的估計，並確定了工人階級在這次選舉運動中的行動路線。代表大會決定，在大城市裏面要提出工人選舉區的完全獨立的候選名單來，不僅要反對立憲民主黨還要反對取消派。

布拉格代表會議對於過去清洗和鞏固布爾塞維克黨的鬥爭作了總結。代表會議結束了布爾塞維克對於孟塞維克形式上所保持的統一，並且最後驅出了社會民主黨內的孟塞維克。在一九〇三年時，布爾塞維克分成爲獨立的政治趨向；在一九〇五年第三次布爾塞維克的大會上，繼續形成起來。在布拉格的代表會議上，布爾塞維克的黨才正式成爲獨立的布爾塞維克黨。

布拉格的代表會議的基本歷史意義，就在於此，這一代表會議，是代替了黨的大會的。從此以後，一切非布爾塞維克派別的鬥爭，在組織上要容易得多了。

在一九〇三年所產生的布爾塞維克，以獨立政治派別，獨立政黨的資格澈底的同機會主義者進行鬥爭。各種機會主義者，直至一九一二年，在第六次布拉格的代表大會上才完全由黨內趕出去。這上

而有着這樣的組織上的明確性，使得再也不能給『左』有取消派留下混入黨內的機會了。

一九一三年黨的會議，克拉可夫和波洛寧會議

在一九一三年時，我們的黨還召集了兩次會議：第一次正月間在克拉可夫；第二次九月間在波洛寧。克拉可夫的會議，是在總結布拉格代表會議以後的鬥爭經驗。在這個時期中，發生了許多事件，如連那慘案及以後許多的革命運動——羣衆的示威和罷工，都證明了革命運動的高漲。克拉可夫是布爾塞維克中央的所在地，各地秘密組織的代表，彼得堡的，莫斯科的，中央黑土區的，烏拉爾的以及高加索的代表，都來到了克拉可夫開會。除了列寧、斯達林以外，參加克拉可夫會議的，還有第四國會的布爾塞維克議員彼特洛夫斯基、巴達也夫、沙果夫以及俄國組織的工人實際工作者。所討論的而且有了決議的重要問題是：關於革命的高漲；關於罷工和黨的任務；關於秘密組織的建設；關於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團；關於黨的刊物；關於保險運動；關於對取消派的態度；關於統一的問題以及關於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等問題。孟塞維克反對羣衆的革命罷工，孟塞維克認為這是『罷工的熱狂』；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問題的決議中說：『一九一二年無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罷工鬥爭有非常發展，這是工人運動史中和俄國革命中一件最重大的事實。參加政治罷工的人數上百萬之多。』『羣衆

的革命罷工，是克服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民中悲觀失望和渙散的最有效的辦法，是覺醒他們參加政治活動和吸引他們更密切的，更一致的，更廣泛的參加革命鬥爭的辦法。」取消派主張反對罷工的鬥爭，想使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道路；而我們的黨在自己的決議中，主張同取消派進行堅決的鬥爭。

關於秘密組織建設的決議，指出應以最積極的工人分子在一切工廠和企業內建立秘密的黨的工廠委員會，『必須在每一中心地把許多渙散的地方組織聯起來建立一個領導的組織。……把各區支部的選舉原則與遞補黨的原則配合起來。』『爲要建立中央同各地社會民主黨組織間的經常的活的聯系，爲要建立對於工人運動主要中心的地方工作之靈活領導方式——應建立特派員制度，特派員應該從工人中，從地方工作的指導者中選出。』必須收黨費，並組織工人的募捐運動。

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團這時發生了分裂，對於這個問題，克拉可夫會議應該表示自己的意見。

這次會議，對於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八月會議給了一個估價，並且主張對於一切黨的組織應該從下面進行統一，從工廠委員會和區的組織來進行統一。同某一個社會民主黨集團進行統一的條件，是要該組織『承認秘密的組織，並且擁護羣衆的革命鬥爭和革命策略。』

在會議上提出了決議，深信已開始的革命高漲將要轉爲羣衆公開的革命鬥爭，這可以幫助各地的社會民主黨工人不分任何民族界綫鞏固團結起來，來加強各民族對於俄國統治的沙皇制度的鬥爭。

一九一三年，在波洛寧召集了中央會議，有地方黨的工作同志參加，到會的有二十二個同志，有彼得堡、莫斯科、中央工業區、南方烏拉爾和波蘭等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組織的代表。會議一共開了九天，在十八次的會議中，五次會議是地方的和中央機關的報告。這次會議的決議，都為中央所批准。在這次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認為這個鬥爭階段中的主要口號仍然是：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和八小時工作制。同時討論了組織上的問題以及關於召集黨代表大會，關於大會的準備，關於鞏固地方黨的組織以及同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聯系等問題。因為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政治總罷工已成為當前的急務，會議決定：『……對於這種罷工有系統的準備和宣傳，應立即普遍的開始進行。』

那時，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有七個孟塞維克和六個布爾塞維克參加，這次會議對黨團提出了明確的決議。取消派利用多一票，企圖壓倒布爾塞維克的議員。波洛寧會議，要求我們在國會中的六個議員，應有平等的權利，否則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黨團必然會分裂。

這次會議對於民族問題和民族派都提出了具體的決議，也可以說波洛寧會議的中心問題是民族問題。為什麼如此呢？

在大戰以前，特別明顯的表示出了俄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的性質。民族的壓迫是沙皇制度民族政策的表現之一。

資產階級兇橫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影響到社會民主黨內小資產階級的階層。某些社會民主黨人，

投降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在這個問題上表示了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方面以奇恒克里爲代表的孟塞維克以及猶太勞動同盟派，對於『國家組成內一切民族都應有自決權』的黨綱的要求，用機會主義的『文化民族自治』的要求來代替了；在另一方面，盧森堡和贊成她的同志，反對『民族分離權』的口號。民族問題，在當時黨的刊物上，特別是在教育雜誌上，都有過極詳細的討論。列寧和斯達林著了許多的論文批評民族問題中各種的傾向。列寧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盧森堡）的錯誤觀點爭論時，主張在我們黨綱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那一條，加上『直至自由的分離』並且把當然的國家文字的字樣刪去。如果我們留心大戰時和一九一七年革命時民族問題所起的偉大的作用，我們就能懂得爲什麼在大戰的前夜列寧主張澈底的解決民族問題；爲什麼他要求我們黨的民族政綱，應該更適合於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和被奴役的民族的要求，因爲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懂得爲什麼列寧那樣厲害的批評盧森堡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列寧特別指出，要同大俄羅斯的國家主義鬥爭。在決議中說：『沙皇制度統治下的民族應有自決權，就是說可以分離和建立獨立的國家。社會民主黨應該無條件的堅持這個權利。』會議認爲『大俄羅斯人民本身自由的事業要求這樣的做，因爲如果不剷除黑色百人團的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那麼俄羅斯人民是不能建立民主國家的。』

同時應該指出，波洛寧會議對於民族問題也有了特別的注意。因爲工人羣衆運動的發展，不能不反映到民族派智識分子中的活躍；對於這些智識分子，是還有一部份工人跟他們走的。在有些場合

上，孟塞維克——取消派同民粹派——同社會革命黨聯盟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如保險委員會的選舉，就是一例。在另一方面，民粹派繼續有害的關於恐怖的宣傳，散播抹煞勞資開利害衝突的發展之思想，並企圖用減輕的形式來掩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社會革命黨——民粹派進行市儈宣傳，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合作社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原則。

在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的內部，有了分裂和解體，成立了人民社會黨，公開的贊助斯托理賓的制度，還形成了超然派，結果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民粹派在農民中進行了瓦解的工作，有時在工人中也是如此。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沒有停止對於社會革命黨的鬥爭。自由資產階級可以經過社會民主黨使其更容易地把持農民運動，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的一個時期都還是如此。

會議上所散發的由社會民主黨各中央委員署名的『特別通知』說：『有的是希望着，有的是厭惡着，但是大家都知道新的暴風雨的時期是快要到來，……政治的形勢尖銳化，危機成熟。……一九一二年一月全俄的代表會議，基本上是這樣的估計了當時的前途。這一會議恢復了我們的黨，他對於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是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的。一九一三年二月會議，繼續了這個路線；而一九一三年夏天的會議，是走向這條道路的新標幟。……』

『我們走的道路已經指出，黨在現在的過渡時期，得出了他的基本的工作方式。在新的情況下和

新的工作條件下，證明了我們對於舊的革命旗幟的忠實。同志們，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新的時期快要到來，將要爆發偉大的重要事變，這些事變要決定我們祖國的命運。加緊工作吧！

我們黨的中央是正確的。新的時期到來了，經過了新的事變，黨領導着羣衆走向了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

托洛茨基派取消派的八月聯盟

革命政策和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鞏固我們黨的鬥爭，引起了孟塞維克、托洛茨基派、前進派以及極明顯的調和派的不滿。列寧對於這個問題說道：爲着同這些派別和小組織進行調和和建立親密工作，『我們的黨空空費去了兩年的時光。』一九二二年一月，由於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和孟塞維克取消派的主動，建立了召集全俄代表會議的組織委員會，其中參加的有孟塞維克——取消派、格魯徐亞的孟塞維克、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猶太勞動同盟、前進派和托洛茨基派。蒲列哈諾夫拒絕參加這個組織，他認爲這一代表會議可能引導到成立第二黨。如果他那時有勇氣『講老實話』，那末他應該承認，那時另外一個資產階級的工黨老早已建立了。並且蒲列哈諾夫自己過去的工作，是助成了這個政黨的建立的。對於托洛茨基、馬爾托夫和但崗所領導的組織委員會，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是沒有

參加的。一九二二年八月代表會議開會了，完全沒有黨的祕密組織代表的參加；甚至於前進派都拒絕了參加這次會議。波梁可夫是所謂參加代表會議的布爾塞維克，可是其實他是個好鄉；另外一個工人阿·布洛西莫夫也是好鄉。孟塞維克自己也承認，代表會議的結果是很不妙的，這種聯盟也是很可憐的。所通過的決議都是取消派的觀點。八月代表會議上特別顯著的是他所製定的對於國會選舉的選舉政綱，他們用全權國會的要求來代替共和國的要求；用自由聯盟的要求來代替工人階級基本的政治要求；用重新審查第三國會的土法法令的提議來代替沒收地主教堂貴族和一切其他土地的要求等等。

一九三一年斯達林同志在他寫的『布爾塞維克史中的一些問題』上說，托派是在俄國傳播中間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派別。托派建立了特別的中間主義支柱的組織——八月聯盟。

萊多維亞的黨中央，參加了一些比較更擁護黨分子時，萊多維亞的代表便在一九一四年二月退出了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所形成的反列寧派的聯盟。格魯芬亞孟塞維克的有名的創始者喬爾達尼亞也脫離了這個聯盟，他很快的以高加索地方委員會的名義同孟塞維克報紙《火把》（取消派八月聯盟的機關報）的取消派路線分家。不久以後，托洛茨基也退出了這個報紙的編輯部。因為八月聯盟的成分是如此的複雜，所以他決不能久持。缺乏原則性是這次聯盟的主要特點。對於列寧和列寧主義的仇視，聯合了一切前進派，取消派和托派。正是因為這種仇視，因為要同列寧主義鬥爭，所以這些派別聯

合起來了。

八月聯盟證明了孟塞維克在拒絕第二次大會上所通過的政綱的道路上更前進了一步。以後，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所走的道路，是更加的分歧了。

列寧稱托洛茨基爲猶大（聖經中叛賣耶穌的門徒）。當托洛茨基掩蓋孟塞維克——取消派的反黨破壞工作的實質時，列寧斥責托洛茨基爲直接欺騙工人。『托洛茨基掩蓋着孟塞維克取消派，托洛茨基負起辯護士的任務，對那些幼稚的人們說，黨內一切派別都擁有堅定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托洛茨基之所以抹殺那種不可爭論的真理，正是因爲要達到他的政策的真實目的，就不能忍受真理。』

『波特列索夫和前進派的先生們，在這裏正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小組的自由，小組的宣揚，小組行動的掩蓋以及在工人的前面替小組組織辯護。』

列寧稱托洛茨基建立八月聯盟的行動是『名敷其實的冒險主義。』

所謂『來路不明之錢』的話，在托洛茨基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史中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其實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因爲那時沒有統一的中央，黨內的款項是由一部份同志保存的。其中有考茨基、梅林和采特金，他們應該決定道錢給那些社會民主黨，給多少，作爲什麼政治運動和出版什麼刊物之用。關於這些錢發生問題的時候，上面的那幾個人就討論了我們黨的情形和要求，認爲列寧派的黨比孟塞維克取消派的黨有更多的權利來使用黨的款項。因此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便得不到錢，因此托洛茨

基講誘了布爾塞維克的黨。

自然，托洛茨基利用了統一和反小組的詞句來掩飾這些破壞組織的行動。列寧說這種企圖是想『用着向任何人妥協，直至向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的先生們妥協的便宜宣傳，來替營自己利益……』『事實上這些宣傳者是向取消派和斯托理賓工黨的建立者投降。』列寧指出『取消派也有他的面目，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面目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面目。』

托洛茨基從來沒有任何什麼『面目』，他有的是搖擺不定，從自由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或是相反的擺過；他所講的辭句和響亮的言詞，是從這裏那裏抄來的。

托洛茨基欺騙不覺悟的工人，對於地下工作的問題不講，並且說俄國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工人政策等來幫助取消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拋棄了黨的一切決議，放棄了秘密工作和有組織的工人，這是最壞的分裂派。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反對之下，在對於羣衆沒有任何聯系，沒有任何秘密黨組織的幫助的條件之下，取消派和取消派的八月聯盟於是塌台了。

國會黨團的工作

在革命高漲的時期，我們黨的力量和我們黨對於羣衆的影響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因為我們黨在極困難的反動時期以後，還能保持着秘密組織的領導幹部，善於經過各種的「輪帶」去指導羣衆的方興未艾的革命運動。爲着這點，須要利用國會的講演台，使工人的代表——布爾塞維克能夠通過黑色百人團和十月革命黨的國會，進行革命的宣傳。

工人代表重要的演說，是由布爾塞維克的中央，主要是由列寧和斯達林事先詳細準備了的。他們定出演說提綱，發言的代表要依照黨中央的指示和訓令發言。對於政府提出質問的權利，也被用來進行對於羣衆的革命教育。黨的最基本的「輪帶」之一，那時是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團。雖說有無數的警察和偵探監視着，黨同志總還能開會和討論黨的工作計劃。

布爾塞維克黨對於取消派的鬥爭，自然不能不反映到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活動。這一鬥爭是爲黨而鬥爭，是爲黨的堅持革命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堅定領導而鬥爭。布爾塞維克始終認爲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是被派遣到重要位置上的革命隊伍之一。這一黨團應該從公開的講演台上超過資產階級的代表們，不顧沙皇一切的法律，進行鬥爭來團結羣衆和組織羣衆於革命口號的週圍。

國會內的鬥爭，僅僅是達夫里斯基宮（國會所在地）外各階級間鬥爭的反映和一部份。

斯達林同志直接的領導了第四國會的選舉運動。在斯達林同志所寫的經過列寧同意的指令中說，國會內的代表應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同封建農奴制度鬥爭，也要同與舊制度聯合的自由資

產階級鬥爭。」

在第四國會的十三個社會民主黨代表中，有六個是布爾塞維克，這就是巴達也夫、彼特洛夫斯基、薩莫伊洛夫、沙果夫、莫拉諾夫與馬里諾夫斯基；（他後來被發現是好細，於一九一八年被捕槍決）孟塞維克的代表有七人；此外孟塞維克通過了波蘭的代表亞格洛參加黨團。亞格洛在國會選舉上當選，是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意思的。如是發生了這樣的問題，「誰的意見來決定國會內社會民主黨團的決議、策略和行動呢？」依據下面所引證的材料，可以判定工人代表是反映了誰的意志。第二國會選舉時，布爾塞維克被選的佔百分之四十七；第三次佔百分之五十；第四次佔百分之六十；第四次選舉投布爾塞維克的票的，據工廠巡查員的統計約有一百萬工人的票數，而孟塞維克僅有二十一萬四千票。工人報的成功也證明羣衆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工人集體募捐給真理報和我們之路的，爲三千一百一十六盧布，給孟塞維克的報紙少，把的捐款，爲七百五十盧布。在彼得堡和其他工業中心的聯工會，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間也有鬥爭，但是這些職工會多數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例如礦工職工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到會的共有三千人，投孟塞維克票的只有一百五十人，其餘都是投布爾塞維克的票。彼得堡許多的職工會中，只有印刷工會當時是擁護孟塞維克的，其他的店員工會、木匠工會、縫紉工會、麵包工會、建築工會、酒業職員工會等都擁護布爾塞維克。

當布爾塞維克的代表拒絕參加火把報的工作時，社會民主黨團便開始分裂了。當時孟塞維克賣

備布爾塞維克進行分裂政策。當爭論提出到公開討論的時候，工人羣衆完全是表示擁護布爾塞維克的。這個時候，在真理報上和火把報上，充滿了決議，工人在這些報紙上發表了他們對布爾塞維克議員和孟塞維克議員的態度。彼得堡最大工廠的工人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寄給真理報的決議和信，說明完全同情布爾塞維克黨團的路線，擁護我們的黨和布爾塞維克議員的決議的，共有六千七百二十二件；而擁護取消派議員的只二千九百八十五件。這種情形，布爾塞維克事先就已注意到了。再看募捐罷，爲着援助連那慘案被難的家屬和其他的需要，在工人中進行了募捐，經過布爾塞維克募集了一萬三千盧布，有一千二百九十五個工人組織捐了錢；孟塞維克却只募集了約六千盧布，只有二百一十五個工人組織參加募捐。布爾塞維克的捐款中，只百分之六是非工人成份捐的；而孟塞維克的捐款中，百分之四十六是非工人成份捐的。這些事實都是說明工人羣衆是站在布爾塞維克議員方面的。國會的社會民主黨團內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的爭論，是在於國會的社會民主黨團是否應該服從布拉格代表會議所建立的布爾塞維克中央的領導。因爲孟塞維克不服從這個中央，分裂和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一三年底，國會內社會民主黨團分裂了。在國會外面存在着兩個社會民主黨：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黨和機會主義的孟塞維克黨。在國會內就是兩個黨團。

保 險 運 動

我們的黨，經過職工會鞏固了它在羣衆中的影響。在極艱苦的時期，黨並沒有放棄職工會的工作，並且在職工會內堅持了革命的政治鬥爭的口號，但這並不是說，在這個時期布爾塞維克很少注意工人級階級小的日常的經濟鬥爭。布爾塞維克參加這種鬥爭最好的例子，就是保險運動。在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中，布爾塞維克一貫的是堅持了革命的立場。

沙皇政府想用不澈底的改良來阻止工人階級的進攻，這種不澈底的辦法，就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廿三日關於疾病和不幸事件的保險法。這一保險法，是黑色百人團和十月黨的國會所製定的。自然，這一法令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要求，它只能包含全部產業工人中的百分之二十。這一法令中未提及殘廢、衰老和失業時的保險，規定的津貼和撫卹金很少，而且保險基金大部份的來源仍然是落在工人的肩上。政府法令把保險機關內工人的管理完全取消了。我們黨的任務，是要利用這個法令的弱點來開展羣衆反沙皇制度的鬥爭。法令容許企業者有權拒絕所委任的疾病保險局管理處的全權代表——布爾塞維克進行了鬥爭，要求一切全權代表都應該是工人。政府同工廠主企圖成立小的工廠保險局，以便分散工人的力量——布爾塞維克却爲着成立區的和全城的聯合保險局而鬥爭；法令上把衛生救濟的工作完全放在廠主手裏——布爾塞維克却要爭取這件工作轉到保險局管理委員會的工人的手裏。布爾塞維克認爲這些鬥爭事件可以用來教育和團結工人羣衆，在這種鬥爭中我們的黨表現了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正確領導的一種光榮模範。自然的，在僱主方面，他們也迅速聯合起來進

行鬥爭了。

工人討論保險問題的會議被禁止，但是由於對這個問題在國會內引起質問，在工人刊物上而進行宣傳，並且舉行工人的大會和飛行集會，工人的抗議等等，所以工人終於得到效果，使工人能對保險問題召集許多羣衆大會。黨不願警察的干涉，普遍的利用了這些公開的會議反對保險委員會和保險所的『指派』。在這個問題上，工人是得到了勝利。以後在選舉全權代表起草章程時也進行了廣泛的運動。布爾塞維克提出了許多的要求：工人保險運動的自由，將保險普及於全體工人，在失去勞動力時應當用各種保險形式使之能夠獲得等於全部工資的數目，保險金應由廠主支付，廠主完全不參加保險的工作等。在這一運動中，工人也是取得了勝利。政府和廠主以爲開辦了保險局就可以和緩工人，但是開辦保險局却成了工人階級同廠主階級繼續鬥爭的基點了。在一九一三年一月幾個大保險局的全權代表委員會，在京城內着手建立保險的中央組織並準備召集全俄工人保險大會。在彼得堡，六十個工廠和企業成立了這樣的保險中心。不僅僅在彼得堡，在其他許多城市裏面，如在華沙等地的保險運動，布爾塞維克也積極的參加了並且大大的鞏固了我們黨的影響。不管對於保險運動領導者的逮捕和放逐以及其他警察的壓迫辦法——這辦法常常引起了抗議和罷工——京城的工人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號的選舉中還是主要的選舉了布爾塞維克到保險委員會和保險所中去。布爾塞維克對於保險運動實行了布爾塞維克的指令和布爾塞維克的保險口號。

在最困難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組織了通俗的工人刊物，這個刊物是工人自己建立的，靠工人的錢出版，大部份都是工人自己來幹，工人自己來售銷，並且反映了工人階級鬥爭的情形。當着秘密組織的中央削弱了的時候，合法活動被禁止的時候，我們工人的日報實行了非常重大的任務，把工人階級團結組織於沒有減削的革命口號週圍。

黨領導了一切政治運動和工人階級一切的鬥爭，所以鞏固了自己的影響。正因為黨保持了他秘密的組織，常常能够在秘密的刊物上有系統的發表革命的路綫，所以黨能實現這些任務。在高漲時期，這種公開和秘密工作的配合以及對羣衆的聯系，大大的鞏固了我們的黨，以致在大戰的時候，不管許多工人組織的破壞，布爾塞維克黨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始終能够保持下來。

在兩個革命中間國際舞台上的布爾塞維克主義

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發生了分裂並且形成了布爾塞維克的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和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之間，一切仇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分子，都從黨內被驅逐出去了。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布爾塞維克的代表會議上，最後的完成並且確定了這種決裂。

一九一二年布拉格代表會議以後的時期，證明布爾塞維克同俄國孟塞維克——托派——的鬥

爭，同時是同國際中間主義的鬥爭，因為托洛茨基主義是國際中間主義在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代表。斯達林同志說，第二國際中間主義者的政策『是以「左」的詞句來裝飾右的機會主義，並以「左」的服從右的。』中間主義的思想『是一黨內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於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托洛茨基所執行的中間主義的路線得到了第二國際中間主義者積極的援助。還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曾經熱烈的歡迎過托洛茨基派真報的出版。在一九一二年時，前進報空出了許多的篇幅來登載許多托洛茨基所化名的文章，對於布爾塞維克進行極可恥的誹謗。前進報拒絕發表布爾塞維克反駁的文章，繼續讓那些取消派們進行反布爾塞維克的宣傳。當時，黨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爲要使德國的工人不至被前進報所迷惑，發行了德文的特別的小冊子，名爲『前進報上的化名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狀況。』

列寧斥責德國社會民主黨刊物對於俄國問題的態度，說道：

『當德國人寫的時候，他們總是不提到分歧的問題。當俄國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寫文章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文字如果不是國外一切派別與取消派聯合起來向「列寧派」作無恥的詆毀，（一九一二年春，前進報便是如此）便是鐵世科派，托派或國外組織其他的人故意模糊問題的本質。在好幾年的時間內，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文件，一個大會的決議和理論的分析，從未想到收集實際的材料。』

『我們很替德國的領袖可惜，他們聽着重複着取消派宣傳者的意見，而並不以此爲恥。』考茨基曾經公開的擁護托洛茨基熱烈的贊助把一切社會民主黨的派別聯合起來並『歐化』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第二國際內的左派，在組織問題上仍然繼續着他舊的孟塞維克的路線，他們也反對布爾塞維克。盧森堡的立場便是如此，她會向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提議，主張克服『黨團鬥爭的混亂現象』，『恢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統一』，從取消派起到布爾塞維克爲止。

列寧當時的估計，這種統一運動實際上是幫助俄國取消派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的立場，是特別值得指出的。他在幫助俄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第四國會選舉運動的旗幟之下，供給了托派和取消派以許多錢。布爾塞維克在他的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現狀』中揭破了這種立場。這本小冊子是列寧用德文寫出的，並且發給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各種報紙的編輯部和各地黨的委員會。

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的代表會議以後，第二國際是一再企圖『統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各個派別。（利用第四國會的選舉運動以及根據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委員盧森堡的動議）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的會議上，特別的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上，考茨基發出了『荒謬的議論』說舊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死去，已經毀滅。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在

布魯塞爾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各派代表的聯席會議。對於統一的問題，仍然有極顯著的兩條路線的鬥爭：考茨基、樊迪文、古伊史曼斯所領對的是中間主義的路線；另一條是布爾塞維克的路線。

列寧對於第二國際領袖們的立場，這樣寫道：『國外社會主義者的同志們，有時特別錯誤得厲害，他們以為取消派如不澈底的改變他們的態度，不服從多數人的意志，便能求得統一，以為我們能夠同取消派一同工作。這樣對於統一是不沒有幫助的，而是幫助了分裂派——這個策略客觀的結果便是如此。』

在布魯塞爾會議上，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企圖統一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列寧在自己所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的報告中，極確切響亮的給了他們以答覆：『只有同取消派進行鬥爭，只有在這個鬥爭中真正的工人的社會民主黨才能奠定起來——如果取消派準備堅決的拋棄它一切舊的策略，當他們不再是取消派了的時候，統一才是可能的。』

在布魯塞爾會議上，布爾塞維克提出統一的條件是要取消派完全的投降和承認布爾塞維克的思想、戰略、策略與組織的原則。因為取消派不承認這些條件，所以，布爾塞維克在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之下，否決了考茨基中間派的決議。在十年以後，在國際舞臺上對於無產階級的政黨建設的問題上，又重新碰到了中間主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向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與中間主義者實行決裂，這同時表明了是對

於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和中間主義者的決裂。

在這個時期中，關於將要到来的新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列寧寫了許多的文章。這些理論著作，是有它國際歷史的意義的。因為在這些著作中，列寧說明了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性質，任務以及變化着的整個進程。很早在大戰以前，列寧在其所作的論文中，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分析，認為帝國主義是腐朽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分析了階級力量的對比以後，他指出了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鬥爭的基本特點；說明了帝國主義的動力和對外政策特點；揭穿了機會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根源；對於工人運動中的兩種趨向的鬥爭，給了一個充分的解釋：一種是少數人的機會主義趨向，他們是被帝國主義所收買了的，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和官僚；另一種是無產階級基本羣衆的革命趨向，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他們的壓迫和剝削是更加厲害了。

在世界大戰的中間，列寧對於他在戰前所寫的那些問題總結了一下，並且利用大戰的經驗，發揮並充實了這些問題。

列寧的這些理論著作，是和他國際舞臺上同機會主義，變相機會主義——中間主義所進行的堅持的緊張的鬥爭有着密切的聯系的。列寧揭破了機會主義的社會根源，指出了機會主義的作用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並且認為機會主義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形式。列寧指出

了因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革命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直接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現在時常碰到的，是理論上的問題：即反對修正馬克思理論的爭論——如果現在在實際上還僅僅是對於工入運動個別問題的爭執，如對於修正主義者的策略的分歧和分裂；那麼，當無產階級革命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使一切分歧集中到對於決定羣衆的行動有直接意義的幾點上，使在鬥爭的灰塵中要分別出誰是友誰是敵，並必須拋棄不好的同盟者以便給敵人以堅決打擊的時候，那麼工人階級將會更加擴大的範圍內，經開這種爭論。』

『十九世紀末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是無產階級不顧一切市儈主義的軟弱和動搖走向完全勝利的偉大革命決鬥中的前哨戰鬥。』（見『馬克思主義與修

正主義』）

列寧特別注意到第二國際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情形。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開斯杜卡爾特大會時，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鞏固以及黨內領導增長着的中間主義的動搖，列寧會敲過了警鐘。

『在斯杜卡爾特大會上的可悲現象，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不穩定及其採取機會主義立場。』

列寧會預告工人階級不要受了傳染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不好的一方面，而熱烈歡迎社會民主

黨的左派（如索特金）因為他們看到了德國代表團在斯杜卡爾特大會上的機會主義立場是一種警告。

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柏爾所提議的反戰的中間主義的決議，特別引起列寧的吃驚。列寧對於這個問題寫道，這個決議可以使人「戴上了機會主義的眼鏡來讀柏爾的正統派的主張」，祇因為列寧和盧森堡提出了許多修正的意見，才把柏爾所提出的死板的偏面的公式主義的決議變成了完全另外一個決議。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寧揭破第二國際領袖們機會主義的偉大意義寫道：

「如果我們想忠實於馬克思的思想，幫助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站在工人運動當前任務的高度上，那末，我們應該大胆的，公開的批評德國領袖們的錯誤。在愛森的會議上，無疑的柏爾也是錯誤了的。當時他擁護諾斯克，他堅持着把進攻的戰爭和防禦的戰爭分開，他反對「激進派」對柯爾（荷蘭機會主義者——譯者）的鬥爭方法，他否認斯杜卡爾特大會上德國社會民主黨策略的失敗和正確。我們不應該掩飾這些錯誤，而應該利用這些例子使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學習避免這些錯誤來滿足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更高的要求。」在斯杜卡爾特大會一年以後，列寧又出來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中間主義的立場。

在「保護祖國」和防禦戰爭的問題上，柏爾是幫助了福爾馬爾的。列寧揭穿了這一點，並且證明，要企圖把帝國主義強盜間的戰爭分為進攻的和防禦的戰爭是不能成功的。同時列寧指出德國社

會民主黨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上是一種不可容許的消極，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說這種消極是由於政府方面的摧殘和威脅所造成的。

列寧說：『紹來斯的意見是很公正的，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它幼年的時期，在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特別法令的困難時期，終於是抵抗住了俾斯馬克宰相的鐵掌，現在它是大大的鞏固發展起來了，它或許就不怕德國統治者方面的鎮壓了吧！』

在國際舞臺上，在一九一〇年柯本哈根的大會上，討論合作社運動問題的時候，列寧聯系這個問題，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機會主義路線給了總的估計。

『德國的代表團是由黨的和職工會的代表各一半組成的，在職工會的代表中，差不多都是機會主義者，因為選舉出來的多數是那些祕書和其他頑固的職工會的「官僚」。一般的說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際大會上不能堅持他原則上的路線，因之國際的領導權就常常落到別人手裏了。武爾姆（中間主義者）在愛爾姆（機會主義者）的面前表示了他的無能，這又一次的證明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危機而醞釀對於機會主義者更大的不可避免的分裂。』

列寧十分明確的看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力量的分野，中間主義在日益完成的機會主義的前面表示了他的無能，同機會主義者分裂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事。西歐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無產階級基本羣衆革命積極性的提高，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影響，俄國布爾塞維克策略的影響等等——促進着

對於機會主義者堅決的決裂，羣衆對於黨的中間主義領導日益表示不滿，中間主義者有系統的同機會主義者實行聯盟的政策，其實是投降他們。中間主義者在理論上和實際上一天天的走到完整的機會主義者的道上去。

列寧盡了他一切的力量來形成第二國際內的激底的左派，同時他極力幫助荷蘭和意大利社會黨內的革命分子實行分裂，反對企圖妥協各個敵對派別使機會主義者得到方便的第二國際領導。

列寧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爭取黨的政策積極化，爭取從單純的國會鬥爭形式轉到羣衆的行動（總罷工和示威），爭取反軍國主義工作的開展等等。在第二國際的斯杜卡爾特和柯本哈根的大會上，列寧曾經企圖在國際的範圍內把第二國際個別黨的左派分子聯合起來。

可是在大戰以前，第二國際內並未實行分裂。這是由於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的不成熟，非常的不徹底，不堅決以及他們的半孟塞維克的錯誤。

斯達林同志說，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多方推動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同機會主義者分裂絕緣。誰還能懷疑這個呢？如果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還沒有達到跟隨俄國布爾塞維克前進的程度，那末，這並不是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的錯誤。（見列寧主義概論）

列寧很明確的看到了左派的缺點：『布爾塞維克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是有一定的重要條件，則批評他們的半孟塞維克的錯誤。』在教育第二國際的左派克服他們半孟塞維克錯誤的工

作上，列寧的批評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在大戰以前，除了上述的錯誤以外，左派還有其他具有特別意義的錯誤：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錯誤的估計——盧森堡的資本積壘的理論，這理論引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前途和性質的不正確的估計；否定布爾塞維克關於民族自決權（直至分離和建立獨立的國家）的口號，不了解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不知道總罷工和武裝暴動問題的聯系；不了解無產階級革命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具體任務；最後，是沒有堅決的反對機會主義直至驅逐他們出黨，未能在組織上形成與中間主義者對抗，也就是說左派不了解中間主義的實質就是機會主義者的變相。

第二國際內左的激進派，對機會主義的壞影響估計不足，對中間主義者存着幻想；沒有注意到黨的機關全部的作用以及黨內生活中組織問題的重要；對運動自發性的意義估計太高。因之，這樣左的激進派，在第二國際內僅起了無力的反對派的作用。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只有布爾塞維克的黨是唯一實行徹底革命鬥爭的黨。

第十一章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對於戰爭的估

計以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的原因

布爾塞維克的勞動真理報，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八號被封閉的。正當工人羣衆中的革命激動達到高度的時候，正當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工人開始在彼得堡準備市街戰的時候，表示大戰開始的全國總動員是宣佈了；幾天之後，歐洲大戰的雷聲是轟動着了。這一戰爭變成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對於我們的黨，對於一切社會主義的黨，對於整個的第二國際，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正是他們階級的堅定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與真正國際主義的忠實性之考試和測驗。各國社會黨如何經閱了這一測驗呢？各國社會黨對於已經開始了的戰爭怎樣看法呢？

一開始就發生關於戰爭性質的問題。這一戰爭，對於任何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並不是一件

不能意料的事。對於我們布爾維塞克，這一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已經從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全部進程中，特別從俄羅斯帝國的整個發展進程中看得非常清楚了。早在大戰之前，布爾塞維克已經看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不可避免的性質是從帝國主義實質產生的。

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由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事變以及戰後時期的情形完全證實了。無論希爾費丁，無論是考茨基，無論是盧森堡，不管他們寫了很多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但都沒有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腐朽的資本主義；同時也沒有指出帝國主義準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加速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

在列寧之前，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突兀性。從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的規則中，列寧引伸了社會主義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有以下特點：『第一、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到了極高發展的程度，他造成了獨佔，獨佔在經濟生活中操着主要的作用；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在這基礎之上成立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統治；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佔着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組成了資本家瓜分世界的國際獨佔聯合；第五、最大資本主義強國瓜分領土已經完結。』（見列寧：帝國主義論）

所以，很明白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號召民眾犧牲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他們永遠不會說明這一戰爭是爲了掠奪領土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每一政府總想愚弄羣衆，對羣衆說他是不得不保護和防衛

自己說進攻的是其他的國家，說鄰國『開始』戰爭，說鄰國要奴役『我們的』國家，說『我們的』的鬥爭是解放的鬥爭等等。關於是誰個開始戰爭，誰個是戰爭罪人的問題，歷史已經給了回答了。戰爭是被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準備了的，戰爭的罪人是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沙皇俄國都準備了這一戰爭。沙皇俄國要奪取到地中海去的海峽，奪取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許多領土。

爲着了解爲什麼俄國加入協約國方面（英法俄三國的協約，是從一九〇七年開始的），就應當看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俄國國民經濟及最大產業部門都掌握在英法大資本主義集團的手裏。例如最重要的五金工業的工廠，有百分之五五掌握在法國人手中；百分之二二掌握在德國人手中；百分之十掌握在德法公司的手中。在煤礦工業中，法國資本佔有差不多百分之七五的生產；德國資本佔百分之十三；煤油工業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在英國人手中；大約一半掌握在英法資本的手裏。俄國工業的極大部份的利潤流到外國銀行去了。在外國銀行掌握中的，有全部五金工業有價證券的百分之八五；煤礦工業有價證券百分之七七；煤油工業的有價證券百分之八六。這樣，可以看到俄國的工業，俄國的產業與金融資本，主要是和法國及英國資本聯結在一起的。

此外，一九一四年以前所發生的很多戰爭，使得糧食經過達坦尼爾的出口變得困難了。如果我們把帝國主義大戰以前五年內的糧食出口統計拿來來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出口的迅速減少。

所以沙皇政府總長及大使，在和法國及其他國家的秘密條約的談判中間，提出了滅亡土耳其，瓜分土耳其的問題。如果沙皇俄羅斯要奪取君士坦丁堡、達坦尼爾海峽和加里西亞的話，那麼法國也不較俄國為次，法國也是想用戰爭去取得沙爾煤鐵區和阿爾薩斯、勞林兩州；這上面的問題是法德兩國五金工業大公司中間鬥爭的問題。英德之間的極大矛盾，不可免的影響一九一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海上霸王的英國，在大戰以前幾年，看到德國在世界海運專業上加緊自己建設要來追上英國，英國清楚的看到德國是要奪取它的殖民地（德國的三B鐵路的建設）。

現在，根據戰後所發現的真實的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一九一四年春天，就是在戰爭開始以前的三個月，俄國是準備瓜分奧匈，並且把這一問題和他的同盟者法國談判了。自然，為着戰爭，需要找得表面的口實，於是實行了挑撥。他們對塞爾維亞人說，奧大利的太子費丁納準備向塞爾維亞進攻；這種挑撥的結果就使費丁納被塞爾維亞國家主義者普林的波所殺。這樣，就造成了開始軍事行動的表面的口實。

所以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發生，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對抗與競爭，是因為俄法英的資本和德國的資本兩方面的衝突，是因為俄國政府要想佔領君士坦丁堡及達坦尼爾海峽，並且因為其他存在（而且現在繼續存在）於各個資本主義集團中間的矛盾。在兩個國家集團的中間所爆發的戰爭，不能僅僅限於這些國家中間的衝突。這種戰爭，關係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所以以後日本、英國以

及其他國家也被捲入這一戰鬥的漩渦中了。

第二國際的崩潰

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世界大戰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關於戰爭態度的問題，已經不止一次地在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世界大會上提了出來。早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裏面就說到：『無產階級沒有祖國，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如下要求：『每一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階級應當結束自己的資產階級。』當一九七〇年普法戰爭開始時，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會指示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應當利用戰爭所造成的情況來爭取自己的解放。一八九三年在第二國際的祖利希大會上通過說，工人階級的代表應當反對一切軍費的債款，並且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常備軍。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會又確定了這點。一九一七年在斯杜特加爾特通過了特別的決議案，在這次議案中，根據列寧與盧森堡的提議，包括這樣一點：『如果不管所有這些（指決議案中阻止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辦法）戰爭還是爆發起來，那麼，他們（社會主義者）應當用一切力量來最迅速的停止戰爭，並且多方面的利用戰爭所引起的經濟政治危機來煽動最深刻的社會階層，並加速資本權力的顛覆。』

一九一〇年，當戰爭的危險已經清楚看到的時候，第二國際從新肯定了斯特加爾特的決議案，並且再一次地指示社會主義者應當投票反對軍事的債款。當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爆發的時候，巴塞爾大會那時又聲明：

『讓各國政府不要忘记：繼普法戰爭之後出現了公社，日俄戰爭引起了俄羅斯帝國內民衆力量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認為爲着增加資本家的利潤，爲着皇室的榮譽，或是爲着外交上秘密條約的尊嚴而互相慘殺，是一種罪惡。』

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觀點如此，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社會主義大會所指示的策略也如此。自然這一觀點就是純粹形式上也遠不是一切人所同意的，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國際內部，無論在大會上，無論在各國黨裏面，都爲這一觀點而鬥爭。

當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的雷聲震動着的時候，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領袖成了國際主義原則的叛徒，成了資產階級的傭僕。

戰爭的宣佈對於第二國際是最大的測驗。第二國際經不起這種測驗。盧森堡對於第二國際的情況，這樣的說道：『在八月四日之後，第二國際是一個死屍。』最大多數的社會主義黨轉到了保護祖國的立場，即轉到了自己帝國主義政府的立場；這樣，他們即是表現了自己的破產，幫助了政府來愚弄工人階級，來窒息工人鬥爭。在第二國際內，只有極少數人還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的立場，敢於反對潮流，

能够在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瘴氣中復活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來繼續革命的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者掠奪並且無情地剝削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衆。他們有可能從他們的食棹上擲下一切殘屑，給予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以小的贈品。工人階級中這種列寧所稱爲『工人貴族』的一小部份被帝國主義者所收買。他們獲得帝國主義者額外利潤的一部份，所以他們也贊成保持帝國主義。這種『工人貴族』正是國際孟塞維克主義的社會基礎。

在列寧於一九一四年秋寫的關於戰爭的提綱上，列寧指出第二國際的崩潰並不是偶然的事。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的大部份領袖對於社會主義的叛變指示出這一國際的思想的，政治的破產。這一破產的基本原因是在於第二國際裏面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佔事實上的統治地位。這種機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與危險性，老早已由各國革命無產階級最好代表指出來了。機會主義者老早已經準備了第二國際的破產，他們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而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來代替；他們否認階級鬥爭以及在一定形勢之下階級鬥爭之必須轉變爲國內戰爭，而提倡階級合作；他們在愛國主義及保護祖國的形式之下提倡資產階級的極端國家主義，而忽視和否認社會主義的基本真理——即工人無祖國；這種真理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說明了。他們在反對軍國主義中間限制於感情主義的小市民的觀點，而不承認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的必要；他們把對於

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及資產階級合法狀態的必須的利用，轉變為對於這一合法狀態的拜物教，而忘記了危急時代非法的組織與宣傳形式的必要。」（見列寧：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任務）

在一九一五年列寧總結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年教訓的時候，指出：

『第二國際的破產，最顯著的表現於歐洲大多數官式社會民主黨對於自己信仰及斯杜特加爾特和巴塞爾大會上一切莊嚴決議案的可恥的叛變。這種破產指示出機會主義的全部勝利，指示出社會民主黨轉變成民族自由主義的工黨；這種破產祇是給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整個第二國際時代的結果罷了。這個時代是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及民族革命的完成轉到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過渡時期，這一時代的客觀條件產生了並且滋長了機會主義。』（見列寧：第二國際的崩潰）

列寧在另外一篇文章社會主義國際的情況及任務裏指出：『國際（第二國際）的崩潰顯然在目。被機會主義所征服的第二國際是死了。』

在圍繞於列寧周圍所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政黨中的，革命的，澈底的少數人面前，產生了建立第二國際的任務。為着這點，必須把無產階級最先進的，最革命的部份從第二國際領袖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少數所以就不得不以殘酷的長期的鬥爭來爭取工人羣衆中的影響，因此不

能不對第二國際右翼保護祖國派，社會國家主義派，以及如考茨基、托洛茨基之類的中間派進行殘酷的鬥爭。同時對於第二國際中好些左派分子的不徹底性，列寧也不得不進行絕大的鬥爭。只有這種堅持的鬥爭，才能走向第三國際的建立。

對於社會國家主義派的鬥爭

我們已經說到，戰爭一宣佈，社會民主黨大多數領袖就提出這種觀點。認為每一國家的工人階級應當保護自己的祖國。『無條件的保護祖國』——這就是保護祖國派所提出來的口號——『別人攻擊我們，我們只得保護自己。』

在各國社會主義者的面前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就是：是否應當在各國內投票贊成軍事借款呢？對於這一問題，俄國的保護祖國派也和法國、德國的保護祖國派一樣回答道：應當投票贊成軍事借款。這種保護祖國派正是社會國家主義者，他們提出保護自己資產階級的祖國及其帝國主義政策的口號。採取社會國家主義立場的蒲列哈諾夫，在其致國會議員普利亞諾夫的信中這樣說道：

『如果我們同伴用魯笨的步驟來妨礙俄國人民自衛的事業，那麼這將是非常可悲的事。投票反對軍事借款，將是對於人民的叛變；而放棄投票，這是懦怯；投票贊成罷！』

法國的愛爾維·山巴蓋德、比利時的樊迪文、德國的率德門等等，也採取和俄國蒲列哈諾夫一樣的地位。自然資產階級的政府對於社會主義者的這種態度是歡迎之不暇，並且加緊聘請他們參加內閣，獻給他們以總長的位置。

這些社會主義者，同樣的開始提倡資產階級的口號：『繼續戰爭直到勝利的結束。』保護祖國派及社會國家主義者提出：第二國際不是爲着戰爭而存在的，這種國際組織，只是適用於和平時期的工具。并且說，在戰爭的時候，每個社會主義黨應獨立行動；說如果在和平時候階級鬥爭是可以進行的，是合法的話，那麼在戰爭時候就應當實行『階級和平』與階級合作。所以根據保護祖國派的意見，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是合法的而且在戰時是必須的。保護祖國派手中愚弄羣衆的方法之一，是把戰爭分爲『正義的』與『不正直的』兩種；可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布爾塞維克，指出必須嚴格的分別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歷史時代的戰爭形式。馬克思不止一次的指出，在十九世紀初期及中期，先進資產階級爲着建立民主國家反對封建制度的戰爭，是起了進步的作用；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却把馬克思論及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意見曲解了，企圖證明說馬克思認爲一切資產階級戰爭包括帝國主義戰爭在內都是進步的。這種對於馬克思觀點的曲解是機會主義者所要求的，因爲他們可以用來爲資產階級的掠奪政策作辯護。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進步的革命的戰爭，是勝利的無產階級反對世界資產階級的戰爭以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但是一九一

四年資本主義國家所爆發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掠奪的戰爭。擁護這一戰爭的社會國家主義者，正是實現了自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策。列寧在第二國際的崩潰一文中說道：

『機會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政府及總參謀部的聯盟，給了他們以極大的力量。』
在第二國際政黨中，除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者以外，還有隱蔽的社會國家主義者以及所謂中間派。

中間派是掩蓋的國家主義者

列寧對於這一中間派做了如下的規定：『所謂中間派，就是事實上在社會國家主義者及國際主義者中間動搖的人們。中間派滿佈小資產階級的好聽的字句，口頭上是國際主義，事實上是懦怯的機會主義以及對於社會國家主義者的幫兇。』

中間派並不是一致的。他們裏面，有一些人（雖然數量不多），雖然在戰爭問題上有了動搖，可是還轉變到了國際主義者的立場；但大多數是很快的轉變到了社會國家主義者的觀點。列寧認為他們是嚇慌了的動搖的人們，『他們現在追隨於機會主義者之後，他們虛偽地企圖用幾乎科學的幾乎馬克思主義的字句（不是開玩笑的話）為機會主義作辯護。這種行動給了無產階級以最大的危害。』
列寧指出：唯一正確的道路是最堅決的和社會國家主義派實行決裂，和一切贊成通過戰時借款（在

國會中投票贊成戰時債款，贊成『保護祖國』、『服從戰時法令』，滿足於合法狀態，放棄國內戰爭等等的人們實行決裂。列寧說：『只有實現這一政策（即決裂）的人，才能在實際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國際。』

這一中間派在俄國的代表，是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同時應當指出，馬爾托夫的立場差不多總是動搖的，他有時嚴厲的攻擊社會國家主義派；但同時他不僅沒有在組織上和他們決裂，而且常是包庇他們最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行為。馬爾托夫及托洛茨基所參加的在國外出版的中間派報紙呼聲，雖然提出要和『積極的』社會愛國主義分子決裂，但並沒有出來反對擁護這一社會愛國主義的亞克蘭雪洛特。

其他國家的中間派：在德國，考茨基、哈塞列及波爾；在法國，郎格、普列斯曼；在英國，史諾登、馬克唐納等；在奧地利，維克多、安特列；在意大利，都拉第、瑞士、格林姆等等。他們提出在表決戰爭債款時放棄投票，同時在戰爭時候放棄階級鬥爭。在這上面，俄國孟塞維克對於樊迪文電報的回答是非常有趣的，他們寫道：『我們向你們宣佈，在自己的行動中，我們在俄國並不反抗戰爭。』他們提出了非常有利於政府的『公正的和平』的口號，正好像他們在戰爭結束時擁護有利於政府的解除軍備的口號。他們贊成叛變無產階級的第二國際領袖，互相赦免罪狀。差不多在大戰時候所發生的一切問題上面，俄國的國際的中間派考茨基、馬爾托夫、托洛茨基等都是動搖到社會國家主義方面的。中間派實際上是隱蔽

的社會國家主義派。

在大戰的幾年以及在大戰以前的幾年，托洛茨基關於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問題都是採取與布爾塞維克相敵對的立場，托洛茨基或許在某一時侯說，在呼聲報及我們的話報的編輯部裏，不止他一個人說馬爾托夫對於取消派及社會國家主義派是太過於讓步了。可是就是在馬爾托夫脫離了我們的話報變成完全是托洛茨基機關報的時候，托洛茨基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基本問題上也都是和列寧不同意的。關於失敗主義的問題，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話報上來反對列寧，他舉出社會國家主義派的論據，認為那些促成俄國失敗的人實際上是促成德國勝利。在民族問題上，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一起出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民族有自決權直至有分離權。』列寧直接責備托洛茨基說，他在對於戰爭及無產階級任務的估計上，採取了於帝國主義者有利的觀點。在關於帝國主義的估計，關於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及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內勝利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出來反對列寧，他在這些問題上是站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觀點上面的。此外還應當指出，他公開擁護國會中的采易之的孟塞維克黨團。托洛茨基最堅持的反對和社會國家主義派決裂，托洛茨基固執地認為與機會主義決裂是一種分離，而以這種分離來恐嚇。其實為着團結真正國際主義分子，那麼對於社會國家主義派的決裂與分離，是徹底的無產階級政策的無條件的必要步驟。在這一時期，托洛茨基雖然在個別場合上出來反對社會國家主義派，可是托洛茨基立場的半途而廢，混擾不清，動搖不定的性質，他的不徹底性，他

自己的機會主義，他在戰爭時期不能激烈的和動搖分子破裂的情形（因為他自己在許多基本的重
要問題上是動搖的），使得他對於激底的國際主義者和布爾塞維克採取敵對的態度。這種情形，使得
列寧早在一九一七年，在革命開始時就警告了黨，反對去與托洛茨基派聯合。

『據我的意見，現在主要的是不使自己被愚蠢的對於社會國家主義派（或是更危險的對於動
搖分子，如組織委員會托洛茨基等等）的聯合企圖所混亂。』

『左的取消派』前進派，在反動的時期被驅逐於布爾塞維克黨之外。他們沒有採取任何確定的
立場，他們中間一部份參加了托洛茨基的我們的話及呼聲報，一部份轉到蒲列哈諾夫派而成爲公開
的保護祖國派（如阿列克森斯基），而另一部份重新回到布爾塞維克國際主義者中間來了。可是在
戰爭開始的時候，前進派還發表了自己的宣言，比這一宣言更可憐的知識分子的文件再也想不出來
了。當政治形勢需要給出做什麼，怎樣做的清楚指示的時候，這些人却空談無產階級的文化。

這樣可以看到，布爾塞維克主義敵人的整個營壘，是採取公開保護祖國派的和隱蔽的保護祖國
派的中間主義立場的。

布爾塞維克對戰爭的態度

從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布爾塞維克便採取相反的立場。布爾塞維克指出了這一戰爭的掠奪的階級的性質，證明這一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一切認為這一戰爭中保護着什麼『民族利益』說他對於任何民族有解放意義等等的欺騙進行了鬥爭。布爾塞維克反對保護祖國的口號，提出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的口號。這一口號，就是說武裝的工農羣衆應當把刺刀轉過來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爲着利用已經開始的帝國主義戰爭來爭取革命的利益，就必須提出另外一個口號：『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使自已政府失敗。』這口號就是說必須投票反對軍事債款；必須建立軍隊中的秘密組織；必須贊助前綫上士兵的聯歡；並且必須組織工農的革命行動，在列寧所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的宣言——戰爭及俄國社會民主黨上面，布爾塞維克宣佈道：

『對於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毫無疑義的在俄國一切民族的工人階級及勞苦羣衆的觀點看來，害處最小的是沙皇帝制的失敗。這一沙皇帝制是最反動的野蠻的政府，他壓迫最多數的民族以及大多數的歐亞的民衆。』

在特別的一篇文章論帝國主義戰爭中自己政府的失敗裏面，列寧堅持這種意見：『在反動戰爭中，革命的階級不能不希望自己政府的失敗，這是一個真理。只有社會國家主義派的自覺的擁護者或無能的走卒，才會反對這一真理。』

列寧發揮下述的思想，認為戰爭既是帝國主義戰爭，戰爭的罪人既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

政府，那麼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就應當促成自己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失敗。因爲在沙皇俄國居統治地位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所以在俄國方面看來，戰爭明顯表現了反動的性質。在這戰爭中，害處最小的辦法，是沙皇政府軍隊的失敗。從所有這些中，布爾塞維克做出了必然的正確的結論：俄國是帝國主義時代矛盾的焦點，對於沙皇制度的勝利是開闢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們應當用一切力量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爲着這點，像上面所說的，就要在軍隊中組織秘密的支部，加強工廠中黨的組織，進行反對戰爭的鼓動，促進戰壕中的聯歡等等。布爾塞維克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這種態度，同樣的是從一九〇七年斯杜特加爾特社會主義大會與決議上產生出來的。這一決議，規定社會主義者應當用一切力量來各方面的利用戰爭所引起的政治經濟危機，以便震動最深刻的社會階級，加速資本權力的傾覆。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寫道：『正是交戰強國中最落後一國的無產階級，特別在德法社會民主黨人可恥叛變的狀況下，應當由自己的政黨提出革命的策略，這一策略非促進自己政府的失敗不可。只有這種策略能夠引到歐洲的革命，引到社會主義的永久和平，並使人類脫離統治於現在的痛苦，貧困，黑暗與野蠻。』（見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戰爭中自己政府的失敗）

在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文中，列寧着重指出社會主義者不是反對一切戰爭。如果戰爭是用來反對一個民族對於別個民族的壓迫的，那麼社會主義者認爲這是正義的戰爭。

「只有在這種意義上，社會主義才承認了並且還要承認「保護祖國」和「自衛」戰爭的合法性，進步性及合理性。例如，如果明天摩洛哥向法國宣佈戰爭，印度向英國宣戰，或是中國向俄國（指沙皇俄國）等等宣戰，那麼這些戰爭是合理的自衛的戰爭，不管首先攻擊的是什麼人；任何社會主義者將同情被壓迫的，隸屬的，喪權的國家來戰勝對於壓迫的，奴隸主的，侵略的強國。」

所以關於保護祖國的問題，應當和當前戰爭性質聯系地提出來，當資產階級欺騙羣衆，說帝國主義戰爭是民族戰爭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揭破這一欺騙，指出這一戰爭的掠奪性，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

在關於戰爭的提綱中，列寧提出了戰鬥的任務，即在軍隊中以及在軍事行動，戰場上各方面的廣泛的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不應把武器用來殘殺自己的弟兄（他國的僱傭奴隸），而應當用來反對自己國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及政黨；無條件的，必須在一切國家的軍隊中組織這樣秘密的支部及集團來進行這種宣傳與鼓勵；應當和一切國家的資產者的，小市民的國家主義以及「愛國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揭發了第二國際的破產，要求和社會保護祖國派，和社會國家主義派實行決裂，並且號召建立新的第三國際。在上面所引的黨的宣言中說道：

「讓機會主義者以叛變自己信仰的代價「保重」合法的組織罷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

將應用組織的經驗以及對於工人階級的聯系來建立適合於危機時期的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非法形式；這種形式不是使工人與本國國家主義資產階級團結，而是使一切國家的人團結起來。無產階級的國際沒有毀滅，而且不能毀滅，工人羣衆經過一切阻礙將建立新的國際。」

關於民族自決的口號以及盧森堡與我們黨裏「左

傾」分子的立場

我們已經看到，當所謂中間派如馬爾托夫、托洛茨基等認爲主要的任務是以一切力量爲公正的和平而鬥爭的時候，布爾塞維克提出了『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國內戰爭』的口號。這是「巴黎公社」經驗所告訴的，一九二二年巴塞爾大會決議案所指出的，以及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開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所產生的唯一正確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建立真正鞏固的和平之必須條件。早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列寧就已經在他關於戰爭的提綱上寫道：

『如果在現在戰爭中革命使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的話，那麼無產階級政黨將做些什麼事情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回答道：我們將以解放殖民地，解放一切地域的被壓迫的主權

不完整的民族爲條件，向一切交戰的國家提出和平。」

我們已經看到，早在大戰以前，從黨的二次大會以來，布爾塞維克就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的問題。在一九一三年黨的聯席會議上，布爾塞維克又提出了民族自決權直至完全分離組織獨立國家的口號。可是對於這一問題，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傾向；對於這些傾向，我們在大戰以前，特別在大戰時期，不得不進行許多鬥爭。我們不得不向以盧森堡爲首的一部份波蘭同志進行鬥爭，因爲他們對於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估計不足，而認爲包含民族分離權意義的民族自決權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關於這一問題，在大戰前夜及在大戰時期都發生了很大的爭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列寧在特別的一篇文章關於民族自決權爭論的總結上，再一次的指出了民族問題上右傾及「左」傾的危險傾向，這一問題是和割地賠款問題密切聯系着的。正因爲沒有把這一問題弄清楚，所以一些社會主義者對於大戰時期在個別國家所發生的民族自決的鬥爭，就覺得混亂起來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態度。例如，波蘭的右派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贊成戰爭，只是因爲他們認爲戰爭能够幫助波蘭的光復；而他方面，像盧森堡那樣的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却出來反對獨立的波蘭緩衝國的思想；她的理由是說這種思想是『無力的小集團的空想』，說『這種思想如果實現的話，這就是建立一個碎小的波蘭的國家，牠將成爲某一強國集團的軍事殖民地；成爲牠們軍事經濟利益的玩物；成爲外國資本剝削的區域；成爲將來戰爭中的戰場。』

列寧堅決的反對盧森堡以及其他波蘭同志在這一問題上的不正確的意見。他認爲『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不正確意見相反的民族自決權的要求，在我們黨的鼓動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比較武裝民衆爲小』。列寧指出了這種理論錯誤的危險性：

『如果在波蘭社會民主黨看來，這些祇是關於波蘭革命運動特殊條件的不正確的理論總結，那麼在更廣大的環境下面，在不是小國也不是狹隘的波蘭而是整個國際廣大範圍的條件下，這些錯誤意見就立刻在事實上，客觀上成爲機會主義對於大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幫助。』（見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爭論的總結）

盧森堡及其他左派，反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反對一切民主的要求；他們等待着『純粹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這點，列寧寫道：『誰要是等待着純粹的社會革命，那麼他就永遠不能等到。這種人在口頭上是革命者，可是却不懂真正的革命。』（見關於民族自決權爭論的總結）

像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與民族革命運動的匯合。

同時，列寧反對我們黨內在民族問題上和盧森堡採取同樣意見的『左』的機會主義者。大戰一開始，布哈林及畢答可夫便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採取不正確的立場（否認提出民族要求的必要，對於國家估計的半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等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黨部的伯恩會議上，布哈林代表

反對派的集團發言，認為必須把『國內戰爭』的口號和中間派『和平』的口號統一起來。他反對我們黨的最重要的策略口號——『帝國主義戰爭中促成自己政府失敗』的口號。布哈林認為可能提出立即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他和托洛茨基一起『跳過了』工農的革命民主專政。布哈林認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反動的，這種觀點使他和孟塞維克及托洛茨基派相接近，『左』派對於托洛茨基孟塞維克不斷革命論之同情態度，更使他們接近托洛茨基。

在大戰開始的時候，黨提出了『歐洲聯邦』作為當前政治口號之一，同時指出『不以革命推翻德國的，奧國的與俄國的帝制，這一口號是沒有意義的，是虛偽的。』因為在一九一五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黨部的伯恩會議上，布哈林堅持這口號，給它以不正確的解釋。所以關於這一問題討論的結果，會議決定不把這一口號包括在決議案中，並且不久以後黨就完全放棄了這一口號。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交部的會議上以及會議之後，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得出這一結論，認為歐洲聯邦的口號是不正確的。』（列寧）

列寧認為在經濟上這一口號或是反動的，或是在帝國主義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成爲獨佔的了；全世界已被大的侵略者所瓜分了；歐洲聯邦的口號是和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與突兀性，帝國主義鎖鍊可能在薄弱一環分裂以及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國內勝利的法則相違反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這篇文章中寫道：

『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表現着極端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之下，再也不會有什麼情形。從此得出確定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同時在一切國家內得到勝利；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獲得勝利，而其他國家在某一期內還繼續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列寧指出在資本家中間，在資本主義強國中間，關於奴役新的民族，掠奪新的殖民地，可能有暫時的妥協。例如歐洲的資本家『共同保持已經得到的殖民地，反對日本與美國。』這是一種暫時的妥協。自由的民族聯合的國家形式不能是歐洲聯邦，而應是世界聯邦。這種世界聯邦，只在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但是這一個世界聯邦的口號，並不積極推動個別國家的工人來為自己國家的革命勝利而鬥爭。像列寧所說的，這一口號『可能產生不正確的解釋，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內勝利；也可能產生對於這一國家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正確解釋。』

中間派托洛茨基等竭力擁護歐洲聯邦的口號，用這一口號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徹底革命的
路線。

布爾塞維克關於解除軍備的口號的意見

列寧及布爾塞維克，反對了小市民的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可能解除軍隊的這種荒唐的計劃。例如

美國獨立社會黨就提出這樣的計劃；同樣的在其他國家有些社會主義者也提出要在綱領中包括解除軍隊的要求。對於這點，列寧反對道：『社會主義者如果要繼續稱爲社會主義者的話，那麼他們就不能反對一切的戰爭。』列寧說：『可能有一國內勝利社會主義反對其他資產階級和反動國家的戰爭。』在綱領內提出解除軍備，這就是一般的說，我們反對應用武器。說這樣的話，等於說我們反對應用暴力的話一樣，是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見列寧論解除軍備的口號）事實上，這種綱領將使工農階級解除武裝，這是使工人脫離革命鬥爭的企圖。關於這點，列寧寫道：『被壓迫的階級，如果不努力與學習應用武器，擁有武器的話，那麼他們只配當做奴隸看待。』從這些理由出發，我們的黨否定了這些辦法，如拒絕軍役，拒絕戰爭等等。列寧寫道：

『拒絕軍役，拒絕作戰，簡直是單純的愚蠢，是貧乏的懦怯的夢想；想以非武裝鬥爭來反對武裝的資產階級；想不經過激烈的國內戰爭或許多戰爭，而即能消滅資本主義。在戰爭中間宣傳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者的責任；使各民族的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工作，是帝國主義時代一切國家資產階級武裝衝突中的唯一社會主義的工作。』（見列寧社會主義國際的情況及任務）

這樣，在大戰時期所發生的一切問題上，布爾塞維克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唯一徹底的實行者，是唯一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只有布爾塞維克沒有被保護祖國的醜語所欺騙及驚怕，沒有

被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所傳染而保持了獨立的階級立場。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黨的工作

對於國會內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審判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是採取了無產階級所敵視的公開的保護祖國（帝國主義祖國）和隱蔽的保護祖國的態度。在這個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只有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中才沒有那樣的驚慌失措與紊亂不清。在偉大的試驗之前，只有布爾塞維克的黨才是最堅定的。當着全世界被帝國主義戰爭的火炮所籠罩，戰爭破壞了無產階級國際陣綫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黨認為當時他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面，爲着實現他對於戰爭所採取的路綫，是負了極重大的責任。他集中了一切的力量，不僅是爲着保持國際主義者的基本核心而且是為了在第二國際的廢墟上來建立一個新的第三國際。在戰爭時期我們黨所派出的——一個小的支隊，從國會的講台上用黨的名義說話，利用這個講台來宣傳布爾塞

維克黨的口號；這個支隊所負擔的責任也是不小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的國會議員，如莫拉諾夫、彼特洛夫斯基、薩莫伊洛夫等同志，他們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即依據中央的指示積極的巡視了許多組織，在那些地方作了關於我們對戰爭態度的報告。布爾塞維克巴達也夫在國會的講台上發表了反戰的演說，這引起了我們敵人的憤怒，但是這個演說還是不充分明確的。布爾塞維克應該更明確的表明自己的立場。黨在中央的宣言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這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一個最革命的文件。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當中央宣言還未發出的時候，國會議員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同中央委員卡米尼夫以及其他幾個同志開了一個聯席會議，討論了對於戰爭態度的問題。在開會的第三天，因被警察發覺，以致全體被捕。法庭審判了這些代表和卡米尼夫，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並且把他們流放到邊遠區域。（議員都被流放到葉尼塞省，以後彼特洛夫斯基進一步被流放到更遠的地方——雅庫茨克邊區）政府企圖宣佈國會內社會民主黨議員的罪狀為背叛祖國。不管他們是怎樣用盡一切方法來掩蓋這件事情的真理，但是在法庭上終於辯明了我們在國會內工人議員活動的真實情形，這是我們黨的光榮。自然在被審判者的中間，不是全體對於這件事情都保持了應有的態度。

在法庭預審時，中央委員卡米尼夫的供詞完全是不容許而且是出賣列寧的。在這些供詞中，證明這時的卡米尼夫是個機會主義者，是個可憐的怕死鬼，在遇到危險的時候，立即準備放棄布爾塞維克

主義的原則。卡米尼夫認為不需要利用國會黨團的審判來揭破統治階級的政策；相反的，卡米尼夫縮小了，降低了國會黨團的政治意義和這次審判的政治意義。卡米尼夫在預審時供稱，他『是被彼得洛夫斯基請來談判出版工人報的』。在結論中他說，『這一案件所搜得的文件的內容（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戰爭事變的態度），是同他當時的觀點絕對矛盾的。』卡米尼夫證明，對於戰爭他同布爾塞維克的觀點是不同的，他不是失敗主義者，並且有孟塞維克——保衛祖國派的伊爾丹斯基作證人，他可以證明卡米尼夫同布爾塞維克沒有任何的共同點。在這個嚴重的歷史關頭，中央委員卡米尼夫本應該向全世界說明戰爭的真理，而他却採取了如此可恥的行動。

列寧在他所著的對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審判證明了什麼？文中，痛斥了卡米尼夫這種變節的行動：

『……卡米尼夫極力證明他同社會愛國主義者伊爾丹斯基的同情，證明他與中央意見不同，這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來說，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容許的辦法。』

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宣告他同列寧的觀點不一致，這自然要引起很不好的影響，無疑義的，這樣便削弱了這次審判的政治意義。

列寧同時也指出了這次審判的好處，他說：『審判展開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所未有的革命社會民主黨如何利用議會制度的圖畫。如何利用這次審判的例子，比任何的演說都更好地激動無產階

級羣衆的心坎，比任何理由都更有效地能够駁破那些合法的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的空談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團的審判，說明了俄國社會各階級對於最重要最基本的戰爭問題的態度。這一公開材料，由黨團在俄國公開的散發了上百萬之多。」

這次對於國會議員的審判，無疑的是有更大的意義，就是說在廣大的羣衆面前說明了我們對於戰爭問題的路綫。可是這次的審判奪去了我們一部份同志，這些同志如果在國會內，還能够繼續鬥爭，揭發統治階級並反對戰爭的。同時，這次審判使我們失去了一個合法鬥爭的中心，這個中心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我們確實是十分重要的。在審判之後，我們曾經企圖影響留在國會內的孟塞維克的黨團，可是這些想把孟塞維克黨團引上國際主義道路上來的企圖終於沒有成功。並且我們看到，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孟塞維克的議員便起了叛賣無產階級利益的作用。

爲第二國際而鬥爭 齊米瓦爾德和金泰爾的代表大會

戰爭證明了第二國際多數的社會黨在最嚴重的時期無力進行澈底的革命的階級鬥爭，這點我們已經看到。第二國際大多數的領袖們都變成資產階級的僕役了，只有個別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同志是繼續忠實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我們布爾塞維克的國外中央，有一個時期

同俄國內部黨的組織是隔離着的；經過了很大的困難，用了很多的方法，才達到經過瑞典建立同俄國的聯系。住在瑞典和挪威的一些同志，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經過當時住在彼得格拉的中央分局，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的地方分局，並且同許多的組織聯系起來了。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時候，在我們黨的刊物上公佈了中央的宣言（關於戰爭的提綱）。這個宣言對於戰爭的原因給了一個總的估計，指出了戰爭的原因與罪人以及第二國際瓦解的原因。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忽視了斯杜特卡爾特、柯本哈根和巴塞爾大會的決議。宣言對於以後如何行動的問題作了具體的指示，指出了當前的迫切任務。在宣言中，首先要要求堅決的同機會主義決裂，並且向羣衆解釋必須利用戰爭爭取革命的勝利。在宣言中又說，我們革命的口號仍然是民主共和國（各民族完全平等和自決），沒收地主土地和八小時工作制；同時對於一切先進的國家，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在布爾塞維克的前面，提出了建立新的第三國際的任務。當時我們所提出來的口號，不是『無論如何要和平』，而是『要把當時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這個宣言，普遍地散佈於全俄國，保證了工人羣衆的反對孟塞維克和反對保衛祖國派宣傳的堅定性。這不僅給了布爾塞維克在俄國行動的方向，而且給了他們在許多國家內行動的方向。

當一九一五年下半年更明顯的見到了革命到來的時候，列寧對於今後的革命更充分地指出了它的前途。在再次確定以前所提出的三個口號以外，列寧補充的說：『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在於激

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掀起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正在成熟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是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而且是它的組織部分。列寧在他許多論文中，提出黨在領導無產階級掌握到政權之時所應該採取的政綱。列寧反對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同社會國家主義者一道參加臨時政府。

一九一五年二月的時候，幾個協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倫敦召集了會議，李維諾夫受列寧的委托，在大會上宣佈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的宣言。他說明了侵略戰爭給與俄國工人的負擔以及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被捕，並且要求各社會主義者退出比利時與法國的資產階級內閣，同所謂民族的聯盟斷絕關係。就是說，要放棄對於資產階級的合作。李維諾夫要求社會民主黨同沙皇制度的罪惡進行堅決鬥爭，同德奧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建立親密的聯系，指斥加入資產階級內閣以及贊成軍事預算的行為。

在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間，在伯恩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的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更確切的草定了布爾塞維克對於戰爭態度的決議（認為這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表示了對於「保護祖國」口號的堅決反對的態度，提出了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即：無條件的反對軍事預算；退出資產階級的內閣；完全放棄「國內和平」的政策；在政府和資產階級實行軍事戒嚴的地方，普遍地建立秘密組織；在前綫上和戰區內，實行兩軍士兵的聯歡；發動無產階級反對戰爭的各種革命的羣衆運動。

在社會主義政黨的面前，提出了建立第三國際的任務，要在贊助一切國際革命行動基礎上聯合一切思想上反對國家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戰鬥口號是促使沙皇專制失敗，以便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

同時，列寧和其他好些同志，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擁護徹底的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路線，在思想上同一切機會主義者與社會愛國主義者分別開來，並且以自己的批評推動不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左傾。列寧的許多論文以後彙印為反潮流的文集。這在大戰時候，對於堅持布爾塞維克的立場是起了極大作用的。列寧同『左派』的布哈林、拉狄克等開始出版共產主義者雜誌，一方面幫助拉狄克向左轉，另一方面絲毫也不允許有基本上的動搖。可是在一九一六年的時候列寧就寫道，再不應同布哈林派共同出版共產主義者雜誌了，因為布哈林和拉狄克並未改正錯誤，他們加深了自己的托洛茨基的錯誤。

列寧主張迅速的開始出版獨立的布爾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文集。

徐諾維夫在口頭上是同列寧一致的，而背後則同『左』的機會主義者進行談判。他寫信給機會主義者史略普尼可夫，要他『逼迫』列寧，以求得同機會主義者實行妥協。列寧在他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號的信上，揭穿了徐諾維夫這種兩面派的行動。列寧說：『這不僅是動搖，而且比動搖更要壞得多。』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齊米瓦爾德開了第一次的國際主義者的代表會議。列寧說這次代表會議

是國際反戰運動發展的「初步」。列寧說：「在戰爭所引起的非常的嚴重的危機時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是前進得很慢的，但是總在朝着同機會主義與社會國家主義絕緣的方向前進。」一九一五年九月五號至八號，齊米瓦爾德的國際社會主義代表會議，就明白的證明了這一點。」

代表會議不僅是成份複雜，而且思想上也是很複雜的。在這樣條件之下，要想提出一致的決議，是非常困難的。齊米瓦爾德代表會議上大多數的分子向着中間主義動搖，因此在會議開始的時候，我們的黨即在代表會議上組成了「齊米瓦爾德左派」。布爾塞維克要在宣言中堅持幾個革命口號，這用了很大力量的。在齊米瓦爾德「左派」與其代表會議參加人進行嚴重的鬥爭之後，才草定了會議的宣言。列寧這樣問道：「我們黨的中央是否應該贊成這個不徹底的無力的宣言呢？」他答覆道：「是的，因為這個宣言在對於反對機會主義者與機會主義決裂的實際鬥爭上是前進了一步的。」

總之，這第一步的企圖使得各國的國際主義者更進一步的團結，並且比較堅決地，自信地保持自己的路線。戰爭中不斷增加着的痛苦搖動了他們向着國際主義路線發展。雖然「齊米瓦爾德左派」裏面有些是很不徹底的國際主義者，而且列寧同他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可是這一中心，總是幫助以後組織第三國際力量的實際中心。

在齊米瓦爾德的「左派」中，只有以列寧為首的布爾塞維克黨採取唯一正確的徹底的立場。只有在布爾塞維克的戰略和策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第三國際。「齊米瓦爾德左派」出版了德文的第一

報雜誌，登載過列寧、拉狄克、羅蘭賀斯特等的文章。

隨後在一九一六年的時候，在金泰爾召集了第二次的國際代表會議，這會議又叫做第二次齊米瓦爾德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的成份，是比較國際主義化些，澈底些。在這個時候，差不多在一切的國家內都分出了國際主義者派，發生了澈底國際主義者同社會國家主義者的分裂。而主要的，則是因為羣衆的情緒改變了，所以參加大會的代表，應該是能够實行更澈底的路綫的。在大會上互相鬥爭的各派妥協的結果，寫出了金泰爾宣言，這一宣言，同齊米瓦爾德代表會議的宣言比較起來有比較明確並且比較革命的口號，這是進了一步。宣言中說：『鞏固的和平，祇能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果實。』『阻止將來戰爭的唯一辦法，只有工人階級起來廢除資本主義財產制度和奪取政權。』但是在金泰爾的代表會議上，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基本口號——『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國內戰爭』，主張『戰爭中本國政府的失敗和創立第三國際』都未曾通過。可是，金泰爾的代表會議確使『齊米瓦爾德左派』的立場鞏固了。

大戰中俄國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狀況

在大戰的時候，關於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狀況的材料，是很片斷的，不充分的。大家都知道，在大戰

中我們黨的組織是大大削弱而且受到了摧殘。如像當時我們沒有黨的公開刊物；一切自由資產階級的刊物，特別是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是採取極端國家主義的論調，這影響了社會民主黨組織的情況；同時還有蒲列哈諾夫和其他的孟塞維克都同資產階級合唱起來；甚至於個別的布爾塞維克，在大戰的初期也是被迷惑了。他們走上了保護祖國派的道路（如米史可夫斯基）。政府利用軍事時期，放肆地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國外黨的中心，並沒有停止自己的活動，可是在大戰的時候，因為同國內黨的組織失了聯系，因為交通被破壞，所以它的影響也就小得多。送指示信，要經過非常大的困難，要經過瑞典、挪威和芬蘭，要派遣專門的同志，因此中央和地方組織的聯系是困難極了。

斯達林當時被放逐在杜魯漢斯基，他揭發了社會國家主義者，中間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誤。

斯達林給列寧的信中寫道：

我親愛的伊里奇，我謹向你致熱烈的敬禮！……你的近况如何？健康如何？我一切如常，啃着麵包，刑期還只過得一半；雖然是寂寞，但有什麼辦法。你們的事情怎樣，想必是愉快些吧！……

不久以前我見過了克魯包特金的文章，他真是個老糊塗，完全是瘋了！又在演辭雜誌上見過了蒲列哈諾夫的短評，那也是個老不改正的空談婆，而取消派同他們在自由經濟社裏面的代表們怎樣呢？要堅決的打擊他們，但我可沒辦法，難道他們就這樣不受到處分嗎？希望在最

近的將來能出現我們的機關報，要無情的打擊他們，不疲倦的打擊他們。如果想寫信給我時，請寄耶尼塞斯基省，廟鄉，史潘特良收——科巴（斯達林）。

史潘特良要請你轉告格特，薩姆巴和樊德久，恭賀他們都身任部長，並致酸苦的敬禮！

任何地方黨的工作是沒有停止的，曾經企圖過出版幾種秘密的報紙。如彼得堡的無階級真理報（出版了幾期），烏克蘭的星報以及其他城市的報紙。對於反戰及其他的問題，例如關於物品漲價，關於國家主義者的暴舉，關於資產階級企圖通過軍事工業委員會吸引工人合作等等問題，都散發過傳單。

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保險問題的雜誌又重新出版了。斯達林在他從流放地寫來的信上說：

親愛的同志們，被放逐到杜魯漢斯基邊區的我們，很興奮的歡迎保險問題雜誌的復活，我們以為現在時候，俄國工人羣衆的公意，是被無恥的膺造了，真正工人的代表是被古奇可夫，梁布新斯基等的積極活動所竄改了。這時，我們能看見真正工人的雜誌，這我們是十分高興的。讓保險問題雜誌用它的力量和努力實現對於我國工人階級思想上的保險教育，克服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和蒲列哈諾夫等腐朽的反無產階級的違背國際主義的宣傳。——

弗拉特金，斯達林，馬斯倫尼可夫，米特維奇夫，皮芳，史潘特良，希佛宰爾。
外附六個盧布，八十五哥比，錢隨此信匯來。

布爾塞維克同時利用了職工會等合法機關來實行自己的路線。在薩拉托夫出版了我們的報，參加的有薩拉托夫斯基、洛莫夫、奧爾民斯基、諾金等。在這個時候，莫斯科、彼得格拉、基夫、哈爾可夫和其他城市裏面，不管遭受了怎樣的破獲，秘密的印刷所總是存在的。在警察廳的文庫裏面，保存着許多對於高爾基的報告，這證明了偉大的無產階級的作家在大戰中的活動。在偵探給與警察廳長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團聚在失敗派紀年雜誌和「猶太人生活研究社」周圍的那些人的活動，你可知道嗎？他們的領袖是高爾基，他們在這個社會的合法行動的掩護之下普遍的進行募捐，他們的用途總不是好事情……高爾基在「孤帆」書店，在季洪諾夫、蘇漢諾夫君那裏，裝着同自學者談話的樣子進行募捐，來供給他的失敗派紀年雜誌的編輯部。』格洛巴雀夫將軍檢查了這個報告之後，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七號的通報中說：『紀年雜誌，主要地是靠著作家高爾基的款項出版的，他是布爾塞維克派，也就是失敗主義派；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前已有過報告。這個雜誌的職員，是隸屬於布爾塞維克社會民主黨的，這些人用着作家名義，其實都是社會民主黨思想的理論家。』……

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第廿七號的黑色百人團的俄國呼聲報上寫道：『伏爾加沿岸都被高爾基的這種『熱烈』呼聲所淹沒了，再不要高爾基見我們，再不要失敗主義的文藝見我們。』

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和其他許多城市物價高漲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進行了革命的宣傳，反對資產階級和孟塞維克取消派共同蒙蔽工人階級的企圖。這種企圖是在於掩飾物價高漲的原因，物價高漲

的真正負責人以及克服的辦法等。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莫斯科的街上發生了羣衆同警察憲兵的衝突，發生死傷。在反對警察的行動中，軍人也有參加的，在我們各地的組織中都有士兵的參加。在許多同志的回憶和當時許多的文件中，都證明了這種情形。

在當年的春天和夏天，頓巴斯爆發了罷工運動的浪潮。在很多的方面，如高洛夫克和魯于斯克的罷工運動，是被屠殺的辦法鎮壓下去的。羣衆是覺醒起來了，各地黨的組織都得到了發展的鞏固。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時候，中央委託魯特芬諾夫回俄國，他到過了頓巴斯、哈爾可夫、耶卡基林諾斯拉夫等地，爲的是準備地方黨的代表大會。在烏拉、伏爾加沿岸、北俄地區和高加索等地，都進行了同樣的組織工作。革命高潮的發展，預示着沙皇專制的死滅。

當時黨散發了很多告士兵的傳單，有的是克羅斯坦特和其他軍隊集中地方的軍事組織自己所散發的傳單。在這幾年中，軍事組織已有了他們鬥爭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在第一次革命的時候，反動時期，革命的高漲和大戰時期得到的，但是工作的範圍還是很狹小。起初的時候，專門向軍隊進行宣傳的報紙傳單是很少的；可是以後布爾塞維克在士兵羣衆中的宣傳逐漸的擴大起來了。在士兵羣衆的面前，從沒有像這幾年那樣明確的尖銳的提出下述的問題——他們應跟着誰走，爲誰而戰。在這個時期中，不管各省和各中心城市工作是怎樣的困難，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和鼓動還是有他的成績的。在莫斯

科用了各種的方法，費了很多的時間想建立領導的中心，但總是被捕和被破獲。因為政府的偵探差不多知道我們每一個行動。

由於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和前線傳來的消息，國家主義者的瘴氣很快的被懷疑所代替了。在莫斯科和其他許多城市的學生中產生了許多組織，他們決意反對國家主義者的瘴氣，主張社會主義者的聯合。

同時在莫斯科，產生了許多獨立工作的集團，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普列斯寧委員會，參加者有梅尼斯基、林杰奇等人；特維爾斯基集團，參加者有克拉斯丁、格龍特、比爾尋、蘭西斯等人。

在大約估計我們在這個時期中黨的組織的力量時，那麼，我們應當說，在組織內積極分子的數目就有好幾萬人。有的是完全脫離了工作，有的是在動搖了投到保護祖國派方面去了。在這幾年所留下的是忠實於布爾塞維克旗幟的，他們能够保存布爾塞維克的基本幹部，能够在鬥爭中教育與鍛鍊新的革命幹部，準備他們來負擔一九一七年以及以後的重大任務。他們的功績是很大的。

大戰時俄國的工人運動

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把事情形容得這樣，好像大戰開始以後，工人即停止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似的。

這種形容對於資產階級當然是有利益的。孟塞維克和社會國家主義者們也是贊助這種謊言的。例如孟塞維克克倫波蘭特在現世界中寫道：『確實是一經動手便熄滅了彼得堡的動盪，而莫斯科和巴庫的罷工也就停止了。工人完全了解到當時形勢的歷史重要性，並指出當時不是發動內部鬥爭的時候。』

自然，這完全不是事實，因為就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罷工也沒有停止過。一九一四年八月的統計，參加罷工者有二萬五千人；一九一五年統計有九百二十八次罷工，參加的約五十四萬人；一九一六年約有一千六百次的罷工，參加者達一百三十萬之多，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政治罷工。如果以為工人運動是被世界大戰的暴風雨掃盪了的話，那是完全不正確的。誠然有過短時期工人運動比較差，這是因為戰爭時期獨裁法令壓制工人的結果；但是因為物價高漲超過了工資的提高，供給的紊亂再加上全國政治上的壓迫，前線的失利，軍隊供給中的貪污，高級指揮官的背叛等等，引起了羣衆的憤怒；布爾塞維克不斷的革命宣傳，又提高了工人羣衆中的革命情緒。一九一五年的春天，在伏士尼生斯克和可史特洛姆發生了屠殺工人事件，於是在俄國許多城市便爆發了罷工潮流來回答這次的屠殺。但是資產階級採取了各種方法企圖造成這種情形，彷彿在國內已進到了『階級的和平』似的。同時沙皇政府不僅在形式上製造『階級和平』、『民族和平』，而且要在實際上實現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合作。工業上的和地主中的資產階級，也是十分關心這個問題的。資產階級的影響愈擴大（他們已經組

織了農村和城市的自治聯合會，則他們愈想使農民特別是工人受他的影響和領導。資產階級提出了組織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意思，孟塞維克和保護祖國派的先生們却熱烈加以擁護。這種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於保證國防的勝利，更好的組織工廠企業對於軍隊的供給。資產階級企圖吸收工人的代表到軍事工業委員會中來，要他們到工人中去宣傳，必須提高大砲工廠，砲彈工廠，槍枝彈藥工廠，化學工廠及其他一切工廠的勞動生產力。在這個時期內，軍事工業是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是其他的經濟部門，農業，機器製造和國民經濟必需品的生產部門却減縮了。資產階級的口號是——一切爲着戰爭，一切供給戰爭。孟塞維克是積極的參加了並且幫助了資產階級這種愛國的事業，而且在工人中宣傳，主張工人的團體應該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選舉。布爾塞維克是積極反對工人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張積極抵制他們的。

工人階級應當怎樣對付軍事工業委員會，布爾塞維克認爲這個問題是有重大意義的。列寧對此寫道：『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生活中，目前最重大的事實，這就是彼得堡工人選舉代表到軍事工業委員會中去的問題。在大戰以來，正是這些選舉第一次的真正將無產階級的羣衆吸引到當時政治基本問題的討論與決定上去，並且告訴我們，在社會民主黨的羣衆政黨中，是什麼樣的一種真實的情形，我』

* 軍事工業委員會是由大資產階級在工商業代表大會的執行委員會中組織起來的。所以軍事工

業委員會是工商業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的附屬品及工具。

們看到其中是有兩個派別：一個是革命的國際主義派，這是我們的黨所組成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派，他是反對保護祖國派的；另一派是保護祖國派或叫做社會國家主義派，他是「我們事業派」。（取消派的基本核心）蒲列哈諾夫派，民粹派和非黨分子的聯盟。同時資產階級的報紙和俄國的黑色百人團都是幫助這個聯盟的，這證明這個聯盟的政策的本質，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

在工人階級中，究竟是那種策略戰勝了呢？初看起來，彷彿是孟塞維克的策略勝利了，因為有一部分工人終於是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活動，領導人是有名的孟塞維克格服士及夫和奸細阿布洛西莫夫。但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當工人代表集合起來進行軍事工業委員會代表的最後選舉的時候，他們大多數終於是反對參加的。大多數提出了尖銳的決議反對參加，並且宣佈他們當前的任務是要同沙皇的專制制度及其社會基礎（地主的土地領有制）進行鬥爭。彼得格拉、莫斯科許多大工廠工人都贊成布爾塞維克的策略——積極抵制軍事工業委員會。據取消派事業雜誌的統計，在二百三十九個地區和地方委員會中，只有七十個委員會進行了選舉，而且只有三十六個委員會選舉了工人的代表。這個數目是十分明顯的告訴我們，工人是怎樣的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在初步選舉失敗之後，由於保護祖國派格服士及夫的告密，許多布爾塞維克的代表被捕了，他那時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寫文章，說在代表的會議上有些「外來分子」。他們用了許多陰謀鬼計，才得進行了新的選舉，選了十個人到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選了幾個人到地方委員會；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在這些選舉的會議

上有組織的退出了會場，並且向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提出了以下的宣言：

「彼得堡各工廠的代表是應遵行選舉人的指令的，選舉人認為無產階級的代表在原則上，不應該參加任何幫助戰爭的組織，故特向軍事工業委員會申明，彼得堡無產階級的代表拒絕參加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的選舉，並且宣佈如果在軍事工業委員會中有任何工人的話，那麼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就要把他們當作無產階級意志的叛徒和敵人來進行堅決的鬥爭。」

其實吸引工人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是要實現孟塞維克所幻想的建立合法「黨」的企圖。很明顯的，資產階級之所以組織工人集團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決不是爲着格服士及夫的媚眼。資產階級是要把這些委員會中的工人代表變成剝削階級的助手，以便更巧妙的欺騙工人羣衆，他們利用了孟塞維克的幫助來達到這種目的，但是時間却是不長的。

自然沙皇政府是容許孟塞維克在工人晨報上謾罵布爾塞維克，因爲布爾塞維克主張「抵制」和「無政府主義」。而布爾塞維克則只能在秘密的文件上，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號彼得格拉委員會所發的文件上給與工人階級的叛徒們以充分的駁覆。彼得格拉委員會在這個宣言中說：「對於爲着侵略戰爭的強盜帝國主義的利益，來利用工人運動的叛徒們，工人階級是要把他們掃盪淨盡的，工人階級毫不動搖的要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並且繼續發展階級鬥爭，要記着帝國主義國家

的民族敵人，是在他們國內，——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

軍事工業委員會，是類似第一次革命時蘇巴托夫的行動，這種新蘇巴托夫派也是受到了可恥的失敗。孟塞維克所選出來的工人代表結果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採取了反對這個委員會和孟塞維克的態度。在二月革命的前夜，甚至於政府不得不逮捕主張工人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發起者——格服士及夫（如像以前在敖得薩逮捕蘇巴托夫派夏也維，或像下令逮捕自己的奸細加朋一樣）。

應當指出，沙皇政府和一切仇視工人的階級，企圖建立『羣衆的工人組織』來使他們始終執行仇視工人的口號，這種企圖終於完全遭受了失敗的命運。

資產階級的陰謀是失敗了，工人階級沒有跟着政府跑，更沒有跟着尾巴主義者——孟塞維克跑。

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沙皇政府無力來勝利地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保衛俄國的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隨着帝國主義戰爭前線上不斷的挫折和失敗，國民經濟的崩潰，工業生產力的下降以及士兵中不滿情緒的增長，資產階級也日益懷着反對情緒了。在資產階級隊伍中，形成了陰謀的集團，他們的目的是要排除那些最可恨的沙皇政府的擁護者。

皇宮內的執政者，是皇后與官女的愛人拉斯希金，是這一最荒淫的官臣。他掌握着統治的機關，像操縱傀儡似的操縱着那些部長先生們；這引起了資產階級中深刻的不滿意，他們是自己要想來管理國家的。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組織的影響是發展和擴大起來了，如像農村城市自治會，工商業代表大會等等。資產階級更多地表示對於現狀的不滿。他們對於自己投在戰爭中的資本的擔心，更促進他們的不滿。在當時戰爭中，每天的耗費達四——五千萬盧布之巨。這些錢的大部分，是落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的荷包裏，他們總要想把這件已經開始了的事業做到一個勝利的結果。可是他們已經看到沙皇政府是完全無力使戰爭得到勝利的結果。一方面是國庫費用的浩大，高級官吏的賄賣，和前線的毀壞；另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和一般生產能力的降低。一九一三年銅鐵生產為四百七十七萬五千五百噸，而在一九一七年則為三百一十一萬二千三百噸；煤的產量也從三千六百萬噸降到二千八百五十萬噸。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在一九一三年為一百五十一噸，在一九一七年為八十九噸。在戰區附近的地方，有大批的失業工人；在波蘭，有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失業的；在波羅的海區，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是失業的。

同時，羣衆的不滿也增加起來了。革命的騷擾也在發展着。因為糧食的投機，是十分的厲害；那些要求進行戰爭直到勝利結果的國家主義者，都是參加了這項投機事業的。每進行一天戰爭，侵略者們就

能從羣衆的血汗中榨取上百萬的財富。在戰爭的第一年，物品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工資只提高了百分之十九；農村經濟是破產了，不斷的徵發制度，牲畜的發瘟，勞動力極端的缺乏（因經常的動員）造成了耕地面積的縮小。

同時在軍隊中實行了嚴刑制度，恢復了毒打和肉刑制度，一言不慎就被遣到前線去送死。在軍隊的後方，軍官們是非常放蕩荒淫的。掠奪，貪污和叛賣無所不爲。前線的士兵，不僅看到他們的指揮官無能，而且他們沒有武器彈藥和糧食，他們是沒有力量對抗技術武裝齊備的德國軍隊，這完全是使他們生命橫受摧殘。整個軍和軍團的士兵是死在泥坑裏，鐵絲網下和毒氣中。士兵羣衆中於布爾塞維克的號召作了熱烈的回答。布爾塞維克是反對戰爭的，並且向士兵指出造成戰禍的人是誰與怎樣去結束戰爭。

羣衆的不滿和國內的革命騷擾是在增長着。在一月，紀念一九〇五年流血紀念日的時候，在莫斯科，彼得格拉和其他許多城市內，就已經發生了大的革命行動。這一工人的羣衆行動，證明了革命情緒的提高。從此以後，革命運動就沒有停止過。國會開幕的那一天，（二月十號）恰巧是審判第四國會內布爾塞維克議員的第二週年，這一天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中的工人集團提議，向着國會的會場舉行遊行示威，並要求組織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是應該依據於鬥爭中組織起來的人民之上。彼得格拉布爾塞維克黨的委員會號召一天的罷工，並提出了在街上舉行示威去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口號。二

月二十三日國際女工紀念日的那一天，在許多工廠裏面發生了罷工。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格勒罷工者有九萬人，二十四日就有二十萬人，二十五日有就二十五萬人了。羣衆到了街上並且不可避免地同警察發生了衝突。當時彼得格勒的市長哈巴洛夫將軍發表了他的佈告，內稱政府已有具體的辦法來鎮壓已經開始的運動。警察機關定出了鎮壓暴動的詳細計劃，在屋頂上都架滿了機關槍。二月廿五日在士納明斯基的廣場上，哥薩克的軍隊是轉過來保衛民衆了。這是軍隊中開始動搖的信號。

以莫洛托夫同志爲首的中央分局，在二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宣言中號召工人、農民和士兵起來組織武裝暴動，反對沙皇制度，建立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在這一天，巴夫洛夫團的部隊拒絕鎮壓暴動，但是政府還有一些可靠的軍隊，所以在軍隊的各個部隊之間遂發生了衝突。那天整個夜晚，各部隊討論着前幾天所經過的一切事變，並且要決定軍隊究竟要站到那一方面去。二月二十七日，伏林斯基團的士兵在軍官基爾皮奇尼可夫的領導下，奪取武器，並且得到巴夫洛夫、莫斯科、立陶宛、帕萊奧白拉、仁斯基等團的響應，他們佔領了兵工廠，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暴動的部隊已佔領彼得格勒城的大部了。

這是民衆的革命，其中的發端者，前鋒隊和領導者是以布爾塞維克黨爲首的工人。穿着軍裝的農民——士兵也同工人打成一片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已在基本上建立起來的工農聯合；在二月革命中是實現了。

暴動的工人和士兵，吸收了學生羣衆和一部份城市小資產階級參加這一運動得到了農民羣衆的同情。在彼得格拉，革命是達到了最大的發展和最大的力量，因為政府機關都集中在這個城市，因為這個城市是軍事工業和一切大工業的中心，因為它是優秀工人的集中地，因為它是政府的生活的中心。警察署，審判廳，保安隊，憲兵司令部和監獄都被掃蕩了。當天暴動者就把牢監中的政治犯釋放出來了，他們鎮壓了警察和憲兵的活動，開始逮捕沙皇政府的部長和官吏。

但是資產階級是不想完全打死沙皇制度的。雖然在一九一六年的時候資產階級殺死了妨礙資產階級利益的拉斯布金，但是資產階級現在確并不急於去對付那些人民所最痛恨的沙皇政府部長們，資產階級是用了很大的力量來挽救沙皇的帝制政體。二月二十七日，資產階級還懇請沙皇，爲着挽救帝制政體實行讓步和妥協。但是這已經遲了，同沙皇尼古拉已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了，尼古拉不得不簽字退位（雖說皇后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走卒克倫斯基，以後用了各種的方法，「拯救」沙皇並護送他的家屬到英國去。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還進行了企圖去同沙皇的兄弟密哈伊爾談判。密哈伊爾拒絕接受皇位，他正確的估計到，在這次的革命洪流中要保持這個腐朽的皇位是靠不住的。在國會內，由各個資產階級政黨所組成的「進步聯盟」組織了以地主羅將珂爲首的國會臨時委員會。這個地主兼資本家的羅將珂，須要將戰爭進行到勝利的結束。這不僅因為他是個大地主，同時還因為他是個大的軍火商（雖說他取了不能用的槍托的螺釘）。在同一天，也就產生了彼得格拉的工人

士兵代表蘇維埃。

這樣，帝國主義戰爭就歸結到了革命，這一革命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

我們知道列寧早就發現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由此產生了革命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列寧寫道：『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各個國家和各個經濟的發展的平衡增長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下，恢復各個時期被破壞的平衡之方法，除了工業的危機和政治上的戰爭以外，是不可能有的方法的。』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突兀性的規律中，產生了突破帝國主義陣線和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在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陣線的最薄弱的一環（俄國）是被突破了。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資本主義戰線的練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些。這練子就在這裏被沖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爲什麼呢？因爲，在俄國會展開了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有了千百萬爲地主所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因爲，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曾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牠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威信，而爲一般人民所痛恨。』（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第十三章 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

革命及布爾塞維克把它轉變爲

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

二月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及黨的作用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的統治是被暴動起來的工、農、兵的革命攻擊所推翻了，工人階級成爲革命的領袖。二月革命之前，工人階級的強有力的罷工運動先在彼得格勒開始，以後就蔓延到烏克蘭（頓巴斯）、巴庫、布良斯克、伊萬諾伏伏斯基、新斯基、可斯托洛馬以及其他許多工業區域。這些罷工，開始時是經濟的，後來很快的轉變成爲『推翻沙皇制度』口號之下的政治罷工了。

在一九一六年末及一九一七年初，特別尖銳的是糧食的飢荒，這種飢荒，主要是打擊着工人階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大約祇得到最低限度糧食的百分之十五；物價高漲與投機，使得實際工資劇烈地降低下來。例如五金工人的平均工資，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祇增

加百分之五十，而同時期食品的價格却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工人把要求麵包，要求改良物質生活的鬥爭和反對戰爭，反對專制政體的鬥爭聯系起來了。工人階級在布爾塞維克的口號之下鬥爭着。一九一七年一月，罷工的浪潮洶湧的發展起來，在彼得格勒，罷工的工人有二十萬人；罷工並且蔓延到其他許多城市。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祇在彼得格勒，就有四十二萬三千人罷工；在一月，政治罷工佔罷工總數百分之六二·四；到了二月，就佔百分之九五·六了。俄國第二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開始了。

直接引向革命勝利的這些事變，是發展得非常迅速的。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到引向二月革命直接勝利的基本事變。二月十八日，開始了布齊洛夫工廠（彼得格勒最大工廠）工人的罷工；二月二十二號，彼得格勒城的一切最大企業的工人都罷工了。二月二十三日（即新歷三月八日，俄歷與新歷時日有些不同），彼得格勒的女工出到街上示威遊行，反對飢餓，戰爭與沙皇政府。這一遊行示威是受到總的無產階級行動的支持的。在這一天，政治的罷工轉爲反對沙皇制度的總的政治示威。二月二日至二十五日，革命運動已經蔓延到整個彼得格勒的工人區域。工人羣衆舉起了紅旗，旗上寫着這樣的革命口號：『打倒沙皇』、『打倒戰爭』、『麵包』等。政治的罷工與示威轉變爲武裝暴動，工人解除警察憲兵的武裝而自已武裝起來。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工人與警察發生武裝衝突，結果在史納門斯加雅廣場警察槍斃了工人的示威隊伍。

在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影響之下，軍隊也開始轉向工人階級方面來。二月七日，工人在兵營裏舉

行了示威與羣衆大會，號召士兵進行共同的行動。在這一天，伏林斯基團暴動起來了；以後莫斯科團、怕夫諾夫團及其他部隊也暴動起來了。

在布爾塞維克黨口號之下的工人的革命行動，軍隊之轉向工人方面以及農民（士兵）鬥爭之與無產階級鬥爭相匯合，決定了沙皇專制政體的命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了。這一革命是八個月以後所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保持了幾百年的看來好像是堅固不破的堡壘之帝制政體，這八天內就崩潰下來了。這初看起來好像是奇事，但是僅僅對於庸人這一革命才好像是奇事。沙皇制度的壓迫愈是厲害，一切社會的抗議愈受鎮壓，那麼在民衆中所蘊藏着的憤怒愈是強烈的。在革命運動中爆發起來了。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革命所開展的創造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不應忘記，俄國工人階級進到這一革命時，是已經有了基本的準備的。列寧指出俄國工人階級經歷了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經閉了這革命以後的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的黑暗反動時期；經閉了帝國主義大戰前一九一一——一九一四年的新的革命高漲時期。這是二月革命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九〇五年革命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的舊習；驚醒了數百萬工人和千萬農民，使他們進入政治生活的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出（並且指示給全世界看）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和其主要的政黨），指出他們的本質，他們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和他們目前及將來的目的。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動時期（一九〇七——一九一四），

盡形暴露了沙皇專制政體的內容，使之纖微畢露；揭破了以拉斯布丁爲首的沙皇狗黨的一切腐敗，癱瘓，淫亂，放蕩，顯示了羅曼諾夫（沙皇姓）朝的殘暴；這些羅曼諾夫輩的強盜，把猶太人、工人、革命者的鮮血洒遍了全俄國。這個擁有千百萬俄畝土地的「一等之一」的地主，爲保障自己和自己階級的神聖的財產起見，就是什麼殘暴，什麼滔天罪惡，對於任何公民的摧殘和屠殺都無所不爲了。」（見列寧：遠方來信）

此外，還應當指出那種產生空前強大的世界政治經濟危機，產生國內及國際危機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是極大的加速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在這一進程的一個特別劇烈的轉灣中，染着羅曼諾夫王朝血腥與污穢的火車就一下子顛覆過來了。

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並且領導了千百萬羣衆要求和和平，麵包與自由的行動。正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造成了革命的勝利。

列寧在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就寫道：『無產階級完成了革命，它表現了英勇，它流了血，它領導了勞動貧苦人民的最廣大的羣衆。』無產階級領導了農民及士兵羣衆與城市貧民，而以武裝暴動推翻沙皇制度。這一事實，對於革命的勝利是有決定作用的。我們黨對於武裝暴動口號的宣傳，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的口號的宣傳，爲着蘇維埃（作爲暴動機關及政權機關）的鬥爭，要求把帝國主義戰爭轉爲國內戰爭的鬥爭——我們黨所有這些工作，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教育是有偉大作用的。好多年

來，我們黨所爲之奮鬥的並且用此來和機會主義者鬥爭的革命口號，深刻的進入到羣衆的覺悟之中。不管警察的恐怖（特別在大戰時期），我們黨在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以及在二月革命時期，對於羣衆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影響是非常強大的。

彼得格勒黨的組織，特別是菲波爾區域（因二月二十五號彼得格勒市委被捕，這一區委實際上執行了彼得格勒市委的作用），直接領導了彼得格勒工人的罷工運動，使鬥爭帶上組織性，並且促成罷工轉爲武裝暴動。

在莫斯科，大企業的工人也罷了工，在『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之下開始了示威遊行。

這時黨的工作的領導，是由住在彼得格勒的，以莫洛托夫同志爲首的中央分局來執行的。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分局發表了傳單，號召武裝暴動。

布爾塞維克是站在鬥爭的前衛。列寧寫道：

『不管一九一四年對於我們國會代表逮捕與流放，不管彼得格勒黨委由於在大戰時期進行了反對戰爭與反對沙皇制度的祕密工作受到殘酷的鎮壓與逮捕，可是我們的黨總是和羣衆和革命的無產階級一起的。』（見列寧：遠方來信）

資產階級及孟塞維克的歷史家，企圖減少和抹殺無產階級及布爾塞維克黨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世略帕尼可夫在他的『一九一七年』一書中，也對革命作了如此純粹孟塞維克的估計。在這書上，

他把二月革命描寫成爲一個自發的過程，完全否認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作用，甚至說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無產階級不是革命的領導者等等。

事實上布爾塞維克黨是站在羣衆之首，工人的革命行動是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口號之下進行的。在當前發展着的革命情況之下，布爾塞維克實際的實現了列寧的指示：關於武裝工人，關於將政治罷工轉爲反沙皇制度的武裝暴動，關於以自己的戰鬥積極性吸收農民及軍隊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等等的指示。

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有農民爲自己的同盟者。可是除了這些戰勝沙皇制度的動力之外，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及西歐的資本，也在革命中有了間接的參加，他們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宮廷政變。列寧在第一封遠方來信中着重的指出：

「革命之所以能够勝利這樣迅速和這樣「激進」（表面上，粗看起來），祇是因爲這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和經濟的企圖，在非常特別的歷史環境下結合起來並且非常「親密」的結合起來了。就是說：一方面，英法帝國主義的陰謀，爲着延長帝國主義的戰爭，爲着要更激烈的堅決的進行戰爭，爲着要屠殺新的千百萬俄國工人以求爲古契訶夫獲得君士坦丁，爲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爲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等起見，於是推動了密留珂夫、古契訶夫之流上去奪取政權；他一方面，廣大民衆（全

體城市和鄉村中的貧苦農民）爲着麵包和平和真正自由，興起了深刻的革命運動。」

無產階級進行了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推翻沙皇制度的勝利，對於工人階級開闢了直接的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在戰爭中獲得極大利潤的自由資產階級，以前總是擁護沙皇政府的，但是沙皇軍隊着着失敗，沙皇政府以及朝廷中以拉斯布丁爲首的賊黨，害怕正在發展起來的革命，企圖與德國訂立單獨的和約（和協約國脫離的）並且在口頭上承認放棄對於君士坦丁堡及亞美尼亞的野心等等。沙皇賊黨之所以要離開協約國而訂立單獨和約，是因為他們要來對付國內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要想與德國訂立單獨和約的企圖，以及國內總危機的發展，引起了資產階級的不滿，使資產階級對沙皇制度也採取反對派的態度。資產階級之反對單獨和平，因爲停止戰爭就是放棄資產階級在戰時所剝削到的無數萬萬的利潤，放棄對於新的市場的掠奪。

沙皇政府在這一時期的政策，也引起了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代表的不滿，西歐的資本家們把俄國看做是『他們帝國主義的附屬企業』（斯達林）

如果沙皇政府訂立了單獨的和約，那麼英國的、法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就要失去戰爭的同盟者俄國。俄國不僅在自己戰綫上牽制了敵人的力量，而且還在法國供給數十萬俄國兵士去補助協約國的軍隊。

這就是爲什麼西歐的資本幫助俄國自由資產階級來企圖實行宮廷的改變。

自由資產階級害怕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他以最大力量企圖停止革命與防備革命，資產階級企圖保持帝室，用米哈以爾來代替尼可拉當權。根據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首領古契訶夫的話，宮廷政變的計劃是這樣的：『在總司令部與沙皇夏官之間的路上奪取沙皇的御車，以後就用在彼得格勒所能依靠的軍隊逮捕現有政府，以後就宣佈政變以及將要組織政府的人員。』

『自由資產階級及協約國的資本家，需要小的革命來進行大的戰爭。』（斯達林）無產階級及農民，以自己革命的行動打破了俄國資產階級及西歐資本家的計劃。

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及臨時政府兩重政權及其社會

根源

暴動起來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一九〇五年革命指示出蘇維埃是武裝暴動的機關，而且在那時期，是新的革命政權的萌芽。蘇維埃的思想留存於工人羣衆的意識之中，在推翻沙皇制度之後，工人羣衆就把這一思想實現起來。一九一七年二月，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開始開會，這一蘇維埃，是革命的工農專政機關。但由於革命開始時羣衆覺悟性與組織性之不足，所以那

*在大戰時候，俄國的愛國派把那城的名詞「聖彼得堡」改爲俄國性的名詞「彼得格勒」，十月革命把這一城市轉變爲革命的世界的城市「列寧格勒」。

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對執行委員會之中，小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孟塞維克同社會革命黨佔了領導地位（布爾塞維克只有少數幾個）。

在這時候，許多因為革命行動受政府摧殘的布爾塞維克黨的積極工作者還是處在流放之中。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列寧，在二月革命的時期還是處在國外；布爾塞維克秘密工作的領導者斯達林、斯維特洛夫等同志是在西伯利亞；因此黨的組織的領導減弱了很多。當時所有的布爾塞維克力量，是忙於直接領導羣衆運動，忙於在彼得格勒的街道與廣場上與羣衆一起行動。

武裝的人民，工人及兵士，在把自己代表派到蘇維埃去的時候，是將蘇維埃看成人民的政權機關的。他們認為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將會實現革命民衆的一切要求，首先將能訂立和約。開始的時候，在革命羣衆的壓力之下，彼得格勒蘇維埃真的通過了民主的決定，好像兵士代表所製定的第一號命令道：「命令給予了兵士以公民的權利。可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孟塞維克領導者，由於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實質，除資產階級政策以外不能實行別的政策。這些孟塞維克領導者，採取他們一切可能做到的辦法來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

同時，自由資產階級要想阻遏革命的往前發展。他們在二月二十七號組織了國會的臨時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的首領，是第四國會的議長，非常富有的地主，保皇黨員羅將珂；臨時委員會指定了臨時政府的人員。

彼得格勒蘇維埃內的妥協派領導就出來幫助自由資產階級。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國會的臨時委員會與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之聯席會議上，組成了以貴族爾伏夫爲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爾伏夫，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就已經被尼古拉第二預定爲沙皇政府的內閣總理了。在臨時政府裏面，加入了有名的立憲民主黨米留可夫和七個有名的資本家；同時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和孟塞維克且夷之，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同意之下，也以「民主派」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盡他們力量所及來鞏固資產階級政權——臨時政府。

代沙皇政府而起的臨時政府是什麼？這是新的階級——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地主——的代表。在經濟上，資產階級久已統治了俄國，並且在大戰時候，當專制政體不能很好應付戰爭而逼得對資產階級讓步的時候，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也鞏固了起來。

在形容臨時政府時，列寧寫道：「這政府並不是幾個人的偶然湊合。這是俄國新的資產階級的代

表，這些資本主義地主和資本的代表在經濟上久已統治了俄國。」（見遠方來信）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實行了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這就使得俄國國內經濟的破壞與勞苦羣衆的痛苦更行加深；臨時政府這一政策得到了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擁護，這一政策是與勞苦羣衆的利益直接衝突的。

事實上這一臨時政府是當了權，可是在這一資產階級政府之旁，繼續存在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

埃。這樣，就造成了兩種政權，就成爲許多政權危機的來源，只有無產階級十月革命才使無產階級脫離這一危機。

究竟在實質上，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是什麼呢？究竟什麼是他的作用，他的權利，他對臨時政府的關係呢？列寧關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後所造成的兩種政權的『階級意義』這樣的解釋道：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僅把全部的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民主專政。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就是那種上述階級的專政（就是說不依靠於法律而依靠於武裝民衆的直接力量的政權）。』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從各方面看來獲得大多數地方蘇維埃的信仰，但它自願把國家政權轉給資產階級和其臨時政府，自願把國家首位讓給臨時政府，與之訂立扶助的協定。它只以觀望和監督立憲會議的召集爲自己的責任（立憲會議的召集期，臨時政府至今還沒有發表過）。』（見列寧：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這樣，就得出了非常特異的兩個專政的錯綜：資產階級專政（臨時政府）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樣的兩種政權不是就能够長久保持下去呢？當然不能。一方面資產階級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幫助之下盡力要想把蘇維埃的人民政權機關的意義消滅下去，可是我們黨的任務却在於用解釋的工作使得羣衆覺悟到必須推翻新的資產階級政權——臨時政

府，必須為革命的第二階段，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這樣，就形成了列寧所形容為過渡階段的情況：沙皇帝制被摧毀了，但沒有摧毀到底。（列寧）十月黨及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需要繼續掠奪的帝國主義戰爭直至『勝利的結束』這一個政府不得不口上允諾人民以最高限度的讓步與賞賜，以便保持政權。在這政府之旁，還存在着「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工人政府的萌芽，以及最貧苦的民衆，就是要爭取和平，麵包與自由的十分之九的人民的利益之代表。（見遠方來信）

勝利的工人農民自願的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這是什麼道理呢？列寧對於這點這樣的解釋道：「十數年來在政治上睡着覺的，在政治上為沙皇的殘酷壓迫，地主和廠主盡力所摧殘的千百萬羣衆，覺醒起來而參加政治生活了。這千百萬人是誰呢？大部份是小生產者，小資產階級，即站在資本家和僱用工人中間的那些人。在全體歐洲的國家中，俄國是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波浪掃蕩一切，它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極大部份的人被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浸潤着和籠罩着。」（見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正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於資本家的深信不疑的，不自覺的態度形成這樣的事實，就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妥協派領導之下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列寧指出另外的一個原因，是俄國無產階級的數量比較少，是無產階級在革命開始時候的覺悟性與組織性還不夠。

小資產階級羣衆成了「善意的（善意地被迷惑的）保護祖國派。」廣大的羣衆看到革命在俄國勝利了，俄國和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比較成了最自由的國家了。這樣，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出來號召保護這一自由的俄羅斯反對德意志帝國；孟塞維克的社會革命黨就贊助這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號召，而相信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小資產階級，就成了善意的保護祖國派。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策略最適合庸常羣衆的情緒，由此就得出所謂「善意的社會革命黨。」這是帶上社會主義者假面具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人。誰要是看到那時候簡直是成千成萬的庸人如何穿起紅的鞋子拿到社會革命黨的黨證，那麼誰在那時候就能看到這一政黨的全部無原則性，全部非社會主義性及非革命性。許多庸人之所以加入社會革命黨隊伍，正是因為他們感覺到社會革命黨是秩序的擁護者，是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對者。因為極大農民兵士羣衆對於社會革命黨的相信，是社會革命黨影響的基礎。而那時農民兵士羣衆正剛剛在覺醒起來參加政治生活，所以就不奇怪的爲什麼廣大的庸常羣衆剛剛贊成這一政黨。孟塞維克的影響則比較少得多。可是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還在最初階段贊成這一小資產階級的政黨。

我們的黨反對保衛祖國派的瘴氣，在那個時候我們黨還沒有爭取得大多數的羣衆。

我們的黨對於與資產階級的妥協，總是採取敵對態度的，可是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却很熱望與資產階級妥協。因為他們認爲當前的革命是純粹資產階級的，他們以爲這一革命的領袖是資產階級

而不是無產階級。我們已經看到，在一九〇五——〇七年時，孟塞維克是如何的論斷：既然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那麼當權的就應當是資產階級。

在二月革命之後也是同樣的情形。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完全沒有能力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領導。他們依靠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這些情形早在大戰時候就使他們成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左翼，並使他們採取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深信資產階級政權的策略。我們已經知道，早在大戰時候，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這些保衛祖國派就起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傭僕的作用，他們拉了工人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擁護戰時的階級和平，而且出來說俄國資產階級之所以進行帝國主義戰爭是由於特別的好像是很高尙的原因。例如說爲着一切地方『民主與文化』的勝利的利益需要結束德國帝國主義等等的話。現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就在羣衆中助長這樣幻想，認爲臨時政府好像是人民的政府。列寧寫道：『他們不是開導工人的覺悟而反加以蒙蔽，他們不去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反加以鼓吹，他們不去使羣衆解脫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反使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羣衆中加強起來。』（見列寧兩種政權）所謂「聯絡委員會」*好像是要把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行動和臨時政府的行動配合起來，可是在事實上，這一委員會差不多是完全服從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

* 參加這一聯絡委員會的，在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方面是司節克洛夫、蘇哈賈夫，且夷之菲里痘夫。

斯基、斯可比爾夫；臨時政府方面是爾伏夫、俄列許肯到及尼可拉索夫。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面前擺着如下的任務，就是用耐心的解釋上作去爭取羣衆以及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孤立妥協派的政黨，揭破蘇維埃的小資產階級領導所幫助的臨時政府之反革命實質。

托洛茨基污蔑黨（或是黨的大多數）在這時期採取半孟塞維克的立場，這種話簡直是最無恥的胡說。黨的各別黨員曾經有了動搖和錯誤，但是黨整個說來，總是布爾塞維克的黨，而且很快的就在正確的道路上和這一時期中央委員卡米尼夫所犯的保衛祖國派的右的錯誤進行堅決的鬥爭。實際上卡米尼夫是繼續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激進派的路綫的，他對於革命完全採取他在第四國會布爾塞維克黨團被審判時所採取的態度一樣。特別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一發生之後，那時在西伯利亞阿青斯克城的卡米尼夫，就在城市大會上出來講話號召和資產階級合作，並且和當地的律師、商人以及其他資產階級代表一起，致電貴族爾伏夫、富豪羅將訶和米哈以爾羅曼諾夫。因為米哈以爾被革命所嚇怕，放棄繼承王位之權。在那時卡米尼夫已經墮落到這樣的地步了。這是對於黨的叛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上，薛夫魯克、維金斯基以及其他保衛祖國派的這一集團被開除出黨，這正是因為黨的最大部份是在正確道路上而不能容認自己隊伍中有投降派的存在。關於這點，西烏奴克自己寫道：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與四月在黨內佔着完全微小數量的一小部份布塞爾維克（我也在其中）對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採取了投降主義的立場。實際上

這種投降主義的集團在全俄蘇維埃聯席會議（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及四月初）的布爾塞維克黨團中是完全孤立的。在那時（在列寧來到之前）黨團內的最大多數就在黨團的一切會議上以最堅決最明確的態度反對卡米尼夫以及黨團中任何個別黨員的危險企圖（我的企圖也在其中）這些企圖，是要使黨團在某種形勢之下幫助臨時政府，是要使黨團脫離列寧對於戰爭的不可調和的態度。」

三月五號，真理報的第一號出版了，斯達林同志才從流放回來以後不久就加入了真理報的編輯部。在莫斯科開始發行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機關報，在也克泰林諾斯拉出版了星報；在沙馬拉、沙拉托夫、喀山及許多其他城市也出版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應當指出，在列寧來到之前，卡米尼夫的機會主義立場已經不僅引起其他中央委員與之進行鬥爭，而且引起黨員中間的抗議。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號真理報上，卡米尼夫寫了一篇文章，在這文章裏他提出我們的口號是『逼迫臨時政府』使牠公開的出來贊成和平，可是當臨時政府還不實行這點的時候，那麼『每一個人就應該留在自己的原位上。』卡米尼夫寫道：『在一個軍隊與別個軍隊對立作戰的時候，如果向其中的一方提議放下武裝各自回家，那麼這將是最荒謬的政策，這種政策將不是和平的政策而是奴役的政策。自由的民族將以憤怒的態度來反對這種政策，他們將堅定的立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子彈回答子彈，以砲彈回答砲彈。』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卡米尼夫在第八號真理報上寫道：『我們幫助它來澈底的消滅舊的制

度，我們將批評及揭破臨時政府的每一點不徹底性。」

黨的最大部份黨員羣衆對於卡米尼夫的文章是採取敵視態度的。一般的講，在布爾塞維克的中間，保衛祖國派以及半保衛祖國派的情緒，只是個別的遇到。可是卡米尼夫的這種動搖並不是偶然的。這些動搖的來源，是他在大戰時期所採取的右的機會主義立場，是他在阿青斯克大會上所採取的自由主義立場。他在二月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勝利之後，就把這種立場充分發揮起來了。彼得格勒黨委的執行委員會，也出來提出抗議反對卡米尼夫的文章。卡米尼夫的這些文章是和布爾塞維克真理報的整個口氣，整個方向相違反的。因為真理報是主張黨須要使全部政權轉給蘇維埃，所以在列寧來到之前，在真理報上就發表了斯達林同志「論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見有鞏固中央以及地方的蘇維埃，才是反對反革命的真實的保證。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工作方向，就應當是鞏固這活命蘇維埃，使它到處建立起來，並在中央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之下，把它們聯系起來，使之成爲人民的革命政權的機關。

在三月十八日的真理報上，斯達林同志寫了一篇論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的文章。在這文章裏，也着重指出：布爾塞維克黨將努力來鞏固工人、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將它作爲人民政權的機關，不做在中央，而且在各省都應當把蘇維埃鞏固起來。只有這種鞏固，才能使革命鞏固與勝利，才能把反革命摧毀下去。而臨時政府，却正是反革命的「合法的保護與掩蓋」。斯達林同志更指出，爲着進一步做深

入革命的鬥爭，必須武裝工人，必須建立工人保衛隊（赤衛隊的隊伍）。

『沒有忠實為革命服務的武裝力量，革命就不能勝利；如果說這話是正確的，那麼，沒有與革命利益血肉相聯的我們自己的工人自衛隊，我們的革命也不能成功的。』

『立即武裝工人，建立工人保衛隊，這就是革命勝利的第二個條件。』

中央局以及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這報的編輯部中斯達林同志起了領導的作用）進行了反對卡米尼夫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那時卡米尼夫總是企圖把這路線包含在自己的文章裏面。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所發表的提綱，得到了我們的黨及其領導的完全擁護，卡米尼夫的集團在我們黨內是被孤立了，沒有一個組織是贊成他們的。

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寧的提綱

我們已經看到，在二月三月革命的開始幾天，列寧對於革命以及新產生的政權作了如何正確的確切的估計。

列寧認為戰勝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是一個過渡階段，它準備着革命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的勝利的基础。列寧在得到革命消息之後，在第一封遠方來信中就這樣說道：

『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帝制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示出無產階級的民衆的特出英雄氣概，你們應該更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衆的組織上的特長，以預備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

列寧那時已經提出了爲着革命的第二階段，爲着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去武裝無產階級的這種任務。

當列寧在國外一得到革命勝利的初步消息的時候，他和有些同志就開始想着如何回到俄國的辦法。臨時政府設法不許他回來，協約國法國、英國也不許他；列寧及某些同志想盡了許多方法，結果只能設法坐着封禁的火車經過德國及瑞典回國。這一事情的組織者，是瑞士的普拉登；坐這封禁的火車回來的不止列寧一個人，這樣回來的，還有孟塞維克馬爾托夫，他是首先想起這一計劃的。在芬蘭的培羅奧斯杜洛夫車站上，斯達林同志接見了列寧，在到彼得格勒的路上，列寧在車廂中經常不斷的和兵士談話，來了解他們的情緒。列寧在四月三日夜到了彼得格勒，在芬蘭車站的廣場上，工人及海陸軍兵士集合起來歡迎列寧。他們把列寧擁到火車站上以前御用的私室裏，在那裏孟塞維克且夷和斯可畢略夫開始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名義發表了歡迎的演說，並且希望列寧找到與他們共同的道路。但是列寧不管他們，却轉過來到工人與士兵羣衆中去，並且在鐵甲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次的演說，號召實行進一步的鬥爭。

在列寧來到彼得格勒以後的第二天，即發表了他的四月提綱。四月四日提綱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文件，因為他在情況完全變更，需要新的指示的時候，給了我們黨的戰略與策略的一切重要問題以確切的、明確的答覆。

四月四日的提綱，在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中給了明確的立場。

列寧對於一切問題以簡要的明確的提法，使得布爾塞維克的立場立即更形明白與確定，並反對那些在基本問題上不站在布爾塞維克立場的黨員，例如卡米尼夫。

提綱指出革命第一時期的過渡性質。在這時期，由於勞苦羣衆覺悟性與組織性的不夠，他們還存在着對於資產階級的相信；提綱又指出必須顧及並利用這一時期的特殊條件來準備無產階級與農民貧窮階層之奪取政權。

『對於臨時政府不能有任何幫助』（和卡米尼夫的立場『在某種限度內幫助臨時政府』是相反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列寧在提綱內所提出來的立場。提綱認為卡米尼夫的立場是『不能允許的，散播幻想的。』

列寧提綱的出發點是承認這樣的事實，就是在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中，我們的黨那時還是處在少數地位，與我們黨對立的，是各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在於能解釋羣衆，而且因為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以我們黨應當用堅持的羣衆工作來爭

取蘇維埃。

和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所提出來的國會制度，民主共和國的要求相反，列寧提出了『全國的從下到上的』工人、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的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說建立新形式的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揭發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掠奪性質，聲明只有在政權轉入於無產階級及貧農手中，在事實上放棄一切割讓，在事實上完全與資本的利益決裂等等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同意於革命的戰爭。列寧指出，由於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利益的聯系，所以，不推翻資本制度是不能以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戰爭的。在估計戰爭之後，提綱提出了我們軍隊與交戰軍隊在前綫之聯歡的口號，這一口號是有重大意義的。

關於土地問題，我們應當堅持沒收一切地主土地，把國內全部土地，把土地轉交地方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的老的布爾塞維克要求，黨應當特別注意僱農代表蘇維埃，特別注意從大的莊園建立模範的社會化的農場。

列寧提出了將國內一切銀行合為一個全國的銀行並且由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方面加以監督的要求，列寧認為所有這些步驟，應當能夠極大的加速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但是，列寧着重指出，他並沒有提倡立即『實施』社會主義。列寧指出，在那時，僅僅必須轉入如下的制度：即『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方面應監督社會的生產及產品的分配。』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提綱中，列寧提出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任務，因此提出了新的戰略口號——無產階級及貧農的專政。

在提綱中，又提出了立即召集黨的代表大會，修改黨綱，並把黨的名稱從社會民主黨改爲共產黨的要求。因爲社會民主的名稱是被孟塞維克叛賣政策，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叛賣政策所惡化了。腐化了。列寧說道：『時候已經到了，應該拋棄離襟襤褸的外套，穿起潔白清淨的大衫。』

但是事情還不是僅僅關於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第二國際已經變成了『瘟疫的死屍』，應當建立新的共產國際。這一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列寧早在革命前就已經提出了。在其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給哥倫泰的信中，列寧寫道：『我們和以前一樣建立自己特殊的政黨，並且一定要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聯系起來。』

『絕不應該從新按照第二國際的形式，絕不應該與考茨基發生關係，應當有比較革命的綱領與策略；共和國的宣傳，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以前一樣的革命的宣傳，以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及「工人代表蘇維埃」（不是立憲民主黨的混蛋）奪取政權爲目的之鼓勵與鬥爭。』

列寧預防布爾塞維克中間可能的『統一的』企圖，所以寫道：『據我的意見，現在主要的是不要使自己被愚蠢的「統一」社會愛國派（或是更危險的統一動搖派，如組織委員會托洛茨基之類）的企圖所迷惑，而應當在徹底國際主義的精神之下繼續自己黨的工作。』（見列寧致哥倫泰的信）

列寧四月四號的提綱引起了我們敵人的恐懼。不久以後，孟塞維克就向工人發表了宣言，這一宣言一開始就警告說：『革命是在危險中。』什麼東西威脅着革命呢？孟塞維克從那方面看到了危險呢？是否從沒有澈底毀滅的帝制政府的殘餘這方面呢？不是。根據孟塞維克的意見，危險是在於布爾塞維克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孟塞維克同樣提出警告，反對提綱中所提出的『危險』口號，反對交戰軍隊的聯歡，反對把臨時政府的黑幕向軍隊解釋，反對無產階級及貧農奪取政權。因為據他們說，這能够引起『荒謬的』無意義的恐懼，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與仇恨。孟塞維克寫道：『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孟塞維克，經常的把列寧派及無政府主義策略的毀滅性警告了你們工人同志。』普列哈諾夫在他自己的統一報上發表了文章，稱列寧的演說為『夢囈的』演說。普列哈諾夫引用了孟塞維克且夷的話：『列寧一個人立在革命之外，而我們大家走自己的路。』嘿！革命正是超過普列哈諾夫且夷之，隨着列寧，隨着斯達林，隨着布爾塞維克黨前進了。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內部，只有右的機會主義者的極小集團，不同意於列寧的提綱。

四月四日舉行了彼得格勒市的黨代表會議，會議通過了列寧的提綱；以後其他的組織也接受了這一提綱；在四月底，全俄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也通過這一提綱。這一會議，把彼得格勒黨代表會議的事業推廣到全俄範圍中去，把全黨團結在列寧的周圍。

全黨以最大的滿意接受了列寧的提綱，因為這一提綱給了真正動員的口號，給了鬥爭以計劃與

明確的目標。

列寧的提綱是黨為着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而鬥爭的最重要的綱領文件，他受到黨的完全的贊成，並使黨對於革命的重要問題得到了明白的、確切的、原則的答覆。這一提綱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歷史上，與我們黨的歷史上，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七年四月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對於機會主義者的鬥爭

卡米尼夫首先出來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他在真理報上面寫了文章，認為根據他的意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結，所以不應當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而應當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而鬥爭。

一部份莫斯科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諾金、李可夫也保持同樣的機會主義觀點），諾金在莫斯科省代表會議上報告立憲會議中布爾塞維克任務的時候，實際上也是保持上列的同樣的觀點。他所說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僅僅關於鞏固民主共和國的問題，這種觀點沒有得到莫斯科組織的贊助。在四月代表會議之時，列寧的提綱已經成為最大部份布爾塞維克組織的綱領了。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至十六日的全俄蘇維埃的聯席會議上，黨提出了布爾塞維克關於不信

任臨時政府的決議案的時候，卡米尼夫和孟塞維克一起投票——『爲着不做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統一戰綫。』

在這時候，那些問題引起特別嚴重的分歧呢？基本的爭論於關於下述的問題，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已經完成？工農民主專政是否已經實現？我們是否已經處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面前？並且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是否可能？這個問題不同的解答就決定對於臨時政府的不同策略。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完成，革命工農民主專政是否完成的問題，列寧採取這樣的觀點，認爲：『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士兵專政的實現，在士兵中間大多數是農民，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見論策略書）

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是在生活中實現了，可是在實際上情形是比較複雜和特異的。

列寧寫道：『誰要是忽略和忘記這種事實，那麼就等於那些「老布爾塞維克」，他們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盡過可憐的作用，已經不只一次；他們無意義的背誦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鮮的生動的實際情形的特點。』（見論策略書）革命工農民主專政已實現於蘇維埃之中，誰要是只是還僅僅講革命工農民主專政的話，那麼他就是『實際上就投奔小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之就應把他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古董陳列所去（或可以名之爲：「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同上書）布爾塞維克黨的路綫，是在於把蘇維埃內部的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分子單獨團結起來，並

在新的「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的口號之下向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道路前進。

但是並不是說，列寧認為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中的鬥爭是已經完結了。爲土地，爲麵包，爲和平的鬥爭，要求對於帝制政體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殘餘進行鬥爭，要求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爲着完全實現這個任務，工人階級就必須與貧農聯合起來，走上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道路，爭取政權全部轉入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掌握中。因爲蘇維埃能夠更好的，更實際的，更正確的解決怎樣做並且採用什麼辦法能夠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

俄國革命的這一特殊道路，那時被機會主義者卡米尼夫及其同伴所否認了。和這一問題相聯的是別一問題：即我們是否直接處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面前？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時就寫道：「無產階級應該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爲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和麻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見兩個策略）

列寧在大戰時期，一九一五年所寫的幾個提綱中，也發揮了同樣的思想。

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俄國的前夜，列寧在向瑞士工人致別的書中，解釋清楚爲什麼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能夠由事實的進程進到社會主義革命。

他寫道：『俄國是農民的國家，是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在這國家裏，社會主義不能立即就直接勝利。但是俄國的農民性質在貴族地主保有極大土地的情形之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經驗的基礎之上，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極大的範圍，而從我們革命中造成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和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梯。』

所以早在一九〇五第一次革命時期，列寧及布爾塞維克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是可能的。我們已經看到，在列寧最初的著作中，已經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在一九一五年列寧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內勝利的問題。這點應當明白看到，因為托洛茨基及其信徒造謠誣蔑地亂說，好像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不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是可能的，而在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却『重新武裝』了。這種誣蔑不是真的，正是造謠，企圖把我們的黨形容為某種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政黨。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全部歷史，證明了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勝利，正是因為布爾塞維克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的革命理論——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中心實質，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專政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

布爾塞維克始終是為統一的戰略計劃而鬥爭，這計劃，就是把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及其不遲延地向着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但是為着實現這一統一的戰略計劃，在革命的

各個階段上就需要不一樣的戰略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的聯盟；在資產階級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中立中農。列寧在四月會議上清楚的解釋，他絲毫沒有像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信徒那樣，提出要跳過小資產階級的。「如果我們說，『打倒沙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跳過小資產階級的飛躍。」

孟塞維克說，列寧好像在四月提綱中提出要立即「實施」社會主義，這是造謠誣蔑。我們黨的敵人，從保皇黨一直到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都把事情形容成那樣，好像我們要「立即實施社會主義」。實際上，像我們所已看到的，列寧是指出了革命如何地以完全具體的形式提出了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任務，這樣的形式，不論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都是還沒有提出過的。

卡米尼夫（以及擁護他的少數人）在一九一七年的機會主義路綫是在於他牽強地，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分離開來，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就已經指出，革命工農民主專政有其過去與將來。卡米尼夫否認這一系列的原則，他只承認工農民主專政有其過去，即反對專制政體的鬥爭；至於爲將來而鬥爭，爲無產階級及貧農的專政勝利而鬥爭，那麼卡米尼夫是否認了的。

據卡米尼夫的意見，那時，俄國只關係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卡米尼夫所設想的對於農民的同盟，也只是這一階段上的同盟。根據他的意見，這一同盟應當表示於蘇維埃對於臨時政府的監督

及對於臨時政府的逼迫。卡米尼夫立場的孟塞維克實質，是在於根據他的意見（同樣的是根據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向着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要使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與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破裂。他說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既是無產階級力量與小資產階級力量的同盟，所以他只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當無產階級開始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的時候，那麼同盟就一定崩潰，共同的工作就變成不可能，即無產階級就要轉過來反對農民。

卡米尼夫否認這一事實，就是在農民中存在着半無產階級的貧農階層，他們能够成爲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同盟者。

卡米尼夫根據右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否認這一事實，即廣大工人與農民羣衆按照自己階級的地位是不需要戰爭的，他們是善意的接受到迷惑的保衛祖國派，而我們的任務是在於用長期的解釋與宣傳來消散這一保衛祖國派的瘴氣。

卡米尼夫說，如果我們站到列寧的觀點上，那麼我們就沒有政治工作可做，我們就成爲書寫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調查之那種理論家與宣傳者了。右派不承認小資產階級之所以隨着資產階級走是由於中了保衛祖國派的瘴氣。列寧指出我們必須把無產階級路線從小資產階級路線解放出來。

「無產階級以及非無產階級羣衆的混雜，羣衆內部階級區別的混淆，正是造成祖國保衛派瘴氣的條件之一。輕蔑地說什麼無產階級路線的「宣傳員小團體」，恐怕不很合式的。

罷。』（見列寧論策略）

右派否認了在西歐社會主義勝利以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李可夫說：『社會革命的發動應當是從西歐來的，革命的戰士力量的推動影響到西歐，在西歐牠變成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革命將成爲我們革命的基礎。不然的話，我們的政策就要變成小集團的政策。』

『社會主義革命的太陽是從那兒上昇起來呢？我想，根據一切條件，根據常人的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動，不是屬於我們，我們沒有這一革命的力量與客觀條件。在我們前面放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力量估計得過高。』

很明白的，卡米尼夫、李可夫等等的反列寧的立場，是在於他們那時把革命的力量——無產階級及革命農民的力量估計不足。這是孟塞維克的托洛茨基的路綫，這一路綫使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做了盜賊的行爲，使他們以後在蘇聯社會主義向城市和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進行堅決進攻的時期站到托洛茨基立場上去。這一托洛茨基路綫使卡米尼夫、徐諾維夫等等轉到最狼毒的反革命營壘中去，使他們走上用法西斯蒂恐怖來反對黨的領導的道路。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在策略問題上關於監督臨時政府問題也發生爭論。我們已經知道，在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聯席會議上，卡米尼夫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局的名義，提出了下列的要求。『對於臨時政府的行動在首都以及在地方實行覺悟的監督，推動它進行最有力的鬥爭來完成消滅舊

制度。

在彼得格勒的四月代表會議上，卡米尼夫同樣提出了這一公式，但是它被否決了。列寧和斯達林極力的批評這一公式是孟塞維克的公式。

列寧說道：『沒有政權是不能督促的。』資本家說：『請罷！你監督我！我將運用大炮，而你則可以飽享監督。』資本家知道，現在不能拒絕民衆。沒有政權，監督是小資產階級的詞句，牠是妨礙俄國革命的進程與發展的。

關於布爾塞維克黨是否留在齊墨瓦爾特聯合的問題，徐諾維夫在代表會議上是反對列寧的。那時齊墨瓦爾特的聯合裏面，大多數可說是像右派社會革命黨切爾諾夫那樣的人。這一大多數，事實上是和保衛祖國派一鼻孔出氣的。所以列寧堅持要立即退出這一聯合，並且要組織新的共產國際；而徐諾維夫却說這樣的退出是太過匆促了，他堅持着要繼續與齊墨瓦爾特派一起直到『每一個工人都懂得我們爲什麼分離。』這正是說推延共產國際的組織到無定的時期。列寧堅決斥責了徐諾維夫的意見，認爲他的策略是『極端機會主義及有害的』，因爲齊墨瓦爾特的大多數，已經完全的揭破了他們自己是中間派。即使到齊墨瓦爾特的會議上去，那也僅僅爲着搜集消息的目的，而不是爲着參加他的工作。

在一九一七年時，徐諾維夫是反對立即組織共產國際的。

一九一七年四月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是有偉大意義的，這是在革命後布爾塞維克第一次所公開召集的代表會議，在參加的布爾塞維克中間，有許多在革命以前是多年的處在國外，處在流放和監獄中。在革命開始以來，首先在這會議上製定了統一的布爾塞維克路線，通過了關於對戰爭態度，關於對臨時政府態度，關於修改黨綱，關於工人代表蘇維埃，關於在斯托克霍姆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問題等等的決議案（關於後一個問題，黨反對了右的機會主義者卡米尼夫、徐諾維夫關於與社會國家主義派共同開會的提議。）

四月代表會議論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

根據列寧報告的基本主張（為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而鬥爭，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四月黨的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還討論了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根據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代表會議號召農民奪取並立即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土地轉交農民蘇維埃。

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所贊助的臨時政府，向農民提出要等待到立憲會議，而現在則不要觸犯地主的土地，可是布爾塞維克則組織農民來為土地而鬥爭，這就給農民證明了臨時政府以及那些贊助臨時政府的人，是人民的敵人。

在爲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的中間，需要在農村中建立農村工人及半無產階級的組織，他們應當在沒收地主的莊園上組織模範的蘇維埃農場。黨提出土地國有的要求，但是保證這一任務實現的，不是資本主義地主及資產階級所組織的臨時政府，而是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蘇維埃政權。

關於民族問題，代表會議聽了斯達林同志的報告。這一報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列寧、端仁斯基、馬哈拉茲及畢達可夫。開展討論的，是關於民族自決權直至完全分離權的問題。這一問題，過去在我們黨內，在大戰以前的幾年，特別在大戰時候，已經引起了熱烈的爭論。中央的報告人斯達林同志堅持這一要求，委員會的副報告人畢達可夫却出來反對。這不僅是理論的問題，這一問題那時已經被實際的生活所提出來了。那時許多強迫歸併於俄羅斯之內的國家要求分離，而烏克蘭，特別是芬蘭，那時已在關於自主的問題上和臨時政府發生了衝突，臨時政府是反對自主的。

在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斯達林同志報告的決議案上，這樣的說道：

『在俄羅斯國家範圍內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及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不採取辦法來保證這一權利的實際實現，這就等於幫助掠奪的和併吞的政策。只有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離權，才能保證各個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團結，才能促進各個民族的真正民主的親善。』

『現時芬蘭與俄國臨時政府中間所發生的衝突，特別顯著的指出否認自由分立權將走

向沙皇政策的直接的繼續。

『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是不能和某一民族在某一時間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淆起來的。對於後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在每一個別場合中，根據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階級鬥爭的利益來完全獨立的解決。』

黨在民族問題上堅決的澈底的立場，保證了我們黨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時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之後能有被壓迫民族的擁護。

在四月的第七次代表會議上，卡米尼夫、徐維諾夫、李可夫以及他們的右派的機會主義路線是完全被揭破了。四月代表會議決議案中的列寧的立場，決定了布爾塞維克爲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而鬥爭的明白的確切的路綫。

第十四章 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之準備與資產階

級政權之被推翻

羣衆革命動員的時期

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八月的時期，斯達林同志稱之爲羣衆革命動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危機的尖銳化以及蘇維埃和臨時政府之間不穩定的平衡的破壞。這種平衡在第一個時期，無論是好是壞，總是存在着的。雙方對於兩個政權，都再不能容忍下去了……革命正在動員着，同時也引起了反革命的動員；反革命又刺激着革命，引起革命高漲的新浪潮。政權之轉入新的階級手中，已成爲迫切的問題了。』

從四月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的列寧提綱和決議中，布爾塞維克黨得到了確定的立場，黨開展了廣大狗爭取羣衆的工作，這個時候黨的路綫是在於耐煩地解釋我們的政策，來揭破孟塞維克和社會

革命黨的妥協政策，使其在羣衆中孤立起來而爭取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的大多數。應該從兩個政權轉到蘇維埃的單一的政權。在七月事變以前，政權會有和平地轉到蘇維埃手中的可能，因為當時的蘇維埃是依靠在羣衆武装力量之上的。如果當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能够堅決同臨時政府對抗的話，那麼，當時的蘇維埃也就是工農革命專政的機關了。在當時鬥爭的階段上，全部政權之轉於蘇維埃，將使布爾塞維克更易於在蘇維埃內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按斯達林同志的話，政權和平轉於蘇維埃的口號是在於說：『……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應同立憲民主黨拆散聯盟，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因為當時的蘇維埃是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手中）建立蘇維埃政府，而布爾塞維克則有鼓動的自由權，並且在蘇維埃內部各政黨可以自由的進行鬥爭。這樣，使得布爾塞維克能够爭取蘇維埃，經過革命的和平發展的道路改變蘇維埃政府的成分。這個計劃並不是指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他便利於準備那些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因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經當政，他們便在事實上不得不實行反革命的政綱，這樣便能加速揭破這些黨派的真實本質，更快的使他們同羣衆隔離起來，孤立起來。』（見斯達林論反對派）

當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還是少數的時候，他們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在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很奇怪的，彷彿我們想把政權交給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似的，但是這當然不是這樣，我們認爲，如果工人還相信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話，那麼，我們便應該在事實上證明出小資產階

級的政黨如何不能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來領導革命。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的主要內容，是在於搗毀舊的國家機關，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想的，把政權交給十個比雪洪諾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主要的，是在於摧毀資產階級農奴性的國家政權機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那時在蘇維埃中佔了多數，他們如果當權，那麼便有兩種前途：他們或者是躑躅不前而揭破自己；或者，是在羣衆的壓力之下不堅決地前進，那麼，也是很迅速地證明他們如何阻礙着革命的發展。

黨認爲這時可能在蘇維埃的內部排除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使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能夠自己揭破自己，使羣衆能够在經驗中認識孟塞維克的本質。這樣，黨不跳過羣衆自己的經驗而能够實現『對於羣衆的統一戰綫的策略』。可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綫來反對無產階級這一情形，像我們往下可以看到的，在革命情緒高漲的情況之下，引起了六月和七月間工人和士兵反對臨時政府的示威遊行。

布爾塞維克在工人士兵羣衆中進行了工作，組織並且團結他們來進行反對戰爭，反對飢餓，反對物價高漲的鬥爭，來爲着蘇維埃的政權，爲着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而鬥爭。

很快的，許多軍事組織建立起來了。在彼得格勒的軍事組織內，下列同志都積極的參加了：如波得伏伊斯基、端爾仁斯基、史維特洛夫、日尼夫斯基、奧夫心可等同志。彼得格勒的軍事組織在四月間即開

始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士兵呼聲（以後改爲士兵真理報）。在莫斯科，佛倫作瓦、史基略託夫、柯榭甫、尼諾夫、阿洛塞夫、克留可夫、法西里也夫斯基等同志，在建立軍事組織的工作中是起了極大的作用。以後參加這個工作的，還有史米爾諾夫、特倫奇也夫、史特法斯金和雅洛斯拉夫斯基等同志。二月革命以後，在民主集中制與選舉領導機關的基礎之上，改造了黨。黨已經可以自由開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問題，可以廣泛的進行宣傳鼓動的工作，並且將這些工作廣泛地利用了。可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很快的便利了他們的多數，壓制布爾塞維克宣傳鼓動者的行動的自由，並且提出了一個決定，說凡是到軍隊或工廠中去講話的，必須得到蘇維埃的允許，這在那時就是說要得到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允許。這在實際上，便是使許多布爾塞維克不能進行宣傳，他們不得超過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用鬥爭的方法來進行宣傳。我們的黨，一從秘密組織進入公開以後，便把各企業中的黨的支部活躍起來了，黨成了吸引工人和士兵羣衆的中心。布爾塞維克組織的情形如何，在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可以明白的表明出來。在這個會議上，到會的^{三三}代表有一百三十三人有表決權，另外還有十八個有發言權；他們代表着七萬九千二百零四個有組織的黨員；各組織黨員分配的情形如下：彼得格勒一萬六千人；莫斯科七千人；烏拉爾一萬六千人；魯干斯克一千五百人等等。在四月的時候，薩拉托夫已經約有一千五百名黨員；薩馬拉約有二千七百名；卡薩有四百名。可是在這時候，布良斯基、蘇爾莫伏、杜拉及其他的地方，黨的組織却還沒有建立起來。高加索的代表在四月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高加索只有三

個代表，並且還只有發言權，因為我們的組織是被摧殘了。」只有在某些組織裏面，如在巴庫，布爾塞維克一開始即佔了優勢。當時組織的發展，從下面的事實中便可看出，如在彼得格勒一個地方，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時候便有三萬以上的黨員了。據史維特洛夫說，在革命以前，烏拉爾只有九個地方進行秘密工作，而在四月代表會議的時候，則已經有了四十三個組織了。在組織上，在對於羣衆的革命的戰鬥的教育上，黨是做了很大的工作。黨在女工中也進行了工作，這些女工，在革命開始時是有很大作用的。女工雜誌也開始出版了。在革命地明確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中，黨是起了前導的作用。所有這些原因，使黨很快地在一切重要的企業中同工入羣衆接近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在軍隊中（無論最後方或前綫）的革命工作，是非常偉大的。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都出來反對我們的火綫真理報和士兵真理報；他們發行了十多種報紙，整千整萬份的散到士兵羣衆中去，多方的誹謗我們的黨。可是，只有布爾孟塞維克黨才能對於關係工農切身利益的一切問題給出唯一正確的革命的解決，并在幾個月之中，將羣衆從各種黨派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團結他們在我們黨的口號的周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斯達林同志指出：「這時的歷史是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同布爾塞維克爲爭取羣衆而鬥爭的歷史……」

自然，在這個時候，對於黨的工作有決定意義的，是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戰爭問題正確的決定。怎樣來結束戰爭呢？——這是當時城市和鄉村中千百萬工人和勞苦羣衆所最關心的事。布爾塞維克在戰

爭一開始的時候就給了解答：不推翻沙皇政府是不能結束戰爭的。二月革命僅僅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初步，不推翻資產階級的政府，不實行國內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我們在羣衆中的鬥爭，是每時每刻都在向着工人、農民和士兵說明布爾喬維克路線的正確。

我們的黨從祕密狀況中公開出來的時候，數量是很少的，而且情形也是非常困難。但是只有它的路線是唯一適合於革命客觀發展，適合於勞苦羣衆利益的。黨在第一次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以及它在反動時期和革命高漲時期的工作建立了它的威信。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只有我們的黨是唯一能夠忠實於無產階級旗幟的政黨，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時候又領導了羣衆的鬥爭。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的周圍能夠團結一切最無產階級化的和最革命的分，這就是爲什麼它能夠發展和鞏固，這就是爲什麼它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時候能夠得到工人階級和士兵羣衆的廣大階層的同情和擁護，這也就是爲什麼它在十月革命中能夠得到勝利。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 的示威

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也進行了自己的工作。四月十八日，外交部長密留可夫以臨時政府的名義向協約國宣稱：『全民要求進行大戰，一直到決定的勝利。』臨時政府準備執行『它對於同盟者所允

諾的一切義務。」這樣，俄國的資本家和地主發誓忠實於沙皇政府同英法資本家所簽定之條約，並且他們允許繼續流人民的血直到最後的勝利。工人和士兵在四月十九日都知道了這個宣言（密留可夫的通牒），四月二十日，我們黨的中央和彼得格勒的黨委，就號召羣衆起來實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抗議，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工人和士兵羣衆走到街上喊着口號：『公佈祕密條約』、『打倒戰爭』、『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臨時政府的擁護者佔據了尼夫斯基廣場和富有的區域，表示了他們對於臨時政府的忠實。工人階級和士兵都從各地向中央集中，在尼夫斯基廣場和其他的地方，都發生了衝突。最公開的反革命者如可尼洛夫將軍，號召屠殺示威羣衆並且發佈了一些命令。但是，米海伊洛夫砲兵學校雖然得到了這樣的命令，却拒絕執行這一命令。

同時克隆斯坦、奧蘭尼堡、卡特青和其他等地的工人和士兵，都準備着隨時聽我們黨的號召來行動。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都舉行了示威。在莫斯科，參加的有工人和第五十六團。兩個政權的危機是開始了。列寧說：『這些指示出，最接近於農民的廣大的，動搖不定的羣衆，逐漸的離開資本家而傾向到革命的工人方面來了。』（列寧危機的教訓）

兩個政權的危機成爲事實，結果，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密留可夫下台，第一個混合內閣成立起來。當時彼得格勒委員會一部份的同志，如巴格達基也夫等同志，主張逮捕臨時政府。並且，爲着這個目的，曾有一部份的示威羣衆遊行到馬林斯基皇宮。

中央是反對這樣做的，因為中央正確的估計到當時的蘇維埃中和軍隊中，我們還沒有取得大多數。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列寧說道：『我們只想和平的偵察敵人的力量，但不要進入戰鬥，在這上面，彼得格勒委員會是左了一點，這實是很大的罪惡。組織的機關是還不堅固的，不是都能執行我們的決定。』『打倒臨時政府』的這個不正確的口號代替了『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萬歲』的正確口號。在行動的時候，稍許左一點都是不適宜的。我們認為那樣做是很大的罪惡，是破壞自己的。如果我們自覺的允許這樣做，那麼，我們一分鐘也不能留在中央裏面。』

混合政府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克倫斯基的進攻布爾塞維克為爭取軍隊中影響而鬥爭

革命無產階級與革命的軍隊，在四月的示威中要求將資產階級的一些代表逐出政府。在他們的壓力之下，密留可夫和古奇可夫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都退出了臨時政府。古奇可夫那時曾是陸軍部長，他在開始的時候，公開的表示是保持專制政體的擁護者，可是當無法再擁護專制時，就依附於共和派來了。密留可夫是反對工人階級和軍隊所已取得的自由之公開敵人。古奇可夫，堅決反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第一號的命令』，因為在這個命令裏面，規定了軍隊已經取得了的政治權利，並且規定了在軍隊中應有選舉出來的政治機關。他要求取消這個命令，資產階級認為正是這個命令使軍隊坍台。

其實，這個很快坍台下去了的軍隊，是不願意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願爲沙皇俄國的資本家所賣而替協約國當炮灰的。而上述命令却反而使軍隊能有組織性。

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成立了混合政府，在政府中，除了地主資本家的代表外，還參加了所謂『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宰列台里、且爾諾夫、史可比列夫等人，可是這些『社會主義者』的參加，對於資產階級的行動並沒有多大的變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參加政府，對於資產階級是很有利益的。資產階級讓那些蒲列哈諾夫和史可比列夫之類的『社會主義者』們空談，說什麼要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利潤』。其實，這些話對於資產階級並沒有什麼危險，因爲，整個國家政權的機關仍然都在資產階級的手裏。當着要同工人談判的時候，資產階級便用着宰列台里、史可比列夫和且爾諾夫。這些『社會主義者』們替資產階級到處奔走，當克隆斯坦的工人、士兵和海員選舉自己的長官，拒絕上面委任的時候，他們便以『說客司令』的資格到那裏去『宣慰』列寧說他們『每個人都是忠實執行資產階級事業的，他們死心塌地的擁護內閣，替資本家辯護，欺騙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諾言，勸導等待又等待……』

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愚夫們，是多麼的高興，他們以他們領袖的部長光榮來自炫，資本家却拊掌大快，他們得到了『蘇維埃的領袖』作爲他們反對人民的幫手，得到了這些領袖們來擁護他們在前綫上的進攻行動，就是說，使已經中斷的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又重新打起來。（見列寧『革命的教

訓)就是禁止地主授受土地和禁止買賣土地的辦法,社會革命黨的部長且爾諾夫也並不能使其實現。在前綫上,『說客司令』克倫斯基,鞠躬盡瘁地執行了資本家古奇可夫的作用,在『社會主義者』部長們的擁護和掩飾之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更加強大而鞏固了,他們準備反對『外部敵人和內部敵人』的進攻,其實就是反對革命的工人。

戰爭的繼續和經濟的危機,大大的打擊着工人階級,最迫切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提高到百分之二百至百分之三百,而工資則只稍許的提高。

資本家實行進攻工人階級,並且用停閉工廠(開除一切的罷工者)的辦法回答工人的罷工。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的時候,在彼得格勒停閉了一百零八個企業,被開除的工人有八千七百零一名;在六月間的時候,停閉了一百二十五個企業,被開除的工人有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名。布爾塞維克的『爲工人監督生產而鬥爭』的口號是只有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的。這一口號,那時是吸收了更多的工人羣衆來擁護。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間,反對地主和臨時政府的農村騷擾蔓延到四十三省之多。

我們黨的任務,是在於揭破參加臨時政府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如何叛賣工人利益的,揭破他們這些可恥的把戲。這正像法國的路易勃朗一樣,這位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正在資產階級政府中起了和現在克倫斯基,宰列台里及且爾諾夫之流一樣的可

恥的作用。像我們在上面所曾經說過的，當一九一七年四月我們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的時候，那時政權還有不經過內戰而和平轉變的可能，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願意走這條和平的道路。工人、士兵和農民羣衆，日益了解了我們路線的正確，特別是工人。四月的遊行示威，證明在我們黨的『打倒戰爭』、『公佈秘密條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土地立即轉交農民』和『工人監督生產』等口號的週圍，團結了工人和士兵羣衆。這種團結是和混合政府內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與資產階級的聯合相對抗的。布爾塞維克的口號，日益成爲工人、農民和士兵羣衆的口號了。在五月底的彼得格勒工廠委員會的代表會議上，有城市工人羣衆的四分之三是贊成布爾塞維克的。但是我們在蘇維埃中仍然是少數，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許多城市裏，在革命開始時被選舉出來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對改選，因此，在這個時候，像莫斯科那樣的士兵代表蘇維埃，是絲毫不能代表士兵羣衆底情緒的。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所召集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布爾塞維克還是佔少數，只有一百多個代表；而孟塞維克和各色各樣的社會革命黨，却有七八百個代表。大會的基本問題是對於政權態度的問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堅持主張同資產階級聯合。孟塞維克報告人宰列台里說，在國內沒有一個政黨能代表一個階級，說着下列的話：『讓政權歸我們吧！』列寧在大會上反駁道：『有這樣的政黨。』列寧走到大會講台上，回答宰列台里說：有這樣的政黨，這個政黨，時刻準備奪取全部的政權。』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列寧在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對於農民和士兵起了深刻的印象。可是統治這個大會的，是社會革命黨人且爾諾夫、克倫斯基和阿弗克生奇也夫以及『已經變成了反革命之母』的布列世可夫斯卡亞。列寧在這次大會上講話是很困難的，可是當列寧把土地問題爽直的、明確的提出來，當他指出只有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政權才能解決關於土地與和平問題的時候，許多農民都不能不傾耳恭聽布爾塞維克的說話了。從這個時候起，許多的農民對於我們黨的態度就不同了，而且也就不很相信我們敵人的那些可恥的謠傳了。他們相信，只有布爾塞維克的黨能夠大胆的、澈底的提出消滅地主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來。

六月十日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開會的時候，我們彼得格勒黨的委員會準備了遊行示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因為害怕，所以禁止了這次的遊行示威。可是，事變是在不斷的發展着，如克隆斯坦布爾塞維克之到達彼得格勒、臨時政府與烏克蘭士兵大會的衝突以及其他許多事實，都證明革命潮流的高漲。但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仍然是資產階級的俘虜，他們以五百零三票對一百二十六票（五十二票懷疑）的多數，通過了信任臨時政府的決議。

『布爾塞維克停止了遊行示威，因為不願意領導工人作絕望的鬥爭來反對聯合一致的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可是這些聯合的黨派爲着要保留他們在羣衆中所殘留下來的一些信仰，不得不指定六月十八日爲共同遊行示威的日子。資產階級在十分憤怒

中明白的看到了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在向無產階級方面動搖，便決定利用前綫上的進攻來阻止民主的行動。」（見列寧革命的教訓）

黨積極的準備新的遊行示威。當時斯達林同志在真理報上寫道：「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彼得格勒的遊行示威能在我們革命的口號之下進行。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是在革命烈士公墓前舉行的，這示威確實檢閱了我們黨的力量，示威民衆有四十萬人，示威是在『打倒戰爭』、『打倒十個資本家的部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這證明了日益高漲的羣衆的革命化。」

列寧說：「如果五月六日（混合政府成立的日子——作者註）是用了繩索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繫到資產階級勝利的車輪上的話，那麼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就把他們鍛鍊成了資產階級鎖鍊下的奴僕。」（見列寧革命的教訓）

但是真的，不管無產階級和士兵羣衆的真正意志怎樣，克倫斯基還是於六月十九日在前綫上下了總攻擊令，這次總攻，很快的就失敗了。因為經濟和供給機關的混亂，指揮官的不負責以致叛變形成了前綫的失敗，這種失敗更引起了軍隊的憤慨和工農羣衆的進一步的革命化。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爲要反對這些，便加強了前綫上的壓迫，並且亂造謠言來反對布爾塞維克，甚至於直接的緝捕他們。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間所舉行的布爾塞維克軍事組織的代表會議，證明在前綫和後方已有好幾萬的士兵是參加了我們的軍事組織，他們使我們和農民羣衆日益密切地聯系起來了。

此外，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內部發生了分裂。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在七月的代表會議上已有三萬二千黨員，而當時孟塞維克却只六千黨員。羣衆日益明顯的退出了妥協的政黨，而這些政黨中的『左』派也就更加明顯的分出來了。像第二國際其他政黨一樣，羣衆的脫離使『左』派形成起來，這些左派的任務，是在於停止羣衆脫離的現象。同時有一部份『左』的社會革命黨人，也表示贊成政權歸蘇維埃。在孟塞維克中，也形成了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派。社會革命黨的大會，對於援助克倫斯基政府問題也分裂成爲兩部份：反對的一百三十六票，贊成的一百三十四票。而布列世可夫斯基，因爲反對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以致於退出了中央的組織。右派的社會革命黨，在他們民意報上，反對左派；左派那時却有土地與自由報。同時在孟塞維克的中間，右派在資產階級的日報上面堅決的攻擊革命；而以馬爾托夫爲首的左派，只在口頭上輕描淡寫的批評他們。階級對比是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立憲民主黨代替了保皇黨的地位，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則代替了立憲民主黨的地位。只有布爾塞維克的政黨代表革命羣衆的意志，實行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徹底的路線。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五日的事變黨是羣衆的首領

戰爭的延長加重了經濟的破壞。交通是完全破壞了，損壞了的火車頭達百分之五十之多，煤炭因

端的缺乏，銅錢不夠，食品減少，物價繼續上漲，這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積極參加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進行戰爭和實施統治的結果。經濟的破壞與前線上的失敗更加深了軍隊中和工人中的革命憤激，以致於引起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五日的新的行動。

蘇維埃領導者的妥協政策幫助了資產階級進行戰爭。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五日的事變，就是工人和士兵對於這些政策表示不滿的自發行動的結果。

七月三日，在彼得格勒的維波爾格區開始舉行示威，整整的繼續了一天。革命的集會與個別的遊行示威，發展成了總的，廣大的示威了，這示威所提出來的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和無產階級革命。我們的黨，那時雖不贊成舉行武裝暴動，但是仍然決定參加這次示威，以便使這示威帶上和平的有組織的性質。斯達林同志在彼得格勒黨的代表會議上說：『行動是開始了。在無產階級和士兵行動的中間，我們的黨有否權利袖手旁觀呢？我們估計到行動可能引起比現在更爲嚴重的結果，我們沒有權利袖手旁觀，我們既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就應該參加到這次行動中去，並使之帶上有組織的和平的性質，而不是以武裝奪取政權爲目的。』

政府派遣了它的可靠的軍隊——教導隊和士官隊來鎮壓示威的羣衆，在彼得格勒的街上流滿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七月四日，在莫斯科和其他的城市，同樣的舉行了遊行示威，雖說範圍比較要小些。

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資產階級聯合鎮壓工人和士兵的示威，並且殘害我們的黨。真理報的編輯部是被他們搗毀了；真理報、士兵真理報及其他許多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也都被封閉了；工人伏因諾夫，因為出賣真理之頁報被打死在街上了；克倫斯基要求封閉我們黨在莫斯科的報紙社會民主黨，並解除我們保衛隊的武裝；革命的部隊被調遣到前線上去；在街上不斷的發生摧殘布爾塞維克的事實；在前線和後方大肆捕人。七月七日發佈了逮捕列寧的決定，許多布爾塞維克黨的行動者都被捕了。『勞動』印刷廠也被搗毀了。

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直接的參加了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摧殘。由孟塞維克且夷之簽字發布了派遣部隊來鎮壓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命令。社會革命黨哥茨和阿弗克生奇也夫拍電到海爾心弗斯，說如果芬蘭的工人和士兵想援助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話，那麼便應迅速進行鎮壓。

一九一七年七月，彼得格勒法院檢察官發出通告，稱列寧及其他布爾塞維克『反叛』和組織武裝暴動，應受法庭宣判。這些罪狀是在台尼金的司令部及總司令部製造出來的，是利用叛徒奸細耶莫林可及其他奸細的供詞作根據製造出來的；叛徒阿列克新斯基和律師比利維爾食夫，都參與了這次案件。列寧把這些罪名和柏里斯*案件相比較。

*沙皇政府爲要掀起對猶太人的仇視，組織了一次審判。告發猶太人柏里斯爲要用耶穌教徒的血來進行他們宗教的儀式，所以謀死了小孩尤世普斯基。在審判中證明，那個小孩是爲黑色百人團。

擺在黨前面的問題是列寧是否應該到底。如果列寧不隱藏起來的話，那無疑的他是要被打死的，正好像一九一九年德國的白黨在德國孟塞維克幫助之下打死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一樣。因此列寧轉入秘密環境中。他在彼得格勒工人的幫助之下，起先是躲在彼得格勒鄉下拉士里夫站附近，以後才轉到芬蘭去。列寧經過極可靠的同志同中央發生聯絡，並且繼續的領導了我們的黨。其他被捕的人在八月底九月初也都釋放出來了，因為這是工人、士兵和海員的要求，同時關於『反叛』和奪取政權的企圖，不能作成任何的控訴狀。

我們已經看到這時在國內是發生了怎樣深刻的變動。在七月的示威遊行以後，列寧在論口號的小冊子中，這樣的說明這個時期的特點：放在黨前面的任務，是要爭取羣衆使之從出賣革命事業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之下解脫出來，並在工人和農民的面前揭穿他們的實質。如果說在七月四日以前政權還能和平的轉到蘇維埃手裏的話，那麼，當立憲民主黨黑色百人團派奪得了全部政權的時候，則只有經過武裝暴動和內戰才能奪取政權。

列寧在他見樹而不見森林的論文中解釋上述的那種意思說：

『在七月四日以前，全部政權歸當時蘇維埃的口號是唯一正確的口號。當時有不經內戰

因挑釁目的而打死的委託辦列寧這一案件的查檢官，正是幫助沙皇政府來辦理柏里斯事件的
檢查官阿列克山大洛夫，這對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是極可注意的事。

而和平轉變的可能，因為當時對於羣衆和人民還沒有實行七月四日以後那樣有系統的壓迫。當時還可以保證全部革命的和平向前發展，特別是各階級和各政黨間的鬥爭，可以在蘇維埃的內部和平的解決。

『在七月四日以後，不經過內戰，政權歸蘇維埃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從七月四——五日起，掌握政權的是立憲民主黨和黑色百人團所支持的拿破崙主義的軍事集團。』

列寧主張要開展比從前更廣泛的宣傳——說明混合政府的反動作用，說明且爾諾夫和宰列台里對於人民所起的創子手的作用。

『在人民中，一切宣傳都要改造得這樣，使得我們能夠說清楚：如果不推翻軍人集團的政權，如果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還沒有在人民中失去信仰，他們的面目還未被揭穿的話，那麼，農民要想得到土地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在獲得了一九一七年七月的經驗之後，就應該獨立的奪取政權到自己手裏，否則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見列寧論口號）

這樣，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七月短短的時期中，在俄國內發生了三次的危機。第一次是四月二十一日示威所引起的危機。列寧說，這次行動『是勃發的，自發的，完全無組織的行動，結果黑色百人團藉此來槍殺示威羣衆，並且對於布爾塞維克進行駭人聽聞的造謠和誹謗。事變之後產生了

政治上的危機。』

第二次的危機是由於布爾塞維克準備向蘇維埃大會示威遭受禁止而起，結果，在布爾塞維克的口號之下舉行了六月十八日的大示威。

『第三次的危機，是在七月三日自動發展起來的，雖然在七月二日布爾塞維克用了很大力量來阻止它。這一危機在七月四日進到了頂點；到了五日和六日，反革命就登峯造極了。』

列寧指出了這些示威和危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政府的示威，這話，或許在形式上是對於事件的最確切的描寫。但是實際上這不是一般的示威，它比示威的意義要大得多，而比革命的意義却還要小一些。這是革命與反革命同時的爆發，這是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激烈衝突而造成的對於中層分子之激烈的，甚至是突然的「洗滌」。』革命發展的過渡局勢（表示於七月三日——五日事變上的）的實質，就是在於這個時候階級力量所發生的變化。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寫道：『任何革命，如果他是真的革命的話，都是在於階級力量的變化。』在這幾個月，階級力量變化的本質是什麼呢？列寧在他論口號的文章中寫道：『各政黨關係發展的週期是已經結束了。在二月二十日的時候，各階級都聯合一致來反對專制；在七月四日以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同保皇派與黑色百人團一起，吸收了小資產階級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並且恐嚇

了其中的一部份，他們把實際上的國家政權交給卡芬涅克（指反革命）手中，交給軍人狗黨的手裏；他們在前綫槍殺不服從他們的士兵，在彼得格勒則摧殘布爾塞維克。』

在這樣的情況下，爲要解決最重大的革命問題，便召集了第六次黨的大會。

一九一七年七月廿六日至八月三日黨第六次代表大

會斯達林同志在大會上的作用

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是在彼得格勒半公開的條件下舉行的，開始是在維波爾格方面舉行，以後移到納佛爾門，就是在現在文化大廈的附近，那裏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資產階級的報紙要求逮捕大會人員，偵探也四出奔走，搜尋大會開會的地點。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五個月以後，布爾塞維克還不得不祕密召集會議，而黨的領袖列寧同志，當時則被迫住在拉士里夫車站附近的茅屋中。這就是一九一七年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的民主。這個『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專政。雖然列寧當時被迫躲了起來，可是他對於這次大會的決定是有非常偉大的影響的。列寧參加了這次大會的準備，並且對於一切基本問題都書面的說明了他的意見。在大會上起領導作用的是斯達林同志和斯維特洛夫同志。參加大會的代表，有一百五十七名有表決權，一百二十八名只有發言權。這個時候黨已經有了二十四萬黨員，七月事變中的失敗不啻沒有使我們黨的

力量削弱，而且相反的使它更加強大了。到七月三日為止，根據在大會上所發表的不完全的統計，僅有四十一個印刷的機關報；俄文的有二十九種，其他文字的有十二種。大會建立了對於區域聯合派的統一，遣派參加大會的有曼努伊爾斯基、尤倫尼夫等人，而拉林也代表孟塞維克的國際主義者同大會致歡迎詞，以後他個人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的中央，由馬爾托夫和阿史特洛夫簽名致送了賀詞。當時他們稱宰列台里，但茵等孟塞維克爲凡爾塞派，他們歡迎我們黨的大會，說：『這個大會是在對他極端困難的時期召集的，是在瘋狂摧殘和毀謗的條件下召集的。』關於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各種造謠宣傳，他們也表示深切的憤慨。可是這不過是非常不澈底的表面文章，因爲不久之後，在孟塞維克的黨內，『左』的馬爾托夫派很快的就在資產階級聯盟的擁護者前面投降了；馬爾托夫並沒有同布爾塞維克走，而是同背叛人民的凡爾塞派走了。

在大會上，中央的主要報告人和黨的政治領袖是斯達林同志。六次大會上通過了許多對於那時非常重要的決議。黨指出它所提出的實現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之任務是國際的任務，因爲我們必須援助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鬥爭。如果『很有可能的，俄國革命新的高漲，將使俄國的工人和貧苦農民能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革命以前得到政權。』當時在黨的六次大會上，對於西歐革命推遲時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問題就已經有了分歧。那時，普列奧布拉克、仁斯基提議在奪取政權的決議案中指出，只有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我們才能使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斯

達林同志激烈的出來反對這種托洛茨基派的提議。斯達林說：『有這種可能，就是俄國正能成爲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這種國家。』斯達林指出：『任何一個國家，還從來沒有享受過像俄國那樣的自由，也從來沒有像俄國那樣想辦法實現工人對於生產的監督。此外，我們革命的基礎，是比西歐要寬汎得多……我們的工人有農民的貧苦階層的幫助。最後，德國的國家政權機關比較我們資產階級（他們自己已是西歐資本的附庸）的不完善的機關，是靈敏得多。我們一定要拋開這種觀念，好像只有歐洲才能指示道路給我們似的。實現教條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實現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呢？我是站在第二種立場上的。』

站在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是大會的大多數，這對革命是可慶幸的。所以，大會在斯達林同志報告之後，就採取了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提出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有勝利可能的這一觀點。在六次大會的『政治形勢』的決議中說：『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在當前革命中的任務，是要『緊張一切力量奪取國家政權到自己手裏來，並且同先進國家的革命無產階級聯合，使這道政權實行和平以及對於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大會上，斯達林同志進行了兩條戰綫的鬥爭。斯達林同志在大會上反對布哈林的意見——布哈林認爲農民懷着保衛祖國派的情緒，已經同帝國主義者成立聯盟，不會跟着無產階級走。

斯達林同志回答布哈林道：『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農民，有的同右派進行聯盟；但是我們還有下層

的農民，他們是農民的貧苦階層，他們是不能實行這種聯盟的。他們沒有同大資產階級進行聯盟，可是由於他們的不自覺，所以跟了資產階級走，資產階級簡直是欺騙他們，挾脅他們走。」斯達林同志同時又反對了布哈林的反列寧的革命兩段論。依據這種理論，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革命，全體農民都是參加的；第二個階段是無產階級革命，這時沒有農民參加而是同歐洲的無產階級聯盟。斯達林同志在反對布哈林時指出：沒有最激進的土地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不得不同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配合起來。十月革命，明顯的證實並且完全的實現了列寧和斯達林同志的這些意見。

在大會的政治形勢的決議中說：革命和平發展的一切可能性是已經消失了，兩個政權的狀態是結束了，整個政權轉到了資產階級的手中，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只有用武力才行。現在已經不能提出『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因為這時蘇維埃中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完全幫助反革命的了；而現在的口號，應該是『完全消滅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專政。』

在大會上斯達林同志指明：撤去『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決不是說我們應該離開蘇維埃。我們應該繼續在蘇維埃裏面工作，像在許多的機關內工作一樣（如區議會等），為的是要在他們內面鞏固我們的影響，揭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實質。經驗很快的證實，在各種事變的影響之下，蘇維埃是布爾塞維克化了；九月初，在兩個首都的蘇維埃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大多數，所以那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得到它的正面的意義。這即是說，政權要轉到布爾塞維克蘇維埃的手中。

大會提出了許多的要求消滅戰爭，土地國有，銀行集中，好些企業的國有，建立真正工人的監督等。自然，這些要求臨時政府是不能實現的，這些要求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才能實現。這些要求成爲一種綱領，布爾塞維克在這個綱領之上團結了不滿的工人和農民羣衆，並且組織了他們向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進行堅決的進攻。

應當指出，在六次大會的一切決議上，着重的提出了列寧關於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聯盟的口號。在『目前工作』的決議中說，只有工人和貧苦農民奪取政權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政治形勢』的決議中說，『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在貧苦農民的援助之下』才能消滅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專政；在六次大會所發表的宣言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工人和革命貧農聯合萬歲。』

在關於工人職工會的決議中指出，職工會由於事變的邏輯參加到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來，他們『血肉相連地關心着要使革命達到勝利的結果……並且要達到國家干預生產組織和物品分配組織的地步。』

大會指出：『俄國的職工會，祇有繼續成爲戰鬥的階級組織，並且同無產階級的階級政黨實行親密的、有機的合作來進行鬥爭，才能實現這些重大的任務。』這就是說，職工會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要爲社會主義政黨的勝利而鬥爭，這個政黨是主張以革命的手段迅速消滅戰爭的。這也就是說，各職工

會中間的國際關係要恢復起來，要定出統一的鬥爭的計劃來反對資產階級的屠殺，並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黨堅決的反對職工會的中立，黨對於職工會的問題，堅持了黨在第四次大會上的路線。

六次大會通過了關於青年團的決議。在這個時候，到處都產生了（有些是自動的自發的）『青年男女工人的獨立組織』。大會估計到青年工人對於整個工人運動有重大的意義，所以認為黨對於組織青年的工作必須有十分嚴重的注意。同時，大會認為黨參與青年組織的建設，不應該帶着包辦的性質。由於黨的往後工作的結果，這個青年的組織——黨の後備軍便鞏固起來了。誰都知道，在蘇聯革命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以及在創造少年共產國際的中間，青年團是起了怎樣重大的作用。在大會上，熱烈的討論了列寧不出庭的問題，因為在我們黨內有個別幼稚的同志認為拒絕出庭是不應該的。對於這種問題，在奧爾卓尼基茲同志報告他同孟塞維克談判的經過以後，通過了『列寧同志不出庭』的決議。在報告中說，對於這一案件，檢察官所用的警察與偵探的辦法，簡直是恢復了沙皇政府的一切最壞的辦法。『……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僅公正的審判，就是被告人的最起碼的安全，也絕對沒有任何保證。所以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會，激烈的抗議檢察官及偵探警察對於無產階級領袖的這種可惡的殘害，同時致敬於列寧及其他同志，希望在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隊伍內重新會見他們。』

六次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吸收新黨員入黨以及黨的工作公開和半公開的環境，都要求增大黨章。新添上的有下面幾條：地方黨的組織，吸收新黨員要有兩個黨員的介紹，並由大會通過一切組織建

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一次；大會選舉出中央來領導兩個大會間黨的一切工作。那時黨還沒有改變名稱，在七次大會以前，還是叫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被選為中央委員的是列寧、斯達林、史維特洛夫、端仁斯基和阿爾基姆等同志。

六次大會的宣言已是準備暴動的號召。在對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作了明確的分析之後，宣言以下列號召作結束：『我們的黨以展開着的旗幟來進行這個決鬥。它緊握着這面旗幟在自己手中，它決不會在強盜、卑鄙污蔑者、革命叛徒和資本傭僕的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幟。它高舉着這面旗幟前進，為社會主義和各民族的兄弟團結而奮鬥。因為它知道，新的運動已爆發了，舊世界死亡的時辰到了。』

『我們的戰鬥的同志們！準備着新的決鬥吧。堅定地，剛毅地，冷靜地不要受到任何的挑撥，要鍛鍊我們的力量，整頓戰鬥的隊伍。無產者和士兵們，到黨的旗幟下面來吧！被壓迫的農民，到黨的旗幟下面來吧！』

在我們黨史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六次大會是有偉大意義的。雖說我們的力量有些受到摧殘，雖說有些同志動搖，但是大會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的一切基本問題都採取了不可動搖的立場。在它的決議中反映出奮起掌握政權的階級的力量。這些決議給了明確的黨的政治路線，黨從防禦轉入進攻來反對反革命的聯合力量。

在這個時期我們黨內鬥爭的歷史中，應當指出，加米尼夫對於布爾塞維克參加斯托克霍姆第二

國際社會主義者會議問題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行動。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原來說好，加米尼夫祇以個人名義發言，說明『我們的黨團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可是，加米尼夫在發言中却說：『我們已經明白，從這個時候起，斯托克霍姆已經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手中的盲目的工具了。』在斯托克霍姆上空，開始展開着廣大革命的旗幟，在這面旗幟之下，正動員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加米尼夫是沒有權利這樣來講話的，因為第一，中央執行委員會內的黨團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第二，中央關於對參加斯托克霍姆會議（這大會上混入了帝國主義者）採取否定態度的決議並沒有取消，所以還是存在着。同時加米尼夫關於中央反對我們參加會議的理由，也是敘述得不對的，列寧嚴格的斥責了加米尼夫的這種言行，認為這是獻媚於社會帝國主義者。

列寧寫道：『國際主義者的政黨，在全世界前面是負責實行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我們決不能容忍國際主義者政黨同俄國、德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的醜行，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政府部長們（且爾諾夫、史可比列夫先生們）的醜行進行無恥的勾搭。』（見列寧關於加米尼夫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為斯托克霍姆會議所發的言論）

斯達林在『再論斯托克霍姆』的論文中，指明了在斯托克霍姆召集的大會的帝國主義性質。在六次大會的決議中，在列寧的論文中，在斯達林同志的言論中，黨得到了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鬥爭的明確路線，大會正確的指出了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是武

裝感動的戰鬥準備的大會。

區域聯合派與托洛茨基

在大戰時期，彼得格勒除了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組織外，還存在着所謂「區域聯合派」的組織，其中的一部份，是不同意黨的革命路線的以前的布爾塞維克和「左」的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這個組織，是幾個地區的集團聯合起來的，所以叫做「區域聯合派」。他們在戰爭的問題上是國際主義者，但是他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站在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政策的許多基本問題都是採取中間主義的態度，他們是反對兩條戰線鬥爭的。從二月革命以後直至布爾塞維克黨的六次大會以前，他們都是代表了一個獨立的組織，在六次大會時才接受他們到我們黨內來。由於幾個國外回來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影響，在「區域聯合派」中間，對於戰爭和臨時政府的問題形成了比較堅決的國際主義的立場，並且形成了比較接近於我們黨的態度。「區域聯合派」是以托洛茨基、盧那卡爾斯基、越飛、尤里尼夫等爲首的。可是托洛茨基對於同布爾塞維克聯合的態度怎樣呢？我們從米爾尼強斯基的回憶中可以看出。

當時，列寧的立場是受托洛茨基敵視的。當托洛茨基到達丹麥的時候，他知道了列寧在彼得格勒

的演說，那時他向自己的同志說道：『難道伊里奇在他做事中昏了頭嗎？在他的演說中，怎麼講出這樣的蠢事來？』他拒絕了經過真理報打電話給我們黨中央的提議，他不願意同我們聯絡。

在列寧死後，托洛茨基解釋他很遲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原因說，他曾同列寧商量好，他不要單個的加入，因為必須吸收全體區域聯合派來加入布爾塞維克黨。可是列寧在的時候，他從沒有這樣聲明過。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實際上他同列寧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的商量。托洛茨基在這個時期內的行動，完全證明了他對於布爾塞維克黨的態度是和他自己所說的不同。

正是托洛茨基妨害了區域聯合派來加入我們的黨。例如托洛茨基責備米爾尼強斯基，說他『急於』要同中央聯絡，並且說他在給伊里奇的信中沒有留意。托洛茨基對米爾尼強斯基說：『你不知道伊里奇的「制度」，伊里奇是不容忍思想不同的分子的。』托洛茨基堅持必須以聯合一致的集團來加入黨，『並且在黨內還要保持這個集團，使它不致於解體。』

托洛茨基早在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就說。布爾塞維克『組織上的保守主義』阻礙了國際主義者的聯合，換句話說托洛茨基埋怨布爾塞維克在組織的問題上沒有站到他的孟塞維克的觀點上去。在布爾塞維克同區域聯合派舉行聯席會議時，列寧所寫的記錄是十分重要的。『托洛茨基說道：（他在列寧之後不按次序臨時起來發言）我完全同意各種決議，可是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國際化了。』

『布爾塞維克是非布爾塞維克化了——我不能被稱為布爾塞維克……但是我們承認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不可能的。』

因此這個時候，托洛茨基雖說是向布爾塞維克的方向走了一步，但是却解說他不能稱為布爾塞維克，因為『布爾塞維克是非布爾塞維克化了。』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列寧起草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小冊子的計劃時，特別指出，在他看來，托洛茨基是當時小資產階級動搖的代表者。在這個計劃中我們可以看了這樣的一段：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是托洛茨基、拉林、賓斯托克、馬爾托夫、「新生活報」報。』

很明白的，列寧在托洛茨基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就認為他是當時動搖小資產階級『左』翼的代表者。六次大會通過了聯合派入黨，在其決議上這樣的寫道：『……社會民主派提出階級革命的口號（一切國際主義者統一起來，在事實上同孟塞維克、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以和一切人統一起來的危險口號相對立。……』

托洛茨基同區域聯合派加入了黨，他聲明同自己的孟塞維克的過去斷絕關係，站到我們黨的立場上來。但是像往後所表示出來的，托洛茨基祇是在口頭上移去了他同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分歧。聯合國際主義者，在實際上同孟塞維克、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的這種立場使區域聯合派和托洛茨基有了入黨的可能。可是根據斯達林同志的話來說，托洛茨基是在對他不利日子把自己孟塞維克的武器

藏在櫃子內，以後他仍是不斷地拿出這一武器來進行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鬥爭，直到他被開除出黨，被驅逐出蘇聯，成爲敵人，成爲反革命。

「——在托洛茨基派未入黨以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孟塞維克主義的派別；在托洛茨基派入黨以後，托洛茨基主義暫時的成了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在托洛茨基派被逐於黨外以後，托洛茨基主義又成爲了孟塞維克主義的一個派別了。」*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國事會議

資產階級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幫助之下，得到了全部的政權，企圖轉入反攻，不僅要來反對布爾塞維克黨，而且要來反對一切革命的所得。資產階級準備解散和摧殘蘇維埃，建立資產階級公開的專政。爲着準備這一步驟，臨時政府便規定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召集會議，會議的任務是來討論如何向工人階級進攻的問題。

在莫斯科第二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會上，百萬富翁梁布新斯基表示他的希望，說：「只有當饑餓的，骨瘦如柴的手和人民的貧困抓住了假的人民之友（民主的蘇維埃和委員會）的咽喉之時，才能

*見斯達林同志答覆陶萊黑諾維奇的信。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第十六號，布爾塞維克雜誌。

逃出危局，在前綫上，軍法處是橫行無忌，不願爲資本家的利潤而拚命的士兵被處死刑。

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柯尼洛夫將軍要求在後方實施死刑，資產階級正準備着反革命的改變，只有瞎子才看不到這點。

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國事會議。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組織了總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四十萬工人，這使得國事會議的代表不得不從車站步行去開會；在布爾塞維克的號召之下，這一天在莫斯科有四十萬以上的工人舉行罷工，甚至於廚師也參加罷工了；同時，在可史特洛姆、基夫及其他城市，也有反對國事會議的罷工。克倫斯基在國事會議上的演說中，威嚇着要用『餓和血』來鎮壓無政府現象。所謂『無政府』就是指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克倫斯基威嚇農民和農民委員會說，如果他們在立憲會議決定以前自動奪取地主的土地，則將以『餓血』對付之。在大戲院的戲台上，舉行了對於資產階級建立『階級和平』的儀式——工商業階級的代表布不里可夫和『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宰萊台里，舉行了吃驚的合作，他們實行了『有歷史意義的握手』。這種行動企圖在會議上鞏固臨時政府的地位，在這會議上資產階級分子是佔着顯著優勢的。可是這種行動却遭受了無產階級和士兵羣衆的抗拒。在當時的會議上，有資產階級社會治安委員會（確切些說是社會危害委員會）市政廳、地方會議及軍官將領等等代表的參加，可是各都市和各省蘇維埃的代表却不許參加。會議上有少數職工會的代表，用了職工會的名義宣讀了布爾塞維克的宣言。

卡列金、阿列克西也夫和柯尼洛夫等將軍，在這次會議上是公開進行挑釁的。卡列金將軍提議『取消一切委員會和蘇維埃。』

在這次莫斯科會議的前夜，反革命的司令部召集了會議，即『社會行動家會議。』這次會議，以共同的綱領聯合了立憲民主黨和保皇黨——密留可夫、羅將可和卡列金、布魯西洛夫、才登尼奇諾將軍，都同意要取消蘇維埃和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權。』

當時已經知道，資產階級所稱爲民族英雄並準備擁之爲軍事獨裁者的柯尼洛夫，是準備行動了。在莫斯科大多數的軍官，是站在柯尼洛夫方面的。*

密留可夫公開的號召消滅布爾塞維克主義，鎮壓布爾塞維克。克倫斯基表面表示胆怯，祕密的則參加反革命的陰謀。『結果，形成了保衛祖國派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有生力量的聯合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斯達林）西歐資產階級政府允諾給克倫斯基、密留可夫和宰萊台里等的『真誠混合政府』以五十萬萬的國家借款，自然這種混合政府是必須把俄國的士兵重新趕到屠場上去。

這次國事會議，最後的在羣衆面前揭破了各種資產階級政黨在當前事變中的作用。

*當時布爾塞維克向克倫斯基提議，在莫斯科逮捕柯尼洛夫，但是小克倫斯基沒有敢這樣做。

可尼洛夫的暴動

可尼洛夫將軍認為時機已到，所以把反革命的部隊（第三哥薩克軍，從芬蘭調回的高加索第一騎兵軍及「野蠻師」等部隊）從前綫調回彼得格勒來進行反革命的政變和建立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可尼洛夫給與克立莫夫的兩個任務是：第一、「率所部進佔彼得格勒城，解除彼得格勒守備部隊的武裝，因為該守備部隊準備參加布爾塞維克的運動，解除彼得格勒的羣衆武裝，並且解散蘇維埃」；在完成這一任務後，第二任務是「派出一個旅附砲兵向奧蘭巴姆前進，到達後即要求克隆斯坦的守備隊解除要塞的武裝，並且轉到陸上」。往後證明，英國大使比根寧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代表，是幫助來實行這個反革命計劃的。同可尼洛夫部隊一同行動的有英國的部隊，他們帶着裝甲車和戰車。在反革命軍隊所包圍的彼得格勒城內，士官生也都發下了子彈，手榴彈和溜彈砲。

擺在我們黨前面的問題是：當政權掌握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無力的聯盟之手中時，我們應該如何的同可尼洛夫派鬥爭呢？在這個時候，一小部份的同志主張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即對於政變威脅採取中立態度；還有極少一部份，主張採取保衛祖國的態度，主張幫助臨時政府。列寧、斯達林和中央的大多數以及黨內的最大部份，認為有些同志所提出的幫助臨時政府，同孟塞

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聯合的主張，是無原則的。

列寧從秘密的住地寫給黨中央的信上說：『我們就是現在也不應該幫助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這是無原則的。有人問：難道不去打擊可尼洛夫嗎？自然是的。但是，這兩點並不是一個東西，這是有區別。有些布爾塞維克不了解這種區別，陷到「妥協派」中去受事變的播弄。

『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要同可尼洛夫作戰，……但是我們並不幫助克倫斯基而要揭破他的弱點，區別就在如此。……』

可尼洛夫派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列寧指出可尼洛夫派的意義是在於『他以特別的力量在民衆的眼前揭穿了那種真理，這種真理，直至現在為止是被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妥協的詞句所掩蔽着的。這一真理即是說，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的地主資本家以及站在他們方面的將領和軍官們是組織起來了，他們準備着實行並且正在實行着最駭人聽聞的罪惡行爲，準備將里格（然後再有彼得格勒）讓給德國人，將戰綫讓開給他們，使他們能够去屠殺布爾塞維克的部隊，發動叛亂，率領着以「野蠻師」爲首的軍隊向京城進攻等等……所有這一切行動，都是爲着要將全部政權奪取到資產階級的手中，爲着要鞏固地主在農村中的權力，爲着要在全國酒過工農的鮮血。

『可尼洛夫的暴動向俄國證明出的，正和整個歷史向各國所證明的一樣，資產階級爲着要保持他統治人民的政權和自己的收入，是會出賣祖國和做出一切犯罪行爲來的。』

布爾塞維克在粉碎可尼洛夫派中做了些什麼呢？

當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對於可尼洛夫的進攻表示完全驚慌失措，簡直是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可是我們黨的中央，不僅在彼得格勒，而且在其他許多的城市中，號召工人和士兵起來對於反革命實行積極的武裝抵抗。在這幾天中，赤衛隊是增加了好幾倍；聯工會表示了他們對於革命的忠誠，他們動員了自己的會員；在彼得格勒，革命的軍隊也採取了戰鬥的準備，在彼得格勒的周圍，都做起了戰壕，配置了鐵絲網，封鎖了一切的通路；數千克隆斯堪的海軍，也來保衛彼得格勒了。根據基羅夫同志的提議，對於「野蠻師」也派了代表去，向那些山林戰士解釋運動的真義，結果「野蠻師」拒絕進攻彼得格勒了。在可尼洛夫的其他部隊中，也派去代表和宣傳者；在一切危險的地方，都建立了同可尼洛夫鬥爭的革命委員會和參謀部。

可尼洛夫派是被粉碎了，可尼洛夫被捕（可是以後他又從監獄逃跑了），克立莫夫將軍自殺了，這次叛亂於是平熄。國家之得救，是由於我們黨的正確的策略以及我們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和革命軍隊的組織性和革命毅力。

在可尼洛夫暴動的時候，我們的策略應有怎樣的變動呢？列寧所主張的策略如下：『絲毫也不減弱對於他（克倫斯基）的敵視，反對他的話一句也不收回，更不拋棄推翻克倫斯基的任務。但我們說：必須估計時機，現在我們不起來推翻克倫斯基，現在我們用別種方法去同他鬥爭，就是，要向人民（對

「可尼洛夫作鬥爭的人民」解釋克倫斯基的動搖和軟弱。這點，我們以前也是做的，可是現在這成爲主要的了；形式上的變動就是在此。

『自然，我們應該同時爲武裝工人，逮捕反革命者，將革命的軍隊調近京城，將地主土地交給農民，使工人監督生產和廠主等等而鬥爭，——所有這一切，我們應該在工人、農民和士兵中去宣傳。可是現在最主要的是在於：現在是幹的時候，應該以革命的辦法吸引羣衆，推動羣衆，鼓勵羣衆起來進行反對可尼洛夫的戰爭（而克倫斯基却是害怕羣衆和害怕人民的。）』

爲着揭破臨時政府，布爾塞維克提出了許多人民所共曉的要求，自然，這些要求是一個都沒有被滿足的。因此，羣衆更相信，爲要實現他們的要求，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有新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在這些時候，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僅沒有抵抗我們黨在軍隊中的工作，而且他們在完全驚慌失措之下不得不求助於我們的軍事組織，因爲，他們自己已經大大的失去了他們在工人和士兵羣衆中的信仰。對於可尼洛夫派的鬥爭，提高了我們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和影響。赤衛隊打败了可尼洛夫派，這同時也就使羣衆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在這個時候，赤衛隊的建設工作和我們黨軍事組織的鞏固特別有了很大的進步。

我們利用了當時的情況，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武裝了赤衛隊的隊伍。在十月十日中央會議上，烏里茨基同志報告彼得格勒的工人已有了四萬枝槍。這些武器，主要的是在打擊可尼洛夫向彼得格勒進攻的時候奪取來的。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七月事變以前，『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設想着：如果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能同帝國主義者破裂聯盟而成立蘇維埃政府，那麼，在蘇維埃內部將能進行『蘇維埃』下的各政黨和各階級的『和平』的鬥爭，而便利於『準備一切保證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條件』。

七月事變，使得這種和平發展成爲不可能了。

可尼洛夫暴動的失敗變更了許多情形。在許多蘇維埃裏面，包括兩個京都市的布爾塞維克，得到了大多數，並且爭取了蘇維埃的領導機關。

斯達林同志寫道：『……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被提出來了。但是，現在這個口號已經不是第一個階段上的那樣意義了。它的內容是有了根本的變動。現在這個口號是指着同帝國主義完全分離，將政權轉到布爾塞維克手中，因爲大多數的蘇維埃已經是布爾塞維克的了。現在，這個口號是指着經過暴動使革命直接的進到無產階級專政。此外，現在的這個口號，更指出要使無產階級專政組織起來，形成爲國家。』（斯達林論反對派）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組織暴動的時期

斯達林同志說：『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應該說是危機的迅速的發展，統治當局中完全的驚慌失措，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孤立以及動搖分子之整批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

國內的革命危機是開展了。到秋天的時候，經濟的破壞是更加厲害了。一九一七年九月，煤的產量等於一九一六年產量的百分之七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只得到了百分之三十的必須數量的煤。在八月時候，又關閉了二百三十一個企業，逐出了六萬一千工人。工人是饑餓着，罷工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帶上了更戰鬥的性質。在『當前威脅着崩潰以及如何與之鬥爭』的論文中，列寧寫道：戰爭的延長，饑饉，破壞和羣衆的貧困——這是臨時政府政策所產生的結果。列寧在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前面提出了偉大的任務，這一任務只有經過武裝暴動和政權歸蘇維埃才有實現的可能。列寧發道：『戰爭是不會饒赦的，它非常尖銳地提出來的問題是：或是滅亡，或是趕上先進的國家並且在經濟上也要超過他們。』

我們的黨，影響在工人階級，農民和軍隊中是迅速的發展和鞏固了。如果在六月底的職工會，全俄的代表會議上布爾塞維克代表還只佔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六·六）那麼，在九月的民治會議上，一

百二十個職工會的代表中已經有六十九個是布爾塞維克，即百分之五七·五。同時我們在農村中的聯系也擴大了，我們在農村中的影響也鞏固了。八——九月的時候，在全國開展着爲土地而鬥爭的運動：農民奪取地主的糧食和牲畜，分配土地和森林。各縣的當局要求軍隊援助去反對農民；各縣的執行委員會主張將私人佔有的土地交給各縣的土地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的時候，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事件是大大的增加了。農民破毀地主的莊園，向地主實行土地的鬥爭。克倫斯基、阿弗克生、基也夫和馬史洛夫等社會革命黨人，關於派遣討伐隊的威脅和恐怖是沒有什麼用處了。在高加索，孟塞維克是派遣過這樣的討伐隊到農村中去的。

「可尼洛夫」的暴動告訴了廣大的農民羣衆，他們手中的土地是完全可能從他們的手中被奪去的。地主的將軍們，在摧殘了蘇維埃之後就要來欺壓農民了。因此，農民中的貧農和勞動階層就轉向我們方面來了。他們了解，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澈底領導革命，才能推翻和鎮壓一切地主，將土地交給農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的時候，黨有了充分根據可以說，農民運動的發展及其範圍和深度，可以保證在無產階級和貧農爲着政權和土地而鬥爭的中間，無產階級是能够得到農民全部基本羣衆的幫助的。我們看到在列寧於這時期所寫的一切信件和論文上，在黨關於暴動問題的一切決議上，都注意到並估計到這種農民運動的發展。社會革命黨在農民羣衆中的影響是日益降低了。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在『農民與工人』和『自勵奪取土地』的論文中，列寧指出基本任務之一是對於孟塞維克特別是

對於社會革命黨的鬥爭。真的，農民羣衆政治覺悟的提高和革命化，他們特殊的『布爾塞維克化』在這幾個月內（二月——十月）是大踏步的前進了。

「……這八個月，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的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見列寧主義概論五

七頁）

農民失望於社會革命黨之後，便離開他們，並且團結到無產階級的週圍來了。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社會革命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間爲着爭取農民，爲着爭取農民的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反對沒收地主土地，派了討伐隊懲罰農民自勵沒收的行動，他們實行繼續戰爭和鎮壓革命的政策。——所有這些，告訴了農民羣衆在當前的情況下應該從那個方向去找出路。在土地問題之後，對於農民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和平和結束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從戰爭中跳出來，『這是疲憊的俄國，首先是一切農民的共同呼聲。』（斯達林）不推翻資產階級，不實行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已經是不能被結束的了。

農民運動是開展了。在以後一切文件上列寧總是清楚的提到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忽視這一點的危險。*

對於可尼洛夫派的鬥爭，使布爾塞維克黨不僅有了可能去鞏固軍事組織和赤衛軍，而且有了可

能去鞏固自己在蘇維埃中的影響。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許多其他地方的蘇維埃，都成爲布爾塞維克的了。黨爭取省區的蘇維埃在許多地方省區的和市的議會，也都成爲布爾塞維克的了。

工廠和軍隊重新選舉他們的代表，他們選派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代表到蘇維埃中去以代替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九月十三日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內，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的蘇維埃內，都以大多數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決議。許多省的蘇維埃（伏士尼生斯克、魯干斯克）也被布爾塞維克所爭取過來了。

布爾塞維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議上，在戰勝可尼洛夫派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蘇維埃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決議，舊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主席團辭職了。莫斯科蘇維埃的布爾塞維克化是比較慢些。雖說軍隊的情緒已經變動，但在莫斯科士兵代表蘇維埃裏（直至十月革命止）還坐着一些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還不想滾開。可是，就是莫斯科的蘇維埃，也通過了一些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如像里金紡織廠的國有和交歸工人管理的決議以及責令製革廠主執行工人要求的決議，這些決議指示出爲無產階級利益而行動的蘇維埃政權已被認爲是最高政權了。這

*列寧全集原文第二十一卷三三六頁「農民暴動是在開展中」；二九三頁「土地運動是在發展起來」；三三五頁「在俄國現時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實是農民暴動」；二八八頁「現在布爾塞維克如果拒絕變蘇維埃爲暴動的機關，那麼就是對於農民也是背叛」等等。

樣的決議使得其他較大中心地點的蘇維埃下之羣衆也能從社會妥協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七月以後被撤去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重新被提出來了，並且奪取政權的問題，被列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但是如我們所已知道的，這已經不是舊的政權轉入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蘇維埃手中的口號，而是暴動的口號；爲的是將政權交給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手裏。

民治會議國會預備會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能够用什麼來和日益發展着的革命浪潮相對抗呢？最公開的反革命者在這個時候已經動員武裝的力量來進行內戰了：在頓河流域，有卡列金和可尼洛夫；在烏拉爾的哥薩克中間有杜托夫。

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又一次的企圖削弱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爲着這個目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召集了各妥協派的蘇維埃、職工會、地方會議、工商界和軍士組織代表的全俄民治會議。這個會議產生了國會預備會（共和國的臨時國會），牠對於臨時政府有建議的性質（工人譏笑國會預備會是過路廳），在歷史上好像再沒有比這個國會預備會更無權的可憐的把戲了。在一八四八

年德國的三月革命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諷刺的譏笑過弗蘭克福特的國會，說這是『弗蘭克福特的茶館。』這種茶館，還不是獨一無二的呵！

自然，蘇維埃的呼聲是要沉歿在這個茶館裏的，所以布爾塞維克決定抵制它。但不是一下子，而是經過某些動搖，布爾塞維克黨團才決定了脫離這個國會預備會。在黨團會議上，卡米尼夫和諾金的發言是主張參加國會預備會的，他們申明，抵制國會預備會就是直接的號召暴動。斯達林同志代表中央發言反對這種意見。列寧、斯達林同志認為，即使暫時參加國會預備會也是極嚴重的錯誤。

在同立憲民主黨作了許多商量和談判之後，民治會議表示了反對同立憲民主黨成立混合政府；可是，克倫斯基還是組織了新的混合政府，其中有立憲民主黨人的參加。在這個混合政府內有十個『社會主義者』，有六個資本人家，爲首的是可諾瓦洛夫。列寧認爲這次民治會議的階級意義是『政府內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繼續的瓦解……是克倫斯基以及宰萊台里，且爾諾夫等等先生們的拿破崙主義更進一步的聯合與明朗化。』

在這個時候，黨繼續的同卡米尼夫與徐諾維夫的機會主義的動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通過了抵制國會預備會的決議以後，卡米尼夫向中央寫了聲明書，說明他不同意黨的這個決定，請求解放他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是右的機會主義立場的繼續，這種立場造成了布爾塞維克黨歷史上所空前未有的，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驚人的工賊行爲。

武裝暴動的準備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工賊行爲之揭發

關於暴動的問題，在十月十日的中央會議上，根據列寧和斯達林的提議，大多數是決定了，反對決定的祇有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兩個人。這兩個人不但表示了如此的原則上的不堅定，而且還表示了如此的不遵守紀律，使得全黨都對之憤激。十月十一日，最大的黨的組織（莫斯科省區委員會，芬蘭省區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黨團委員會，北地區蘇維埃大會黨團委員會）都得到了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署名的關於目前形勢的一封信，在這封信內這兩位投降主義者宣佈他們反對暴動的意見。他們寫道：『我們深刻的相信，現在宣佈武裝暴動，不僅是把我黨的命運，而且也把俄國和國際革命的命運拿來作孤注一擲。』這些投降主義者深信地說：『我們已是拿着手槍對着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必定不得不召集立憲會議，在這個立憲會議上，資產階級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們黨在立憲會議選舉上的機會是很好的。』他們認為俄國大多數的工人和大部的士兵是贊成布爾塞維克的，但是據他們的意見，贊成布爾塞維克的還沒有農民和大多數的國際無產階級。他們宣佈道：『既然選舉依靠着我們，我們現在可以而且應該限制於防禦的立場上。』在羣衆中沒有戰鬥的情緒，在許多大的職工會中（鐵道工會）我們還是很薄弱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提出『或是現在動手，或是永遠沒

有機會」把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政黨手中的問題，是深切的歷史上的錯誤。」（這些引句都是從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信中摘下來的）按徐諾維夫和卡米尼夫的意見，他們的信是反對布爾塞維克中央的破壞政策之「警號」，因為當時中央是準備速即暴動的。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在孟塞維克中間散佈了這封可恥的信。

我們黨的中央怎樣來看這件事情呢？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通過了武裝暴動的適時性和必要性的決議，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是反對這個決議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同負責幹部的會議，通過了決議指出完全同意中央的決定。

這兩個決議都是列寧起草和提出的。在十月十六日的會議上，解決了武裝暴動的實際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領導暴動的實際軍事中心，參加的有斯達林、史維特洛夫、端爾仁斯基、布伯諾夫和烏里茨基。

列寧堅決認為「危機已經成熟」暴動若再延遲，能夠成為革命失敗和毀滅的原因。

在「危機成熟了」的論文中，列寧指出農民暴動的發展是這個危機的最重要的事實之一；第二個最重要的事實是已開始的民族衝突（烏克蘭、芬蘭）；第三就是軍隊贊成布爾塞維克；第四是小資產階級脫離舊的聯盟。「……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一起，我們現在在蘇維埃中，軍隊中和全國都已得了大多數了，對於這點，是沒有任何懷疑的。……」鐵道工人和郵務職員也同政府發生尖銳的衝突。

如果我們放棄暴動的話，那麼我們便要成爲無產階級事業、國際主義、農民、民主和自由的『可恥的叛徒』。托洛茨基要把暴動延遲到蘇維埃大會的時候，列寧是反對這樣做的。托洛茨基以爲，對於蘇維埃大會，祇要命令將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并使臨時政府服從這點就夠了，用不着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這是老孟塞維克的話。如果黨聽了托洛茨基的話，那麼革命是會遭受失敗的。

列寧知道，蘇維埃大會是不能簡單的命令轉交政權的，在奪取政權之前要有嚴重的武裝鬥爭。這就是爲什麼列寧堅決認爲這時關於暴動的政治問題是一個軍事的問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決定，規定十月二十五日（蘇維埃大會開幕日）爲政權轉入蘇維埃手中的日子。列寧提議從三處（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羅的海艦隊）突然的實行攻擊。關於這一點，列寧在九月二十九日寫道：

要善於運用我們三部主力：艦隊、工人及軍隊。不管犧牲幾多，一定要先佔據電話局、電報局、火車站與橋樑。

挑選最堅決的分子（如我們的敢死隊的青年工人以及海軍兵士）組織小的隊伍，去佔據最扼要的地點，參加各處緊要的軍事行動。例如：

要使艦隊、工人及軍隊聯合攻打彼得格勒，加以圍困，並截斷外援以奪取城市——這個任務，需要藝術及三倍的勇敢。

要把最好的工人組成小隊，帶着槍枝及炸彈去圍攻敵人之『中心地』（如士官學校，電

報局，電話局及其他。）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寧可死完，但不能放走敵人……

在把里格讓給了德國人之後，在協約國軍事力量極端可疑的行動之下，一種嚴重危險是存在着。就是政府或將把彼得格勒也讓給德國人。關於這個問題，那時發生了嚴重的議論，甚至於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準備把臨時政府搬到莫斯科來。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列寧在十月八日寫道：『正是爲着要挽救彼得格勒，必須推翻克倫斯基並由兩個首都的蘇維埃奪取政權。』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中央會議上，列寧就以同樣的精神作了報告。卡米尼夫、徐諾維夫反對暴動的發言，引起了列寧非常的憤慨。他認爲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意見『祇顯明地表示出他們喪失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而進退維谷的驚慌失措，不然就無從解釋如此可恥的動搖』（見致同志書）。列寧認爲揭破這些動搖是必須的，因爲『這兩個喪失原則的同志，可能引起某種紛擾』。列寧極尖銳的提出問題來：『或是把政權交給孟塞維克，並且公開的放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或是實行暴動，沒有中間的辦法。』（見致同志書）

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沒有得到地方黨的組織來幫助他們的破壞工作，所以便求助於資產階級了。十月十八日，卡米尼夫經過徐諾維夫的同意在孟塞維克的報紙新生活*上發表一篇文章，在這文章內把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暴動的秘密決議告訴給資產階級了。

在這個叛賣的行爲之後列寧寫了一封信給中央，在這信中寫道：『黨中央關於武裝暴動，關於不使敵人知道武裝暴動的準備以及關於選擇武裝暴動的時機的決議，都被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向羅將柯和克倫斯基告密了。這是事實，任何的解釋都不能推翻這種事實。兩個中央委員，用了譏諷的語言，在資產階級面前將工人的決議告密了。對於這個問題，只能而且只應有一個答案，中央應該立即作出決定。』

『承認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在非黨刊物上的言論完全是工賊的行爲，中央應開除他們兩個人的黨籍。』（見致中央書）

暴動的組織與實行

*新生活報，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其中參加者有波格達洛夫、阿維洛夫、巴薩洛夫、米斯可夫斯基、伏爾斯基、林託夫、史特洛夫也）同新生活合作的，則有高爾基、盧那却爾斯基、史節克洛夫和孟塞維克、蘇漢諾夫等。實際上，這個報紙所採取的立場，是同資產階級進行妥協，並以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任務來限制革命。這個報紙，很厲害的批評了布爾塞維克。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就是在這個報紙上發表文章，反對黨的決議。

十月革命，是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由工人及士兵羣衆來完成的。布爾塞維克黨到這個時候已經由於自己堅決保護勞苦羣衆的利益，反對侵略戰爭，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而爭取了羣衆的無限制的信仰，但是如果沒有精細的組織準備，那麼勝利或許就不能保證。在暴動中，布爾塞維克的軍事組織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與其他城市工人所建立的赤衛隊組織是起了極大的作用的。我們已經看到，到這時候，布爾塞維克黨已經在最主要的蘇維埃中爭取了大多數。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在羣衆中之完全喪失影響以及資產階級政府之叛變行動，是有利於我們勝利的。我們的黨，以壓倒一切的最大多數，堅決的打擊了徐諾維夫與卡米尼夫的叛變以及其他機會主義者的動搖。黨是隨着列寧前進的。列寧早在革命以前就已經詳細的分析了並且肯定的回答了布爾塞維克能否堅持國家政權的問題。當列寧被逼，躲避克倫斯基偵探搜索的時候，列寧就用上一個問題爲題寫了小冊子回答了這一問題。布爾塞維克整個過去的戰鬥經驗以及一九〇五年暴動的經驗，在這時期都被用來實行堅決的打擊。在暴動之前不久，列寧在局外人的建議的一篇特別的文章裏，指出：

武裝暴動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受一定的特殊規律的支配，我們對於這些規律，應該可以深思熟慮。關於這個道理，馬克思說得非常透澈明白。他說：『武裝暴動和戰爭一樣，是種藝術。』

此種藝術的主要法則，馬克思提出以下幾項：

一、無論何時，不要以暴動爲兒戲，應該堅決的知道，一旦暴動開始，就要做到盡頭（一不做，二不休）。

二、在千鈞一髮之際，一定要多集精銳於要塞，不然，組織較好訓練較良的敵軍，便會把暴動者消滅。

三、一旦暴動開始，就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要馬上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守勢是武裝暴動的死亡。』

四、應乘敵人之不備而襲擊之，在敵軍尚未集中之時，乘機猛進。

五、軍事上每天應有進展，雖小不妨（如在城市中則每點鐘應有進展）無論如何，一定要鼓勵士氣。

馬克思用歷史上革命戰略大家但頓的話來總結一切革命武裝暴動的教訓：這便是『勇敢，勇敢，還要勇敢。』

列寧在指出暴動藝術的這些規律之後，同時給了具體的指示，說明必須從最重要的地點實行同時的進攻。其中包括整個海軍的進攻，必須在決定的中心造成力量極大的優勢，必須佔領重要的機關，必須派出最堅決的分子特別是青年工人來參加最重要的戰鬥行動。列寧的這些建議，對於暴動的成

功是有偉大的意義的。

估計到國際的環境，西方的，首先是德國的革命運動；估計到內部的國內的環境，工人，兵士及農民羣衆的迅速的革命化，反對臨時政府的壓迫政策之民主革命運動以及蘇維埃中大多數之取得。在估計了這些之後，列寧指出，暴動的時期是到了，現在是：『遲延等於死亡。』

克倫斯基害怕着彼得格勒的軍隊，他經過北方軍總司令切列米索夫發佈了命令，要把革命的部隊調開彼得格勒，轉赴前方；而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却決定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軍委向一切軍事部隊任命自己的政治委員，從此以後，不經過這些政治委員的審查與同意，任何命令都不能執行。*

革命的軍隊沒有從首都調開，部隊一一地站到暴動方面來了。

斯達林同志指出布爾塞維克策略的特殊點之一，是在於『革命的每一個，或是差不多每一個進攻步驟，是在自衛的形式下實行的』。蘇維埃反對把軍隊從彼得格勒調開，派遣自己的政治委員到部隊中去等等。

『……好像是革命以自衛的外形來掩蓋自己的進攻行動，使得這樣更容易把不堅決的動搖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軸心上來。』

*在莫斯科，這樣的機關是在暴動的前夜被建立的。

暴動的政治領導是掌握在黨的中央和彼得格勒黨委的手裏，爲着實際領導暴動的執行，布爾塞維克黨在中央和最重要組織代表的會議上建立了一個中心，參加的有斯達林、史維特洛夫、埃爾仁斯基、布伯諾夫和烏利茨基。這一中心，領導一切參加暴動的組織（革命的部隊、赤衛隊）。在暴動前夜，列寧從秘密住地回到彼得格勒，親自參加武裝暴動的領導。

應當指出，我們布爾塞維克的報紙，特別是真理報和士兵真理報，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真理報是有光榮的名譽的，當真理報在大戰以前幾年動員羣衆在我們黨的戰鬥口號之下來實行新的革命高漲的時候，就已經取得了這一名譽。現在真理報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宏亮的警鐘。列寧和斯達林的文章解釋了革命的任務，這在對於羣衆的布爾塞維克革命教育的事業上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在前後方的士兵羣衆中，在焦渴地尋找任何的結束戰爭的聲息的戰壕中，士兵真理報指出了脫離戰爭的唯一革命道路——這就是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國內戰爭。士兵真理報不斷的說明「敵人在是自己的祖國」。由於卡米尼夫、徐諾維夫工賊與叛徒的傳播消息，階級敵人就立即採取辦法要來企圖迅速摧毀革命的司令部——布爾塞維克黨。當卡米尼夫的文章在新生活上發表的時候，當天（十月十八日）晚上臨時政府就召集了秘密會議來討論當前布爾塞維克所準備的暴動之問題，十月十九日臨時政府就匆忙的從前綫調兵到彼得格勒來，並在各街道上來往着巡邏着。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臨時政府發佈了命令要封閉我們的報紙工人之路及士兵報。十月二

十五日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革命報紙的印刷所繼續開張，報紙繼續出版，革命印刷所的保衛由立陶宛團的士兵和第六補充工兵營負責。』這樣，到了這個時候，臨時政府的政權就已成了完全空虛的了。

主動力是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手裏，黨中央派遣了特派員到頓巴斯、烏拉爾、赫爾辛福斯、克龍斯坦及西南戰綫上去，他們使各地組織明瞭暴動的計劃，動員這些組織來援助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黨的中央分配了各省區在準備暴動中的責任。

十月二十五日（新曆十一月七日），赤衛隊和革命軍隊就在彼得格勒佔領了最主要的政府機關、火車站、郵政局、電報局、通信社、國家銀行、冬宮等等；解散了國會預備會的會議；史莫爾尼宮成了革命的戰鬥司令部；從史莫爾尼宮發出了戰鬥的命令，武裝了赤衛隊。在這幾天，彼得格勒的工人表示出他們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之下是經過了很好的學校。革命的部隊在我們的軍事組織的工作之下準備了暴動，他們確切的實現了戰鬥的命令並且和赤衛隊肩並肩的戰鬥着。可是別有重大意義（戰鬥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的，是這一事實——就是一開始海軍就站在革命的方面，克龍斯坦一開始就是布爾塞維克黨的壘壘，那裏是不承認臨時政府的政權的。阿伏羅拉艦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其大砲的轟擊造成了新紀元（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紀元）的開始。

臨時政府表現出無能為力，在奧夫辛可指揮之下的一隊赤衛隊逮捕了臨時政府。因為臨時政府

只有極微弱的力量，沒有民衆的任何同情，所以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經過比較少數的犧牲就完成暴動了。

斯達林指出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塞維克策略四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整個革命的準備及其領導是一個黨（布爾塞維克黨）的事業；第二、黨的主要努力就是向着這一點，即是使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失去任何影響並被孤立起來，沒有這點革命是不可能的；第三、『將蘇維埃轉變為國家政權機關的政策，是孤立妥協派政黨並使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見列寧主義概論）第四、黨使羣衆能够在二月與十月之間一個時期的自身經驗上深信我們黨的口號的正確。

由於黨在羣衆中的有系統的工作，黨的革命口號的明確，組織的靈敏，對於妥協派政黨的揭破，黨於是爭取了革命羣衆到自己的方面來了。

以後，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上面對於十月革命做了誹謗的形容，他把事情形容得這樣，好像他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什麼特殊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似的。我們已經看到，托洛茨基甚至沒有被選在暴動的實際領導的戰鬥中心裏面。關於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這種神話是被黨所揭破了。

托洛茨基企圖把事情形容得這樣，好像完成十月革命的不是布爾塞維克而是他，好像根據他的提議，彼得格勒蘇維埃採取了不把革命軍隊調開首都的決定，因而十月革命四分之三已經完成，而十月二十五日的暴動即只有『補充的性質』似的。可是事實却說的是另一個樣子。暴動及政權的奪取

是在蘇維埃大會前發生的，這暴動決定了十月革命的基點，暴動是由我們黨的中央，黨的軍事組織所準備的。十月二十一日，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遣了自己的政治委員到一切革命的部隊裏去，這幾天，一直到暴動的時候都進行了有力的戰鬥的準備。「阿伏羅拉」和「自由曙光」軍艦都得到了戰鬥的任務。在戰鬥的五人委員會中，決定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進攻冬宮的問題。托洛茨基亂嚷亂說不同意革命的時期。爲着使得克倫斯基政府沒有可能來組成自己的力量並準備反攻起見，在從十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的夜間，根處了列寧、斯達林的計劃實行了武裝暴動。『事變指示出，列寧是完全正確的，大家知道暴動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開始的，大家知道政權在實際上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被奪取的。』（見斯達林論反對派）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黨從地下狀態中出來，組織上是減弱了的。黨在自己的鬥爭中是依據着羣衆運動的『自發的高漲』（斯達林）黨形成了十月革命的政治軍隊。十月革命的全部準備是在一個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進行着的。所以在十月，政權就被取到這一政黨的手中了。布爾塞維克黨使千百萬的工農士兵羣衆解脫了小資產階級妥協派政黨的影嚮，在他堅持的鬥爭中爭取了蘇維埃，使蘇維埃布爾塞維克化，把蘇維埃轉變爲暴動與革命政權的機關，使羣衆在自身經驗上深信布爾塞維克口號的正確。（見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

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開始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接受了彼得格勒工人與士兵羣

衆所爭取到的政權。

不管敵人與缺乏信心者的一切預言，十月革命終是勝利了。布爾塞維克黨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叛徒，工賊卡米尼夫與徐諾維夫從自己的路上掃除出去了。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立場是和托洛茨基的立場相符合的，托洛茨基也是認爲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步。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領土上，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只有勞動羣衆的英勇的努力，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的忠實，他們集體領袖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不可動搖的堅定性，才能克服敵人的抵抗，保持這一政權，鞏固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上的最初成功，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這些任務之所以能够實現，正是因爲布爾塞維克黨澈底的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爲黨對於俄國的基本兩個階級——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了正確的政策；並且能够建立蘇聯一切民族的勞動羣衆的聯盟。

附錄
三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親愛的同志們！

我堅決地反對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發表斯路茨基底布爾塞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篇反黨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

斯路茨基斷言，列寧（布爾塞維克）輕視了德國的以及一般戰前的社會民主黨內中派主義的危險，即是說，輕視了暗藏的機會主義底危險，輕視了對機會主義調和底危險。換言之，照斯路茨基底意見，列寧（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機會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因為輕視中派主義，實際上就是放棄與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這樣就是說，列寧在大戰之前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者甚至在這次大戰告終時，才成了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斯路茨基在他的論文中就是這樣揚言的。而

你們不但沒有把這個新出台的『歷史家』當作誹謗家和偽造家來咒罵他，反來同他爭論，給他一個說話的講台。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反對你們雜誌上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因為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列寧是否會與機會主義著名的形式——中派主義——作了原則上不調和的鬥爭的問題，列寧是否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問題——這種問題不能變成爭論的東西。

你們在十月二十日致中央的『申明書』內承認編輯部發表斯路茨基底論文作為爭論的文章，是犯了錯誤。這自然很好，雖然該『申明書』發現得很晚。可是你們在自己的申明中又犯了新的錯誤。『申明書』內說：『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篇幅上繼續攻究布爾塞維克與戰前第二國際的相互關係的一切問題，這在政治上是很切要而必需的。』這就表示你們想把布爾塞維主義這個無可爭辯的定理，從新拿來加以討論。這就表示，你們重新想把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由定理變成需要『繼續攻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是在與各種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中產生，長大和鞏固起來的，這裏自然也包括與西歐（考茨基）的中派主義，與俄國（托洛茨基等）的中派主義的鬥爭。這一點甚至布爾塞維主義底仇敵也不能否認。這是定理。而你們把我們拉向後退，企圖把定理變為尚須『繼續攻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呢？或者是因為不知道布爾塞維主義底歷史？或者是為着腐敗的自由主義，要使斯路茨基和托洛茨基其他的信徒不得埋怨人家不給他們以說話的自由？好奇怪的犧牲布爾塞維主義底切身利益的自由主義……

究竟編輯部認為斯路茨基底論文中有什麼值得爭論的東西？

一、斯路茨基說列寧（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採取斷絕和分裂的路線。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斯路茨基這個托洛茨基主義的提綱。但是這裏有什麼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簡直誹謗列寧，誹謗布爾塞維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誹謗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為爭論底對象。

凡是布爾塞維克（倘若他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列寧遠在大戰之前，大約從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起，那時俄國剛形成了布爾塞維克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初次顯露，——這時列寧就已決定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並在那裏與「第二國際」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線。凡是布爾塞維克都知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布爾塞維克在那時候（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就已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隊伍中間獲得了「分裂者」和「破壞者」的頭銜。但是，倘若社會民主黨左派在「第二國際」首先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面，自己還是很薄弱和沒有努力的派別，組織上尚未形成，思想上尚未鞏固，甚至還害怕說出「斷絕」、「分裂」的字眼，那末，列寧又能怎樣？布爾塞維克又能怎樣？不能够要求列寧，要求布爾塞維克從俄國替左派造成西歐黨內的分裂。我更不必說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薄弱，不僅是社會民主黨左派戰前時期的特點。大家都知道，左派這個缺點就在戰後都還保存着。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在大戰開始兩

年多以後，寫了一篇論尤尼烏斯底小冊子（尤尼烏斯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首領盧森堡），這篇著名的論文對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有了估計，列寧在這裏批評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說到『德國一切左派底弱點，就是他們還被考茨基底虛偽，學究氣和對機會主義者的「友善」所籠罩着。』他說『尤尼烏斯尚未完全脫掉德國的，甚至害怕分裂，害怕說出激底的革命口號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環境」。』

在「第二國際」一切派別中間，俄國布爾塞維克依自己組織上的經驗和思想上的堅定是當時唯一能與自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堅決分裂的派別。

所以如果斯路茨基甚至不企圖證明，而只是簡單地設想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沒有利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來與機會主義者（普列哈諾夫、馬爾托夫、唐恩）分裂並驅逐中派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其他「八月聯盟」底擁護者）——那末，關於列寧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和布爾塞維克底布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尚有爭論的餘地。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斯路茨基之流連提都不敢提到這種無理的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間與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者採取了堅決的分裂政策，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這些事實會起來反對這種設想。他們所以不敢，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第二天就會受衆人的唾罵。

試問一問：俄國布爾塞維克遠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如果不同時決

定與「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的路線，他們能否與本國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的調和派實行分裂？

誰能够懷疑，俄國布爾塞維克曾經認爲自己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政策是西歐左派政策底模範？誰能够懷疑，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曾經竭力推動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與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斷絕和分裂呢？要是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尚未成熟，不能效法俄國布爾塞維克，那就不是列寧和俄國布爾塞維克底過錯了。

二、斯路茨基責備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說他們沒有堅決地和不屈不撓地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左派，說他們祇在嚴格的附帶條件之下幫助了它，說小組織的關係妨礙了他們澈底幫助左派。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無根據和完全捏造的責難。可是這裏有什麼可以爭論的東西呢？斯路茨基在這裏玩手腕，妄行責備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藉此來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上實際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麼？布爾塞維克正因德國左派在布爾塞維主義和孟塞維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所以如果要幫助他們，便一定要有嚴格的條件，嚴格批評他們的錯誤，否則便是背叛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狡猾的手腕須要加以咒罵，而不要將它變成爭論底對象。

是的，布爾塞維克祇是在一定的，嚴格的條件之下幫助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同時批評他們半孟塞維克的錯誤。但這正要歡迎，而不應加以責難。

有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呢？

我們現在看一看歷史上更顯著的事實。

(一) 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徵收黨員的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布爾塞維克關於黨員資格的提案，想在組織上限制非無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因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非無產階級分子混進黨內的危險，當時非常嚴重。俄國的孟塞維克則堅持相反的立場，對非無產階級分子大開入黨之門。因為俄國革命的問題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重要，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決定參與這個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左派領袖怕吾斯和盧森堡也參與了這個問題。怎樣呢？他們兩個人都反對布爾塞維克。大罵布爾塞維克為極端集中主義和布朗基的傾向。後來這些卑鄙的和市僧式的語句被孟塞維克利用而散佈於全世界。

(二) 一九〇五年，俄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關於俄國革命性質問題發生了分歧。布爾塞維克堅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工農聯合的思想。布爾塞維克斷言，必要達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鄉村貧農援助的保證之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伊國的孟塞維克否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領導權的思想，否認工農聯合的政策，他們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採取妥協的政策，宣佈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是反動的布朗基主義者的觀點。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怕吾斯和盧森堡對於這個爭論的態度怎樣呢？他們提出一種烏託

邦的和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的公式（不正確地演繹馬克思的革命公式）充滿了孟塞維克否認工農聯合政策的精神，並把這個公式和布爾塞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公式相對立。後來，這個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論的公式又爲托洛茨基（馬爾托夫也部份地）所抓住，而變爲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三）大戰時期「第二國際」政黨前面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被壓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解放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問題與帝國主義鬥爭道路的問題，推翻帝國主義之道路的問題。布爾塞維克爲着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包圍帝國主義起見，提出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援助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底解放運動的政策，並發揮了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革命及解放運動統一戰線的觀點。因此各國機會主義者，各國社會國家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就團結起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將布爾塞維克當作瘋狗似的攻擊。當時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站了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塞維克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排斥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自決（直到脫離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的原則，他們反對關於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具有嚴重革命意義的提綱，他們反對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有締結統一戰線可能的提綱，並把這一個一貫輕視殖民地民族問題的，半孟塞維克的東西拿來與布爾塞維克底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相對立。大家都知道，這種半孟塞維克的東西後來爲托洛茨基所抓住，並用來作爲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這是世人共知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錯誤。

我更不用講到德國左派其他的在列寧的文章中所批評過的錯誤。

同樣更不用講到他們估計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時期的政策時所犯的錯誤。

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在戰前的歷史中所犯的這些錯誤，難道不正是證明社會民主黨左派雖然左傾，可是還未脫出孟塞維克的思想麼？

自然，德國左派不僅有嚴重的錯誤。他們還有很大的和嚴重的革命事業。比如在對內政策問題上，尤其是在選舉鬥爭問題上，在國會和國會以外的鬥爭問題上，在總罷工，戰爭，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有許多的功績和革命的言論。正因為如此，布爾塞維克才認為他們是左派，並且幫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但是，這並沒有消滅，也不能夠消滅這個事實：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自己同時帶有許多極嚴重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錯誤，他們尙未脫出孟塞維克的觀點。因此還需要布爾塞維克方面極嚴重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評判一下，要想不背叛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想不背叛革命底利益，要想不背叛共產主義，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能否不帶嚴格的附帶條件，對他們的錯誤不作嚴格的批評，就來幫助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呢？

斯路茨基拿他應該歡迎（如果他是布爾塞維克的話）的地方來非難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主義

豈不顯然是澈底揭破自己是半孟塞維克，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嗎？

斯路茨基竟推測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對西歐左派的估計是以自己小組的關係爲出發點，這就是說，俄國布爾塞維克爲着自己小組的利益而犧牲世界革命偉大的事業。難道還需要證明，這種推測比什麼都更卑鄙醜惡。再沒有比這更卑鄙的了，因爲甚至孟塞維克中間那些毫無廉恥的人都開始了解：俄國革命不是俄國人底私事，恰巧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底事業，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再沒有比這更醜惡的了，因爲甚至「第二國際」底那些專門造謠中傷的人也開始了解：布爾塞維克澈底的和革命到底的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模範。

是的，俄國布爾塞維克，第一步就提出了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如關於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國會的和國會以外的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自決，關於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關於援助這種運動的政策等等的問題。他們提出了這些問題作爲檢驗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是否有這種權利呢？不僅是有這種權利，並且應當這樣做。他們之所以應當這樣做，因爲所有這些問題同時就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布爾塞維克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策略也就是服從於世界革命之任務的。

所以應當這樣做的，是因爲祇有這些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第二國際」各種派別底革命性。試

問，這裏俄國布爾塞維克底「小組織性」在什麼地方，這與「小組織的」作用又有什麼關係呢？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在自己做什麼的小冊子上寫道：「歷史在我們的前面提出了一個極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各國無產階級一切急迫任務中最革命的。」「實現這個任務，不僅破壞歐洲的而且破壞亞洲的反動勢力最強大的基礎，將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出版以來，已經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時期的事變完全證明了列寧底話之正確。但是從這裏難道不應當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現在仍是）世界革命底樞紐嗎？不應當說，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會是（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嗎？

祇有根據這樣的根本問題才可以真正檢查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革命性，這難道不明顯嗎？把這些問題看作「小組織」問題的人們，——豈不顯然澈底揭破自己是卑鄙腐化的人嗎？

三、斯路茨基說還沒有找到充分的正式文件足以證明列寧（布爾塞維克）堅決地和不調和地作了反對中派主義的鬥爭，他拿着這種官僚式的提綱作爲強固的理由，來證明他所謂列寧（布爾塞維克）輕視了「第二國際」中派主義底危險。你們想舉行爭論來反對這種毫無意識的廢話，反對這種卑鄙的巧言。可是，這裏有什麼值得爭論的東西呢？難道不明顯：斯路茨基藉口於文件掩飾自己的所謂立論的拙劣與虛偽麼？

斯路茨基認爲現有的黨的文件還不夠。爲什麼根據什麼？難道所有關於「第二國際」方面，以及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鬥爭方面衆人皆知的文件，尚不足以明顯地證實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在他們反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鬥爭中的革命的不調和性嗎？斯路茨基是否看過這些文件？還需要什麼文件？

我們就假定除了已經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了一堆其他的文件，例如布爾塞維克再次論及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案。但這種紙上文件的存在，難道就足以表示布爾塞維克中派主義真正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不調和性嗎？除了不可救藥的官僚之外，誰能祇是根據紙上的文件？除了書齋之外，誰不懂得審查政黨和首領，首先要根據他們的行為而不祇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在任何革命的決議上都可以簽名以避免批評。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執行了這種決議。其次，歷史上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竭力要求其他國家的工人政黨幹出最革命的行動。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在自己黨內，在自己本國，不在機會主義者面前，不在資產階級面前屈節逢迎。列寧不是正因此而教訓我們審查革命的政黨，派別和領袖，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為麼？

倘若斯路茨基真的想審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對中派主義的不調和性，他應該不以個別的文件和二三封私人的信件爲自己論文底基礎，而要根據他們的行為，根據他們的歷史，根據他們的動作來檢查布爾塞維克，這難道不明顯麼？難道在我們國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沒有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麼？難道布爾塞維克沒有與所有這些派別進行堅決的和調和的鬥爭麼？難道這些派別在思想上

和組織上與西歐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沒有聯繫麼？難道布爾塞維克沒有克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這種克服，世界上更有那個左派做到了？有了這些事實以後，怎樣可以說列寧和布爾塞維克輕視了中派主義底危險呢？爲什麼斯路茨基抹煞這些對於批評布爾塞維克有決斷意義的事實？爲什麼他不用更可靠的方法，根據他們的行爲，根據他們的行動來檢查列寧和布爾塞維克呢？爲什麼用不可靠的方法，在偶然彙集起來的紙堆中去尋找呢？

因爲利用更可靠的方法，根據他們的行爲來審查布爾塞維克，則斯路茨基底整個立論立刻就會倒台。

因爲根據他們的行爲來檢查布爾塞維克，就會表示布爾塞維克是世界上澈底撲滅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並將他們驅出黨外的唯一的革命組織。

因爲一講到布爾塞維克真正的行爲和真正的歷史，這就會表現斯路茨基的導師——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在俄國培植中派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派別，他們爲着這個目的，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如「八月聯盟」作爲中派主義底主幹。

因爲根據行動來檢查布爾塞維克，就會完全揭破斯路茨基是我黨歷史底僞造家，他企圖誣蔑列寧及布爾塞維克，說他們輕視了中派主義底危險，這樣來掩飾托洛茨基主義底中派主義。

編輯同志們，斯路茨基和他的論文底問題就是這樣。

你們看，編輯部允許與我們黨史底偽造家舉行爭論，這是犯了錯誤。

編輯部爲什麼會走上這條不正確的道路呢？我想，它之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爲現在腐敗的自由主義在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中間有相當的流行。有些布爾塞維克這樣想：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底派別，固然是錯誤的派別，犯了不少愚蠢的錯誤，甚至有時犯了反蘇維埃的錯誤，但總還是共產主義底派別。由此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托洛茨基那樣的思想家就發生相當的自由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採取這種觀點，其深刻的錯誤和害處是無須再加以證明的。實際上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底派別了。實際上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的先鋒部隊。

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以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上的武器，如在我們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提綱，如布爾塞維克必然腐化等等的提綱呢？這個武器是托洛茨基主義供給他們的。蘇聯境內一切反蘇維埃的集團都引證托洛茨基主義關於我們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關於蘇維埃政權必然腐化，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恢復的著名的提綱，作爲自己必然要與蘇維埃政權作鬥爭的根據，這件事實決不是偶然的。

誰供給了蘇聯境內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發動的嘗試？這個武器是企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反蘇維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義

者供給他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行動振起了資產階級底精神，幫助了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底危害工作，這是事實。

誰供給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組織上的武器，如企圖建設秘密的反蘇維埃機關？這個武器是組織反布爾塞維克的秘密派別底托洛茨基主義者供給他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反蘇維埃的祕密工作幫助了蘇聯內部一切反蘇維埃集團組織上的形成，這是事實。

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部隊。

因此對托洛茨基主義，雖然是在被打破了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這是近於罪惡與背叛工人階級的昏聩。

所以某些『歷史家』和『著作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廢物偷運到我們的文壇上來，這種企圖應受到布爾塞維克底堅決的打擊。

因此不能容許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舉行爭論。

我認爲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家』和『著作家』現在企圖經過兩條路線來進行自己的偷運事業：

第一、他們企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輕視了中派主義的危險，這裏使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祇有在大戰之後，當他在托洛茨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

以後才成爲真正的革命家。這類偷運家標本式的代表就是斯路茨基。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像斯路茨基及其同流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長久周旋的。

第二，他們企圖證明，列寧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這裏使沒有經驗的讀者可以這樣揣測：列寧在那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祇有在大戰以後，當他在托洛茨基底幫助之下『改換武裝』以後，他才開始了解這個轉變之必要。這類偷運商的標本式的代表就是聯共簡史的作者瓦羅瀉維赤的確，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寫道：『我們立刻就開始從民主革命轉變，恰恰是隨着我們底力量程度，隨着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程度，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住在半路上。』的確，這類事實和文件可以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很多，但是列寧生平和行動中的這些事實與瓦羅瀉維赤有什麼相干呢？瓦羅瀉維赤底著作爲的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染色之下偷運自己反列寧的私貨，誹謗布爾塞維克和假造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

你們這裏看到，瓦羅瀉維赤之流與斯路茨基之流是一樣的東西。

這是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底『道路和歧路。』

你們自己都知道把報紙篇幅送給這類『歷史家』以成就其偷運行爲，這不是編輯部底事情。

照我的意見，編輯部底任務，是要把布爾塞維克主義歷史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研究我們黨史的事業推上科學的，布爾塞維克的軌道，並加緊注意力，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及所有其他我黨歷史底

偽造家，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面具。

這一點之所以更需要，因為甚至有些我們的歷史家——我這裏指的是沒有括弧的歷史家，我黨布爾塞維克的歷史家——也沒有免除錯誤。這種錯誤，替斯路茨基和瓦羅滿維赤助長聲勢。可惜，這裏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是例外，在他編的聯共黨史上，雖有它的優點，却也包含着許多原則上和歷史上的錯誤。此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斯達林

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研究黨史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加康諾維赤在紅色教授學院十週年

紀念會上的演講——

黨準備馬克思主義幹部的意義

同志們！你們是為黨底總路綫而鬥爭的堅定戰士，在今天「紅色教授學院」十週年紀念日，你們值得受全黨和中央底熱烈慶賀。（鼓掌）

「紅色教授學院」成了黨內不斷發展的新的理論幹部底先鋒隊。幹部問題，以及理論幹部問題，在黨的工作中開始佔了最重要的地位。這個問題在革命的各個階段上各有不同的提法，然而它始終是黨在消滅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這是因為黨始終反對工人運動中自流的理論和自發的理論，黨始終主張加強先鋒隊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主張在這個先鋒隊裏有系統的進行馬克思、列寧式的準備幹部。從列寧著做什麼的時候

起，至我們的黨（世界上唯一的黨）領導偉大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時期止，我們的黨始終組織先進的工人幹部，始終由工人階級中提起千百新的指導者。

「紅色教授學院」發展歷史中的兩個數目字，明確地表示這種狀況。一九二二年在「紅色教授學院」剛才組織的時候，總共只有六個工人，這六個人等於全體學生百分之六。

而現在呢？現在「紅色教授學院」中有一千零二十二個工人——佔百分之六十（不斷的鼓掌）

我們黨與別的政黨不同，有史以來就遵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能用辯證的方法將理論和革命運動的實際具體的結合為一。斯達林同志在他的列寧主義底基礎一書中顯明的說明了馬克思、列寧理論的意義。他說：

『理論是各國工人運動經驗底綜合。自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系起來，它就變成了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的指示，它就變成了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的形成能和革命的實際親密地聯系起來，它就可以變成工人運動的偉大力量。因為它，而且祇有它能够幫助工人運動以堅信，方針以及對週圍事變的內部聯系的了解。因為它，而且祇有它能够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現時各階級如何並向何方進發，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它們應當如何並向何方進發。』（列寧主義問題，上卷，八六頁）

我們幹部的理論準備，始終充滿了重大的政治內容。譬如列寧在龍壽姆所組織的老的布爾塞維

克的學校，將這個學校的經驗和波格達諾夫（召回派人）在加普利島上所組織的學校可以相比較。兩個學校，兩種課程大綱，兩種造就幹部的的方法。在加普利島上波格達諾夫的學校裏邊，佔重要位置的課程大綱是：社會思想史，藝術史，俄國文學史，俄羅斯教會與國家；在列寧底學校內，其課程大綱是：土地問題，社會主義底理論和實際，工人立法。在那裏是藝術史，在這裏是社會主義底理論和實際；那裏是俄國文學史，這裏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那裏是俄羅斯國家和教會，這裏是工人立法。

拿這兩個課程大綱一比較，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布爾塞維克，列寧能在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的基礎上提出革命底基本問題。所以由列寧的學校內出了幾位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這並不是偶然的。「紅色教授學院」應該是我們黨的造就幹部的工作，造就馬克思、列寧、布爾塞維克理論戰士的工作之繼續與發展。這自然不是說可以保證每個紅色教授將來都是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笑聲）

「紅色教授學院」開始的時候是個準備教授的學校。因黨的任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之發展，準備幹部的性質也隨之改變。試回想一九二一年的時期。那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在我們大學中開老的資產階級教授活躍起來的時期。那時在我們的大學裏邊，這些資產階級教授底大部份底情緒都很惡劣，並且他們無論在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他們進行反對我們的動作。他們——其中在政治上最積極的分子——宣傳了改變方針派的理論，準備了蠱惑的思想和實際。

教務擴大了，一般的文化發展首先就要創造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教授人材。因為一二十個布爾

塞維克教授幹部，已經不能滿足我們黨的要求；黨已經成了當權的黨，領導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國家。

從此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底發展，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各方任務底複雜化，「紅色教授學院」已經開始準備社會主義經濟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在蟲賊擾亂的時期，在階級鬥爭加緊的時期，當國家機關裏藏有蟲賊而右傾的人不願意——照他們的立場，實質上他們也不能够——與他們鬥爭的時期，對於這種幹部的需要特別迫切。在沙河金事件的時候，斯達林同志已經十分決斷地提出了準備新的幹部問題。

在這方面，現在我們無條件地有了成績。我們切實在全國的廣大範圍之內進行解決幹部問題。我們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員在高級技術學校，高級學校，專門學校裏邊學習。現在我們已經有些機關，其中大多數的專門家是共產黨人。譬如人民土地委員會，其中幾乎一半的專門人材是共產黨員；在二百六十個專門家中，有一百二十六個是共產黨人。然而我們還不能過於看重我們的成績。我們應該堅決實現斯達林同志在他的六個指示中所提出的任務。除了會利用好的老專門家以外，我們還應該有系統地天天去用新的幹部補充舊的幹部，用我們無產階級新輩專家代替老輩。

在「紅色教授學院」方面，除了準備教授訓育家以外，同時也要準備無產階級國家的建設家與工作人。

教授訓育家底作用非常之大。我們應當依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提高我們教務底質量。這裏教授底

作用特別偉大。列寧在他致加普利烏那個學校學生的信中，會特別嚴格指出教員底作用。他寫道：

『一切學校裏邊，最重要的是教課底思想政治的方向。什麼東西決定這種方向呢？完全和絕對由教員成分決定。同志們，你們都很了解，任何「監督」，任何「領導」，任何「課程大綱」和「規則」等等，所有這些東西同教員的成分比較起來都是空話。無論怎樣監督，無論那種課程大綱都絕對不能變更由教員的成分所決定的學習方向。在世界上，無論何時何地，無論那個自重的團體，黨團和小組，要是一個學校，其方向已爲教員成分所預先決定了，而這種方向是敵異的，則它決不肯替這學校分擔責任。』（第十四卷，一一八——一一九頁）

列寧所寫的這封信，是反對加普利烏上教員底成分的，然而這點並沒有減輕，反而加強了這封信對於現在的意義。

有些人以爲只要著了書——我們國內著書常不正確——寫了課程大綱，或者像現在最時髦的說法，寫了『研究方法』以後，就足以保證教育底方向。這是很深的錯誤。所以，同志們，我們應當十分嚴厲指出必須要繼續擴大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準備教員的工作，必須繼續發展爲教育質量的鬥爭。

準備幹部事業上的理論和實際爲教學底黨性而鬥爭

學習必須與實際工作相聯系。我們應當盡量擴大和改善生產的實際工作。我們準備幹部，特別是在紅色教授學院中準備幹部，應該和國家機關，蘇維埃機關和黨的機關底工作相聯系，應該和經濟機關及各個人民委員部內的實際工作相聯系起來。

整個「紅色教授學院」其中所有的各系（交通、計劃、農業等）都應該這樣做。假若農業專家不和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實際密切聯系，假如他不會用自己的學識來歸納豐富的實際經驗，分析和歸納這種經驗，深深地按照列寧主義的精神了解實際底辯證律，就不要想在「紅色教授學院」中造成很好的農業專家。

世界上從來沒有像我們國家所有這樣的實驗場、實驗室，可以使得學生能在實際上檢驗自己的學識。

每個紅色教授，每個學生都應該會歸納實際，把實際提到理論程度，將理論充滿實際生活。譬如討論交通上的困難問題，我們在去年找到了無人負責制；我們指出了主要的劣點在於車頭的無人負責制。當時設了法，開始力謀實行雙班制，結果改善了交通事業。

既然黨為解決交通問題而鬥爭，則我們的科學幹部，「共產主義學院」和「紅色教授學院」應該順着已經開拓了的道路去尋找如何幫助黨繼續恢復交通的方法。

經過了半年以後，黨找到了第二個劣點——車箱的無人負責制。然而假若科學的工作人員，倘若

科學幹部，尤其是「紅色教授學院」中的交通科開始研究了健全車頭的經驗，尋找和歸納交通上的實際，它一定可以免掉其他的臨時事務，它一定能够按時找到車箱的無人負責的毛病。

這是學習底一種最重要的形式。只有這樣，才能够組織真正的學習。

紅色教授應該專門化，然而每個紅色教授都是黨員，布爾塞維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絕對不能這樣做，絕對不能以為他是準備由經濟學者，他應該只研究經濟學，他準備成爲哲學家，他的事情只是講哲學。我們要反對這種『專門化』。

馬克思、列寧一致教育底組成部份，有不可分離的聯系，自然專門化是有的並且是需要的。每系裏面應當規定以什麼爲出發點，主要的應研究什麼——規定這種基本的東西。然而專門化不應當達到謬妄的地步。不要忘記，所有這些專科在生活上彼此互有影響，彼此之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系。

黨要求在理論工作上，要有具體出發點和顯明的目標。黨進行鬥爭反對理論與實際的分離，作兩條戰綫上的鬥爭，一方面反對狹隘的實際主義，另一方面反對學院主義及形式主義。同時黨要求理論幹部加深研究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與實際，理論與實際要有密切的聯系，使理論的學習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任務相連貫起來。

紅色教授既準備擔任指導人，訓育人的職責，就應該實行自我訓育。你是指導人，旁人的訓育人，但不能担保自己不犯錯誤。所以紅色教授應該有系統的實行自我批評。應該說，近幾年來在我們共產主

義的科學戰線上擴大和加深了自己隊伍內部的自我批評。

在科學的戰綫上發現了很多有害的『系統』和『小系統』，很多重大的政治錯誤和深刻的原則錯誤。在政治經濟上有魯賓主義，在哲學中有傾向孟塞維主義的唯心主義和機械主義，在法權學和國家學中也有很多的錯誤，末了，在文學中間有各種有害的『理論』（培利維爾塞夫主義）。在這些理論戰線上，到處都發現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

可以直接說，國家計劃局中的格洛曼主義和經濟科學中的魯賓主義，彼此之間是有聯系的。一派是企圖在編計劃時混亂大局，另一派企圖使我們共產黨員的經濟學家脫離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使他們專心從事於公式的抽象爭論，這種公式，在外表面上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而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

經濟脫離政治，是資產階級理論家及其法西斯蒂走狗最顯著的特點。

譬如早已被揭破的馬克思主義敵人考茨基，在他最近著的唯物史觀一書中（第二卷，五七八頁）（我們印書館對這本書出版得非常沒有道理，既沒加序言，又沒加批評）寫道：

『兩個對敵的階級如何可以同時不但絕對的加強了，並且相對的加強了呢？這種表面上
的矛盾之解決，在於這兩個階級經常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區域內發展。資本家底力量不斷的
在經濟方面發展，而無產階級底力量則在政治方面發展。』（大笑）

托洛茨基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理論的宣傳也不亞於考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一書中（一四一頁）他說：「一個國家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成熟的，但是另一方面則不懂對於獨立建設社會主義，連對於實行廣大的社會化也絕對沒有成熟。」換言之，政治在無產階級手中，經濟在資產階級手中。

在反對馬克思、列寧的經濟和政治底一致中，考茨基和托洛茨基觀點底完全一致，便是如此。在我們的黨反對各種曲解和各種傾向的鬥爭史上，曾有過這種把經濟和政治脫離的企圖。

譬如拿經濟主義來講。經濟主義底錯誤底實質在那裏呢？崇拜自發性，崇拜經濟發展的自流，忽略政治的上層建築和它反轉來對於經濟的影響。這是很早以前的。右傾呢？右傾錯誤底實質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底改造作用而主張自流。當時的經濟主義和現在的右傾，他們的基礎都是把政治和經濟分裂和對立起來。

譬如關於工會的爭論，你們可以見到列寧底對手底錯誤，其實質在於不懂經濟和政治的辯證式的一致，或者像列寧所說的，在於「忘記馬克思主義，對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有一種理論上錯誤的，折衷式的觀念。」（第二十四卷，一二七頁）

所以我們應該在「紅色教授學院」裏，在一切的科學戰綫上，教務上要多多的充滿黨性，學會新的領導方法，能在每個理論提綱裏邊找到他對於目前迫切問題的應用，了解實際中的矛盾一致，這矛盾一致律翻譯成爲我們的普通政治的語言，又是什麼意義呢？了解實際中的矛盾一致，這

就是不怕困難。這是不怕在我們的道路中所發生的生活上的矛盾，而是要以布爾塞維克的精力和毅力克服它們。這也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本身含有被克服的可能性的。這就是說，我們困難底特點就在於它自己成爲克服它們的基礎。』（斯達林在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

須要將這個可能性變爲實在性，須要動員所有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走向勝利，幫助這個客觀的可能性迅速些和優良些化成實在性。須要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學會擇取黑格爾的學說對於我們所需要的，對於我們鬥爭所需要的。特別要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研究過去的歷史，去研究昨天的歷史，使這種昨天的歷史和黨的總路線，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或將要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聯系起來。這是教務黨性底實質，這是馬克思、列寧教育的意義，要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爲這點而鬥爭。

馬克思、列寧的教育和黨史

黨史中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

現在我們處在新任務的前面，在我們最嚴重的部門中——在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史中，斯達林同志揭露出最有害的曲解和最愚頑的錯誤。斯達林同志在他的信中將黨史問題，研究黨史的任务問

題特別提得很高。我們的黨史，是無情的反對脫離澈底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種傾向鬥爭史。我們的黨大大發展了。它在無情的和堅決的反對各種傾向反對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鬥爭中發達起來了。近十年來這種爭論是對於黨的政策中的基本問題和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中的主要問題的爭論。關於通常的政治和實際的爭論，一向是理論上的爭論。這些爭論底出發點，一向是理論上的分歧。實際錯誤底基礎是在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而鬥爭，在現在所以絕對和非常緊迫，是因為我們黨內有二百五十萬黨員，並且其中有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人只有三、四、五年的黨齡，此外我們還有五百五十萬的少共。由此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是關於千百萬人的問題。此地既是數量的問題又是質量的問題，因為這件事體是世界史中最革命的，理論上最澈底的和最紀律化的政黨底黨員問題。

如何去教育這數百萬的新輩呢？如何將他們鍛鍊成爲堅定和老練的列寧主義者呢？

我們要廣大地提出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問題。須要如何按照布爾塞維克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呢？不應該用小學教授的觀點，不應該形式的和機械的提出這個問題，而是要用革命的和布爾塞維克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對於黨史研究的態度有人時常形式的，或者多少是誠實的按着年代紀實，敘述其中個別的事實，多少正確地描寫單個的事變，然而這些事實和這些事變中間的聯系却没有表現出來。必須要辯證式地研究黨史，必須要了解發展定律，必須要繼續加緊注意主要問題和基本

問題，加緊注意我們的革命底緊要階段。

我們應該教育黨員和團員，我們應該喚起工人階級新的更新的階層，教育他們研究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史。這個歷史不是像很多的歷史家形式家所想像的那種既往不復返的古代史。我們的全部歷史，是我們階級最優秀的最先進的分子為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消滅階級，為共產主義的英勇鬥爭的綱領，戰略和組織。

我們國家在過去認為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而現在我們的國家（佔全球的六分之一）是社會主義國家，這點使我們要感激無產階級布爾塞維克綱領，戰略和組織，感謝我們黨的綱領和指導。這點我們要感謝我們黨內以列寧為首的優秀人士在幾十年以來的英勇鬥爭；反對民粹派，反對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經濟主義者，反對托洛茨基派，反對少數派，反對黨內的右派及調和分子。所以按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教育我們的青年沒有比我們的黨史更好的經驗和更好的武器。

因此所以斯達林同志特別嚴格地看重黨史中所犯的最有害的曲解和最重大的錯誤。

他在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揭穿了託洛茨基主義的謬蔑式的曲解黨史的企圖，愚頑的曲解列寧主義史，謬蔑列寧，在廣大的黨員及少共面前這樣的描寫，說列寧在革命以前還不是布爾塞維克。

斯路茨基這類的可憐的歷史家底罪過是企圖將事件描寫為這樣：在革命以前列寧曾放鬆第二

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中派，也就是沒有真正的反對他們，有些時候列寧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謂社會民主黨左派（盧森堡等人）幫助得很少和完全沒有幫助。

這類的可憐的歷史家中有一個米龍諾夫，他是「紅色教授學院」底畢業生，曾任「共產主義教育院」（很大的學院，其中有兩千餘黨員）副院長的職務，他寫道，在大戰以前，布爾塞維克們沒有反對考茨基，因為當時他們認為考茨基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列寧主義史這種的曲解和假造還值得反駁麼？

只要把列寧和馬爾托夫、阿克爾雪洛特、蒲列哈諾夫鬥爭的歷史（從一九〇三年起到托洛茨基止）思考一番，就可以了解列寧比任何人都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當然中派也在內。他首先就是揭破俄國社會民主黨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同樣，也就揭穿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中派，考茨基派。列寧始終反對和咒罵機會主義者，這些人只是對於遠方是「革命的」，他們揮起紙劍反對遠方的敵人，而對於本國的最接近的敵人就投降。他反對自己周圍的修正主義和調和主義，同時也就是反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一切的修正主義和調和主義。

因此列寧並不是無條件地幫助了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究竟是怎樣的人呢？盧森堡和怕吾斯等究竟是怎樣的人呢？當時他們是否是像列寧像俄國布爾塞維克那樣左呢？是否是像列寧、俄國布爾塞維克那樣徹底呢？是否可以稱他們為布爾塞維克呢？只要對於歷史事實有

最淺顯的，誠懇的認識，一定可以無疑義地說，列寧以及一般的俄國布爾塞維克，是戰前第二國際中唯一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不是布爾塞維克，他們始終是動搖於布爾塞維主義與孟塞維主義之間，並且時常與孟塞維克派接近，與中派接近。

列寧和布爾塞維克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幫助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以及盧森堡。爲什麼呢？因爲列寧在他的全集中所指示出來的和現在斯達林所指示的，盧森堡對於很多的基本問題——組織問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和所謂不斷革命問題——與布爾塞維克分歧，與中派接近。她與托洛茨基派，與托洛茨基很接近，托洛茨基在當時是真正的中派，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二年他組織了中派的八月聯盟。

托洛茨基在當時是中派，結果怎樣呢？現在他的中派主義變成了反革命主義。他在過去是中派，現在就和以往的中派考茨基一樣的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進戰士之一。中派人托洛茨基底命運，和中派人考茨基底命運是一致的。

自然盧森堡有過很大的功績。在歷史上她的姓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殺害了的解放德國工人階級的戰士。這是無疑義的。然而這是否就是說我們可以不管歷史真理底要求，假造歷史，在事後抹煞和遮蓋盧森堡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過去錯誤呢？自然不是的。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的黨團會議上有拉狄克同志底講話。他承認了他的一些錯誤，他承認盧

森堡並不是一向站了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立場。然而他沒有將他和盧森堡共事的時候的錯誤立場和以後他與托洛茨基同謀的時候的錯誤立場聯系起來。他發表了一種理論，說盧森堡是優秀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過到我們這邊來的橋樑，因此要輕輕批評她。第一，這種理論是不正確的；工人過到我們這邊來並不一定要經過盧森堡的橋樑。第二，凡是還與這種橋樑相聯系的工人，應該知道社會民主黨左派底錯誤，好在這種錯誤的基礎上學習以成爲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如不然，假如你抹煞盧森堡底錯誤，則這個橋樑就是走向社會民主黨的橋樑而不是走向共產主義的橋樑。假若你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揭破盧森堡底錯誤——這就是工人從社會民主黨的錯誤走向布爾塞維克的橋樑。這是布爾塞維克應有的問題提法。而拉狄克同志沒有講得透澈。這大概是他自己還沒有完全說明清楚；他或者是盧森堡與托洛茨基間的橋樑，或者是曾經照一般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道路走過從盧森堡到托洛茨基的橋樑。（大笑）

斯路茨基那篇文章底意義在那裏呢？在於這篇文章是表現在戰前社會民主黨左派底旗幟之下，在盧森堡底旗幟之下扯出托洛茨基主義的穢物的公開企圖。這是斯路茨基文章底意義——這是現代局面很特別的現象。這篇文章的著作是偶然的或者不是偶然的——這點沒有什麼意義的。斯路茨基本身是個很小的在政治上值不得多講的人物。這個人曾經長期是少數派，以後就在黨外，只有在一九三〇年才是本黨的候補黨員。這個人一當了候補黨員以後，有了可能作文章反對列寧，譏蔑列寧輕

視中派的危險，責備列寧沒有澈底幫助接近托洛茨基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所以，當時他（列寧）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假若我們在此地慎重地分析這個誹謗的胡言亂語，我就未免過於看重了斯路茨基。只要斯達林附帶的寫了幾筆，就將他這種胡說打得粉碎。這裏問題甚至不在於斯路茨基發了誹謗的胡言亂語。而在於在布爾塞維克的雜誌裏邊竟然有了登載斯路茨基胡言亂語的篇幅。問題在於有些共產黨員對於懷着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作家表現了腐敗的自由主義。托洛茨基在他的可恥的傲慢的小冊子我的生活當中，將自己描寫成了革命的中心人物，至於他早已轉到反革命的營壘去了，他就不談了，這並沒有什麼特別，因為破產家亡命徒除了傲慢自誇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安慰自己呢？當斯路茨基在他的文章當中企圖利用盧森堡底旗幟將托洛茨基主義的穢物託到我們的刊物上來，這也沒有什麼特別；因為被打得粉碎的托洛茨基派，除了用偷運的方法以慰安自己外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然而布爾塞維克雜誌無階級革命竟可以將它的篇幅讓給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時候——這已經不是小的現象了。這就是說在我們的隊伍裏邊，還有人對於脫離布爾塞維克的傾向，對於黨的曲解，抱腐敗的自由主義的態度。這就是說在我們的隊伍裏邊還有人因為頭腦不清，爲了他的腐敗自由主義，準備無意地去幫助托洛茨基主義的偷運家來假造布爾塞維克主義史。

所以同志們，我認爲反對我們隊伍中的腐敗自由主義，是反對假造和曲解黨史的鬥爭之組成部份。

列寧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和歷史家

底錯誤

可惜，無產階級革命雜誌還不是我們唯一的弱點。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著的聯共黨史是更薄弱的地方。耶魯斯拉夫斯基是四部聯共黨史的總編輯，犯了很多的重大的錯誤，他給了他彙集的青年歷史家（其中有些歷史家可以加上括弧）行動的自由，他不但沒有阻擋他們曲解黨史的企圖，並且允許他們出版，自己簽名贊助他們。

此地我不來分析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主編的黨史中的一切錯誤。這些錯誤一部份已經批評過了，無疑義的，這種批評工作還會擴大起來。我只講到其中的幾個錯誤，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他著的『歷史』中，或者正確點說，在他主編的黨史中，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講得不正確，對於列寧的作用和列寧對於俄國革命性質的估計解釋得不對，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特別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對於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問題立場有不正確的說法。

我僅引證聯共黨史第三卷（二〇六頁）巴葉夫斯基的文章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點。這位『歷史家』寫道：『反對沙皇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革命這種客觀的聯系，還在（！）大戰時期，就已經被黨覺悟到了……』你們看他很客氣地恭維列寧和黨，說『還在』大戰時期他們就已經領會了這種聯系。按照思想深奧的『歷史家』底意見，這個聯系底表現，因為大戰的結果，列寧從新提出俄國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種聯系之表現於準備改換戰略計劃。

試問這點和托洛茨基著名的改換武裝論有什麼分別呢？

實質上沒有什麼分別。

在第二卷內你們可找到很多錯誤，非常不正確的估計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立場，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精神解釋列寧關於轉變的立場。

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所編的黨史中關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作用之錯誤估計……否認列寧在當時主張轉變，這必然要弄到對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第一個階段的作用，作出錯誤的和有害的估計，弄到誣蔑布爾塞維克。現在有些『歷史的』狡猾家，如克恩這種『歷史方面』的形式主義者，企圖這樣來說明問題：『同志們，我是擁護黨和擁護中央的；我只寫了很小的一頁，請你們自己來判斷——我算什麼罪人呢？』這些人將問題弄成小小的一頁，這只是表示他的無識無知，表示他們在歷史方面和理論方面的可憐。請想一想，難道問題是在小小的一頁嗎？須要知道，只要稍微懂一點歷史，就可以看出耶魯斯拉夫斯基所主編的黨史對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作用估計的錯誤和托洛茨基對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三月的作用誣蔑的估計的聯系。

樸泡夫同志也這樣曲解我們的黨史，曲解列寧底立場。他也是以非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曲解列寧對於轉變問題的立場。爲了要鞏固他的觀點，他在編輯列寧選集的時候，沒有將列寧關於轉變問題最

重要的一篇文章選在裏邊。這是列寧這篇文章內的一段話：

「我們起初用全力徹底幫助一般的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土地，然後（甚至不是然後而是同時）我們幫助無產階級反對一般的農民。誰要是在現時來猜想革命（民主革命）後「第二天」農民內部的力量關係如何——這便是空洞的烏托邦。我們不陷於冒險主義，不違背科學的恒心，不貪求廉價的通俗化，我們只是這樣講：我們以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完成民主革命，使得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因此更容易極迅速地走向新的和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約許：現在的農民暴動勝利以後，就有什麼協調，什麼平均，什麼「社會化」——恰好相反，我們「約許」新的鬥爭，新的不平等，新的革命，這革命就是我們所要從事的。」

（第八卷，一八六——一八七頁）

列寧論我們黨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文章，在樸泡夫同志所編的列寧選集裏邊恰好沒有採納。

爲什麼，根據什麼呢？

問題在這裏：他自己對於轉變問題的態度如何呢？照樸泡夫同志底意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有特別的計劃，就是布爾塞維克以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要經過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果實際上，樸泡夫把托洛茨基的理論代替了列寧的轉變的理論，因此他不須要列寧這篇

文章，而把它拋開了。這樣編輯黨史……

這些歷史家既然犯了托洛茨基主義性質的錯誤，其中反而有些人企圖以『客觀』和『政治適當性』等可憐的廢話來替自己辯護，結果這種的廢話加深了反黨性質的錯誤。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主編黨史底一個著者明茨同志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上關於這個問題的講演，講到第四冊黨史中的錯誤時，他說：『我們不是從政治適當性的觀點上描寫了某個事實，而是從客觀性的觀點上描寫這的錯誤時，他說：』這種客觀性絕對不能說明我們政治史底特性，這種客觀性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餘毒。』

這裏，明茨同志表面上似乎批評資產階級歷史家和他自己已往的錯誤，實際上把『客觀性』同『政治適當性』對立。這樣提出問題，就是恢復了他的老機會主義的錯誤。然而，問題還不只是在科學名稱上所公認的方法論上的錯誤，而是在於明茨同志這樣聲明，想把問題弄成這樣，依他說，我們著名的歷史是好的，客觀的，然而我們不得不爲着『政治適當性』而放棄這個『客觀性』。明茨同志大概忘記了一切的歷史，特別是聯共黨史應該是科學的，客觀的，絕對正確的，不然，歷史就失掉科學的性質而變成神話。

明茨同志這種在理論上不能成立的『新』立場是不值得辯論的。明茨底講演，是一種可憐的企圖，企圖抹煞耶魯斯拉夫斯基所主編的黨史中的錯誤的基本意義。問題正在這裏，明茨著的『歷史』不是客觀的歷史。這裏，基本點，也和第二國際的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的歷史家一樣，用『客觀性』來

遮蓋他的『科學』作品，實際上是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明茨同志和他的朋友也是如此，他的似乎是『客觀的歷史』，實際上是很厲害的『主觀歷史』，幫助黨史的偽造家，誹謗家——托洛茨基派。『客觀的』歷史家在第四冊黨史的序言裏很傲慢的聲明他們努力『得出十分客觀的著述』，用『最高限度的歷史客觀性觀察問題，在全部著作中嚴格地遵守歷史的前途』。雖然他們這樣講和正因為他們這樣講，他們——在耶魯斯拉夫斯基領導下而集合的集團，著了非客觀的歷史，在很多地方是偽造的歷史，染上了托洛茨基主義的色彩。

所以明茨同志白白地詆蔑了他的『歷史』沒有『政治適當性』。政治適當性是有的。然而它是託洛茨基主義的適當性，而不是別的適當性。

無論是耶魯斯拉夫斯基同志所編的黨史，或其他的歷史家所著的黨史他們的錯誤都是非辯證式的，經院式的和形式主義的研究一般的歷史以及我們的黨史的結果。

所以斯達林同志在他的信中特別指出須要與研究歷史的形式——官僚主義態度作鬥爭。假如有些布爾塞維克黨的總路綫的戰士，有時上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當，這大半是因為他們忘却了辯證法，把理論和實際，歷史和政治分裂而對立起來。

正是因為形式地研究歷史事變和事件，形式地同類比較，時常會錯誤地了解黨的策略和鬥爭。譬如一九一七年當政府內有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時期，布爾塞維克提出了『打倒十個資本家總

「長」的口號，人們可以責備我們這個口號不澈底，有時有些可憐的歷史家真正這樣責備我們。然而這個口號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在工人中最通行的一個口號。假若形式的和經院式的看問題，——這是不澈底的口號。然而假如深刻地考察當時環境，——須要使蘇維埃擺脫立憲民主黨人——就會了解布爾塞維克這個策略底精明。

一九一七年在蘇維埃裏邊曾經有一個時期，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人佔大多數。我們要求給這些蘇維埃取得政權。爲什麼我們這樣提問題呢？在革命底最初幾個月，在羣衆中間，廣大的流行了列寧所謂『立憲的幻想』。沙皇推翻了，所有的人都戴了紅帶。很多人不能立刻就解過去所發生的事變，很多人不能立刻就站在爲擴大革命的激烈鬥爭的道路上去，很多人不能立刻就感覺到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底變節。所以布爾塞維克在當時主張將政權轉歸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手中，使得這些老爺們去實行他們的綱領，使民衆看出他們的反人民的面孔。形式主義者不了解這一點，而列寧主義家却懂得。

或者，譬如我們責備克倫斯基政府延緩召集立憲會議，似乎我們布爾塞維克『擁護』立憲會議，然而過了一些時期，我們自己解散了立憲會議。假若用形式主義，學院主義，官僚主義來看問題，則我們是『不澈底的』。然而列寧主義者辯證家却不能有旁的策略，因爲革命要求使羣衆碰到立憲會議的牆壁，當面看到它的無用。

誰若不了解列寧、滿腔鬥爭和勝利的意志，誰就不會了解列寧策略的敏捷活動，不能了解我們的黨史，不能研究黨史以及由它裏邊求得列寧的結論。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而鬥爭時，列寧估計羣衆底情緒，估計他們對於鬥爭的決心和他們對於自己成見的消除，而變更了口號，奪取了這些羣衆，而對於爲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而鬥爭的基本目標，却一步也不離開。

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研究黨史的方法，在這種黨史上教育青年。正是需要這樣的方法，而不是像現在斯路茨基一類的『歷史家』所用的翻亂紙的、腐敗的形式官僚主義的方法。你看，他沒有得到列寧寫過『考茨基——混蛋』這種文件，既然沒有這種文件，所以他，（不久以前崇拜過考茨基也許現在還崇拜考茨基的斯路茨基）現在竟敢謾罵列寧沒有反對中派。爲要考究這種文件起見，他們準備著述成堆的文章，然而他們却不願指明和說明公認的事實：列寧和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是世界上唯一的左派，他將所有的各種中派肅清到底和完全驅出黨外。

這就是模範式的托洛茨基主義少數派的『研究』、『著述』、『說明』、『歷史的』、『方法』。

揭破托洛茨基派的把戲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爲列寧主義爲黨的

總路線而鬥爭

現在這個爲黨爲列寧主義而鬥爭的階段之特點，是托洛茨基主義打得粉粹了，右傾揭穿了，黨的總路線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勝利。我們的勝利是接連不斷的發動機，是接連不斷的工廠，工業品和農業

品的增加，布爾塞維克速度的社會主義之發展。

公開的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之下講話，現在已經困難了，已經得不到羣衆，得不到好處了。須要在旁的旗幟，口號，提綱，公式之下講話。須要對於列寧、布爾塞維克理論的澈底性表示懷疑，以便破壞我們實現黨的總路線的實際。

所以，現在機會主義者企圖混到我們隊伍裏來，他們偷偷摸摸，遮遮掩掩，企圖鑽毛孔，爬穴隙，特別企圖穿過黨史的門徑鑽進我們這裏來。

斯路茨基、阿爾特洛夫等偷運家的『歷史哲學』的意義在那裏呢？我們不能不懷疑這裏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半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和間接企圖影響黨史之研究，影響新黨員和新少共之教育。這是這一個表面上狡猾的實質上愚鈍的歷史機械底實質。這是問題底樞紐。

托洛茨基現住外國。這裏，在蘇聯境內，被我們工人階級所驅逐了的，污壞了的，扯得粉碎的托洛茨基的丟臉的旗幟，已經絕對不能奪取羣衆了。應當要從另一方面悄悄的用『合法的』方法，換一條路去接近羣衆。要利用盧森堡以及任何其他的面面具從黨史的戰線上，工人運動史上去發動。

這些托洛茨基主義的搖旗吶喊的人，他們自己怎樣想呢？好了，你們這些布爾塞維克，你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們忙着去建設馬格尼託古爾斯基的、尼泊洛、新莫斯科、庫斯諾茨克、波布黎克夫，你們忙的是計劃，拖拉機，你們不安的是採煤種麥等事——你們去幹這種事了，我們却來幹歷史，我們準備宣傳，

悄悄爬上前去，凡是不可狡狴的地方，就用愚笨來掩飾，利用某些布爾塞維克底腐敗自由主義，我們嘗試担任自己的事，去教育青年。要注意，他們是根據自己破產首領『志在遠處』的指示去幹的。

所以斯達林同志堅決指出對於所有歷史偽造家，以及託洛茨基派偽造家的腐敗自由主義的危險。

須要思考事實，斯路茨基以前是孟塞維克，一九三〇年的候補黨員，現在在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有了可能來污毀列寧主義，誹謗列寧，並且還可以利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家』這個雜誌的篇幅來做這個勾當。

另一個『歷史家』就是阿爾特爾，是由黨內開除的託洛茨基派，在「共產主義學院」得了講話的機會，你們想想，在什麼地方講話，……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的黨團上討論斯達林同志的文章時講話。而有人客氣的，自由主義式的回答他：『阿爾特爾同志（你看）是不對的，他擁護托洛茨基的偷運事業，他有一點兒錯誤，曲解了事實。』只要看一看這個人底歷史，就不難知道他不是偷運家，而實際上是真牌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貨。（笑，鼓掌）

由黨內開除了的托洛茨基派在共產黨黨團內得到了講台，擁護盧森堡主義，說『盧森堡主義已經和布爾塞維主義混為一體了。』在以前，在一九二七年的時期，他說在一九一八年『盧森堡主義已經變成了布爾塞維主義。』阿爾特爾打起盧森堡主義的旗幟。他——托洛茨基派，現在需要這面旗幟

來作爲掩飾自己的假面目。

每個布爾塞維克立刻應該問：怎麼一回事？問題在這裏，同志們——這是現代的新現象，——托洛茨基派，真正的托洛茨基派，害臊的，面孔發白，發紅，發黑（這句話的意義是直接的和間接的）的托洛茨基派現在已經不能在托洛茨基這個反革命的可恥的旗幟之下講話，這個旗幟現在已經握在無產階級專政最兇惡最狠毒的敵人手中。所以公開的和半公開的托洛茨基主義派打了新的旗幟，盧森堡主義的旗幟，利用被德國社會民主黨所謀害了的盧森堡的旗幟以達到他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目的。

爲的什麼呢？爲的是在這個旗幟之下，企圖用新的方式提出托洛茨基政綱內的問題，企圖重新修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礎。他們想在新的條件之下用新的方式提出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布爾塞維主義，關於轉變，關於改換武裝，關於小組織性等舊的問題。

我們可以遇到這種事實，有人雖然努力想與托洛茨基已往歷史斷絕關係，然而實際上還沒有解說過去的污穢。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會的黨團會議上有拉狄克講話。按照他的講演，共產國際將工人運動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它的隊伍裏來了，他說共產國際不應該忘記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中的那些『支流』小港。拉狄克同志應該了解這種『支流』理論是什麼東西。在實質上這是八月聯盟的思想。那裏當時也想有各種支流，想以後混成一條大河，但是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支流向各方流散了。托洛茨基主義是個臭水池。雖然我們的開鑿河道工作做得很好，雖然莫斯科人要把莫斯科河與窩瓦河鑿

通，然而在政治方面這種開鑿工作是不適用的。這裏支流的理論，機械的連接各個支流是什麼也得不到的。

是的，有各別的社會民主黨左派分子加入布爾塞維克黨，這是對的。然而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打破了他們的傳統，戰勝了他們，打碎他們的錯誤立場以後，他們才來到我們的隊伍裏。拉狄克同志講共產國際却忘記了二十一條。難道二十一條沒有實行麼？難道這不是反對那些還要保持各種支流和立場的分子的武器麼？這裏是否可以講混合聯合？自然是不可以的。拉狄克同志應該知道，支流的理論爲派別自由，小組織自由造成了根據。既然要顧到『小港』就要使它有『小支流』。

不是的，同志們，我們的黨不是同流合污的混水河，而是任何支流所不能阻擋的澎湃的和一體的巨流，因爲他能冲破在他途徑上一切的障礙。（鼓掌）

我們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團結在他的列寧中央的週圍，他一致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中央地位很高，它在工人和集體農民裏邊有絕對的威信，黨，少共，極大多數的工人和集體農民對於我們黨的領導人——首領斯達林同志（大鼓掌）表示無限的擁護和愛戴，這些都是因爲布爾塞維克的中央不斷的，一步緊一步的，無情的在各方面去搗穿曲解我們黨的總路線，將它變爲『支流』和『分流』的一切企圖，揭穿脫離我們基本道路的一切企圖……我們的道路，是社會主義在蘇聯，在全世界勝利的道路。（大鼓掌）

同志們，在我們的建設中間還有很多困難，鬥爭還沒有終止。國內的階級鬥爭還是繼續着，無論在鄉村和城市到處都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影響的企圖不只是經過混進工人隊伍中的富農及其走狗傳到工人階級裏去，並且在我們黨內也有。在「紅色教授學院」十週年紀念日，每個紅色教授應該自己想想：我過去是擁護黨的戰士，將來是更堅固和更堅定的戰士，我將更團結在黨內，團結其他的人，堅忍地和強堅地來進行馬克思、列寧教育青年的工作，將百萬羣衆聯合在列寧固決底週圍。（大鼓掌）

布爾塞維克黨的三十年

——一九〇三至一九三三年——

三十年前，一九〇三年的七月三十到八月二十三，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大會。黨的第二次大會的三十週年，就是布爾塞維主義的三十週年。

這三十年中間，布爾塞維克的黨——「我們時代的知慧，榮譽和良心。」（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九五頁）——經過了光榮的英勇的道路，長成了強大的力量，領導着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成了國際無產階級的突擊隊，得到全世界的工人，勞動農民和被壓迫民衆的無窮的贊助，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是第二次大會的鬥爭裏所產生的，現在加進了一切言語，成爲澈底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同意義的字眼。列寧是布爾塞維克的偉大領袖，布爾塞維克黨的全部歷史

的化身，他的名字成了各國幾萬萬勞動者所最知道的，最愛好的名字。列寧的名字，是爲着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而鬥爭的旗幟了。

—

布爾塞維主義的『實踐的歷史，它的經驗的豐富，在這世界上是沒有相等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七五頁。）

『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十五年中間——列寧指着布爾塞維克黨的十月革命前的歷史說，——也沒有，連勉強趕得上的也沒有經過這麼許多的革命經驗，這麼各種各樣運動方式的變更的迅速和複雜；合法的和秘密的，和平的和熱烈的，地底下的和公開的，小團體的和羣衆的，國會的和恐怖政策的運動。任何一個國家，也沒有在這樣短促的過渡時間，集中着現代社會一切階級的鬥爭的這樣豐富的方式和類別。而且，因爲國家的落後和俄皇制度的嚴重壓迫，鬥爭是在特別迅速的成熟起來，特別貪得的順利的佔有歐美政治經驗的相當的最新發明。』（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七五頁）

我們黨在十月革命後的經驗，那是更豐富，更複雜，更集中。武裝暴動和無產階級的取得政權；廣大

的無產階級和貧農中農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動員；毫無寬恕的鎮壓被推翻的拚命抵抗的剝削者；組織革命的武裝力量和領導紅軍的英勇戰鬥去反對白黨和干涉；我們的國家從農業的變成工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民和整個集體化的基礎之上的消滅富農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建立，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運動的強大的高潮，極偉大的文化革命，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文化的發達，打碎應用各種各樣不同的鬥爭方式的階級敵人打碎黨內的階級敵人的代理人——一切種種的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派、右派、調和派；共產國際的建立和鬥爭之中的領導作用——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黨的極複雜，極豐富的經驗。

布爾塞維主義的三十週年——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的革命學說的全世界歷史上的勝利；布爾塞維克黨的三十年的道路——這是在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革命，爲着無產階級專政，爲着共產主義的鬥爭裏的黨的決定作用和決定意義的最偉大的證實。

三

發生和形成布爾塞維主義的時代——是世界經濟之中的鉅大變動的時代，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空前尖銳化的時代。資本主義長成了帝國主義——腐爛的，臨死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成

了跳躍式的，崩潰式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來到了。

在工人運動的前面，極尖銳的站着新的任務——組織羣衆，革命的教育羣衆的任務，準備那爲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決定勝負的戰鬥的任務。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在自己的最好的時期，執行了一種有益處的工作，就是準備了羣衆的工人運動的傳播的基礎；但是，它不會提出這些任務，更不會解決這些任務。機會主義——在比較『和平』發展的環境裏生長出來的，合法性所培養出來的，依靠在工人貴族身上的，——事實上，在戰前的第二國際裏就佔了統治地位。第二國際的黨的模型，就是『容忍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的那樣的黨……這種模型已經過完了自己的生命』（列寧全集第十八卷，八六頁）

爲着解決新時代的偉大任務——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偉大任務——工人階級必須要有新式模型的黨。布爾塞維主義的天才的領袖和理論家——列寧，就創造了這樣的黨。

四

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的總樞紐，是空前的資本主義、地主、殖民地、軍事的壓迫的爐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反對革命，殘酷剝削幾千百萬工農殖民地奴隸的後備軍和代理人。俄皇制度的利益和

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極端密切的糾纏在一起。

所有這些，決定了俄國所生長出來的偉大的民衆革命性質，特點和國際意義，這個革命的首領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它領導着起來反對地主的幾千百萬的農民羣衆。『這樣，反對俄皇制度的革命接近着並且應當轉變爲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頁）還是在第二次大會以前，在一九〇二年，列寧就說：『歷史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最切近的任務，這是任何一個無產階級的最切近的任務之中的最革命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打破這個不僅是歐洲的而且是亞洲的，反動的，最強大的堡壘（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那就要使得俄國的無產階級，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寧全集第四卷，三八二頁）

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移到了俄國，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家鄉，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黨的家鄉。

五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布爾塞維主義的形成——這是列寧在還以前爲着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十年鬥爭的結果。還是在九十年代，列寧就成了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直接的，唯一的，徹底一貫的繼承者和接手的人。

『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堅固的基礎之上發生出來。俄國的得到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真正經過了半世紀的受苦的歷史，這是沒有聽過的磨難和犧牲，沒有見過的革命的英勇主義，異乎尋常的努力和無窮的探索，訓練，實際上的熬煉，失望，檢查，歐洲經驗的對比的歷史。』（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七五頁）

這是九十年代以前俄國革命運動的半世紀的道路。普列哈諾夫領頭的「勞動解放社」（一八八三年成立的）——是俄國的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不過在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而走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三五三頁）正是列寧在自己的最初的言論裏，在一八九四年，就用全力在我們國家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了偉大的任務，這個任務，在他的著名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裏，說明了：『俄國的工人，領導起一切民主主義的分子，要推翻專制主義，而引導俄國的無產階級（同着各國的無產階級）從公開的政治鬥爭的道路上走到勝利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列寧全集第一卷，一九四頁）

列寧在九十年代就開展了不調和的鬥爭：反對民粹主義，反對俄國的修正主義（斯脫魯維派、經濟主義派），反對西歐的修正主義（伯恩斯坦派）。列寧在九十年代就在各方面繼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動搖的保持和執行理論的黨派性的原則，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不可分離的統一原則。九十年代的列寧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之中的列寧階級的開始。

列寧在九十年代就提出了創造新式模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那時候，列寧就開展了堅決的鬥爭——爲着戰鬥的，作戰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政黨而鬥爭。

『西歐社會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我們工人運動的經驗——這是我們所應當佔有的材料，爲的來製定我們黨的適當的組織和策略……可是，「製作」這個材料却應當是獨立的，因爲我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找現成的標本。』（列寧全集第二卷，四九七頁）

列寧所創造的，所領導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聯合會」（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是布爾塞維克黨的胚胎。在「鬥爭聯合會」裏，列寧就不調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最小的表現，就領導無產階級的最初的革命戰鬥，就爲着反對專制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決定勝負的進攻而教育工人階級。在這個鬥爭裏，列寧教育了，團結了自己的同志的親密的團體，教育了，團結了戰鬥的同伴和布爾塞維克黨的建設者的團體。

『布爾塞維克不是什麼「偶然的東西」，他們是在一八九四——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裏產生出來的。』（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三一七頁）

六

爲着黨的鬥爭，反對俄國的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鬥爭，直接的準備了第二次大會。進行這種鬥爭的就是列寧所創造，所領導的老花報（二九〇〇——一九〇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一次大會（一八九八年三月）宣佈了黨的成立，然而運動仍舊停留在個別的，散漫的，小集團的階段上；那些小集團沒有戰鬥的黨綱和集中的，組織的統一聯系，社會民主主義的小團體的小集團，被發鏽的經濟主義侵蝕着。「經濟主義派」——是國際機會主義的俄國方式，工人運動之中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否認革命理論的作用，崇拜着自發性，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革命政黨的必要。「經濟主義派」否認工人階級的獨立的政治作用，在工人的落後階層的尾巴上幹些瑣屑的事情，把工人階級的任務縮小到「爲着五個銅元的鬥爭」。（「工人只要經濟鬥爭，讓自由主義者去幹政治鬥爭。」）毫無寬恕的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是黨的生死問題。列寧在彼得堡的「聯合會」時期（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和西伯利亞充軍的時期（一八九七——一八九九年），就領導了這個鬥爭。

在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裏，在思想上的紊亂和組織上的手工業狀態的環境裏，列寧開展了自己的歷史意義的黨的建設計劃。（做什麼）這個計劃的基本點就是創造全俄的政治機關報。這種機關報，應當成爲職業革命者的戰鬥核心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中心，有紀律的，集中的，帶着馬克思主義的黨綱和策略的全副武裝的，毫無寬恕的驅逐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分子，密切的和工人羣衆聯系着，

建築在每一個參加者的革命覺悟性和偉大積極性之上。『這個計劃的勝利，建立了那個團結的鍛鍊過的共產黨的基礎，這樣的黨，在世界上是沒有相等的東西。』（斯達林論列寧，七頁）

《火花報》是列寧計劃實現的開始。《火花報》一貫的保持工人階級的革命的統一，不斷的進行着反對國際的和俄國的伯恩施坦主義的戰爭，執行了堅決的有機機會主義派破裂的政策。『在統一之前，而只爲着統一起見，我們應當先堅決的劃分出來。』（列寧全集第四卷，三九—四〇頁）《火花報》的打碎「經濟主義派」，列寧對於自發論——一切機會主義的思想基礎——毫無寬恕的批評這是有國際意義的，這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運動的理論基礎。』（斯達林論列寧主義問題，一八頁）《火花報》製定了，建立了黨的黨綱上，策略上，組織上的原則的基礎。

在《火花報》的內部，列寧進行了反對普哈列諾夫和編輯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機會主義的勸搖（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階級性質，中派主義，對於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對於農民的态度，土地國有等問題）。

《火花報》教育了，團結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火花報》它在俄國的代理人 and 組織，爭取了大多數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地方組織。『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老《火花報》的三年之中，進行了反對孟塞維主義的鬥爭，而在這鬥爭裏形成了整個的趨向。』（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一六三頁）

七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是列寧（布爾塞維克）爲着新式的無產階級政黨反對着一切種種機會主義的聯盟而鬥爭的舞臺。大會的主要任務，在於『根據火花報所提出和製定的原則上，組織上的基本點，而創造真正的黨。』（列寧全集第四卷，一六四頁）大會的代表之中有三十三個火花派（其中二十四個「硬派」和九個「軟派」——動搖的）十個『泥坑』的代表和八個反火花派。

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這黨綱的中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布爾塞維克爲着革命的黨綱而鬥爭，打擊了『經濟主義派』和猶太工人同盟派的機會主義的曲解黨綱的企圖（無產階級爭取問題革命問題，資本主義崩壞的不可避免的問題，黨的領導作用的問題），打擊了藉口擁護黨綱而暴露出來的改良主義的表現（托洛茨基）。大會所通過的黨綱一貫的繼續着馬克思、恩格斯的路綫，和第二國際的一切黨的黨綱都是顯然不同的。它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任務給了『精確的，明瞭的，絕不動搖的堅定的說法。』（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二〇一頁）

在大會的工作裏面，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問題佔着重要的地位。布爾塞維克，爲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鬥爭，建立了，並且保持了革命的土地政綱，這個政綱對於工人階級提

出了這樣的任務——就是在鄉村之中進行階級鬥爭，而且澈底的大量發揮反對沙皇制度和地主的鬥爭之中的農民的革命能力。布爾塞維克建立了並保持了民族問題之中的無產階級政綱（民族自決權，俄國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的統一組織），實行了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猶太工人同盟派的機會主義立場（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主的口號，依照民族的標準分裂無產階級），並且反對波蘭的社會民主派（否認民族自決權，事實上贊助強國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布爾塞維克反對着波特列沙夫的，關於自由主義者的機會主義議決案——他的議決案把革命之中的領導作用給了資產階級，使得無產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庸，——而提出了列寧和蒲列哈諾夫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的鋒芒是針對着斯脫魯維和解放雜誌的，是反對自由主義運動的反對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出賣革命的性質的。

八

第二次大會上的鬥爭的主要問題是組織問題。大會上的整個機會主義部份，從馬爾托夫派到「猶太工人同盟派」和「經濟主義派」都起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中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是浸透在列寧的章程草案裏的。在黨章第一條（關於黨員的黨籍）的問題上發生分裂，這種分裂其實是列

以前反對機會主義，反對火花報編輯委員會內部機會主義動搖的整個鬥爭所準備出來的。火花報的「軟派」（馬爾托夫、阿克爾雪洛特、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第一條章程，他們開始組織第二次大會的孟塞維克派的中心。『布爾塞維克，是要用自己關於黨內的黨綱問題的說法，造成抵制非無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來的組織上的提防……俄國的孟塞維克却保持了相反的立場，給非無產階級分子大大的開放黨的門戶。』（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六〇七頁）『我們的任務——列寧回答機會主義者說——是要保持我們黨的堅定性，堅持性和純潔性。我們應當竭力提高，再提高，更提高黨員的稱號和意義。』（列寧全集第四卷，三三頁）

大會上為着組織問題而發生的殘酷鬥爭的基礎，是革命之中的兩條根本分歧的路綫。布爾塞維克的方針，是要把資產階級革命引導到底，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專政，這是列寧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計劃所適應的；而孟塞維克的方針，却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式的國會制度的共和國，從這樣的方針裏，就產生了組織上的機會主義，阿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的建立資產階級性的「工黨」的「計劃」。『列寧的不朽的功績，在於他天才的敏銳眼光在最初就發露了分歧的深刻性和原則上的意義，暴露了孟塞維克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階級本質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意義。』

因為第一條章程而發生的分裂，在為着黨的領導機關（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的編輯委員會）成分的鬥爭得到了最後的固定形勢。選舉硬派和列寧路綫一貫的擁護者到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機關報裏去，應當保證黨的革命的領導以及以後毫無寬恕的反對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動搖分子和黨不住分子的鬥爭。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的成分問題的表決，鞏固了列寧原則的勝利。

列寧在第二次大會上的鬥爭，是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黨派性和不調和性的榜樣。

九

黨的第二次大會是國際工人運動的轉變關頭。第二次大會上的分裂和布爾塞維克黨的建立，是對於國際機會主義的一切種種形式的打擊。第二國際的著名領袖，以及第二國際裏的著名的左派社會民主派（盧森堡等）都贊助孟塞維克，而孟塞維克在大會之後却在開展着破壞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反對着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和中派，打擊着孟塞維克（亞克爾雪洛特，馬爾托夫，托洛茨基，普列哈諾夫），反對着自己隊伍裏的調和分子——保持了自己的黨。而黨在第三次大會上（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月）鞏固了這個勝利。

到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偉大戰鬥的時候，俄國無產階級已經有了完全形成的，自己的黨在領導着。『布爾塞維主義，作為政治思想的一派，作為一個政黨，從一九〇三年起就已經存在了。』（列寧全集）

第二次大會之後，布爾塞維克的黨在列寧領導之下，經過了光榮的，偉大的，爲着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道路。

在這條道路的第一階段上（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二月），黨的最切近的任務是推翻俄皇制度。在這一階段上，『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主義的革命引導到底，聯合農民羣衆到自己方面來，爲着要用力去壓服專制的抵抗，並且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六頁）

布爾塞維克，認爲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條鍊條上的兩個鐵環，是革命形勢的統一的整個的景象。』（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二三頁）『從民主主義的革命——列寧說——我們立刻就開始轉變，而且正要依照我們的力量，依照覺悟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贊成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在路上。』（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六頁）

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整個過程，非常明顯的證實着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布爾塞維克的戰略和策略。黨在巨大的階級戰鬥之中能够領導羣衆的革命鬥爭，團結他們在自己口

號的周圍領導武裝暴動，建立第一次的蘇維埃——暴動的機關，革命專政的胚胎。『一九〇五年的春天，我們的黨是地底下的小集團的聯合會，而秋天，黨已經成爲無產階級的幾百萬人的黨。』（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三〇一頁）

在反動時期（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在革命的暫時失敗之後，布爾塞維克唯一的政黨，仍舊同羣衆在一起，領導着他們，而沒有在困難之前發抖。『革命的階級，在自己的痛苦的經驗上學習着了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不能夠勝利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七七頁）布爾塞維克不斷的繼續着組織，團結，教育工人階級的工作，能够在完全的戰鬥的秩序之中退却下來，保全着自己的幹部，準備着新的堅決進攻的力量。

在革命高漲的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布爾塞維克組織了工人階級反對俄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戰鬥和經濟戰鬥，鞏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引導了工人階級的新的戰鬥幹部——列寧的真理報（一九二一——一九一四年）所教育的，整個的一輩布爾塞維克的工人到階級戰鬥的戰場上來。『真理報派，保持着黨的革命教訓，贊助着工人運動的開始的高漲……聯合着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組織，聯合着刊物和鼓動，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了覺悟的工人階級的最大多數。』（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二〇頁）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布爾塞維克是唯一的政黨——對褻狹的

愛國主義狂熱宣戰，出來反對潮流，高高舉起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銀鍊過的老旗幟；布爾塞維克，動員着羣衆圍繞革命的口號，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帝國主義戰爭之中要「自己的」政府失敗；布爾塞維克不但是俄國的，而且是西歐的正在生長的革命之唯一的組織者和指導者。

布爾塞維主義勝利的極重要的條件，就是不斷的，不調和的爲着黨而鬥爭，爲着黨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而鬥爭。

孟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已經是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的馬弁；在反動時期，像叛徒似的否認革命前途和革命的秘密組織，公開的成爲斯托理賓的「工黨」；孟塞維克在戰爭時期，變成了「社會褊狹愛國主義者」，俄皇制度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可恥的奴才。

托洛茨基主義，這個俄國的中派主義，最惡劣的一種孟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五年就在不斷革命論的旗幟之下反對布爾塞維克；在反動時期，結合着一切色彩的機會主義者的無原則的投機的聯盟來企圖破壞無產階級的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聯盟」）；在戰爭時期，猶都史卡——托洛茨基宣傳着考茨基主義的「社會和平主義」——這是最有害的，最良善的對於帝國主義屠殺的擁護。

召回主義派（波格達洛夫等）是『取消派的反面』，『左』傾詞句的英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偽造者。——他們否認『合法可能』的革命利用的必要，企圖把黨和工人階級隔離起來，而把無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知識分子的關門主義的小集團。

布爾塞維克調和派（卡米尼夫、李可夫等）企圖妨礙黨進行堅決的反對『左』右機會主義的鬥爭，做了取消派可憐的幫手。

在反對『左』右機會主義的不調和的兩條戰線的鬥爭裏，布爾塞維克在列寧的領導之下高高舉起黨派性的旗幟。第四次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布拉加開的）在俄國工人運動之中鞏固了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勝利，這個同機會主義破裂、分裂的路線，把取消派從俄國社會民主黨裏驅逐出去，而恢復了全黨的中央機關。『在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幸福是在於他們有十五年的時間去進行有系統的反對孟塞維克（就是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鬥爭，同樣也反對『左派』鬥爭到底，這還是在爲着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的羣衆鬥爭之前。（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二四二頁）

布爾塞維克同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破裂和分裂的路線，在俄國工人運動以及整個國際工人運動裏是同樣執行的。所以戰前第二國際的領袖堅決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竭力想在『調和互相敵視的派別』的旗幟之下來消滅布爾塞維克的黨。布爾塞維克用自己反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堅決的、毫無寬恕的全部鬥爭，給了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以很大的贊助，同時，堅決的批評他們的

半孟塞維主義的錯誤，他們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裏的不徹底以及他們的怕分裂——這樣，使他們在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布爾塞維克反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鬥爭，是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左翼政策的模範。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是工人運動裏一切派別的嚴厲而無情的測量儀。第二國際破產了，被機會主義征服了，喪失了力量了。布爾塞維克唯一的能够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前面執行自己的責任到底。在反對俄國的和國際的改良主義，『社會褊狹愛國主義』，考茨基主義的鬥爭裏，克服着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的不徹底。『布爾塞維主義建立了第三國際的思想和策略的基礎。』（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三八五頁）

一一一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塞維主義的口號和思想的極明顯的證實。俄皇制度的推翻，開展了黨的歷史的第二階段（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黨進到了爲着實現第二個策略計劃的鬥爭。關於這個計劃，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說：『無產階級應當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聯合人民的半無產階級分子的羣衆到自己方面來，爲着要用力去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并且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

穩定。』(列寧全集第八卷,九六頁)這階段上的黨的主要口號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無產階級和最貧苦的農民聯合反對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而中立中農。布爾塞維克認為在我們國內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開展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極重要的條件。

布爾塞維克在二月革命之後還是少數,可是從革命之後的第一天起就一天不斷的,忍耐的,有系統的宣傳自己的口號,毫不容情的暴露妥協派政黨的帝國主義政策,堅決的和羣衆的國防主義,民主主義的幻想鬥爭。『沒有這樣各方面的,謹慎的注意的,長期的準備,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會得到勝利,也不會鞏固這個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七九頁)

四月會議,在著名的列寧提綱(四月提綱)的基礎之上團結了黨。第四次大會(一九一七年八月)在斯達林的領導之下執行了列寧的路線,這是十月革命的戰鬥準備的大會。黨打碎了,隔離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爭取了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領導了農民羣衆和被壓迫民族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鬥爭。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黨肅清了自己隊伍裏的孟塞維克叛徒的小集團(魏辛斯基,謝夫魯克);掃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冒險主義(波格達替耶夫);嚴厲的打擊了托洛茨基要想使得黨『非布爾塞維克化』的企圖,當頭打碎了右傾的恐慌派工賊(卡米尼夫,徐諾維夫)。黨在列寧領導之下極光榮的組織了,進行了十月的武裝暴動。

黨的全部歷史指示着:『地球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够阻礙布爾塞維克,假使布爾塞維克不讓

人家嚇退，而能够取得政權，抓住這個政權，直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二七九頁）

一三三

十月革命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也就把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綱的中心思想變成了事實。十月的勝利，『是世界工人運動之中列寧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勝利。工人運動之中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統治時代完結了。開始了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的統治時代。』（斯達林論十月革命一三六頁）

我們的黨，從一個爲着政權而鬥爭的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變成了統治的黨，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裏的領導力量，開始了我們黨的歷史的第三階段。列寧的戰略計劃是：『爲着發展，贊助，驚醒一切國家裏的革命而在一個國家裏實現最大限度的可以實現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三八五頁）『在一個國家裏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這個專政作爲推翻一切國家裏的帝國主義的支點。』（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五四頁在列寧的天才的領導之下，黨堅決的執行這個偉大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出發點，就是列寧的『在一個個別的國家裏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的

學說。

黨在軍事共產主義（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時期爲着這個計劃而鬥爭，在反對國外和國內的反革命的戰鬥裏保持了無產階級的專政。黨把這個計劃作爲新經濟政策的基礎。當轉變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一九二一年），列寧說：『現在我們主要的是用自己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四一〇頁）列寧對黨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基礎，消滅階級，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在斯達林——列寧的偉大的繼承者的領導之下，黨勝利的解決了這個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

一四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爲着黨而鬥爭，爲着布爾塞維克的黨派性而鬥爭的意義就大大的增高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反對舊社會力量的傳統的，堅決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強暴的和和平的，軍事的，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和幾萬萬人的習慣，這是最可怕的力量。沒有鐵的鬥爭之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得到這個階段裏的全體正直的人們的信仰的黨，沒有會注意羣衆的情緒而影響羣衆的情緒的黨；那麼，順利的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一九一頁）

十月之後，黨內鬥爭的全部歷史證明着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的企圖是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之直接的幫手。機會主義者反對黨的全部鬥爭，並不是什麼別的，而正是企圖用第二國際的腐爛的傳統和教條來束縛列寧的黨，企圖復活孟塞維主義。

右傾的投降主義者和十月的取消主義者（卡米尼夫、徐諾維夫、李可夫、史列普尼可夫）的立場，不是什麼別的，而正是企圖復活孟塞維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以及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年，堅決的、重複的對黨進攻。他是反黨聯盟的組織者，是列寧主義發狠的敵人，是布爾塞維克黨派性的發狠的敵人，不可避免地變成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

「左派共產黨」（布哈林、普列沃白拉仁斯基）在自己的冒險主義的分裂政策上事實上走到了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盟來反對列寧。

「民主集中派」（薩普洛諾夫）爬到了反革命的，孟塞維克的泥坑裏。

「工人反對派」（史列普尼可夫）從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傾向變成了一班惡的工會主義叛徒。

「新反對派」（徐諾維夫、卡米尼夫）可恥的滾到了托洛茨基主義和反黨的，反蘇維埃的聯盟的隊伍裏去。

「右傾反對派」（布哈林、李可夫、湯斯基）反映着反革命的富農的抵抗，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根本，而替資產階級的復辟做清道夫。

『左』右聯盟（洛明納茲、塞爾錯夫）企圖用兩面主義的毒害的武器來搗亂黨。

民族主義的小集團，從反對列寧的民族政策的鬥爭開始，必然的迎合每一次新發生的反黨的派別，事實上做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幫手和工具。

黨所打碎的小集團解體的結果，就產生了那些可憐的反蘇維埃的黨派：劉廷、史列普可夫、烏格蘭諾夫、和愛斯孟特、託爾馬赤夫、斯米爾諾夫。

一切反黨的派別的共同特點，就是孟塞維主義的否認我們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否認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以及我們黨的世界革命的方針。這是孟塞維主義的投降階級敵人，厭惡階級鬥爭和這個鬥爭的一切困難，這是尾巴主義的降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者的歷史作用，這是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的反抗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紀律，這是竭力來破壞布爾塞維克的集中主義，毀謗黨的列寧幹部和它的老前衛來推翻黨的領導。

他們在攻擊列寧的中央委員會的時候，大家都一定重複孟塞維克的濫調，說什麼『壓制』，『什麼』黨的官僚主義。『關於著名的官僚主義的叫喊，——列寧在一九〇四年就說的——不過是公開的不滿意中央的人的成分，不過是一塊遮羞布，掩飾那種對於大會上的鄭重申明的破壞的。你是官僚，因為你的被大會委任沒有依照我的意志，而是違反我的意志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依靠大會的

形式上的決議而沒有得到我們同意……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肯把權力還給老朋友。」（列寧全集第四卷，二八七頁）

最近十年以來因為聯系着社會主義進攻的準備和開展的那些戰鬥有決定勝負的性質，所以黨內鬥爭特別的尖銳。黨一貫的執行列寧的教訓，在斯達林的領導之下，黨打碎了托洛茨基和右傾反對派；黨暴露了「左」的過火派。這是反革命的託洛茨基主義的迴光返照，黨指出了他們客觀上是右傾派的同盟者。

這幾年來，我們國內的工人階級極偉大的生長了，得到了極大的政治經驗，更密切的圍繞着黨和它的中央委員會。在自己的反對機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的孟塞維主義的重複鬥爭裏，黨得到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最積極的贊助。黨繼續打擊機會主義者，兩面派，腐化分子——一切口頭上承認黨的總路線，中央的指令和國家的計劃任務，而事實上在怠工破壞的人；一切不願意同階級敵人鬥爭而贊助反國家的傾向，破壞黨和國家的鐵的紀律，動搖革命的法律的人；一切寬容，官僚機關主義的領導方式，輕視工人和集體的農民需要，用單純的行政手段來代替教育羣衆，說服羣衆，組織羣衆的人。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向着新的勝利進行，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着反對現在階段上的主要危險的右的機會主義，也反對「左」的機會主義。黨堅決的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反對大俄羅斯的褊狹愛國主義——這在蘇聯的範圍裏是民族問題上的主要危險。黨掃除這種腐爛的自由主義和調和主義。

「原則不是「調和」的而是要戰勝的」（民族問題與馬恩克主義八〇頁）

一五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在三十年同敵人的鬥爭之中，鍛鍊出了自己的列寧的統一。它從地底下的小集團長成了強大的力量，經過分支的羣衆組織（蘇維埃、工會、合作社、紅軍、青年團、婦女代表會等等）同跟着黨的幾千百萬工人和農民羣衆聯系着。在每一個鬥爭階段上黨表現着偉大的靈活性，適合着新的任務，勇敢的改變自己工作的組織方式。

黨提出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領導方式的任務，用黨部組織的生產企業方式的結構來補充地域方式的結構。根據斯達林的建議，適合着社會主義時期的條件而着手的全部黨的工作的改造，是列寧的創造新式的黨的原則底繼續發展之中的極偉大的一步。

建立着機器耕種機站和國立農場的政治部以及集體農場的生產支部，組織着交通事業裏的政治部，實行着工業裏的新的工作方式（首先是煤業和五金業）。黨提高了自己的戰鬥力，使自己領導的具體性和行動性達到新的程度，鞏固自己布爾塞維克的紀律和集中的力量。在鄉村之中，中央派去了一大隊審查過的黨的工作人員，機器耕種機站和國立農場的政治部已經變成了極重要的爐灶，以

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場，爭取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裏的大多數羣衆，保證這些農場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一切種種破壞政治部的工作，降低政治部的意義，妨礙布爾塞維克集中主義的鞏固的企圖，都要受着我們黨的嚴厲的打擊。『集中主義——列寧在第二次大會上就說的——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的，最偏僻的地方之間沒有的隔閡。』（列寧全集第六卷，一九頁）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毫無寬恕的反對那些『黨「溶化」在勞動羣衆之中』的機會主義理論，而起來提高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稱號。黨領導幾萬先進的無產者來加入自己的隊伍，而保存着『對於某一個願意加入黨的人的個人考察的方法——這是鍛鍊過的方法——以及個人的加入手續。我們不但需要數量而且還需要質量。』（斯達林給斯威爾得諾夫大學學生問題的回答，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真理報四〇號）

黨得到極偉大的勝利，因為從來不驕傲，從來不企圖戴着桂冠睡眠。*『自我批評對於任何一個活的，有生活能力的黨，都是無條件必須的。沒有比自滿的樂觀主義再庸俗的了。』（列寧全集第五卷，三〇八頁）沒有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黨派性。自我批評的口號『是布爾塞維克黨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基礎』。（斯達林論中監四月聯席會議的工作，五頁）

*『戴着桂冠』就是受着榮譽的意思。古代希臘的大文學家、藝術家等，得到了公認之後，就用桂冠繫在頭上表示勝利。

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最高表現就是清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實行清洗自己的隊伍爲的要『保護黨內的鐵的無產階級紀律，而肅清自己隊伍裏的一切靠不住的，不穩定的，混進來的分子。』（見聯共中央和中央監委關於清黨的決定，真理報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一八號）

一六

布爾塞維克的黨，在自己三十年的反機會主義鬥爭裏面，鍛鍊出了自己的戰鬥的傳統。『在世界上海沒有，也不曾有過像我們共產黨這樣強大的有信心的黨。』（斯達林論鄉村中的工作一四頁）

我們的黨，在自己歷史道路的整個時期裏，像一個統一的一元性的力量在行動着，毫不改變的遵照着列寧在第二次大會上所宣佈的原則：『每一個黨員都爲黨負責，而黨也爲每一個黨員負責。』（列寧全集第六卷，三三頁）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在反對階級敵人和他們的代理人的無數鬥爭之中，把黨員的偉大稱號舉到了極高的高處。

在鬥爭的一切階段上，在階級戰綫的一切陣地上，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永遠是同樣羣衆的領導羣衆的，衝破着落後的情緒，忍耐的在羣衆自己的經驗上去說服羣衆，說明黨的路綫的正確。

在俄皇制度的時期，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從祕密的，地底下的組織裏發動羣衆的反對農奴主，地

主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它領導了暴動起來的，樹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旗幟的工人；它在工農紅軍的先鋒隊伍裏是紅軍的普通戰士，是紅軍的指揮者和黨代表；在決定革命運命的一切戰線上，它總是無產階級堅決性和英勇主義的模範。

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在國內戰爭時期引導着羣衆去和飢荒，寒冷，破壞做堅決的鬥爭，他燃燒起幾千百萬人的勞動的熱情，爲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他是社會主義競賽的發起人，表現突擊勞動和布爾塞維克速度的模範的；他是社會主義工業的巨大建築和爭取最新技術的事業裏的戰士。

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發動農民羣衆反對富農的剝削，引導他們到消滅富農階級鄉村裏社會主義改造的公開的戰鬥，幫助集體農民消除他們的小私有主義的偏見；在集體農場裏爲着耕種機，汽車，聯合機而鬥爭。

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建設着，鞏固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發動羣衆反對蠢笨和官僚主義的憤怒；他永久注意着進行嚴厲的鬥爭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反對地痞，騙子，反對破壞神聖的社會主義財產的盜賊，反對害蟲和偵探；他盡力的提高工農國家的軍事力量。

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毫不動搖的爲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鬥爭；爲着蘇聯之中的各種民族的親愛，爲着全世界各種民族的親愛而鬥爭。共產國際的領導黨的黨員，他的全部工作的整個鬥爭都

是爲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服務的。

布爾塞維克黨的黨員是有紀律的戰士，不調和的列寧主義者，永久準備着打擊自己的黨的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永久和到處保存着對於自己的列寧中央委員會的絕對的忠實。

「我們共產黨人，是一種特別人。我們是具有特別的性格。偉大無產階級戰略家底軍隊，列寧同志底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面做一個隊員，是再光榮也沒有了的。在列寧同志所建立和領導的黨裏面做一個黨員，是再高尚也沒有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這個黨底黨員的。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忍受爲做這樣的黨員所必然遭遇的痛苦和波折的。工人階級以內的人，經受過貧困和鬥爭的人，經受過非常痛苦和英勇鬥爭的人，——便是最應該加入這個黨的人。」（斯達林：列寧底遺囑）

一七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是共產國際的先鋒隊。

還是在老火花報上，列寧就預言了世界工人運動之中革命的「山岳派」和機會主義的「基爾特派」的不可避免的破裂。*從那時候之後，等二國際早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的社會柱石；

第二國際的賈淫的領袖，替法西斯主義在掃清道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命運——他們已經匍匐在希特拉的面前了——證明着國際孟塞維主義墮落到了何等深沉的地步。

對抗着第二國際的解體的政黨，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東方各國，都有先進的無產者——布爾塞維克的能够戰鬥的自我犧牲的隊伍團結在列寧所創立的共產國際的旗幟之下。我們的兄弟的共產黨以及他們中的先進隊伍：光榮的德國共產黨，熟習着布爾塞維主義的三十年經驗，在工廠企業之中建設着自己的支部，教育着自己的職業革命者的幹部，學習着配合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方式，我們的兄弟黨，照着列寧的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榜樣進行着不調和的兩條戰綫上的反機會主義鬥爭，毫無寬恕的肅清自己隊伍裏的右的取消派和「左」的關門主義者。

我們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國際無產階級戰綫上的決定勝負的障地。蘇聯的無產階級是國際工人階級的最革命的隊伍。「俄國革命是（而且仍舊是）世界革命的總樞紐……」「俄國革命的根問題同時也是（現在還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六一〇頁）

共產國際在自己的鬥爭上，依據着我們黨的極偉大的勝利。

布爾塞維主義『是大家的策略的模範。』（列寧）依照着這個模範，各國的共產黨在列寧和斯達林的旗幟之下準備着新的革命和戰爭的潮流之中的決定勝負的戰鬥。英勇的鬥爭着，反對法西斯

*「山岳派」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左派的名稱，而「基期特派」是當時右派的名稱。

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擁護一切勞動者的祖國——蘇聯，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的勝利而鬥爭。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武裝着，建設着，鞏固着世界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共產國際是列寧主義勝利的化身，是國際工人運動中布爾塞維克黨的原則和不調和的革命性的勝利的化身。

『列寧主義是整個的理論，從一九〇三年發生，經過三次革命的試驗，現在向前進展着，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斯達林論十月革命，七一頁）

三十年以前，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會上，列寧指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三十年前，列寧給了無產階級以無可比較的武器，沒有這種武器就不能够想像怎樣遵照着那條道路而勝利的前進。——這武器，就是戰鬥的，有紀律的集中的黨，運用着最先進的革命理論的黨。三十年來，布爾塞維克的黨毫不動搖的遵照着列寧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得到了開闢人類歷史的新時代的勝利；在這條道路上，布爾塞維克的黨在斯達林領導之下繼續的前進，達到共產主義的新的勝利。『黨假使知道往那裏引導自己的事業而不害怕困難，它是不可克服的。』（斯達林）

論聯共黨史課本

我以為我們聯共黨史的課本，因了下面三種主要的原因而不能令人滿意：或者因為它們在敘述聯共黨史時，和俄國史、聯邦史沒有關聯；或者因為它們把自己限制於敘述或簡單的描寫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事實，而沒有與以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最後或者因為它們的材料組織及分段上還有不正確的地方。

要免除這些缺憾，作者應注意到下列幾點：

第一、他們應當在課本的每章（或每節）之前，加以一段關於本國經濟政治情形簡明的、歷史的解釋；否則，聯共黨史將不能成爲歷史，僅只是一篇過去事項的札記和不完整的故事了。

第二、不但應當敘述事實來說明俄國資本主義時期中黨和工人階級內的各種趨勢與派別，而且，必須與以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說明：一、在前革命的俄國，除資本主義新興的近代階級外，還有舊時的前資本主義的諸階級之存在；二、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性；三、工人階級成分的複雜成爲有利於黨和工人

階級內多種傾向與派別之存在的條件。否則，徒有許多派別和傾向的內容，而令人難以索解。

第三、不儘應當以簡單的敘事的口吻來敘述各種傾向與派別間激烈鬥爭的事實，而且應當給這些事實以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說明：布爾塞維克對於反布爾塞維克的諸傾向與派別的鬥爭，是原則性的，爲了列寧主義的鬥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以及一般地說在存在有敵對階級的條件下，黨內的分歧與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條件下，無產階級的黨祇有在克服這些矛盾的過程中才能發展與鞏固。沒有這種原則性的，對於反列寧主義傾向派與別的鬥爭，不克服它們，則我們的黨亦免不了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墮落下去。第二國際政黨正是由於沒有開展這種鬥爭而墮落下去。這裏我們可以利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致伯恩斯特的著名的信件來幫助此種研究。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的，關於蘇聯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報告第一部份，也引用了它的。我這裏對它的評註也可以通用。如果不給與這樣的解釋，聯共黨史上派別與傾向的鬥爭，將爲費解的爭論，而布爾塞維克將成爲不可救藥的，永不疲倦的爭論家與鬥毆家了。

最後，聯共黨史上事件的分段必須有某類的次序。

我以爲下列的大綱或類似的大綱可以作爲基礎。

大綱

- 一、爲在俄國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而鬥爭（自一八八三普列哈諾夫的「勞動解放社」到一九〇〇——一九〇一「火花報」第一期出版止。）
- 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成及黨內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的形成（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
- 三、俄國戰爭與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
- 四、斯託理賓反動時期中的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以及布爾塞維克之組成獨立政黨（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
- 五、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工人階級運動高漲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
- 六、帝國主義內戰時期中及第二次俄國二月革命時期中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三月。）
- 七、備準與實行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時期中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九一八年。）
- 八、內戰時期中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
- 九、轉入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時期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

- 十、爲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
- 十一、爲農業經濟的集體化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
- 十二、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及實行新憲法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

斯達林

怎樣研究聯共黨史

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九期，載有斯達林同志給正從事於編輯蘇聯共產黨史課本的同志們的一封信。

列寧及斯達林同志，自來即極端重視聯共黨史的研究及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經驗的基礎上來訓練黨的青年幹部。他們曾不息地暴露過布爾塞維克黨的公開及隱密的敵人對其過去的歪曲。

斯達林同志這封論聯共黨史課本的信，是一篇極端重要的文獻。在這研究布爾塞維克主義成為每一共產黨員當前十分重要的任務的時候，更特別需要把黨史的研究提高到所要求的科學的水平和原則的高度。

斯達林同志的這封信，以清楚具體的指示武裝了全體共產黨員羣衆。它供給了在黨史的研究上確定的改進的鑰匙，而黨史的研究在研究布爾塞維主義的整個系統上佔有絕對重要的地位。斯達林

同志已經提出了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些問題，並表明了應當如何來真正研究共產黨所集彙的豐富經驗。

我們不能把布爾塞維克黨的歷史跟本國的歷史分離開來。分開某一時期一般政治及經濟的情況，將使布爾塞維主義的歷史為現代的學者或讀者所不能了解。沒有對於事實的分析，亦將使全部工作浮淺與毫不動人，最後將不免為黨的敵人所利用，他們許久以前已把布爾塞維克描成一幅爭論家與令人難忍耐的詭蔑的圖畫。

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使人了解到爲了列寧主義的純潔，布爾塞維克對於一切不論公開的或戴了假面的反對派之無情的鬥爭之必要與不可避免。

黨是生活的有機體，它在一定的情況下生活與發展。只要資本主義仍然活着，只要對立的階級還沒被消滅，則這個情況的矛盾必然也要在黨的生命上表現出來。在綜合國際勞工運動的巨大經驗時，列寧和斯達林曾經許多次最明確地表明：如果黨要不願意如第二國際的各社會民主黨之墮落而自甘墮落，則以鬥爭來克服黨內的矛盾，也只有矛盾正是無產階級政黨生長的法則。這裏列寧和斯達林參照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創立者表現的意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各兄弟的共產黨代表前致詞時，斯達林同志對於蘇聯共產黨發展史上黨內矛盾的最尖銳之點，給了非常有力，非常簡明的綱領。說：

『如果我們拿我們黨自一九〇三年以布爾塞維克派存在之日起來看，如果我們考察它直到現時的晚近諸階段，那麼我們可以毫無誇張地說，我們黨的歷史也就是一篇黨內矛盾的鬥爭的歷史，一篇克服這些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逐漸鞏固的歷史。』

掃除開了以黨內鬥爭是由於布爾塞維克的特別『吵鬧的性質』之庸鄙的解釋，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與鞏固只有去克服黨內矛盾，對反黨的傾向與派別激烈鬥爭的道路的原因給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他說：

『這就是說，對立只有在爲了這個或那個原則，爲了這個或那個戰鬥目標，爲了達到鵠的這個或那個鬥爭方法而鬥爭時才能克服。在一些時事問題上，在一些純粹實際性質的問題上，一個人能够而且必然跟黨內同義心理的人們作妥協但是當這些問題和包含原則的意見之分歧聯結一起時，就沒有所謂妥協，沒有「中庸」之路可以挽回。在包含有原則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也不能够有「中庸」之路。或是這個，或是那個原則，必須成爲黨的工作的基礎。在包含有原則的問題上的「中庸」之路，是引致混亂之路，是粉飾分歧之路，是黨的意識的墮落之路，是黨的意識的死亡之路。』

再者，當分析黨內矛盾歧異的來源，這些來源，在一方面就是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中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對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迫所致；在另一方面就是由於工人階級複雜的性質，其中各種社會

層的存在所致。斯達林同志得到下面的結論：

『能够免去這些矛盾與分歧嗎？不，不能的。幻想這些矛盾可以避免開去是在欺騙自己。恩格斯的話是對的，他說，要想如何長久地勉強撮合黨內的矛盾是不可能的，這些矛盾是要鬥爭來解決的。』

一本蘇聯共產黨史的課本正應當這樣建立起來，並且黨史是應當這樣來研究的。

最後，黨史是不應當任意分成幾個時期的。斯達林同志的指示爲黨史的分期加入了一定的規則。他所提出的大綱，對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各個階段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劃分法，每一階段都代表我們黨的一般的發展中一定的水平。

在研究聯共黨史的十月革命後的時期時，必須將黨對於托洛茨基派，右傾機會主義及別的反黨派別的頑強堅決的鬥爭與以極充分的表明。他們這些派別，在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過程中轉變成社會主義的最惡劣的敵人，成了蘇聯的叛徒，成了偵探和挑釁者。

斯達林同志的致正從事於編輯一本聯共黨史課本的同志們的信，在正確地提高教授黨史的間題及整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上將起偉大的作用。這封信是作教師、宣傳工作者及所有從事於布爾塞維克歷史的研究的同志的參考的。

聯共黨史研究提綱

第一章 在俄羅斯爲建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而

鬥爭

——從一八八三年普列哈諾夫組織「勞動解放社」至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火花報」開始出現止——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俄羅斯的工人運動俄羅斯馬克思主

義運動的開始

革命前俄羅斯的經濟制度。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比較起來，是要落後。在革命前的俄國，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上看來，有新興的階級，也有資本主義以前的階級。俄國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在農村中以小農經濟佔優勢。在農村中是地主對於土地的佔有，並且有農奴制度的殘餘。

俄國資本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發展。工人階級的生長。工人階級成分的複雜。農民的分化，農村中分爲了富農與貧農。

沙俄的政治制度是沙皇的專制，是農奴主和地主的專政，就是人民最凶惡的敵人。專制的國家機關是官僚、警察、法庭和教堂等等。這是鎮壓工人農民的武器。在沙俄的時候，工人和農民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並受到野蠻的剝削。民族的壓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監獄。

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在他們中間散佈着民粹派的理論。民粹派是農民對於地主壓迫自發反抗的一種反映。民粹派理論及民粹派個人恐怖策略的反動性。

八十年代俄國政治上的反動。工人運動。工人的罷工和這些罷工的性質。一八八五年在沃列可夫佐也夫的罷工及其意義。

普列哈諾夫「勞動解放社」的成立（一八八三年，於日內瓦）。「勞動解放社」在俄國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勞動解放社」反對民粹派的鬥爭。

「勞動解放社」的政綱（一八八四——一八八七年）。「勞動解放社」政綱及其領導者（普列哈諾夫和阿克雪洛特）工作中民粹派思想的殘餘和機會主義的根源。「勞動解放社」在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並且開始向工人運動方面走。（列寧）

八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勃拉哥也夫、布魯史列夫、費多雪也夫等）列寧革命活動的開始

(一八八七——一八九三年於卡桑和沙馬爾)

九十年代列寧在俄國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爲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鬥爭。

世界資本主義進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外國資本向俄國的輸入。大資本主義企業的創立。工人階級的集中。俄國是帝國主義矛盾的軸心。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俄國。九十年代下半年工業的發展和工人經濟的罷工。

一八九三年列寧到彼得堡，他爲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爲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爲組織俄國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鬥爭。

九十年代自由的民粹派（密哈以洛夫斯基等）反馬克思主義的活動。民粹派是馬克思主義最兇惡的敵人，是羣衆同沙皇統治進行革命鬥爭發展的障礙，是組織工人階級羣衆革命政黨的障礙。

列寧反對民粹派的鬥爭。列寧揭穿了民粹派言論的反動性及民粹派政治鬥爭方法和手段的反動性。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的意義，民粹派們如何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一八九四年）。民粹派思想上的瓦解，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斯脫魯維、巴倫諾夫斯基等）。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是自由資產階級企圖將工人運動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

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瓦解，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勝利和組織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

政黨必須的條件。

列寧爲着狹窄的小組織的宣傳轉變爲在工人中的羣衆宣傳的鬥爭。一八九五年列寧在彼得堡所組織的「工人解放鬥爭社」是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萌芽。同馬爾托夫的分歧，經濟主義的產生。「鬥爭社」在彼得堡工人中的活動。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在鬥爭社的領導下的罷工運動。基也夫、耶加基林史拉夫地方「鬥爭社」的組織及其工作。

一八九七年列寧被捕及放逐。在坐監和放逐的時期內列寧對於工人運動的領導。

斯達林革命活動的開始。九十年代斯達林在高加索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者及爲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鬥爭。

斯達林在工人小組中的宣傳工作。斯達林、徐魯基茨、克賀費里等在高加索開始組織的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小組。

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產生（波蘭的立陶宛）

經濟主義的發展。它的實質是否認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在組織的問題上宣傳自發運動，他們反對組織羣衆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經濟主義產生的原因是國際機會主義的影響（伯恩斯坦派），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影響（智識分子）侵入到工人運動中來了。工人階級中間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存（工人階級中的落後階層，工人貴族）列寧是反經濟主義的創始人，經濟派出版有信義報，列寧出

版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反抗（一八九七年）

一八九八年在明斯克開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第一次大會的宣言，大會的意義是在建立黨的組織。

列寧由放逐中回來後即出國（一九〇〇年），爲着領導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及黨內布爾塞維

克孟塞維克之產生

——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

爲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中的列寧的「火花報」

在一九〇〇年時代的工業危機。工人自發運動的發展。工人運動由經濟的罷工轉變爲同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一九〇〇年哈爾可夫的五一節。一九〇一年五月阿布舍夫的防衛，替夫利斯的罷工。斯達林於一九〇二年三月所領導的巴都姆工人的政治示威。一九〇二年十一月洛斯特夫的罷工。南俄的總罷工，無產階級鬥爭對於其他社會階層民主運動發展的影響。學生運動，農民運動的發展。一九〇二年烏克蘭農民的騷擾。高加索、波蘭、烏克蘭等地民族運動的發展。

沙皇政府同革命運動的鬥爭（佐巴託夫所宣傳的「警察的社會主義」）

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黨綱與黨章；缺乏統一的中心和統一的路線；小組織主義；渙散，動搖。
 火花報（舊火花報是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該報產生的歷史。列寧在組織全俄領導的報章火花報中的作用。

火花報為組織俄國新的工人階級底革命政黨的鬥爭。火花報的組織計劃。列寧著的做什麼一書（一九〇二年）在為組織俄國新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中的作用。

列寧及火花報反經濟主義的鬥爭。列寧指出經濟主義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的代理人，是國際機會主義（伯恩斯坦派）的變形。

列寧與火花報反對經濟底尾巴主義策略的鬥爭及其在組織問題上的自發主義。

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意義。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政治自由的必要，是工人階級迫切的任務。列寧在反經濟主義（俄國伯恩斯坦的變形）鬥爭中的國際意義。

一九〇二年社會革命黨的產生。在這個時期列寧同火花報反對社會革命黨和民粹派恐怖主義的鬥爭。一九〇二年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解放」的產生，火花報指責為反革命性質的組織。

俄國和外國火花報組織的建立。火花報的通訊員——革命職業家：巴布式金、保沃曼、李維諾夫等。
 斯達林是高加索火花報列寧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

斯達林在高加索爲列寧組黨的計劃而奮鬥。斯達林是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組織列寧火花派的創始人。

火花報粉碎了經濟主義，爭取了地方黨的組織。

火花報籌備黨的二次大會。火花報編輯內部對於黨綱和策略問題的爭論。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二次大會和黨內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小組織的產生

一九〇三年倫敦和布魯塞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大會的人數，大會中的派別，大會的任務。

列寧爲黨的政綱反對經濟主義者（阿基莫夫、馬爾丁洛夫）反對托洛茨基和其他的人。托洛茨基在大會上的發言，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

列寧爲無產階級的預備而鬥爭（民族問題與農民問題）策略的問題（對自由資產階級和社會革命黨等的態度）。

關於黨章第一條的內容的問題。列寧反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的鬥爭。列寧爲黨章第一條鬥爭的歷史意義。大會上普列哈諾夫的態度。

黨中央機關的選舉與二次大會上的分裂。黨內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小組織的產生。

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布爾塞維克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次大會的決議。同孟塞維克與調和派的鬥爭。多數地方黨的組織擁護二次大會的決議與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孟塞維克反對黨中央機關和二次大會決議的活動。普列哈諾夫轉向到孟塞維克方面。列寧退出《花報》的編輯部。《花報》落於孟塞維克之手。

布爾塞維克中央中的調和分子（克拉辛、諾斯可夫等）調和派佔據中央委員會。布爾塞維克委員會分局的建立。

二次大會在組織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意義。二次大會黨內分裂的國際意義和黨內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小組織的產生。

第三章 日俄戰爭和第一次革命

——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時期中的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

一九〇五年前俄國的革命運動和階級力量的對比

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俄國工人農民的狀況。工人運動的發展，布爾塞維克是工人階級的領袖。一

九〇四年斯達林在巴庫所領導的罷工及其對於全國罷工運動發展的影響。農民反地主的鬥爭。邊區的民族解放運動。

帝國主義國家爭取太平洋統治權瓜分中國的鬥爭。沙皇的侵略政策及其在遠東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衝突。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對於戰爭的態度。

戰爭中沙皇的失敗。日俄戰爭對於俄國階級矛盾尖銳化的影響。國內革命運動和反政府運動的發展。『議會運動』及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態度。

一九〇八年一月九號俄國革命的開始。一月九號後國內的情形。春季的工潮。五一的示威。農村中農民的騷擾。

一九〇九年第二國際在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的大會。第二國際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態度。布爾塞維克獨立代表團參加第二國際的六次大會。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路線

一九〇五年革命時階級力量的對比。推翻專制，肅清農奴制度的殘餘。這是革命的當前任務。地主階級是沙皇制度的支柱。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開始時的動搖。布爾塞維克獨立與自由資產階級的

鬥爭。

俄國革命的特點——第一次的革命是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動力，是革命的領導者，農民是在反沙皇制度鬥爭中工人階級同盟者。

列寧、斯達林爲召集第三次黨大會的鬥爭。斯達林在高加索的黨的組織內爲着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的路線進行反對孟塞維克和調和派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委員會分局在準備三次大會上的作用。

一九〇五年四至五月間在倫敦開黨的三次大會，三次大會的決議是武裝暴動，臨時革命政府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對其他黨派的態度等問題。三次大會上的組織問題。通過了黨章第一條列寧的條文。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和孟塞維克的策略。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布爾塞維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列寧將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

布爾塞維克在革命中反對孟塞維克路線的鬥爭。日內瓦孟塞維克的代表大會。孟塞維克在革命中的策略是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無產階級應受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否認農民的革命的作用。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孟塞維主義的變形。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反對其他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鬥爭。社會革命黨是

主張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並且革命應受資產階級的領導。

一九〇六年社會革命黨的第一次大會及半立憲民主黨的「人民社會黨」脫離了社會革命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勞動社」是動搖於社會民主黨與立憲民主黨之間。

一九〇五年列寧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人的兩個策略的意義。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黨在事實上獨立的存在。

革命的發展

一九〇五年夏秋兩季罷工運動與農民騷擾的發展。革命運動浸入了軍隊中。一九〇五年六月「普基姆金」軍艦的暴動，君主立憲派自命為「立憲民主黨」——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

布里金的國會與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的策略。赤衛隊的產生。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產生及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對它的態度。

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政治總罷工。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號的宣言，自由資產階級準備同沙皇制度分贓妥協。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寧由外歸來。

高加索的工人農民在斯達林領導之下，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是武裝暴動的組織者。莫斯科十二月的武裝暴動（洛斯託夫、頓城、新羅西斯克、烏拉爾、西伯利亞、高加索等。）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對於武裝暴動教訓的估價。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後的布爾塞維克黨

一九〇六年的革命環境，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繼續和農民運動的發展。

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建設和戰爭工作。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泰米福爾的代表大會。

大會關於形式上同孟塞維克合併的決議。一九〇六年三月國會第一次的選舉。對於第一次國會的態度，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抵制，孟塞維克的策略是參加。

一九〇六年四月至五月間在斯托克霍姆黨第四次的聯席會議及其重要的決議。列寧同斯達林在大會上，是擁護多數黨在革命中的路線，反對了少數派。

一九〇六年夏季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一九〇六年七月在史弗布爾格和克隆斯坦的海員暴動。一九〇六年七月第一次國會被解散。一九〇七年二月第二次國會。在選舉第二次國會時，關於選舉策略的問題，彼得堡的組織發生分裂。布爾塞維克參加第二次國會的選舉。布爾塞維克左派反對孟塞維克與立憲民主黨妥協的策略。

孟塞維克公開的同立憲民主黨聯盟。布爾塞維克黨為召集第五次黨大會而鬥爭。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開第五次黨大會。大會主要的決議及其意義。斯達林關於倫敦會議，寫了一篇文章為代表的感育。大會上有布爾塞維克的勝利，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提案。

第二次國會被解散。一九〇七年六月三號的政變。革命的失敗，專制暫時的勝利，反動時期的到來。列寧二次出國。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敗的原因。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的國際意義。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偉大無產階級革命的總演習。

第四章 斯託理賓反動時代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

——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布爾塞維克形成獨立的社會民主黨——

斯託理賓的反動。斯託理賓時代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斯託理賓是沙皇同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斯託理賓的農村改革，是沙皇在農村中依賴富農的企圖。沙皇政府反對工人農民的恐怖。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的脫離革命。在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中消沉幻想的情緒與思想的發展。小資產階級政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的分裂與瓦解。沙皇政府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恐怖。地下工作中的布爾塞維克

黨。列寧、斯達林爲保持和鞏固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秘密組織的鬥爭。反動時代布爾塞維克黨的策略是秘密工作及在秘密黨的領導之下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布爾塞維克黨在職工會、病院、合作社和其他公開與半公開組織中，工人組織中的工作。一九〇七年十月選舉第三次國會，布爾塞維克揭破反黨的抵制國會的態度（卡米尼夫、波格達洛夫）。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布爾塞維克全俄代表大會。布爾塞維克對於形勢及革命前途的估計。布爾塞維克黨貫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布爾塞維克黨爲着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這三個不可分離的口號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反對取消派的鬥爭，取消派企圖取消沙皇制度下秘密的黨組織「斯託理賓黨」。取消派是孟塞維主義繼續發展的階段。

列寧、斯達林反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託洛茨基主義是以取消主義作基礎的中間派的變形。反對召回派的鬥爭（波格達洛夫、阿列克新斯基、波克洛夫斯基、盧那察爾斯基等）。一九〇九年，無產者編輯部的決議，開除召回派的黨籍。反對徐諾維夫、卡米尼夫、李可夫、託姆斯基等對於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主義的調和態度。一九一〇年中央的一月會議。布爾塞維克黨同孟塞維克黨員（普列哈諾夫）聯合反對取消派和中間派的鬥爭。列寧、斯達林論這次聯合的原則的基礎。

斯達林在高加索爲着保持和鞏固布爾塞維克秘密黨的組織與反對取消派與召回派的鬥爭。巴

金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是在斯達林的領導下，這是高加索黨組織的支柱，是列寧黨不可摧毀的堡壘。斯達林被放逐及其逃亡與參加黨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布魯塞爾的代表大會及布爾塞維克獨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

斯達林從放逐中逃往彼得堡。斯達林在俄國對於黨的工作的領導。布爾塞維克準備召集全俄的黨代表大會。在沃爾聖里斯基領導下俄國組織委員會的成立。斯達林到巴庫和替夫利斯準備召集布魯塞爾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

一九二二年一月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及其意義。一切機會主義派與小組織之被開除黨籍。布爾塞維克形成獨立的社會民主工黨，選舉中央，列寧為領袖。斯達林被選入黨的中央。以斯達林為首中央分局的成立，指導俄國黨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國際中間機會主義中間派的分裂隔離的路線。布爾塞維克對於左派的擁護（盧森堡等）但並不放棄對於他們錯誤的批評。

第五章 世界大戰前工人運動高漲時期的布爾塞維

克黨

——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

工業繁榮的開始，工人罷工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活躍。農民中革命運動的高漲。一九二二年四月

的林斯基事件。一九二二年的五一罷工。罷工運動的政治性

革命高漲時期布爾塞維克黨的策略。在新的革命鬥爭中布爾塞維克的基本口號。布爾塞維克黨三個不可分離的口號及爲着部份要求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黨對罷工鬥爭的領導。保證金運動。爲工會組織的鬥爭。爭取對於工人階級領導同取消派的鬥爭。取消派與托洛茨基派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聯盟。布爾塞維克黨反對托派，取消派的八月聯盟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反對工人的聯盟。一九二二年四月真理報的產生。列寧、斯達林也組織真理報中的作用。莫洛託夫在真理報的工作。真理報在團結廣大羣衆在布爾塞維克黨周圍而鬥爭中的作用。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月第四次國會的選舉運動。彼得堡工人對於自己工人的代表給與了斯達林的指示。布爾塞維克選舉工人代表參加第四次國會的勝利。在第四次國會中的各種黨派。國會中布爾塞維克的黨團。列寧、斯達林對於第四次國會黨團工作的領導。

一九二二年第二國際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大會及其對於戰爭的決議。列寧、斯達林在民族問題上爲布爾塞維克政綱的鬥爭。斯達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俄國中央分局的工作（斯達林、西耶特亞、沃爾塞理斯基、史維特洛夫）。一九一三年中央的二月的聯席會議。斯達林參加道次的會議。斯達林的被捕及放逐。

大戰前夜俄國革命的高漲與歐洲的政治危機。一九一四年夏在彼得堡、巴庫及俄國其他工業中

心的罷工與示威。一九一四年七月彼得堡的巷戰。布爾塞維克是革命高漲中羣衆的領袖。

第六章 大戰時期的布爾塞維克黨與俄國的二月革命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三月——

大戰時期的布爾塞維克黨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開始。大戰爆發的原因及其帝國主義性。俄國沙皇專制及俄國資本主義對於西歐資本的依賴。在戰爭中俄國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之帝國主義性的利益。沙皇政府反對工人運動恐怖的增加。

各階級對於戰爭的態度。立憲民主黨變爲帝國主義性資產階級的政黨，公開的擁護沙皇對外的侵略政策。第二國際的瓦解。第二國際大多數的黨均轉向擁護帝國主義祖國的態度（社會愛國主義）。俄國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等）的防禦態度。考茨基的中派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是俄國中派主義的變形。社會革命黨的防禦態度（克倫斯基，基爾洛夫等）。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黨中央的宣言。大戰時期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大戰中本國政府失敗的口號，同

社會愛國主義與中派主義脫離關係。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列寧認為在一個國家有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一九一五年）。

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在大戰中的工作。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國會內布爾塞維克黨團之被捕及其審判。

一九一五年在法庭卡米尼夫的叛黨行爲。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時俄國的環境。前綫上沙皇軍隊的失利。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保守派，前進聯盟及其他派別）。各種資產階級組織的建立。幫助政府進行戰事（全俄自治聯盟，全俄市鎮聯盟，軍事工業委員會等）。孟塞維克對於這些資產階級組織的幫助。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繼續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黨組織的恢復與鞏固。一九一五年中央俄國分局的建立。斯達林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上擁護列寧路綫的鬥爭。斯達林從杜魯漢斯基放逐中的來信。布爾塞維克在軍隊和海軍中的組織及其宣傳鼓動工作，軍事俘虜中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對於一切合法的可能之利用（職工會，保證金運動，合作社等等）。

罷工運動的發展。農民革命情緒的增長。邊區被壓迫民族反對沙皇政治的革命，騷動與活躍。一九一六年中亞細亞的暴動。布爾塞維克在反沙皇政府鬥爭中的領導，在莫洛託夫領導下的布爾塞維克中央分局的作用。布爾塞維克爲組織第三國際的鬥爭。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齊米瓦爾德和金

塞爾的國際大會，布爾塞維克在國際大會上爲自己的路線而鬥爭。齊米瓦爾德大會上左翼的組織，布爾塞維克反對左翼（拉狄克、盧森堡等）在第二國際中錯誤的鬥爭。布爾塞維主義是共產國際唯一的思想基礎。大戰時期列寧反對布哈林，畢答可夫與拉狄克等反布爾塞維克活動的鬥爭，同時與徐諾維夫、卡米尼夫對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進行鬥爭。

二月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二月革命前夜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大戰中沙皇政府的失敗。工業與運輸的衰落，農村經濟的衰退，給養的困難。羣衆不滿的增長。兩次反革命的陰謀。

反對沙皇政府武裝暴動的準備。反對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企圖將革命運動引向合法的方向（傾向於國會制度等）。彼得堡布爾塞維克黨委員會在工人士兵中的工作。

三月八號（二月二十三號）國際婦女節，布爾塞維克黨所組織的示威。三月十號的罷工，三月十一號布爾塞維克發表的宣言，號召武裝的推翻沙皇政府。罷工轉變爲暴動。

革命的勝利，軍隊轉向暴動的無產階級方面來。俄歷二月二十七號工人同着穿上軍服的農民推翻了沙皇的專制。在彼得堡成立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在各省也成立了蘇維埃。蘇維埃是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臨時政府的成立（三月二號）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政的機關。兩重政權是二

月革命最主要的特點。兩重政權的原因。第二次俄國二月革命開始時的布爾塞維克黨。斯達林從放逐中回到彼得堡，布爾塞維克黨逃出秘密的工作及各地布爾塞維克黨組織的鞏固。布爾塞維克黨爲着革命繼續的發展，爲着各地蘇維埃的組織與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而奮鬥（工廠委員會，職工會等）黨爲着武裝無產階級和組織工人糾察隊而鬥爭。布爾塞維克黨在斯達林的領導之下，反對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投降政策，反對國主義戰爭的鬥爭，反對卡米尼夫機會主義的鬥爭。

二月革命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開始。

第七章 準備和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布爾塞維

克黨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九一八年——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四月的代表大會布爾塞維克爭取羣衆的鬥爭七

月事件

臨時政府繼續沙皇政府帝國主義的政策，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與國民經濟繼續的破壞。民族運動的發展（烏克蘭、高加索等地）農民反地主的鬥爭與臨時政府反對農民運動的鬥爭。

第二次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階級力量的對比。資產階級各政黨。立憲民主黨是帝國主義性資產

階級的政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擁護臨時政府。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性資產階級左翼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民主中小資產階級左翼的代表，他們主張保持並改善資本主義。革命開始時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羣衆中發生影響的原因。

列寧歸國。列寧的四月提綱，其本質及其世界歷史的意義。布爾塞維克黨的方針，是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布爾塞維克黨的口號是：『政權歸蘇維埃』，『不幫助臨時政府』，『工人監督生產』，『土地給農民』。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後，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戰爭問題的路綫。布爾塞維克黨爲停止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在準備和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黨對於農民各階層的態度。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號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的示威。臨時政府政權危機的開始。揭破普格太也夫左的機會主義的冒險路綫。聯合政府的成立——是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同資產階級公開的聯盟。

布爾塞維克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於彼得格勒）及其歷史的意義。列寧關於政治現勢的報告。大會通過了列寧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

大會上列寧、斯達林同右派分子（卡米尼夫、李可夫等）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見鬥爭。斯達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指摘了畢塔可夫和其他人的意見）。布爾塞維克在羣衆組織中的影響及其

黨的工作。當前主要的任務是剷除各妥協政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羣衆中的影響。真理報、士兵真理報、火綫真理報，這些布爾塞維克黨報紙的作用。黨的迅速發展和新的黨內幹部的出現。

第一次全俄的蘇維埃大會。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六月間前綫的進攻及其失敗。六月三號至五號的示威和臨時政府對於示威的屠殺，並有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直接的參加。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公開投入反革命。反布爾塞維克的恐怖。列寧的地下工作。

兩重政權的結果。黨的策略的改變。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暫時取消。

布爾塞維克黨直接準備武裝暴動的方針。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布爾塞維克黨第六次大會於彼得格勒和直接準備武裝暴動的方針。列寧給與大會的訓示。斯達林是大會的直接領導者。斯達林在大會上的報告。斯達林大會上的發言，擁護在一個國家內能够建設社會主義的列寧的理論。斯達林在大會上反機會主義者的鬥爭（羅根、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等。）大會上的組織問題。通過中間派（托洛茨基等）入黨。

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動員。莫斯科的國家會議。莫斯科工人的總罷工。可利洛夫及其瓦解。同可利洛夫派鬥爭中，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作用。布爾塞維克揭破克倫斯基派反革命的作用。

工人武裝赤衛隊的鞏固，工人羣衆轉向於布爾塞維克方向。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和其他的組織中，爭取了大多數。重新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及其在這個時期內的意義。一九一七年九月十

二日的民主會議及「代議會」是反革命的中心。布爾塞維克抵制「代議會」。李可夫、卡米尼夫等對於民主會議及「代議會」之孟塞維克的立場。

罷工運動的發展。反對地主和農村資產階級農民運動的發展。羣衆脫離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影響。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瓦解。十月前的國際環境。

列寧關於準備武裝暴動的信。組織以斯達林爲首的領導暴動的行動中心（五人組）。徐諾維夫與加米尼夫的背叛。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發表叛黨的言論。反對黨關於暴動的決定。列寧、斯達林在暴動前反對內奸——卡米尼夫、徐諾維夫和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臨時政府動員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進攻革命。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及其國際的意義

一九一七年俄歷十月二十五號（十一月七號）在彼得格勒的武裝暴動。偉大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臨時政府的倒台。一切政權轉到蘇維埃之手。勞動農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之擁護。列寧、斯達林是暴動的直接領導者。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至八號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大會決定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頒佈和平與土地的法令。以列寧爲首組織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在莫斯科及其城市內的武裝暴動。

同反革命分子怠工的鬥爭。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是怠工的組織者。

粉碎反革命的中心（杜賀林、克拉斯洛夫、恰列金等。）以季倫斯基為首組織非常委員會。

布爾塞維克黨同右派變節者及好細分子（徐諾維夫、卡米尼夫、李可夫等）的鬥爭。

右派同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談判恢復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右派脫離負責的工作。揭穿右派的實質並撤消其工作。

蘇維埃政權的凱旋。地主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破壞及各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布爾塞維克為着維持鞏固這一政權的鬥爭。銀行、鐵路收歸國有。實行對外貿易的壟斷。實行工人階級對於生產和分配的監督，工業開始收歸國有。廢止民族的壓迫。開始組織紅軍。

解散立憲會議。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蘇維埃大會。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的民權宣言。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及其動力。蘇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開始。十月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和前提。

布爾塞維克黨為停止帝國主義的戰爭而鬥爭。當時俄國的環境。布勒斯特和約。列寧、斯達林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共產黨的鬥爭（布哈林、墨塔可夫等。）『左翼』的共產主義是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反映。列寧稱布哈林和左翼的投機者為瘋狂的小資產階級。布勒斯特和約時托洛茨基的出賣。

作用。

托洛茨基破壞列寧、斯達林關於構和的指示與德國帝國主義者的進攻。

關於和平問題列寧路線的勝利，締結布勒斯特和約與休息的取得。黨第七次的大會及批准列寧關於和平問題的路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爲俄國共產黨（布）。

一九一八年春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爲統計、監督、提高紀律及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鬥爭。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左翼共產黨」之小資產階級的綱領及列寧、斯達林對它的鬥爭。列寧著《左傾幼稚病及其小資產階級性》。列寧關於俄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意見，指出小商品經濟的優勢和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

貧農委員會的建立，同富農的鬥爭，及農村中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展。

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五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憲法。

第八章 內戰時（一九一八——一九二〇）的布爾塞

維克黨

休息的結束，外國開始干涉及國內戰爭的展開。

國際帝國主義者在組織反革命的戰爭和干涉中的作用。

捷克軍隊的變亂，英國隨戰隊在姆爾曼斯克登陸，日本的在海參威登陸，德軍佔據烏克蘭，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替干涉者服役。一九一八年夏社會革命黨富農反革命的暴動結束休息。內戰開始。

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變亂。白黨，社會革命黨反布爾塞維克黨的恐怖。社會革命黨謀刺列寧。工農反對俄國白黨和國際反革命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保衛無產階級的國家，正規紅軍的成立。實行政治委員制度。爲麵包，爲社會主義的鬥爭。斯達林在南俄領導籌集糧食的工作。

守衛查理城，及斯達林與伏洛希洛夫的作用。以列寧爲首成立國防委員會，領導前後方防衛的一切工作。在後方同反革命的鬥爭。莫斯科的赤色恐怖。

德奧匈的革命。布勒斯特和約的廢除。收回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英國在中亞細亞和高加索的軍事干涉。英國軍隊槍殺二十六名巴金斯基部隊的政治委員。

一九一八年秋可爾恰克的出現，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

布爾塞維克黨同可爾恰克及但尼金的鬥爭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至二十三號第八次黨大會於莫斯科。通過新的黨綱。對於黨綱問題，列寧反對布哈林和皮塔可夫的鬥爭。內戰時工農的軍政聯盟。

八大大會決定改變中立中農的政策，爲同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八次大會上的軍事問題

一九一九年春協約國第一次反蘇聯的出征。

布爾塞維克黨戰勝了可爾恰克。一九一九年夏可爾恰克的瓦解。斯達林在瓦解可爾恰克中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秋協約國第二次反蘇聯的出征。波蘭軍隊之佔領白俄羅斯。但尼金、猶金里奇的進攻。但尼金佔領哈爾可夫和基也夫。反但尼金的鬥爭。取消托洛茨基的計劃。列寧撤消托洛茨基對於紅軍作戰的領導，委任斯達林指導反對但尼金的戰爭。斯達林粉碎但尼金的計劃，及紅軍執行的情形。但尼金的瓦解。爭取彼得格勒的鬥爭，和粉碎猶金里奇、斯達林的作用。

國內的糧食恐慌。頒佈實行糧食徵發的法令。工業國有及其供給戰爭需要上的動員。

軍事共產主義是內戰時黨的經濟政策。內戰時黨的工作。『黨週制』。布爾塞維克黨在可爾恰克和但尼金內的秘密工作。白黨後方的游擊運動。

同波蘭軍隊及弗蘭格爾軍隊的鬥爭。內戰勝利的結束。

但尼金瓦解後（一九二〇年初），暫時的休息。同經濟的破壞作鬥爭。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至四月五號黨第九次的大會。九次大會對於經濟問題和黨內建設任務的決議，黨同反黨派「民主中間主義」的鬥爭。

這一時期國際工人和革命運動的發展。第二國際內部的分化。社會民主派下面的工人傾向於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列寧著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

協約國第三次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出征。波蘭軍隊和菲蘭格爾軍隊的進攻。波蘭軍隊的進攻和烏克蘭一部之被佔領。紅軍的反攻，波蘭軍隊的瓦解。同波蘭構和。粉碎菲蘭格爾內戰勝利的結束。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蘇維埃第八次大會通過了列寧全國電氣化的計劃。

布爾塞維克黨是內戰中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組織者及領袖。

列寧、斯達林在內戰時對於紅軍的領導和組織蘇維埃政權勝利中的作用。

內戰時在前綫上的伏洛希洛夫、福隆基、基洛夫、庫比雪夫、沃爾松里斯基和卡岡諾維契。

內戰中的英雄——布景乃及其騎兵，夏伯陽、索爾斯等。

在反對國際反革命和國內反革命的鬥爭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同情和贊助。

第九章 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間在過渡時期內布爾

塞維克黨進行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的勞動

內戰後國內的情勢，關於職工會的爭論，轉變到新經濟政策

內戰後蘇維埃共和國軍事、政治的情形。工業與農業的衰退。農民對糧食徵發制度之不滿。小資產階級散漫性的增強。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革命行動的活躍。安東洛夫派與馬里洛派、克羅斯坦的變亂。

轉變到和平經濟建設之困難。在新的環境下，列寧、斯達林論黨新的任務與領導羣衆的新方式。

關於職工會的爭論，與黨內的危急。列寧、斯達林論職工會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共產主義的學校。關於職工問題。列寧、斯達林反對托洛茨基派的綱領（職工會之國家化）。工人反對派（西尼布利可夫、克隆太等）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映。

布哈林、托洛茨基、反列寧路線的聯盟。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主張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勝利的反映。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所謂之「民主中間主義」的綱領。在職工會問題的爭論中，反列寧派的主張是小資產階級散漫性的反映。

一九二二年三月八號至十六號第十次黨大會

糧食稅制代替糧食徵發制，轉到新經濟政策。列寧、斯達林認爲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

期，無產階級的唯一正確的政策即是新經濟政策。列寧、斯達林反對托洛茨基同布哈林對新經濟政策實質的曲解。

第十次大會關於黨內統一和禁止小組派別存在的決議。

大會決定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傾向及工人反對派的觀點不能與黨相容。職工會問題通過了列寧、斯達林的路線。斯達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黨第十次大會上認為同主要的危險大斯拉夫的愛國主義鬥爭，同時同地方的民族主義鬥爭。

第十次大會代表的動員，鎮壓克隆斯坦的變亂。

一九二一年的國際環境。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七月的第三次共產國際大會。

新經濟政策初期時的布爾塞維克黨

蘇維埃共和國國內和國際地位的鞏固。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的恢復。國內的階級鬥爭同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反革命行動活躍的企圖。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反革命派「工人反對派」、「工人派」、「工人真理派」之被克服。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第十一次黨大會，列寧的報告。退讓的結束。「學習經商」的口號。列寧提出「誰戰勝誰」的問題。列寧論幹部的挑選和執行的檢查。在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的

作用。

轉變到新經濟政策後黨的建設。清黨運動與黨內成分的調濟。

一九二二年選舉斯達林爲黨中央的總書記。一九二二年全蘇聯第一次蘇維埃大會，斯達林報告在蘇維埃國家內，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自願的基礎上，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蘇聯的成立，及其對於個別民族共和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斯達林在建立蘇聯中的作用。

列寧最後的著作《合作社、日記、錄》等。

斯達林在大會上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第十二次黨大會上關於兩條戰線的鬥爭，並且主要的危險是民族問題。

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恢復時期經濟上的困難，和黨內反對托洛茨基派與徐諾維夫派的鬥爭。

恢復時期經濟的困難。工業品與農產價格剪刀形的發展。黨對於鞏固城市與鄉村聯盟的辦法減低價格的政策，幣制的改革，改善國家機關工作的鬥爭。

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西歐帝國主義組織反對蘇維埃共和國戰爭的企圖。

一九二三年五月克爾聖哀的美敦書及伏洛夫斯基在洛桑之被刺。

托洛茨基對於布爾塞維克黨的路線的攻擊。

托派的方針是縮減重工業，因其無利可圖；對於工業品價格的問題，是破壞同中農聯盟的路線；主張小組的自由；反對黨的一致等等。

一九二三年的爭論。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號，黨中央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布爾塞維克黨在斯達林的領導之下，進行勝利的鬥爭，反對托洛茨基主義，擁護列寧的路線和黨的統一。

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號至十八號），斯達林在大會上的報告。大會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列寧在黨內的號召。斯達林在列寧墓前的誓詞。全蘇聯第二次的蘇維埃大會。批准全蘇聯的憲法。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至三十一號，第十三次黨大會關於在新的條件下黨內的組織工作。第十三次黨大會和第五次共產國際大會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制裁。

布爾塞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企圖曲解布爾塞維主義的歷史，並且用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托洛茨基著十月的教訓）。

托洛茨基主義思想上的解體。斯達林列寧主義概論的意義。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恢復時期的蘇聯的國際地位。英國、意國、奧國、希臘、瑞典、丹麥、匈牙利、日本等國之承認蘇聯。同西歐各國商業的發展。蘇聯參加裁軍會議。

恢復時期蘇聯工業和農業的狀況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至三十九號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基倫斯基關於鋼鐵工業的報告。大會決定以後工業發展的方針，鞏固工農聯盟和提高農村生產。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認為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建設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局部的相對的穩定。

蘇聯同資本主義國家間矛盾的尖銳化，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一九二五年秋間的經濟困難。徐斯維夫、卡米尼夫組織反列寧的列寧格勒反對派——即新反對派，他們的政綱是恢復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在蘇聯社會主義不能勝利的理論。

第十四次大會前，徐斯維夫、卡米尼夫反對布爾維塞克黨列寧的中央。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至三十一號第十四次黨大會——這是關於工業化的大會。斯達林論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鬥爭中黨的唯一正確的總路線，重工業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變農業國的蘇聯為工業國的蘇聯。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為爭取蘇聯經濟獨立的鬥爭。同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斯達林揭破新反對派孟塞維克的實質，揭破史柯里可夫『復活的政綱』。

第十四次黨大會上徐諾維夫反對派的失敗。

第十四次黨大會關於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布爾維塞克黨的敵人。揭破布哈林關於「富裕」的口號。主要的火力向着徐諾維夫，托洛茨基派。俄國共產黨改名為聯邦共產黨。

基洛夫的作用，在反對徐、托反對派時他是列寧格勒布爾維塞克黨的領導者。

第十章 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黨為

全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而鬥爭

黨實現列寧全國工業化的政策並同徐托聯盟作鬥爭

在落後的小農國家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資本主義的包圍同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局部穩定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矛盾的尖銳化。反蘇聯戰爭威脅的增強。國際帝國主義挑撥反蘇聯戰爭的企圖。英國保守黨反蘇聯的活動。在北平包圍蘇聯領事館。英國警察襲擊蘇聯在阿爾可斯的商務代辦處。廢除商務協定與英蘇的絕交。

蘇聯駐波蘭大使弗衣可夫的被刺。

外國派到蘇聯內部來的危害者與偵探們的破壞工作。

蘇聯爲着和平與廢除軍備的鬥爭。蘇維埃政府提議立即全部的廢除武裝。

資本建設社會主義集羣問題順利的解決。黨爲着正當的利用資本和節省制度的鬥爭。工業投資的增加。生產手段生產速度的加速是在加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工業建設的開始（德尼泊水電、土西大鐵道、斯達林城的機器工廠等）。

農村經濟繼續的發展。合作社的鞏固是工業、農業間聯系的基本方式。加強限制和排擠富農的辦法。稅收政策。減低價格。黨同政府對於提高蘇維埃工作的辦法。蘇維埃的改選。黨爲鞏固工農聯盟而鬥爭。

以托洛茨基主義爲基礎的徐托聯盟的形成。徐托派走上了祕密的反蘇維埃政黨的道路。無原則的武斷宣傳與兩面派的態度，是徐托派反黨鬥爭方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號至十一月三號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會議，認爲徐托聯盟是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徐托反對派轉到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鬥爭。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決定開除徐諾維夫和托洛茨基的黨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號至九號第十五次黨大會，是農村集體化的大會。斯達林的報告。

斯達林關於農業機器化和集體耕種的基礎上組織聯合的大規模經濟時黨在農村中的任務。堅

決排擠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大會關於起草五年計劃的訓令。

第十五次大會決定，隸屬於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分子，不允許留在黨內。

十五次大會開除徐、托反對派重要領袖的黨籍。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及同右派的鬥爭

大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比工業發展落後。五穀的問題。富農反對農村中集體運動的獸性的鬥爭。破壞屯集糧食的企圖。在糧食線上的黨。五穀問題的意義及屯集上困難的原因。屯集糧食的組織和對富農富裕分子的進攻。一九二八年的緊急辦法。一九二八年四月和六月會議的訓令。加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的建設。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資產階級的專門家的危害工作，政治上對蘇維埃政權公開的仇視（沙黑金事件）。

黨的路線是在有系統的減低成本，鞏固勞動紀律，展開社會主義的競賽。口號是把握技術。中央關於訓練專門幹部的決定。動員羣衆的力量，執行五年計劃第一年的經濟計劃。

斯達林是布爾塞維克進攻的組織者。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黨中央關於自我批評的告同志書（一九二八年六月）。

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問題。右派反對黨總的路線的進攻。

布哈林關於熄滅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轉化到社會主義中去的機會主義的理論。

莫斯科黨部和職工會內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同志，反對黨及其中中央的鬥爭。實際上右派是擁護托洛茨基關於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右派同托派談判的企圖（布哈林同卡米尼夫的批判）

揭破右傾機會主義者為黨內富農的代言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中央會議，關於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右『左』派機會主義者，反對調和派。十一月的中央的會議，認為右派是黨內主要的危險。

一九二八年七月第六次國際大會，大會上通過了國際綱領。

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討論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問題。動員整個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力量，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任務。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社會主義競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大建設中的作用（庫茲尼奇馬格里特，得尼泊，斯達林機廠等建設）。

黨同官僚主義作鬥爭的辦法，及羣衆組織工作的改造。一九二九年的清黨。

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因為反革命的活動放逐出國。托洛茨基主義變成了無原則，無思想的工人階級兇惡的敵人，外國偵探機關所御用的匪徒。一九二九年七月，共產國際第十次執委會決定取消布

哈林爲共產國際執委委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央會議開除布哈林聯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警告李可夫及託姆斯基，並決定在黨內不容許宣傳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右傾機會主義繼續兩面派反黨的鬥爭

帝國主義重新企圖組織反蘇聯的同盟和干涉。一九二九年中國軍閥在遠東的挑釁，遠東特別紅軍的勝利。

爲執行五年計劃而鬥爭。五年計劃第一年超過的執行。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蘇聯在各個戰線上社會主義決定的勝利。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的發展。農民的基本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轉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集體運動普遍的發展。中農參加到集體農莊中來了。一九二九年是偉大的轉變年。

第十一章 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黨爲農村經濟

集體化而鬥爭

布爾塞維克黨爲着社會主義的進攻而鬥爭

世界的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國家內矛盾的尖銳化。帝國主義反蘇聯的企圖。反蘇聯戰爭危機的加緊。

黨團結着貧農，把中農組織在一起。進行反富農的鬥爭。向勞動農民解釋集體耕種的優點。政府用農村借貸和機器幫助集體農莊。開始組織機器站。

集體運動猛烈的發展。全盤集體化的口號。在農村中限制排擠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轉變為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號聯邦共產黨中央決議，規定集體化的速度。在集體建設中，黨同右傾機會主義與「左」的傾向的鬥爭。斯達林著勝利冲昏了頭及給集體農民的回答的意義。在集體建設中，機會主義的瓦解與黨的路綫的勝利。第十六次黨大會時，工業和農村經濟中的勝利。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至七月十三號，第十六次黨的大會——這是在全線上開展社會主義總的進攻的大會。斯達林在大會中的報告。蘇聯進到了社會主義的時期。「農村經濟的命運及其基本的問題不是由私人的農民經濟來決定，而是由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來決定。」集體的莊員，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真正的堅固的基礎。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而鬥爭。大會決定右派的觀點不容許在黨內存在。十六次大會關於兩條戰線的鬥爭，主要的是右傾的危險。揭破與帝國主義有聯系的反革命的組織。「工業黨」、「孟塞維克的聯合委員會」肯特拉奇也夫的富農黨。揭破「左」右派的聯盟——西爾佐夫、羅敏留爾。

徐托派、右派等的匪徒們轉到反黨反蘇維埃秘密的、恐怖的、危害與偵探的活動。

一九三一年二月斯達林關於「經濟人員之任務」的演講。『把握技術』的口號之提出。一九三一年六月斯達林論在新的環境下社會主義建設之基本的任務。所謂斯達林同志的六個條件。

集體化的勝利及黨爲鞏固集體建設的鬥爭。肅清混入到集體農莊內的富農，鞏固勞動的紀律。在集體農莊內同偷竊浪費公產的鬥爭。黨在集體農莊中培養布爾塞維克幹部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〇號至二月四號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討論第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任務。大會討論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爲鞏固社會主義的財產而鬥爭。

托派右派反黨的祕密的反革命的鬥爭

牛津、耶斯姆特反革命派的揭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始。

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內完成。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中央聯席會議。斯達林關於五年計劃總結的報告。

在城市和鄉村『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最後的解決了。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國內大工業的建設，許多新的工業部門的建立（鐵工業，機器工業，農村機器工業，汽車工業，航空工業等。）蘇聯經濟獨立的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和國防的鞏固。社會主義的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社會主義的改造

中和建立技術基礎中的作用。創立大的農村經濟的機器建設。農村經濟的機械化（拖拉機、康比因機等）。

黨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中最複雜任務的解決——農村經濟轉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變爲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的國際意義。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的聯席會議，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任務。斯達林認爲建設的熱情上還要加上學習的熱情。斯達林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發展的速度。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及國內階級殘餘鬥爭的尖銳化。德國法西斯蒂的執行。祕密的徐、托反革命組織。依照法西斯蒂偵探機關的指示，進行恐怖的、危害的、破壞的和偵探的工作。

開展社會主義的進攻與階級敵人反抗的尖銳化。農村中富農的怠工。

斯達林論農村黨組織和黨員工作的缺點。在農村中建立政治部。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一次集體農民的大會。斯達林的口號是：『集體農莊應成爲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民應該是富裕的。』粉碎富農的怠工。集體農莊工作根本的轉變。在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反革命民族的瓦解。爲鞏固黨的隊伍而鬥爭。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的清黨。

第十七次黨大會是勝利者的大會（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至二月十號）。十七次大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大會上斯達林的報告。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黨的工作的綱領。莫洛託夫、庫比雪夫

二同志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十七次大會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基本的經濟政治任務的討論。大會上的組織問題。卡岡諾維契的報告。十七次大會提出『提高組織上的領導到政治領導的水準』的必要。成立黨內監察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委員會。制定了新的黨章。斯達林論民族問題中一般政策的主要危險。

社會主義工業猛烈的發展。黨爲着改善運輸工作而鬥爭。蘇維埃商業的發展。在工業和農村經濟中突擊隊和模範隊運動的發展。勞動大衆物質生活的改善。

一九三四年中央十一月會議，取消糧食證的制度。

機器站的政治部改組爲普通黨的機關的決改。

徐、托匪徒剝殺列寧格勒工人的領袖，中央書記之一——基洛夫。黨爲整理黨內的經濟而鬥爭，檢查黨的文件。驅出混到黨內來的兩面派和托派強盜——黨的內奸。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爲提高黨的覺悟性而鬥爭。

勞動羣衆團結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在蘇聯人民的領袖，全世界勞動大衆的領袖——斯達林同志的周圍而鬥爭。

第十二章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在完成社會主義建

設和實行新憲法而鬥爭中的聯邦共產黨

黨爲着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而鬥爭

工業猛烈的發展。運輸落後的克服。卡岡諾維契在提高運輸中的作用。黨爲着重工業的發展而鬥爭。蘇聯的國防力量 and 紅軍威力的鞏固。工人階級的發展。勞動大衆物質生活的改善。黨爲着有爾塞維克的集體農莊及其富裕的生活而鬥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第二次全蘇聯集體農民——突襲隊員的大會。通過了集體農莊生活之斯達林的規章。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會議決定以中央的名義向全蘇聯的蘇維埃大會提議修改蘇聯的憲法。以斯達林爲首組織憲法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五月，斯達林提出的口號是幹部決定一切。斯達林論對於人——蘇維埃勞動公民加強注意。世界上一切最有價值的資本就是人——幹部（斯達林）。

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認爲蘇聯已經是社會主義最後的和不變的勝利。黨爲實現斯達林的指示——幹部把握技術而鬥爭。羣衆創造性的提高。史達哈諾夫運動是社會主義競賽新的更高的形式，爲高度勞動生產力而鬥爭的形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全蘇聯史達哈諾夫者的

大會。斯達林的口號，要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到專門技術勞動之工作人員的水準上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中央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史達哈諾夫運動的決議，在各民族共和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各民族共和國文化的發展，這種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是社會主義的內容。第二個五年計劃順利的執行。

五年計劃中，工業及鐵道運輸早期的完成。集體農莊制的全部勝利。

機器駕駛員，農業突擊隊員，牧場工作人員，民族共和國的代表及蘇維埃婦女等的大會，證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廣大的勞動大眾都團結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團結在蘇聯人民和全世界勞動大眾偉大的領袖——斯達林同志的周圍而奮鬥。

通過斯達林的憲法。黨為着實行新的社會主義的憲法而鬥爭。

一九三六年六月公佈了工農社會主義國家斯達林的憲法草案，並進行全民的討論。破壞托派匪徒的組織，他們是德日法西斯蒂所僱傭的偵探，危害者，破壞者和恐怖者（一九三六年八月對卡米尼夫、徐諾維夫的審判；一九三七年一月對於反蘇維埃托派中心的參加者皮塔可夫的審判）；破壞右派反革命分子。一九三七年二月，布哈林、李可夫被開除黨籍。

布爾塞維克黨為着鞏固自己的隊伍，提高布爾塞維克的警覺性和鎮壓與消滅社會主義的敵人而鬥爭。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決議恢復接收新黨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蘇聯第八次的蘇維埃的臨時大會，斯達林報告新憲法的草案。斯達林稱：我們蘇維埃的社會已經基本的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用馬克思主義者的口調說，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者是低級的階段已經實現了。

新經濟政策已經結束，創立了社會主義的公產，表現在兩種方式上，即國家的和集體合作社的。這是蘇維埃制度不可動搖的基礎。剝削階級和階級剝削的消滅。在蘇聯發揚了世界上最完善最澈底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蘇聯工人階級專政基礎的鞏固與擴大。

第八次臨時蘇維埃大會，一致的通過了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斯達林憲法。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央會議，斯達林在會議上的報告論黨內工作的缺點及消滅托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

斯達林論帝國主義包圍對於蘇聯的意義。清淡，苟安，愚昧，麻木和政治上的近視，是我們黨和經濟工作缺點的原因，必須要克服它。

斯達林論現階段中黨的任務。

塞丹諾夫的報告：『新選舉制度下黨政工作的改造及黨的組織對於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準備工作。』

黨內民主和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擴大。施行黨內機關祕密的選舉。

加強黨內幹部政治教育的工作。

現實斯達林的口號：『把握布爾塞維主義。』在列寧、斯達林領導之下的聯邦共產黨偉大的勝利，有其世界的歷史意義。

附

錄

三

蘇聯共產黨

——布爾塞維克——

黨 章

共產國際的支部

——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 * 為共產國際的支部,是蘇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先鋒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黨在為無產階級專政,為社會主義勝利而進行的鬥爭中實現對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全體勞動

* 簡稱聯共(布)——譯者。

羣衆的領導。

黨領導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並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順利建成。

黨是以自覺的，無產階級的紀律聯結着的統一的戰鬥組織。黨的力量就在於自己的團結性，意志統一和行動一致，不容許離開黨綱，破壞黨紀和結成黨內的派別組織。

黨要求自己的黨員進行積極的和自我犧牲的工作，來實現黨綱和黨章，執行黨及其機關的一切決議，保證黨的隊伍的統一鞏固，蘇聯各民族底勞動羣衆彼此間的以及和全世界無產者的兄弟的國際主義的關係。

第一章 黨員及其義務

一、凡承認黨綱，在黨的一個組織內工作，服從黨的決議和繳納黨費者，都得認為黨員。

二、黨員必須：

(一) 遵守嚴格的黨紀，積極參加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生活，在實際上執行黨的政策和黨的機關的決議；

(二)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武裝程度，通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礎，黨的最重要的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並向非黨羣衆解釋這些決議；

(三) 共產黨員在蘇維埃國家是當權政黨的黨員，應當遵守勞動紀律和國家紀律的模範，應精通自己本分事業的技術，不斷提高自己生產的和辦事的熟練程度。

三、接收黨員只能按個別的手續進行。新黨員是從候補黨員中經過了規定的候補期限，受過了政治常識教育，領會了黨綱和黨章者接收的。工人，集體農民，紅軍兵士，學生和職員，在同情組內，在蘇維埃，職工會，青年團，合作社和代表會內的工作中有了好的表現，得到了他以前或現在做工地方的組織的批評以後，都得被接收為黨員。

候補黨員轉為黨員的手續如下：

(一) 規定四個種類：1. 工業工人生產年限滿了五年者；2. 工業工人生產年限不滿五年者，農業工人，由工人和集體農民出身的紅軍兵士，直接在車間或生產地段上做工的工程技術工作人員；3. 集體農民，手工業組合的社員，小學教員；4. 其他職員。

(二) 第一類人入黨，須有三個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介紹；第二類人入黨，須有五個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介紹；第三類人入黨，須有五個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介紹和農業機器站政治部或區委一個代表底介紹；第四類人入黨，須有五個有十年黨齡的黨員介紹。

附註：在接收各類的少共團員入黨時，蘇聯少共區委員會的介紹等於兩個黨員的介紹。

(三) 從其他政黨退出的人，只在特別的情形下才接收，同時須有五個黨員的介紹；三個

有十年黨齡的黨員，兩個革命以前入黨的黨員，只能經過生產的初級組織，並且必須得聯共

(布)中央的批准，不管入黨者社會地位如何。

附註：中央可以將接收其他政黨退出的人員入黨的最後批准權授給個別邊疆的和省的黨委員會以及各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

(四) 審查介紹書須在入黨前舉行並由地方黨委員會負責。

(五) 關於接收黨員的問題，預先由黨的初級組織審查，由該組織黨員大會通過，並由上級機關批准，即發生效力；對於第一和第二類人，由區委或市委批准；對於第三和第四類人，即由省委、邊委或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批准。

(六) 二十歲和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入黨，只能經過青年團。

四、介紹人替被介紹人負担責任，如果介紹沒有根據時，須受黨的處分，直到開除黨籍爲止。

五、由候補黨員轉爲黨員者的黨齡，從黨的相當的初級組織全體黨員大會通過批准該同志爲黨員的決議之日算起。

六、某一個組織的任何一個黨員，在轉到另一個組織底工作區域時，即算爲後者的黨員。

附註：黨員由一個組織轉到另一個組織，按照聯共(布)中央所規定的條例施行。

七、黨員及候補黨員，沒有正當理由，三個月不繳納黨費者，即認爲脫了黨的人，並通知初級組織的

全體黨員大會

八、關於開除某人的黨籍的問題，由該黨員所在那個組織的黨員大會決定，並由上級黨部批准。對於第一和第二類人，由省委和邊委批准，對於第三和第四類人，則由區委或市委批准。同時，從被黨組織的黨員大會或黨委員會開除之日起，該人即被解除黨的工作。關於被開除的黨員，在黨刊上公佈並指出開除的原因。

九、依聯共（布）中央定期的決議舉行清黨，以便有系統的清除階級異己的和有敵視心的分子；

欺騙黨的，隱蔽自己的真正觀點的及破壞黨的政策的人；

公開和秘密破壞黨的及國家的鐵的紀律者；

與資產階級分子相結合的蜕化分子；

鑽營職位者，自私自利者，官僚化的分子；

道德上腐化的，行為不正而損傷黨員資格的，玷污黨的旗幟的分子；

消極的，不執行黨員的義務和不領會黨綱，黨章及黨的最重要的決議的分子。

第二章 候補黨員

十、凡想入黨的人，須經過候補期限，以便使候補人澈底認識黨綱、黨章、黨的策略並審查他的個人品質。

十一、接收候補黨員的手續（種類的劃分、介紹書的性質及其審查、黨組織的通過、黨委員會的批准）與接收黨員的手續完全相同。

十二、候補期限規定如下：對於第一類人規定為一年，對於第二、第三和第四類人定為兩年。

附註：由其他政黨退出的分子，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一律經過三年的候補期限。

十三、候補黨員參加其所屬的組織的會議，只有發言權。

十四、候補黨員向當地黨委員會的會計處繳納普通的黨員費。

第三章 同情員小組

十五、為要將最接近黨的，在事實上——在生產中——證明了自己對黨忠實，但還不到入黨程度的非黨的積極分子組織在聯共（布）周圍起見，在黨的各初級組織下，成立無條件的服從黨機關的一切決議的聯共（布）同情員小組。

十六、加入同情員小組，由工廠的，機關的和其他的黨委員會，農業機器站，蘇維埃農莊和鐵路運輸業的政治部決議接受，須有兩個黨員介紹。

十七、聯共（布）同情員小組的組員，必須參加黨的一切公開會議，並在公開會議上有發言權，必須積極為執行黨和政府的決議而鬥爭，在黨的領導之下有系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第四章 黨的組織構造

十八、黨的組織構造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說：

- （一）黨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上到下，一律依選舉制產生，
- （二）黨的機關定期向自己的黨組織作工作報告，
- （三）嚴格的黨紀和少數服從多數，
- （四）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無條件的務必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

十九、黨的構造是根據民主集中制，按照地域和生產為標準；辦理某區全區黨務的組織，對於辦理該區的一部分黨務的一切組織，算是上級組織；或是辦理整個生產部門或管理部門黨務的組織，對於辦理該部門的一部分黨務的一切組織，算是上級組織。

- 二十、黨的一切組織，在地方問題的決定上，可以自主，只要這些決定不與黨的決定相矛盾。
- 二十一、每個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

二十二、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選出委員會，委員會是他們的執行機關並領導這組織的一切日常工作。

二十三、黨的組織系統如下：

(一) 蘇聯全境——全蘇聯的聯共(布)代表大會——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二) 省、邊疆、共和國——省代表會議，邊疆代表會議，民族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三) 市、區——市代表會議，區代表會議——市委員會，區委員會；

(四) 企業、村莊、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紅軍部隊、機關——黨的初級組織的黨員大會，代表會議——初級黨委員會(工廠黨委員會，紅軍部隊黨常務局等等)。

二十四、服從關係，工作報告，黨的決議的傳達和抗爭，其次序如下(從上級機關到下級機關)：

全蘇聯黨代表大會，聯共(布)中央，省和邊疆代表會議，民族共產黨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市和區代表會議，市和區委員會等等。

二十五、為進行實際工作來實現黨的指示和決議(以及審查蘇維埃經濟機關和黨的下級組織怎樣執行這些指示和決議)起見，在各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聯共(布)

中央委員會內，設立一些完整的生產部門部。

在聯共（布）中央內設立：

（一）農業部，（二）工業部，（三）運輸部，（四）設計、財政、商業部，（五）政治和行政部，（六）黨的領導機關部，（七）文化和列寧主義宣傳部，（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以及兩股：總務股和特務股）。

在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及民族共產黨中央內設立：

（一）農業部，（二）工業和運輸部，（三）蘇維埃商業部，（四）文化和列寧主義宣傳部，（五）黨的領導機關（市的和區的）部和特務股。

在每個生產部門內，集中該部門的全部工作；黨的組織工作，分配和造就幹部，羣衆鼓動工作，生產的宣傳工作，監督相當蘇維埃經濟機關和黨的組織對黨的決議的執行。

二十六、黨的每個組織，得到最後批准以後，即有權備具自己的圖章，但必須得相當的上級黨組織的認可。

第五章 黨的中央組織

二十七、黨的最高機關爲代表大會。定期代表大會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非常代表大會，由中央自己發起或根據上次代表大會所代表的全體黨員至少三分之一的黨員的要求而由中央召集。黨代表

大會的召集和議事日程，至遲要在大會前一個半月宣佈，非常代表大會在兩個月的期限內召集。代表大會，如果他所代表的黨員至少有上次定期代表大會所代表的全體黨員的半數，即認為有效。

出席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定額，由中央委員會規定。

二十八、在中央委員會不按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期限召集非常代表大會時，要求召集非常代表大會的各組織，有權成立組織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來召集非常代表大會。

二十九、代表大會：

(一) 聽中央委員會、黨的監督委員會、中央檢察委員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報告並批准這些報告；

(二) 審查和改變黨綱和黨章；

(三) 規定黨對基本的日常政治問題的策路路線；

(四) 選舉中央委員會、黨的監督委員會、中央檢察委員會，並擬定蘇維埃監督委員會的人選交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批准。

三十、中央委員會和其他的中央機關，按代表大會所規定的成份選舉出來。如遇中央委員會委員離職時，則由大會選出的候補委員按大會所規定的次序替補。

三十一、中央委員會至少每四個月開一次全體會議。中央候補委員出席中央全體會議，但只有發言權。

三十二、中央委員會設立政治局以進行政治工作，設立組織局以担任對組織工作的一般領導，設立書記處以辦理組織和執行性質的日常工作。

三十三、在兩屆代表大會之間，由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全部工作，代表本黨與其他政黨，其他組織和機關發生關係，組織黨的各種機關並領導它們的行動，委任在他監督之下工作的各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批准大的地方組織內黨機關報的編輯員，組織並領導有社會意義的企業，分配黨的人力和經費，並主持中央會計處。

中央委員會經過中央蘇維埃的和中央社會組織內的黨組織來指導這些組織的工作。

三十四、爲加強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和政治工作起見，中央委員會有權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落後的而對於國民經濟和全國有特別重要意義的部門內設立政治部和委派中央的黨組織員，並且按政治部完成自己的突擊任務的程度，把他們變爲普通按生產和地域的標準而建立的黨的機關。

政治部根據相當的生產的黨委員會的權限而進行工作，並由聯共（布）中央經過中央的相當生產部門部，或經過專門組織起來的政治管理處和政治股直接指導。

三十五、中央委員會經常將自己的工作通告黨的組織。

三十六、黨的監督委員會

(一) 監督聯共(布)及其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的執行。

(二) 究辦破壞黨的紀律者。

(三) 究辦破壞黨的道德者。

三十七、中央檢查委員會檢查：(一) 黨各中央機關內黨務之進行是否敏捷和正確以及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機關是否有條理。(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會計處和企業。

第六章 黨的邊疆的，省的，共和國的組織

三十八、省的，邊疆的，共和國的黨組織的最高機關為省的，邊疆的代表會議或民族共產黨的代表大會，而在兩屆會議之間，則為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以蘇聯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總決議為指導。

三十九、邊疆的，省的定期代表會議或民族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當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或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年半召集一次；非常代表會議，則根據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或根據屬於該邊疆，省，共和國的黨組織全體三分之一的黨員的要求而實行召集。

出席邊疆代表會議，省代表會議，民族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額數，由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規定。

邊疆代表會議，省代表會議，民族共產黨代表大會，總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邊疆的省的其他機關的工作報告並批准這些報告，討論本邊疆，本省或本共和國內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和工會的工作問題，並選舉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在共和國則選舉民族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出席全蘇聯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四十、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共和國內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立相當的執行機關以担任日常工作，人數不能超過十一人，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批准，並設立兩個書記——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以辦理日常工作。充任書記者至少須有十二年的黨齡。

四十一、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本邊疆，本省，本共和國範圍內，組織各種的黨的機關，並領導它們的行動，指派在它監督下工作的邊疆和省的黨機關報的編輯部，領導黨外各組織內的黨組，組織並領導自己已有全省，全邊疆，全共和國意義的企業，在自己組織範圍內分配黨的人力和經費，並主持本邊疆，本省，本共和國的黨的會計處。

四十二、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全體會議，至少三個月召集一次。

四十三、屬於邊疆或共和國之內的民族省，其他省和自主共和國等等的黨的組織，在邊疆委員會或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工作，而在內部生活上則遵照黨章第六章關於邊疆，省和共和國

的組織條例。

第七章 黨的市和區的（鄉村和城市的）組織

四十四、黨的市代表會議，區代表會議，由市委員會，區委員會召集，至少一年一次非常代表會議的召集，則根據市委員會，區委員會底決定，或根據該市組織，區組織屬下各組織內佔全數三分之一的黨員底要求。

市代表會議或區代表會議，聽市委員會或區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市的或區的其他機關底工作報告並批准這些報告，選舉市委員會，區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出席邊疆和省的代表會議或民族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四十五、市委員會的書記必須有十年的黨齡，而區委員會的書記必須有七年的黨齡。市委員會和區委員會的書記由省委員會，邊疆委員會或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准。

四十六、市委員會或區委員會各選舉一個常務局，人數由五人到七人，組織並批准企業的，蘇維埃農莊內，農業機器站內，集體農莊和機關內的黨的初級組織，進行登記全體共產黨員。在市或區底範圍內，組織黨的各種機關並領導它們的行動，委任在它領導和監督之下的市或區黨機關報的編輯員，領導黨外各組織內的黨組，組織自己的有全市或全區意義的企業，在市或區的範圍內分配黨底人力和

經費，並主持市或區的黨會計處。市或區委員會按聯共（布）中央所規定的期限和形式向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自己的工作情形。

四十七、在各大城市裏，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允許，得成立服從市委員會的區的組織。

第八章 黨的初級組織

四十八、黨的基礎為黨的初級組織。在輕工廠，重工廠，蘇維埃農莊和其他經濟企業內，在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紅軍部隊內，在村莊內，機關內等等，在黨員人數滿了三人時，得建立黨的初級組織。在黨員不滿三人的企業，集體農莊，機關等等內面，建立以黨的組織員為首領的候補黨員小組或黨與少共小組，黨的組織員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指定。黨的初級組織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相當的政治部批准。

四十九、在有大批黨員（從一百人到三千人以上）的那些大的企業，機關，集體農莊等等內面，在包括整個企業，機關等等的初級組織以內，在個別情形之下，得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相當的政治部的批准，可以按車間，地段，分部等等成立黨的組織。而在車間地段等等內部，又可以按分隊，分團等等建立黨組。

五十、黨的初級組織使工農羣衆與黨底領導機關聯系起來。它的任務是：

(一) 在羣衆中進行鼓勵工作和組織工作以實現黨的口號和決議；

(二) 吸收同情員和新黨員，並對他們施行政治教育；

(三) 協助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進行日常的組織工作和鼓勵工作；

(四) 在企業、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等等內面，動員羣衆來完成生產計劃，來鞏固勞動紀律和發展突擊運動；

(五) 與企業、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內的懈弛現象和不好生經營事務的現象作鬥爭，日常顧慮改善工人和集團農民的生活條件；

(六) 以黨的機關底資格，積極參加國家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

五十一、爲進行日常工作起見，黨的初級組織選舉黨委員會（輕工廠黨委員會，重工廠黨委員會等等），人數不能超過十一人，一年爲期，車間組織，則選舉黨的組織員，由初級的黨委員會批准。

黨的組織內，黨員和候補黨員不滿十五人時，不建立黨委員會，只選出黨的組織員。

在組織不超過一百個黨員的初級黨委員會內，黨的工作，照例是由不解放生產工作的工作人員担任。在黨員人數到一千人的黨委員會內，應有二三個解放了生產工作的領薪的工作人員做工。在黨員人數到三千和三千以上的黨委員會內，可以有四五個解放了生產工作的同志做工。

初級黨委員會的書記，至少必須有三年黨齡，而黨的組織員至少必須有兩年黨齡。

第九章 紅軍內的黨組織

五十二、在紅軍，紅色海軍，紅色空軍內，黨的工作底一般的領導由工農紅軍政治管理處實行，紅軍政治管理處行使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軍事部底職權。紅軍政治管理處，則經過它所委任的政治部，軍事政治委員和相當的紅軍代表會議選出的黨委員會來進行自己的領導。

紅軍，紅色海軍，紅色空軍內的黨組織，根據聯共（布）中央所批准的特別訓令進行工作。

五十三、軍區，艦隊和全軍的政治部主任，必須有十年的黨齡，師和旅的政治部主任，必須有六年的黨齡。

五十四、紅軍政治機關必須與當地的黨委員會有密切關係，其方法是紅軍政治機關的領導者和軍事政治委員（政治方面的助手）經常參加地方的黨委員會以及黨委員會有系統的聽政治機關主任和軍事政治委員（政治方面的助手）關於軍隊內政治工作的報告。

第十章 黨外組織中的黨組

五十五、在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及其他黨外的羣衆組織的一切代表大會上，會議上和選出的機關內，黨員人數滿了三人，即組織黨組，其任務是在各方面加強黨的影響，在黨外羣衆中實行黨

的政策，鞏固黨和蘇維埃的紀律，與官僚主義鬥爭，審查黨的和蘇維埃的指令的執行。

黨組選舉一個書記以担任日常工作。

五十六、這些黨組，無論其意義如何，完全服從相當的黨組織（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委員會，區委員會。）關於一切問題，黨組必須嚴格和堅決遵守黨的領導組織的決議。

第十一章 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

五十七、在個別黨的組織內或全黨之內自由和切實討論黨的政策的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制所得到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在黨內民主制底基礎上，可以擴展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和鞏固黨的紀律，而這種紀律應是自覺的，而不是機械的。但是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廣大的爭論，特別是全蘇聯範圍內的爭論，應該這樣來組織，就是要使它不能造成極少數人強迫黨內極大多數服從自己的意志的企圖或是形成破壞黨的統一的派別組織的企圖，造成分裂的企圖，因這個企圖可以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勢力和牢固立場而使工人階級的敵人高興。因此，全蘇聯範圍內廣大的爭論，只能在以下的一種情形下才能認為必要：（一）這種必要，至少為幾個省的或共和國的黨組織所承認；（二）如果中央委員會內部對於黨的政策的一些最重要問題沒有充分堅決的大多數；（三）如果中央委員

會內雖有站在一定觀點上的堅決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會還是認為必要用黨內爭論辦法來審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只有執行這些條件，才能保證黨不被反黨分子濫用黨內民主，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可以指望黨內民主有利於實事和不會被人利用來損害黨和工人階級。

五十八、保持黨的統一，與派別鬥爭和分裂黨的那些最小的企圖作無情鬥爭，實行最嚴格的黨的和蘇維埃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和黨的一切組織的最首要的義務。為實現黨內和一切蘇維埃工作中的嚴格紀律和達到最大的統一而消滅任何黨內派別組織性起見，如有破壞紀律或復活或進行派別組織行動時，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有權採用一切黨的處分辦法，直到開除黨籍為止，而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則降為候補委員以及開除黨籍作為最後辦法。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委員，採用這種最後辦法的條件，應是召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請全體中央候補委員和全體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委員出席。如果這種黨內最負責領導者的全體會議，有三分之二表決認為必要將某中央委員或黨的監督委員會降為候補委員或開除黨籍時，那末，這種辦法應立即實行。

五十九、黨和蘇維埃的中央機關的決議，應該迅速和確切執行。不執行上級組織的決議和犯其他的罪行由黨的公意認為是罪惡行為時應受處罰；對於黨的組織是給以處分和總的重新登記（解散組織）；對於個別的黨員，則給予某種處分（勸告，警告等等）；當衆的處分，暫時撤消黨的和蘇維埃的

負責工作，開除黨籍，並將其罪過通知各行政和司法機關。

六十、對黨的監督委員會的問題不肯據實回答的黨員，應立即開除黨籍。

第十二章 黨的經費

六十一、黨及其各組織的經費，由黨費收入，黨的企業的收入和其他進款組成之。

六十二、黨員和候補黨員每月的黨費，規定如下：

每月工資在一〇〇盧布以下的，每月繳二〇哥比；每月工資從一〇一到一五〇盧布的，每月繳六〇哥比；

每月工資從一五一到二〇〇盧布的，每月繳一個盧布；

每月工資從二〇一到二五〇盧布的，每月繳一盧布五〇哥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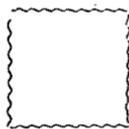
每月工資從二五一到三〇〇盧布的，每月繳二個盧布；

每月工資從三〇一到五〇〇盧布的，每月繳工資百分之二；

每月工資在五〇〇盧布以上的，每月繳工資百分之三。

六十三、加入為候補黨員時，須繳入黨費，費額為所得工資底百分之二。

聯共黨史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十月初版
出版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初版二千部每部五册合售定價五元

冊 本

定價一元八角

#1976
171220

1.14.24

GF